



有形基督教会史

历永举 著

于泽安 梁巧玲 孙松阳 校

圣约内部资料



目 录

| | |
|----------|---|
| 作者序..... | 1 |
| 绪论..... | 3 |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 | |
|------------------------------|-----------|
| 第一章 旧约教会前期背景..... | 11 |
| 第一节 教会的开始..... | 11 |
| 第二节 古代埃及与以色列历史..... | 15 |
| 第三节 未成年的教会——以色列在迦南..... | 17 |
| 第二章 旧约几个帝国..... | 18 |
| 第一节 亚述帝国..... | 18 |
| 第二节 新巴比伦帝国..... | 19 |
| 第三节 波斯帝国..... | 23 |
| 第四节 希腊帝国..... | 24 |
| 第三章 两约间教会历史及背景..... | 29 |
| 第一节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 | 29 |
| 第二节 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马加比起义..... | 30 |
| 第三节 犹太亡国..... | 32 |
| 第四节 罗马帝国..... | 33 |
| 第五节 帝国统治下的犹太..... | 33 |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 | |
|----------------------------|-----------|
| 第一章 耶稣和使徒时代的教会..... | 39 |
| 第一节 耶稣在世时代..... | 39 |
| 第二节 使徒传福音和殉道..... | 42 |
| 第三节 第一次大逼迫..... | 44 |

| | |
|--|----|
| 第二章 初代教会教父和逼迫 | 47 |
| 第一节 教父和地区主教制的形成..... | 47 |
| 第二节 初代教父的主要神学思想..... | 48 |
| 第三节 最早的几个异端..... | 50 |
| 第四节 大逼迫和殉道..... | 53 |
| 第五节 几位护教士和教父..... | 55 |
| 第六节 马可·奥热流大逼迫..... | 59 |
| 第七节 亚历山大学派错谬的教义..... | 60 |
| 第八节 二世纪最大的异端——神格唯一论..... | 62 |
| 第九节 几次大逼迫..... | 63 |
| 第三章 米兰敕令和尼西亚大公会议 | 67 |
| 第一节 君士坦丁当政..... | 67 |
| 第二节 尼西亚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 | 70 |
| 第三节 亚他那修..... | 74 |
| 第四节 老底嘉大公会议（363年，COUNCIL OF LAODICEA）..... | 77 |
| 第五节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第二次大公会议）..... | 77 |
| 第四章 几位拉丁教父 | 82 |
| 第一节 安波罗修..... | 82 |
| 第二节 耶柔米..... | 83 |
| 第三节 约翰·屈梭多模..... | 84 |
| 第五章 以弗所会议（第三次大公会议） | 86 |
| 第一节 聂斯多留派异端..... | 86 |
| 第二节 犹提克——一性论..... | 88 |
| 第三节 迦克墩会议..... | 89 |
| 第六章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及伯拉纠主义 | 92 |
| 第一节 奥古斯丁生平..... | 92 |
| 第二节 伯拉纠主义..... | 93 |
| 第三节 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教义贡献..... | 95 |
| 第七章 教会渐趋腐化和修道主义兴起 | 98 |
| 第一节 罗马主教长为首地位的形成..... | 98 |
| 第二节 教会开始腐化..... | 99 |

| | | |
|------------|--------------------------|------------|
| 第三节 | 修道主义产生..... | 101 |
| 第八章 | 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灭亡..... | 103 |
| 第一节 | 蛮族入侵..... | 103 |
| 第二节 | 罗马帝国灭亡..... | 104 |
| 第三节 | 教会向蛮族传福音..... | 105 |
| 第四节 | 有形教会偏离正路..... | 106 |
| 第五节 | 拜占庭帝国强大..... | 108 |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 | | |
|------------|----------------------------|------------|
| 第一章 | 回教兴起（632—732年）..... | 115 |
| 第一节 | 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 | 115 |
| 第二节 | 东罗马领地丧失和抵抗..... | 118 |
| 第二章 | 教皇国产生..... | 123 |
| 第一节 | 加洛林王朝兴起..... | 123 |
| 第二节 | 教皇采取各种手段增加权势..... | 126 |
| 第三节 |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 127 |
| 第三章 | 教会独立与革新..... | 129 |
| 第一节 | 教会挣脱世俗政权的掌控..... | 129 |
| 第二节 | 教会腐败日趋严重..... | 131 |
| 第三节 | 教会克吕尼革新运动..... | 134 |
| 第四节 | 教皇和皇帝授衣礼之争..... | 137 |
| 第四章 | 十字军东征和东罗马帝国灭亡..... | 144 |
| 第一节 | 十字军东征的背景..... | 144 |
| 第二节 | 十字军八次东征的经过..... | 146 |
| 第三节 | 东征结果：东罗马帝国灭亡..... | 148 |
| 第五章 | 教皇权势达到顶峰..... | 149 |
| 第一节 | 英诺森三世时教会权势达到顶峰..... | 149 |
| 第二节 | 英诺森在教会教义上走入更大错谬..... | 152 |
| 第三节 | 坐在神殿里..... | 154 |
| 第四节 | 瓦勒度派兴起..... | 156 |
| 第五节 | 几个新的修会产生..... | 158 |

| | |
|-------------------------------|-----|
| 第六章 教会权势衰落和文艺复兴 | 160 |
| 第一节 英诺森四世后的天主教会..... | 160 |
| 第二节 教皇势力的衰落..... | 160 |
| 第三节 文艺复兴的开始..... | 164 |
| 第四节 天主教的神学根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 170 |
| 第七章 改教先驱 | 176 |
| 第一节 天主教更加疯狂地屠杀和迫害..... | 176 |
| 第二节 威克里夫..... | 177 |
| 第三节 约翰·胡斯..... | 182 |
| 第四节 共同生活弟兄会..... | 185 |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 | |
|---------------------------------|-----|
| 第一章 神使用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 | 189 |
| 第一节 马丁·路德早期..... | 189 |
| 第二节 宗教改革的背景..... | 191 |
| 第三节 马丁·路德发起改教运动..... | 193 |
| 第四节 德国教会的改革..... | 198 |
| 第五节 路德的助手和支持者..... | 201 |
| 第六节 奥斯堡和约..... | 204 |
| 第二章 瑞士的改教运动初期 | 206 |
| 第一节 慈运理在瑞士发起宗教改革..... | 206 |
| 第二节 慈运理和路德的分歧及慈运理的殉道..... | 207 |
| 第三节 布林格继续瑞士的宗教改革..... | 209 |
| 第四节 重洗派的兴起..... | 215 |
| 第三章 加尔文的改教运动 | 219 |
| 第一节 法国的宗教改革初期..... | 219 |
| 第二节 加尔文早期..... | 221 |
| 第三节 首次日内瓦..... | 224 |
| 第四节 重返日内瓦..... | 227 |
| 第五节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 | 235 |

| | |
|---------------------------------|------------|
| 第四章 英国初期宗教改革 | 248 |
| 第一节 威廉·丁道尔..... | 248 |
| 第二节 初期王朝开展的宗教改革..... | 252 |
| 第三节 玛丽治下的天主教复辟..... | 255 |
| 第四节 伊丽莎白时代的改教运动..... | 259 |
| 第五节 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 262 |
| 第五章 荷兰宗教改革 | 275 |
| 第一节 尼德兰革命..... | 275 |
| 第二节 亚米念主义和多特大会..... | 278 |
| 第三节 神学家布雷克..... | 283 |
| 第六章 法国后期宗教改革和大逼迫 | 291 |
| 第一节 法国王室的更迭..... | 291 |
| 第二节 法国宗教战争..... | 292 |
| 第三节 圣巴多罗买惨案..... | 294 |
| 第四节 南特赦令..... | 295 |
| 第七章 天主教反改革会议与三十年战争 | 297 |
| 第一节 天特会议..... | 297 |
| 第二节 三十年战争..... | 298 |
| 第八章 英国清教徒运动 | 300 |
| 第一节 清教徒的产生..... | 300 |
| 第二节 詹姆斯一世对清教徒的第一次逼迫..... | 303 |
| 第三节 詹姆斯一世的继续逼迫和五月花号..... | 305 |
| 第四节 查理一世的天主教复辟..... | 309 |
| 第五节 内战时期..... | 312 |
| 第六节 威斯敏斯特大会..... | 314 |
| 第七节 《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摘录和特点..... | 317 |
| 第八节 清教徒的危机和查理二世的反攻..... | 320 |
| 第九节 浸礼派与贵格会..... | 325 |
| 第十节 英国国内逼迫时期清教徒的生活..... | 328 |
| 第十一节 光荣革命..... | 334 |

第五部 近代教会史

| | |
|----------------------------------|-----|
| 第一章 敬虔运动与摩拉维亚弟兄会 | 341 |
| 第一节 施本尔和富朗开..... | 341 |
| 第二节 亲岑多夫和摩拉维亚小群的兴起..... | 346 |
| 第三节 循道派..... | 349 |
| 第二章 英国圣公会开放和新派丛生 | 358 |
| 第一节 循道宗成为基督教主流..... | 358 |
| 第二节 英国弟兄会的兴起和分化..... | 358 |
|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 364 |
| 第一节 改革宗再遭逼迫..... | 364 |
|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 | 367 |
| 第三节 拿破仑时期及以后的教会..... | 369 |
| 第四章 天主教收复失地和西欧教会的衰落 | 372 |
| 第一节 德国的大学失落和改革宗教会的衰落..... | 372 |
| 第二节 德国自由主义学说及新派神学兴起..... | 373 |
| 第三节 圣经批判学和无神论的诞生..... | 376 |
| 第四节 英国教会的衰落..... | 378 |
| 第五章 教会在美洲大陆 | 382 |
| 第一节 教会在新大陆扎根..... | 382 |
| 第二节 教会经历大觉醒..... | 384 |
| 第三节 约拿单·爱德华滋..... | 388 |
| 第四节 爱德华滋的《宗教情感》选读..... | 395 |
| 第五节 大觉醒后教会的复兴..... | 403 |
| 第六章 独立战争 | 406 |
| 第一节 独立战争的背景..... | 406 |
| 第二节 战争经过..... | 407 |
| 第三节 美国成立后的信仰状况..... | 411 |
| 第四节 美洲的第二次大觉醒..... | 413 |
| 第五节 芬尼的复兴主义..... | 414 |

| | |
|-----------------------------------|------------|
| 第七章 美国近代错谬神学泛滥 | 417 |
| 第一节 时代论和千禧年主义兴起..... | 417 |
| 第二节 慕迪带来现代福音派复兴..... | 419 |
| 第三节 自由派神学和基要主义..... | 421 |
| 第四节 长老会的几位著名的神学家..... | 424 |
| 第五节 北美长老会倒向新派《奥本宣言》..... | 428 |
| 第六节 普林斯顿大学的改革宗阵营被现代神学占领..... | 429 |
| 第八章 欧洲近代改革宗教会 | 434 |
| 第一节 其他国家的改革宗教会状况..... | 434 |
| 第二节 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复兴..... | 435 |
| 第三节 英国司布真浸信会的复兴..... | 445 |
| 第四节 教会在宣教及社会的见证..... | 448 |
| 第九章 错谬异端的兴起和改革宗教会的艰难 | 455 |
| 第一节 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 | 455 |
| 第二节 新正统派..... | 456 |
| 第三节 近代几位改革宗神学家..... | 458 |
| 第四节 几个异端兴起..... | 461 |
| 第五节 20世纪最大的异端——灵恩派..... | 464 |
| 第六节 心理学登上科学和教会讲坛..... | 467 |
| 第十章 世界大背道与普世福音 | 469 |
| 第一节 猴子事件..... | 469 |
| 第二节 美国改革宗教会现状..... | 471 |
| 第三节 现代普世合一运动..... | 472 |
| 第四节 世俗潮流冲击着名义上的教会..... | 476 |
| 参考文献 | 479 |
| 附录一 罗马皇帝表 | 483 |
| 附录二 教皇表 | 485 |
| 附录三 改教时期欧洲王室谱系 | 490 |
| 复习题 | 491 |

作者序

本书之所以取名为《有形基督教会史》，是基于改革宗对教会作出的分类方法——将地上可见的、争战中的教会定义为有形教会。虽然这教会时而光明，时而黑暗，但上帝对其恩典的环绕和看顾却从未止息。虽然她不断地遭受撒但和世界的袭扰，甚至有时似乎被仇敌铲除净尽；虽然教会的内部始终鱼龙混杂，每个成员都充满了软弱和败坏，内外交困，生长如嫩芽，但她却一直安稳于磐石之上，坚立于天地之间，地上一个个强大的帝国在她面前灰飞烟灭。为何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教会的根基立定在万古之先，她的工程早已被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成就，她的成长时时在保惠师的看顾之中。所以，“谁能把她怎么样呢？”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透过教会历史的主要脉络，从庞大纷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背后，看见上帝主权的大手如何掌管历史——祂不仅展开教会的历史，更展开人类的历史，调度万事，使祂的教会（又是祂的身体）得益处。虽然我们记录的有限，我们能记住的更是稀少，但惟愿每一位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从心中发出无比的赞叹：“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诚哉！”（启 15:3）

感谢孙松阳弟兄、于泽安姐妹、梁巧玲姐妹、由婷婷姐妹花费巨大精力对本书进行修订，愿上帝纪念他们。

孙序

圣经的真理是唯一且和谐的，因为启示圣经的上帝是独一全智的。但今天的教会中却充斥着许许多多不和谐乃至自相矛盾的对圣经的解释，有的人甚至用几句圣经就可以建立一个教义，如用“只要信，就必得着”几句话就建立了“信心万能”的信仰。充斥今天教会讲台的信息，正如今天的时代一样，虽然信息发达，却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那么，圣经不变的真理在历史中如何保守并传递下来？

《有形基督教会史》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圣经启示的真理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地传递下来、又是如何跨越不同民族地域被万民接受，以及这真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有形基督教会史》记载了从伊甸园到基督降生、从使徒时代到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近现代教会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历史意义和影响，波澜壮阔、广大恢宏。作者以“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为中心、以“上帝的救赎计划”为线索，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历史中护理的中心乃是祂的教会”、“教会的使命乃是见证、持守并传扬基督的真理”。

《有形基督教会史》帮助我们看到历代大公教会是如何整理、阐明并总结出圣经的真理以抵挡异端错谬的侵袭、世俗败坏的影响，向我们展示了上帝如何带领祂的教会在世上持守真理、与罪恶争战，让我们确信“上帝的教会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

今天的教会仍然在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回归上帝的话语、持守并传扬真理、抵挡错谬异端和各种罪恶的搅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有的事还会再有”，古时的异端错谬今天仍然不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古时的罪恶今天仍然威胁着教会的纯洁。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识别、警惕并驳斥掳掠今天教会的异端邪说；以古圣先贤为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回归圣经、敬拜和侍奉上帝，效法他们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回到圣经真理时，我们同样可以确信上帝今天与我们同在。

孙松阳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绪论

——关于教会历史的概述

1、教会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1) 教会是上帝向人类启示的媒介

自从伊甸园人类堕落以后，整个历史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史，所以宗教是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美国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宗教史。”其他的宗教观皆是基于人自身的努力和寻找，然而，基督教的宗教观是基于上帝的启示。

当一间政府向民众传达他的计划和命令时，需要透过一定的媒介，例如报纸、国家电视台等，这些媒介通常被称为“政府的喉舌”。那么，上帝将祂的救恩奥秘启示给人——这启示的内容就是上帝的圣言，即圣经——这种启示也要透过一定的媒介和载体，这媒介就是教会。人类若要认识上帝和祂的旨意，就必须通过教会。就连天使要明白神奥秘的旨意，都要透过对教会的考察，即考察教会怎样整理、讲解圣经，以及教会怎样在历史中见证圣经。

弗 3:9—11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2) 教会是人类历史的中心

上帝在圣经开篇便向我们启示，人类历史的出现源于祂的创造，是祂创造了历史，祂也主宰历史，最后还要终结历史。祂在永恒中已经定下要藉着祂的儿子进入历史，来成就祂的旨意，因此，上帝向人类所启示的焦点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用祂自己的宝血所重价买赎的教会，就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旨意的中心。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上帝与选民的关系是建立在恩典之约基础之上的，这恩约的中保是基督，因此，恩典之约的实施过程就是神藉着基督拯救选民的过程，通过教会得救赎，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因此，在神永恒的旨意中，教会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这就是改革宗教会的历史观。

人类历史处处彰显着上帝和谐一致的作为，祂调度万事，都是为要使教会得益处，所以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中，没有一件会与此无关。这样的记载在圣经中比比皆是。譬如，曾经有一个犹太的年轻人被随意安排到一群同胞中去做倒水或打扫的服侍工作，在工作时恰巧听到他们起誓要杀保罗的信息，于是将这个信息告知了舅父保罗，而当时恰是忠于法律的吕西亚在担任着当地千夫长的职务。这种种巧妙的安排使保罗逃徙罹难，并且最终安全抵达罗马，完成了他一生最远的宣教旅行。与此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虽然微小，却全部掌管在上帝手中，不差分毫。在保罗脱险一事上，最大的帮助应当是来自千夫长吕西亚的保护。然而，从吕西亚与保罗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推测他一生怎样努力才取得千夫长这一职位（徒 22: 28），而他的努力正是上帝主权运作的结果，为要成就祂对教会的旨意。

绪论

罗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教会历史的定义

教会历史，就是以上帝主权恩典的荣耀为出发点，以上帝对教会的工作为主线，总结并研究人类的历史。

从这一定义中可见研究教会历史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有形教会的本身。上帝在教会中的作为只是一条主线，人类历史围绕着这条主线不断展开，其目的是要使人 and 天使清晰地看见三位一体上帝在永恒中所定之约（即永恒之约）如何在历史中逐步成全。尽管撒但黑暗的势力不停地疯狂抵挡，人心也极其诡诈悖逆；尽管神的选民如此软弱，但上帝的旨意丝毫不被拦阻。无论是对于女人后裔的得胜，还是教会向万国的扩展，我们只认定一件事，那就是：

伯 42:2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3、学习教会历史的目的

(1) 认识上帝伟大的护理

第一，神的护理事无巨细。人类历史的内容极其庞大而繁杂。仅仅是一部中国历史，要想具备基本的了解，也要在大学学上四年，更不用说亚洲史、欧洲史、世界史……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层出不穷，不可胜数，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人类的历史果真是那样杂乱无章、无踪可寻吗？一定不是！因为一切的大事、小事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中。不用说人类社会，就是大风中被吹落的每一片树叶、大海中被激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在永恒上帝的掌管中，都是要实现祂预定的旨意。

诗 89:9 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

诗 107:25 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

第二，神护理万事为要成就祂的预旨。人类历史不是漫无目的地任意发展，而是都要实现上帝永恒的预旨。上帝一切作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藉着祂的爱子耶稣基督彰显自己的荣耀，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关于祂（耶稣基督）的故事”（History）。就像演员要按照剧本一幕幕的安排依次登场一样，人类历史也要按着上帝在万古之先所预定的旨意，被依次呼召出来，直到基督的国度彻底显现。

赛 41:4 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

启 6:1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

(2) 上帝借历史中先贤的榜样带给我们激励和安慰

学习教会历史会和在艰难中的选民带来极大的鼓励和安慰。通过历史，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环境看起来多么黑暗艰难，就如士师时代、以利亚时代，即使教

会似乎已被黑暗铲除净尽，几乎看不到一丝希望，然而神的教会依然如明光一样，向着空中掌权者夸胜，见证着教会元首基督是超乎万有的君王。同时，当我们看见那些和我们有一样软弱的人如何成为上帝翻转世界的工具时，便知道这实在不是人的作为。反之，我们也看见，再伟大的人一旦离开了主，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不应因自己的软弱和残余的罪性而气馁，只要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尽上自己的本分，也能活出不至虚空徒然的一生。

雅 5: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3) 将教会在历史上的失败作为我们今天的鉴戒

林前 10:11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耶 6:16 耶和華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历史就是后人的鉴戒。古代皇帝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不仅旧约以色列的失败是我们今日基督徒的鉴戒，就是新约教会历史中圣徒的失败也同样是我们的鉴戒，因为我们是同被一位圣灵所引领，面对同一个仇敌的攻击，也具有同样的软弱和败坏。因此使他们得胜的恩典，也是我们所依靠的恩典；他们的失败也会成为我们的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们要寻访古道，晓得哪些应当效法，哪些需要谨慎。

再者，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产生的正面果效或负面果效，不一定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好树一定要结好果子，坏树一定要结坏果子，然而这果子并非在播种的当时就能结出来看得见的，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这一点特别反映在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错谬、一个偏离圣经的方法对教会产生的危害，大都在历经几个世纪以后才显明出来，有的狐狸尾巴在以后的数百年才显露，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上的争战，看见那些孤独的先知们发出沉痛的呼喊与哀叹时，也为今天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反思。

美国的芬尼在 18 世纪采用许多偏离圣经的方法“传福音”，短时期内的确给美洲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复兴”的浪潮。然而，一些忠心的牧者却洞察出这背后是撒但的工作。但他们的呼声一发出就立刻被那些“复兴的狂浪”所淹没，人们嘲讽他们是“吃不着葡萄的人”。一位牧师阿萨赫尔·内特尔曾如此感叹道：“这些复兴的新措施损害了教会，是玩火自焚，这会给教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些对复兴的错误偏见，会像旋风一样势不可挡，我们的一切担心都会成为事实，我们这块土地的教会将会变得破败不堪。虽然那时我们已经归于尘土，但我们的见证将会存留下来，并公诸于世！”看看今天美国教会的光景，看看这个荒凉的世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历史！

4、教会历史研究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历史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之，真理恰恰是引导我们学习历史的标准。

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应当分为三个层面，即史实、史录、史观。史实就是真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史录就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作出的记录和描述。而史观则是人们研究历史时所持的观念。毋庸置疑，以不同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相同的自然世界，会得出千

绪论

差万别的结论，同样地，以不同的史观研究相同的历史事件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人们在讲述亲身经历的事件时，也会因自己的史观基础而产生一定的倾向性，并做出不同的历史描述。那么，持有不同史观的人对教会历史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虽然史实反映的是完全真实的历史，没有人为主观认识的掺杂，但是当人们以不同的史观研究相同的历史时，无论是对过程的描述，还是对结果的评价，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史录必然受史观的影响，同一历史事件会由于史观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史录。

从以上的定义来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都是史录，除了圣经，那种没有受到人为史观影响的、完全客观真实的史录并不存在。这就决定了历史的研究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除了神亲自默示的圣经完全无谬以外，只要是以人作为书写的主体，那就难以脱离自己史观的基础和狭隘私欲的影响，因为人都是虚谎的。

罗 3:4 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俗话说：“二里地没准信儿。”何况我们研究的是跨越千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考察历史——特别是教会历史，更是免不了要建立在前人所整理的历史书籍的基础之上。那么，以不同史观所整理的历史书籍的种类如此繁多，我们又如何在这些史录中进行选择呢？当然，我们一定会选择接受和我们具有相同史观的作者所做出的记述和评价。

那么，什么是决定我们教会历史史观的基础呢？那就是我们所认信的真理教义。教会历史的史观就是教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延伸和体现。人们认信哪一种系统的教义，就会根据这种教义去理解历史过程，因而必定会选择与该系统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书籍，在整理历史的过程中带着此种系统的观点。这是基于人对真理的真实性的信心。笔者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1547年7月，苏格兰改教领袖约翰·诺克斯被法国舰队俘虏，囚禁19个月。对于此事发生的原因，有两种说法。按着《天主教教会史》所说，诺克斯被俘虏的原因是他参与了暗杀苏格兰红衣主教（大卫·毕顿）的阴谋。而新教历史书籍基本上都记载说，诺克斯被俘是由于法国舰队袭击脱离天主教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城堡，诺克斯此时正在该城堡牧会，不愿离开，因而遭擒。

第二，对于清教徒在美国发展的初期，不同的人就撰写出了不同的历史。改革宗人士记载他们怎样敬虔敬畏神、传播真理、建造教会和发展教育，为美洲这一蛮荒之地带来了巨大文明。而亚米念派的人本主义者描写这一段历史时，就讲述他们如何狭隘保守，不仅制定法律迫害异教徒，而且不肯向当地印第安人传福音，当约翰·卫斯理等人去传福音时，他们竟极力拦阻。

同样一段历史，却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描述。双方都有铺天盖地的书籍，都有大批神学名家的支持，那么哪一种描述是真实的呢？我们可以看见，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信徒一定相信并接受改革宗人士所整理的历史，而亚米念主义的信徒一定会选择亚米念人士所描述的历史。可见，人对教义接受是其接受其他知识的基础。难道没有比较客观一点的记录吗？曾经有一位姐妹试图进行这样的寻求，两边的书我先都不接受，我去看看大学图书馆里那些无神论者所写的历史书籍，他们不持任何一方的信仰，总该是客观的吧！结果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些无神论者的书上所说的，无非是诸如“英国清教徒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失败而逃亡美洲，实现其资本主义的梦想”之类。

对于这些历经数百年的事件，我们当然也可以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考证其事实，或许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据，但若要对所有历史事件都如此考证，恐怕我们一生也学不了多少历史。我们实在有限，所以只能是接受哪种信仰体系，就以该体系的史录作为事实。

因此，对历史的研究是有局限性的、相对的，唯有真理是绝对的、真实的。

启 15:3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诚哉！”

唯有真理才是检验一切（包括历史）的标准。因为，只有圣灵藉着真理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接受了改革宗的真理，也就同时接受了改革宗的圣经观、人生观和历史观。

不仅是历史，就连世上的自然科学研究都受到信仰的指引。当我们评价那些相信人类乃是猿猴进化而来之人的无知时，那些无神论者更嗤笑我们这些相信上帝创造万有的信徒为愚昧，双方也都会使用许多所谓科学的证据反对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人类离弃了真理的本体之后，便用自己堕落的理性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人的良心在这种虚谎之下是何等的扭曲！

诗 26:3—4 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瞞哄人的同群。

5、教会历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每一门学科也不会孤立存在，都与相近学科有密切的关联。教会历史亦是如此。既然人类历史的主线是上帝要实现选民救赎，那么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上帝的认识（即宗教）就必定是历史发展变迁的直接影响因素。因此，教会史、教义史和基督教思想史就构成宗教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三种历史又直接影响着人类其他方面的历史，如政权史、异端史和文化史。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教会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架构见图1）。这些历史均以宗教为核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宗教这一核心又是建立在神学教义的发展之上，对真理的认识是宗教历史的前提。因此，正如一位牧师所说：“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神学问题。”这是那些无神论者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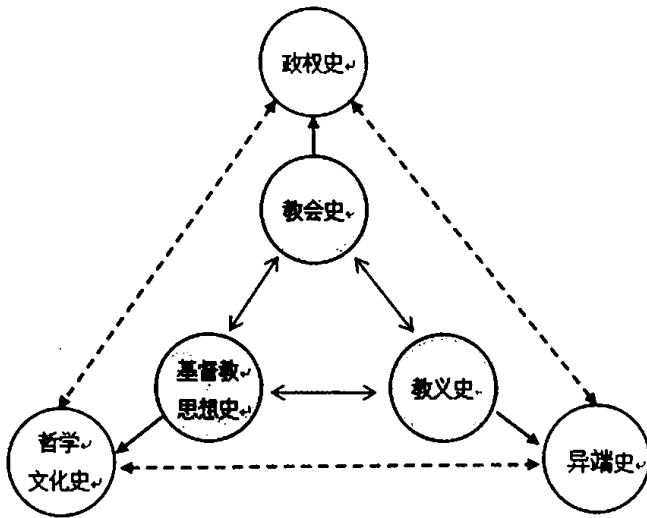


图1 教会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因此，通过学习教会历史，我们不仅要看到神在教会中的作为，也要看到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好让我们惊叹！

诗 72:8 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板。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第一章 旧约教会前期背景

第一节 教会的开始

1、堕落前在行为之约下的始祖

行为之约的内容是神应许生命给亚当以及在他里面的所有人类，条件是亚当必须完全的顺服。如此，亚当和他的后代就能永远活在神的喜乐和荣耀中。神同时也吩咐亚当要治理万物，包括：

(1) 修理看守——治理使命

创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2) 家庭敬拜——敬拜使命

创 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始祖的堕落，这种在行为之约下的敬拜随之结束。恩典之约下的教会历史被神开启。

2、恩典之约下教会的开始

恩典之约下的教会是从福音的启示开始的。在伊甸园审判后，上帝第一次启示祂拯救人的福音，应许“女人的后裔”的来到。从此，神的百姓开始活在对这一应许的仰望之中。

创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教会的建立不是从五旬节才开始的，认为“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观点是时代论对教会最大的曲解。五旬节是新约时代的开始，是恩典之约以新的方式进行实施的转折点，而上帝的教会，在伊甸园就已经开始了——“哪里有纯正的真理和圣礼，哪里就有教会”（加尔文）。上帝造人时把道德律刻于人心，又颁布一系列诫命和使命。亚当和夏娃就在这纯正的真理中，藉着献祭，敬拜造他们的主、也是他们的父，这就是教会。他们敬拜的内容不仅含有安息日的敬拜，也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遵行上帝的诫命和使命。

创 4:1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華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得了一个男子”原文是“得了那个男子”。亚当以为他所盼望来拯救他脱离仇敌的人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该隐，虽然盼望得有些急切，但却表达了他们的等候之心。亚当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在敬拜的生活中将信仰传递给了后代，因为教会从一开始就要在敬拜中仰望弥赛亚早日来到。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创 4:4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虽然那时他们对献祭的意义不甚清晰，但圣灵藉着信心足够教导他们依靠羔羊赦罪的恩典，其本质与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

3、洪水后的巴别塔反叛

人类社会发展到挪亚时代，地上满了强暴和罪恶，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通婚，教会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恩典之约应许的实现似乎受到威胁。为了实施救赎计划，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上古的世代，却在方舟中保存了挪亚一家八口，这记载在创世记的第六至八章中。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立约，为恩典之约的实施提供了自然环境的保障。但洪水的审判并没有改变人的罪性，人仍然处于“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创 8:21）的全然败坏光景之中。洪水之后，人类社会继续反叛上帝，他们打算在示拿地（后来的巴比伦）建造一座通天塔，传扬自己的名声，以对抗上帝恩典之路，这就是巴别塔反叛。此时，神的儿女甚至可能也参与了建造巴别塔，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听见教会发出任何声音。从这次反叛直到亚伯拉罕时代——大约有二百年的时间——上帝没有向人类启示祂的话语，因此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然而上帝仍要实现祂拯救万邦的旨意，便亲自干预、变乱语言，从此人类向天下四方分散。历史的中心仍要继续围绕着神立下的救恩主线展开，这就是恩典之约的进一步展现——亚伯拉罕之约。

圣经不仅记载了从闪到亚伯拉罕这一分支的家谱，也介绍了人类的其他宗族，只是篇幅很少而已。所以，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救恩主线息息相关、脉络清晰，只是由于我们有限，无法认清每个脉络而已。

4、两河流域的发展

亚伯拉罕的故乡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地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起初的伊甸园就在此附近，由于两河的河道已经变迁，因而我们无法考寻伊甸园的准确位置。在地图上，两河流域和靠近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地区形成月亮状，称为“新月沃地”（见图 1.1），它通常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世人所谓的文明一般是从有文字和建筑开始，因为文字和建筑展示了当时的情景，可供后人考察。然而，我们基督教的文明是基于上帝的启示，完全不同于世人所说的文明。神藉着圣经启示了人类早期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是要造就祂的教会。如果我们以圣经启示的救赎历史为出发点来考察这些文明，那么我们也会得到不小的帮助。

美索不达米亚地处平原，易受攻击，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个民族在此经历了入侵和融合。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迦勒底人等民族都曾在此定居，他们先后经历了欧贝德、早期的乌鲁克、苏美尔和阿卡德时代，后来又建立起先进的古巴比伦和庞大的亚述帝国。圣经对于这一段历史记载甚少，只用短短的一段家谱便一笔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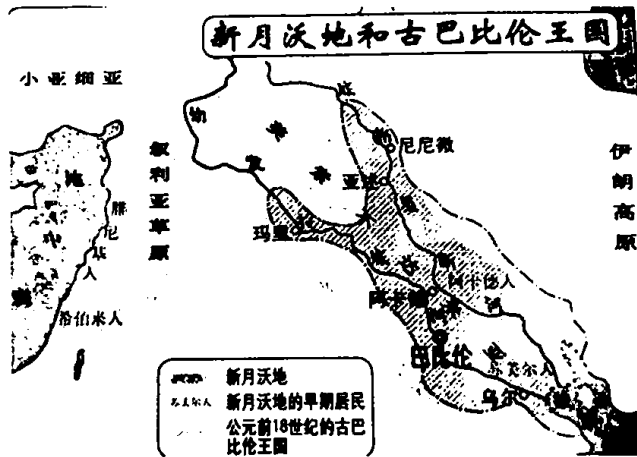


图 1.1 两河流域地形图

(1) 苏美尔早期王朝（苏美尔城邦时代）

大约公元前 3000 年，闪族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众多城邦，进入城邦时代，至今留下遗迹可查的城邦有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和尼普尔等。苏美尔人于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发明了楔形文字。



图 1.2 苏美尔人泥板上的文字

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人类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载了大洪水事件。这部史诗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27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之间，以神话方式记载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的事迹。其中描写了这样一段神话故事：吉尔伽美什为了自己和百姓要到远方去寻求永生，途中遇见一个女巫，女巫告诉他，世上没有真正的永生，永生就是今世的物质享受和暂时的肉体快乐。从此，吉尔伽美什回到乌鲁克，努力建设物质的繁荣。这奠基了典型的“巴比伦世界观”，即将永世追求转化为今世的享乐。这种世界观一旦进入神的教会，就会导致信仰的世俗化。世俗化一直是教会最厉害的仇敌。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2) 阿卡德王国时期

闪的一支——阿卡德人大约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进入两河流域。阿卡德王萨尔贡统一了苏美尔地区，建立了君主制的集权国家。

(3) 乌尔（吾珥）第三王朝

乌尔纳姆大约于公元前 2113 年在乌尔建都，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 2111 年——公元前 2003 年）。苏美尔城邦进入了比较繁荣的时期，农业、商业、贸易、建筑等都很发达，并且那时已经有了棉毛、啤酒等高档消费品。此时的乌尔以拜月神为主，至今在伊拉克境内仍存在许多当时的月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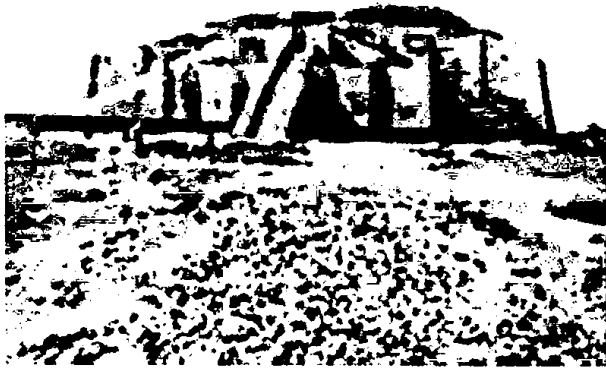


图 1.3 现存于伊拉克的乌尔时期月神台（又称通天塔）

按照最普遍的圣经年代计算方法，应该就是在这时，神对吾珥的亚伯兰开始了第一次呼召。

徒 7:2-3 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通过以上背景的研究，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离开了何等富庶繁荣的家乡，踏上信心之旅。

5、古巴比伦王国的兴盛

(1) 古巴比伦王国

亚摩利人是迦南的后代。公元前 19 世纪，亚摩利人灭掉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了以巴比伦城为首都的巴比伦王国，历史上称为古巴比伦王国。

创 10:15-16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革迦撒人。

表 1.1 中所列举的是考古发现的古巴比伦前几名国王的名字及在位年份。

表 1.1 古巴比伦国王在位年代表（部分）

| 国 王 | 年 份 |
|--------|-----------------------|
| 苏穆阿布 | 公元前 1883 年—公元前 1881 年 |
| 苏穆拉埃勒 | 公元前 1880 年—公元前 1845 年 |
| 萨比乌姆 | 公元前 1844 年—公元前 1831 年 |
| 阿皮勒辛 | 公元前 1830 年—公元前 1813 年 |
| 辛穆巴里特 | 公元前 1812 年—公元前 1793 年 |
| 汉谟拉比 | 公元前 1792 年—公元前 1750 年 |
| 萨姆苏伊鲁纳 | 公元前 1749 年—公元前 1712 年 |

在这些国王中，按照名字和在位年份来推测，苏穆拉埃勒应该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四王五王交战中的暗拉非。

创 14:1 当暗拉非作示拿王、亚略作以拉撒王、基大老玛作以拦王、提达作戈印王的时候……

(2) 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 1792 年—公元前 1750 年）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古巴比伦国王是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他建立了第一支常备军，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法典中对于王权、奴隶、贸易等具有较为全面的规定。

第二节 古代埃及与以色列历史

古代埃及的历史被史学家分为三十个（或三十一个）王朝。第四王朝斯尼弗鲁的儿子胡夫为自己修建了埃及最大的金字塔，高 147 米，边长 230 米。笔者接下来只介绍与圣经有关的（亦即与旧约以色列有关的）古埃及历史。

1、喜克索斯时代

喜克索斯人是古代亚洲西部的一个混合民族，属于闪的后裔。他们在公元前 17 世纪进入埃及东部并在那里建立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按通常的圣经年代算法，约瑟和雅各是在喜克索斯时代进入埃及的，这一点似乎有充分的证据。这些闪族的统治者对待与他们在种族上有关系的希伯来人很友好。约瑟就是在他们手下升至高位。

2、底比斯王朝

公元前 1548 年，底比斯的统治者在成功地打败了喜克索斯人以后，建立新的王朝。作为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君主，他们不仅占领了全埃及，而且征服了努比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富裕强盛的帝国。这些“不认识约瑟”（出 1:8）的统治者很自然地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歌珊地的外来民族希伯来人。因为他们是与喜克索斯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人有关系的，曾得到他们的厚爱。

继雅赫摩斯之后的第二位法老是阿蒙霍特普一世。他曾率军出征南方和西方。他的儿子图特摩斯一世，把父亲向叙利亚的进军推进到幼发拉底河。历史记载他是第一个下令利用亚洲籍奴隶建造庙宇的国王，这里所指的奴隶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继承他王位的是他多病的儿子图特摩斯二世。他死后，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哈特谢普苏特和平地统治埃及 22 年（约公元前 1504 年—公元前 1482 年）。也就在图特摩斯二世与哈特谢普苏特之间这段时期，埃及开始屠杀以色列男婴。哈特谢普苏特可能就是摩西的养母，因为如果她不拥有和法老一样的权力，怎能公然违背法老的命令擅自收养以色列男婴呢？摩西 40 岁以前生活在埃及王宫里，正在图特摩斯二世和哈特谢普苏特统治之下。此后埃及曾发生一场祭司的革命，强迫她接受外甥图特摩斯三世联合执政。后来她突然消失了，可能是由于暴力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自然的原因。

3、图特摩斯三世

埃及第十八王朝中最以尚武著称的法老是法老图特摩斯二世之子——图特摩斯三世，他是图特摩斯二世与次妃伊西斯之子。从即位起，图特摩斯三世进行了接连不断的十七次战争，在麦吉杜（米吉多）、卡迭石（加低斯）、卡尔赫美什等地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其中以围攻米吉多的战役最为著名），其结果是恢复了哈特谢普苏特时期丧失的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

4、阿蒙霍特普二世

图特摩斯三世之后，其子阿蒙霍特普二世继位，他在位时期正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代。也有学者认为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发生在图特摩斯三世的时期，但从埃及文献记载来看，阿蒙霍特普二世死后，继承他王位的并不是长子王储（古埃及法律规定长子为王位合法继承人），而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图特摩斯四世。王储的消失很有可能是因降于埃及的第十灾而被击杀。圣经之外的同时代文献之所以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事，是因为埃及人从来不记录对他们不利的事件。

法老不肯放走以色列人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不愿失去大批奴隶劳动力；二是恐怕那些原本已被埃及征服的各族与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再次反叛。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只是经过列国，而且他们允诺用钱买水和食物，绝不会损害列国的利益。那么为何摩押等族不惜冒着灭顶之灾要和以色列人争战呢？原因很可能是，这些民族都曾在图特摩斯三世的进攻下臣服于埃及，而且按着埃及的条例，臣服的各国国王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埃及境内作人质，所以他们非常惧怕埃及，唯恐法老认为他们有意反叛而再次攻打他们或杀掉人质。但他们却忘记，在以色列出埃及的事上，耶和華怎样施展祂可畏的能力。

5、圣经远古历史年代

根据圣经的记载，对远古历史的年代计算如下：所罗门死于公元前 931 年，所罗门在位 36 年（在位共 40 年，其中 4 年协助大卫辅政），因此所罗门在位第一年为公元前 967 年，是年圣殿奠基。

王上 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因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 1445 年或公元前 1446 年。我们笃信圣经之人对这一年份的准确性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当时具体是哪位法老在位（如前述）对于教会历史本来是无关紧要的。

但近代许多无神论者和不信派的学者（以协和神学院为代表）认定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为公元前 1290 年，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其最大的证据仅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为“兰塞王”。众所周知，古语的名字并非无意义，而兰塞的意义只是我们今人不知道罢了。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楚王之前就早有“楚地”的名字。同样地，不能因法老的名字第一次使用“兰塞”一词，就认为兰塞之地是从他在位之时才开始出现，从而推论说曾住兰塞的以色列人在拉美西斯二世期间才出埃及。这些学者如此费尽心机，无非是想推翻圣经的一处经文，以达到批判圣经的目的。

第三节 未成年的教会——以色列在迦南

1、西奈山神赐律法

之所以称旧约的以色列为“未成年”的教会，是因为整个旧约教会都处于在礼仪律法下敬拜上帝的阶段，而礼仪律法所预表的实体基督尚未显现。神在西奈山赐下律法，从此以色列不仅成为按照上帝律法的定规而敬拜的教会，也成为与万国分别的大国。以色列在摩西时代脱离了单单以祭坛为中心的敬拜形式，而进入了会幕敬拜的时期；到了所罗门时代，他们进入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时期。

2、以色列的背约

在被掳巴比伦之前，以色列这一旧约的有形教会一再背约，违背西奈山律法，始终没能摆脱偶像迷信的困扰，因而遭遇了上帝一次次的管教。在回归之后，他们虽然脱离了偶像崇拜，却偏向了律法主义的错谬。因此神就兴起一根根管教的杖，来责罚这悖逆的儿女，从而一个个超级的大帝国便应运而生。

赛 10:5-6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衰淩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第二章 旧约几个帝国

第一节 亚述帝国

1、亚述的兴起

创 10:22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

公元前 14 世纪中叶，亚述王亚述乌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 1365—1330 年）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亚述帝国，史称古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

公元前 746 年，军事将领提格拉·帕拉萨（和合本圣经译：普勒）篡权夺得王位，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开始大规模扩张。他击败了乌拉尔图，占领叙利亚，攻打以色列。亚述从此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新亚述帝国。

王下 15:19 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现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

经过萨尔贡二世、辛那赫里布（和合本圣经译：西拿基立，公元前 704—681 年在位）、伊萨尔哈东（公元前 680—669 年在位）的征服，亚述已变为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首都仍是尼尼微。靠着征服和掠夺，亚述的经济空前繁荣，因而便心骄气傲，开始觊觎上帝的选民。



图 1.4 画家笔下的尼尼微

2、以色列灭亡

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为亚述灭亡后，犹大王希西家向亚述交纳大量赎金，方得留存。

王下 17:21—23 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



图 1.5 尼尼微王宫浮雕：西拿基立攻打拉吉，城破，以色列居民被掳

3、围攻耶路撒冷

公元前 700 年，辛那赫里布（西拿基立）兵分数路围攻耶路撒冷，希西家顽强抵抗。据历史记载，正在这时亚述军内突然发生瘟疫，因而全部撤回，保全了耶路撒冷。从圣经得知，这是神亲自的干预，要保全大卫家的灯不至熄灭。

王下 19:34-36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第二节 新巴比伦帝国

1、新巴比伦兴起——建国

迦勒底人于公元前 1000 年初来到两河流域南部定居，后被亚述帝国征服。公元前 721 年，南部迦勒底地区的马尔都克·阿帕尔·伊狄那（和合本圣经译：巴拉但）宣布自己为巴比伦尼亚之王，并同周围国家结盟。所谓“上兵伐谋，次之伐交”，阿帕尔曾派遣自己的儿子为使以探病为由，和犹太国希西家结盟。

王下 20:12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儿子比罗达巴拉但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公元前 612 年，巴比伦总督波帕拉沙与米底（和合本圣经译：玛代）王国联合，消灭了亚述帝国，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自己成为尼布甲尼撒一世，首都巴比伦。

2、尼布甲尼撒二世

公元前 605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登基，帝国开始扩张。公元前 600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又娶米底公主阿米蒂斯为皇后，并为她修建了世界七大景观之一的“空中花园”。此时的犹太国悖逆腐败到极点，濒临灭亡，上帝的教会即将要开始回到美索不达米亚——亚伯拉罕的出生地去反思悔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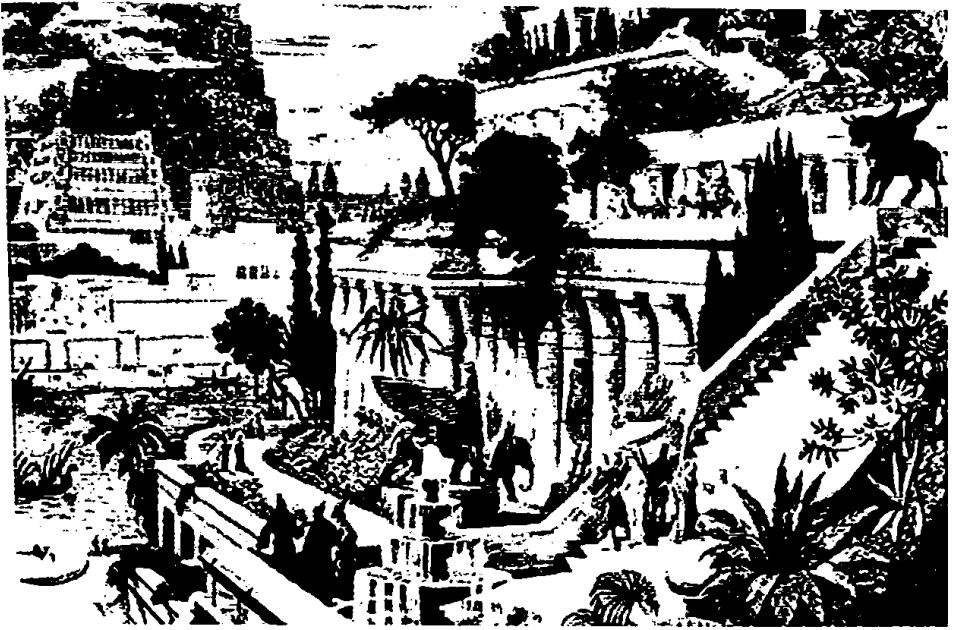


图 1.6 空中花园

3、以色列民第一次被掳：公元前 605 年

约哈斯被法老王擒获带到埃及，约雅敬被立为王。

王下 23:33-34 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得、金子一他连得。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

此时巴比伦已日趋强大，超过埃及。

王下 24:1 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

公元前 605 年，尼布甲尼撒进攻埃及。起初尼布甲尼撒打了几次败仗，约雅敬便见风使舵，与刚刚得胜的埃及结盟。约雅敬不听信自以赛亚以来神藉着众先知发出的一次的预言——关于巴比伦兴起的信息，却把神藉先知耶利米发出的警告烧毁。尼布甲尼撒一怒之下进攻并占领了犹大，将投靠埃及的约雅敬活擒。先知但以理及许多王族贵胄、圣殿中的金银器皿都被掳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斤为王。

代下 36:5-8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華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或作“自己的宫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斤接续他作王。



图 1.7 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耶 36）

4、以色列民第二次被掳：公元前 597 年

约雅斤也不忠于巴比伦王，故尼布甲尼撒王再派大兵围困耶路撒冷。好在约雅斤王率首领及时出城投降巴比伦王，于是被带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王。

王下 24:9 约雅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

王下 24:12 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王下 24:17 巴比伦王立约雅斤的叔叔玛探雅代替他作王，给玛探雅改名叫西底家。

5、以色列民第三次被掳：公元前 586 年

西底家虽假惺惺求问耶利米，却并不听先知的劝告，再次反叛巴比伦。这是因为埃及经数年喘息，又能对抗巴比伦了，故此西底家再次投靠埃及，甚至把主张服侍巴比伦的先知耶利米投入枯井，结果引来尼布甲尼撒率全军大举进攻（参见耶利米书第 37 章至 39 章）。

耶路撒冷被围困 18 个月后，于公元前 586 年被攻陷。西底家企图逃走，却在耶利哥的平原被抓并被剜去双眼，带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放火焚烧了圣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其中的居民除一些最贫穷的人外，尽数被掳到巴比伦去。



图 1.8 公元前 586 年第三批犹太人被掳，圣城被毁，犹太亡国

6、教会被掳后

被掳之后，以实玛利等逃跑的军人背叛巴比伦王设立的省长基大利，将其杀害。叛乱虽被平息，但留下来的犹太人惧怕巴比伦王报复，再次不听耶利米的劝告，执意逃往埃及（参见耶利米书第 41 章至 43 章）。

公元前 567 年，巴比伦王趁埃及内乱，再次进攻埃及。那些刚逃来不久的犹太人很可能在这次进攻中被全部屠杀，包括被挟带而来的先知耶利米。这正是耶和華对这群悖逆之子的审判。

从这一次次的被掳中，我们看到，犹太国灭亡的原因除了不忠心持守摩西律法、不专心事奉耶和華外，还有他们对埃及的情结。从他们的祖先起，他们就不断留恋埃及的肉锅，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极大的警戒。教会的每一次失败和堕落，都是因向这个世界倾斜和妥协所致，这也是每一个得救之人最大的软弱。

启 11:8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7、巴比伦覆灭

尼布甲尼撒死后，接下来的巴比伦王权开始动荡，巴比伦帝国走向衰落。公元前 539 年 10 月 12 日，居鲁士手下的大将大利乌（大利乌）兵临巴比伦城下。因为巴比伦城墙极其坚固，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儿子伯沙撒自以为高枕无忧，还在王宫欢宴，亵渎圣殿的器皿，不想大利乌堵塞巴比伦城的河道，波斯大军从河道进入城内，一夜之内攻下巴比伦，杀死伯沙撒王。这是上帝对伯沙撒亵渎圣物的审判。

但 5:24-27 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第三节 波斯帝国

1、居鲁士（古列）

早在先知以赛亚时代，圣经就预言了居鲁士的出生。

赛 44:28 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赛 45:1 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此预言早于居鲁士出生一百年，居鲁士是除耶稣和约西亚外，圣经在其未出生前如此久远就预言了名字和事迹的人。居鲁士一生离奇的身世很可能与这预言有关，因世上的王权都在上帝手中。



图 1.9 居鲁士

2、统一西亚

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统一波斯，灭亡米底，又指挥他的骆驼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先是以闪电战术打败吕底亚的骑兵（吕底亚王国是兴起于公元前 1300 年，位于小亚细亚中西部的一个国家），后又于公元前 539 年攻陷巴比伦，建立了以书珊城、巴比伦城两座城市为首都的帝国，版图超过了新巴比伦帝国。

3、居鲁士亡

公元前 530 年，居鲁士出兵征讨里海东岸草原上的马萨格泰人，结果波斯军队全军覆没，居鲁士阵亡。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他打败了该部落，将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迪（位于伊朗法尔斯省）。居鲁士陵墓旁的一根柱子上写道：“我是居鲁士王，阿契美尼德宗室。”这一时期，被掳的犹太人开始三次回归，原因是上帝为成就七十年回归的应许，感动居鲁士和大流士等波斯君王的心。他们下令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可以回归故土，重新修造圣殿。这期间也发生以斯帖、末底改救国的“普珥节事件”。

第四节 希腊帝国

1、城邦兴起

创 10:2 雅弗的儿子是歌蔑、玛各、玛代、雅完（希腊）、土巴、米设、提拉。

希腊由爱琴海周围上千个岛屿构成。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这些岛屿兴起了许多城邦，希腊城邦遍及地中海沿岸。在诸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

（1）早期克里特和迈锡尼

爱琴海地区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是爱琴文明的发源地，较比希腊文明更早，曾繁荣了几百年，此时的克里特岛内已经出现了宏伟华丽的宫殿，产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公元前 2000 的克里特王宫遗址在上世纪被挖掘出来。

迈锡尼人占领了克里特岛后，继承并发扬此文明，成为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人是最早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自己文字的民族，并在建筑、商业、农业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在迈锡尼文明鼎盛时期，最有名的一场战役就是特洛伊战争，公元前 1200 年，盲人诗人荷马的著作《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以神话形式描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

（2）雅典

雅典经过梭伦改革，也进入了辉煌的时期。梭伦在公元前 594 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一上任就着手进行改革，制定法律，制定雅典的教育制度。这可能是最早的学校教育，雅典人也酷爱体育，公元前 776 年雅典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一直坚持举行，甚至在战争年代也不轻易间断。新约中，保罗经常以体育比赛的例子，来形容属灵的努力和奖赏，这是当时普遍接受希腊文化的人非常熟悉的。

（3）斯巴达

在特洛伊战争 80 多年后，多利亚人建立起斯巴达城邦。斯巴达人不注重文化，只崇尚武力，全民只重军事训练。孩子长到 7 岁后便会被编入团队进行残酷的军训，直至 20 岁正式进入军队。他们以服从命令为至高天职，保罗也常用精兵的比喻激励基督徒顺服和装备。

（4）马其顿

公元前 495—450 年，当政的亚历山大一世统一了整个马其顿。公元前 399 年，在位的国王阿尔赫拉奥斯进行币制改革。公元前 338 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马其顿王腓力二世战胜了希腊联军，从而成为希腊诸城邦的霸主。

2、波希战争和几次著名战役

波斯为了阻止希腊的兴起，便开始不断地征讨希腊城邦，为此展开了近百年的波希战争。其中有几次著名的战役：

（1）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 490 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派出陆海军共 2.5 万人进攻雅典，在马拉松平原惨败。一名雅典士兵为送出胜利信息，徒步奔跑 42 公里，最后累死，由此产生今天的“马

拉松”长跑项目。

(2) 温泉关战役

公元前 480 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 20 万大军再次进攻希腊。《以斯帖记》记载的大宴席正是薛西斯一世（和合本圣经译：亚哈随鲁）在出征前为鼓舞士气而设。战争中，斯巴达王李奥尼达以其本国精兵 300 人及其它城邦的 7000 人负责防守希腊的第一道防线——温泉关，结果以 300 人成功堵住了 20 万波斯大军，使希腊本土各城邦的实力得以保存。

(3)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 431 年，斯巴达的同盟底比斯进攻雅典，雅典海军被全歼。次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斯巴达成了希腊的新霸主。

(4) 喀罗尼亚战役

公元前 338 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战胜了希腊联军，从而成为希腊诸城邦的霸主。次年亚历山大继位。

(5) 高加美拉战役

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三世展开的最后战役，亚历山大再一次取得了胜利，并乘势攻下巴比伦，波斯帝国灭亡。

一个新的帝国兴起，都是上帝为了祂的教会和成就祂自己的旨意。希腊是一个注重文化推广的帝国，如果文化没有融合统一，那后面的犹太人在各处的会堂及使徒传福音，就失去了一个接触和交融的平台。所以，当我们看这些战争的胜败时，表面上是人的勇敢和智谋，实际上，正如大卫所说：

撒下 17:47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3、希腊文化

希腊人崇尚哲学，特别是雅典，可以说是哲学的发源地，产生了许多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如柏拉图的学园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等等。下面只介绍几个著名的哲学家：

(1)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399 年）

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形式探讨人类的心灵智慧与活动能力，围绕人的精神修养，如幸福、美德、正义等等，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改造自己的灵魂，从而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

(2) 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 年）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人们感觉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真正的实体，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比如称赞一位少女或一朵鲜花美丽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在判断者心中。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把上帝创造的一切真实的东西都说成虚幻，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使人们活在幻觉梦境之中。这样的思想给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伤害，容易造成分裂和封闭。这种理论一直以来都是基督教的死敌。

(3)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

他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人们的认识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觉。他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系四种原因所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他根据无穷后退不可能的原理推理得出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只能是没有质料的形式，或者称之为“神”。但这个“神”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实际只是一种以精神为实体的东西。在这里，“神”不过是一种探索不已、往复追询的代名词。

(4) 斯多亚学派（又译斯多葛学派，Stoicism），

斯多亚学派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于公元前 305 年左右创立的哲学流派。他们的基本主张即宇宙是绝对的理性，理性能提供“共同概念”。人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应该避免理智的判断受到感情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性，即达到有德性的生活。

(5) 以彼古罗派（伊壁鸠鲁 Epicurus，公元前 341—270 年）

伊壁鸠鲁成功地发展了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的享乐主义，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并且他以鲜明地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他说：“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

公元 3 世纪以后，伊壁鸠鲁的学说一直是教会世俗化的帮凶。在中世纪，伊壁鸠鲁成了不信上帝、不信审判、不信灵魂的同义语。文艺复兴时期，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完成和出版，扩大了伊壁鸠鲁学说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保罗在雅典传道时曾和上述两派进行辩论。

4、哲学对教会的危害

哲学这一被圣经称为“世俗小学、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的学问，一直以来就是撒但扰乱教会的最主要的工具，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初代教会受柏拉图主义残害，中世纪教会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教会的每一次堕落，往往都与哲学被引入、混杂到圣经教义之中有关，这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所结出的最大的毒果。当教会青睐哲学时，教会就要从真理上滑落，人类社会就要进入极大的黑暗。

哲学的“巧妙”就在于他们把上帝在人心普遍启示的一些概念窃为己有。当人类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仿佛都是由哲学家而来，所以给人以“神学离不开哲学”的假象，使教会深受迷惑。比如：逻各斯（λόγος）在希腊文的原义是“话语”（英语：word）的意思，它包含了许多层面的意义。在古代的波斯、印度和埃及的原始宗教里，都曾提到“逻各斯”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将“逻各斯”引入哲学，用以说明万物变化的规律性。从此，这一在普遍启示领域的词汇仿佛成了希腊哲学的专利。当圣经作者使用这一词汇的时候，仿佛圣经需要借助哲学的词汇。将堕落理性披上神学的光环，撒但用此手段不断将世俗小学偷偷引入教会。

中国的“道”一词也是这样，一提到“道”，中国人就只想到老子的《道德经》。许多人不遗余力地要借此将基督教和中国的道家哲学融合。其实，在老子写《道德经》之前，道的观念早已存在人心。最早的书籍《周易》中有：“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尚书》中更是充斥许多“道”的思想。当然这些书籍也不是“道”一词

的发明，道乃是在人良心中本身就有的认识。所以中文圣经用的这一词与道教并无丝毫瓜葛，我们借用特士良的一句话：“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关系？”圣经也说：“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干？”



图 1.10 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

5、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 336 年，20 岁的亚历山大继承马其顿王位。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 13 年中，亚历山大不仅统一了希腊、消灭了波斯，并继续征讨东部直至印度，使希腊帝国成为横跨欧亚非三个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征服到哪里，便在哪里强制推行希腊文化，包括文字，使希腊文化在欧亚大陆实现统一。这是出于上帝的美意，为后来福音的传扬铺好道路。公元前 323 年 6 月初，亚历山大在征服印度失败后，在巴比伦死去，其时还不满 33 岁。据说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所以他死时命人将棺木掘出两个窟窿，将两手放在外面，向世人警示虽然他占据大片领土，但死后仍是两手空空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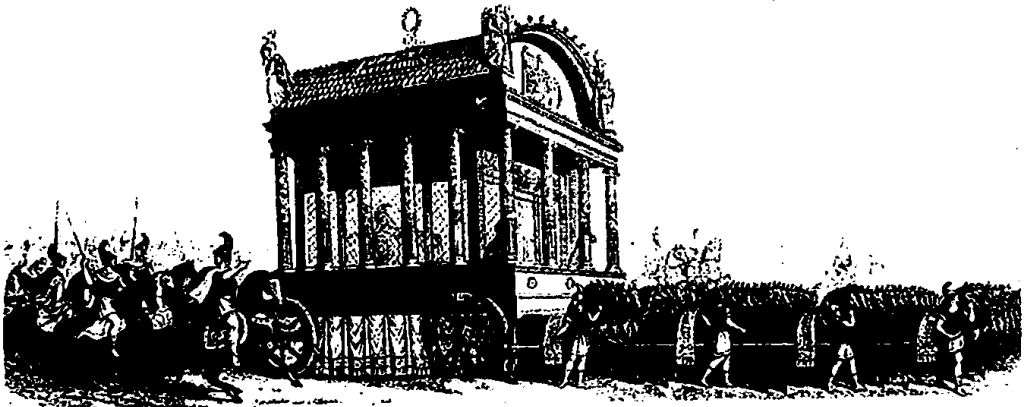


图 1.11 亚历山大出殡的场面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6、亚历山大死后的希腊帝国

但 8:19-22 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就是玛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这一段圣经所预言的，正是在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帝国版图将要发生的变化。亚历山大死后，帝国版图立即被其四名将军瓜分，形成了四个帝国：

西部（马其顿本土与希腊）——卡仙大；

东部（土耳其，小亚细亚）——吕辛马库斯；

北部（波斯，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巴比伦）——塞琉古（西流古）；

南部（埃及）——托勒密（又译：多利买）王朝。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预言的南北战争，主要是指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之间所发生的几百年战争。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正好夹在叙利亚和埃及中间，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无论谁打谁，以色列都先受其害，真是痛苦万分。圣经对此早有预言，神的百姓要继续在这些帝国间的争战中被管教和陶塑。在这黎明前的呻吟中，他们呼唤着大卫子孙的到来。

第三章 两约间教会历史及背景

第一节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 397 年《玛拉基书》写成之后，以色列历史进入“黑暗期”，即神不再有默示，直至新约的到来。而此时的以色列历史却是波澜壮阔，扣人心弦，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由此我们看出，圣经主要是讲救恩而不是来记述历史的，否则这一段历史应该是大篇幅描述的对象。然而我们既然讲述教会历史的背景，并且这一段的历史背景与新约圣经又关系密切，所以还是需要详细阐述。

1、托勒密·梭特尔

公元前 323 年，托勒密·梭特尔（Ptolemy Soter）成为托勒密（多利买）王朝第一任君王，文治武功达到鼎盛。埃及因此积蓄了一定实力，便开始进攻北方叙利亚王罗密单。犹太地是必经之地。

但 11:5 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

此前，犹太一直归罗密单统治。犹太人曾在上帝面前起誓要效忠罗密单，因此自然就拼力抵制托勒密的进攻。托勒密久攻不下，便利用犹太人安息日不作工、不打仗这一宗教传统，在安息日攻陷耶路撒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安息日的战争。直至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们根据圣经制定教理问答时，再次阐述“为了保卫国家在安息日可以战斗”这一教义。教义上的错误导致了犹太的数次亡国。

托勒密在安息日得胜，俘虏了十几万犹太人。因为赞许他们遵守诺言的信实，托勒密就没有屠杀犹太人，仍命他们把守各个城市。而且托勒密对犹太人和他们的信仰也极其友善，准许他们到圣殿敬拜。

2、多利买·非拉铁非（多利买二世）

公元前 285 年，多利买·非拉铁非继位，称多利买二世。他继续友善地对待犹太人。多利买二世也很注重文化，他在亚历山大城建起了空前的图书馆，据说藏书达五十万册。当时的书籍多用羊皮卷，所以图书馆规模之宏大可想而知。这时上帝使用这位君王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从公元前 285 年开始，历时数年，由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以利沙主持，邀请十二支派的文士 72 人进行翻译，所以该译本被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这次圣经的翻译工作使神的圣言得以向天下传播。耶稣和使徒在新约就是引用此译本的经文，说明这次翻译是神的特殊的护理和保守。与此同时这些人还翻译了 15 卷次经，后被天主教纳入正典。

3、南北继续争战

此后，南北两王继续不断地争战，在靠近迦萨的拉菲亚（Raphia）之役，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的安提阿克被多利买（托勒密）四世（多利买·菲罗柏多）打败。多利买四世得胜之后，开始心骄气傲，回到耶路撒冷竟擅闯圣殿，被大祭司西门二世极力拦阻，便怀恨在心，开始逼迫犹太人了。从此托勒密王朝内乱不断，使本来强盛的王朝迅速衰落。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公元前 205 年，多利买四世薨，他五岁的儿子继位，王权动荡不安。这时北方的安提阿克三世（安提阿克大帝）抓住时机，立即出兵战败埃及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从此，犹太人又进入了被叙利亚统治的时期。



图 1.12 亚历山大图书馆

第二节 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马加比起义

1、巴勒斯坦行省划分

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的安提阿克三世占领巴勒斯坦后，将巴勒斯坦分成五个省：犹太省、撒玛利亚省、加利利省、比利亚省和特拉可尼省（前三省有时统称为犹太省），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犹太人的力量。这种行省划分一直持续到主耶稣降生的罗马帝国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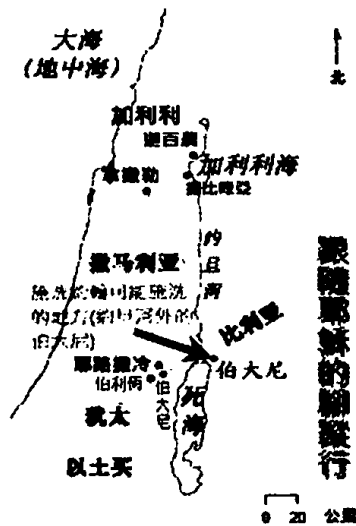


图 1.13 叙利亚统治时期巴勒斯坦行省

2、祭司长之争

罗 2:23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

罗 2: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对于安提阿克的统治，犹太内部分成两派：一种是保守派，严守律法及人的规条，反对外族的统治；另一种是以耶孙为代表的亲希腊派，乐意接受并推行希腊文化。此时犹太毕竟是在希腊统治下，所以亲希腊派一直处于上风。特别是在安提阿克四世伊比法（Antiochus IV Epiphanes）继位以后，利未族的耶孙出重金贿赂安提阿克四世，当上祭司长之职。另一位也觊觎这一职务的米尼老便出更高的价格行贿于安提阿克四世。安提阿克见钱眼开，又命米尼老代替耶孙担任祭司长。但米尼老并不是利未支派，而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他立即遭到犹太通国的反对，包括保守派也开始支持耶孙。民众自发地废掉了米尼老，让耶孙复职。米尼老便求助安提阿克四世，请求大军支持。

3、亵渎圣殿

公元前 170 年，又是一个安息日，安提阿克大军再次开进耶路撒冷。安提阿克四世此时对犹太人甚是气愤，因为是他们自己买卖圣职而又反悔才挑起事端的，因而便开始亵渎犹太人的信仰。公元前 168 年，安提阿克开始在圣殿铸造朱庇特·奥林匹斯（Jupiter Olympius）和朱庇特·辛尼阿斯（Jupiter Xenius）神像，将其置于圣所之中。他还掠夺圣殿财物，毁坏耶路撒冷，在祭坛上献猪，洒猪血；下令禁守割礼、安息日与一切节期；焚毁旧约经卷；强令犹太人向假神献祭；处死私藏经卷者和拒绝吃猪肉或偶像之祭肉者。他试图用各种严刑迫使犹太人放弃信仰。数万犹太人遭屠杀，或被贩为奴。当保罗说到罗马书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经文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对刚过去二百年的历史并不陌生，一定深感羞愧。这不是外邦王的愤怒，而是上帝因自己的名在本国中被亵渎而施行的审判。

4、马他提雅（Mattathias）起义

在离耶路撒冷 24 里的一个村子摩丁，政府官员强迫全村的犹太人向假神献祭。一个怕死的犹太年轻人首先开始献祭。本村的一位老祭司马他提雅（Mattathias）义愤填膺，上前挥刀刺死了这名年轻人。他的举动正像当年的非尼哈一样，使犹太人开始从灾难中转离。马他提雅杀人后和他五个儿子逃往山中，附近村民纷纷投奔，不久就组成一支小有规模的军队，与安提阿克四世展开了游击战，并取得几次胜利。又是一个安息日，安提阿克的将领腓力奉命追缴起义军。起义的犹太人仍然严守安息日不战斗、不逃跑的规条，结果许多起义的活活被擒，一千人被杀。在从这次安息日的屠杀中逃出后，马他提雅规定：安息日自卫义不容辞。

5、马加比领导犹太人取得胜利

马他提雅去世后，其三子犹大·马加比（锤子）任义军首领，组织起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其装备训练接近正规军。加上他们对犹太信仰的忠诚，士兵们作战勇敢和马加比战术有方，于是战斗节节胜利。后来军队发展到 5 万人，在以马忤斯力挫叙利亚军，又一举攻克了耶路撒冷。这时安提阿克亲率十万大军反扑，耶路撒冷再失。但马加比并没有气馁，以一万人的兵力竟向驻守耶城的几万叙利亚军发起反攻，并至终取得胜利，重新夺回耶路撒冷。这场胜利再次让我们看到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只在于神。



图 1.14 犹大·马加比在战斗

犹太人于是在公元前 165 年基斯流月（公历 12 月）开始洁净圣殿、拆毁偶像祭坛，并重新举行献殿礼，连续庆祝 8 天，并将这一节日定为修殿节（见约翰福音第十章），以纪念圣殿重现光明。

不久叙利亚军再次反扑，战斗继续。但叙利亚人因内乱开始议和，答应不再干涉犹太人信仰。犹太的长老、文士便答应了议和条件。马加比被出卖，不得已率部下退入旷野。结果新任的祭司上任不久，便开始了对保守的犹太人的逼迫。犹太人再次向马加比求助，战争再次爆发。犹大·马加比战死疆场，其弟约拿单率残余渡过约旦河逃走。这时叙利亚宫廷内乱更趋严重，敌对双方都想拉拢犹太人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便共同立约拿单为犹太的祭司和总督。约拿单死后，其弟西门继此位，由此开始了哈摩斯王朝。

第三节 犹太亡国

1、许尔堪的开明统治

公元前 134 年，西门的女婿谋反，杀害了西门的全家，只有西门的三子约翰·许尔堪（John Hyrcanus）逃脱。叛乱平定后，许尔堪继承父位，治理犹太。约翰·许尔堪信仰比较虔诚，敬畏神，统治也开明。在许尔堪的昌明领导之下，犹太地国泰民安，有 29 年之久。而且在外交努力下，犹太领土也有所扩大，以东地也被收回。许尔堪在主前 106 年去世。在他以后，哈摩斯王朝开始没落。

2、犹太人内乱

就像希西家生出玛拿西一样，许尔堪的众子都是悖逆之徒。为争夺王位，他们相互之间展开了残酷的争斗和残杀。众子中的亚利多布为使自己称王，竟将自己的亲生母亲囚禁并饿死狱中。继任者亚历山大为镇压法利赛人的反抗，竟残杀数万同胞。王权就在这黑暗血腥中频频更迭，和亡国前的北国以色列的光景一样。这都是因为教会信仰的衰落给社会带来的危机。

箴 28:2 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

公元前70年左右，当时祭司长的职位在亚历山大的儿子亚利多布和许尔堪（不是约翰·许尔堪）之间争夺。这时刚获高位的以东人希律替许尔堪想出一个卖国的计策，就是投靠已经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势力，依靠罗马军队来对抗亚利多布。

3、庞培攻占耶路撒冷

公元前63年，在许尔堪的勾结下，罗马将军庞培率领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哈斯摩王朝彻底覆灭，犹太亡国。

第四节 罗马帝国

1、罗马帝国兴起

公元前8世纪，一些希腊人向意大利和西西里半岛移民，建立城邦。据古典作家记载，公元前8世纪末，罗慕洛和勒莫斯于7座山峰之上建立了罗马城。传说罗慕洛是吃狼奶长大的，故称“狼孩”。罗马后经7个王，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由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执政，图利乌斯实行改革，采用三权分立治国，标志着罗马国家的产生。三权即：库利亚大会（人民大会）、元老院（长老大会）和国王（军事长官）。

公元前451年，罗马政府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废除了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的限制，这也标志着“罗马法”的诞生。从此，罗马逐渐强盛起来。通过二百年对迦太基等地的战争，罗马的版图向地中海、西班牙、马其顿和亚细亚扩张，成为新崛起的又一个强大帝国。

2、主耶稣降生前的帝国统治背景

（1）前三头

公元前63年，庞培用了一年时间占领了本都，利用犹太祭司长的内讧又一举攻占了巴勒斯坦。此时凯撒也占领了高卢。公元前60年，克拉苏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后，罗马的政权由克拉苏、凯撒、庞培共同控制，史称前三头政治。公元前53年，克拉苏阵亡。公元前48年，因埃及女王奥帕特拉投靠凯撒，因而凯撒打败庞培，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杀，埃及女王嫁给安东尼。

（2）后三头

又经一年内战后，公元前43年，罗马的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公开结盟，史称“后三头政治”。随后屋大维将雷必达打败，又进攻埃及，奇迹地战胜女王奥帕特拉和安东尼几十万军队的抵抗，统一了埃及，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凯撒”的尊号。这一切的战事都是上帝在为报名上册作预备。

第五节 帝国统治下的犹太

1、重修圣殿

庞培占领犹太后，起初立许尔堪统管犹太、加利利、以土买和比利亚四省。公元前37年，大希律（Herod the Great）被封为犹太地的王。大希律一上台就大肆兴建浴场、公园、公路等工程。他是以东人，其作王的身份常遭犹太人质疑，为讨好犹太人，从公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元前 20 年开始，希律重修圣殿，直至公元 62 年。之后不到十年，圣殿便彻底被毁。希律作了无用工。主耶稣洁净圣殿时，维修工程仍未完工，所以犹太人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约 2:20）可能是指局部的完工。由此也可推算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间约为公元 26 年左右。

2、希律家族对犹太的统治

大希律统治残暴，曾屠杀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因为害怕要出生的“犹太人的王”威胁自己的王位，又下令屠杀伯利恒四境男婴。

他有十妻，生七子，其中四位与圣经历史有关。后来大希律被神刑罚，患颠狂症而死。死后领地由他三个儿子继承。

（1）希律的三个儿子分封为王

希律·安提帕

希律·安提帕的领地是加利利、约旦东部地区（路 3:1）。公元前 4 年至公元 39 年希律·安提帕在位，希律·安提帕被放逐后其领地并入希律·亚基帕的领土。他先娶亚里达王之女为妻（参林后 11:32），后又夺兄长的妻子希罗底为妻（太 14:3—4）。为此，他杀了责备他的施洗约翰。

希律·亚基老

希律·亚基老接续大希律统治犹太省，亚基老和他父亲一样，性情残暴，滥杀无辜。公元 6 年，因犹太人对他的统治极力反对并上告凯撒，亚基老被免职，其行省由巡抚居里扭代管。

希律·腓力二世

希律·腓力二世的领土有戈拉尼提斯、现在的戈兰高地、特拉可尼等地区（路 3:1），腓力二世建造了该撒利亚城，作为他的第二行宫。其统治较温和，所以受到犹太人拥戴。腓力二世也死于公元 34 年。其领土归入亚基帕一世。

（2）希律家族与圣经有关的其他成员

希律·亚利多布

希律·亚利多布是大希律和犹太妻子生的儿子，早年死去，生前生一个儿子，便是后来的希律·亚基帕一世。希律·亚利多布生了一女儿便是希罗底。

希律·腓力一世

大希律长子，一生没有作王，生前一直住在罗马，其妻子原是他的侄女希律·亚利多布的女儿希罗底，后希罗底被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夺去。

希律·亚基帕一世

希律·亚利多布的儿子，公元 37—44 年为犹太地的王，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的那位杀雅各、囚彼得的希律王。希律·亚基帕一世上台后积极外交，用粮食和财物支援周边国家，同时为了讨好犹太人，一面大兴土木，一面逼迫犹太人痛恨的使徒，结果被虫咬死（使 12:23）。其子就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两个女儿分别是百尼基和土

西拉。土西拉后来嫁给了罗马巡抚腓力斯为妻（徒 24:24）。

希律·亚基帕二世

他是希律·亚基帕一世之子，希律·亚利多布的孙子，他就是审问保罗的那一位。他有两个妻子，传说其中一位就是他亲生的妹妹百尼基，他们曾大张威势来审问保罗（徒 25:23）。希律家族常有此乱伦的关系。亚基帕二世死于公元 100 年，希律王朝亦到此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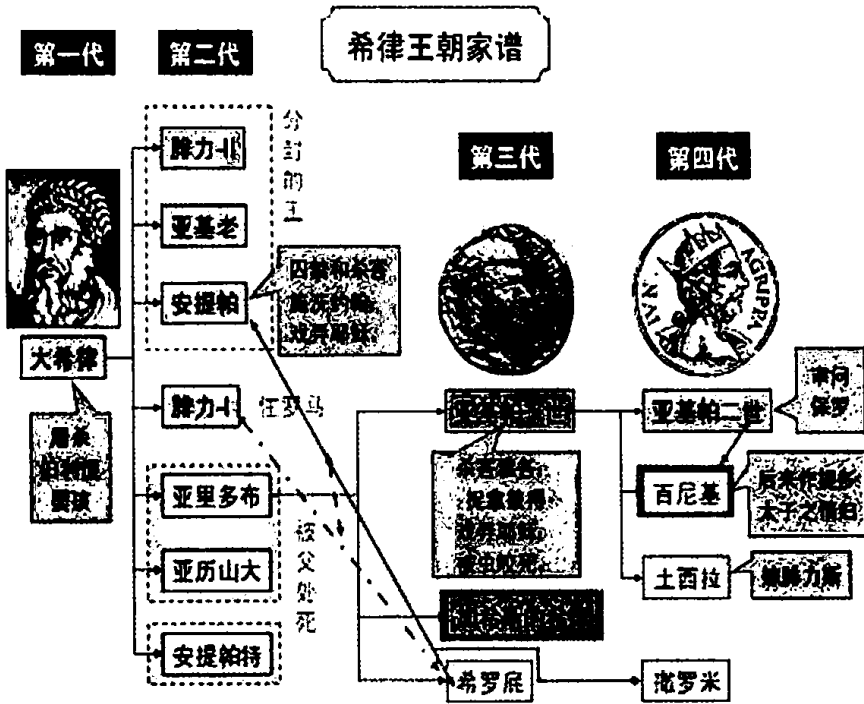


图 1.15 希律家族图表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第一章 耶稣和使徒时代的教会

第一节 耶稣在世时代

1、耶稣降生

加 4: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路 2:1-2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圣经中提到的凯撒奥古斯都是屋大维。他成为罗马唯一的皇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帝国境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报名上册，即人口普查。在埃及发现的公元 104 年的蒲草纸碎片上，记载了一段关于耶稣降生时天下人民报名上册的话：“由于报名上册之时已近，远居各地之人都应准备回乡，以便完成全家家户户登记的手续，如此才可保留他们的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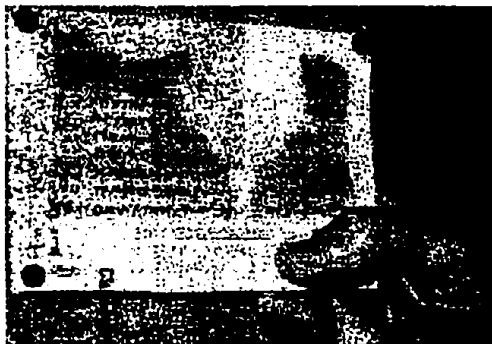


图 2.1 在埃及发现的记有报名上册的蒲草纸碎片

2、耶稣家谱的两种观点

对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两个不同的家谱，历史一般有如下两种观点：

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记载的是马利亚的家谱。可能马利亚的父家没有儿子，约瑟到马利亚家生活，继承她家的产业。这种情况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过继”，所以路加福音也称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另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优西比乌的观点。约瑟的祖母伊斯莎嫁给马但后，生下约瑟的父亲雅各，然而马但离世后，伊斯莎改嫁与麦基（拿单的后代），生下希里。希里无子，但既然雅各和希里是同母异父的兄弟，雅各生下的儿子约瑟也归在希里的名下。因此，希里也是约瑟的父亲。

无论哪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对圣经的坚信。神在圣经中启示这两个不同家谱的记载，一定有祂的美意。我们是有限的，无法确切知道原因，但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从亘古应许要来的那一位。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才是教会历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的核心。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3、耶稣传道时代犹太行省和执政官

路 3:1 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当耶稣传道时，罗马皇帝已经是屋大维之子——提庇留（14年—37年在位）。他是最早听到耶稣和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些事迹的皇帝，对基督教颇有好感，曾提出报告打算推广，被元老院驳回。

耶稣时代的犹太巡抚是本丢·彼拉多（？—41年），其名字的意思是“掷标枪的能者”。根据名字判断，他可能是运动会的一名标枪健将。当时除了罗马巡抚统管犹太地外，罗马政府还设立了傀儡——分封的王，就是前述希律家族的分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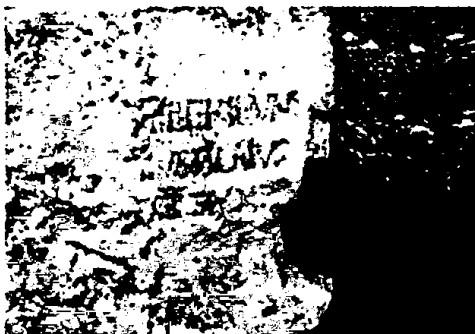


图 2.2 刻有本丢·彼拉多任犹太总督的碑文

4、耶稣降生前两次起义

徒 5:36-37 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附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附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对于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犹太人一直表示不满，总想恢复独立的犹太王国。于是有些人就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根据圣经和历史考古的记载，耶稣降生前主要有两次起义：

(1) 丢大的起义——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中迦玛列提及的。对于这次起义，没有历史记载，至今不详。有些学者怀疑迦玛列说的就是下面这一次起义。

(2) 犹大·嘉马拉起义。因报名上册要增加赋税，一个名叫犹大·嘉马拉的人怂恿犹太人反叛罗马，有几万人跟随。最后起义被镇压，几万犹太人被钉十字架，余者组成奋锐党。耶稣正是出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在马太福音中记载当希律和犹太人听到基督降生的消息后，恐慌起来。

太 2:3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希律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他怕失去王位。那么犹太人为何也如此不安？因为不久前发生的起义被血腥镇压，犹太人仍心有余悸。他们一听说有一位王要降生，就担心那又将是一场血雨腥风，所以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不安起来。可见，在高压的奴役下，犹太人宁可在苟延残喘中生活，也不愿像他们祖先当年在埃及做奴隶时那样呼求耶和華

的拯救。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所盼望的那位真正的犹太人之王是一位和平之君！

5、耶稣时代犹太宗教背景

耶稣时代，由于罗马对殖民地的政策多变，所以犹太社会复杂混乱。有几类影响社会及宗教主流的人群，他们分别是：

(1) 法利赛人

“法利赛”意为“分别”。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拉比，在犹太人被掳回归后渐渐形成。到了耶稣时代，他们地位崇高，受人尊敬。但此时的法利赛人大多都成了字面解经和律法主义者，以只注重外表的装束和敬虔而著称。

(2) 文士

文士的希伯来名称是“sopherim”，原意为抄写、宣读圣经的人。在四福音的记载中的文士不仅只做抄写文书等工作，而且已经形成一个解释圣经的权威阶层。文士并非祭司，因为此时祭司担负圣殿里敬拜的职责，祭司的工作已完全属于礼仪层面。

(3) 律法师

律法师是讲解律法的一类人的统称，是旧约律法的专家，专职讲解并执行律法的教训。他们只按字面解经，自认为对律法的解释要高于法利赛人，所以在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企图澄清自己。但他们的律法主义和自以为义是与法利赛人如出一辙。

路 11:45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

(4) 撒督该人

哈斯摩王朝的西门认为大祭司职位应由撒督的后裔继承，但希律王废弃了大祭司的世袭风俗，所以这些祭司后裔总希望能再恢复这一制度，于是他们便联合在一起组成了撒都该人（Sadducees）。由于这些世袭的祭司家族仍然是当地的贵族，他们就保持了对上层社会的影响力，但他们不承认身体复活、天使等教义，与今天的“不信派”一样。

(5) 希律党

希律党并非实际党派，是支持希律·安提帕之人的总称。他们是典型的世俗主义者，不理睬圣经，只关心政治，竭力维护希律王的统治，从中获得好处。

(6) 奋锐党

公元前 4 年，犹太·嘉马拉反抗罗马人的起义失败后，剩余的起义者便组成一个秘密的抵抗组织——奋锐党，也称为匕首党（因常藏匕首在身），伺机行刺犹太叛徒。他们笃守摩西律法，热切等待弥赛亚国度降临，但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国度仍是地上的犹太王朝。十二使徒中的奋锐党西门就是一位原属于该组织的成员。可见，世上任何党派、任何组织，只要归向基督，都会成为新人，不再被旧事袭扰。

(7) 艾赛尼派

他们是在公元前 2 世纪马加比家族起义之后，在死海周围组成的库兰母（昆兰）社团的总称。他们离群索居，专心传抄旧约圣经。今天艾赛尼派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他们抄写的旧约圣经在上个世纪被发现，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6、死海古卷

1947年，居住在死海西北部某一小村中的儿童，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发现了一些羊皮卷。这些羊皮卷后被证实是一些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旧约圣经，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由库兰母社团抄写的，其内容与我们今天拥有的圣经分毫不差。死海古卷包含了整个旧约的38卷书，只是没有《以斯帖记》。学者们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以斯帖记》中没有“耶和华”或“神”的字样，所以艾赛尼派的人不承认这卷书的正典地位。今天，也有一些人仍然持有艾赛尼派的这种观点，对《以斯帖记》的默示性产生怀疑。另一种解释是，艾赛尼派是极端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因无法接受上帝的子民竟成为外邦皇后的事实，故而略去。

死海古卷的出土，是神在末世赐给争战中的教会的宝贵礼物。20世纪是反圣经、反传统猖獗的年代，怀疑论、无神论大行其道。德国兴起的高等批判学更是直接批判圣经的地位，甚至否认旧约圣经是写于公元前，而认为旧约是公元后由后人添加杜撰而成。在这场争战中，许多选民都开始疑惑。上帝怜悯祂的教会，使这公元前二百年由艾赛尼派抄写的旧约圣经面世，堵住了高等批判学者的口。即使如此，不信的人仍会不信，但对于神软弱的儿女来说，这是巨大的帮助和鼓励。现今死海古卷的原稿就保存在以色列的圣书博物馆里面。由于死海古卷是在瓦罐里被发现，所以博物馆建成了瓦罐的外形。



图 2.3 保存死海古卷的以色列圣书博物馆

第二节 使徒传福音和殉道

1、福音属灵环境的预备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复活、升天，都是按神所定的日期，是“女人后裔伤蛇头”的应许的实现。从此教会不再用外部的礼仪，而单单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教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圣灵的大能，教会开始扩展到万国万邦，这是对旧约预言的成就。因此，犹太民族作为预表之民族的地位开始改变，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不再特殊，而以色列国的历史也不再继续代表教会的历史了。但这样的转变，也不是那些出身犹太的使徒一下子能明白的。但他们仍聚集在圣殿的时候，神藉着司提反的殉道使他们四散，将福音带到各方。

另外，神也早已在其他方面，为收割时代预备了合宜的环境和土地。在文化上，广泛传播的希腊文化构成了各族人民拥有共同文化的背景；在语言上，希腊语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为新约圣经的书写和传播奠定了语言基础，希腊文旧约圣经——七十士译本为福音在外邦世界的传扬也做了铺垫；犹太人在希腊和罗马统治时期经历了三次的流放，把独一真神的信仰及七十士译本带到天下各方。他们在各地建立了犹太会堂，这些会堂成为使徒们传扬福音的重要平台。同时，因着圣经的广传，神在各地也为福音的种子柔软了许多地土，即当时被称作虔诚人的一群人。他们早已生发出敬畏之心，准备接受基督的福音，百夫长哥尼流就是其中之一。

徒 18:19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徒 10:1-2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同时，罗马帝国的交通十分发达，各个地区都被高水准的大道连接在一起，正如谚语“条条大道通罗马”所反映的那样，这也为使徒们把福音传到各个角落提供了便利。

2、福音传至外邦

赛 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五旬节后，使徒们开始将基督的福音传扬到万邦，上帝在成全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众使徒中保罗的宣教足迹最远，果效最突出。他不仅在亚细亚一带建立了教会，而且将福音传到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其中，保罗在雅典向希腊人讲道的亚略巴古广场就位于世界著名的七大建筑之一的雅典卫城。根据优西比乌《教会史》的记载，使徒们传福音的路线，除圣经记载的彼得和保罗的路线以外，其他使徒到达的地点分别是：马可——埃及和亚历山大；多马——印度；巴拿巴——居比路；达太——以德撒。



图 2.4 保罗在亚略巴古广场传道（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3、第一次教会会议——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公元 49 年秋天，使徒保罗、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后，他们就外邦教会是否要守礼仪律条规的问题与一些人大大争辩。为解决此问题，使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召开了新约教会的第一次会议——耶路撒冷大会。最后大会否认了“外邦教会必须守礼仪律才能得救”的主张，定规了四条禁戒——血、偶像、勒死的牲畜及奸淫。大会促进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彼此接纳和融和，它的定规使外邦教会皆大欢喜，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这次会议意义深远，因为它不仅对困扰教会的教义问题给出了精准的结论，而且也教会会议及教会治理立下了规范。宗教改革后形成的长老会体制就是根据此次会议的模式而制定的。

4、使徒殉道

约 15: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太 20:23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新约教会初期，使徒就开始遭受逼迫，司提反和使徒雅各的殉道在《使徒行传》中有详细记载。根据教会传统和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其他使徒也先后殉道。

彼得与保罗于 64 年在罗马殉道，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保罗被斩首；

马太在埃塞俄比亚殉道，死于剑伤；

马可死于埃及的亚历山大，他被迫害者用马车拖过闹市，直到拖死；

腓力到赫拉波里斯传道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巴多罗买于 52 年也在赫拉波里斯附近殉道；

路加在希腊传福音，众多失落的灵魂纷纷归向耶稣，由此引起逼迫，被绞死；

主的弟弟犹大被棍打死；

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柱石”的雅各（传统认为他是主的弟弟雅各，但加尔文认为他是亚勒非的儿子使徒雅各）从圣殿被推下后，被棍子打死；

奋锐党的西门在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工作，极有成效，后赴非洲、甚至英国传道，74 年在英国被钉死；

使徒马提亚在耶路撒冷殉道，先被石击，后又斩首；

亚波罗在罗马城殉道；

巴拿巴被犹太人所杀。

从此，教会进入三百年大逼迫的时代。

第三节 第一次大逼迫

由于初代教会遭遇的大逼迫通常由罗马皇帝发动，所以本书的附录一给出罗马皇帝的年代表。

1、尼禄纵火案

54年，尼禄在其母亲的帮助下当上罗马皇帝。尼禄本人酷爱音乐，近乎疯狂，终日吟诗作赋，不理政事。64年，尼禄突发奇想，想要使罗马城成为像雅典卫城一样的世界奇迹。在元老院和罗马民众未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派人在罗马城四处放火，以使其立即成为废墟，实现他重建罗马城的梦想。结果，在大火的吞噬下，罗马全城三分之一被毁，死伤无数。这一下激怒了罗马民众，大家立即调查火灾真相。尼禄害怕事情败露，激起民愤，便瞒天过海，谎称大火是基督徒所为。此时的基督教仍处于被打压之中，所以教会的聚会都比较秘密，教会也不为民众所了解，因而民众对这一谎言深信不疑。尼禄便乘势展开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屠杀。

尼禄屠杀基督徒的方式是在罗马大剧院（斗兽场）将基督徒活活喂给饥饿的狮子，因此数以万计的基督徒被狮子吃掉。到了晚上，尼禄又把许多基督徒捆绑在柱子上当蜡烛烧死，同时命人在一旁歌舞助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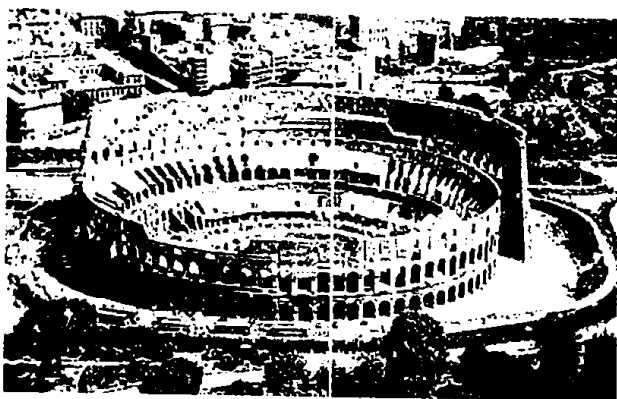


图 2.5 屠杀基督徒的罗马大剧院（斗兽场）遗址

教会在这场流血的争战面前，表现得无比勇敢。基督徒们在唱诗赞美中英勇殉道，见证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徒的壮烈之举震惊了罗马人，在基督徒的惨死中，活在享乐奢靡中的罗马公民没有像以往观看角斗士那样感到兴奋和刺激。相反，他们第一次领略到基督信仰的价值何等超越生命、超越死亡。使徒保罗和彼得也都是在这次逼迫中殉道的。



图 2.6 法国杰洛姆（Jean Leon Gerome）的《基督徒殉道前的祈祷》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2、圣殿被毁及犹太人被赶散到列邦

(1) 背景

公元 69 年左右，犹太人在一个名叫约哈难之人的率领下，又发动起义。与其说是起义，不如说是一次叛乱，因为他们不仅劫掠罗马人，也抢夺本国人。最后义军占领了耶路撒冷。

韦伯多（后来的罗马皇帝）率大军镇压。70 年，提多攻陷耶路撒冷。根据约瑟夫的《犹太史》记载，当时犹太地处处荒凉，人们易子相食，景象惨不忍睹，正应验了主耶稣升天前的预言。那些剩余的犹太人难以在本地生存，又一次被赶散到各方。

路 19:43-44 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太 24:2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2) 焚毁圣殿

提多攻占耶路撒冷后，为使犹太人不再以宗教为由聚集在圣殿而再次反叛，就下令焚毁圣殿。其实，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不仅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而且标志着恩典之约的预表阶段彻底结束了。当初代基督徒对圣殿和祭司制度还有一丝留恋之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就宣告：

来 8:13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如果上帝不是借着罗马人将圣殿彻底拆毁，那么这一旧约标志性的建筑会永远成为新约基督徒的偶像。即使时隔两千年后，许多人如时代论者，仍对圣殿情有独钟，认为犹太人未来还会重建圣殿。撒但藉着这样的错谬欲再次把人引到“懦弱无用的小学”。即使犹太人重建一个所谓的圣殿，它与我们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在今天的新约时期，敬拜的真正原则就是：“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灵，所以我们只可用心灵诚实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约 4:24）

第二章 初代教会教父和逼迫

第一节 教父和地区主教制的形成

1、主教制形成的原因

使徒之后，教父们继承了使徒的工作，同时初代教会的治理模式逐渐成为主教制。那么，耶路撒冷大会当年的会议制，如何形成了初代教会的主教制呢？这一直是教会历史上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当时客观环境因素，来探索主教制形成的原因。

(1) 教父——传承使徒的圣经权柄

使徒们离世后，虽然圣经已经写完，但教会还没有完全识别出圣经正典，又由于当时没有印刷术，圣经并没有普及，教会聚会时只是带领会众念诵使徒书信。当时充斥着许多类似正典的其他书信，甚至有许多伪造的书信。由于普通信徒自身缺乏辨别能力，因此为了辨认哪些书信是正典、哪些是人的作品，教会需要有自使徒传承下来的权柄来维护圣经正典的纯洁。此外，圣灵对圣经教义的光照需要藉着一些仆人，同时也为了抵制纷纷袭来的各样异端，神格外使用一些器皿，这就产生了初代教父。在传承圣经的真理教义上，教父是使徒的继任者。

(2) 主教——教会治理的权柄

由于教会始终处于逼迫之中，而且逼迫有时甚为强烈，以至于聚会常常东躲西藏。在这种情况下，用召开教会会议的形式治理教会是困难重重，因此教会无法以众长老会议的形式来治理。此外，为了安慰和激励在逼迫中的信徒、照顾殉道者的孤儿寡妇，每一地区就需要有一位核心的教会领袖来治理教会。如此以来，治理一个地区的教会的权柄就落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成为他所服侍教会的主教。于是，主教制逐渐成为初代教会的治理体制。当然，我们无法查明主教产生的其他原因，但由于主教制不是圣经启示的最佳治理模式，所以为后来教皇制的形成埋下危机。

2、初代几位著名的主教

罗马：黑马、革利免（罗 16：14、腓 4:3）；安提阿：伊格那丢；耶路撒冷：西面（革罗罢的儿子）（约 19:25）；士每拿：坡旅甲；希加波利、帕皮亚；犹太都（西 4:11）；亚历山大：巴拿巴。

3、初代教父书信

许多使徒后期教父的作品，虽不是圣经正典，但它们见证了新约著作的正典性和完整性，对我们了解初代教会所处的背景以及整理圣经真理颇有帮助，其中有几封书信流传至今。它们是革利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革利免一书》、坡旅甲的《致腓立比教会书》、伊格那丢的《七封书信》。

作者不确定的书信还有：信徒的行为手册《十二使徒遗训》、讲道性质的《革利免二书》、《巴拿巴书信》、预言性的《黑马牧人书》和《帕皮亚残卷》。

第二节 初代教父的主要神学思想

初代教父在他们的书信中，为上帝论、基督论和教会论等教义奠定了基础，但缺乏系统论述，而且他们的著作里也有不少错误的认识。

1、论上帝

由于初代基督徒对基督持有一种深厚的个人关系的印象，所以初代教父们最关心的乃是如何才能过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他们虽被异教的多神思想所包围，但是却坚信独一真神、持守一神论。《黑马牧人书》说：“我们尤其要相信一位上帝。他是创造并统管万物的主。他从无生有，叫万物存在。”所有教父都异口同声说：“上帝是万能之主、创造者、托住者，是万物的统管者。他虽创造世界，但他本身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上帝是眼所不能看见的，是人所不能理解的；非受造的，乃是永远的；而且他毫无所欠。他是慈悲的父，他显明自己是爱护人类的。”教父们有这样的思想，源于他们对旧约圣经和使徒书信的认信。不过，大多数的教父都没有谈到三位一体，只有革利免和《黑马牧人书》曾谈到父、子、圣灵的神性并给予肯定，但也没有提及在三位一体中位格间的关系。虽然他们的论述没有形成上帝论的任何教理，但他们对上帝属性和作为的论述为后来教会要阐明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做了铺垫。

2、论基督

教父们对基督的神人二性都有所论述，但还未提及二性的关系。他们都相信基督之神性。伊格那丢认为基督为“我们的上帝”及“我的上帝”。革利免在致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应当认基督为上帝，为死人及活人的审判主。”他们也相信基督的人性。《十二使徒遗训》论及耶稣不仅是上帝所拣选、所喜悦的，而且也是上帝的仆人。伊格那丢写道：基督为马利亚所怀孕，并出自“大卫的后裔”。革利免说：“主基督拯救我们。虽然他原是灵，但却成为肉身，并且呼召我们。”他们对基督神性的先存都有清楚的陈述。伊格那丢说：“未有空间与时间之先，基督就是上帝。他高过众天使，但他与圣父不同。他协助创造。他后来在肉身显现，为被救赎者打开天国的门。”《黑马牧人书》也论及基督之先存性。

3、论救恩

关于基督的拯救工作、如何赎罪，教父们虽有明确的记述，但对基督的工作为何以及如何带有赦罪能力，却缄默不言。革利免说：“让我们注视基督之血。让我们知道此血被圣父看为宝贵，因主的宝血为我们的救恩流出，并将悔改的恩典带给全人类。”《巴拿巴书信》写道：“就因为这个理由，主忍受舍去他的身体，以致于死，好叫我们藉着赦罪得蒙圣洁，即靠着他所洒的血。”坡旅甲和殉道者游斯丁都讲到基督代替的痛苦。教父们喜欢谈上帝所带给世人的恩典，这些恩典包括有赦罪、真理的知识和永生。他们这些看法虽无错误，但都是一些没有系统的教训。

有一种谬论逐渐在初代教父中滋生，就是有些教父强调一种新的道德论。他们主张善行之功效。例如，坡旅甲写道：“倘若你能行善，不可迟疑。因周济能取得能力，以脱离死亡。”《巴拿巴书信》说：“为你罪的赎价，用你的双手工作。”《黑马牧人书》说：“倘若你能行过于上帝所命令的，你就将获得更大的荣耀，并且在上帝面前，你将有更多的尊贵。”这些都是一种功德主义观念，即人有可能行额外的善行。这种思想为以后罗马天主教“分外功德”的论调埋下了危机。

4、论教会

诸教父都有很强的教会观念。越是在逼迫时期，信徒对教会的认识越清晰，对教会的委身越专一。革利免说：“教会是众圣徒的团体，是上帝自己的产业，是基督的羊群。”《黑马牧人书》说：“教会是创造的真正目标。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正如身体与灵魂的密切关系一般。教会只有‘一个’，并且是‘圣的’。我们若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属于教会。然而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令人厌恶的事。再者，谬论亦可能潜入教会。”可见，教父们都很强调信徒对教会的委身。但他们有时过分强调教会治理中的核心权柄，如伊格那丢写道：“监督就是教会的中心。当跟随你的监督，犹如耶稣跟随圣父一般。”教父们的这些言论本来并没有鼓励教阶制度的意图，然而却被后来的罗马天主教利用来支持教皇制。

5、论圣经

教父们的作品大量引用旧约和新约，甚至长篇累牍地引用经文，以至于仅仅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可以复原圣经。对于旧约圣经，教父们全然信赖旧约，并承认旧约有绝对的权威。当他们的著作提到“经上”或“经上记着说”这类字句时，我们便确知教父是在论及旧约。他们认为旧约是神所默示的。他们当中有人认为基督徒为真以色列人，因此基督徒为旧约的守护者。

对于新约圣经，他们认为耶稣和使徒的话语有最高权威的地位。革利免论先知及使徒诸书信为教理权威之书。根据教父们的认信，众使徒给教会的教理与教训，是不可能错误的。“圣经无误”的观念是历代教会不可动摇的根基，这观点在初代教父们身上已经体现出来。我们若仔细考察，便知道众教父都晓得有四本福音书及保罗的十三封信。

6、论圣礼

教父们承认圣礼是属于教会的。由于当时还没有受到后代神秘主义的影响，初代教会的圣礼观更接近基督设立圣礼的真义。后代的圣礼观特别是改革宗的圣礼观都是对初代教父圣礼观的传承。

(1) 洗礼。教父们认为洗礼是赋予基督恩赐的真正方法。《巴拿巴书信》说：“我们背着罪与污秽走入水里，然后从水中上来，这样我们的心就结果子，我们的灵就有在耶稣里敬虔的盼望。”《黑马牧人书》说：“没有任何悔改比得上这个，即我们下到水里，便可承受以往诸罪的赦免。”因此洗礼赋予赦罪。洗礼也是一种“印证”，叫我们在基督里获得信心与所指望的新生命。教父们在洗礼的言论上，似乎有一些偏离了圣经，使人误以为洗礼能叫人重生得生命，又能叫人的原罪本罪都得赦免，但他们本身并非要表达这种意思。

(2) 圣餐。他们祈求并体验基督临在圣餐之中。伊格那丢说：“圣餐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的罪受苦。圣父在他美意中，叫他从死里复活。”圣餐仍然是一种“感谢祭”。在这时期，他们并没有“圣餐用的酒会变成基督之血”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以后在罗马天主教产生的。

7、论末世

教父们都有很强的末世思想。当时，人人都认为他们是活在世界的末了，所以他们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预料耶稣会立刻再来。这样的期待使信徒团结在一起，他们开始探索基督再临的预兆——假先知出现、罪恶与逼迫逐渐增多、敌基督的出现、神迹奇事、死人复活等事的发生。圣经要求活在任何时代的人都要谨慎自守，因为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在那逼迫的年代，基督徒有末世的紧迫感更是理所当然的。

8、书信中关于主日

遵守安息日是神在伊甸园时就颁布的诫命（创 2:1—3）。使徒时代的教会都尊主日为圣，教父时期的教会在遵守安息日的事上也没有任何异议。第二世纪的教父伊格那丢、《巴拿巴书信》的作者以及殉道者游斯丁等都曾详细说明基督徒为何守主日而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初代教会遵守主日在非信徒的书信中也有记载。109年，庇推尼总督普利尼上书皇帝图拉真，书信中记载了基督徒的崇拜。他说：“在星期日日出之时，基督徒聚会，唱诗（诗篇）、祷告，领受圣餐，到了晚上，举行聚会与爱筵聚餐。”即使当时出现的异端也都没有针对这一诫命来攻击教会。

9、婴儿洗礼的思想

初代教会虽然还没有系统的圣约神学教义，但对圣约的观念特别是恩约家庭的观念都十分清晰的。从使徒时代以来，教会就施行圣约家庭的洗礼，对象就包括信主的家长、家中的儿童与婴儿。游斯丁在《护教书》中说，许多老年信徒从小就是主基督的门徒。坡旅甲在殉道时说：“我事奉主86年”，这显示他是从小就受洗了。爱任纽说：“婴儿也属于重生（受洗）范围之内”。居普良说：“应当给小孩施洗，越早越好”。

第三节 最早的几个异端

1、犹太教

犹太教是拒绝福音之犹太人的总称。犹太教只接受旧约，强调割礼和律法。到了使徒时代，他们承继法利赛人的传统，继续逼迫使徒，就成了异端。

徒 6:5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2、爱宾尼派（以便尼派）

爱宾尼派也属于犹太人的信仰，他们虽不像犹太教那样直接反对基督教，但他们企图将基督教犹太化。他们强调摩西律法的重要性、严守律法，但否认因信称义、童女怀孕、耶稣是神。他们认为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才知道自己是基督，耶稣因在遵守律法中表现出来的美德而被上帝收纳为嗣子。保罗在歌罗西书等书信中详细驳斥了他们的错谬，所以他们拒绝保罗书信。

3、幻影派

幻影派的人相信物质世界是恶的，因此神不可能取了物质的身体。他们否认基督道成肉身，认为基督的肉身只是一个幻影，被钉受苦的不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只是幻影而已。这一异端在使徒约翰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

约壹 4:2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4、克林妥派

克林妥原本是使徒约翰时代以弗所的一名同工。他认为基督的国将在地上实现，持续千年。在此期间人们将不停地吃喝嫁娶，这等同于节庆和献祭。他在基督里既然得自由，就当追求放纵。追随克林妥的人被称为克林妥派，又称为放纵派。有一次，使徒老约翰去浴池洗澡，看见克林妥也在那里，约翰急忙穿上衣服跑了出来。同伴问发生了什么事，约翰答道：“恐怕这房子要塌了，因为真理的仇敌克林妥在这里。”

加 5:13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5、诺斯底主义——第二世纪最大异端

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于 80—150 年间成形，这个异端主要是把希腊哲学中的二元论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混合到基督教里来。“诺斯底”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知识、智慧”。其主要观点如下：

（1）本质一元论

诺斯底主义深信神不断发出灵体（Aeons）。所有受造物都是由至高神发散、放射出的诸神，都是人神混杂，且他们离神越近就越像神，离得越远就越缺乏神的形象。

（2）宇宙二元论

在宇宙中，有一位由神发出的灵体离神最远、完全和神对立，成为恶者。物质世界是由这位恶者所创造的，所以灵界与物界是对立的。

（3）灵善物恶

物质世界是罪恶的，灵界都是善的。也就是说在人类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里，有两股同等的、势均力敌的力量，即所谓的善恶二元论（来源于斯多亚派哲学）。

（4）耶稣幻影说

善神发出超灵体与耶稣肉身以秘密的方式结合，为此诺斯底派撰写《约翰行传》等书籍。

（5）物质有灵的余种和能力

诺斯底派认为物质仍然有灵的余种和能力，所以人有三类：属灵人、属魂人和属体人。因为属体人是不得救的，所以要追求作属灵人、属魂人，但人要想得救变成属灵人和属魂人，就必须参加诺斯底派的秘密仪式。

诺斯底主义的思想中充满了褻渎，这一异端给初代教会带来巨大的毁坏，是初代教会面临的最大的仇敌。今天，人神混杂的灵恩运动、神秘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新纪元运动都是初代诺斯底异端的变种。近代中国教会的三元论思想也是因受此异端的影响而形成的。

6、马吉安主义

马吉安主义是由诺斯底主义衍生出来的一个异端。马吉安认为上帝是爱，他推崇保罗书信。他同时认为旧约里所说的耶和華是一位严厉的主宰，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接受旧约的教训，应该把旧约丢掉。因此马吉安成为割裂圣经的鼻祖，他还公布了一个他认为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是新约圣经的标准经文——《马吉安的正典圣经》。教父们都痛恨马吉安主义这一异端。有一次，坡旅甲在罗马遇见马吉安，没有和他搭话。马吉安问坡旅甲：“你不认识我吗？”坡旅甲不客气地回答：“我认识你，你是撒但的长子马吉安。”

诺斯底主义和马吉安主义两个异端都出自希腊哲学，所以又被称神哲派。

西 2: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7、孟他努派

孟他努派是 140 年左右兴起的异端，由一个名叫孟他努的信徒与两个所谓的女先知在腓尼基一带发起。他们反对神哲派，主张教会信徒必须从神那里得到特殊的能力，强调圣灵的能力及先知的讲论，并且要求信徒在生活上要有圣洁的追求和完全为主摆上的心态。他们反对保罗书信，只喜欢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非常强调方言的恩赐，和今天的灵恩派一样。至于孟他努派强调的过圣洁生活，无非就是经常禁食、守童身。他们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主必再来。这个异端是今天灵恩派的鼻祖。

约 16:13-14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8、异端的规律

在教会历史中，撒但一直使用的一个诡计是：当一个异端出现时，教会会竭力抵挡，在抵挡时有时用力过猛，忽略了真理的平衡性，结果不知不觉又落入另一个圈套。这诡计类似于拳击中的左右连攻法。我们从初代出现的几个异端可以看出这一诡计。当教会竭力反对以便尼派及犹太教靠律法得救的错谬时，主张放纵情欲的克林妥派异端便乘机流入，使不少人中了撒但的诡计而陷入放纵主义。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等用堕落的理性将希腊哲学混入基督信仰。当教会竭力抵挡这些神哲派异端的时候，忽视了灵命建造，孟他努派趁机打着追求灵性经验的幌子再次冲击教会。后代的教会也面临着同样的攻击和试探。当教会竭力反对天主教功德主义的时候，不小心会走向反律主义的陷阱。当马丁·路德竭力反对天主教教皇体制的时候，教会不小心又落入反体制的圈套。真理的平衡是何等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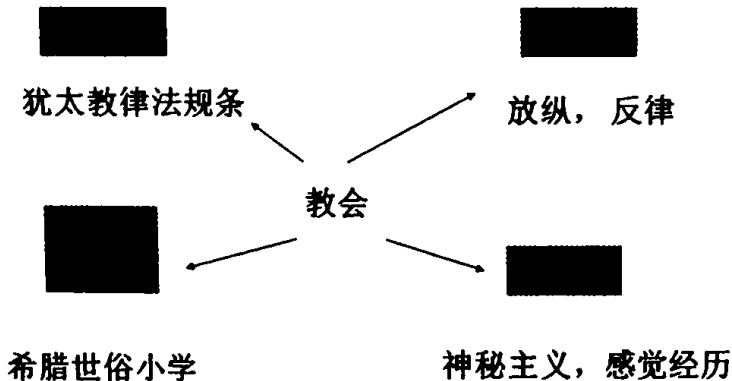


图 2.7 初代最早的几个异端

第四节 大逼迫和殉道

教会在内忧外患中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继续见证着得胜阴间权柄的应许。尼禄的逼迫只是在罗马城内，并不是全帝国性的大规模逼迫。然而接下来的罗马皇帝开始了对基督徒的大规模逼迫。

1、图密善最早大规模逼迫

从罗马皇帝图密善（Titus Flavius Domitianus，又译多米田，81—96在位）即位后，罗马帝国开始了对基督徒的大规模逼迫。某些地区不但处死基督徒，而且也处死耶稣的许多非基督徒亲戚，主要是针对大卫家族。这也是主后犹太民族家谱消失的主要原因，可能这位皇帝对“大卫的子孙要作王”仍有忌惮。使徒约翰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流放到拔摩海岛，见到异象。图密善的统治也残暴不仁，超过他以前的皇帝。图密善骄奢淫逸，发明了女人角斗士等许多残酷又奢靡的娱乐，他还以无神论的罪名屠杀自己的基督徒亲属。独裁者一般总是怕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所以他总想铲除元老院的势力，这使得元老院的议员们惶惶不可终日。96年9月，元老院策划刺杀了图密善，由元老内瓦尔继位。内瓦尔立即剥夺了图密善一切的帝国荣誉，并大赦天下，取消图密善在位期间一切流放人员的判决，让他们返回故土。使徒约翰也得以从拔摩海岛返回以弗所。内瓦尔仅在位一年，便去世。另一位著名的皇帝图拉真继位。

2、图拉真减缓逼迫

图拉真于98年继位（Trajan，98年—117年在位），仍然继续减缓对基督徒的逼迫。当主耶稣在拔摩海岛启示约翰《启示录》时曾说：

启 2: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里的“几个人”和“患难十日”无非是在告诉约翰，教会所受的患难逼迫是有限的，无论是人数还是时间，都是少数和短暂的。所谓罗马帝国的三百年大逼迫，也仅是几个时期，也并非临到所有人，否则若都像尼禄和图密善这样残酷的迫害，教会也早被铲除净尽了。即使在逼迫之中，神也会开各样的出路保守那不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使教会得以存续，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图拉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现今保存于罗马城市的图拉真广场就是为该皇帝所建。有一位总督小普林尼上书皇帝：“现在基督徒越来越多，这些人除不拜罗马神像和献祭之外，无罪可查。这些人拂晓就起床，把他们的基督当神来歌颂。他们也禁止谋杀、奸淫和欺骗。请陛下明示该如何处理他们。”图拉真给了模糊的回复：“应当立即停止对基督徒的追捕，但如果他们基督徒的身份一旦确定，还是要给予一些刑罚。”这种含糊不清的话便成了一个国家政策的两种表述，帝国境内有些地方开始停止了逼迫，有些地方则继续对基督徒杀害追捕，但总体上有明显减缓。

3、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丢殉道

这一时期，安提阿仍是奉行逼迫政策的地区。安提阿主教伊格那丢（Ignatius）约于108年被捕，由十名凶暴士兵解送罗马城，殉道于竞技场野兽口中。伊格那丢被定罪细节不详。他在殉道前将教会托付给坡旅甲，同时又给其他教会写了很多安慰的书信，他至死忠心，留下极美的见证。他说：“我是耶稣的一粒麦子，主用狮子的牙齿将我磨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成祝福别人的面包。”伊格那丢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殉道的主教。

4、哈德良

哈德良（Hadrian，117—138 在位）继位后，继续奉行前皇的模糊政策。这期间，巴勒斯坦又发生犹太人的暴乱事件。在犹太人中有一个人名叫巴尔科克巴（意即“星之子”，民 24：17），自称是弥赛亚，带领数万人攻城掠地。到 135 年，罗马政府攻取他们所守的坚城，剿灭 50 万以上的犹太人，在圣殿的旧址上建造异教神明（木星）的殿，并下令犹太人从此不得出入耶路撒冷，从此犹太人被彻底赶散到天下各方。为了报答基督徒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哈德良皇帝准许基督徒继续留居耶路撒冷。不仅如此，他还发布赦令：“倘若有人起诉基督徒，如果他们确实违反法律，就可以视其程度定罪；倘若有人为要得到报酬对基督徒提出错误的控告，经取证后应对起诉者加以惩罚。”这种对基督徒温和的态度更加缓解了教会受逼迫的困境，使教会在平安稳妥中继续得到建造。

接下来的皇帝皮雅斯（又译安多纽皮乌，138—161 在位）仍然是一位温和的皇帝，没有进行大规模逼迫。但一些地方的民众被撒但激动，自发地起来攻击基督徒，迫使一些地方官不得不杀害一些主要的教会领袖。士每拿的主教坡旅甲便在皮雅斯大帝统治下殉道。

5、坡旅甲

坡旅甲（Polycarpus，约 69—156 年）于 69 年出生，自幼跟从使徒约翰。坡旅甲为主殉道前担任士每拿主教（在今土耳其伊兹梅尔）达半个世纪之久。

他起初担任士每拿教会的执事。在早期教会中，执事担任着非常重要的事工。由于当时罗马政府不时地发动对基督徒的逼迫，很多人因坚守主道而坐监和殉道。因此教会的执事必须照顾那些失去丈夫或父亲的孤儿寡妇，同时也要探访在监狱里的弟兄，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并要竭尽全力供应他们衣食药物，减轻他们肉体的痛苦。执事还要管理教会的财物，保证教会的发展。

使徒约翰被放逐至拔摩岛之前，任命坡旅甲为士每拿主教。坡旅甲不负使徒约翰的重托，他不遗余力地牧养信徒，将教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还要与诺斯底主义等破坏真理的异端做坚决斗争，使教会的信仰始终未偏离主耶稣的教导。他著有《腓立比教会书》，此书共十四章，勉励信徒忠心侍奉，并倡导圣经真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当时，教会在复活节问题上存在争议，东方各教会和罗马教会相持不下。为了解决争端，坡旅甲前往罗马，与罗马教会主教阿尼塞图斯会面。他们长时间探讨此事，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尽管谁都无法说服对方，但彼此并无任何怨恨、苦毒和纷争。最终，他们决定让各教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以哪一天来纪念主的复活。为了表示在主内的合一，阿尼塞图斯还请坡旅甲在罗马教会主持圣餐。

坡旅甲从罗马返回后不久，士每拿的教会又遭遇逼迫。许多基督徒被捕下监，甚至有些被送到角斗场喂野兽或受火刑。弟兄们苦劝年已 86 岁高龄的坡旅甲离开城市，于是他到乡村去暂避，为教会及众人祷告。坡旅甲离开不久，寻找他的人因找不到他，便捉去他的两个仆人，其中一人因经不起苦刑而出卖了坡旅甲。罗马兵丁到乡村找到了坡旅甲的住处。他本可以逃走，但他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安静地对众人说：“愿主的旨意成全。”

坡旅甲被带到角斗场接受罗马帝国士每拿总督的审判。暴民在周围呼喊着“打倒无神者！”、“处死他！”。罗马总督说道：“悔改吧，向凯撒宣誓，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如果你拒绝，我就把你烧死。”坡旅甲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八十几年来，我一直事奉祂，祂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亵渎、辱骂我的救赎主呢？我是基督徒，祂是我生命中的王！你用烈火威胁我，烈火不过燃烧一时就会熄灭，但你却不知道那将来的审判之火，那永罚之火。不要迟延，你愿意动用什么就动用什么吧。”罗马总督怒不可遏，立即做出火刑的宣判。于是，角斗场堆起了木柴。当刽子手要把他绑在木桩上时，坡旅甲对士兵说：“你们不必把我绑在柱子上，我不想逃跑。”木柴点燃了，浓烟和烈焰吞噬了这位年迈的圣徒，基督忠仆坡旅甲祷告的声音从烈焰中传出来。



图 2.8 坡旅甲殉道的情景

正如教父特土良所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血所流经的地方是教会成长的地方”，坡旅甲等圣徒虽然为主殉道，但基督信仰并未因此而消亡，反而在罗马帝国更为广泛地传播。

第五节 几位护教士和教父

针对当时各地的逼迫，上帝兴起一些仆人起来用文章为基督徒辩护，这些人被称为护教士。他们辩护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政府及民众了解基督教，除去敌意。他们其中有许多人也是教会内的神学领袖，承担着教父的职责。

1、护教士、殉道者游斯丁

(1) 生平

游斯丁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希腊人，游斯丁年轻时醉心于钻研各种哲学，如斯多亚、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学派，希望从中找到真正的满足和平安。他甚至穿上哲学家的制服，模仿他们的样子。

但基督徒面对死亡时的大无畏的精神及他们高尚的道德生活给游斯丁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一名老基督徒向他传福音，于是他开始专心研读旧约。132年，他宣告自己归信基督，开始为主作见证。游斯丁在罗马住了很久，并在以弗所及罗马等大城市讲学。

游斯丁的信仰总是伴随着希腊哲学的掺杂，他认为基督教就是希腊哲学最崇高的具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体实现，并且是最卓越的真理，因此他将这信念也带进他的神学中。

(2) 游斯丁为主殉道

165年，游斯丁与另外6位信徒殉道于罗马。由于他们坚决不向偶像献祭，审判官要他们把所信的道说出来，游斯丁就简明地言明他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主宰，以及先知们所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审判官威吓他说：“你这自称学识渊博的人，自以为知道一切真理。我砍掉你的头，难道你还真能上天堂吗？”游斯丁说：“我若能忍耐，则必进入神的居所。凡忠心到底的就必受神的恩惠，直到世界的末日。”审判官又问：“你以为你所行的可得奖赏吗？”他坚决地回答：“我不是以为，乃是知道，并且是确信。”最后7人皆坚守到底，结果被处以先鞭笞后斩首的极刑。

(3) 游斯丁在护教和神学方面的贡献

在护教方面，游斯丁的贡献良多。他曾著述多类护教学书卷，其中以写给罗马皇帝皮雅斯(Pius)及哲学家路求(Lucius)的《第一护教辞》(First Apology)，以及简短而热情的《与推芬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第二护教辞》和《复活论》最为著名。

在他的神学思想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关于三一神的论述：“属神的道(逻各斯)，这道在父上帝之下，却是祂的儿子，祂的代表。”这样的表达有父子同体同权之意，但没有同等的观念。

游斯丁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他能领悟到基督教对普世的意义，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他对于“道”有卓越的了解，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在基督身上达到尽善。作为对“道”的总结，游斯丁作了明显的描述。然而，其作品偏重希腊哲学和理性，有许多不合圣经的观念。“基督教乃一切哲学中最正确的一种”是游斯丁的中心信念。

(4) 游斯丁神学中的错误

(一) 基督论

游斯丁降低了基督的神性，因他认为父神自己定了永恒的计划。为了实施祂的计划，就首先生了圣子(道、逻各斯)。如此便把圣子置于父神的元旨之下，为后来的亚流提出“次等的神”打下基础。其实，三位一体的神都在永恒中预定了一切旨意。他也忽略了耶稣的人性。在他看来，耶稣不过是道成肉身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事例，祂藉以将上帝的旨意最圆满地显露出来。他也讲及基督“用祂的血洗净相信祂的人”。

(二) 启示论

他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混为一谈。他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的成全，那些顺从并按着道(逻各斯)生活的哲学家都是基督徒，传讲基督教的不仅是旧约的先知。上帝的道也教导希腊人，无论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只要他们行事顺服上帝的道，便都可算为基督徒，如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这种思想与斯多亚主义同出一辙，此观点消除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界限，这也是今天许多新派学者所热衷的。游斯丁虽然承认基督教比哲学更优美，是单纯由逻各斯发出的，但他也认为哲学家的话是由他们和他们里面的逻各斯合作而成。这种错误思想就是将神的特殊启示与人的堕落理性对普遍启示的回应混淆在一起。初代教会的学者有这样的错误还有情有原，但经过圣灵对教会几千年光照后再持此言论，仍鼓吹佛教、道教里面都有上帝的启示，

在性质上就与初代教父的错误截然不同了。

(三) 福音道德化

游斯丁将基督的福音看为一种新的律法，以一种禁欲的道德生活教导人。游斯丁的这种将神学哲学化的方式影响了后来的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和俄利根。

2、教父爱任纽

(1) 生平

爱任纽出生在 115 年，在士每拿长大，早年从师于坡旅甲。他的名著《驳异端书》立下了“基督论”教义的典范。他为揭发诺斯底主义，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至少研究了二十多位诺斯底主义教师及其学派的大量著作。《驳异端书》对诺斯底主义进行了清晰的剖析，显明其将基督教变成二元论、贬低物质被造意义的邪恶本质，指出他们否认“物质的被造是出自良善之神”更是邪恶。爱任纽树立了基督教护教学的典范，他同时也极力反对当时兴起的孟他努派，后来爱任纽回到里昂任主教。他在里昂夜以继日地守望、事奉。据载，几乎整个里昂的居民都归信了基督，他还往高卢差派宣教士。爱任纽于 202 年为主殉道。



图 2.9 爱任纽

(2) 爱任纽的神学思想

在初代的几位教父中，爱任纽的神学思想是最接近圣经的正统思想。他竭力将神学从希腊哲学的混淆中分别出来而回归圣经。上帝使用这位仆人为以后的正统教义的建立做了很好的预备工作。

(一) 神论和启示论

爱任纽根据洗礼中使用的三一神的名字，提出神的三位存在状态，所以神从来就不是孤独的，从来就是三种形式（那时还没有位格一词），但是这三种形式本质相同、权能相同。这和当时的另一位教父希坡里达的观点完全相同。万物都是由这位神创造的，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也是同一位神救赎了人类。在对神的认识上，爱任纽强烈反对用哲学理性的方法来认识神，他第一次提出“启示”的概念：“我们不可能通过揣测而认识神，只有透过神的启示；没有启示就不可能认识神，就如人不在光中就不可能看见光。”

诗 36:9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二）基督论

爱任纽对基督论的贡献更是突出的，他第一次提出了道成肉身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联合。耶稣就是基督，是完全真实的人和神，基督就是第二亚当。罪就是不顺服神，基督的顺服抵消了亚当的不顺服，我们因此获救。这里已经含有了圣约的代表性思想。

但爱任纽的救恩论也有错误，他主张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圣灵是新人类的头，基督给我们新的生活方式。

3、教父特土良

（1）生平

特土良（Tertullianus，150—230年，又译：德尔图良），北非人，迦太基教会主教，他生于迦太基，被誉为“第一位拉丁教父”。年轻时特土良学习法律、成为职业律师。30岁时归主后，写下著名的《护教辞》，为基督徒的无辜作辩护。特土良所使用思辨神学的方法极有说服力，他的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带给受苦中信徒的极大的鼓励。207年，这位正统教父却脱离了教会，成为孟他努派的一员。但后来他由于不满孟他努的学说，于是自立宗派——“特土良派”。我们看到，神所重用的每一位仆人都有限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也容易步入歧途，和一般人并无两样。在神学上，特土良的贡献就是他首先采用一些日后教会常用的一些名词，如“三位一体”、“位格”、“圣礼”、“救赎”等。特土良对居普良及奥古斯丁影响颇深。

（2）特土良的几部著作

他的《灵魂的见证》比较哲理化，其中他极力揭示人心灵对罪孽的体会及其对自身超越提升的渴求。

他的《反马吉安论》长达5卷，是使用旧约为基督教进行的辩护，在书中他主张上帝的独一性，祂既是造物主，又是救赎者。

在《驳帕克西亚》中，特土良发展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这一词就是在此首先提出：“三个位格只有一个本质，位格乃众数，却没有本体之别。”

（3）特土良的神学思想

（一）神论

只有一位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把神和创造者分开是魔鬼最大的亵渎（针对诺斯底主义）；神是有理性的灵（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一切真实的事物都是有体的）；认识神不能靠揣测，只能通过理性（和爱任纽相同，反对游斯丁的通过哲学来认识神）；神同时拥有公义和良善（针对诺斯底分善神和恶神）；神的创造是为人，预定是为了人的完全（这有一点人本的倾向）。

（二）基督论

道是实际的本质，有独立的位格（针对游斯丁的道在神里面的观点），祂是从神而生，但不是流出，道与父同本质。

子的存在有起点（没有脱离子是低一等神的错谬），道在被造时才有位格（认为圣子是被造的），神人二性毫无混乱，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个位格中。

（三）人论

亚当犯罪后，邪恶就是灵魂的因素了（当时还没有约中归算的思想），这种状态透过生育传给全人类。人一出生，罪就在里面（第一次提出原罪思想）。全人类都在罪的权下，但人还是有自由意志的（这两个说法本身就有矛盾，一方面承认人是罪的奴仆，另一方面又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犯罪后必须认罪才能满足神的公义，但认罪要通过禁食、洗礼等仪式（将救恩和禁食、洗礼、忏悔相连，为天主教忏悔礼打下伏笔），此外特士良极其反对婚姻，为后代的禁欲主义埋下祸根。

总之特士良可以说是正统神学的奠基者之一，特别是在三位一体、位格等词汇的使用上，为后来的神学教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是初代教会伟大的教父，可惜晚节不保，他晚年竟然加入了孟他努派异端。虽然最后脱离了该异端，但也不免遗憾后世。这主要是由于特士良极力反对那些用理性、哲学来认识神的错谬方法，不小心走向另一个极端——神秘主义。这是每一个神的仆人所应该警醒的。

特士良的《护教辞》极其优美，逻辑论辩力极强，下面节选一段：

再者，如果我们确为最坏的人，那为什么对待我们与对待其他罪犯不同，同样的罪行不是应当得到同样的对待吗？如果对我们所加的罪名加到别人身上，你们就允许他们亲自或者请辩护人来说明他们的清白，使他们有充分的回答和辩护的机会；实际上，对一个人不容其辩护和申诉就加以定罪是违法的。但你们只是不许基督徒开口陈述自己的无辜，维护真理，许多人对基督教不加调查，只是一味地盲目仇视其称号，这有失公平。多数人对基督徒称号的仇恨如此盲从，甚至在他们对某一位信徒有好评时，都要对此称号加上贬语，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呢？有的说：“塞尤斯（Gaius Seius）是个好人，只不过他是个基督徒。”另一个说：“我很惊奇，像路西乌斯（Lucius）这样的聪明人，居然一下子成了基督徒。”谁也不认为有必要考察，塞尤斯和路西乌斯是否因成为基督徒就不好或不聪明了。他们称道他们所了解的，鄙夷其所不了解的……

第六节 马可·奥热流大逼迫

这又是一个热衷哲学的罗马皇帝，著有《沉思录》。他对各地逼迫基督徒的事件持放任态度，由于皇帝的放纵，使得各地开始再次残酷迫害基督徒。这种放任实际上就等于他自己逼迫一样，彼拉多虽然洗手，但却仍然不是无辜的。亚该亚的方伯迦流虽然没有亲自打保罗的同工，但他仍是保罗的迫害者之一。

徒 18:17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迦流都不管。

此时逼迫最厉害的地区有里昂、高卢（法国）。逼迫的外部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人传说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这是因为他们听到教会在领圣餐时所祝福的话。这些没有灵性的人怎能理解这节圣经的含义！撒但要攻击教会，会寻隙各样的借口，连主耶稣都能被他们定罪。所以教会要躲避患难，不是单靠自己的谨慎，而是要依靠神的大能的护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理。

官长用酷刑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只要继续坚持，就折磨至死。酷刑有火刑柱、铁椅、狮子坑、鞭打，景象真是惨不忍睹。然而窑洞烈火越是凶猛，生命大能的见证就越光彩夺目。在这次逼迫中，法国的一些著名主教如亚塔鲁斯、桑科图斯、游斯丁都纷纷殉道。据优西比乌的《教会史》记载：“官长把教父亚塔鲁斯绑在烧红的铁椅上，直至烧焦。亚塔鲁斯死前大喊：‘看那，吃人的正是你们，而我们什么恶事都没做过。’”

其中几位姐妹的见证也令人称奇，当神的能力覆庇一个人时，姐妹一点也不比弟兄逊色：

布兰地娜（Blandina）是一名奴隶出身的少女，在最残酷的拷打中却显现出超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坚强。最终，她被掷入网中，成为狮子的食物（177年）。

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是一名美丽的少女。在受到了比死更残忍、更可怕的严刑后，她与她母亲一同被煮死在沸腾的铁锅里（202年）。给这对母女执刑的军人波希利德斯（Basilides）被这殉道场面深深地感动，怜悯至极，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他也被斩首。女信徒比男信徒留下了更多的记录，而殉道的女信徒大部分是下层民女。

殉道者贝坡图（Perpetua）是一名出身贵族的年轻少女。她和自己的奴隶腓利西塔斯（Felicitas）以及她的孩子一同被下在监里，最终互相拥抱在一起被猛兽撕碎吞噬。此时，她们已经不再是主仆的关系，而是天国同路姐妹。圣经美好的祝福见证在这些软弱的器皿之上。

门 1:16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



图 2.10 贝坡图姐妹和她的仆人腓利西塔斯

第七节 亚历山大学派错谬的教义

1、两大学派形成

在逼迫火焰熊熊燃烧之时，圣灵仍没有停止光照教会真理的教义。这时形成了以安

提阿和亚历山大为中心的两大学派：此时较为正统的安提阿学派从解经开始就强调字义解经，因此该学派产生出来的教义也接近正统；亚历山大学派提倡灵意解经，而且他们的教义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非常强调世俗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越来越偏离圣经正路。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革利免和俄利根。

2、革利免

革利免的特点就是以希腊哲学来配合基督教的教训，有的时候重视科学甚于福音真理。他与特士良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独一真神是超乎自然的存在（不在哲学之前）。神是没有属性的，基督是神的道，是至尊的教师。基督吃食物不是为了身体的滋润，只是让周围人认识到他是人。祂没有任何情感，救赎大功并不是为了赦罪，而是要提升人的生活。

3、俄利根

俄利根（Origen，约185—251年，又译：奥利金）185年生于亚历山大港，是亚历山大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02年，他归信基督教。18岁时，他已继承革利免主教的校长职务。他以字面解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而自阉，主张过极端禁欲生活。在罗马皇帝德修进行大迫害期间，他因伤重而死。

4、俄利根的基本教义

俄利根的神学存在较大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神论

俄利根认为神不可测度、完全自足，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又主张神在不停地创造，这种观点被现代新派学者发展为“二次完善”。

（2）基督论

俄利根认为道是有位格的，也是永恒的，这是正确的。然而，他又主张：道是比父神次等的神，本质也是次等的；道就是神圣理性；基督的灵魂是先存的，道成肉身后两性混合。

和游斯丁一样，俄利根也认为圣子是生在神的预旨之下：“道从来就住在神的心中，是神的理性和计划；但神要行祂旨意时，就首先生了这道。”俄利根已经完全否认了圣子的独立位格，这也是后来亚流学派形成的根源。

（3）圣灵论

俄利根的圣灵论大有问题。他认为圣灵是父藉着子创造的第一位受造物，圣灵与父的关系不如子与父的关系密切。俄利根之所以否认圣灵，可能是因其太强调学问，而否认了圣灵的神性大能，这是哲学渗透到基督教的必然结果。

（4）人论

俄利根的人论也有严重的错谬。他认为：未有伊甸园以先，上帝先创造了人这有理性的灵（不是灵魂，而近似天使的一种受造物）。因为之前已有一次堕落，所以神又创造物质世界，目的是为了惩罚这些堕落的灵，因此神为他们造了监狱，就是人的肉身，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让灵魂在这监牢里受苦。这纯粹是希腊神话式的空想。

俄利根也将信徒分为属肉体的、属魂的、属灵的：没有文化的信徒是属肉体的，只拥有低级的信心，只是因怕受刑罚而信；有知识的、有文化的信徒才是属魂的和属灵的（例如哲学家），他们的理性有更高的理解力。

（5）救恩论

在基督论上，俄利根错误地提出：基督将自己交给撒但作为赎价，撒但接受了这个赎价，却不知道基督是完全无罪的，所以就无法将祂留住。基督之死是替罪而死。基督是教师、赐律者、好榜样，因此人可以因为效法祂而得到上帝的性情。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神将救恩赐下，人有权选择。俄利根反对因信称义，认为信心是使人得救的外在因素，知识才是使人得救的内在原因，悔改是得救的真义。

（6）圣经论

俄利根对教会最大的影响和损害就是发明了灵意解经。他认为圣经字面的意思都是低级的、是为那些属肉体的信徒预备的，而内在的、背后的含义才是高级的。照他所言，圣经就成了人自由发挥的、随己意谬解的书卷了。

5、对俄利根神学思想的评价

俄利根的种种诡异理论主要源于他的灵意解经及对希腊哲学的热衷。他的错谬教义对以后的多数异端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马其纽顿主义（敌圣灵论）、亚流主义（敌基督论）以及中世纪的天主教。虽然俄利根最后确实是殉道了，但是有一些人因此就认为对俄利根的神学思想也应加以肯定，这种“以管窥天”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有一位牧师曾说过：“我们只能高举圣道，不能高举殉道。”无论他个人结局如何，今天的教会仍需警醒防备他的错误神学思想。

第八节 二世纪最大的异端——神格唯一论

1、神格唯一论产生

所谓“神格唯一论”，就是相信神只有一个位格，这就等于说耶稣不可能是神，只是一个人。这个异端的产生可能源于一些人为了维护独一神的信仰。但他们用人的理性和哲学来认识神、揣测神的属性，将不能测透的神置于人的理性之中，而不用信心领受圣经的启示，对于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启示，他们就不接受。他们不理解耶稣既是神又是人的事实，就干脆否认耶稣的神性，因而便发明了这个异端。

2、神格唯一论的分类

（1）神格唯一论的创始者

关于神格唯一论的创始者，初代主教有不同的看法。特土良认为创始者是一个名叫普拉克西亚（Praxeas）——一位不太有名的人，而希坡里达认为创始者是士每拿的奴爱达（Noetus）。这可能由于两人都曾倡导此学说。普拉克西亚完全反对神格中可以有位格上的不同：“基督自己就是圣父，乃是圣父自己降生，并受苦而死。”奴爱达则大胆地说：“圣父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变成祂的儿子。”他接着说：“当圣父尚未降生时，

祂当被称为父；但祂按自己的美意，服在降世为人的旨意之下时，祂就出生成为圣子。”

(2) 动力神格唯一论

动力神格唯一论的创始者是安提阿主教萨摩撒他的保罗。他说：“道之所以被称为神，是因为祂在神里面，但自己没有独立位格，仅仅是无位格的能力，存在于所有人里面。”他认为耶稣只是人，“耶稣按本性只是一个凡人，是父神收养的儿子，受洗时被道充满而被神化。”动力神格唯一论于268年被安提阿会议定为异端。近代索西尼派的观点与之相似。

(3) 形态神格唯一论

形态神格唯一论的创始者是撒伯流。他认为神只有一个位格，但却有三种表现形态，就如水有“水蒸气、液态水、冰”这三种形态，又如人可能有“父亲、儿子、主人”这三种身份。近代也有人用这种论调来讲论神，但由于福音派忽略教会历史及教义史，竟然将此异端说法看为正统。

第九节 几次大逼迫

1、德修的逼迫

德修（Gaius Messius Quintus Decius，201—251年，又译为：德基乌斯）本是普通元老，曾平定了梅西亚反叛。但是在249年德修的军队突然也反叛，进入意大利，战败皇帝阿拉伯人菲利普，菲利普被杀。之后德修得到元老院的承认，正式成为罗马皇帝。此后德修首先屠杀教会领袖，展开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逼迫，罗马、安提阿、耶路撒冷、凯撒利亚等地的主教都先后殉道。随后，德修又以极刑强迫所有基督徒向罗马神明献祭，以获得效忠国家的证书。无证者随时都可能被捕、被杀，而且不受任何保护。德修皇帝想出这个别出心裁的诡计可谓毒辣至极。为此当时许多人交出圣经，叛道离教，更有主教带领全体会众焚香献祭，亦有人贿赂官员以获得效忠证件，这些人皆被称为“交付者”（Traditores）。

启 13:17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

德修的逼迫时期，俄利根殉道。251年6月，德修皇帝在与哥特人的战斗中阵亡。



图 2.11 罗马皇帝德修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瓦勒良 (Valerian) 继位后, 逼迫仍然持续。瓦勒良于 257 年颁布两个谕令, 要求教会的神职人员向罗马诸神献祭, 禁止基督徒聚会, 并没收教会财产。第一道谕令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便要求对不向诸神献祭的神职人员处以死刑。在北非, 当时 87 位主教中 12 位被处死, 其中包括迦太基的居普良。但是, 瓦勒良的儿子即位后逼迫稍缓和。他不仅停止屠杀, 还把财产还给了教会。

奥勒良 (Aurelia) 270 至 275 年在位。他是一位很狂妄的人, 一登基就无理地杀害基督徒。275 年, 他被杀以后, 教会进入一个安静没有逼迫的时期。

251 至 284 年间, 仅仅短短的 33 年间, 罗马帝国却接连出现了 18 位皇帝, 这预示着这个曾经辉煌强大的帝国已摇摇欲坠。由于宫廷、政界争斗不断, 每个皇帝都无暇顾及教会, 因而教会开始平静约四十年, 得以喘息和建造。

箴 28:2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2、戴克里先的逼迫

284 年, 在位的皇帝努梅里安被暗杀。当时, 担任皇帝卫队队长的戴克里先指控主谋是近卫军长官阿培尔, 于是两人决斗。戴克里先杀死了阿培尔, 于是戴克里先被推举为皇帝。

303 年, 戴克里先在罗马帝国发动了最后且最大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戴克里先效法从前的尼禄, 在宫殿被两次纵火后, 嫁祸于基督徒。303 年 2 月 24 日发布首个迫害基督徒的法令: 基督徒士兵要离开军队, 基督教堂的私产要充公, 而且基督教的书籍要烧毁。

之后他颁布更强硬的命令: “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 要么被处死。”全罗马境内基督徒惨遭酷刑折磨。为了表现自己大义灭亲, 戴克里先亲手杀死了归信基督的妻子和女儿, 戴克里先下令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折磨基督徒。当人里面的恶一旦没有约束地爆发, 世界立刻变成人间地狱。有的基督徒被人用竹签扎入手指, 有的人背上被浇上热沥青, 活活被折磨致死, 简直是惨不忍睹。但这阴间仇恨的火焰并没有焚毁教会对上帝的忠心, 逼迫也没有使基督徒的聚会停止。基督徒在城郊的坟墓里聚会, 因为当时罗马人的坟墓里面四通八达、便于逃离。在烈火窑般的艰难中, 基督仍然在保守着祂的教会, 使黑暗中依然传出阵阵赞美的歌声。

伯 35:10 他使人夜间歌唱。



图 2.12 初代教会聚会的坟墓

3、四帝共治制

戴克里先统治时，罗马帝国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多处殖民地爆发叛乱。为了稳定政局，戴克里先认为帝国过于庞大，不利于一位皇帝独自自治，便在 305—311 年期间，将东西罗马帝国分由四个皇帝共治。罗马西部的皇帝是君士坦提乌斯一世、马克西米安；罗马东部的皇帝是戴克里先及其女婿伽勒里乌斯（加利流）。



图 2.13 四皇帝共治的塑像

4、加利流掌权继续逼迫

这四个皇帝并没有像图 2.13 中塑像所反映的那样亲密无间。相反，东西部矛盾加剧，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彼此都想击败对方。加利流迫使戴克里先退位后，又用自己的实力劝退了马克西米安，欲再次成为奥古斯都。

加利流继续奉行前皇逼迫基督徒的政策，而且手段之毒辣不亚于戴克里先。310年，加利流颁布吃祭物法令，命令所有集市上卖的食物，无论是粮食、肉或蔬菜，都要经过向偶像丘比特献祭后才可出售。为要遵守圣经不可吃祭偶像之物的吩咐，上帝忠心的儿女宁可选择野菜充饥，甚至许多人活活饿死。

之后加利流患上怪病，痛苦中或许良心受责，他找了一位基督徒为自己祷告果然好转，于是就宣布赦令，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

箴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从尼禄到戴克里先和加利流，教会经历了整整三百年之久的大逼迫。

5、诺瓦天派

诺瓦天（Novatian，200—258年）是从斯多亚主义皈依基督教的学者，于250年以前被按立为罗马教会长老，乃是罗马教会第一个用拉丁文发表神学论文的神学家。

在诺瓦天以前，孟他努主义者列出三大永不得赦免的罪——背道、奸淫、谋杀，连第二次悔改的机会也不留给犯罪者。德修皇帝大举逼迫的时候，许许多多信徒在酷刑之下，因挺刑不过而否认了信仰。逼迫止息之后，他们也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希望重新回到教会，请求教会重新接纳他们。在是否接纳他们的问题上，教会中产生了分歧。罗马主教哥尼流（Cornelius）认为，主教有权赦免任何的罪，故坚持应接纳这些所谓叛教者，而诺瓦天视他们为故意犯罪，坚决反对他们再回到教会。最后，经教会投票决定，哥尼流获胜。诺瓦天于是宣布脱离大公教会，自立门户，在罗马和迦太基有许多追随诺瓦天的信徒，他们被称为诺瓦天派。到第4、5世纪时，仍有诺瓦天派的信徒群体散居于北非、小亚细亚及君士坦丁堡一带地方，诺瓦天派直到第6世纪时才消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反对诺瓦天派对教会的分裂，北非教父居普良写下了传世之作《论教会合一》。诺瓦天在258年瓦勒良帝（Valerian）逼迫时期殉道。

6、居普良

居普良在200年生于北非首府迦太基，受过高深的教育，曾潜心研究修辞学。自46岁时归主后，除《圣经》及基督教著作外，居普良拒绝阅读其他书籍，并受教于教父特土良。三年后，居普良即被选为迦太基主教。虽然他在神学思想上没有很大贡献，但他在教会治理和爱心上却显出很大的恩赐。他著的《论教会合一》揭露了诺瓦天派分裂教会的行径，阐明了他的教会观，对后代，尤其宗教改革后教会论的整理有着深远的意义。他的“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教会是基督徒的母亲”等精辟名言被许多改教家推崇，并为改革宗信条所引用。

公元258年9月14日，居普良因不肯变节亦不敬拜罗马假神，被判斩首示众，成为北非第一位殉道的教父。

第三章 米兰敕令和尼西亚大公会议

第一节 君士坦丁当政

1、台伯河战役

(1) 四皇共治后期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其子君士坦丁被不列颠的罗马军队拥立为帝。此时罗马帝国仍是四皇共治。西部皇帝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狄于306年10月28日自封为奥古斯都，他被当做篡位者来对待。加利流派出西部奥古斯都塞维鲁二世在307年起兵讨伐马克森狄，但塞维鲁兵败后被抓住关押。加利流再次出兵围攻罗马，仍然以失败告终。加利流病逝后，他的地盘被马克西敏和李锡尼瓜分。此时，四位皇帝统治的区域分别为：

君士坦丁统治不列颠、高卢及西班牙；

马克森狄统治意大利及北非；马克西敏统治小亚细亚及埃及；

李锡尼统治巴尔干。

其中马克西敏和马克森狄仍继续逼迫基督徒，而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已开始宽松友好地对待基督教了。

(2) 战争原因

马克西敏被李锡尼打败、杀死。312年春天，马克森狄公开地与君士坦丁敌对，再次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君士坦丁集结军队决定推翻马克森狄的残暴统治，并在都灵战役和维罗纳战役中大破马克森狄军队。

(3) 战争过程

君士坦丁带着4000军队进攻意大利，与马克森狄的数万军队在罗马近郊的台伯河相遇。此时，君士坦丁的军队中发生奇迹，君士坦丁便将自己军队的盾牌都漆上希腊语字母“XP”即“基督”希腊语的代表字母，并将此记号与十字架作为军旗。君士坦丁到底经历了什么，史学家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基督在梦中向君士坦丁显现。另一种说法是，君士坦丁在作战时，面对阳光看到天空中出现希腊文基督的名字或是十字架的符号，且听到“靠这标志，必然得胜”的声音。对于这些传说，我们没有必要深入考证。上帝以什么方式改变人类历史，以怎样的护理掌管君王和世人的心，我们难以探究。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福音此时已经在君士坦丁的军队中被广传，许多将领和士兵都是基督徒。况且，君士坦丁皇帝对基督教友好，这些基督徒不可能不向皇帝传讲福音，这才是君士坦丁作出划时代的大胆举动的真正原因。



图 2.14 君士坦丁的“XP”军旗

当塞维鲁二世和加利流围攻罗马时，马克森狄战败他们所使用的成功策略是坚城据守。如果他仍采用同样的策略对付君士坦丁，那么君士坦丁难以得胜，至少很难在短时间内攻下罗马，因为马克森狄在罗马城内囤积了大量粮食，君士坦丁此时已孤军深入。但出乎意料，马克森狄选择了野战。有人猜测马克森狄认为第二天（10月28日）是自己即位的日子，非常吉利，因着这迷信而做出军事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无论怎样，我们再次看到胜败在乎神，人的聪明愚拙也都出于神。

马克森狄将军队列阵于台伯河的米尔维安大桥前方。由于这座石桥是弗拉米尼亚大道的一部分，扼守住这座桥对于防守罗马乃至保住他自己的地位而言至关重要。为了方便军队渡河，他又搭了座木桥，这木桥更可以看作浮桥，因为他在筹备防守时可能已经部分地拆毁了这座桥。各书中对于这座桥的状况描述不一，有人说这座可拆卸的桥就是为君士坦丁军队设下的陷阱。



图 2.15 摄于 2005 年的米尔维安大桥

第二天，两军开始交锋，马克森狄的布阵似乎有致命问题：他把军队放得离台伯河太近了，使军队失利时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君士坦丁的骑兵很快就把对手一步步地推向台伯河。马克森狄撤军，为使军队得以逃生，马克森狄很快就立起浮桥。但桥梁在军队撤退时忽然倒塌，这使尚未渡河的军队被俘虏或被杀死，结果马克森狄也被水淹死，全军覆没。

君士坦丁率军于10月29日进入罗马，举行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庆典。进城之后，君士坦丁率队拜访了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依照惯例仍举行了献祭，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君士坦丁那时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2、米兰敕令

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米兰会面，共同宣告了米兰敕令。米兰敕令以君士坦丁、李锡尼以及加利流的名义共同发布，后来成为了罗马世界通行的基本法。敕令内容如下：

我们在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敕令已使许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还丧失了性命，……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一向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格外开恩。……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罗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同时规定：

(1) 承认基督教徒同其他各教徒一样具有同等的信仰自由权；

(2) 归还给他们被没收的教堂和教会财产，免除了基督教神职人员个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

(3) 主教有权审判教会案件。

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标志着初代教会300年大逼迫的结束，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君士坦丁后来打败了李锡尼，成为又一位统一罗马的奥古斯都，他是神兴起的第二位居鲁士。

亚 8:13 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

赛 45:13 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居鲁士”原文作“他”），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一系列措施

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广基督教的措施。他首先用十字架取代了罗马的“老鹰”徽号，然后君士坦丁又继续颁发了一系列谕旨，包括：

317年，钱币上异教徒罗马皇帝的雕像被逐个除去，换上基督（XP）的名字；



图 2.16 带罗马皇帝雕像的罗马钱币和带基督名字（XP）的钱币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319年，颁布法令，免收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赋税，禁止异教徒的私人献祭；

321年，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从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

322年，主日——星期日为法定休息日，凡违反此规定的人要被处罚。

在历史上，很少有政权像君士坦丁一样以法令的形式保障教会的敬拜和人类社会的安息，因此这些措施在教会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君士坦丁又在东部建立一个新的城堡——君士坦丁堡（现为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并将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从此，帝国的核心转移到东方，教会也逐渐形成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西方两大主要教区。

第二节 尼西亚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

1、亚流主义

(1) 亚流生平

亚流（Arius，又译为阿利乌，250—336年），曾任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他继承了亚历山大学派的种种错谬，坚决否认基督和神同等，宣称“基督不是自有永有的，而是由神造的”。由于亚历山大是埃及最大的港口城市，船工很多，亚流就将耶稣非神的思想编入船歌。通过船工们的传唱，亚流的思想流传深远，甚至在尼西亚会议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未能被铲除。从亚流传播异端思想的做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唱诗在信仰的改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亚流思想

亚流的异端思想并非首创，而是吸收并发扬了先前异端和教父的错谬。他的思想如下：

（一）上帝是“独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但因为物质是恶的，纯善的灵不可能造出恶的物质，于是上帝先创造了“道”，再藉由道创造世界。这一点继承了诺斯底主义的思想。

（二）耶稣基督就是那道，是因上帝特别的旨意而受造。他受造于创造之先，亦即“他虽生于时间之外，但出生之前他并不存在”。此处的“生”是“作或被造”的比喻说法，那么也就意味着上帝与道有着不同的本质，因为上帝是在时间之外、永恒之中，而道出生之前他并不存在。这一点源于俄利根的错谬。

（三）论到崇拜与祷告时，他说耶稣基督就是那道，虽是受造但有神性，所以可以是敬拜的对象。但论到拯救时，他又说耶稣基督不过是人，不过是我们学习的模范而已。这一点也源于俄利根的错谬。

（四）圣灵是圣子所造。这一点也源于俄利根的错谬。

（五）耶稣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被接纳为儿子，我们若学习耶稣的榜样，就可以被上帝接纳为他的儿子，得蒙救赎。这一点源于萨摩撒他之保罗的错谬。

(3) 正统信仰与亚流思想的斗争

亚流首先受到他自己的主教亚历山大的反对。亚历山大为圣子的神性据理力争，同

时主张父生的是永恒之子。亚流真正最大的敌对者是亚历山大教区年轻的执事亚他那修。亚他那修坚称圣父与圣子是同本质的，而且父与子是不同的位格。他也教导圣子是由圣父生出，但“生出”是神的内在和永远的作为，而不是圣父主权旨意的作为。

亚历山大在 321 年召开地区会议，定亚流为异端，革除其长老职分。但亚流已经在亚历山大城形成不小的势力。由于亚流曾经受教于安提阿学派——东方教会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东方教会的不少主教误以为亚历山大主教是仗势欺人，因而同情或支持亚流，虽然他们并不真正清楚亚流的思想。

2、第一次尼西亚会议

(1) 时间地点

随着亚流和正统信仰的争斗日趋激烈，君士坦丁皇帝担心这种争论会给罗马帝国带来分裂和动荡，因为此时的基督教已经近乎罗马帝国国教，教会的问题会影响整个国家。由于基督论对基督教最为关键，针对当时的争论，325 年，君士坦丁皇帝召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会议地点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按罗马元老院的形式进行，皇帝只是列席和旁听会议。君士坦丁的做法正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政府应尽的职责。在改革宗信仰代表性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中也有如下阐述：

第 23 章第 3 节：政府官员不可擅自讲道并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但有权力与责任保持教会内的秩序、合一与和睦，维持神真理的纯正和完整，禁止亵渎和异端，防止或改革在敬拜与教会纪律中所有的腐败和弊端，并确立、执行和遵守神所有的律例。为了更有效地执行任务，他有权召开教会会议（Synod），出席会议，并确保会议所执行的一切都合乎神的旨意。

(2) 讨论议题

尼西亚大会讨论的议题是亚流的教义、庆祝复活节的日期、米利都派（Melitians）分裂教会及教会惩戒等。

(3) 会议经过

来自帝国数百个地区以及帝国以外的波斯、印度等国家的教会主教参加了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优西比乌（Eusebius）、亚他那修（Athanasius）和安提阿主教尤斯坦修斯（Eustathius）记载的出席会议之主教人数分别是 250 人、318 人和 270 人（他们的统计方法可能不同，比如中途出席或退席者是否计算在内等）。根据后来希腊教会史学家苏格拉（Socrates Scholasticus）的记录，主教人数超过 300 人。与会主教中，以东部主教居多。每个主教都被许可带两个牧师和三个执事，所以与会总人数可能超过 1500 人。其中许多主教经过了大逼迫，身上还带着累累的伤痕。与会人士的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会议气氛庄重肃穆，君士坦丁恭敬地坐在主教们后面，作为会议的旁听者。

西班牙主教胡西亚（Hosius of Corduba）、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与安提阿主教尤斯坦修斯先后主持了会议的讨论。全体主教在复活节的日期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名通过了复活节的日期——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对于最重要的议题——耶稣的神性，亚流派与正统信仰派人数相当（各约 20 人），其余大多数是不明真相者或中间派。亚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亚流、尼哥美地亚主教优西比乌（后为君士坦丁施洗）；正统派的代表是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及其年轻的执事亚他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那修；中间派的代表是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教会史》的作者。

在公平的基础上，亚流派与正统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各方都按程序轮流发言。亚流派率先提出论点，在会议开始时取得明显的优势，许多权威的中间派主教都支持亚流的观点，包括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每拉主教尼古拉（Nicholas of Myra）等。亚流陈述其思想后，正统派的辩论主要由亚他那修承担。亚他那修不负众望，用坚强有力的圣经证据证明基督就是从太初就有的独一真神。他的论点论据确凿清晰，一针见血地揭穿亚流错谬的实质和危害。亚他那修发言后，会场一片哗然，感叹上帝及时挽救了教会的危机。许多主教纷纷撕毁亚流的信件，甚至那位本来支持亚流的老主教尼古拉（以仁慈怜悯著称，圣诞老人的原型之一）义愤填膺，跳过去给了亚流两记耳光。当然，此举受到会议的责备和制止，并被勒令向亚流道歉。老主教也为自己的冲动懊悔不已，但对亚他那修的正统立场则坚信不疑。这次辩论不仅奠定了正统基督论教义的根基，也为后世立定了基督教教义产生的方式——公开的辩论。圣经是教会本身的至高权威，是教义产生的基础。透过公平的辩论，圣经真理更加明晰。圣灵藉着这样的会议和辩论，在人的理性和良心中光照显明符合圣经的观点与违背圣经的谬论。

犹 1:3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

亚他那修的辩护词很长，笔者在此仅整理其中主要的论点：

（一）如果圣子、圣灵是由神在无中创造的，那么神以后还会造更多的神，如此神就成为一位可变的神，不再是永恒不变的了。

（二）教会的洗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如果其中两位是被造的，那么这样的洗礼有何意义？

（三）亚流派的主张使父神的存在受到威胁，因为他说：“父不是从来就是父，在没有子之前祂不是父。”这样圣经中那么多对父神的启示以及我们的祷告，就成了向一位非永恒不变的神祷告了。

（四）亚流派导致多神论，让人敬拜两位不同的神，《启示录》中对羔羊的敬拜就成了敬拜受造之物，这和希腊的多神信仰无异。

（五）亚流派破坏了人得救的确据，因为如果人的得救是建立在一位受造物上，那么人无法获得永生。

提前 6:12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4）会议结果

会议经过数天辩论后，几乎全票通过（仅两票弃权）将亚流的思想判为异端。会议将基督位格的教义付诸文字，成为《尼西亚信经》，还通过了“反异端的咒诅”。

从会议结果看，正统信仰看似得胜，但危机四伏，令亚他那修感到不安。许多主教的投票并非基于对真理的清晰认定，而是迫于压力，因为出席会议的皇帝君士坦丁的立场明确。许多主教如尼哥美地主教优西比乌，心中虽然仍然支持亚流，但违心投票支持正统。亚他那修担心，这种依附于世俗皇权的决议必定站立不住，随着皇帝的更替，正统派得胜的形势必会急转直下。此外，亚历山大学派对各地教会的影响极深，亚流的

思想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根除。亚他那修的担心不久果然成为事实。

3、尼西亚会议后的帝国

君士坦丁死后，国土由其三个儿子继承：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治理西部（不列颠，高卢，西班牙）；次子君士坦提（Constantius II）统治东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三子君士坦司（Constans）统领中部（意大利，北非）。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能持久，公元340年君士坦丁二世与君士坦司之间因领土争端而爆发战争，君士坦丁二世战死，君士坦司统一了帝国的中部和西部。

亚流派领袖优西比乌在尼西亚会议后并未罢休，一心想要恢复亚流派在教会中的地位，他所采用手段是政权手腕，特别是巴结皇室。在君士坦丁死前，优西比乌争取到了为君士坦丁施洗的机会。天主教否认优西比乌为君士坦丁施洗的事实，改称西尔维斯特一世（罗马主教）为其施洗，一方面是为避免和这位亚流派主教有任何瓜葛，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8世纪伪造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经过不懈努力，优西比乌终于获得东部皇帝君士坦提的支持。于是优西比乌于339年从尼哥美地亚调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从此大权在握，便立即促使君士坦提下令放逐亚他那修。优西比乌又在各地教会安插亲信，于是亚流派逐渐执掌教会各地主教。通过与政权勾结，亚流派五次放逐亚他那修。

教会一黑暗，世界就混乱。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十年间，帝国出现了十几位皇帝，争斗残杀、阴云密布，教会历史似乎又要倒退衰落。

4、犹利安恢复异教失败

当教会正处于亚流派与正统派激烈争战中时，犹利安（Flavius Julianus）于331年5月出生帝王之家，其伯父是君士坦丁皇帝。犹利安早年接受过洗礼，年幼时一直跟随宫廷教师玛·尼乌斯学习希腊古典哲学，也受过亚流派主教优西比乌的教育。360年2月，犹利安在帝国西部军团的推举下称帝，获得了与东部皇帝君士坦提同样的尊称——奥古斯都。经过一段暴虐的统治后，君士坦提于361年死去，犹利安便成为帝国的唯一皇帝，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帝国的新都君士坦丁堡。年仅30岁的犹利安便已毫无争论地完全占有罗马帝国。

在他执政期间，他致力于恢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学以及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多神宗教。犹利安以“罗马神教大祭司”的身份，开始有系统地重建异教信仰。他自己每天向偶像献祭，仿效基督教会，制订信仰告白，建立教区制度，提高异教寺庙祭司的水平。犹利安对基督徒展开迫害，下令剥夺教会的财产以重建古代神庙。君士坦提皇帝在位时，亚流派在政治上得胜，君士坦提放逐了许多正统派的主教。当犹利安执政时，为了助长教会内部的斗争以瓦解教会，犹利安便下令被放逐的所有主教返回各自的教区。这反而使正统派的亚他那修回到自己的主教岗位。因犹利安对基督教的逼迫，历史称犹利安为叛道者犹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363年3月，犹利安开始了对波斯萨珊王朝的远征。同年6月3日，犹利安竟然下令放火烧毁自己的运输船舰。这一严重的错误举动断绝了自己的补给线与退路，可能他妄想像三国的马谡一样，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6月26日，在逃跑途中，犹利安在底格里斯河岸边被一支箭射中而死，年仅32岁，在位仅两年。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王上 22:34 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

据传说，这位皇帝于临终时，用手抓起一把从伤口喷出的鲜血洒向天空，喊着说：“加利利人哪，最后还是你赢了！”



图 2.17 犹利安之死

第三节 亚他那修

1、亚他那修生平

亚他那修 298 年生于北非的亚历山大港，父母都是基督徒。他早年在当地的圣道学校毕业，325 年随主教亚历山大赴尼西亚大会。他因大会中与亚流派的强烈争辩而闻名于世。主教亚历山大离世后，亚他那修继位，任亚历山大主教达 46 年之久，曾先后五次被四个皇帝放逐出境。

约 15:20 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328 年，亚他那修接任亚历山大主教，同时承接了当时教会所面对的很多难题。当时，米利都派（Melitians）在亚历山大城闹分裂，激烈地反对亚他那修，抱怨控告他，甚至致使帝国政府法庭在 330 年传唤亚他那修向君士坦丁皇帝解释，一年之后才平息下来。亚流派的优西比乌一党伙同米利都派以不合法征收亚麻税、谋反的罪名控告亚他那修。皇帝召集亚他那修，亲自调查后发现他无辜，便恭敬地遣送他返回亚历山大，并亲笔写信给他的教会，证实他们的主教被人诬告。后来，亚历山大有一名叫伊斯基亚（Ischyra）的人犯了亵渎罪，被人发现后逃到尼哥美地亚，并与优西比乌一党勾结。伊斯基亚冒充长老的身份，以玷污圣餐、焚烧圣书的罪名，控告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马卡里乌（Macarius），以便将主教亚他那修也牵扯在内，因为马卡里乌处在亚他那修的领导下。同时，优西比乌一党又勾结一个人，宣称他是一位米利都派主教亚尔色纽（Arsenius）的仆从，并控告亚他那修谋杀并肢解了亚尔色纽的尸体用来行巫术。335 年，皇帝决定在推罗（Tyre）召开主教会议，以审理亚他那修和马卡里乌的案件。结果，在上帝的护理之下，那位被“谋杀”的亚尔色纽竟然在会议召开前安然无恙地来到推罗，被推罗的官员和主教发现认出。亚尔色纽的出现使谋杀罪的控告立即失效。马卡里乌的

案件则因证据不足而遭暂缓，但主教会议被亚流派操纵，派去取证之人都是优西比乌一党。亚他那修对此提出抗议，抗议无效后，不得已离开会议，要上诉于皇帝。趁亚他那修离开之时，会议竟然定亚他那修渎职之罪并撤除其主教职位，尽管亚他那修在亚历山大城广受爱戴。君士坦丁皇帝见到亚他那修后，写信给主教会议，要求他们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面前审理。不少主教因害怕而退出会议，但优西比乌一党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又控告亚他那修，说：“亚他那修威胁要切断亚历山大港对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供应。”君士坦丁皇帝被欺哄而激怒，立即判定将亚他那修流放到德国的特瑞尔（Trier）。一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的判决是出于教会合一的考虑，因为亚他那修坚定地拒绝与亚流派相交。亚他那修的经历和历史上的先知们何其相似！

耶 11:19 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记念。”

公元 337 年君士坦丁过世，亚他那修返回家乡亚历山大，受到会众的热烈欢迎。但优西比乌领导的亚流派获得东部皇帝君士坦提的恩宠，通过操纵一系列教会会议，篡改尼西亚信经，再次定罪亚他那修，宣称他不是合法的主教，任命亚流派的贵勾利（Gregory of Cappadocia，为了和后来的贵格利区分，所以翻译成贵勾利）。338 年，君士坦提下令放逐亚他那修，派兵护送贵勾利出任亚历山大主教职位，以武力逼亚他那修把教会权力交出来给他，结果引发动乱。政府把动乱原因归咎于亚他那修，所幸亚他那修说服了一位军官，带他偷渡出港，搭船前往罗马。到达罗马后，亚他那修亲自陈明其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立场，很快地得到罗马圣职人员的支持。罗马主教召开会议，宣布亚他那修为亚历山大教会的合法主教，而贵勾利则是不法篡位者。但此时罗马教会无力执行对东方教会的决议，于是亚他那修仍然停留在罗马，一直等到 346 年。随着帝国西部实力增强，西部皇帝君士坦司（Constans）要求东部皇帝君士坦提（Constantius）允许亚他那修返回亚历山大城。整个亚历山大城因为他们所爱戴的主教回乡而大大庆祝，且产生了信仰上的复兴。

353 年，东部皇帝君士坦提取得全帝国东西部的统治权，再次成为奥古斯都，而他是坚定的亚流派。加帕多家的乔治（George of Cappadocia）——坚定的亚流派，被任命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由军队护送到亚历山大城。356 年 2 月 8 日晚上，亚他那修正在一个教堂主持圣餐聚会，当时教会坐满了人。一位将军命令军队包围教堂，带着武装士兵冲入教堂要逮捕亚他那修。亚他那修却镇定不受影响，要会众唱诗篇 136 篇及其副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亚他那修不愿离开会堂，要等会友们都平安离开，但他的朋友们紧紧围成一圈保护他，不让他被抓捕。忽然间，亚他那修昏倒，他的朋友们匆匆将他带离教堂。之后的六年间，亚他那修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到处藏躲，从一家躲到另一家，甚至隐居在荒野中修道士的小居室中，士兵们一直抓不到他。在逃亡中，亚他那修通过一些中间人及信件，继续牧养他的会众。

361 年，亚流派皇帝君士坦提过世，叛道者犹利安继位。由于他极其憎恨基督教信仰，为了让教会产生更多混乱，这位皇帝突发奇想：“如果大力扶助基督教内的异端，那么基督教会自然就瓦解了。”谁是异端呢？亚流派此时在教会中掌权，他们定罪的异端是持守尼西亚信经的主教们。于是犹利安下令：前任亚流派皇帝所放逐的主教们全部返回家乡。亚流派主教乔治十分残忍，在一场暴动中被人杀死。于此背景下，亚他那修在 362 年 2 月再次回到爱戴他的会众中间。所谓“先有的事后必再有”，这令人想起圣经中先知耶利米获救的事（耶利米书 39 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分憎恨犹太人一次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次的反叛行为，所以他攻陷耶路撒冷后立即释放并宽待耶利米——当时被犹太人视为仇敌而囚禁在地牢中。362年10月，发现亚他那修信仰十分坚定，犹利安下令将亚他那修驱逐出亚历山大城。10月23日，群众聚集抗议皇帝的命令，但亚他那修敦促他们顺服，并安慰他们说：“我的离开是短暂的。”亚他那修再次躲避到埃及的旷野中。

363年6月，犹利安死后，亚他那修秘密回到亚历山大城，新任皇帝乔维安（Jovian）再次恢复其主教职位，亚他那修立即召集会议，重申《尼西亚信经》。364年10月，乔维安离世，瓦伦斯（Valens）继任帝国东部皇帝，宠信亚流派，再次放逐亚他那修，亚历山大群众激烈抗议，所以瓦伦斯不久允许亚他那修回到主教的位置上。

亚他那修不再被放逐，致力于阐释《尼西亚信经》，教导新一代的教会领袖，直至373年离世。他一生担任亚历山大主教46年，其中17年处于流放中，在亚历山大城仅有29年。他靠着上帝的恩典坚忍刚强，完全委身于上帝，固守真道，忠心侍奉，传讲尼西亚大公会议正统教义，在天上必蒙主的称赞。

太 25:23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2、亚他那修的著作和神学思想

(1) 《亚他那修信经》

此信经以优美流畅的语言精准地表达了早期教会在圣灵光照下对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的认识，是继《使徒信经》之后正统教会的又一份信仰告白，为正统的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奠定了基础。其摘录如下：

凡人欲得救，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此信仰，凡守之不全不正者，必永远沉沦。大公教会信仰即：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

其位不紊，其体不分。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亦一位。然而父、子、圣灵同一神性，同一荣耀，亦同一永恒之尊严。

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亦如何。父不受造，子不受造，圣灵亦不受造。父无限，子无限，圣灵亦无限。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亦永恒。非三永恒者，乃一永恒者。亦非三不受造者，非三无限者，乃一不受造者，一无限者。如是，父全能，子全能，圣灵亦全能。然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亦是神。然而，非三神，乃一神。如是，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亦是主。然而，非三主，乃一主。

.....

此乃大公教会信仰，人除非笃实相信，必不能得救。

(2) 其他著作

《安东尼传》一书的主人公安东尼（Anthony of Egypt）是第3、4世纪期间一位在埃及沙漠的隐修士。身为主教的亚他那修曾经跟从安东尼学习隐修，所以了解安东尼的经历。但安东尼有许多传奇色彩，比如遇见旷野恶魔，也写于《安东尼传》。根据迄今为止所整理出的圣经教义，安东尼的传奇经历可归因于他的心灵经历或过度禁食所产生的幻觉。亚他那修在书中也掺入了自己多次的放逐经验，使本书有许多神秘色彩，对以后的修道主义产生有深远影响。

《致马尔克路书》描写亚他那修自己在苦难中读《诗篇》的切身心得，成为个人灵修生活的见证。

《道成肉身》系统阐述了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和意义，以“基督成为人，为叫我们得成圣”为基本观点，并对“三位一体”教义有颇多论述，为后代教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老底嘉大公会议（363年，Council of Laodicea）

犹太安死后，军中将领乔维安（Jovian）在363年继任皇帝，君士坦丁家族世袭结束，但仅一年后乔维安就离世了。36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执掌罗马帝国大权，但帝国东西部难以相合，他再次将国土从行政上分为东西两部分，自己统治西部，东部由其弟弟瓦伦斯（Valens）治理。东部皇帝瓦伦斯宠信亚流派，东部教会仍处于危机之中。

就在363年，东部一些教会主教在老底嘉召开“大公”会议，会议并未讨论教义之争，而是就领圣餐、按立、敬拜等规定作出调整。现列举其中几条：

第一条：根据大公教会规定，应该接纳婚前未同居、自愿且合法结婚的再婚者领圣餐。但是在此之前，再婚者必须有一段不长的时间专心祷告、禁食。

第十条：教会信徒绝不可肆意使其子女与异教徒通婚。

第十一条：教会自此不可再按立女长执（或者被称作女执事主席）。

第十三条：主教的选举，民众禁止参与。

第十五条：只有教会选定的唱诗班才可参与教会的诗歌服侍。他们应站在讲台上，根据诗歌本选唱诗篇。

第五十九条：除了旧约正典之外，个人所作的诗章，不得在教会中使用。

老底嘉大会列举的新约正典仅有26卷，不包括《启示录》，旧约正典还包括了次经《巴录书》。

这次会议不为新教所承认，因为它所认定的圣经正典不完整且包含了次经，参加人员少且均为东部主教，许多规定违反圣经。但这次会议留下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教会的状况。

第五节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第二次大公会议）

1、三位一体和基督二性的新争论

（1）圣灵神性的争论

亚流派的争论尚未止息时，在对三位一体神论和基督位格的认识方面，教会又出现了分歧。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尼西亚信经》只说到“我信圣灵”，但并未提及圣灵的神性。亚他那修和希拉里（Hilary of Poitiers）等教父坚称圣灵与圣父同本质。君士坦丁堡的马其纽顿（Macedonius）却声称圣灵是受造的，从属于圣子。马其纽顿的观点被认为是异端，而其追随者被称为“马其纽顿派”或“敌圣灵派”。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2) “三位一体”用词的争论

“三位一体”中位格特征的用词，在东方教会是由希腊单词“ὕποστασις”（位格）来表达。然而，此词的用法涵义在安提阿教会引起激烈纷争：一位主教米立提认为“三位一体”是三个“ὑποστάσεις”（ὕποστασις的复数），而另一位主教保林纳主张是一个“ὕποστασις”。米立提的立场显然是正统的。

(3) 基督位格的争论

老底嘉主教阿波里拿留（Apollinaris）坚决反对亚流派，但他矫妄过正，提出极端观点，宣称基督的人性与一般常人不同：神性的道（λόγος）取代了人的灵魂。他认为基督只有人的身体，并无人的灵魂。照此说法，基督的人性是既不完整，又不真实。这种说法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被定罪。

在如此晦暗不明的时刻，上帝再次兴起祂的仆人为正统教义的确立浴血奋战。

2、加帕多家三杰

亚他那修离世后，其继承者——三位来自小亚细亚加帕多家省的教父，继续同亚流派、马其纽顿派斗争，他们分别是凯撒利亚的巴西流、尼撒的贵格利、拿先斯的贵格利。

(1) 巴西流

巴西流 329 年生于凯撒利亚（加帕多家的省会）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凯撒利亚主教。他早年求学于君士坦丁堡和雅典，与拿先斯的贵格利是同窗好友。学成之后，巴西流回到家乡教授修辞学。360 年，他赴巴勒斯坦与埃及等地，过修道生活。370 年，他被选立为凯撒利亚主教，统管加帕多家全境的众主教。

此时正值亚流派在政治上得势，然而巴西流不畏艰险，反对亚流派和马其纽顿派，选立正统信仰人士出任主教，以保护群羊不受异端的迷惑。支持亚流派的东部皇帝瓦伦斯，想要把加帕多家夺回到亚流派阵营，就命令该省总督与行政官员多方逼迫巴西流，威胁要将其家产充公、放逐边疆、甚至处死。巴西流不为所动，反而视死如归，回答说：“还有别的么？这些一点也动不到我。充公？我无家产；放逐？全地属乎主，我只是过客；处死？使我更早回天家，其实老我几乎已死了，我正迈向坟墓。”巴西流在 379 年离世，未能参加君士坦丁堡大会。

巴西流一生所著的作品包括《驳斥尤诺米》（尤诺米属亚流派）、《圣灵论》、《讲道集》、《创世六日》、《创世记》以及许多书信。这些著作深受安波罗修与奥古斯丁的喜爱。在崇拜礼仪方面，他也在东方教会留下了深远影响。

(2) 尼撒的贵格利

尼撒的贵格利是巴西流之弟，生于 335 年。372 年，他蒙召出任尼撒的主教。在 376 年的地区会议上，亚流派以阴谋手段废除其主教职位，将其放逐。两年之后，贵格力恢复职位。

巴西流的离世令他难过，但是他仍然尽忠职守，维护尼西亚信仰和三位一体的教义。他参加了君士坦丁堡大会，是当时最出色的神学家，发挥极大影响力，被大会称为“大公正统信统的柱石之一”。他是加帕多家三杰中最具神学深度的思想家，有许多重要著作流传后世，例如《驳斥阿波里拿留》、《论圣子与圣灵的神性》、《神的本体与位格

之区分》、《基督信仰要理问答》等，其中大部分是在巴西流离世之后继续辩护与发展巴西流的教训。尼撒的贵格利于395年左右离世。

(3) 拿先斯的贵格利

拿先斯的贵格利(330—390年)330年生于拿先斯地区，母亲是早期教会史上著名的敬虔妇女诺娜(Nonna)。藉著祷告与圣洁的生活，诺娜将丈夫从异端信仰中领回，丈夫归信主耶稣，后来被选立为拿先斯的主教。诺娜将其子贵格利在出生前就奉献给主，正如哈拿奉献撒母耳一样。贵格利从小决志独身。他赴省会凯撒利亚求学，可能在那里初识巴西流。后来他又赴埃及的亚历山大，有机会聆听他所敬佩的亚他那修讲道。后来，他来到雅典，与巴西流同窗，结为终生的密友。另外，当时叛教者犹利安也在雅典求学。

379年，他被召前往君士坦丁堡一小教会牧会，他把这一小小的教会变成持守尼西亚正统信仰的阵地。在亚流派的主教长德莫非力(Demophilus)逼迫之下，因传讲“三位一体”真道，贵格利曾受亚流派暴民围攻。然而他靠主恩典得胜一切困难，以其满有能力的讲道来建造这个小小的金灯台。日复一日，昔日的小教会从衰微到兴旺，竟成了庞大的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竟改变了整个东部信仰，几乎消失的正统信仰竟然在此兴旺起来。后来为了纪念濒临消亡的尼西亚正统信仰在此复活得胜，人们将此教会改名为“复活堂”。

贵格利的声名远播，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听其讲道。其中，已经上了年纪的著名学者耶柔米也远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要听贵格利的讲道。耶柔米也私下请教他如何解经。贵格利在帝国首都默默耕耘，教导尼西亚信仰，改变了君士坦丁堡，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为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380年2月，狄奥多修新任东部皇帝，宣告尼西亚信仰为正统。381年，君士坦丁堡大会召开，与会主教们选立贵格利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

诗 126:5-6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贵格利的一生实在为后代那些在黑暗艰难中辛勤耕耘的牧者们留下佳美脚踪，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是从一个小小的讲台开始，一小股被人轻视的泉水竟然成为遮盖全谷的江河。这是耶和华的作为！

诗 84:6-7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

(4) 普瓦捷的希拉里

普瓦捷的希拉里(又译希拉流，Hilary of Poitiers, 310—367年)，是普瓦捷的主教，又是当时的权威神学家，被誉为“驳亚流派之重锤”和“西方的亚他那修”。

希拉里的父母都是异教徒，并从小就让希拉里接受了异教教育，但他在希腊语方面造诣匪浅。他年轻时开始研究圣经，不久便放弃新柏拉图思想成为一名基督徒。普瓦捷的基督徒非常尊敬希拉里，于是在350年或353年选他为该地主教。在这期间，希拉里用其全部精力反对亚流派，并上书君士坦丁二世来减少亚流派对正统信仰者的迫害，但君士坦提为了尽快平息这场无休止的争论，遂发布一道将希拉里放逐弗吕家的谕令。根据耶柔米的记载，希拉里死于367年。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3、狄奥多修国教化

(1) 狄奥多修的谕旨

狄奥多修(Theodosius, 约346—395年)生于现今西班牙塞哥维亚的基督徒家庭,长大后随父从军。374年,狄奥多修已成为莫西亚的军事长官。378年,东部皇帝瓦伦斯在抵御哥特人时战死沙场,次年,狄奥多修被皇帝格瑞钦任命为共治皇帝,统治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成为东部皇帝,称狄奥多修一世(379—395年)。392年,狄奥多修统治整个罗马帝国。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君主,也是一个善待教会的皇帝,其举动超过君士坦丁。

380年,狄奥多修颁布了一道谕旨,正式宣告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谕旨上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值得全罗马帝国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智慧的人去接纳的信仰。如此一来,帝国境内的民众便纷纷加入教会。在狄奥多修一世统治时期,他在帝国内禁止一切异教,从而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这为后来历史的发展确立了基督教化的路线,使基督教成为帝国后期及中世纪时欧洲的权威宗教。自391年之后,罗马政府连续颁布谕令,开始镇压异教信仰,各地的偶像寺庙逐渐遭到拆毁或变更用途,罗马帝国境内异教逐渐消亡。

(2) 狄奥多修反对异教

狄奥多修严厉对付摩尼教。摩尼教是由第三世纪巴比伦人摩尼(Mani)所创,受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主张以诺斯底主义为本的善恶二元论。奥古斯丁早在北非时受到摩尼教的蛊惑,当他于383年到罗马之时,发现当地摩尼教已经衰微。

狄奥多修一世于380年受洗。他明确反对亚流派,宣布东方教会领袖必须一致接受《尼西亚信经》,并打算通过大公会议彻底解决亚流争端。



图 2.18 狄奥多修像

(3) 罗马帝国分裂

395年1月17日，罗马皇帝狄奥多修逝世。狄奥多修被后世冠以“大帝”的称号，成为为数不多的获得大帝称号的罗马统治者。

在临终前，狄奥多修将帝国分与两个儿子继承：18岁的长子阿卡狄乌斯（雅卡迪亚，Arcadius）统治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年仅10岁的次子霍诺利乌斯则接任西罗马的皇位，以拉文纳为首都，但名义上的首都仍是罗马。从此以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

4、君士坦丁堡会议

(1) 经过

381年，狄奥多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公会议。狄奥多修欲藉此解决基督教的长期纷争。会议由拿先斯的贵格利主持，共186位主教出席。会议确认《尼西亚信经》为正统。上帝使用这一位优秀的君王敲响了亚流派的丧钟。这次会议坚守了“圣父与圣子同本质”的立场，并在圣灵论上有更深的讨论。

(2) 会议结果

会议最终制定了《君士坦丁堡信经》。《君士坦丁堡信经》建立在《尼西亚信经》的基础上，取消了《尼西亚信经》中咒诅亚流的话，并在最后加上定亚流为异端。关于“我信圣灵”，会议补充说明：“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所出，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尊荣，并藉着先知说话。”会议肯定圣灵的神性，定阿波里拿留主义（Apollinarianism）、幻影说（否认基督真实的人性）和马其纽顿主义（反对圣灵的神性）为异端。

在制定信经的同时，会议也制定了七条教会法规，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排名应该仅次于罗马主教，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此项规定引起东西方几百年的纷争和分裂。

通过这次会议，三位一体教义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得到初步确立。这次会议最大的贡献是肯定圣灵的神性，但直到后来的迦克顿会议，神论才有比较完整的阐述。

(3) 亚流在帝国境内被剪除、传与蛮族

381年7月，皇帝狄奥多修正式立法规定：凡违背《尼西亚信经》中三位一体的信仰者皆为异端。从此，亚流派在帝国境内绝迹，其残余信徒为了逃避追捕四处逃散，遂将亚流信仰传与蛮族。

基督的神性这一教义确立后，以后的教会历史又开始围绕基督二性的关系展开了数百年的辩论和争战，期间也出现很多新的异端，于是神又兴起许多仆人继续为捍卫圣经真理呕心沥血。神在教会中用祂大能的手，在惊涛骇浪中托起无数先辈为此争战一生，他们成了一块块的铺路之石，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全备的真理教义。可是今天许多福音派教会轻忽历史，打着“我们只读圣经”的口号，为此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耶 5:21 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

第四章 几位拉丁教父

提后 2:19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第一节 安波罗修

1、安波罗修生平

安波罗修（约 340—397 年）出生于今日德国西部一个罗马贵族的基督徒家庭。在安波罗修出生后不久，时任高卢总督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在罗马将他抚养成人，他也在那里接受教育。因为他的姐姐是修女，所以他常同教会中的人来往。但他更热衷于政治，而且仕途一帆风顺，年约三十岁时就升任意大利的巡抚，住在米兰（Milan）。那时米兰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教会也相当兴旺。安波罗修到任后公义宽仁，极得民众爱戴。

374 年，米兰主教亚流派的奥森提（Auxentius）过世，继任人选竞争激烈、难出结果。安波罗修身为行政长官，出席维持公共次序。当选立会议面临僵局时，突然有一孩童高喊“选安波罗修为主教”，民众立刻回应，认为这是神的指引，一致要求安波罗修出任主教。安波罗修当时尚未受洗，觉得自己不配，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只好顺服。他立刻受洗承接圣职，被按立为米兰的主教。

随后他变卖万贯家财，除了将一部分留给作修女的姐姐养生以外，其余全部用来周济贫穷。他按照当时的苦行规律，自奉简约，夜间用长时间祈祷，有时同会众彻夜祷告。他熟习圣经、有口才、有能力，在米兰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教牧领袖。他和西部皇帝格瑞钦与瓦伦提尼二世以及狄奥多修的关系密切，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带来深远影响，并积极引导皇帝的宗教政策。

狄奥多修竭力在东罗马推广基督教的时候，瓦伦提尼二世为西罗马的共同执政皇帝。皇太后朱丝汀娜（Justina）是个热心的亚流派信徒，想要占有米兰教堂。386 年 1 月，她怂恿儿子下令让亚流派使用教堂，违者处死，但安波罗修坚决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他在讲道中宣布：“决不将任何教产交给异端分子。”他坚持教会的独立，认为教会绝不受地上政权的干预。他主张皇帝“属于”教会，而不是“超越”教会，因此皇帝也是平信徒，不能审判主教。皇帝应该是教会顺命、守分的儿子。安波罗修不畏强权，冒死维护教会权益，获得百姓支持，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只好退让。

2、安波罗修和狄奥多修皇帝

390 年，帖撒罗尼迦的暴民在剧院杀死一名蛮族的罗马将军。此时统治全罗马的唯一皇帝狄奥多修大为震怒，下令军队严厉报复。结果，军队围住圆剧场，不分男女老幼，抓捕、屠杀了许多平民。残杀的消息传到米兰，安波罗修大为震惊，他公开惩戒皇帝，禁止狄奥多修再领圣餐，并阻止他进入教堂。在教堂大门口，狄奥多修说：“大卫王也曾犯过好淫杀人的罪啊！”主教说：“如果像大卫一样犯罪，也要像大卫一样悔改！”

狄奥多修皇帝谦卑地接受教会的纪律，放下皇帝的尊严，向全教会作了公开的认罪

忏悔，并且下诏凡是判定死刑的，必须在30日内重新审理后再行处决。此后，主教才准予其恢复圣餐。后来，论到狄奥多修忏悔的情形，奥古斯丁说：“见到皇帝那样痛悔的人都为他受感流泪。”

主教与皇帝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皇帝对人说：“我发现安波罗修是唯一对我讲真理的人，他是我所知唯一配有主教名位的人。”395年，狄奥多修逝世。安波罗修在他的葬礼中说：“在病床上，皇帝关心教会的情况过于他自己。”安波罗修又对他的将士说：“狄奥多修的信仰是你们的胜利，也愿你们的真诚和信心成为他儿子们的力量。”

397年4月4日，安波罗修主教离世。他是神在教会中兴起的贵重器皿，他辅佐皇帝，抵制异端、异教。安波罗修带领奥古斯丁归主，使其脱离摩尼教的捆绑，造就了早期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教父。他持守基要真理、抵挡异端假道，真是传承真道的善牧、忠仆。

3、安波罗修著作——《论基督教信仰》

《论基督教信仰》辑了安波罗修的五篇论著，它们分别是：《论圣灵》、《论基督教信仰》、《论相信复活》、《论奥秘》和《论悔改》。针对亚流主义的从属论思想，作者在这些论著中阐释了基督的神性与父同等、同永恒、同本质的观点，这一观点为新约和旧约所共同肯定。安波罗修也对神的属性做了精辟的阐述。

第二节 耶柔米

1、耶柔米生平

耶柔米（约347—420年）生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拔马太的基督徒家庭中。耶柔米的父亲很注重儿子的教育，为了从小栽培他的宗教信仰和文学素养，就送他去罗马。在那里，他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约在18岁时，他受了洗礼。他自己说：“在星期日，我常与同龄的青年们去浏览地下墓穴，看先前圣徒的遗迹。”379年，耶柔米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被按立为长老。380年，耶柔米赴君士坦丁堡，在贵格利主教门下受教。382年，他赴罗马，成为罗马主教戴玛索（Damasus）的秘书。在处理日常事务之余，耶柔米把四福音书由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并修订了拉丁文诗篇。

耶柔米博学诚实、正直敢言，对教职人员的糜烂生活、道德败坏口诛笔伐，这也给他带来不少仇敌。

2、圣经的拉丁文翻译工作

耶柔米熟悉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翻译旧约时，他没有采用七十士译本，而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405年，耶柔米前前后后已经用了23年的光阴把圣经所有的正典翻译成拉丁文，这个译本被称为武加大（Vugate，“武加大”即“通俗”之意）译本，直至今日仍为天主教的唯一官方译本。

374年，耶柔米到安提阿。他离群独居了4年，过着苦行隐居的生活。410年，罗马为蛮族攻破。耶柔米亲自看见伟大的古城沦为蛮族国度，耶柔米说：“我不得不同他们悲哀，为他们哭泣。”耶柔米因工作过劳，加之经常禁食祈祷，最后他的视力衰退、甚至消失。420年9月30日，耶柔米安然离开世界，耶柔米的武加大译本圣经却流传下去。

第三节 约翰·屈梭多模

1、屈梭多模生平

屈梭多模（Chrysostom, 347—407年）的意思是“金口”（golden-mouth）。他本名约翰，是叙利亚安提阿的教会长老。由于他讲道大有能力，所说的皆是金玉良言，被大众称为“金口”。自第6世纪起，他被称为“约翰·屈梭多模”。

347年，屈梭多模生于安提阿，他的父亲是杰出的军官，他的母亲安淑撒（Anthusa）是早期教会著名的敬虔妇女之一。屈梭多模从小受母亲的熏陶，学习圣经真理，神在他的心灵中埋下敬虔真理的种子。后来，屈梭多模在修辞学大师莱巴尼（Libanius）门下受教，是其最优秀的学生。

成为出色的修辞学家后不久，屈梭多模就献身学习神学，在安提阿主教米力提（Meletius）门下受教3年。他原想离群索居，成为修道士，但是他的母亲以眼泪挽留他，他不得已留在安提阿事奉。米力提主教按立他为圣职人员。370年，屈梭多模原可被按立为主教，然而他推辞此职分，并推荐其友巴西流（不是凯撒利亚的巴西流）出任此职。

2、修道与牧会

在母亲过世之后，屈梭多模退隐至叙利亚旷野。在安提阿郊外的修道院中，他跟随院长狄尔多（Diodorus）修习神学，灵修、祷告、默想。但是因采取过度严格的修道生活，他的身体受损，不得已于380年回到安提阿教会继续事奉。386年，他出任长老，开始他的讲道事奉。由于他有讲道的口才，忠于圣经的解经讲道，能针对听众的需要与问题，因此吸引了许多群众。

387年，安提阿城因税收太重，引发了民众暴乱。暴民将皇帝、皇后及皇太子的雕像拆下损毁，并示街游行。当时的皇帝狄奥多修威胁要毁灭安提阿城。安提阿主教亲赴京城，请求皇帝从轻发落。屈梭多模在此时期（复活节前40日）连续传讲21篇信息，呼吁市民认罪悔改，城中大批异教徒因他的讲道悔改。果然，皇帝回心转意、从轻发落。从此“金口约翰”声名大噪。

3、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

狄奥多修去世后，其子阿卡狄乌斯在君士坦丁堡继任帝国东部皇帝。此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职位出缺。皇帝觉得屈梭多模是最佳人选，于是将他从安提阿绑架到君士坦丁堡，出任主教长。

亚历山大当时的主教是提阿非罗（Theophilus, 385—412年），他曾尽力布局推荐手下人选，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当屈梭多模被皇室挑选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时，提阿非罗在开始时假意与他合作，但是后来处心积虑要推翻屈梭多模。

4、屈梭多模的改革

398年2月，屈梭多模来到君士坦丁堡。他的讲道大受欢迎，立刻吸引许多民众。出身修道士、有敬虔背景的他看见君士坦丁堡懈怠的属灵光景，立即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改革。前任主教宽松对待圣职人员，常常大开宴席招待属下同工，使教会疏于治理，充满奢华之风。然而，屈梭多模主教却是过着修士般的俭朴生活，以致他的敌人造谣生事，说他孤僻行事、独享奢侈。

为了职位的晋升，亚细亚省的一些主教向以弗所的教区主教行贿。屈梭多模以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身份严惩了这些主教，将他们开除。屈梭多模也得罪了许多权贵，他在讲道中常指责权贵们奢侈放荡，自然招惹权贵的憎恨，但他因敬虔清廉的生活见证赢得了市民的衷心爱戴。

5、橡树宫会议

因为屈梭多模遭到君士坦丁堡高层圣职人员和权贵的反对，亚历山大主教提阿非罗设法利用他们来指控屈梭多模。403年6月，提阿非罗来到伯斯普鲁斯海峡区域，以屈梭多模庇护“高大弟兄会”（俄利根派）的修士为理由，定罪屈梭多模。他在君士坦丁堡对岸迦克敦的橡树宫召开会议，召聚那些对屈梭多模不满的人对他提出控诉，并决议开除屈梭多模。

此时屈梭多模与皇室关系也矛盾重重。皇后以不正当方法取得产业。由于屈梭多模在一篇讲道中，以恶后耶洗别为例指责强取豪夺之罪，大家以为他在指责皇后。所以，愤怒的皇帝阿卡狄乌斯批准了橡树宫的决议，下令放逐屈梭多模。就在屈梭多模离去后第二天，君士坦丁堡遭到大地震。拥护屈梭多模的市民认为这是上帝的刑罚临到这个城市，所以聚集在皇宫前抗议。皇帝与皇后赶紧召回屈梭多模，恢复其主教长之职。

然而，数月之后，皇后的银雕像落成，被树立在圣索菲亚教堂，宫廷大肆庆祝。屈梭多模不表赞同，在皇后眼中这又是一大侮辱。就在此时，提阿非罗主教又火上浇油，著文恶劣地攻击屈梭多模，加深皇后的怨恨。皇帝决心开除这位不受约束的主教，下令再次放逐屈梭多模。

屈梭多模遂上诉至罗马与米兰等地的主教。罗马主教英诺森（Innocent）深表同情，尽力营救但失败。屈梭多模被放逐至偏远的边疆，于407年9月死于艰难熬的押解旅途中。他临终时说：“为这一切感谢神！”屈梭多模的殉道是教会历史上的悲剧，是政权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必然恶果。

屈梭多模遗留后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其《讲道集》。《讲道集》中的讲道超过600篇，都是精彩的整卷解经讲道。他也写了许多神学与伦理文章，以论述基督徒信仰与生活。他的书信有242封传世，几乎都是他在放逐年间（403—407年）所写的。

屈梭多模是至死忠心的忠仆。他身居高位，却不为名利所惑，并非在于“金口”的恩赐，乃在于向主的“忠心”。今日教会多为世俗潮流所牵引、摆布，妥协真理以迎合大众。金口约翰的生命见证，如同施洗约翰一样，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为主发光且如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启 3:4-6 然而在撒狄，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第五章 以弗所会议（第三次大公会）

第一节 聂斯多留派异端

1、聂斯多留生平

聂斯多留（Νεστόριος，又译为聂斯脱利或涅斯多留，386年—451年）是叙利亚人，他曾进入安提阿修道院作修士。从428年至431年，他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期间，他曾反对亚流派在基督论上的见解，但是他自己却又另外提出一个错谬见解，因此他被认为是聂斯多留派的创立者。

2、聂斯多留的错谬神学

聂斯多留在基督论上有以下几点错误：

（1）聂斯多留将基督的本质的神性和人性完全分离，等同于将基督分成了两个位格。他说基督自己并未降生，马利亚所生的不过是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而已。这样，基督就成了两个位格：一个是在天上的神，另一个是在地上生活的人。如此一来，聂斯多留否认了基督是在地同时又又在天的神人二性的中保。

（2）童贞女马利亚只是生了一个叫耶稣的人，故此，马利亚不应被称作上帝之母。为了严防阿波里拿留主义，聂斯多留竭力反对“Θεοτόκος”（生上帝者，另有译作“上帝之母”）这个词。不用这个词是对的，但他否认基督是藉着马利亚道成肉身，这等于又把几百年来的正统教义推翻了。

（3）他将耶稣的一些事迹归结为神性，而将一些事迹归结为人性，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分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只是人性，神性只是伪装、不会受苦，所以耶稣的死不是真实的受苦。

3、主教屈利罗与聂斯多留的斗争

当时亚历山大的主教屈利罗（西里尔 Cyril，412—444年在位）与聂斯多留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聂斯多留被选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之后，屈利罗发表揭露其错谬的文章。在428年年底发给普世教会的《四二九年复活节文告》中，屈利罗公开指控聂斯多留错误的教导。然而，皇帝狄奥多修二世（401年—450年在位）与皇后、安提阿主教约翰及叙利亚的众主教都支持聂斯多留，屈利罗也无计可施。

430年2月，屈利罗写了一封公开长信给聂斯多留，详细解释亚历山大学派“基督的神人二性并未因联合而废去各自的特征”。屈利罗说，此联合是合而为一，所以神性的超自然作为可以归算给人性，人性有关的作为也可以归算给神性，因此“上帝之母”（Θεοτόκος）不只是尊敬的称呼，也符合“属性相通”的正统神学。5个月之后，聂斯多留公开回信，重申此时安提阿学派的观点，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划清界限的，继续反对“Θεοτόκος”一词，两者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

屈利罗的“神人二性在同一位格里相通”的真理为教会正确认识基督二性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他却使用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上帝之母”来为真理辩护，反而使聂斯多留

用错谬的异端思想来反对这个不恰当的名称。上帝让教会历史出现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是要显明人的不足和有限。

屈利罗尝试利用狄奥多修二世的姐姐与妻子来搬倒聂斯多留，最后却无功而返。我们看到，当神的仆人依靠世上的君王时必受神的管教。

诗 146:3-4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屈利罗转而向罗马主教克力斯丁（Celestine）求援。克力斯丁在罗马召开会议，限定聂斯多留十天之内收回其错谬，否则开除主教职，并将此决议交付屈利罗来执行。

430年11月，屈利罗在亚历山大召开会议，制订《十二条定罪条款》，定罪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特别是神人二性分立的看法。他要求聂斯多留同意这十二条条款。屈利罗将此《十二条定罪条款》连同《罗马主教的最后通牒》一起送给聂斯多留，聂斯多留却以《十二条反定罪条款》回复，指控反对他的人是阿波里拿留派。

由于屈利罗获得罗马主教的支持，聂斯多留有安提阿主教给他撑腰，东方教会将陷于分裂状态。皇帝狄奥多修二世看见教会陷入如此困境，认为必须召开大公会议才能解决此争端，于是他会同西部皇帝瓦伦提尼三世下诏，定于431年6月的五旬节在以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

4、以弗所大公会议

在会议召开之前，聂斯多留在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细亚已经失去民心。以弗所当地的主教麦美农（Memnon）支持屈利罗，反对聂斯多留。聂斯多留由皇帝派兵护送赴会。然而，因路途遥远，支持聂斯多留的安提阿主教约翰和叙利亚的众主教未能如期赶到。屈利罗却不愿等他们，也不顾皇帝代表的抗议，于6月22日召开会议。屈利罗声称：“人若不承认以马内利的耶稣是真上帝、诞生了圣道肉身的童贞女马利亚为上帝之母，就应当受咒诅。”这次会议虽然成功地定罪了聂斯多留主义者，但由于过高地称呼马利亚，给后来的马利亚崇拜埋下了隐患。而且维护真理绝不应该用不公正的手段，这是屈利罗主教的又一个错误。

会议共有160位主教出席。此时已到场的聂斯多留虽然三次被传唤，仍然拒绝开会，理由是要等到其他与会主教全部到齐。在聂斯多留缺席情况下，会议定罪开除聂斯多留。聂斯多留于次日得知结果，由于不服判决就上书皇帝。4天之后，约翰和叙利亚的众主教（共42位）方来到会场。在皇帝代表与卫队的保护下，他们也立刻召集对抗的会议，开除屈利罗和麦美农，定罪所有同意屈利罗立场之人。接下来，两边人士互相定罪咒诅，以弗所会议陷入混乱失控的局面，这次会议也在教会史上留下被外邦人讥笑的一页。神的儿女行任何事情都要行在光明之中，哪怕是面对错谬和仇敌，也要以神的公义为法则，这才是神所喜悦和祝福的。

弗 5:8-9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双方都上书皇帝陈情。两难之下，皇帝最后干脆命令各打五十大板，下诏将聂斯多留、屈利罗和麦美农三人同时监禁，并召唤双方各派代表8人到皇帝行宫迦克墩面谈。经过多次努力，双方仍然无法和好。后来，皇帝敦促双方签署《复和协议》，定罪并革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除聂斯多留，带来了短暂与表面的合一。

435年，聂斯多留再次被罗马皇帝定为异端，被流放到阿拉伯和埃及，于451年去世。后来其教义的支持者在叙利亚和波斯等地活动，成为独立教派。在波斯，该派得到波斯王朝的宽容。在波斯人的统治下，他们在尼西比斯（Nisibis）开办了一所神学院，从此逐渐影响波斯教会。该教会在14世纪时达到鼎盛，拥有主教区250个、信徒1500多万，被称为“迦勒底教会”。迦勒底教会在印度及中国亦开展传教的工作，唐代时聂斯多留主义由宣教士阿罗本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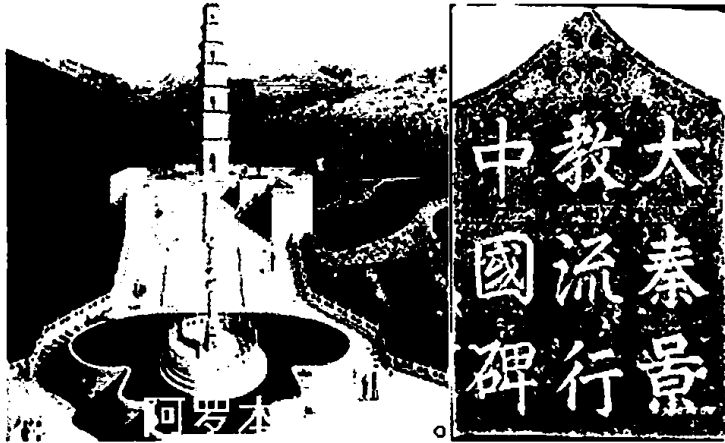


图 2.19 景教在中国西安的纪念塔

前面讲过，撒但攻击教会最厉害的方法就是左右拳击法。为了抵挡聂斯多留将基督分成两个位格的异端思想，教会强调基督的一位格，却不小心中了撒但的另一个诡计——将基督的一位格看成一性，把人性和神性混合。

第二节 犹提克——一性论

1、犹提克的错谬思想

431年的以弗所会议后，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修道士犹提克（Eutyches，约380—456年，又译：优提克斯、欧迪奇、犹推古）提出一性论教义——基督只有神性，其人性已经融合于神性之中。此教义在埃及等地受到普遍拥护。一性论者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既不是单纯的神性，也不是单纯的人性，而是“神性+人性”这样一种特殊的本性。犹提克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的溶化在一起的（人性被神性吞掉），是神死在十字架上。

446年，新一代的领袖崛起，情势发生了改变。狄奥司科（又译丢斯库 Dioscorus）继任亚历山大主教，他是极端的“一性派”。傅来文（Flavian 弗拉维）继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是承继基督二性的主教。此时皇帝宫廷也发生变化，太监克瑞撒非（Chrysaphius）掌权，他的教父便是犹提克。犹提克是出名的修道院长，与克瑞撒非和狄奥司科联手，处心积虑想要推翻433年的《复和协议》。安提阿派的提尔多瑞主教立刻看出此“一性派”的阴谋，于是撰文揭露一性派是以旧日异端的破布缝制新衣服。因此，狄奥司科激动皇帝反对他，皇帝于是在448年春下令禁止提尔多瑞外出。

2、犹提克与“强盗会议”（第二次以弗所会议）

448年11月，犹提克看到时机成熟，便公开挑战正统信仰，质疑“在道成肉身之后，主基督具有神人二性”，公开提出基督一性论。提尔多瑞主教召开区域的主教会议，定犹提克为异端，将其逐出教会。犹提克起初跑到罗马，得到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 I）的接纳，利奥由此开了一个教会接纳被其他教会开除者的先河，教会治理次序开始混乱。后来随着深入研究，利奥也确认定罪犹提克是对的。他写了数封书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封是写给主教傅来文的书信。这封书信被称为《利奥大卷》（Tome），是一卷长篇论述。在《利奥大卷》中，利奥深入浅出且精彩地论述“基督一位格两属性”的圣经真理，指明犹提克的“一位一性论”的错谬。

犹提克不服，上诉宫廷。皇帝的宫廷与一群修士支持犹提克，所以一性派的狄奥斯科主教促请皇帝召开大公会议来审议、裁决。

449年8月，狄奥多修二世在以弗所再度召开大会，共有135位主教参加，整个大会由亚历山大主教狄奥斯科把持。修士们与军队在场监视，一有反对声音立即镇压，提尔多瑞全程被隔离在场外。若有人发言不利“一性派”，他们立即群起而攻之，用声浪压盖任何反对声音。因无法宣读利奥的《大卷》，罗马主教代表团只有暗自离开会场，以免被迫签署大会的决议。

此次会议定犹提克为正统信仰，定罪本为正统的“一位格两属性”为异端，开除提尔多瑞、傅来文与利奥。遭放逐的傅来文被暴怒修士们殴打成重伤，数日之后去世。这次“以弗所会议”是如此的独裁、暴力，完全是黑暗在掌权，在历史上永留臭名，难怪利奥称之为“强盗会议”。直到迦克顿会议后，一性论才被正统教会铲除。

迦克墩会议后，犹提克的一性派仍继续盛行于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和亚美尼亚等地。他们组成叙利亚雅各派教会、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等。

第三节 迦克墩会议

1、背景和过程

因为第二次以弗所会议是如此野蛮和强横，罗马大主教利奥极力抵制，呼吁重新召开大公会议。正在此时，支持一性派的皇帝狄奥多修二世于450年7月坠马而死。皇帝无子，其姐姐普凯利雅（Pulcheria）接掌大权，将军马西安（麦吉安 Marcion）与普凯利雅结婚而继任皇位。

新任的皇帝与皇后皆是拥护正统信仰者。451年9月，马西安宣布召开大公会议。地点最初定在尼西亚，但后又迁移至皇帝行宫所在地迦克墩，迦克墩（Chalcedon，卡尔西顿）位于君士坦丁堡对面。大会的会期从451年10月8日到11月1日，约有520到630人参加，人数为历届大公会议之冠。

会议讨论了犹提克的一性论，大家一致判定其为异端。另一个引起争论的中心就是《利奥大卷》中对基督二性的描述和屈利罗主教当年的《十二条定罪条款》中所表述的基督论貌似有所不同。《利奥大卷》明确说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基督完整无缺的两个属性，而屈利罗的《十二条定罪条款》只强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共同构成一个位格。最后，主教们愿意以《十二条定罪条款》为基础和标准来审视《利奥大卷》。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会议随后决定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时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亚纳多留（Anatolius）领导特别委员会，对《利奥大卷》的内容进行严格审视。五天之后，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经仔细审慎的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利奥大卷》与屈利罗《十二章》两者所说的基督论是互相一致的，《利奥大卷》完全可以用屈利罗大主教的思想来诠释。故此，我们建议大会接受《利奥大卷》的教义为正统的基督论。”

2、结果

这次大会主要有以下几个贡献：

(1) 大会废除“强盗会议”的一切决议，殉道的主教傅来文获得平反；开除“强盗会议”的主将狄奥司克与其他五位主教。狄氏拒不认错，遭到放逐。

(2) 大会重申聂斯多留派的“两位格两属性”为异端，并定罪犹提克派的“一位格一属性”为异端。

(3) 大会宣读《尼西亚信经》、屈利罗的两封书信以及利奥的《大卷》。

(4) 大会制订《迦克墩信经》。

(5) 大会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作为教义。

(6) 大会明令禁止人写的诗歌在教会中使用。

大会将会议结果制定为《迦克墩信经》，其内容如下：

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祂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祂与父同体；按人性说，祂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圣母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

这次会议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至此，大公会议已经奠定了三位一体的神论和基督论的基本教义，近二百年的基督论之争宣告结束，因此迦克墩会议是初代教会最后一次大公会议。这是圣灵借着一代代的忠仆们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建造的丰碑。

提前 3: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3、信经和正典的制订

“信经”这个词源自拉丁文 *credo*，即“我信”。教会制订《使徒信经》以分辨诺斯底派及孟他努派的异端。

“正典”是早已被教会承认、接受而列入的经卷。367年，东方教会终于列出了新约的27卷的目录。393年在非洲希坡举行的大公会议和397年在迦太基举行的大公会议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完整的正典书目。这说明这些圣经正典早已为教会所通用，是出于神自己的工作。

4、早期教会的异端总结

在早期教会，神藉着教会与异端的争辩，将祂的真理显明出来。最主要有以下异端：

(1) 以便尼主义：是指犹太人主张严守犹太教的律法，认为这样是得救的条件之一（徒 15）。这个异端直至第 4 世纪末才消失。他们自称为拿撒勒人。

(2) 诺斯底主义：主张灵善物恶的二元论、幻影说、发射论。

(3) 马吉安主义：反对旧约，认为基督是纯灵，祂在地上的身体是一个幻象。

(4) 孟他努主义：相信圣灵对个别信徒有直接的带领，追求灵恩方言，是狂热的律法主义。

(5) 诺瓦天主教：惩戒过分严厉，只知公义，规定许多罪（如奸淫、不认主）永不赦免，后来发展成多纳徒主义。

(6) 神格唯一论：主张上帝只有一个位格，耶稣的诞生是超自然的，在意志上（非本质上）与上帝合而为一，在 269 年的安提阿会议上被判为异端。

(7) 亚流主义：主张基督是被造的，也和天父上帝的本质不相同。对此，传说亚流派有一句流行的话：“曾经在某时间他（基督）并不存在。”

(8) 马其纽顿主义：主张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是有次序的，上帝是由一位非被造的父神和两位被造的次神（圣子和圣灵）构成，被认为是“敌圣灵派”，在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被判为异端。

(9) 阿波里拿留主义：主张基督有一个人的魂（νοῦς，魂/精神/理性/意识中心），也有一个完整的神的魂（三元论）。

(10) 聂斯多留主义：主张耶稣有两个位格，在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判为异端。

(11) 犹提克主义：主张耶稣出生以后只有一性，就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了人，由神人二性混合而成。

(12) 撒伯流主义：是形态论，主张三位一体神只有一个位格，以不同形态出现。

(13) 伯拉纠主义：高举人的自由意志。418 年，两次的迦太基会议议决：神的恩典是完全的，人无法在罪中自救。因此，伯拉纠主义被判为异端。

(14) 基督一志说：虽然承认基督的神人二性，但提出基督的活动是由一个“属神人的精力”主宰，只有这一个意志。如果基督的人性没有独立的意志，基督就不再是完整的人。680 年举行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对基督一志论派加以谴责。

第六章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及伯拉纠主义

第一节 奥古斯丁生平

1、少年时期

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年) 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尼卡 (Monica) 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受到传统非洲基督教的教导和训练, 过着纯朴的生活。她紧守安息日, 管教儿女, 并不停为儿子祷告, 许愿将这个儿子献给神。

撒上 1:11 许愿说: “万军之耶和華啊, 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 眷念不忘婢女, 賜我一个兒子, 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

奥古斯丁 11 岁时, 他被送到塔加斯特南边的小城的学校学习。他在那里学习了拉丁文学, 也熟悉异教徒的信仰和习俗。17 岁时, 他赴迦太基继续学习修辞学。少年时的奥古斯丁才华横溢, 放荡不羁。19 岁时, 奥古斯丁读了西塞罗的《霍腾修斯》。受其影响, 奥古斯丁开始对希腊哲学产生兴趣, 深信柏拉图的善恶二元论, 很快接受了与此相近、教导善恶二元论的摩尼教的信仰。奥古斯丁做了 9 年的摩尼教徒。

他之所以接受这样的信仰, 这和他里面灵魂的挣扎分不开: 一方面, 他羡慕母亲那种敬虔、圣洁的生命, 他自己也深受基督教的熏陶, 觉得自己也应该是这样一位基督徒; 另一方面, 奥古斯丁又过着一个放纵私欲的生活, 无法摆脱情欲的捆绑。因此, 他觉得自己里面有善恶两种力量, 仿佛真理和情欲共处一身, 这导致他怀疑是否真的有善恶两位神, 他自己就是这两位神中间的棋子。摩尼教的思想正符合他里面的挣扎, 所以他热心摩尼教, 但上帝拯救的手没有离开这位浪子。

375 年, 21 岁的奥古斯丁在迦太基教授雄辩术。他在那里教了 9 年。383 年, 他不顾母亲的流泪恳求, 毅然离开非洲, 远赴罗马教授修辞学。这时的奥古斯丁像一只无头苍蝇。



图 2.20 古迦太基城遗址

第六章 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及伯拉纠主义

384年，奥古斯丁来到米兰，教授修辞学，他的母亲也来到米兰和他同住。这时，他终于离开了摩尼教，在米兰教会聆听安波罗修的讲道，但他又迷上了新柏拉图的学园派哲学。就在这个时候，神拯救的呼召临到了他。

2、花园奇迹

这是一个在西方妇孺皆知的故事。一天，在米兰以北的一座乡间别墅的花园中，奥古斯丁正在冥思苦想。此时他的灵魂陷入苦苦的挣扎，他想将自己献给上帝，可是里面诸般的情欲令他难以选择，他的心里仿佛在呼求：“主啊，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到明天再明天吗？为什么不是现在呢？”此时他听到一个孩童的声音：“拿起来读！”于是他拿起了手边的圣经，正好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只有悔改、离开罪恶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一刻成了奥古斯丁一生的转折点，他悔改了，从此以后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其实，奥古斯丁的重生不一定是在这一时刻。信道一定是从听道来的，奥古斯丁的悔改离不开他的母亲从小用圣经对他的劝诫和教导，更离不开这位母亲昼夜不住地祷告，而且他当时已经听过安波罗修的不少讲道。虽然他一直生活在罪恶之中，但那从万古之先拣选的恩典一生伴随着他。

387年，奥古斯丁正式受洗加入教会，跟随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学习神学。388年，34岁的奥古斯丁回到非洲希坡(Hippo)为真道争辩，将那里的摩尼教领袖反驳得哑口无言，许多摩尼教徒开始皈依基督信仰。391年，37岁的奥古斯丁被按立为北非希坡的助理主教。395年，他成为希波的主教，之后一直同多纳徒、伯拉纠作斗争，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430年，奥古斯丁离世，享年76岁。

3、奥古斯丁同多纳徒派作斗争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可怕的逼迫期间，诺瓦天派反对否认了信仰的基督徒回到教会，后来发展成多纳徒派。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徒(Donatus)教导：圣礼的有效性在于施礼的圣职人员本身是否圣洁。换言之，如果神职人员曾经跌倒过，那么他为信徒所施行的圣礼将被视为无效。当时，有些主教在逼迫中缴出圣经给政府官员焚毁，有些主教也盲从跟随过亚流等异端，但他们有的后来悔改了。多纳徒派认为这种主教没有资格主持圣礼以及按立别人为主教。330年，该教派已有172名主教，最多时拥有约300名主教。348年，多纳徒派被北非教会定为异端，罗马帝国派军队镇压，双方在北非对峙达13年。最后这批多纳徒派退出教会，组建了自己的教会。奥古斯丁主张：“大公教会是唯一的教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纳徒派内心的骄傲和自义：“他们并非恨恶别人的罪，乃是喜爱自己好争议和自义的心，所以他们以严厉地对付罪为借口，怂恿人变得冷酷无情，从而破坏教会的合一。”

第二节 伯拉纠主义

奥古斯丁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教会认清“伯拉纠派”的根本错误，并指出他们是从人的有限且有罪的理性来错解人性与神的恩典。伯拉纠派的错误是如此严重，完全违背了圣经的福音真理。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1、伯拉纠

伯拉纠 (Pelagius, 约 360—418) 是英国不列颠人, 是禁欲的道德主义者、修道士, 曾居住于罗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处。

伯拉纠的错误神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拒绝原罪的说法, 认为亚当仅仅是一个坏榜样, 耶稣基督仅仅是一位好榜样。

(2) 认为人需要的是道德方向的转变, 而非重生。

(3) 认为人犯罪只是学坏了, 人自己有能力选择重新做人; 恩典就是神在新旧约圣经中启示出许多可以加以效法的好榜样, 目的是从旁协助我们过圣洁生活。

(4) 否认无条件的预定, 认为人有自由意志, 自己可以决定得救。

在以弗所第一次大公会议时, 伯拉纠主义就已经被定为异端。这个时期, 教会主要精力都投在基督论的争论上, 对伯拉纠主义这个在救恩论上影响后代两千年的异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只有神的仆人奥古斯丁穷尽毕生的心血, 呼唤人们回归圣经启示的救恩真理。

2、伯拉纠的异端要点

411 年, 米兰的保利努 (Paulinus, 保林纳) 列举了伯拉纠信息中的六个异端要点:

(1) 亚当受造是要朽坏的, 不论犯罪与否, 他都会死; (2) 亚当的罪只伤害了他自己, 而没有影响全人类; (3) 新生婴孩和亚当堕落之前的光景是一样的; (4) 全人类并未因亚当的罪和死而死, 我们也并未藉着基督的复活而复活; (5) 和福音一样, 律法也提供了天国的入口; (6) 世上有从不犯罪的人, 在旧约时期就已经有人是完全无罪的。

伯拉纠主义不仅完全否认了人得救要靠信心, 即因信称义的真理, 更否认了上帝的主权。伯拉纠主义者将基督赐给人的生命之道完全变成道德式宗教, 否认圣灵在人里面的大能的运行, 否认圣灵使人更新改变的工作, 将基督教贬低至世上的主义、学说、人自己努力决志的工具。伯拉纠主义是教会历史上神儿女最大的仇敌。

创 3:5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实际上, 伯拉纠主义所倡导的就是“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正体现了人企图像神一样能自己辨别好歹、自由选择, 即具有自由意志。这正是千百年来行为之约下的人挣扎和反叛的呼声: “美好明天要靠我们自己!”

耶 17:5: 耶和華如此說: 倚靠人血肉的膀臂, 心中離棄耶和華的, 那人有了禍了!

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家华腓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说: “伯拉纠主义是对异教徒世界观的平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企图与用自己的主权拯救人的神势不两立的异端, 却一直袭扰、牢笼基督教会几千年。现代派、不信派都是这个异端的变种。

3、半伯拉纠主义

半伯拉纠主义是由 5 世纪马赛港的卡西安提出。他并没有否认原罪以及其对人的灵魂和意志的影响, 但是他教导: (1) 神与人合作才实现对人的救赎, 否认基督教的预定论; (2) 人有根据自己意志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 罪恶中的人有能力去选择信仰上帝; (3) 是人去选择相信上帝, 而不是上帝主动对人施与恩典; (4) 人能通过其自由的意

志选择上帝，然后依靠神的恩赐与神合作，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持信仰；（5）上帝的恩赐救赎是人最初努力的结果。

在 529 年召开的奥朗治会议（The Council of Orange）上，半伯拉纠主义被定为异端。近代掠夺教会几百年的亚米念异端本质上和半伯拉纠主义没有区别。清教徒约翰·欧文说：“亚米念就是半伯拉纠原封不动的翻版。”

第三节 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教义贡献

1、奥古斯丁一生的著作

奥古斯丁著作很多，主要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论自由意志》、《驳多纳徒派》、《驳伯拉纠派》、《奥古斯丁选集》等等。

奥古斯丁奠定了正统神学的基础，特别是恩典论。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曾数百次地引用奥古斯丁的观点。



图 2.21 奥古斯丁

2、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

教会有关三位一体的观念在奥古斯丁的巨著《论三位一体》中臻于成熟。

奥古斯丁也强调神本质上的合一与位格上的三位，说：“三位中的每一位都拥有神的全部本质，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且与位格中的其它二位同一。圣父、圣子、圣灵不像我们世间的三个人，每一个只拥有人类人性的一部分。此外，三者不缺一而独立，也不可能缺一而独立，即父不能没有子，子不能没有父，圣灵不能没有子和父。祂们中间有相依存的关系。每一位都有属神的本质，但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如使之生出（generating）、被生出（generated）。这三位格之间有一种互通、互住的关系。”

以“位格”一词来指明三位之间彼此的关系不能令奥古斯丁满意，但他仍然继续使用，正如他所说：“我用这词句并不是为了表明三者间之关系，乃是为了不保持沉默。”从这种三位一体的观念来看，圣灵自然是由父也由子而出。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3、奥古斯丁的救恩论

在与摩尼教的命运论或决定论争辩的时候，奥古斯丁强调人被造时有自由意志；当在与伯拉纠主义争论的时候，他更强调预定和恩典。

奥古斯丁在其著作《自由意志论》（De Libero Arbitrio, 395年）中强调：“创造时神将人造成一个人格体，神赋予人自由意志。虽是自由的，但不常是善的。此时人处在可以犯罪、也可以是不犯罪的状态。亚当以后，因意志的错误选择，罪恶进入世界历史。结果，堕落后的人丧失了不犯罪的可能性，只剩下了犯罪的可能性。如果说有自由的话，那便是只有犯罪的自由，所以称其为‘被罪捆绑的意志’没有自由。”

奥古斯丁强调亚当原罪的遗传性，即使是婴儿也带着罪性出生，整个全人的败坏也是奥古斯丁主要的思想。他说：“除了罪，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因而他主张当婴儿洗礼。他强调因本性的腐败和堕落，所以借着神的拣选，被预定得救的人类得以救赎，并被神保守到底。

奥古斯丁认为得救上的预定是不可抗拒的（Irresistible）力量，但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的恩典是温柔的强权。他主张，人的得救绝不是人自己努力寻找的结果：“你要畏惧，免得当你宣称自己找到真道时，你就从所宣称的真道上灭亡了。”

约 6:44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奥古斯丁说恩典降临的时候，虽然不犯罪的可能性被恢复了，但因为人的私欲一直存在到死的那一天，所以仍有犯罪的可能性。所以完全的成圣和完全的自由在这世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未来的天国才能完成。在这世界历史中也就只有基督具有不犯罪的可能性。

谈到赏赐的根基，奥古斯丁主张神的恩典是人类一切善行的源泉：“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运行，我们才有善行。”所以人能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善工。当伯拉纠提出“若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么神的奖赏就毫无意义”时，奥古斯丁则反驳道：“神所奖赏的绝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祂自己所赐下的恩赐。”这种完全的神本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加尔文等改教家。是的，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可夸。基督通过在世上的顺服和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成就的义归算给圣徒，但与此同时，圣徒的本性得到变化而成长。

林前 1:30-31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4、奥古斯丁的教会论

神大爱所支配的上帝之城即教会从亚伯、雅各、以色列人一直延续至今，而由利己的私欲所支配的世俗之城则是从该隐、以扫、亚述、巴比伦、希腊延续到罗马。虽然异教徒否认使罗马最终衰退的原因是教会，但奥古斯丁的辩证不是如此。最终上帝之城（教会）在世俗之城（罗马）中仍走殉道之路。

关于圣礼，奥古斯丁用毕生精力反对多纳徒派所强调的圣礼的功效与执行圣礼者的灵命和品德有关。奥古斯丁强调即使是曾背教的圣职者所举行的圣礼也具有功效，圣礼不是藉着人发挥功效，而是藉圣礼本身发挥功效。后来加尔文认为也不是圣礼本身，而

是神在圣经中的应许使圣礼有效。

在敬拜中，奥古斯丁反对在敬拜中使用未受圣灵默示的诗歌，也就是人写的歌。加尔文也说：“奥古斯丁说的对，没有人配向神唱诗称颂，除非这诗歌是从神而来的。”

5、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和末世论

奥古斯丁对希腊的螺旋、轮回等历史观同样加以批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更像一条线段，有起点、有终点。这条直线并非漫无目的随机发展，而是上帝自己的旨意在掌管成就。奥古斯丁的末世论强调神国的内在性，他不相信千禧年王国出现在历史的终了，而认为千禧年王国就是指现在的教会。奥古斯丁属于无千禧年论者。教会中虽有穗子，但教会是在地上的天国模型。在认识神的知识上，奥古斯丁认为只有通过神的启示人才认识神。

第七章 教会渐趋腐化和修道主义兴起

第一节 罗马主教长为首地位的形成

1、五大教区

初代教会由于历史原因，逐渐形成五个核心地区，成为五大教区：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罗马。每一个教区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都曾被上帝使用为福音复兴的基地，都有著名的使徒和教父们的足迹和鲜血。由于这些原因，此时教会没有采用后来的众教会一律平等的长老会模式，而是仍然以这五个中心教区去发展开拓。虽然每个教会或教区都有了主教，但是这五个教区的主教地位在众教会中格外突出，这五个大城的主教均被称为主教长、牧首、大主教。

罗马原本是罗马帝国的都城，随着历史的演变，罗马主教逐渐地超过其它主教的权位，在罗马帝国中的五个大城渐居重要地位。但后来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渐渐兴起，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地位也越来越迎头赶上。因而在迦克顿会议中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与罗马主教地位相等，这遭到罗马大主教利奥一世的抗议。随着帝国东西部的分裂，教会的分歧也在所难免。

2、教皇形成的趋势

正所谓“罗马非一日建成”，教皇的形成也并非一日突起，这与初代教父们的言论以及后代对其错误解释都不无关系。例如爱任纽的《驳异端》说：“所有教会都当赞同罗马教会，众教会都承认罗马主教的超越地位。”这些因素从而导致教皇制的开端。

“教皇”（Pope）一字源自拉丁文 PaPa，是“爸爸”的意思。根据教父伊格那修的一句话：“我们要紧紧跟随监督，像基督跟随天父一样”。在圣经中“监督”和“长老”是同义词，“长老”指职分，“监督”指职务，但后来许多人提出由一个人管辖众教会的观念，也为了区分和其他长老的不同，便有了“监督”，“教皇”头衔就是由此而来。人罪性中一直有等级高低的观念，就连使徒们都曾为此受过主的责备。

太 20:20-21 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她说：“愿你叫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我右边，一个坐在我左边。”

太 20:25-28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当然，教父们不会要获得高人一筹的地位，但“对个人领袖的恩赐和推崇超过圣灵在教会所有会众中的工作”这些错误的言论，后来被野心之徒利用，成了教皇制的借口。

第二节 教会开始腐化

1、腐化的原因

教会开始腐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义的偏离。另外我们看见教会在血腥的逼迫中屹立不摇，终于胜过异教，建立了稳固的地位。然而由于下列因素：

第一，基督徒残余罪性；

第二，在初期教会中圣经尚未整理完成；

第三，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成为挂名的基督徒，教会受慕道友导向。

许多罪恶出现。其根源是教会对错谬的妥协和对罪恶的包容。

提后 1:13-14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2、偶像的进入使教会腐化

在4—5世纪时期，教会在地下墓穴和集会所的壁画中开始采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和形象来代表基督，它们是教会为了逃避罗马政府的追捕而采用的特殊联络方式。初代教会在教会的崇拜上一直是严谨的，特别是引入偶像崇拜在教会中是绝对禁止的。教会禁止在室内设置任何偶像，墙上禁止张贴任何肖像。早在公元305年的艾薇拉会议（The Council of Elvia）已颁布法令：“禁止在教堂内悬挂任何图像，信徒所敬拜和赞美的不得描绘在墙上。”当大量的异教徒涌入教会时，有的教会为了迎合这些异教徒的口味（用今天新派的话说就是尊重地方的文化风俗），开始在教堂内设置一些装饰和肖像。此举一发生便立即遭到教父们的极力反对。奥古斯丁指出：“在教堂内摆放任何偶像都是极其错误的。”并且预言：“人一旦拜偶像，谬论就会加倍递增。”然而随着这些忠心的教父们的离世，偶像崇拜之风像决堤的洪水涌进教会。

人们由在教会中设置图画渐渐演变成设立偶像、祭坛；圣职人员开始争相追逐穿着，以华丽的法衣标榜自己；为了迎合异教徒对死去亲人的想念之情，教会产生为死人祷告的教义；敬拜天使、殉道者及圣徒，尤其是敬拜马利亚；崇拜圣徒遗物；崇拜仪式日趋繁复华丽；讲道越来越少；异教徒的地域优越观念和个人神秘主义观念成为教会主流，开始圣地朝拜；修道主义也应运而生；教会中的异教徒对人的追崇导致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阶级之分。总之，教会开始渐渐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启 2:20-21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

3、异教崇拜混杂

(1) 太阳崇拜渗入教会

公元274年罗马皇帝奥勒良指定12月25日为罗马帝国官方庆祝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是波斯、叙利亚一带最广为崇拜的太阳神苏里耶（Surya）和伊朗太阳神米特拉（Dies Natalis Solis Invicti，译为“不可征服的太阳”）的生日，所以这一天一直为异教世界所推崇。后来许多异教背景的信徒在这一天仍然以一定的仪式祭拜太阳神，即使这一天是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星期日，他们也先是拜过太阳神后才到教会敬拜真神。

5世纪中期利奥一世就曾斥责过那些先向太阳朝拜然后才进圣彼得教堂礼拜的信徒，但利奥的斥责似乎没有产生明显作用，人们依然固我。为了调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敬拜之间的矛盾，有人根据圣经《玛拉基书》第四章二节说，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干脆将这一日定为耶稣的生日（一说是由君士坦丁提出，一说是由罗马主教克莱芒倡议）。这样矛盾便迅速得到调和，于是教会将其命名为“圣诞”。“圣诞节”英文是 Christmas，即是为基督（Christ）做弥撒（Mass）的意思。“弥撒”原是为死去之人的灵魂举行的外邦宗教仪式，包括祷告、唱诗及念经等内容，教会竟然把神圣的基督称号与一个魔鬼的节日混合在一起。从此教会便陷入历史上这一最大的漩涡中。

结 20:39 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

历史上教会的敬虔者不断反对这一称呼和节日。1644年，英国国会宣布圣诞节是非法的，但后来被圣公会废除。

英国的清教徒把圣诞节的庆祝视为撒但的作为。1605年，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法庭通过法案：任何人若庆祝圣诞节，或者与它有关联，罚款五先令。

（2）对马利亚崇拜

马利亚无原罪的思想源于亚历山大。后来的教父、旁经、以弗所会议、迦克顿信经中由于使用“上帝之母”一词使马利亚的地位愈加提升。

由于异教迷信思想涌入，而许多人崇信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也有人膜拜希腊与罗马神话中雅典娜女神，人们又将这两个异教偶像与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牵拉硬扯到一起。有些留存下来的伊西斯怀抱婴儿贺如斯的偶像，其姿势与某些早期圣母怀抱圣婴像极其类似。后来天主教将马利亚无原罪、马利亚升天、马利亚神性等教义作为自己的信仰。



图 2.22 伊西斯怀抱婴儿和圣母马利亚怀抱圣婴银像
（流传于 6 世纪，圣母装束为埃及人）的对比

第三节 修道主义产生

1、安东尼（第一个修道主义者）

修道主义最先开始于埃及，最早的创立者是底比斯城的安东尼。公元 270 年，安东尼在自己的乡村开始过修道士的生活。35 岁的时候，他彻底离开埃及的居住区，退入沙漠。他在沙漠里待了 20 年。在安东尼的几封书信中，他详细论述了悔改和洁净的必要性，详述“悔改之灵”对灵、心智和身体的作用，后来亚他那修根据他的经历写了《安东尼传》。

2、坐柱者西门

叙利亚的西门，为自己制作了一个高 60 尺柱子，柱顶只有 4 平方尺。西门开始终日坐在上面修道，食物是门徒们从梯子送上的。他既不能躺卧，也不能坐，只能站立或驱身向神敬拜。人们数过他以头触到脚面的姿势敬拜神，达 2044 次。他衣着野兽皮，颈带铁链，圣餐也是在柱子上接受。他经历过太阳光的酷暑，受过瓢泼大雨的考验，被深夜的露雨打湿过。他每天向旁观者讲两次悔改之道，甚至向君王也传讲神的训诫。

3、修道院组织

西方的修道运动起源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奥古斯丁回到北非也过修道生活，还创立了修道院。这时的大多数修道院恪守“三誓愿”——独身、服从、贫穷——的人本思想，修道院的生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静修，另一部分是体力劳动。针对当时有些修士闲懒不作工、靠人救济过活，奥古斯丁写作《论修士的工作》以驳斥此错误，鼓励修士们要自力更生，这也被看作是修道院运动的开端。西方教会正规修道院运动比较有组织有规模的创始者还是本尼狄克（本笃）。公元 529 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立了本尼狄克修会。修会安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在凌晨两点、四点半、清晨六点、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傍晚六点为祷告敬拜的时间。



图 2.23 修道院里面简陋的生活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4、修道主义形成原因

教会的堕落和腐化必然使里面的真信徒渴望追求圣洁和敬虔的生活，脱离徒有外表和虚名的宗教生活。但初代的信徒，特别是引导带领教会的主教和教父们，没有按照真知识追求敬虔，而是将这种追求转化为自己里面盲目的热心。其实主早已告诉我们：追求圣洁不是脱离世界，更不是苦待己身。

约 17: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太 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西 2:23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教会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这些苦待己身的方法对教会的圣洁来说确实毫无功效。后面我们会不断地看到，由起初追求简朴的修道院生活变成到后来的奢华、充满罪恶的营所足以说明这点。

5、教会当脱离宗教作品的渲染

加尔文说：“罪人的本性往往都愿意夸大渲染真实的事实。”在教会为圣徒作见证的时候，也难免受这种罪性的影响。比如讲到坡旅甲殉道时，这位神的仆人能从容和坚定地舍命，已经是神给我们的云彩般的见证，可是后人总是愿意画蛇添足，加上许多神话般的东西，说他死时周围充满奇香，更有甚者，说从火堆里竟然飞出一只鸽子。这些怪说非常迎合人好奇的本性，因而越传越神，几乎成为后代的事实了。再比如讲到安东尼修道时，如何禁食 50 天，如何和魔鬼对话，如何见到天使等等。通过这些宗教作品的渲染使人们对修道更加心驰神往，因而修道主义大兴。我们看到，夸大圣徒的见证一样害人——害听到之人，使教会堕入虚假和神秘主义的泥潭。

出 20:16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6、修道院对教会历史的贡献

由于修道士们过着简单清贫的生活，所以除了灵修外他们可有大量时间，他们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就是抄写圣经。那时没有印刷术，因此借着他们的抄写，圣经得以传承保存下来。目前发现的几个最早的圣经抄本大都是修道院的工作。

圣经抄本的数目很难有精确的统计。现在的数目已有数千本，其中有几本古卷最为著名：（1）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因藏于罗马梵蒂冈大图书馆而得名；（2）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因发现于西乃山的一修道院得名，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西乃抄本的新约最完整，并未失落一页；（3）亚力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因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抄录得名，现藏在大英博物馆。

以上的抄本以梵蒂冈抄本最古。这些抄本抄写的时间在第四至第五世纪，是古卷中最完整而清晰的，对校正圣经文字最有价值。现在的各国圣经译本都是在翻译 8 世纪以后的圣经抄本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些古卷抄本的注释，如中文和合本经常有“古卷在此有……”的字样，这里的“古卷”指的就是这些抄本。

第八章 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灭亡

第一节 蛮族入侵

1、阿提拉

匈奴人于东汉时期被汉朝屡次打败后，匈奴的一分支北匈奴被迫开始西迁，于350年左右进入了欧洲。继承父位的匈奴王阿提拉是一位作战勇猛果断的首领，曾多次率领大军侵入东、西罗马帝国。虽然他们跟汉人作战一再挫败，但进入欧洲，在日益颓废的罗马军队看来他们却如入羊群的虎一样。罗马帝国和一些蛮族部落在阿提拉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一些部落为了生存也开始进攻罗马帝国和其他部落，结果引起了欧洲二百年的动荡和民族迁徙。阿提拉被称为“上帝之鞭”。

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修二世以纳贡赔款、归还叛逃者等措施求和而得以喘息。450年，阿提拉进攻西欧，逼近罗马。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利奥大卷》的作者）出面谈判，最终解围，使罗马城逃过一劫。利奥和罗马教会的名声和地位也因此大振。



图 2.24 罗马大主教利奥一世

2、蛮族入侵罗马

蛮族是罗马帝国版图外一些部落部族的总称。当时几个大的蛮族部落有东哥特、西哥特、日耳曼、汪达尔等。阿提拉的入侵引起了民族大迁徙，许多蛮族抵不住阿提拉的进攻，开始争先蚕食已经羸弱不堪的罗马帝国。帝国早已失去初期凯撒时代的威武，军队战斗力涣散，帝国皇帝不得以雇佣大批的蛮族士兵为其效力，这又给帝国带来更大的隐患。

3、蛮族入侵路线

蛮族的入侵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1) 378年8月，亚得里亚堡一战，罗马军队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继位的狄奥多修一世被迫让步，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阿拉利，Alaric，395—410在位）统率下南下希腊，西进意大利。410年8月24日晚攻陷罗马。西哥特人遂回师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占高卢西南部。418年以土鲁斯为中心建立西哥特王国。

(2) 406年底，苏维汇人经高卢，于409年秋进入西班牙。西哥特人侵入西班牙后，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苏维汇人被迫退居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建立苏维汇王国。

(3) 汪达尔人由盖塞里克率领，于 429 年渡海进入北非。439 年攻陷迦太基，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随后，汪达尔人又征服西西里西部、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

(4) 5 世纪初，勃艮第人占据高卢。451 年，他们曾协助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击退匈奴人阿提拉的进犯。约 457 年，勃艮第人在高卢东南部建立勃艮第王国，定都里昂。

(5) 486 年在克洛维统率下，法兰克人在苏瓦松击败罗马军队，占据高卢北部，建立法兰克王国。

(6) 盎格鲁和撒克逊的各部落横渡北海进入不列颠，占据该岛的东部和南部，建立许多小王国。7 世纪初，合并为 7 个王国。

(7) 素有北欧海盗之称的斯堪的那维亚在此混乱之际乘机占领了北欧，建立了许多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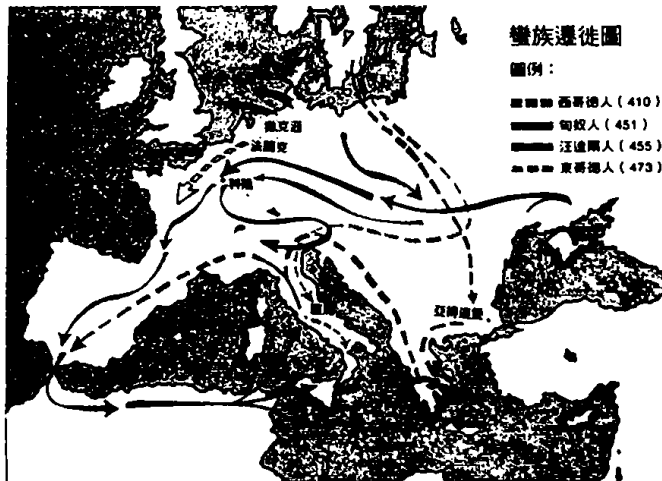


图 2.25 蛮族入侵罗马路线图

第二节 罗马帝国灭亡

1、罗马遭洗劫

410 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领导下攻下了罗马城，便大肆掠夺了六天六夜之久，罗马城内贵重珍藏均遭洗劫。

455 年，汪达尔人在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之后又越过地中海攻入罗马，大肆焚掠，全城文物毁坏殆尽，代表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主义”由此而得名。

2、西罗马帝国灭亡

476 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在日耳曼雇佣军将军奥多亚克的命令下正式向元老院声明退位后，元老院派出一个使团赴东罗马朝廷，把帝徽送给当政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

第三节 教会向蛮族传福音

1、东、西哥特的信仰背景

早在 341 年，在东、西哥特人入侵罗马帝国前，作为异端的亚流派传教士已经将该教传给东哥特人，这主要是因为乌斐拉的宣教工作。乌斐拉后来被立为主教。此外，他将大部分圣经译成哥特文。如何清除亚流异端对这些蛮族部落的影响，使他们接受正统的尼西亚信仰，是教会工作的当务之急。

2、法兰克人归信基督

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 27 岁时与身为基督徒的勃艮第公主结婚。他曾一度对妻子所笃信的上帝持怀疑态度。

496 年，克洛维与进犯的阿勒曼人激战得胜。据说当时他也经历了和君士坦丁一样的神迹，于是他和三千名部属同时于当年圣诞节受了洗、归入基督，从此开创了辉煌的法兰克历史。当然神迹传说不足为论，是神使用一位敬虔妻子的规劝和祷告成就祂在历史中的作为，像神使用以斯帖一样。

3、苏格兰人及英格兰人基督化

早在使徒后期，就有人去英国宣讲福音，而且著名的宣教士阿尔本就是在教父时代的初期于该地殉道，不列颠曾经拥有一些基督教区。但是在第五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濒临崩溃时，驻守英格兰的罗马军队撤回意大利，因此欧洲大陆的蛮族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先后入侵并占领不列颠，基督教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

6 世纪，爱尔兰籍科伦巴（Columba）开始向苏格兰宣教，后来其弟子爱丹（Aidan）及其修道院的宣教士也开始由不列颠北部向入侵英格兰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殷勤不懈地宣教。据说有一次在奴隶市场上，教皇大贵格利听到不列颠的土地仍是蛮荒，便在 597 年派 40 人在奥格斯丁的率领下也赴英格兰宣教，次年不列颠南部的肯特王受洗。此地成为教皇的教区，而北部群众仍是原有塞尔特教会的简朴信徒。

4、爱尔兰人基督化

“爱尔兰使徒”帕提克（St. Patrick）曾在 16 岁时被俘虏到爱尔兰为奴，6 年后才逃回到故乡英格兰。432 年，他再度回到曾经被掳为奴的爱尔兰宣教，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归信基督教。他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及修道院，培育出许多人才。后来在 6、7 世纪，这些修道院成为欧洲宣教的主要基地。

5、德国人基督化

波尼法修（Boniface）在 8 世纪初前往德国宣教，并在 722 年被封为主教。当时日耳曼人奉大橡树为陀尔神（Thor）和树神。波尼法修就将大橡树砍下，藉此引领迷信的日耳曼人信主。他在 40 年间也设立了几所著名的修道院，并教导当地人畜牧、农业等技术，为德国教会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图 2.26 波尼法修砍倒橡树，立上十字架的标志

6、荷兰人基督化

692年，英格兰宣教士卫利勃罗（Willibrord）在法兰克王的支持下开始到荷兰宣教，并在乌特勒克区（Utrecht）设立修道院，但多年后才有些人归主。他先后设立了四间修道院，以作为宣教中心。波尼法修也曾短时间在荷兰宣教，最后于754年在荷兰殉道。后来查理曼大帝以武力征服了萨克逊人及荷兰的弗里斯兰人（Frisians），并强迫他们归信基督教，荷兰才真正完全基督化。

7、斯拉夫人基督化

861年，东罗马帝国派两位出生于帖撒罗尼迦的希腊宣教士司瑞尔（Cyril）及美梭丢（Methodius）兄弟两人赴莫拉维亚（今捷克）的斯拉夫人中间宣教。他们使基督教信仰在莫拉维亚真正扎根。865年，保加利亚王就受洗了。他们以希腊文字母为基础，发明了斯拉夫文字。

8、斯堪的那维亚基督化

• 北欧一带的野蛮民族维金人所到之处哀鸿遍野。831年，“北欧使徒”安斯卡（Ansgar）奉教皇之命前往瑞典及丹麦宣教。他花了将近40年时间在瑞典及丹麦耕耘，但直到934年丹麦国王才终于在德国国王的压力下信主。

虽然这些人传的福音已有天主教的色彩，并非保罗所传的纯正的福音，这些地区所谓的基督化也只是成为天主教会的领地，但我们仍纪念他们为基督教的传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他们不仅在文化上做出贡献，他们所传播的信仰也不乏福音的核心内涵，使基督教给世界带来光明。

第四节 有形教会偏离正路

1、主教制演变成教皇

帖后 2:3-4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从大主教利奥一世开始，罗马教会及其主教的地位在教会中逐渐提升。特别是在世界动荡的年代，人们以为教会中要有一位像外邦君王一样的英明领袖来领导他们，教会便更能平安和强大。其实，教会的君王一直都有，那就是元首基督。可是人们多么愿意有一位看得见的统帅，这就是人骨子里对上帝作王的厌弃。况且，此时的教会大多数是假信徒，他们自然要将世界上争名夺利的罪恶引进教会。因此，罗马主教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2、第一位教皇大贵格利生平

贵格利一世（格里高利一世，540—604年）是中世纪教皇国的创立者，被称为“中世纪教皇之父”。在他以后教会完全沦为天主教。

540年，贵格利出生于罗马元老院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他的曾祖父在483年被选为罗马主教，即菲利克斯三世，他的父亲也是教会辅祭。573年，贵格利被拜占廷帝国任命为罗马城执政官。由于受隐修生活的吸引，在任执政官一年后，他便走上了弃官隐修之路。他把全部家产捐给教会，大建隐修院并自愿成为修士，还接济穷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在教会中的声望。约586年，他在罗马担任自己创设的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

579年，罗马主教伯拉纠二世任命贵格利为罗马教会七大执事之一。590年，罗马发生大瘟疫，教皇伯拉纠二世染病身亡。贵格利率领祭司和所有圣品人员一面高唱圣诗，一面绕罗马城转行三天，仿效以色列人绕耶利哥的情景，据说当时瘟疫果真消失。当然这样的神迹极容易掺假。一般瘟疫流行一段时间后就呈衰微的趋势，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贵格利的举动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纯粹是迷信之举。然而贵格利的名声却因此大振，不久就被推选担任大主教。从此，贵格利开始励精图治、大展宏图。

593年，伦巴第人再次进攻罗马。贵格利一面以罗马政教两界领袖的身份积极备战，一面与伦巴第人秘密谈判。谈判成功，罗马城再一次免遭劫掠。之后他又用大量财物赎回许多原罗马地土，这时他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罗马保护者。为了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也积极开展宣教工作。597年，贵格利差派奥格斯丁等到各地宣教，结果各地建立的教区都成为“贵格利的罗马教区”。

3、贵格利成为教皇

此时，罗马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仍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拜占廷的中央集权国家中执行宗教的最高权力，但他完全依附于皇帝。与之相对照的是，罗马大主教则相对独立，但大主教上任还需拜占廷皇帝的批准，在一些方面还受拜占廷帝国节制。贵格利便使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支持百夫长福卡斯在拜占廷国内斗争中取得皇位。福卡斯为报答他对自己的支持，承认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会内具有最高权力。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一再提出普世教会需要有一位至高的监督。贵格利起初积极支持约翰的观点，约翰误以为贵格利是在支持自己。待教会会议召开时，贵格利忽然揭发约翰的许多道德品质问题，再加上东罗马皇帝坚决支持贵格利，结果这“普世牧首”职位自然就落到贵格利手中。贵格利立即宣布罗马主教是唯一的彼得传下的教皇，自称“大贵格利一世”，称自己是“众仆人中的仆人”。这种沽名钓誉式的称呼哪里是谦卑，分明是要彰显自己和所有人的不同。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4、贵格利加强教会敛财和修道院制度

贵格利一世开始加强教会及修道院的敛财。根据《圣彼得教产论》的记载，他鼓励修道院积极敛财，使教会的天国事奉转向玛门。

在他写给西西里副管家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者看来不中用的公牛，你应立即出售，这样至少还能从它们身上收回一些利益。所有教会的农具必须在它们年久生锈以前卖出。你应该把所有款项连同账册一起送来。对于教会庄园里的犹太人，如果有人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交款的数目可以减少，以刺激其他犹太人产生同样愿望。

教会终日为积攒地上的财宝而奔波。贵格利也加强修道院制度，以本笃会为代表，制定严格的教规，强调修士的苦修、绝对服从和独身制。

5、教皇贵格利的著作和神学

贵格利的著作有《约伯记解说》（或译《道德论》）、《论神职人员的职责》、《意大利父老生平神迹对话录》。他最特殊的成就是在圣乐方面。

他的许多神学思想奠基了天主教的错谬神学：

（1）明目张胆地提倡偶像崇拜

他在写给马塞尔主教的信中说：“偶像是未受教育者的很好的教科书。”

耶 10:8 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

（2）强调灵感

这奠定了中世纪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

（3）变质说和炼狱说

贵格利主张圣餐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为祭（弥撒变质说的来源），已故圣徒可帮助我们得救。593年，贵格利一世宣布炼狱（purgare）的存在：炼狱的对象是已确定永远得救的人；炼狱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灵魂净化后仍可进天国得享福乐；活人可以补赎功德使已死亡之人的灵魂及早升天。他的种种怪异理论成为天主教的基本信仰。

第五节 拜占庭帝国强大

1、查士丁尼大帝

公元527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被授予奥古斯都尊号，与叔父共同执政。同年8月，查士丁尼叔父去世，他成为唯一的君主。532年，查士丁尼一世镇压尼卡起义，重建圣索菲亚大教堂。529年，他编成《查士丁尼法典》，共12卷，随后又收集历代法学家的论著，共50卷。534年，查士丁尼派贝利萨留毁灭汪达尔·阿兰王国，兼并北非，占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552年，他出兵干涉西哥特王国，占领西班牙东南部。554年，东哥特王国灭亡，这时的罗马帝国几乎再现往日雄风，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内海。

553年，查士丁尼主持了东正教和一性派主教的联合会议，一性派异端因皇帝的偏好再次成为东罗马的正统信仰。

2、崇拜偶像开始——硬币事件

公元695年，查士丁尼二世将基督的像刻在硬币上。从此，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描绘耶稣的形象的图案，这也引起许多虔诚信徒的忧虑。但教会为迎合皇帝的喜悦，帮助辩称：“我们不是为了敬拜，而是为了标志帝国对基督的尊敬。”从此教会的偶像崇拜便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耶稣和使徒的画像渐渐被挂在街市上、教堂的墙上，理由还是：“我们不是为了敬拜，只是纪念。”

3、废除偶像运动

东罗马的利奥三世继位东罗马皇帝。他本是叙利亚人，初为拜占廷将领，后推翻了狄奥多修三世的统治，结束了自711年至717年拜占廷的无政府状态，登上皇帝宝座，开创了伊苏里亚王朝。可能是出于民众对教会繁琐的偶像及崇拜仪式的厌恶，也可能是受一些回教背景的将军的影响，利奥三世宣布废除偶像。726—730年间，利奥三世两度宣布禁止供奉圣像的诏令，史称“破坏圣像运动”。罗马教皇贵格利二世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不过这一切都已无法阻破坏圣像运动的进行。此时教堂已经空空荡荡，人们再次看到敬虔的希望。



图 2.27 清除偶像后的教堂

4、教会彻底陷落

后来的君士坦丁五世、利奥四世仍然奉行前任皇帝清除偶像的政策。利奥四世驾崩后，君士坦丁六世继位。由于年幼，皇太后伊琳娜（利奥四世的皇后）摄政。她却是一个坚定的偶像崇拜支持者。787年，伊琳娜申请教皇哈德良一世合力召开“第二届尼西亚大公会议”，颁布恢复圣像崇拜、具有22条法令的《尼西亚法规》，规定“圣像破坏运动”是异端行为、是应当受咒诅的，下令严禁收藏“异端”和反对圣像崇拜的书籍，如有发现立即加以销毁。他们还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支持偶像崇拜：“所有圣像，包括十字架、福音书等等，按理应受到教会的尊敬。凡是向圣像致敬的，乃是向它们所代表的对象致敬。况且，经常注目于圣像绘图或雕像能使圣像所代表的对象常常留在人们的心中，让人念念不忘，具有帮助信徒维持信仰的良好果效。”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当然《尼西亚法规》里面也有一些正确的内容，例如：（1）大会将有些人主张的耶稣基督按肉身而论不是上帝的亲生子而是“义子”的理论定性为异端；（2）任何人对诗篇不熟就不能担任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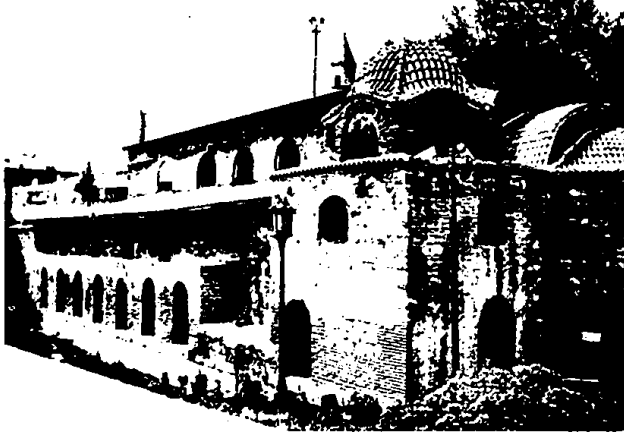


图 2.28 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会址遗址

尼西亚城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兹尼克（Iznik）

此届大公会议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所承认的“第七次大公会议”，也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共认的最后一届“大公会议”。从此，天主教以各样的雕塑、偶像崇拜为主，而东正教则以圣像画崇拜为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大公会议立法的形式强迫人敬拜偶像或圣像，教会已然彻底堕落。现今的天主教每年四旬期第一主日举行的“正统信仰凯旋节日”，便是为了庆祝将圣像画像崇拜纳为正统教义的第二届尼西亚会议。

5、天主教会偶像化的形成

在尼西亚会议后，圣像破坏运动并没有就此完结。813年，利奥五世即位，他也是一位反圣像派的皇帝。圣像破坏运动重新得胜，崇拜圣像的行为再次禁止。843年，米海尔三世（酒鬼米海尔）登位。米海尔只注重外交和争战，将一些朝政事务交给提奥多拉皇后管理。该皇后赞成使用圣像崇拜，立即放逐了反对圣像崇拜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七世，让圣像派的美多迪乌斯一世取而代之。

摄政皇后提奥多拉促使东方教会通过支持偶像崇拜的《尼西亚法规》，再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偶像崇拜。从此，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落入偶像崇拜的泥潭。虽然东方教会不设置雕塑的偶像，但却以圣画代之。正如加尔文所说：“偶像令人的罪恶更加疯狂、更加愚昧、更加污秽、更加亵渎。”从此教会历史进入了黑暗、愚昧、罪恶的中世纪。



图 2.29 科隆大教堂内部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第一章 回教兴起 (632 - 732年)

第一节 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al-Islam)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据统计，迄今为止全世界穆斯林有12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的19.6%，有57个伊斯兰国家，其中30多个国家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伊斯兰教的创建人为穆罕默德。

1、背景

阿拉伯人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原本是相信多神、崇拜偶像。其首府是坐落在古商道南北交通中心的麦加，麦加因受过境贸易之利发展为繁荣的商业城镇。麦加古莱什部落的商业贵族执掌着多神崇拜的中心——克尔白（“克尔白”是阿拉伯语，意为“立方体”）神殿的管理大权，垄断了麦加的商业贸易。当时克尔白神殿供奉着360多尊各民族部落神的偶像，人们定期向其祭祀、祈祷和献牲。

6世纪时，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半岛，其独一无二神的信仰和《圣经》对伊斯兰教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2、穆罕默德早年经历

穆罕默德(Mohammed, 约570—632年)于570年生于麦加城(Mecca)古莱什部落哈希姆家族。穆罕默德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和伯父抚养。早年失学替人放牧，12岁时跟随伯父及商队曾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东岸一带经商，对基督教和犹太教耳濡目染。

由于和犹太人经常有贸易往来，穆罕默德对犹太礼仪也颇为熟悉。25岁时他同雇主麦加富孀赫蒂彻结婚。

3、建立伊斯兰教

受哈尼夫派思想的影响，穆罕默德经常隐居潜修。相传，610年穆罕默德40岁时的一天，当他在麦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中潜修冥想时，安拉派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此后，他宣称不断接受了真主给予的“使命”，开始了历时23年的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他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要求人们信奉安拉，并宣称：如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堕入火狱；归顺安拉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进入天园。他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血亲复仇，并提出禁止高利贷盘剥，行善施舍、赈济贫弱孤寡和善待、释放奴隶等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主张，受到广大下层群众的拥护。穆罕默德根据他的“启示”和传教经历编写而成《古兰经》，并自称是这位安拉的先知。

这个宗教初期遭到上层反对。622年，他逃往麦地那(Medina)，并派出弟子到麦地那的阿拉伯各个部落传教，当地绝大多数居民很快归信了伊斯兰教。十年之内，他就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成了阿拉伯的统治者。

625年3月21日，麦地那的伊斯兰教徒订立了著名的《麦地那公约》，在信仰自由和结盟的基础上同犹太人的各部落达成某些协议，实行和平共处。在实现了麦地那的统一后，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代替部落血缘关系，建立了以“乌玛”（意为“名字”、“国家”）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成为麦地那宗教、政治、军事和司法的最高领袖。他的著名弟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等组成上层领导集团，确定了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于624—627年间，他领导穆斯林武装同麦加贵族进行了著名的三大战役——白德尔之战、吴侯德之战和壕沟之战，并取得全胜。

4、麦加朝圣

628年3月，他带领1600人去麦加朝圣受阻。630年，穆罕默德以麦加贵族违背协议为由，率领一万多穆斯林组成的大军，进逼麦加城下。麦加贵族被迫请降，接受伊斯兰教，并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麦加全城居民宣布归信伊斯兰教。进入麦加后，穆罕默德下令捣毁克尔白殿内的全部偶像，只保留黑色陨石，并将克尔白殿改为清真寺，宣布克尔白为禁地。从此，麦加的克尔白（又称为“天房”）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圣中心。631年末，阿拉伯半岛实现了政治统一。

632年3月，穆罕默德率10万穆斯林到麦加进行了一次经过改革的朝圣。穆罕默德亲自确立了朝觐的一系列仪典，成为以后穆斯林朝觐所遵循的范例。同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至此，伊斯兰教已成为在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揭开了阿拉伯历史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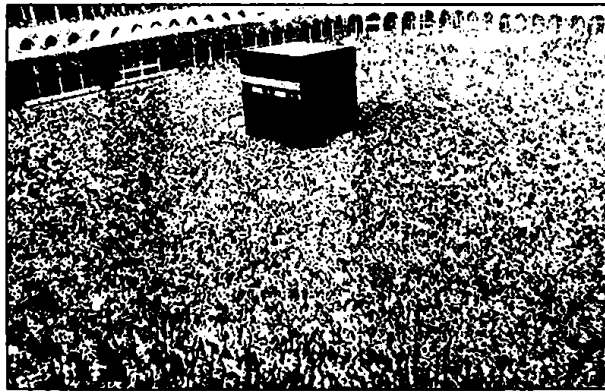


图 3.1 天房朝圣的景象

5、伊斯兰帝国的扩张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弟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先后继承他的事业，称为“哈里发”（意为“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执政的30年间，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史称“伊斯兰教的开拓时期”。

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在位期间，巩固了麦地那政权，并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军，开始对外征战和扩张。

第二任执政者欧麦尔执政时，乘波斯、拜占廷连年战争力量削弱之机，先后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埃及等地。这些地区原本是基督教复兴的基地。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 (644—656) 率 4 万阿拉伯铁骑一举消灭了波斯萨珊王朝数十万大军, 并采取凡归信伊斯兰教者免交人丁税的政策, 吸引被征服地的居民多改信奉伊斯兰教, 使伊斯兰教发展成世界范围内多民族信仰的宗教。

奥斯曼在位期间, 统一了《古兰经》定本。这是在艾布·伯克尔时所辑录的《古兰经》原抄本的基础上, 经再次搜集、反复对照、核订和考证, 编纂成奥斯曼定本《古兰经》, 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向世界的传播提供了经典依据。

阿里执政时, 上层社会发生叛乱, 阿里遇刺。穆阿维叶于 661 年即位为第五任哈里发, 以大马士革为首都, 建立了倭马亚王朝。自此, 哈里发成为世袭制。

自 661 年起, 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时期, 历经伍麦叶 (倭马亚) 王朝和阿拔斯王朝, 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伊斯兰教成为帝国境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经济和学术文化也得到繁荣和发展, 史称“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6、伊斯兰的宗教、文学简介

(1) 《古兰经》

《古兰经》(القرآن) 共有 114 章, 6236 节, 它是穆罕默德在 23 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古兰”一词意为“宣读”, 其中内容多数引用旧约圣经。古兰经和圣经中的名称对照见表 3.1。

表 3.1 古兰经和圣经中名称对照

| 古兰经 | 圣经 |
|--------|----------|
| 安拉 | 神、以罗伊、以利 |
| 真主 | 主 |
| 人祖阿丹 | 亚当 |
| 先知努哈 | 挪亚 |
| 先知易卜拉欣 | 亚伯拉罕 |
| 先知易斯玛仪 | 以实玛利 |
| 先知易斯哈格 | 以撒 |
| 先知叶尔孤白 | 雅各 |
| 先知优素福 | 约瑟 |
| 先知安优卜 | 约伯 |
| 先知穆萨 | 摩西 |
| 先知哈伦 | 亚伦 |
| 先知达伍德 | 大卫 |
| 先知素莱曼 | 所罗门 |
| 先知易勒雅斯 | 以利亚 |

| 古兰经 | 圣经 |
|-----------|---------|
| 先知艾勒·叶赛 | 以利沙 |
| 先知优努斯 | 约拿 |
| 先知宰凯里雅 | 撒迦利亚 |
| 先知叶哈雅 | 施洗约翰 |
| 先知尔撒（麦西哈） | 耶稣（弥赛亚） |
| 尔萨之母麦尔彦 | 马利亚 |

以下是对古兰经的摘录：

第五卷 第四章 妇女（尼萨仪）

74 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

第四十四章 烟雾（睹罕）

51 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52 住在乐园之中，住在泉源之滨，53 穿着绫罗绸缎，相向而坐。54 结局是这样的：我将以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55 他们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

（2）文学

《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在数百年时间中被不断完善。它汲取了印度、希伯来、波斯、埃及、中国和阿拉伯民间文学，许多故事就是根据旧约圣经改编的。



图 3.2 《古兰经》穆萨与法老斗法

第二节 东罗马领地丧失和抵抗

1、领地丧失的原因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逃过了蛮族的肆虐，得以保持一段时期的太平。经过查士丁尼大帝的强盛时期，又在 627 年的尼尼微之役中消灭了波斯军队的主力，几乎除掉

了东罗马帝国的劲敌。但随着教会的堕落、偶像崇拜的兴起，这一上帝祝福的地区逐渐衰落下来（上一部有详细记载）。阿拉伯军队入侵东罗马帝国的领地以来，所向披靡。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强大的罗马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他们不是基督教信仰吗？其实，伊斯兰帝国和从前许多帝国一样，都是上帝兴起的工具，来管教祂的教会。当教会偏离独一真神的信仰，偏行邪路，用偶像败坏自己时，这样的结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申 8:19-20 你若忘记耶和華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華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華你们神的话。

(1) 偶像使教会偏离正统教义，基督教信仰成为偶像迷信

当教会转向偶像的时候，带来的就一定是迷信和愚昧。失去真理，人们便追求神秘、奇迹、经历，什么科学、军事一切合乎理性的东西都被视为没有信心的表现，教会终日陷于偶像仪式之中，反倒不如回教理性，注重军事和战术。阿拉伯帝国从兴起到扩张，与拜占庭军队共进行了五场大规模战役，分别是：636年雅莫科河之战、637年的铁桥战役、740年的阿克罗农之战、763年的安奇阿鲁斯战役、811年的普利斯卡战役。五次战役中除两次胜利外，拜占庭军队节节惨败。

例如，636年雅莫科河之战（Battle of Yarmouk），是拜占庭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关键之战，最终拜占庭将领希拉克略在此战中败给了“安拉之剑”哈立德。战争地点位于今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加利利湖东南部的雅莫科河附近。初期，双方实力相当、胜负难分，但东罗马的教会组织了一支由祭司、神职人员率领的队伍，穿着祭司的服装。这支几万人的特殊军队由鼓号带头，士兵不拿武器，纷纷举着十字架、耶稣画像，企图仿效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的情景。于是，这支队伍吹奏着圣乐，径直走向阿拉伯的军队，结果可想而知。阿拉伯骑兵冲过来的时候，拜占庭军队所期望的神迹没有出现，战斗变成了毫无抵抗的屠杀，拜占庭士兵的尸体堵塞了雅莫科河数日。



图 3.3 战场附近的雅莫科河河段

此战役后拜占庭失去了富庶的叙利亚行省，东方教会的四大教区之一安提阿教区就被穆斯林占领了。今天从圣经和教会历史中读到的安提阿教会就这样从这片流淌过恩典礼物的土地上消失了，令人潸然泪下，这都是教会偏离圣经、背约的结果。

(2) 修道主义和鄙世观的影响

当阿拉伯的青壮年男子踊跃参军进行圣战的时候，东罗马的成千上万青年人却纷纷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隐退、进入修道院，不再关心所谓世上的事，这使东罗马的军队力量大为削弱。此外，政府、教会醉心于圣诞节等宗教活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军事装备、战术、将士培育都远不如阿拉伯帝国。而且那种视今世的一切物质为魔鬼工具的世界观，只会带给人消极厌世、不积极工作和战斗、不尽自己在世上本分的遁世离俗的思想，所以东罗马的战斗几乎不堪一击。这样的信仰看起来似乎是很属灵、不爱世界，却使教会丧失大片禾场，不用说福音曾经复兴的基地一个个丧失，就是君士坦丁堡也岌岌可危。当我们读到保罗三次布道的一些地方、几次大公会议的情景、教父们洒下血汗的那些地方时，这一切都犹如昔日的梦境一般。试看今天，回教已经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和领土，现今这广大的土地全是头缠白布、身穿白袍的穆斯林，教会极难再在这些地方兴起。愿上帝再复兴祂的教会，愿天国早日降临！

2、铁锤查理

(1) 都尔之役（又名“图尔之役”，Battle of Tours）

到了8世纪初，穆斯林军队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侵入伊比利亚（现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半岛，并于711年夏，击败了当地的西哥特人（Visigoth），建立了占据伊比利亚达七百余年之久的伊斯兰教政权。如果他们继续北上，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第一道防线——法兰西帝国（法兰克王国）。

从711年至718年，短短的七年时间里，伊斯兰教势力在伊比利亚急速地扩张。穆斯林军一路弯刀指处，所向披靡，侵占了几乎整个西南欧洲，并继续再向北迈进。

732年，穆斯林军在倭马亚王朝安达卢斯省总督阿布得·厄尔·拉合曼（Abd er Rahman）的指挥下，北上翻过位于西南欧和西欧法兰西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Pyrenees），侵入法兰西境内。穆斯林军队所到之处攻城掠地，烧杀抢劫，特别毁坏了诸多基督教堂。是年秋，拉合曼的军队人数达四十万之众，向图尔城开进。

法兰西宫廷长（宫相 Maior Domus）查理率领一支法兰克军队到达了图尔城，与拉合曼的穆斯林军在城外形成对峙局面。查理（686—741）出身法兰克王族，在法兰克人中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图尔之战时，查理所率领的法兰克军人数约为75000人，其战斗主力多为重装骑兵。会战即将展开之前，查理采取防守的战术，与步兵一同组成重装的方阵，以发挥重装骑兵的优势。



图 3.4 图尔战役

10月25日，穆斯林军与法兰克军对峙七天后，终于在图尔城外展开了大会战，穆斯林军主力轻装骑兵向法兰克军全力发起冲锋，企图将法兰克军一举击垮。与此同时，查理指挥的法兰克重装步兵和已下马的重装骑兵将其盾牌相连，结成紧密的方阵，长矛长剑指向阵外，严阵以待。一时间，沙尘滚滚，喊声震天，在法兰克军如同城墙般的盾牌、森林般的长矛长剑的方阵面前，以往战无不胜的穆斯林骑兵伏尸数万，流血千里，但拉合曼岂肯罢休？于是命令又一次冲锋，未获成功，又再次进攻，如此激战了整整两天。穆斯林军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士气受挫，于是退至己方大营，法兰克军也不追赶，战斗遂告一段落。

次日，正当两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查理悄悄地派出一支快骑，绕道从背后偷袭穆斯林军的大营。当时拉合曼率领的穆斯林军，在征战了半个法兰西后，抢掠的大量钱财均带在身边，原来中古时代的穆斯林军队还保留着阿拉伯沙漠民族的习性——即使在远征时也要带上私人全部的家当财物。所以当法兰克军袭营劫财的消息在穆斯林军队里迅速地传开时，穆斯林全军一时斗志顿失，纷纷朝自己的大营退去。于是查理下令法兰克全军随后追杀，穆斯林军的主帅拉合曼被杀死，穆斯林军队更是士气全失，于是全军大溃，人马自相践踏，查理率法兰克军趁势一路掩杀，穆斯林军死伤无数，向南方全面败退。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图尔之战，以法兰克军的大胜而告终。

这场战役，法兰克军损失约一万五千人，穆斯林军的伤亡竟达三十七万。图尔之战后，查理又乘胜追击，在柏利（Berre）河与拿旁（Narbonne）两次打败穆斯林军，终于将侵略者悉数逐出法兰西，一直把其赶回到了比利牛斯山以南的伊比利亚，夺回西班牙领土，从此查理被称作查理·马特尔（Charles Martel），意为“铁锤查理”，象征他将入侵略者击得粉碎。

这场战役有效地遏制了伊斯兰帝国的侵略步伐，使基督教保住了西欧的领地，形成了当今基督教社会和伊斯兰教社会在地中海北南两岸分海而处的格局，可谓是影响深远。英国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说：“假如查理的法兰克军队在图尔之战中失败的话，如今牛津大学的学生所研习的课程就只有《古兰经》了。”

3、查理的国家改革

查理不久便成为法兰西的实际统治者，他将许多圣经知识用于国家建设，使欧洲发生巨变。

(1) 政治：采邑制

采邑制是对土地占有形式的改革，即将土地及对当地农民、士兵的管理权柄一起分封给有功劳的人或家族中被封的人（称为封臣），以服兵役、保护国家为条件，土地供其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这使整个西欧世界很快进入封建制度之下。这种方式来源于旧约《约书亚记》的封地制度，这样的分封减少了大范围的中央集权制的弊端，使得国家日趋稳定和强大。

(2) 推广重犁

由于当时欧洲人口稀疏，大片荒地需要开垦，并且当时以单独犁杖为工具的方式效率有限，所以查理将圣经中巴勒斯坦地几只牛“同负一轭”的方式推广使用，称之为重犁，使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欧洲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图 3.5 农民用重犁耕地

(3) 三圃制

查理根据旧约《申命记》中安息年的教训，将欧洲的耕地划为条形。耕地大致被分为春耕、秋耕、休闲三部分，轮流春播、秋播、休闲。每一块土地在连续耕种两年之后，可以休闲一年。这样不仅使土壤可以休养生息，同时也避免了病虫害的连续传播，使欧洲连年大获丰收，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欧洲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进入了现代文明。

这让我们再次看到，圣经虽然主要是教导我们得救并赐给我们生命的圣言，但其中关于普遍护理的知识也是充满无穷宝藏。所以一个君王若能以敬畏谦卑的心来诵读查考圣经，不仅自己蒙福，周围的环境甚至土地都蒙受祝福，可是历世历代能有几个像查理这样的君王呢？

诗 33: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第二章 教皇国产生

第一节 加洛林王朝兴起

1、丕平赠土

751年，伦巴第人攻陷东罗马帝国控制的意大利拉文纳地区，直接威胁着教皇所牧养的罗马公国。此时，东罗马帝国名义上是教皇的保护者，但实际上东罗马帝国的注意力已集中于东方，且远离罗马，无力为教皇提供保护。于是，教皇便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支持力量，于是转向了当时比较强大的法兰克王国，要求与法兰克王国结成政治和宗教联盟。查理马特尔的儿子宫相丕平三世，又称“矮子丕平”——这位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独裁者就成为罗马教皇首先要讨好的对象。教皇便不断派使节向丕平表达好意。

丕平也通过地区主教向罗马教皇扎卡利亚斯捎去了口信：“法兰克国王虽属王族，可除在公文上签名外实际已经没有任何权力，只会照宫相的吩咐办事。”教皇为换取丕平的支持，表示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

751年秋，丕平在苏瓦松举行王国大会，教会为其涂抹圣油，赐予王权，而克洛维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希德里克则被剃掉头发，关进了修道院，“矮子丕平”开创了法兰克加洛林王朝。

753年冬，教皇史蒂芬二世冒着风雪穿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法兰克王国，丕平十分尊敬地恭迎了教皇，并象征性地为其牵马。国王与教皇签订了一个旨在“互相协助，互相保护”的盟约。史蒂芬二世重新为丕平举行了加冕典礼，并赐给他的两个儿子罗马贵族的头衔，教皇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法兰克国王，违者将被逐出教会。”丕平承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征服的意大利土地，划出拉文纳至罗马的狭长地带，捐赠给罗马教会。

754年，丕平率兵护送教皇返回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对伦巴第国王拉赫斯展开一场恶战，直到伦巴第国王保证归还教皇领地拉文纳以及归还教皇的全部罗马财产为止。但在丕平退兵之后，伦巴第国王并未遵守诺言。

756年，丕平两次率军南下，挥戈进入意大利，并且彻底征服了伦巴第王国，把它夷为平地。到了756年末，丕平已平定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丕平兑现了承诺，将征服的拉文纳、利米尼、具沙罗等二十二个城市献给了罗马教会，史称“丕平献土”。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将主耶稣的教训完全忘记，不甘再在地上做一个没有钱囊口袋的群体。从贵格利一世开始，教皇们已为拥有大量财富而努力，现在又觊觎世上的权力。他们不但要管理教会的事务，还要成为属世的统治者。为了这个目标，教皇从此便与地上的君王搅浑在一起，这是教会被掳巴比伦大城的开始。

启 17:2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2、查理曼统一欧洲

768年，丕平病逝，按照遗嘱划分遗产。10月9日，丕平的儿子卡洛曼在苏瓦松即位，另一个儿子查理也在努瓦永登基为王。771年12月4日，卡洛曼去世，查理合并了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父亲的全部国土。查理一生酷爱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他一生的征战过程中，不仅抵制了回教的扩张，也把天主教推广到了所有被征服的土地上。在查理以前，法兰克王国的疆土只限于高卢的一部分，查理通过东征西讨，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包括今天的法国、瑞士、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奥地利以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克罗地亚、捷克和波希米亚、匈牙利等大部分地区。自从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欧洲还没有这么广阔的疆土被一个国家控制过。

799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因与当地贵族发生矛盾，引起贵族叛乱，只身一人逃出罗马向查理求救。800年，查理又一次率兵进入意大利，镇压了叛乱，恢复了教皇利奥三世的职位。

800年12月25日圣诞节，查理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突然被利奥三世戴上了皇冠，并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教皇高声宣布：“上帝为查理皇帝加冕！愿这位伟大的、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万寿无疆和永远胜利。”接着，罗马的贵族们开始高声赞颂那历史性的诗文：“奥古斯都·查理！”教堂内欢声雷动，欢呼查理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从此“查理国王”变成了“查理曼”，“曼”就是大帝的意思。

查理加冕标志着西欧不再是东罗马帝国的附庸。812年，东罗马皇帝米海尔一世（Michael I，811—813年在位）的特使在收到《亚琛条约》的文件时，欢呼拥戴查理为皇帝，这是五百年以来东罗马帝国第一次承认另外一位罗马皇帝。此时似乎已经灭亡了三个多世纪的西罗马帝国再一次死灰复燃。



图 3.6 拉斐尔的壁画《查理曼的加冕礼》，现存于梵蒂冈博物馆

3、查理曼带来的加洛林振兴

查理曼在位期间，制订了《加洛林书》，规定了罗马教义和宗教的基本仪式，指派阿尔古因组织人员在797—800年对当时收集到的各种圣经文本进行校勘，他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校译成同样的拉丁文版本，成为后来天主教通用的定本。同时，他还授权阿尔古因对基督教的文献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规》等）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其中的圣经抄本是在几个古代抄本发现之前最基本的圣经抄本，还有些抄本包括福音书的插图和绘画，几乎都是描绘基督及其使徒的形象。不仅如此，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还模仿当时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和修缮了很多精美的宫殿与教堂，典型的亚琛大教堂。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大多是以拜占庭建筑为样本的“巴西利卡”式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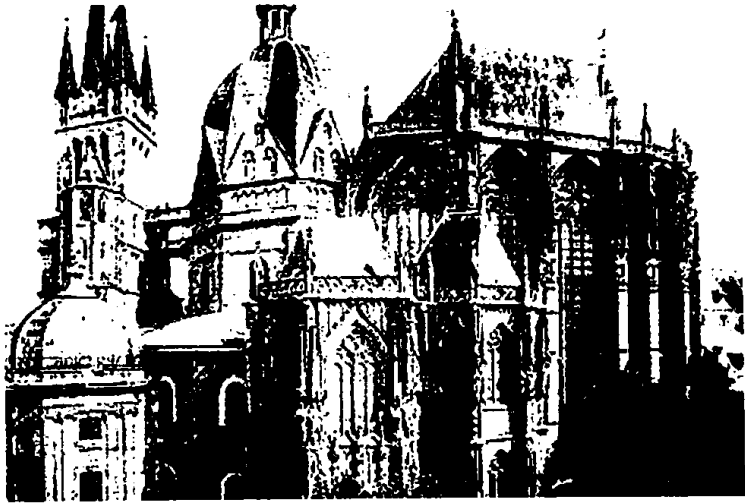


图 3.7 亚琛大教堂

查理也重视法律和教育。他兴办学校，欧洲的大学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查理曼要求每一座教堂和修道院都要设立学校与图书馆，用拉丁文传授“七艺”，即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七艺”的课程后来发展为较完备而独特的欧洲课程体系。

尽管查理大帝的这些成就推广了天主教信仰和文化，奠定了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基础，但与回教肆虐相比，这些成就对教会确实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同时也预备了宗教改革迅猛传播的文化土壤，就如希腊文化的统一也为使徒预备了传福音的文化基础一样。



图 3.8 查理大帝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3、查理后欧洲的雏形

查理在他的遗嘱中规定将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丕平、敬虔者路易和小查理。但由于丕平和小查理分别于810年和811年去世，路易于814年得以继承其父的皇位。在830年初的一次宫廷政变中，敬虔者路易被他的儿子们扣押，丧失实权。路易死后三年，洛泰尔一世、秃头查理和小路易瓜分了帝国领土。经过连年争战，三者在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三分，法兰克帝国结束，形成后来的法兰西王国、意大利和德国。

第二节 教皇采取各种手段增加权势

1、两份伪造文件

丕平献土和查理曼的加冕大大提升了教皇的权势。对于教皇取得地上权势的圣经依据，教皇们并不难找到，他们随口断章取义地谬用一些经文，声称“主耶稣将钥匙交予彼得，胜过阴间的权柄，何况世上的权柄……”。但教皇还需要有一个法理上的依据来增进他的权势，于是不惜采用欺诈手段伪造两份文件，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骗局，欺骗了全欧洲一千年。直至宗教改革后，骗局才被改教家们彻底揭穿。如果那时有吉尼斯纪录，这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骗局之首！

(1) 《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

《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据称由东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君士坦丁大帝颁发，将西欧的统治权授予罗马教皇西维斯特，因为是他给君士坦丁施洗的（这也属于欺骗，因为是尼哥美地亚的优西比乌为其施洗），由此为教皇高于世俗国王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一文件出现于查理曼大帝之父丕平当政时期，当属教廷与丕平联手伪造。早在15世纪以前就被证实为伪造的——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斯宣称其为伪造文件。而后，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也查证该项文件使用的修辞及文字确实是伪造的。除了这两位之外，奇切斯特主教雷金纳德·波科卡也独自得出类似结论。

从这份文件中的用词可看出这份文件不是四世纪的产物。虽然其中的部分用语符合帝国时代的语言风格，但有些用词仍不属于四世纪，像“采邑制”。面对此事实，教皇庇护二世在1453年写了一篇短函，不得不承认该文件是假的，但坚称教廷依然要从查理曼大帝得到领地，并从圣彼得手中得到管理教会的钥匙，最后他并未公布该文。该文件则成为默认的存在，直到天主教史学家枢机主教巴罗尼乌斯在他的著作《教会通史》（*Annales Ecclesiastici*, 1588—1607年间出版）中才正式提及这一点。

(2) 《伊西多尔教令集》

《伊西多尔教令集》是9世纪的一部教会法汇编，因其中包含伪造文件，故又称《伪伊西多尔教令集》（*Decretals of Pseudo-Isidore*）。根据此文件，主教可以直接向教皇请诉，主教和教皇均不在属世政府辖管之下，宣称教皇权力高于帝王。《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也包括在这份教令集中，因假托西班牙百科全书编纂家兼史学家塞维尔的圣伊西多尔而得名。伪造者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结束加洛林王朝对教会的控制。这部教令集包括律法、教皇书信和会议教令，多数是伪造的。从10世纪末以来，此教令集一直为人们接受，直至17世纪它才被证明是骗人的。

第三节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1、东西方文化背景

395年，狄奥多西将罗马帝国分给他的两个儿子，因而造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各自主政。随着两帝国的出现，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各自成为东西方教会的中心，东方教会以希腊文圣经为基础，西方教会以武加大译本的拉丁文圣经为教会通用译本。圣经译本上的差异，也一定造成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

罗马教皇宣称罗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中居首要地位的彼得所建立的，因此继承彼得的人理应享有一切权力且具最高的优越地位，也就是说罗马教皇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主教，这在迦克顿大会上形成条文。但是，这只是罗马教皇一厢情愿的看法，君士坦丁堡教会并不同意，他们甚至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因为君士坦丁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东方教区是初代使徒建立的大部分教会所在地，而且也是几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地。

857年，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废逐了君士坦丁堡牧首依格那提乌一世（Ignatius I，又译伊纳爵一世），改立心腹佛提乌（Photius）为牧首。而后罗马教皇尼古拉（Nicholas）一世表示坚决反对，宣布佛提乌为非法牧首，革除他的教籍，并宣称依格那提乌才是真正的牧首。不过，佛提乌在东罗马皇帝的支持下于867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与罗马教皇抗衡，并谴责尼古拉一世传播异端，同样也开除其教籍。从此，东西方教会的摩擦正式拉开序幕。

2、教义的分歧

早在544年，拥护基督一性论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颁布：对451年召开的迦克墩会议上关于基督神人二性所下的定义应迁就亚历山大的解释，改成“基督的人性变成在神性之下的人性”。虽然教皇维吉流斯（Vigilius，538—555在位）一度反对，差点把皇帝开除教籍，但因东罗马正在强盛期，教皇只好不了了之。

633年，东罗马皇帝贺拉流斯再次提出此教义问题的新解释，即基督一志说，认为基督确实有一种“神而人”的意志，这样基督人性的意志将不存在。直到680—681年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第六次大公会议，确定基督有两个意志，定一志论为异端。

后来的分歧就是东方教会兴起的“破坏圣像运动”，受到罗马教会的强烈反对。虽然在787年召开第二次尼西亚会议时双方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崇拜方式上仍有巨大差异。再后来仍是教义上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尼西亚信经》中“圣灵是由父（和子）而出”这句话。西方教会认为在《尼西亚信经》里有一个filioque（拉丁字），即“圣灵是由父和子而出”，而东方教会认为没有，并且反对西方教会未经大公会议就加添任何字句的做法。两方教会不只一次互相指控，争议不决。这一词至今仍是东西方教会的重要分歧。另外，在许多其它崇拜礼仪上，分歧也越演越烈：罗马教会圣餐礼所用的是无酵饼，君士坦丁堡所用的是有酵饼；罗马要教士守独身，君士坦丁堡却准许下级教士婚娶；罗马只准许各主教在坚振礼中涂油，君士坦丁堡却准许各神甫均可如此做；罗马准许人在大斋节（Lent）中使用牛奶、奶油和干酪，君士坦丁堡却不许；罗马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剃去胡须，而东方教会则要求保留……

在这些分歧中，那些无关紧要、荒渺繁琐的礼仪之争都是应当废弃的。但至关重要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的，也是深深影响后世教会历史的，就是“和子”句之争。其实，无论是初代大公教会的陈述，还是教父们的表达都在表明圣灵是圣父和圣子在永恒中发出的，这一圣经真理是无可争议的。但东方教会还是未能脱离希腊哲学和俄利根神学的影响，固执地强调“圣灵单由圣父发出”这一错谬，不仅降低了圣子的地位，也割裂了圣道和圣灵的关系。这种割裂，使得东方教会更是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在西方教会，后来还发生了回归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东方教会连宗教改革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圣灵论已完全不在圣经的范畴里。

3、宣教领土之争

862年，摩拉维亚王国摆脱了德意志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控制，取得独立。863年，拜占庭帝国派遣修士西里尔和其弟美多迪乌前往摩拉维亚传教。为了向当地斯拉夫人传教，西里尔和美多迪乌以希腊文字母为基础，发明了斯拉夫文字母，把传教书籍翻译成斯拉夫文字，以便更方便且容易地传教。但是好景不长，西方教会不甘心失去摩拉维亚地区，于是策划推翻了亲拜占庭帝国的摩拉维亚国王，随后以武力征服摩拉维亚，驱逐东方教会的传教士。可以说这次斗争最后是西方教会胜利了。

4、东西方教会的彻底分裂

1054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的钦差大使宏伯特（Humbert）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瑟如拉留（Michael Cerularius）拒绝向他臣服，不愿接受教皇的圣职授任。宏伯特随即在7月16日发表一份文件，亲自拿着教皇革除瑟如拉留教籍的诏谕，放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的圣坛上。瑟如拉留盛怒之下，一报还一报，也革除了教皇利奥九世的教籍。东方教会强调宗教事务应由基督教五大教区的主教会议来控制，而罗马教会则主张宗教事务应由教皇单独管理。东西方教会领袖之间争执不下，最终造成东西方教会分裂为二：东方为希腊教会（现在的东正教），西方为拉丁教会（现在的天主教）。

第三章 教会独立与革新

第一节 教会挣脱世俗政权的掌控

1、法兰克帝国分崩离析

自876年意大利王路易二世驾崩之后，作为加洛林王朝中最年长者的秃头查理继承了法兰克帝国的帝号。秃头查理虽然戴着“罗马人的皇帝”和“奥古斯都”的两顶桂冠，但实际上诸侯们早已各自为政了，秃头查理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秃头”。公元877年，秃头查理驾崩。为争夺秃头查理遗留下来的帝号，法、德、意国的国王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881年，意大利王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获得帝号。888年，胖子查理驾崩，原来在名义上尚且保持统一的法兰克帝国彻底分裂。

在意大利，教皇国所在之地的罗马城只是弹丸之地。因为当时的教皇是由罗马城中的全体圣职人员及民众选举而产生，但这种选举实质上却是由罗马城中的政治势力所左右，选出来的教皇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漩涡中，为他们所驱使利用。

“僵尸事件”（第三章第二节）的教皇司徒反六世死后，意大利各党各派轮流统治罗马，分别指派自己的人当教皇，教皇频频更换。此后的近五十年间，当过教皇的人竟然达十七位之多。

到了奥克塔维安手握罗马城大权时，这位生活放荡的皇帝对自己的皇权仍不满足，干脆自己提名自己当教皇。955年，奥克塔维安居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18岁的他被推举为教皇，自己改名为约翰十二世（John XII），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皇。教皇成了皇帝手中的玩物，著名的“比目鱼”的寓言故事就是讽刺这位皇帝兼教皇的。

936年，亨利一世之子德意志王国萨克森王朝第二代国王奥托一世即位，开始东征西讨，打下大片疆土。961年应教皇约翰十二世请求，奥托一世再次进军意大利，平息当地叛乱，次年2月奥托一世在罗马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由他开始的“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一直传承下来。963年，奥托废黜约翰十二世，立利奥八世为教皇。这也开了由皇帝决定教皇人选的先例，拉开了历史上皇帝与教皇长期斗争的序幕。到1157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腓特烈一世为了显扬他的国威和武功战绩，竟在“罗马帝国”之前增加“神圣”二字，“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从而出现，已逝近千年的罗马似乎又死灰复燃，从此德国逐渐占据了欧洲的霸主地位。

2、德国、意大利争夺教皇控制权

因奥托三世太过年幼，于是先由他的成年堂兄——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二世（Henry II）担任奥托王朝的摄政。亨利二世因觊觎皇位，于是发动叛乱，但最终失败。994年，年仅14岁的奥托三世再次继承德国皇位，这位年少老成的皇帝，其威风和才干不逊其祖父奥托大帝。

996年，奥托三世亲临意大利，其目的是要让教皇为他举行“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礼。当他们到达意大利时，时任教皇约翰十五世（John XV）在罗马染热病驾崩，奥托三世就在罗马大显身手。5月3日，奥托三世便任命自己的私人神甫，也就是他的堂兄弟布鲁诺（Bruno）为新教皇，号称贵格利五世（Gregory V）。贵格利五世是史上第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一位做教皇的德国人。5月21日，贵格利五世主持典礼，加冕奥托三世为“罗马帝国皇帝”。

一个德国人当了教皇，让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非常不满。不久，奥托三世返回德国之后，在拜占庭帝国的暗中支持下，一群意大利贵族在一名叫克瑞申丢（Crescentius）的人领导下，起兵反对奥托三世。他们进入罗马城，逼走贵格利五世，另立了一位教皇约翰十六世（John XVI）。因为约翰十六世的教皇身份不被后世承认，所以他是第一位所谓的“对抗教皇”（antipope）。

998年，奥托三世带着贵格利五世从德国卷土重来，把克瑞申丢叛军迅速打垮，然后直捣罗马城，约翰十六世被德军捕获。德军把约翰十六世送到奥托三世和贵格利五世的面前接受审判。结果，除了革除约翰十六世的教皇之职以外，还将他砍耳剃鼻，刺瞎其眼，割去其舌，剁断手指，最后被押送至德国弗尔达（Fulda）修道院终身监禁。三年之后，约翰十六世惨死于那座修道院中。

贵格利五世重登教皇宝座，却于999年猝死。奥托三世于是又任命他的老师、时任法国兰斯大主教的吉尔伯特（Gerbert）接任教皇之职，号称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是史上第一位做教皇的法国人，他本人也是一位学识渊博、饱谙经史的学者。

到此之止，醉心于恢复昔日罗马帝国雄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已经完全控制了教皇的任命权，也控制了意大利大多地区的政治局势，他还决定长期驻扎在意大利。

可是，这种控制如昙花一现。1002年，年仅22岁的奥托三世因得疟疾而驾崩于意大利。其遗体被护送回德国，埋在亚琛教堂之下，与法兰克帝国伟大的皇帝查理曼的陵柩并睡一处。

3、教皇因世俗政权轮番更换

奥托三世死后无嗣，1002年帝位由“捕鸟者”亨利的曾孙亨利二世（Henry II）（是前一个亨利二世的儿子，分属于不同的帝王序列）继承。亨利二世在离开意大利返回德国之时，掌握意大利实权的图斯库伦党人指派本家族的本尼狄克八世（Benedict VIII）为教皇，虽然本尼狄克八世的为人相当庸俗不堪，但亨利二世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意见，甚至还与之建立了相当亲善的关系。

不久，罗马另一支反对势力用武力将本尼狄克八世逼出罗马，另立贵格利六世（Gregory VI）为教皇，这又是一位“对抗教皇”。本尼狄克八世遁往德国，请求亨利二世救援。1014年初，亨利二世进军意大利，进驻罗马之后，扶持本尼狄克八世复位为教皇。作为报谢复位之恩，2月14日，本尼狄克八世加冕亨利二世为正式的“罗马帝国皇帝”。5月，亨利二世返回德国，除了敦请本尼狄克八世下令禁止圣职人员结婚，且对当时教会事务实行必要的改革措施之外，亨利二世后来就一直很少干涉教皇国的事务。

亨利二世死于1024年，同年，教皇本尼狄克八世也相继死去，图斯库伦家族又推出本尼狄克八世的弟弟约翰十九世（John XIX）充任教皇。1032年，约翰十九世死后，图斯库伦家族又推出本尼狄克八世和约翰十九世的侄子本尼狄克九世（Benedict IX）充任教皇。这叔侄三人要么昏昧无能，要么品行不端，却凭着图斯库伦家族成员的身份而连续占据教皇之职达三十余年之久，其中尤其以本尼狄克九世最为腐化下流。在三人当教

皇期间，整个罗马充斥着骄奢淫逸之风，最终引起了罗马政局的动荡。

4、教会终于摆脱政权而独立

教皇权势尚在悄无声息之中，教会还远未独立。但自11世纪中期开始，教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立性。

教会独立的最早征兆是1059年《教皇选举法》的制定。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的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每遇教皇去世，首先由枢机主教对继任者作全面考虑，然后召集枢机教士会商；此后其他教士和俗人才有对新选举教皇予以追认的权力。这一法规赋予了枢机主教选举教皇的权力，他们组成了“教会元老院”，而世俗皇帝对选举教皇只剩下了空洞的追认权。因此，有人将此法视为教会的“独立宣言”，它使得教皇权位得以从前所受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教会迈出了摆脱世俗政权控制关键的一步。以此为基点，教皇开始着力于统一教会。教皇权势要想增强达到鼎盛，首先就是必须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只有教会取得完全的独立，教皇才能真正地掌管教会。

第二节 教会腐败日趋严重

1、各种节日、巫术仪式被拿来敬拜上帝

偶像带给人的结果除了无知愚昧之外，就是各种节日、仪式、宴乐，和许多外邦宗教一样。天主教除了将圣诞节和复活节定为节日之外，又大量引进其它节日，使人们陷于繁琐的礼仪和荒宴的享乐之中，成为撒但的工具，其主要目的就是借此让人彻底忘记上帝的诫命，将神定规的主日用这些魔鬼的伎俩所替代。

增加的主要有以下节日：棕榈节、斋期、耶稣升天节、圣灵降临节、圣母升天节、仲夏节（纪念施洗者约翰）、冬至日（纪念圣女露西亚）、万圣节（为纪念所有死去的圣徒）、情人节（纪念圣瓦伦丁）、光荣十字圣架（纪念找到十字架）等等数以百计。

2、罪恶很早渗入教会

中世纪教会中罪恶非常猖獗，许多神职人员荒淫无度，且不受律法约束。教会盛行的就是尼古拉（尼哥拉）主义和西门（西拔尼）主义。

尼古拉主义

尼古拉主义指神职人员结婚纳妾，名字取自于使徒时代背道的执事“尼哥拉”，以属灵的背后来形容世上的淫乱行为。这种歪风主要源于天主教禁止神职人员结婚的制度，禁止嫁娶——这种属鬼魔的道理；不但不会给教会带来圣洁，反倒演变成淫乱之风，使教会更加混乱。

西门主义

西门主义指圣职买卖，名字取自《使徒行传》中向彼得购买使徒恩赐的西门。西门没能实现他的妄想，反倒遭受了咒诅。但中世纪的“西门”们却在教会如此混乱之际纷纷如愿以偿，使教会的神圣性遭受最大程度的亵渎。

3、教会的财富剧增

世俗的君王和臣宰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当然也不排除许多人也真是为了信仰和感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恩)和其他各种目的,便把大片土地赠给教会。查理曼曾把72块封地赐给教会,每块从几垧到几百垧不等。虔诚者路易赐了600块,而最初的两个奥托大帝则赐给教会154块。贵族们不仅捐献土地,还捐献金钱、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甚至庄园、田地、森林、葡萄园、牧场、磨坊、牛棚等。

教会土地的第二个来源是开垦无主荒地。中世纪初,经蛮族扫荡,整个西欧一片荒芜,留下了大片无主荒地。教会通过建修道院,占领了许多土地,通过以上合法及非法的种种手段,教会取得了巨额地产。据统计,大约在1200年,教会在英格兰的土地占国土的1/5,在日尔曼有1/3,整个西欧,落到教会手中的土地几乎占全部土地的1/3到一半。这些土地,自格列七世始,悉归于教皇名下,成为教皇财政收入巨大来源之一。除此之外,教会也利用朝圣、圣物崇拜来敛财,从主教法院移到教皇法庭上诉案件的诉讼费,还有赦免费、兼职费等都成为教会聚敛财富的大好时机。到12世纪,教皇还涉足金融及银行业,使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圣彼得教会的钱柜里。这样教皇的全部收入加在一起,自然富过王侯。据1250年统计,教皇的年收入超过当时所有欧洲君主收入的总和,为日后权倾天下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财富的剧增带来了生活的腐化,这是人类罪性的必然结果。那种有衣有食就当满足的基督仆人的形象早已被人忘却,人们看到的尽是雍容华贵,身穿细软贵重衣衫、手拿念珠或权杖的“仆人”。

4、教皇争夺残酷

11世纪以前,教会还处于世俗权力的控制之下,修道院院长、主教以及各地方教会神父均受世俗政权的控制。不仅如此,连教皇权位也受人牵制,他们或成为罗马贵族派系间争斗的政治足球,或由德皇任免,毫无威信可言,不自觉地就变成世俗当权者的傀儡。所以各封建君王势力的争斗,往往演变成教会内部的争斗,使基督的名大受羞辱。

司提反五世(Stephen V)于885年当了教皇。891年,意大利王斯波·莱多公爵基多三世(Guy III of Spoleto)强令司提反五世加冕他为法兰克帝国的“奥古斯都”。此时帝国已完全瓦解,这顶空洞无物的帝号已经没有什么实权相随,却仍有不少人来抢这个浪名。司提反五世无权也无奈,只能屈服于基多的威慑而为之加冕。

司提反五世之后的继任教皇福摩索斯(Formosus)也同样迫于威胁,不得不于892年,将“奥古斯都”帝号也加冕在斯波·莱多的儿子兰伯特二世(Lambert II)的头上,让兰伯特跟基多一道成为父子“共治皇帝”。

福摩索斯不甘过这种忍气吞声的傀儡教皇生活,于次年说服有东法兰克国王头衔的德国王阿努尔夫(Arnulf)出兵意大利,于是,阿努尔夫挥兵以解放意大利的名义进军意大利半岛。895年,攻陷罗马,将兰伯特父子两人的势力赶出了罗马。福摩索斯稍获自由,为报答阿努尔夫的救驾之恩,896年2月,福摩索斯加冕阿努尔夫为“奥古斯都”。同年4月,福摩索斯去世,教皇之位由波尼法修六世(Boniface VI)继任。但几乎与此同时,兰伯特带着意大利军队卷土重来,成功回击阿努尔夫,重新开进罗马城,阿努尔夫撤军退回德国。

兰伯特进入罗马城之后,立刻罢免了只当了十五天教皇的波尼法修六世,同时选立属于自己家族的司提反六世(Stephen VI)为教皇。之后,兰伯特向福摩索斯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

897年1月,在兰伯特的授意之下,司提反六世下令开棺挖尸,就是把福摩索斯已

经腐烂的尸体挖出来，抬到罗马城中的拉特朗大教堂（Lateran Basilica）中。然后，司提反六世主持对福摩索斯的尸身进行审判。因为死人不能站立，司提反六世灵机一动，命人将福摩索斯的尸身扶起，放在教皇的宝座上，然后指定一位曾在福摩索斯手下担任执事者立在审判台上，并由这位执事装模作样地代为福摩索斯辩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司提反六世极尽羞辱之能事。

最后，审判会议一致决议，宣布福摩索斯的尸身有罪，废黜他的教皇称号。从前由福摩索斯任命的所有圣职人员全被免职，又砍去他右手的三根指头（教皇通常是用这三根指头来进行祝福礼），剥去尸身上披着的教皇圣衣，让其披上百姓的衣服，再埋葬它处。刚入葬几天，兰伯特觉得这样还不解恨，又再授意司提反六世把福摩索斯的尸身再挖出来，抛入台伯河。这就是9世纪末发生在罗马教廷中的最为耸人听闻的“僵尸审判”（Cadaver Synod）。

司提反六世的所为很快引起了罗马城内的骚乱。有一群暴乱分子冲到教廷，将司提反六世捉住并投入大牢。此时，兰伯特的军队早已调出罗马城，无法营救司提反六世。司提反六世被勒死于大牢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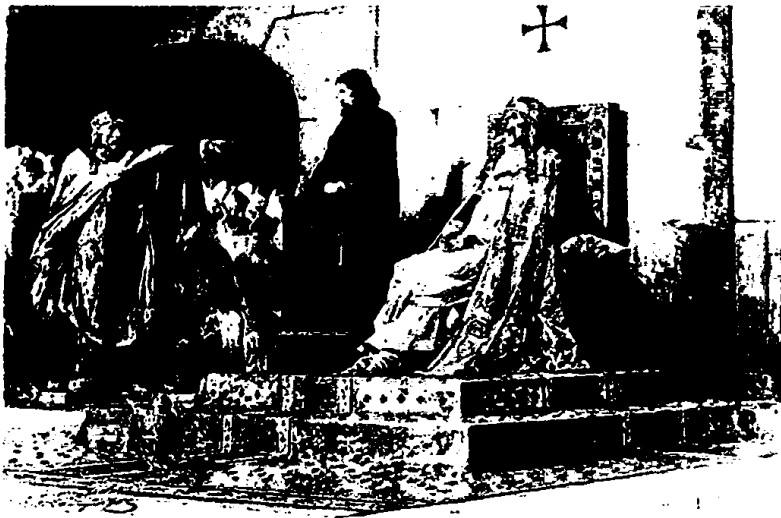


图 3.9 让·保罗·劳伦斯作《教皇福摩索斯和司提反六世》

法国画家让·保罗·劳伦斯画了一幅作品《教皇福摩索斯和司提反六世》，描述“僵尸审判”的情景。画中左边站着抬手进行指控者是时任教皇司提反六世，右边坐在教皇宝座上身着教皇圣衣的是已故前任教皇福摩索斯的尸身，站在台上身着黑衣的是福摩索斯曾任命的一名执事，他代为福摩索斯辩护。

此时的有形教会在地上受尽羞辱，和初代教会为了维护基督的尊荣、前仆后继殉道的壮举形成鲜明对比。但神的教会依然坚立于天地之间，只是这时完全被黑暗笼罩。人们似乎看不见那些不向权势屈服的圣徒的见证。

赛 2:6-9 耶和華，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作观兆的，象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作的。

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第三节 教会克吕尼革新运动

1、修道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兴起

(1) 修道主义在法兰西的发展

修道主义起源很早，2世纪时已形成。到5世纪末6世纪初时，著名的隐士、努西娅的本尼狄克在罗马附近创立了本尼狄克派修道院，形成了一个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本尼狄克派修会组织。本尼狄克本人为该派修道院编立了规条，就是《本尼狄克规条》，这个规条成为后来的修道院组织制定规章的重要参考依据。

中世纪的修道主义有禁欲思想的传统成分，认为人们若借着逃离世界、以禁欲修行的方式生活便能灭灭人的罪恶本性，最终臻达圣洁。后来，这种主义也颇注重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在8世纪法兰克帝国查理曼统治时，法国南方出了一名贵族武士，名叫维帝沙（Witiza）。此人醉心于修道主义的禁欲理想，在779年时，他在法国的阿尼昂（Aniane）一带建立了一所修道院，自己隐身其中潜心修道。维帝沙高举《本尼狄克规条》为尊，以致于后来他本人以“阿尼昂的本尼狄克”（Benedict of Aniane）或“本尼狄克第二”（Second Benedict）见称于史册。维帝沙在修道院中推行《本尼狄克规条》，也得到了查理曼的皇位继承人——虔诚者路易的赞同，这位皇帝还聘维帝沙为其最高修道顾问。约817年，他更是下诏，命令全国的修道院均按维帝沙的榜样实行《本尼狄克规条》，如此一来，九世纪的修道院在道德和灵修方面都有了相当不错的改观。可是，这种改观似乎并不长远，其成效也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崩溃而烟消云散，但因着维帝沙而带来的禁欲思想却在第10世纪初开始复兴，这可以说是因为上文所说的教会腐败日久而引发的反动。

(2) 修道主义奠基在错误观念上

第一、从初代教会开始，人们一直有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苦修=敬虔。其实真正的敬虔是藉着上帝的恩典，以敬畏的心过遵行神律法的生活，而苦修对于治死旧人毫无功效，只能让教会走上假冒为善的道路。教会通过苦修把人的灵性分成高级与低级的看法更是错误的。

西 2:23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第二、他们错误地认为本性罪恶的人可以藉着逃避世界而达到圣洁的地步。

我们的罪性只能通过顺从圣灵而渐渐地治死，而且基督徒今生不可能达到完全。逃避世界，虽然似乎暂时远离了一些犯罪的环境和诱惑，但因里面没有改变，依然使人活在罪中，只是罪的形式不同而已。后来克吕尼运动的失败证明了这点，而且主耶稣从没有吩咐教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正是要在这个世界中见证神的圣洁。所以修道主义是和圣经相背的歧途。

第三、脱离教会，在教会之外再建敬虔国度（加尔文对修道主义的评论）。

人们都有这种骄傲的想法，认为教会腐败了，我就远离，自己建立一个纯洁的教会。

修道主义正是迎合了罪人这种骄傲自大的心里，结果使神的教会蒙受巨大亏损，人们不再看重神亲自设立的教会，而是完全青睐于这些远遁人群的寺庙修所。

2、克吕尼运动原因与背景

(1) 教会的腐败使很多人向往超脱世俗的生活

从10世纪到11世纪，教皇国内政混乱不堪，许多人都欲借外部政治势力夺取教皇权位，多位教皇道德败坏，在教会上下各级所谓的圣职人员中卖职鬻爵，贪墨成风，买卖圣职之事屡见不鲜。教皇之位尚且可以用金钱购得，更何况其它圣职呢？另外，世俗权力也干涉教会事务、介入教会斗争，教会圣职人员纷纷成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势下，一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发起了一场教会改革。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克吕尼改革”（Cluniac Reforms）。这是一场主要由奉行修道主义人士所发起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人们没有回到纯正圣经的教导，反而更深地转向禁欲主义、修道主义。

(2) 真信徒渴慕学习圣经

这一原因是很多史学家所忽略的。虽然教会此时已走入黑暗，但是里面仍不乏上帝的真选民，神的选民离不开灵魂的粮食，就是圣经。由于此时教会醉心于偶像和宗教仪式，很少专研圣经，人们的心灵饥渴困乏，急需圣言的滋润，克吕尼修道运动就给神的百姓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机会。

修道士们若要向众人宣讲上帝的福音就必须具有阅读和理解经文的能力。《本尼狄克会规》中对修士的学习和抄写经文的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懒惰是灵魂的敌人，因而弟兄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手工劳动，在其它时候专心地读圣经，从4点到6点阅读，6点之后用完餐，静默地躺在床上休息，想要读经者可以读经，但不能打扰他人，在星期日，所有人都应阅读。

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使修道士成为了当时唯一掌握真理知识的人，修道院是中世纪掌管神学的场所，使基要的福音真理得以传承。因为教会不能间断，所以真理就不会断绝。

各修道院中设置的大小图书馆对传承西欧文化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蛮族化时期的战乱使大量古罗马时代的珍贵书籍被毁坏，许多有价值的教会文献都已失散，书籍奇缺。克吕尼时期西欧尚无印刷术，抄写圣经和现有书籍并收集到的大量藏书就成了修士们的重要工作。一般修道院都设有图书馆及阅览室，不少图书馆藏书丰富，不仅藏有宗教典籍和神学著作，还有政治、法律、世俗社会、战争、自然科学等领域的书籍，为西欧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知识储备。修道院作为中世纪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对以后真理再一次光照世界做了预备，中世纪的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皆由修道院产生。克吕尼修道院既是西欧文化和知识的保留地，也是中世纪人才的摇篮。

3、克吕尼运动主要内容

公元910年，勃艮第阿奎丹公国的威廉在法国东部马孔不远的克吕尼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严格执行禁欲院规，不受任何主教或政府机构的管辖，宣称自治。地产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不被挪为俗用，但仅受教皇的保护。

克吕尼修道院创立的本意只是想为改善修道主义而树立楷模，但其成效远超当初的想像。在它之后，有许多同形态的修道运动兴起，并有许多已存在的修院亦跟着转型效法、加入克吕尼修道院派系，竟成为在其后两百多年改善教会光景的强大助力，这就是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克吕尼改革运动”。修道院针对当时教会盛行的尼古拉主义和西门主义，制定遵守的院规是按着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本尼狄克会规》，例如：（1）绝对禁止神父结婚；（2）不得实行圣职买卖；（3）非经圣职人员及会众选举，没有人可担任教会职务。

4、修道士生活

最初的克吕尼修士的主要生活方式就是修道、读经：每天祈祷7次（约4个小时），从事6—8小时体力劳动，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与教会神职人员的腐化宴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此运动吸引大批人加入的原因。



图 3.10 修女们在种地



图 3.11 克吕尼修士在祈祷

5、克吕尼运动的结果

（1）修道院剧增

以法兰西为例，8世纪时法兰西共有修道院107所，到了9世纪时增加到251所，这正是克吕尼运动的结果。

(2) 修道院规模迅速扩大

9世纪初，巴黎圣日耳曼修道院已拥有地产3.65万公顷，圣乌尔利希修道院属于穷困修道院之列，仍有庄园203处。

(3) 使真教会有所转移

这股克吕尼修道风潮迅速席卷整个欧洲，面对克吕尼所表现出来的敬虔因素，很多真信徒云集于此，因此发出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光芒。人们不再愿意呆在学校、教会里研讨圣经，也厌倦了繁琐的宗教礼仪生活，更想远离世俗争斗的尘埃，所以纷纷放弃自己的工作职业，甚至许多主教都甘愿放弃教职，去克吕尼修道院做修士。另一方面，克吕尼修士被派往各地的教区担任主教甚至教皇，包括乌尔班二世。但这场运动并没有使教会在根本上脱离教义的错谬和偶像崇拜，修道院最终仍堕落成和世上其他教会一样的结局，教会仍然疾驰在迷信的狂热中。

(4) 巩固了教皇地位

克吕尼运动得到教皇利奥九世和德皇亨利三世的大力支持，尼古拉二世等教皇和皇帝也纷纷响应（背后策划者为希尔德布兰），巩固了教皇的威望，由此教皇地位大增。

(5) 结局依然腐化

12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克吕尼派权势显赫、财富激增，以反对僧侣世俗化起家的修道院本身也世俗化了，这个以清贫起家、以圣洁为目的的运动最终也逃脱不了败坏腐化的厄运。所以我们再次看到，成圣是救恩的恩典，绝不是人努力的结果。

耶 13:23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6、教廷组织结构的改革

克吕尼运动也促使了教廷内部组织结构的改革。自从利奥九世在1049年由罗马皇帝亨利三世钦定为教皇之后，他从德国远赴意大利上任。初到罗马，利奥九世深感教会各种弊端的危害，决计以克吕尼派的改革精神来改革整个教会。但他身边绝大多数高阶的圣职人员都是从前操纵教权的罗马贵族顽固派人士，这些本土的顽固派们当然是强烈地反对这位空降自德国的外地教皇。于是利奥九世通过设立枢机院排除了异己，也排除了顽固派的干扰，其后大力提倡教会改革事工。他还到处旅行，举行各种宗教会议。比如他在罗马召开复活节会议，声讨西门主义份子和尼哥拉主义份子。在法国兰斯举行的会议上，他又对于教会圣职的选举做出如下规定：“非得圣职界及信众公举，任何人皆不得升任至教会统治者的地位。”借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利奥九世重振了教皇在西方教会中失落已久的声威。

第四节 教皇和皇帝授衣礼之争

1、希尔德布兰

(1) 成为教皇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又称希尔德布兰德、希尔德兰）于1020年出生在意大利一个穷苦的家庭。从1049年起至1073年止，希尔德布兰在24年中，先后担任了利奥九世、维克多二世、司提反十世、本尼狄克十世、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等六位教皇的总参谋。他是教皇背后真正掌握大权的人、克吕尼运动真正的推动者。

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去世。一部分人拥护希尔德布兰上台。尽管他本人对教皇宝座向往已久，但经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便谢绝这番好意，亲自带领代表团前往德国恭请亨利三世指定新教皇。皇帝根据他的意见，选立维克多二世。新教皇对希尔德布兰非常感激，把他提升为枢机神品。此后，希尔德布兰为抬高教皇的地位和皇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自奥托一世至亨利三世的100年间，德国皇帝一直掌握着任命教皇的权力。1056年亨利三世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尚未成年，司提反九世被选为教皇，但没有与皇帝商量，因此希尔德布兰被派到皇帝身边来取得其支持。希尔德布兰通过皇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支持，但他回到罗马前司提反九世就死了。罗马贵族借这个机会选举了他们自己的教皇本尼狄克十世上台，希尔德布兰与其不合，他在意大利一些封建主的支持下另行组织选举，抬出尼古拉二世，于是又形成两个教皇对立的局面。为了获得军事的支持，希尔德布兰环顾四周，发现只有塔斯卡尼公爵（Duke of Tuscany）是可靠的，只可惜他的力量不够强大。意大利南部有诺曼人，当教皇利奥九世在位时，曾为领土问题和诺曼人交战，教皇战败，甚至被囚。然而，希尔德布兰却以善辩的口才和明智的外交手腕使诺曼人成为尼古拉二世的封侯，并依封建制度条例使他们为教皇提供军事防卫。不但如此，希尔德布兰又为这位教皇获得了意大利北方民族的支持。

在这些强大政权有力的支持下，教皇权位非常稳固，希尔德布兰感到这是解决当时两位教皇问题的良机。

1058年助尼古拉二世上台后，希尔德布兰被擢升为大副祭。他积极协助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4月13日颁布著名的《教皇选举法》，规定教皇只能由枢机主教团选举产生，世俗封建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得干预，并禁止买卖圣职和教士婚娶。

教皇尼古拉二世去世后，伦巴第主教与德国太后爱格妮联合，指派帕尔马主教（Bishop of Parma）继任教皇职位，称为何挪留二世（Honorius II）。而希尔德布兰于1061年扶立亚历山大二世为教皇，又形成两个教皇对抗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德国忽然发生了政变，公元1062年，科隆（Cologne）大主教亚诺（Anno）绑架了德皇亨利四世，并取代太后爱格妮的监护地位。亚诺看出克吕尼改革团体对自己有利，便公开承认亚历山大二世为正式教皇，而使何挪留二世悄然引退。这件事使希尔德布兰再度获胜，因为新教皇在各方面相当成功得益于希尔德布兰强大的辅佐。

我们看出，虽然此时教会已经腐败变质，但由于神的选民仍在其中，所以她仍属于基督教会。神还是在看顾护理着教会，使她能早日摆脱政权的束缚。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希尔德布兰顺理成章登上教皇宝座，只是希尔德布兰未经提名选举，没有按1059年选举法的规定而成为教皇。过不久，红衣主教们举行了一次正式投票，追认此事合法，希尔德布兰取名贵格利七世。

贵格利七世上台后第一个目标就是彻底废止“平信徒授衣礼”。1074年，贵格利七世在罗马召开会议，连发四道通谕，攻击结婚的神职人员，谴责神职买卖行为，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神职买卖必须停止，否则予以绝罚。贵格利七世派出枢机、亲信教士

充任“钦使”，到各基层教区游说，通过钦使直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每个教区，而且开始强烈反对由教皇和红衣主教以外的人颁授神职，从而引发了近百年的“授衣礼之争”。

(2) 莫立教皇的权威

教会和政府事实上是两个平行的组织，它们既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却又相互关联，这两个均是由上帝设立的权柄。历史上两者很少能够合乎中道地各司其职，不是政权逼迫教会，就是教会爬到君王头上欺压君王，因为教会存在于世界之中，信徒既是教会成员又是国家公民，那种所谓政教完全分离的思想更是空中楼阁。也因此原因，要么是神的选民在地上受尽凌辱和试探，要么是皇帝的尊严被践踏得体无完肤。但神是让我们仰望那真正的上帝之城——天家，在那里这两大权柄将由基督一人掌管，各种职分权力都在基督里同归于—。

东方的教会一直以来是在政权之下，东罗马皇帝全权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及东方希腊教会，但在西方这个问题造成严重的冲突。贵格利七世相信教会是上帝建造的，其目的是将全人类组织在一个单一的、执行上帝旨意的社会中，因此教会理应高于任何人间机构，尤其高于国家，而教皇作为教会的首领是上帝在人间的统治者，因此任何对他的不服从也是对上帝的不服从，也就是背离基督。他在罗马修道院修习时，又浸染在克吕尼革新理想之中，终其一生，这些理想给他强烈的启发，而且深植在他本性之内。

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源自“上帝之城”，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希尔德布兰深信，神所预备并指派为这国度实现的代理者就是教会。他进一步深信，教会的头——教皇本身，就是基督的代表(Christ's vicar)。在他的观念中，教皇高于一切，包括王子、国王、皇帝及所有人民，而教皇只向神负责。

2、授衣权之争

授衣权就是将象征主教职务的圣服授予候职者的权力。到底谁有这权力？是世俗君王，还是教皇本人？这是教会是否完全摆脱政权统治的最关键的一步。

只要属世权势有能力指派并授权给主教，那么这些被指派的主教就必然要替他们的属世领袖卖力，而不会为教会效力。

从皇帝的角度而言，他们不能放弃“授衣权”，因为这样会大大削弱他们的势力。在当时，封建制度仍然继续，单单德国就分成好几部分，分别被许多公爵、侯爵及贵族们辖管。他们之间经常冲突，但他们若联合起来，势力往往大于皇帝。而主教们及修道院院长也是封侯之一，藉着这批人的帮助，皇帝就有力量对付贵族的势力。如果皇帝失去“授衣权”，就等于失去对主教及修道院院长的控制权，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他便很可能被贵族们夺去皇位。

如此，对教皇及皇帝而言，“授衣权”变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件。教皇若得不到这权柄，就不能改革治理教会；皇帝若没有这权柄，就有失去帝位的危险。这两方面的挣扎已经累积多年，为了争“授衣权”，教皇贵格利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终于爆发了火势凶猛的大摩擦。

3、教皇革除德皇教籍

德皇亨利四世于教皇贵格利七世在位的头两年，表面上与他保持友善关系，后由于有一些贵族反叛，德皇局势危机，于是教皇贵格利七世趁德皇势微之际，于1075年再度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禁止“平信徒授衣礼”。然而，就在同一年下半年，亨利四世在对其他诸侯的军事上大获全胜，整个德国局势改观。亨利深信自己有够强的力量反抗教皇，便公然违反教皇禁止“平信徒授衣礼”的宣告，而给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教皇对此事的反应十分激烈。

公元1075年12月，贵格利发了一封信给亨利，以严厉的口气表达他心中的忿怒，于是教皇与皇帝之间形成对敌的情势。

信上一开头写着说：“神的众仆之仆贵格利主教写信给亨利国王，愿问候及使徒祝福临到他，也就是说，如果他顺服使徒座位、配为基督徒国王的话。为了使徒首领圣彼得所托的事奉，我们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当用什么严厉之言，在此犹豫地给您使徒的祝福……”

教皇在信中继续指出国王许多罪状，并提醒国王，他是在圣彼得及圣彼得继承人教皇之下，贵格利又劝他不要为最近的胜利而骄傲。贵格利对亨利说，由于他的违规，必须被革除教籍，并从国王的地位免职，除非他悔改，否则就要受罚。

当国王亨利收到该信时，他正为不久前的得胜而兴奋。这年轻、傲慢、顽固的国王，读完这信便勃然大怒。

1076年1月24日，他在沃木斯召开主教会议。在国王的命令下，会中宣布不再尊贵格利为教皇，并写信将此决议致达教皇。

信上一开头写着说：“非藉篡位乃藉神手按立的国王亨利，写信给目前不是教皇而是一个伪修士的希尔德布兰。”信中指贵希尔德布兰以非法手段篡取教皇职位，国王亨利根据希尔德布兰当日不寻常地被拥立为教皇的事实，作出如此的结论。国王的信继续写道：“因此，我们全体主教定你有罪，必须从你所篡的使徒座位上下来，让其他不假借宗教外衣、不运用暴力、只教导圣彼得纯正教义的人，登上圣彼得宝座。”

可想而知，教皇必定立刻采取行动。2月14日，在罗马一个会议中，教皇严肃地宣布革除国王亨利四世的教籍。

教皇在他的宣判上写着说：“圣彼得啊，恳求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你的代表，得着你从神而来的权柄，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凭着信，也为了保全教会，并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者的荣耀，藉着你的大能和权势，我褫夺皇帝亨利三世之子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因为他以前所未闻的侮辱抵挡你的教会。凡和亨利四世所订的誓约，无论过去或未来，均归无效，我在此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

4、德皇前住意大利

德皇也颁了一道谕令，给罗马百姓，以激烈的口气要求他们将“修道士希尔德布兰”逐出罗马城。在这同时，教皇也写了一封信给德国百姓，叫他们另选新王，除非亨利悔改。德皇的谕令没有罗马人理会，而教皇的要求却在德国掀起了热烈的反应。封建贵族们很高兴他们有借口可以不再效忠德皇，由于德皇高压式的统治，德国百姓都很恨亨利。

公元1076年10月，德国贵族们举行一次会议，大部分人主张立刻废黜亨利，全体都希望将他降卑。最后贵族们决定第二年2月在奥斯堡再举行一次会议，由教皇亲自主持。在那次会议中，他们将给德皇亨利一个机会澄清罪名。如果一年之内，教皇贵格利还没有取消革除亨利教籍的宣判，亨利就将失去王位。这段期间内，他将被软禁在斯拜

尔 (Spires) 城中。

这时亨利处在非常危急的境况中，他可以感觉到皇冠正在往下滑，为了挽救王位，他愿意做任何事。因此，他给教皇写信说：“谨遵臣民之意见，本人愿意从此尊重并顺服使徒职任及您教皇贵格利。既然本人已被判触犯重罪，愿意呈上无辜之证明，或接受惩罚、或遵行您所规定，足以抵罪的补赎之礼。”“革除教籍”就是从教会的会员中被除名。当一位国王被革除教籍时，他的臣民可以不必再听从他，他就失去了整个国家。若要挪去“革除教籍”的宣判，恢复教会会员的身份，就必须得到教会的宣赦令。在宣赦之前，这个人必须先行补赎礼并呈上悔改的证明。

在中世纪，行补赎礼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补赎礼有一定的方式及习俗，补赎时，悔罪的人必须穿上某种衣着并且禁食。

亨利必须在一年内获得教皇的宣赦，取消“革除教籍”的判决。因此他设计逃出斯拜尔城，带着妻子白莎 (Bertha)、小儿子及几个忠心的随从，前住意大利。在酷寒的冬天，冒着刺骨的冷风，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

在这同时，教皇正启程北上，前往参加奥斯堡会议。当他行过塔斯卡尼时，他听到谣言说，亨利带军前来，于是贵格利转道避入卡诺撒堡 (Castle of Canossa) 的坚固城墙中。

1077年1月25日，亨利爬上卡诺撒堡的山坡，敲打城堡的外门。外门开启，有人领他穿过第一道围墙及第二道围墙的墙门，但第三道墙门却仍关闭。亨利在第三道墙门外的庭院中，整整站了一天，全天禁食，在他衣服外面罩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寒冷的雪地上。日暮西沉，大门仍然紧闭，这一天他不得进入。



图 3.12 亨利四世在雪地上等候

第二天早上，亨利再度出现，又是一整天赤足站在雪地上。夜晚来临，第三道门仍不开启，亨利只得回到他简陋的临时住处。

第三天，亨利再一次以悔罪者身份站立在卡诺撒堡庭院中。漫长的时光，一直拖到中午，仍然没有动静，当下午即将消逝之际，于1月27日的黄昏，第三道门终于徐徐开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启，终于让亨利进入了。在房间的一端，坐着一位身材矮小、外表平凡的老头子——希尔德布兰。他出身寒微，但却是教皇贵格利七世。

走进来的亨利，则为年轻、高大、体格健壮的男子汉。虽然身穿悔罪者装束，仍是令人瞩目的德皇亨利四世。

现在戏剧上演了：德皇流着泪，伏倒在地，他亲着教皇的脚，恳求他的赦免。于是，教皇贵格利宣告赦罪，并解除了他“革除教籍”的判决令。如今人们用“去卡诺撒”这句话代表最深度的降卑。



图 3.13 教皇贵格利七世宣告赦免亨利四世的罪

5、贵格利之死

“卡诺撒事件”并未结束亨利和贵格利之间的摩擦，这仅是最戏剧化的部分而已。

接下来是一片混乱的局面。德国和意大利分裂成两个阵营：亨利在德国的对手们于1077年推选了斯华比亚的鲁道夫（Rudolph of Swabia）为王，于是，在德国有了两位对立的皇帝，于是德国陷入三年内战之中。贵格利七世以调停为名，等待时机。1080年1月，鲁道夫在一次战役中击败亨利，贵格利七世以为德国政局已定，便再次废黜亨利，加封鲁道夫为罗马帝国皇帝。这种见风使舵的措施使贵格利七世在“卡诺撒事件”中建立起来的威望顿时扫地，也使亨利及其支持者大为恼火。1080年6月，拥护亨利的势力在意大利布列克森举行会议，宣布废黜这位背信弃义的贵格利七世，另立拉文那大主教吉伯特为教皇，取名克莱门三世。

此时德国有两位皇帝，意大利有了两位对立的教皇，彼此角逐。

1080年10月，鲁道夫在埃爾斯特战役中阵亡，形势急转直下。1081年春，亨利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围困罗马城。1084年3月21日，罗马城被攻破，贵格利七世不得

不逃到罗马城西北角梵蒂冈天神堡避难。10天后，克莱门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就位，并再次把亨利四世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第二年，与贵格利七世结盟的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向罗马进军，救出了这位教皇。但因诺曼人在罗马城内进行了大肆抢劫，放火烧毁了1/3的城池，使贵格利大失人心。虽然这不是教皇的责任，但罗马人对教皇已经充满忿恨，因此在诺曼人撤走时，他不得不随之南下，不久便死于萨莱诺城（1085年5月25日）。临死前，他说：“我酷爱正义，恨恶罪恶，因此我死于放逐。”

6、沃木斯协约

公元1122年，经过长期疲惫的争斗，终于订下了双方同意的《沃木斯协约》。由教皇在续任主教的“授衣礼”中颁赐属灵职位的象征（戒指与杖），而皇帝则以“权杖之触”颁赐封地。此协约为“授衣礼之争”画上了句号，这个协约基本上符合“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依然掌权，为后来教会走出巴比伦做了预备的工作。

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和东罗马帝国灭亡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的背景

1、教皇要修补东西方的分裂

教会本是源自东方。第一世纪后，在东方举行的大公会议中也订立了许多伟大的基督教信经。教会从东方发展到西方，历经一千年之久，所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都藉着这个相同的信仰而属于同一个身体。

1054年，教会分裂成东方希腊教会与西方拉丁教会。当希尔德布兰于1073年即位教皇之时，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裂已经久远，贵格利七世深盼自己能医治这个创伤。

教会不但内部有分裂，外部也被战争摧残，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敌军征服。回教与基督教同样源自东方，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与北非，再以旋风之速从北非夺取西班牙，直捣法国。若不是732年查理马特将他们截阻在图尔，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数世纪后，阿拉伯人失去了威势，被土耳其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取而代之，土耳其人也是回教徒。1070年，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并且进攻小亚细亚，曾一度严重地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及东方教会的命运。

希尔德布兰急于弥补东西方之间的裂痕，所以在他还是教皇参谋之时，他就十分关心正受土耳其人威胁的东罗马帝国与东方教会。

在危急情况下，东罗马帝国皇帝向教皇乌尔班二世和教皇助手希尔德布兰求救，请求帮他们抵御土耳其人。因为东罗马皇帝有权控制东方教会，所以皇帝应允教皇，如果教皇给与援助，他将终止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东罗马皇帝的请求使教皇大为动心，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教皇以为他可能同时完成三件大事：（1）保全东方教会不致落入回教徒手中；（2）东西方教会再度合一，医好分裂的创伤；（3）建立全球性、宇宙性的教皇统治。这实在是一项伟大而勇敢的计划。

到了教皇贵格利七世即位后，这位中世纪的拿破仑，计划亲自带领五万军人前去“与神的敌人争战，直打到耶稣基督的坟墓所在地”。然而这个计划却因他卷入与亨利四世的“授衣礼之争”而无法实现。

无论如何，贵格利是第一个想到十字军东征的人。虽然没有一位教皇真正亲自带过十字军东征，但后来所有发动十字军的教皇都是受到贵格利的启发。

2、土耳其人阻止朝圣者

到“圣地”（Holy Land）朝拜，是天主教一直以来提倡的宗教仪式。第5世纪时，耶柔米甚至定居于伯利恒。自从东西方教会分裂后，大部分西欧基督徒并不关心回教徒怎样对待东方教会，但他们一想到基督教的圣地被不信者侵占，便感到这耻辱不可容忍。

过去阿拉伯人占据圣地时，基督徒去朝圣并未遭到拦阻，因为阿拉伯人侍朝圣者，

就像今天名胜景区对观光客的态度。朝圣者的钱和回教的钱一样好，他们从朝圣客身上赚取了不少财富。

然而，当土耳其人自阿拉伯人手中夺走圣地后，情况就改变了。土耳其人在宗教信仰上非常狂热，他们憎恨基督徒，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要和朝圣者打交道，不要挣这些人的钱，致使“朝圣之路”陷于困境。朝圣者要冒着很大风险方能实现自己的朝圣活动，于是他们回去后，向大家报告如何遭受土耳其人的恶待。这些报告煽起了西欧信徒心中原有的怀恨，造成一股忿怒的烈焰。这种群情激奋的场面，为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II）打开了发动第一次东征之路。

3、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东征

教皇乌尔班二世自公元1088至1099年在位。他与希尔德布兰完全不同：希尔德布兰身材矮小、相貌平凡、不善言辞；乌尔班出身贵族，高大英俊，相貌出众又善于演讲，虽然他不是一个率领军队的将军，却是一个会激发人心的人。1095年秋，他前往法国克勒门城（Clermont）之前，先让大家晓得他此行要去公开讲论“圣地与土耳其人”之事。因此，当他走上讲台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人山人海、迫切等待的听众。他有力的声调、流利的言辞，震撼了全体听众。他提到耶稣的降生、成长、受洗、在圣地的游行、教导与行善。他使他们看到耶稣的被捉、被钉、死亡与埋葬。他充满感情地描述教主所到过而成为神圣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谈到现在这些圣地正在被异教徒亵渎，朝圣者正在被虐待，听到这些，群众都忿然作色。

接着，他号召他们一同前往圣地去，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与耶稣之墓。他应许所有参加的人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又应许为此圣战而丧生的人可以得着永生。于是群情激昂，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克勒门城，狂热地喊着说：“愿神旨成全！愿神旨成全！”



图 3.14 乌尔班二世激动人心的演讲

教皇把红布剪成小布条，将它们缝成十字形，每一个愿意参加的人，在袖子上缝一个红十字，于是形成了这支“十字军”。十字军是西欧基督徒为将圣地自回教徒手中夺回的远征军。回教徒为传教而打的仗叫“圣战”，现在，西欧天主教也掀起了一场“圣战”，因为这也是为宗教目的，是由教会发起的战争。



图 3.15 十字军队伍整装待发

第二节 十字军八次东征的经过

1、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7—1099年）

1097年，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附近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占塞尔柱土耳其人首都尼凯亚。1098年，又攻占埃德萨和安条克（安提阿），建立起最初的十字军国家——埃德萨伯国和安条克公国。1099年7月，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其他国家，均附属于耶路撒冷王国。十字军为控制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建立了由僧侣组成的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或作：约翰骑士团）。十字军的数次东征只有这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因为这是首次进军，所以战争的目的还算纯净，基本上都是出于宗教的热情，打起仗来也比较勇敢，但以后的东征，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操和业绩了。

2、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下进行的。1144年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埃德萨，是这次东征的起因。德意志十字军最先出动，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军队击溃。同时法国的十字军也失利，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

3、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

第三次东征是因埃及苏丹萨拉丁的军队于1187年在太巴列湖附近战役中击溃耶路撒冷王国军队并占领耶路撒冷而引起的。这次东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统率下进行的。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10万人，穿越整个小亚细亚，沿途伤亡惨重，巴巴罗萨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水死亡，其军队亦随之瓦解。腓力占领阿卡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一定战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塞浦路斯王国，1192年又与埃及苏丹萨拉丁签订和约。因为这个和约，理查得罪了其他十字军国家，不久被法国俘虏，缴纳大量赎金才得以回国。在国内，理查的弟弟乘机叛乱，卫队长罗宾汉却在国内积极维护理查的地位，这就是著名的小说《侠盗罗宾汉》的故事。第三次东征就这样因内部不合而终告失败。

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教皇英诺森三世策划的。十字军原定东征埃及，但后来却改变计划，进军本来要援助的对象拜占庭帝国，攻陷了一座基督教城市——达尔马提亚的扎达尔，1204年十字军竟然又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在已瓦解的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土上建立起几个国家。1261年希腊的米海尔八世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灭亡了这些拉丁帝国，建立了拜占庭的巴列奥略王朝。但此时的东罗马已是奄奄一息。

5、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1年）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是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六世和匈牙利国王安德拉十二世率领奥匈十字军联军对埃及进行的远征。十字军在埃及登陆后，攻占了达米埃塔要塞，但因粮草不继被迫同埃及苏丹签订停战协定并撤离埃及。

第四、五次之间还有一次儿童十字军。教皇总结失败教训，竟然认为失败是由于成人带有罪性，考虑如果用儿童可能会取胜。法国牧童史蒂芬竟真的组织了一支3万人的儿童十字军，而后多数儿童被卖为奴隶，形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惨剧。

6、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年）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进行。这次东征使基督徒于1229年一度夺回耶路撒冷，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攻占。

7、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年）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统率下先后对埃及和突尼斯进行的两次东征，但均遭失败。十字军很快便攻取了达米埃塔，但却陷入被瘟疫折磨的境况。1250年熬过瘟疫后，十字军进攻开罗，但被土耳其将领拜巴尔率领的奴隶骑兵（马穆路克）打败。结果，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杀，路易九世被俘。

8、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为报1250年兵败之仇而发起，路易九世不听法兰西贵族及近臣的劝阻，领导雇佣骑士，进军突尼斯的穆斯林哈夫斯王朝。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不久，全军就染上了瘟疫，一路上大批士兵死亡，路易九世亦染病身亡。路易九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力三世马上下令撤退，十字军撤退，以失败收场。

此后，教皇曾多次号召组织十字军，都未能实现。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历时近200年，原占领的领土，又逐一被穆斯林收复，从北非、小亚细亚，一直到东南欧，都成了穆斯林的势力范围。1291年最后据点阿克城（今巴勒斯坦北部）被埃及占领，耶路撒冷王国灭亡，标志着十字军东征彻底失败。有一部电影《天国王朝》演绎了这段悲惨的历史。

9、十字军东征失败的原因

上帝并未呼召教会组织这样的战争，因那是世上君王的职责。此时教会僭越了自己的权柄，得不到上帝的祝福，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另外，无论是从十字军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其目的和动机都不纯正，掺杂着各种世俗利益，根本不是在为神的国争战。

十字军东征参战者的社会成份十分复杂，因而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极不统一。与十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他们装备有弓弩、马刀，其战斗素质和机动能力都优于笨重的骑士骑兵。

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但教皇的权势非但没有削弱，威望反倒增加了（任何战争都使领袖威望增加）。教会历史被教皇的巅峰历史所遮盖，这也预示着，黑暗越深光明就越近了。

第三节 东征结果：东罗马帝国灭亡

十字军东征结果非但没有遏制回教，反倒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贸易中心和连接欧亚的桥梁，积累了叹为观止的财富。君士坦丁堡战役之前，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就说：“我一生只要一件东西，那就是君士坦丁堡。”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1452年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纷纷被土耳其军队攻陷，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实际已成孤城。

穆罕默德苏丹于1452年4月至8月在波斯普鲁斯海峡最窄一侧的欧洲部分筑起坚固的鲁梅利城堡。1453年春，土军以总兵力超过10万人、战舰320艘的实力，从海陆两面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包围。而君士坦丁堡的城内驻军仅9000人左右，海上仅有一支由20多艘大帆船组成的舰队。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大主教仅凭坚固的城墙便以为城池固若金汤（君士坦丁堡筑有两层城墙，长约20公里，修建了1000年，城外是一条深100英尺的壕沟）。

4月6日，土耳其人用火炮、攻城锤和投石器猛烈破击城墙，并填平壕沟，架设云梯，还在城墙下挖掘坑道。君士坦丁堡军民在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古斯率领下顽强抵抗，粉碎了土军数次进攻。

穆罕默德苏丹又利用乌尔班火炮、地道进攻，但均遭失败。他调动5万军队，并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之间铺设一条长约1.5公里的圆木滑行道，然后在一夜之间将80艘轻便帆船拖上海峡岸边，用人、畜和滑车拉过山头，再从斜坡上滑进金角湾，又在金角湾最窄处架设浮桥，在桥上配置了火炮。5月29日，土军从海陆两面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总攻。君士坦丁堡守军浴血奋战，誓死保卫城堡，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城堡最后被攻陷。延续了上千年的拜占庭帝国至此灭亡。穆罕默德苏丹二世下令将该城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来东正教传入东欧，从此教会的历史就只有西方这一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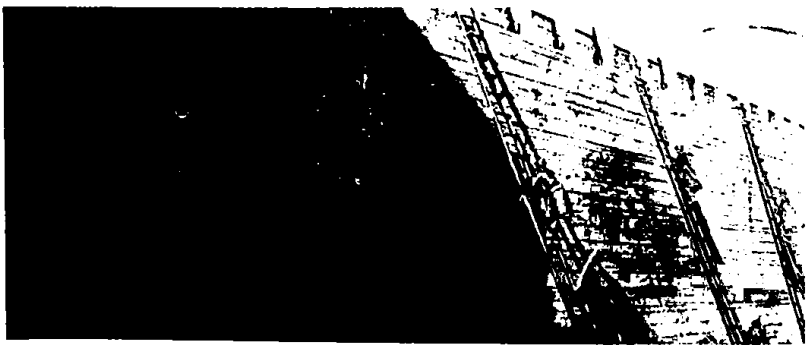


图 3.16 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第五章 教皇权势达到顶峰

第一节 英诺森三世时教会权势达到顶峰

1、德皇腓特烈·巴巴罗萨向教皇屈服

巴巴罗萨又称红胡子腓特烈，“红胡子”的音译为“巴巴罗萨”，因此，他也常被称为腓特烈·巴巴罗萨。他是希特勒最崇拜的人物，希特勒将他入侵苏联的计划定名为“巴巴罗萨”计划。腓特烈的父亲就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士瓦本公爵康拉德三世，1138年康拉德凭借武力加政治手段当选为德意志国王。1147年父亲去世，腓特烈继任士瓦本公爵，1152年3月，当选为德意志国王。看到亨利四世的结局，红胡子腓特烈也许已经意识到他与教皇的纷争不可避免。为了巩固后方，他不惜割让土地讲和。稳固后方之后，红胡子开始寻求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机会。1153年，腓特烈发动了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的战争，在进军途中，他接到了教皇尤金三世的求救信。原来是教士阿诺德领导人民夺取了城市政权，选举了罗马元老院成员和执政官，主张教会放弃领地、过使徒的简朴生活。这真是天赐的机会，腓特烈加速进军，镇压了这次起义，以拯救者的身份进入罗马城。但新任教皇哈德良四世（阿德里安四世 Adrian IV）是个注重外表脸面的人，他在为腓特烈加冕时，坚持要腓特烈按照惯例为教皇牵马扶镫，这下激怒了腓特烈。腓特烈以杀死教皇的下属相要挟，结果使庆典会场变成了战场。这倔强的教皇眼看着自己仆从的头颅一个一个地被砍下，就是不肯屈从，一直杀到近千人的时候，哈德良四世才被迫答应加冕腓特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教皇不久便去世了。腓特烈对意大利的暴行引来越来越多的反对者。虽然此事件表现出了红胡子腓特烈的残暴，但教皇的刚硬和对生命的冷漠也令人惊叹，这种为了维护一个人的尊荣而如此草菅人命的教皇就连《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也是望尘莫及。

1167年，意大利各主要城邦（包括威尼斯、维罗纳等）组成“伦巴第同盟”，共同反对腓特烈，并取得了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拜占廷帝国的支持。同年，腓特烈发动第四次意大利战役，结果腓特烈身陷重围，被迫化装成一个农民狼狈逃脱。这是腓特烈在意大利第一次惨遭败绩。心有不甘的腓特烈于1174年第五次入侵意大利，北意大利各城邦严阵以待，加入“伦巴第同盟”的城市增加到22个，意大利各城邦之间以及它们与教皇之间如此团结，这还是第一次，由此可见腓特烈是何等地令人憎恶。一开始双方试图以和谈解决，但伦巴第同盟坚决要求教皇参加，因此和谈遭到腓特烈拒绝。1176年，双方会战于米兰附近的林雅诺，这是中世纪有名的战役之一。腓特烈大军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本人也身受重伤，不得不投降。

1177年，腓特烈被迫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签订《威尼斯合约》，归还教产，同时承诺不再干涉教皇国的内部事务，皇帝还亲自到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在教皇面前，俯伏在石灰地上，跪在亚历山大三世的脚下吻他的脚。亚历山大把皇帝扶起，并赐他一个“平安之吻”。8月7日这位德皇为教皇拉着马缰，并陪在马旁，环行圣马可广场一周。



图 3.17 红胡子腓特烈为教皇牵马的圣马可广场

2、英诺森三世继任教皇

英诺森三世原名赛尼·洛泰尔，出生于有德意志血统的罗马贵族世家，是意大利阿纳尼城特拉西蒙伯爵之子，曾先后在巴黎和波洛尼亚攻读神学和教会法。1190 年任枢机主教，写过著作《论人的贫苦条件》，后来凭着他的叔叔教皇克莱门特三世的关系成为教廷高级人员，并于 1198 年在 38 岁时终于当选为罗马教会的最高领袖。



图 3.18 英诺森三世

3、发动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战争

(1) 阿尔比派异端

阿尔比派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异端之一。它得名于信徒大量聚集的法国南部阿尔比地区，故称阿尔比派。又由于其英文名称“Cathar”来源于希腊语，意为“清洁、纯洁”，故又称清洁教派。阿尔比派的信仰就是初代诺斯底异端的再现，他们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位格，上帝的本质是圣灵，否认耶稣基督具有人性，他们的信仰本质上属于二元论。阿尔比派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堕落天使的首领撒但统治的，因此是邪恶的，魔鬼出于对上帝永恒天国的嫉妒而创造了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阿尔比信徒不相信地狱、炼狱、复活，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他们认为天主教会的圣事与说教都是错误且无用的，教

会以接受土地和财产的方式向物质世界和魔鬼做了妥协。一个阿尔比派模范信徒应当禁欲、少食，远离物质享受，这样才能限制私欲的增长，并使灵魂从肉体中解脱，使自己成为“完人”（the Perfect）。

阿尔比派信仰在它的诞生之地东欧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教皇的家门口——意大利，尤其是在伦巴第靠近米兰和加尔达湖周围地区，同样有阿尔比派的几个重要据点，很多已经发展成一定规模的“教会”。

（2）英诺森组织的清除计划连连受挫

虽然天主教此时是错谬重重，但由于真信徒还没有从其中出来，所以她现在还仍是地上的有形教会。清除异端也无可厚非，但是英诺森三世要以他世俗的权力来进行所谓“属灵”的事业，其实这也是属血气的行为。英诺森首先于1198年6月25日藉一封信件将这些异端开除教籍，并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然而教皇的震怒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激化了矛盾，阿尔比派信徒在意大利甚至没有转入地下，反而继续在教廷前耀武扬威。在奥尔维耶托，地位较高的阿尔比信徒还担任了主教的职位。阿尔比派思想从奥尔维耶托传播到了维泰博，在1199年，英诺森威胁要对维泰博采取行动，而在1205年两个阿尔比派信徒竟当选为该城市的执政官，而且其中一位司库提米奥西还是阿尔比派斯波莱托“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1207年9月，英诺森亲自前往，命令摧毁阿尔比派的房屋，并没收其财产，事实证明他的激烈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公元1209年奥托四世加冕后，便在费拉拉开始了依照教皇法令整治异端的行动，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合情合理。然而当奥托四世与教廷关系破裂之后，皇帝整治异端的行动便不了了之。而异端在意大利中部的城市也和往常一样抓住机会在两股对立势力——教皇与皇帝之间渔利。

英诺森对异端采取的行动一次次失败，便开始依靠外交。1204年，英诺森致信身在蒙彼利埃地区的西多会特使，建议他们用和平手段进行劝导。随后他也给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写了信，争取南法贵族的支持。他警告法王，这个异端的拥护者将比穆斯林更危险，对抗这个异端的天主教徒和同穆斯林作战者会得到相同的功德。同时英诺森对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成功的外交活动，已无后顾之忧的教皇决定对异端发动十字军战争，以求一劳永逸地恢复南法的宗教秩序。1207年，那个充满自信的英诺森此时已经决意一战——教皇的信件如雪片一般从罗马飞往法国各地，他号召所有人共同全力对抗他所谓受到魔鬼煽动的雷蒙德（雷蒙德是在南法兰克比较同情和支持阿尔比派异端的爵士）。英诺森三世在一封发给法国民众的公开信中写道：

“那么，挺身而出吧，主的骑士们！众多天主教的领主们站起来！让神圣的普世教会悲痛的哭号激动你们虔诚的心灵！让虔诚的热情激励你们去向如此伤害你们的上帝的人复仇！望你们倾听正义者的鲜血在向你们发出的声音，并为教会向暴君和信仰的敌人举起保护之盾！”

“在图卢兹地区迅速蔓延的堕落之异端的诱惑绝不会停止，产生越来越多的邪恶的余孽，他们还用他们的疯狂去腐化他人……因此，既然以药物医治无效的伤口就当以利刃予以切除、无视教会劝导的人当以世俗权力予以约束，我们决心呼吁你们施以援手，以期伤害耶稣基督之人将得到惩罚。”

这次新十字军一开始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很大的热情，因为腓力·奥古斯都公开表示他需要更多帮助以对抗英王约翰，然后才会考虑将军队派往南部。英诺森的努力似乎又要失败。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在1208年初，一个流血事件使南法局势变得更加紧张。1月13日，教皇特使卡斯特尔诺的彼得与比较支持异端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进行了谈判。就在第二天，一个刺客刺死了彼得。

图卢兹伯爵雷蒙德随即被开除教籍，因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雷蒙德与此事有关。这使得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后来也命令他手下的贵族们响应教皇号召，去打击这个肆无忌惮的异端势力，于是阿尔比派遭到了灭顶之灾。教皇这次组织的十字军团攻克了清洁派的中心——贝济耶城，随即展开了大屠杀，有两万多人遭到杀害。在米内尔瓦，一百多位清洁派领袖被烧死在火刑台上。教会此时彻底忘却了主耶稣给她的原则：

太 26:52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教会争战的兵器是圣道，而非刀剑，教皇的残暴反倒让人民同情异端。

第二节 英诺森在教会教义上走入更大错谬

1、自称是中保

为了继续抬高教皇的地位，英诺森称教皇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存在，位于神之下，人之上，扮演着神人之间中保的角色。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宇宙的创造者》中表述的“日月论”，可以生动的描述英诺森所希望的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英诺森三世声称：“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是整个世界。”他继续说：“宇宙的创造者在天空中安放了两个发光体，光度较大的一个管白昼，光度较小的那个管黑夜。在以天上之城见称的普世性教会的天空中同样如此，他设立了两大尊位，较大的那个主管灵魂，较小的那个主管肉体，这二者就是教皇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不仅如此，月亮从太阳那里得到光亮，并且月亮无论从它的大小和能量上均小于太阳。同样，君主的权力因教皇的权力而取得威望，因此，他愈逼近那个权力的光环，自身所显出的亮度就越小；反之，越是退避一些，亮度则越强。”

提前 2:5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在教会事务方面，他制定了教皇大权独揽的神职人员任免制度。1215年，他主持召开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颁布了“圣餐变体说”的教义和一系列教会改革条规。在英诺森的扶植下，天主教内出现标榜清贫的托钵僧团，主要派别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他还加强异端裁判所，并命多明我会士主持。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是教皇权势的鼎盛时代，教廷势力在当时的欧洲达到顶峰。

2、集权的教会体制

英诺森三世首先在教皇国之内推行中央集权。他利用罗马城和教皇国内的贵族王公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来自德意志的威胁，使他们服从了自己的权威。他调整并扩大了教皇的宫廷机构，向各地派遣枢机主教以监督各地教会，直接受教皇管辖，就好像中国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在此之前，一直由各地大主教兼任教皇使节的监督职能。但此时主教已全部为教皇掌控，而各地主教又必须监督其属下的教区和修院，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者，如此使西欧的教会系统在教皇的掌控之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3、发明七项圣礼

英诺森三世对天主教最大的贡献在于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这是第二次尼西亚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天主教会议之一。会议对一个信徒所应遵守的规范作了许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了七项基督教圣礼，将人的传统纷纷抬到圣礼（圣事）的地位，以和基督的权柄抗衡。这七项圣礼包括：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圣餐礼、终敷礼、婚礼、授职礼。

（1）洗礼（圣洗圣事）

洗礼包括婴儿洗礼，这确实是圣经所吩咐的。但天主教认为这是得救所必须的，受洗者需三次浸入水中或三次倒水在头上。

（2）坚振礼（坚振圣事）

坚振礼是为巩固洗礼后入教的决心，一般用于婴孩洗礼后的成人。天主教认为坚振礼是使洗礼达到完美的圣事，能够赐人圣灵。这宣称完全抹杀了圣灵主权运行的大能，仿佛圣灵还要听从这些主持圣礼的神父们的使唤。

（3）忏悔礼（告解圣事）

忏悔礼类似于今天的认罪，但对象是司铎，即向神父或主教认罪。主教、神父都成为了神、人间的中保，听告解者的忏悔并建议忏悔者作某些“补赎”或“忏悔”的行动，以弥补由罪过所造成的伤害，并恢复相称于基督门徒身份的生活习惯。只有从教会内获得赦罪权的司铎，才可以因基督之名赦罪。

（4）圣餐礼（弥撒外送圣体）

用变质说来崇拜杯饼，这是天主教举行的弥撒。做弥撒是再次让耶稣重行逾越节晚餐献祭的过程，间接地重演了他在加略山十字架上的死，完全否认了耶稣一次献祭成就永远赎罪的功效，而且普通信徒只领被神父唾沫玷污的小圆饼，不可以领杯。

（5）终敷礼（病傅圣事）

为病人敷油的目的是为重病或年老所困扰的基督徒所设立的一种特别礼仪。当信徒因疾病或年老而开始有死亡的征兆时，都需要领受敷油礼，信徒每次生重病也能领受敷油礼。同样，领过敷油礼后，若病情更加严重，还可再领。临终时神父抹油才能得救，只有司铎（神父和主教）能够给病人敷油，所以天主教的人都害怕自己突然死亡而来不及请神父敷油，最终堕入炼狱中。这样的信仰多么荒唐可笑！

（6）婚礼（婚姻圣事）

由于婚姻是向教会公开男女二人以夫妻身份过教会生活，所以天主教也要求婚礼必须公开举行，安排在礼仪庆典中，在司铎（或教会认可的证人）和其他证人及信友团体前举行。天主教认为这圣礼能够成全夫妻之间的爱情，强化他们之间那不可拆散的结合，并在迈向永生的旅途中圣化他们。这所谓“圣礼”完全变成了偶像迷信活动，他们认为此“圣礼”具有超自然的能力。9世纪时，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法令，规定男方赠送婚戒给女方是正式求婚不可缺少的程序。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7) 授衣礼（圣秩圣事）

授衣礼类似于按立，就是由教皇或大主教把象征神职权柄的圣衣授予候职者，即宣布其就职。把衣服当成偶像，这是圣职服装的开始，后期为清教徒极力反对。

这七项圣礼，除最后一项外，都是普通百姓直至王公大臣必须施行的。每个教徒每年至少应向神父忏悔一次，做弥撒一次。另外还有无数的普通礼仪，有些礼仪就是土著巫术的重演，如驱魔礼，简直就是拜鬼的礼仪。

第三节 坐在神殿里

1、教皇继续开展政治外交

英诺森三世支持德国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登上皇位之后，新皇帝立即翻脸，不承认教皇在战争中获得的好处，甚至准备兵戎相见。于是，英诺森抬出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孤儿——已被他收为教子的腓特烈（后称皇帝腓特烈二世），并让其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结盟，终于在布汶战役中歼灭了背信弃义的奥托四世。腓特烈二世向教皇许诺放弃西西里王位和进行十字军东征之后，在英诺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帝宝座。这样以德国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被控制在英诺森三世之下。



图 3.19 腓特烈二世向英诺森三世臣服

2、骑在君王头上

与此同时，英格兰国王约翰（又称“无地王约翰”）在多件事情上明目张胆地违抗教皇，特别是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上冲突激烈，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教皇在 1208 年，将英王约翰革除教籍，让他的臣民不必再臣服于他，还将英格兰教会排除出基督教区长达六年之久。英诺森还准备支持法王腓力二世进攻英格兰，并亲自组织十字军相协助。1213 年，英王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屈服，承认自己处于教皇的附属地位，同意每年向教皇纳贡，并且为表示接受教皇任命的大主教人选，他写了一份公文，在肃穆的典礼中，呈递给教皇代表鲁道夫，公文上写着：

“谨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切权力及臣民献给神及圣使徒彼得和保罗，也献给我们的母亲——神圣罗马教会，以及我们的主——英诺森和他的继承人，为要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因此……”

随着英王的臣服，教皇的威势再一次大张。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时，良心也不会平安，因圣经吩咐我们：

彼前 2: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如果这些教皇们真有一点圣灵普遍的恩典，有一点良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凌辱君王到如此的程度。所以，敌基督的本质不是指他们整日咒骂基督，而是处处违背圣经而悖逆妄行。



图 3.20 英王约翰将皇冠放在教皇代表鲁道夫的前脚

3、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英诺森三世于 1215 年在罗马拉特兰教召开的第四次会议是天主教第一次大公会议，会议作出以下的决定：

- (1) 会议确立了圣职人员与教皇对社会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预备再组织第五次十字军，由教皇亲领出征。
- (2) 会中规定了对不肯悔改、传布异端者的刑罚，同时宣告限制。
- (3) 命令犹太人及回教徒穿着特别服装，犹太人不可担任管辖基督徒的公职，被排除在一般社会之外。
- (4) 确认方济会成立，禁止再设立新的修会，以避免修院设立的泛滥。
- (6) 指斥瓦勒度派（Waldensian）及阿尔比派为异端。
- (7) 建立异端裁判所，规定了对不肯悔改、传布异端者的刑罚。
- (8) 宣告限制赎罪券的颁发。
- (9) 规定教民每年需作一次告解。
- (10) 除非得到教会的许可，否则禁止任何圣物崇拜。
- (11) 提醒主教作教师的责任，规定主教们应当选能干的人讲道，并为学识较差者免费提供神学及文法教育。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12) 强调圣职人员的培育与革新，禁止买卖圣职。规定圣职人员的外在生活，如：公职、贸易、穿着、表演等。

(13) 有关圣餐礼，化质说被接纳为正统。化质说认为，饼与酒内存的本质，经过祝谢已经变成基督的血与肉了。

这次拉特兰会议彻底奠定了天主教谬教义和教皇统治的根基，也是使教皇英诺森三世超越其他诸教皇、拥有最高权势，并且成为属世的诸王之王的标记。

英诺森组织的第四次十字军不前往耶路撒冷，乃是攻打君士坦丁堡。他们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设了一个拉丁王国臣属教皇，大部分君王成为罗马教会的封侯。第二年，即 1216 年，这位教皇之巅峰——英诺森逝世，但教会的权势自此盘旋在顶峰。

在英诺森三世死后不久，他的侄子、继任教皇的格列高利九世就按着拉特兰会议的决定创办了异端裁判所，并宣称杀害异教徒是教廷的职责之一。而英诺森三世创立的用火刑烧死异教徒的做法也被沿袭了下来，火刑柱后来成为无数坚持真理改教家殉难的标志。

启 17:18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

第四节 瓦勒度派兴起

1、彼得·瓦勒度简介

彼得·瓦勒度 (Peter Valdez or Waldo, 又称瓦尔多、韦尔多) 是瓦勒度派的创立人。他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数，所以不知他何时生。有人说他是死于 1179 年，也有人说他死于 1217 年。瓦勒度是里昂城的一位富商，1176 年，因为听见一位漫游诗人述说圣亚勒克西 (St. Alexis) 舍己牺牲的故事而大受感动，加上他和朋友一起晚餐时，朋友忽然死亡，让他对信仰开始产生兴趣。他去访问一位神学专家，问他，用什么方法可以到上帝那里去，这位神学家用当时修道主义所常引用的经文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瓦勒度便将这句出于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一节的话按着字义实行出来。他免了别人一切的债务，将财产一小部份分给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之后，将剩下的部分都给了穷人，然后开始巡回宣教。

他决心要将耶稣基督的吩咐和使徒的话完全实行出来。他所穿的衣服是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人们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瓦勒度为了要多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来行事，他还购买了一部新约译本。他的这种行为在他周遭的朋友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认为在瓦勒度身上真正看见了“使徒的贫穷”。

瓦勒度在城市和乡村传道，不久就吸引了一批跟随者。1177 年有些人与他共同生活，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为更进一步实行耶稣基督的吩咐，四处传教劝人悔改，他们被称为“里昂的穷人” (Poor Man of Lyons)。但是里昂大主教禁止他们传教，1179 年瓦勒度和跟随他的人在第三次拉特兰会议期间到达罗马，向教皇恳求准许他们传道。教皇亚力山大三世称许瓦勒度甘于贫穷，但是却认为他们为无知的平信徒，不肯批准他们传道的请求。地方教士不准瓦勒度传教后，瓦勒度肯定自己需要“顺从神而不是人”，所以他与他的同伴依然继续传道。1184 年，教皇卢修斯三世在所召开的维罗纳会议中革除了他们的教籍，不久，他们就被和阿尔比派混为一谈，受到审判和压制。瓦勒度派在

13世纪时，曾经分裂为二：保守的一派回归到罗马教会，较前进者的一派则继续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

2、瓦勒度的信仰观点

瓦勒度的信仰观点如下：改革教会、简化仪式、反对教会敛财与向圣人敬礼；取消神职制度，反对神职人员享受；男女信徒皆可传教；否认弥撒中酒饼变质及炼狱、婴孩受洗、为亡者祷告等说法；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根据；凡信徒皆可自由讲道，不必教会许可；贫穷为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拥有私人财产；教会必须恢复纯粹的圣经教训；没有炼狱；教会亦非无错误的；平信徒有资格讲道；变卖货物，以其所得周济穷人，乃是基督徒的一种奉献行为。瓦勒度也反对罗马教会的正统性。

1208年12月18日，有一部分瓦勒度派人士在回归到罗马教会时写下了包含誓词的信件。这篇誓词反映出瓦勒度派所主张的信仰内容和方式，其中一些的确与日后16世纪宗教改革的言论十分相似。另外我们要指出，这些回归到罗马教的瓦勒度派成员，接受罗马教廷的指导，也过着绝对贫穷的“贫穷公教徒”生活，这与圣方济的修会理想又完全一致。

1655年瓦勒度派教会发表一份信条，在这信条中同意各国改革宗教会所定纯正的教理。在教义上，他们相信拣选以及神有绝对的权柄且配合人自由的意志。他们也随时准备拼死为真理辩护，极力强调实际的敬虔和安静的行善并事奉神等，恳求所有的福音派和复原教会，不计他们的贫穷和卑微，将他们看为基督奥秘身体的真肢体，是为祂的名受苦的团体，更请继续帮助他们。

历史上对瓦勒度派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就是改革宗教会内也有分歧，这主要是由于该派信仰并非完全与宗教改革信仰一致，特别是他们过重地将贫穷当成功德，而且反对婴儿洗礼。近代的复临安息日会将瓦勒度派看成是他们的先驱，所以人们对瓦勒度派难下定论。

3、瓦勒度派的经历

以下略述其重要历史事件：

1179年，平信徒过福音贫穷生活获批准；

1181年，里昂大主教禁止其讲解圣经；

1184年，被贬为异端，交与异端裁判所，但人数反而增加；

1208年，若干人士回归罗马教会参与“贫穷公教徒”运动；

1214—1215年，两度被指为异端；

1218年，在贝加莫（Bergamo）召开大会讨论教义歧见；

1229年，天主教的土鲁斯（Toulouse）会议宣布禁止平信徒购买圣经、圣经译本（针对瓦勒度派等异端而起的严格规定），并组成异端裁判所；

1870年，因普世宗教自由原则在意大利得以生存；

1937年，该派向南美洲移民约一万五千人，现今意大利本土约有瓦勒度派信徒两三万人。



图 3.21 瓦勒度派传教士和生活过的房屋

第五节 几个新的修会产生

1、方济各修会

(1) 早期传道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以创始人方济各（Francis Javier，又译法兰西斯，1182—1226年）命名，方济各的拉丁文为“Ordo Fratrum Minorum”，是“小兄弟会”的意思。因其会士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

方济各（法兰西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二十几岁之前，为跻身贵族成为骑士，而后在战役中失败，成为战俘。释放后他放弃了财产和家庭，过着清贫的生活，并进行隐修，1208年开始讲道。他穿着粗布衣服，赤脚，而且照著《圣经》的说法连拐杖也没有，四处呼吁大家要反省悔过。很快在城内有名望的人士伯纳多·昆特瓦雷把所有财产也都贡献出去跟随他，一年内近十一个跟随者陆续加入，跟从他修道。早期的法兰西斯运动结合了传教的热诚与神秘的默想。这些默想其实是那些从初代就常见的如见天使、见耶稣等经历，还有人传说方济各能向动物传福音，这一切都是故弄玄虚罢了。但在中世纪没有真理的时代，这一切非常迎合人心。

(2) 被教廷批准为正式修会

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他们效忠教皇，反对异端。初创时，会内不置产业，靠乞食为生，后会规松弛，在城市内建立住院，积聚大量钱财，内部为此意见不一而引起纷争，从而分裂为守规派、住院派、嘉布遣派（“嘉布遣”指行乞修士所戴的尖帽）三个支派，后守规派进行改革，自称方济各派，16世纪时通过传教向外发展。方济各的同乡女子克拉拉（佳兰）创建的女修会，倡导隐修，称

方济各第二会，又称克拉拉（佳兰）会，参加传教活动，后也分裂成数派。

方济各会还有为俗教徒设立的第三会，入会者不必出家，只须在修会指导下安贫乐道或解囊布施，过清贫的生活，这些对当时社会都有较大的影响。



图 3.22 方济各会士在乞讨

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甘于各种境况，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或缺乏都应该靠主适应。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非要以贫穷的外貌甚至用乞讨的生活为属灵来标榜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假冒为善。加尔文曾说：“贫穷的外衣下依然或包裹着奢华和贪婪，而贵重的外衣下一样有谦卑的性情。而且，神的选民纷纷放下自己的家庭去讨饭，这也是对充足的神的侮辱。”

诗 37:25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2、多明我修会

1215 年，西班牙人多明我·德·古斯曼（Domingo de Guzman，又译多明戈或多米尼克）在法国南部的普卢叶（Prouille）创立多明我修会。他自己本身是个博学多识的圣职人员，当时奉派到法国东南部处理异端问题。这过程当中，他体会到必须培养一些能向人民讲道、受过良好教育的圣职人员，于是成立多明我会，特别训练能言善辩的教师与传教士，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被称为“黑衣修士”，自称为主的看守犬，立志走遍欧洲去扑灭异端与无知。他们注重讲道与神哲学，故亦名宣道会。多明我会后来控制了异教裁判所，专司根绝异端的工作，是中世纪托钵僧第二个大团体。多明我会于 1215 年成立后两年，即在 1217 年获教皇批准，其会规接近奥古斯丁修会和方济各会，也设立了女修会的第二会和世俗教徒的第三会，他们主要是在城市的中上阶层传教。多明我修道士逐渐成为西欧著名学府的教授，其中最出名的有亚伯特·马格纳斯及托马斯·阿奎那。1631 年 1 月 2 日，多明我会高奇神父抵达中国福建，开始正式向中国传教。

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都有该会会士任教，该会 18 世纪后趋于衰弱。多明我会发明了所谓“圣母马利亚亲授”之《玫瑰经》，并加以推广，现今已是天主教徒最普遍诵之经文。

第六章 教会权势衰落和文艺复兴

第一节 英诺森四世后的天主教会

1、英诺森四世和里昂会议

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即西尼巴尔多·菲斯奇，意大利籍教皇（1243—1254年在位），生于热那亚，1225年任意大利境内阿尔本加主教。1243年，在阿那尼（Anagni）举行教皇选举，6月25日，时任阿尔本加（Albenga）大主教的西尼巴尔多·菲斯奇当选为教皇，结果于三天后宣布，“英诺森四世”为其名号。

英诺森四世在继教皇之位之前和之后，都竭力推行教皇贵格利九世的方针。

2、里昂会议

此时，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矛盾已经持续多年。英诺森四世上任之后，与腓特烈二世的冲突逐渐升温，后者扬言要发兵捣毁罗马，废黜教皇。英诺森四世遂于1244年迁往热那亚，第二年又移至法国里昂，并在法王路易九世的支持下，于6月28日至7月17日召开大公会议，史称第一次里昂大公会议。会议决定对腓特烈二世处以绝罚，会议上路易九世宣布准备发动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与此同时，由于蒙古人侵入匈牙利，继而转向奥地利，欧洲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所以会议之后，英诺森四世派遣柏郎嘉宾携教皇敕令前往蒙古帝国以说和，柏郎嘉宾在哈拉和林见到蒙古大汗贵由，向其进谏，后者却于1246年用波斯语回信要求教皇和其他欧洲君主向蒙古臣服，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梵蒂冈。

1250年腓特烈二世病逝，英诺森四世则在1251年得以回到意大利。英诺森四世也想像贵格利七世那样通过克吕尼修道运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于是在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会议上承认了四大托钵修会，而禁止其他修会。英诺森四世将这四个当时最大的修会势力揽在自己权下，这四个修会是：方济各会、加尔默罗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

第二节 教皇势力的衰落

1、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

波尼法修八世即红衣主教本尼迪克特·加塔尼（Benedict Gaetani，1235—1303年）。1292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去世。当时，罗马的两大望族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正在为选举新教皇而进行激烈的争斗，从而使教皇选举陷入了无望打破的僵局。好几个月过去了，人们仍然看不到新教皇的影子。本尼迪克特·加塔尼既不拥护奥尔西尼家族，也不拥护科隆纳家族，就在双方争执不休之时，本尼迪克特·加塔尼已是成竹在胸，认为他们定会选他为教皇，以此折中方案来收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两下竟选了一个隐士切莱斯廷五世为教皇，繁多的事务令这个外行教皇头晕脑涨。他本来喜欢在深山老林里修行，而不是统治整个天主教世界，不知所措的教皇便把加塔尼当做专职顾问来咨询，这正合了加塔尼的意。传说加塔尼挖空心思在切莱斯廷五世的房间里安了一根管子，每天晚上教皇就寝熟睡的时候，他就在管子那端低声呢喃道：“切莱斯廷，切莱斯廷，放下你的政务吧！对你来说这件事太大了，让加塔尼来做吧！”数日后，切莱斯廷五世认为他一

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否则怎么会几天做同一个梦？于是欢天喜地地辞职了，本尼迪克特·加塔尼旋即当选为教皇，即波尼法修八世。

波尼法修八世的理想与中世纪最后几任教皇如贵格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等人一脉相承，他也公开宣称教皇的最高权力，其声势之大简直盖过了他的前辈们。“罗马教皇就是法律”，他号令天下，“只有不加思考地服从于罗马教廷才是得到救赎的基本要素。”



图 3.23 波尼法修八世

一位西班牙外交官给他下了个不错的结论：“这位教皇只关心三件事：长命百岁、荣华富贵以及家底雄厚。”波尼法修八世利用教廷的财产在罗马周边地区不断攫取土地和城池，他想建立起可以匹敌罗马所有望族的加塔尼王朝。

有一次科隆纳家族中年轻的斯蒂芬·科隆纳（Stephen Colonna）劫掠了一辆马车，那辆车上装着教皇打算用来买地的黄金。科隆纳家族的两个主教听说了这个后果严重的事件之后，主动找到教皇恳求他恕罪。波尼法修的答复是只要他们把劫走的东西还回来就可以了，但却偷偷地将自己的军队进驻于科隆纳家族在罗马周围的领地，这一点对科隆纳家族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侮辱。

科隆纳家族揭竿而起。他们在罗马散发传单，质疑波尼法修八世的合法性，并指控他从“隐士教皇”切莱斯廷五世手中窃取了皇位。于是教皇奋起迎战，他把整个科隆纳家族都逐出了教会，甚至第四代也未能幸免。

波尼法修八世得寸进尺，他召集了十字军攻打科隆纳家族。虽然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让教皇自己捞好处而加入军队，但支持摧毁该家族的人也足够了。最后，战败的科隆纳家族成员聚集到了仅剩的领地古城帕莱斯特里纳中。帕莱斯特里纳的城墙固若金汤，他们本可以阻挡一阵，波尼法修八世的军队不能立即攻进去，但教皇开始了诱降，他骗取了科隆纳家族的信任，让他们认为只要放弃城市并向他屈服便可解决所有问题。

科隆纳家族全体成员都在教皇面前跪了下来，族长们亲吻着教皇的双脚，乞求他的原谅。然而，波尼法修八世没有放过他们，展开了无抵抗的屠杀。我们可以在但丁的《神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曲·地狱篇》中找到波尼法修八世在最后一击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下场（波尼法修死了以后，他和其他几位教皇被打入地狱的第8层，脸朝下栽进一条裂缝中）。教皇下令将帕莱斯特里纳城彻底清剿。这座拥有无价古迹和悠久历史的辉煌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城内恺撒大帝的宫殿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教皇手一挥就把帕莱斯特里纳夷为了平地，而且还命人在耕地中撒上盐使之永远贫瘠。波尼法修八世似乎赢了，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但科隆纳家族漏网的成员在得到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协助以后，必将报仇雪恨。

这时，教皇和美男子腓力四世之间的矛盾就是金钱问题。他们俩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腓力四世需要用钱巩固刚开始扩张的封建帝国，波尼法修八世则需要用钱来资助他不断膨胀的领土扩张野心。教皇想阻止腓力四世继续掠夺法国教廷的财产，腓力四世一怒之下宣布所有的财产和货物对外国禁运，其实就是禁止对教皇国运送，这样就直接导致教皇失去了法国地区所有教廷对教皇国的进贡。波尼法修八世无奈，只好同意腓力四世对教会征税。但是双方的梁子就此结下了。腓力四世依然不睬教皇，准备制定一个法案来限制教皇在法国的权力，教皇立刻责令法国大主教训斥腓力四世，结果腓力四世火冒三丈，逮捕了大主教，交给了法国世俗的法庭来审判他。教皇愤气填膺，宣布了《圣一至圣》（A holy duarul）的诏谕，故伎重演，开除了腓力四世的教籍。波尼法修八世警告说：“我的前任们一共罢黜过三任法国国王。你要知道，一旦事态必要，我们会把你贬为马夫的。”但这一次，教皇的算盘打错了。

教皇没有意识到君主们受教皇控制的时期已经渐趋终结了。在波尼法修八世的威胁和命令面前，腓力四世不但没有像亨利四世那样诚惶诚恐地来到他面前行最卑微的补赎礼，反而召开三级会议寻求帮助。大会宣判教皇为罪人，并秘密资助了远征罗马的行动。1303年9月，一群武装分子进入了阿纳尼城，那里是波尼法修八世的出生地，也是他喜欢去休养的地方。这群人在一位教皇的世仇——科隆纳家族长者的带领下攻入了教皇的宫殿，波尼法修八世正傲慢地坐在宝座上等待着他们的光临，以为这些人会立即跪倒下来亲吻他的脚。

老科隆纳看着这曾经毁灭了自己家族的教皇那傲慢的样子不由得怒发冲冠，哪里还跪倒，他立刻攥着匕首冲过去，意欲手刃仇人。就在匕首即将刺中教皇的最后一刻，他的同伴由于害怕这个渎神的行为会触怒上帝而拦住了他。波尼法修的性命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尊严全完了。老科隆纳和同伴们剥下了教皇的法衣，把他用锁链套走了，之后对其尽行侮辱，兵丁也对他拳打脚踢。波尼法修八世气得发抖，拍着脑袋说：“你们可以囚禁我，杀了我！但我是教皇，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一个教皇！”腓力四世本想把教皇带到法国审理的，但可能觉得审判教皇毕竟太惊世骇俗了，于是过了段时间也就把他放了，据说在那段时间里波尼法修八世的精神失常了。尽管在加塔尼家族势力的影响下，波尼法修最终恢复了自由，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一个月以后，中世纪巅峰的最后一任教皇在颓丧和绝望中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灵去世，波尼法修死后，本尼狄克十一世即位。

一般而言，整个13世纪，从英诺森三世到波尼法修八世之前，教皇都能保持教会的属世权威。但到波尼法修八世的时代，教皇权势开始快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尤其是在法国。当教皇革除法王教籍时，法国百姓不但没有因此放弃对法王的效忠，反而更团结起来，支持法王。在这种局势下，法王美男子腓力才可以公然地蔑视教皇波尼法修。在教皇与国王的摩擦过程中，“革除教籍”所产生的效用全看当时百姓的态度。如果百姓支持教皇，这个武器几乎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但若百姓支持国王，

这个武器就毫无作用。上帝的审判即将临到这一大城，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

2、教皇阿维尼翁被囚——“巴比伦被掳”（1309—1376年）

波尼法修死后，在法国的压力下，教廷选立了一名法籍大主教为教皇，即克雷芒五世，但他始终未去梵蒂冈。1309年克雷芒五世将教廷迁至阿维尼翁。迫于腓力四世的压力，他同意国王向法国教会和神职人员征税，解散拥有大量财产的圣殿骑士团，并通谕承认世俗王国是由上帝直接设立的。在他之后担任教皇的，有约翰二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克雷芒六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和贵格利十一世，都是法国人，枢机主教团中法国人亦占大多数。1377年，罗马城局势动荡，贵格利十一世感到有必要回罗马坐镇，同时，他接受了神秘主义者谢拿的迦特林等人的劝告，遂将教廷迁回罗马。

阿维尼翁教廷先后历时70余年。因受制于法国王室，历史上有“阿维尼翁之囚”之称，借用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70年的历史，称之为“巴比伦囚虏”。各派史家对其评价颇有争议，有人认为阿维尼翁教皇偏安僻壤，道德败坏，是教皇史上的最黑暗时期，也有人认为教廷也曾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进行机构调整，提高枢机主教团的权力；继续制定教会法典，扩大传教范围；兴办大学教育等措施，力图改革。

贵格利十一世于教廷迁回罗马的次年死去。法、德、意各国统治者为了争夺对教廷的控制权，在选立教皇问题上多次发生争议，终酿成天主教会的大分裂。

3、天主教会分裂时期（1378—1417年）

1377年，阿维尼翁教皇贵格利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后，于次年3月去世。罗马市民决心将教廷留于罗马，枢机主教团选出意籍教皇乌尔班六世，他即位后力图消除法国对教廷的影响，引起在枢机主教团中占多数的法国人的不满。他们离开罗马，回到阿维尼翁，并声称被胁迫而选出的乌尔班六世职位无效，并另选日内瓦枢机主教为教皇，称克雷芒七世，驻阿维尼翁。乌尔班则在罗马另设枢机主教团，因而形成天主教会大分裂的局面。两位教皇互相攻讦，互相开除对方教籍，并同时向西欧各国征收贡赋和税金。各国则根据其法国和德、意的政治态度和关系的亲疏，分别拥护其中一位教皇，因而形成两个势力集团。当时承认罗马教皇的，除德国、意大利外，还有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的英格兰和受德意志影响的波兰、波希米亚、丹麦、瑞典等。承认阿维尼翁教皇的除法国及其盟国西班牙外，还有与英格兰不睦的苏格兰和受法国影响的西西里和撒丁尼亚。各地教会则基本上按本国君主的态度行事。

天主教会大分裂的真正起因并非教义及教规上的分歧，而是因争夺权力才上演的闹剧，和以前的教会分裂截然不同。后来，在法王查理六世和巴黎大学的倡议下，两处的枢机主教团于1409年在比萨举行会议，将罗马的贵格利十二世和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同时废黜，另选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但贵格利和本笃分别得到一些国王的支持，均拒绝退位，因而形成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

141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会同巴黎大学教会法学者和若干枢机主教，迫使亚历山大的继任者约翰二十三世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召开公会议。约翰在会上遭到谴责，弃职而走。在西吉斯孟坚持下，会议继续举行，结果约翰和本笃被废黜，贵格利被迫引退，另选被各方所接受的马丁五世为新教皇。至此，延续了40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才告结束。

大分裂虽在组织上得到了弥合，但却暴露了天主教会上层争权夺利的本相，使教皇的威信和权力大大下降。在各国政权支持下，地区主教和拥有地方实力的枢机主教的权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力相对上升。为避免教廷迁离罗马致使分裂再度发生，以后的教皇多从意大利人中选出。

4、黑死病爆发（1348—1390年）

黑死病从东方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曾夺去数千万人的生命，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由此，欧洲大伤元气，街道到处是处理不完的尸体，农村遍地是荒芜的村庄，到处是没人要的牛羊。大瘟疫不但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而且也导致了大饥荒、盗贼四起。

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于是将怒气转向犹太人，声称瘟疫是犹太人杀害耶稣的报应，于是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在美因茨，1.2万犹太人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这种倒行逆施转移视线的方法也阻挡不住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信仰的浪潮。



图 3.24 黑死病恐怖的情景

第三节 文艺复兴的开始

1、经院哲学家兴起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虽然道德腐败、统治黑暗、神学混乱，但上帝仍然兴起一大批神学家，在理性知识上苦苦地挣扎和追寻。只是因为教会的黑暗，他们的神学体系仍然脱离不了堕落理性败坏的影响。特别是因人心的骄傲，这个时期的神学都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把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均变成玄虚空洞的哲学，这些神学家有：安瑟伦、亚伯拉德、彼得·伦巴德、阿贝拉尔，以及圣维克多学派、亚伯特马格纳斯、托马斯·阿奎那、敦司苏格徒等，他们均被称为“中世纪教授”，他们所教的内容被称为“经院哲学”。所谓经院哲学，是将神学与哲学混合的一种学问。哲学其实历来都是对教会最大的搅扰，今天仍是如此。但在充满偶像迷信的中世纪，这种理性的思考毕竟要强于那些在迷信愚昧中的缠绵，所以经院哲学的兴起对天主教来说也是一种文明和进步，而且里面也不乏许多真正来自圣灵的光照。圣灵赐下一点福音真理，来滋润即将枯干衰亡的教会，好使教会能等待着黎明的出现。

2、安瑟伦

(1) 生平

安瑟伦(Anselmus)1033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Piedmont)的奥斯塔(Aosta),其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去世以后,他离开家乡,并放弃了全部遗产。1059年,他进入法国贝克(Bec)的本笃修道院,因为那时著名的学者兰弗朗克(Lanfranc, 1010—1089年)在该修道院任副院长,并兼任修道院学校的校长。1063年,当兰弗朗克离开贝克修道院以后,安瑟伦接任了他的职位。在安瑟伦管理学校期间,该修道院学校迅速成为当时欧洲的神学研究中心。1078年,安瑟伦成为该修道院的院长。同年,他前往英国拜访了已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当1089年兰弗朗克去世以后,安瑟伦又接任了他的职位。然而,安瑟伦在英国的经历却充满坎坷,在主教续任权的问题上,他与英王发生激烈的冲突,同英国两任国王——威廉二世(William Rufus)和亨利一世(Henry I)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前后被流放两次。安瑟伦死于1109年4月21日。



图 3.25 安瑟伦

(2) 著作

安瑟伦的著作颇丰,数量上可以和奥古斯丁相媲美,有:

《独白》(Monologion, 1076年)

《宣讲》(Proslogion, 1077—1078年)

《论语法学家》(De grammatico, 1080—1085年)

《论真理》(De veritate, 1080—1085年)

《论选择的自由》(De libertate arbitrii, 1080—1085年)

《论魔鬼的堕落》(De casa diaboli, 1085—1090年)

《书信:论道成肉身》(Epistola De Incarnatione Verbi, 1094年)

《上帝何以化身为人类》(Cur Deus hominem, 1094—1098年)

《论纯洁受胎和原罪》(De Conceptu Virginali et de Originali Peccato, 1099—1100)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年)

《对于人类救赎的沉思》(Meditatio Redemptionis Humanae, 1099—1100年)

《论圣灵的发出》(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 1102年)

《书信：论基督宗教的圣事》(Epistola de Sacramentis Ecclesiae, 1106—1107年)

《论上帝的预知、预见、恩典同自由意志的和谐》(De Concordia Praescientiae et Praedestinationis Gratiae Dei cum Libero Arbitrio, 1107—1108年)

(3) 神学思想

安瑟伦主要继承了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年)的思想。安瑟伦在《独白》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他的思想完全和奥古斯丁一致:“经过反复的检查,我发现我在这里所做的任何论述没有一样不是与公教会的教父们,尤其是与真福音者奥古斯丁的论著相一致的。因此,如果有人发现在这部作品中我提出了任何过于新颖或与真理不一致的思想,我恳求他不要立即把我当作是新奇论点的妄想者或谬误的坚持者加以谴责。相反,他应该首先仔细地阅读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然后以此来判断我的这部小作品。”基于奥古斯丁的思想,安瑟伦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

他的一篇祷告文:“主啊!我并不奢想能洞察你的崇高,因为我无法让我的理解力和你的崇高相比拟。但是,我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你的真理,我的心相信并爱着这真理。因为我不是寻求理解以便相信,相反,我是相信以便理解。因为我深信:除非我信仰了,否则我无法理解。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在我们用理性去研究以前,应先有信仰,同样,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已经在信仰上有了根基之后,不努力去理解我们所信仰的,那就是一种疏忽懈怠。”我们看到安瑟伦确是有一颗谦卑的心,尚没有宗教改革就有了唯独圣经的观念,但由于哲学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仍禁不住理性的迸发。

安瑟伦在中世纪思想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一是提出关于救赎论的“补赎说”。安瑟伦关于上帝的证明主要集中在《独白》和《宣讲》中,即讨论那本不可言说的三位一体的奥秘。但是讨论三位一体的上帝要以上帝存在为前提,因此,在该书的头几章,安瑟伦证明了作为至善(optimum)、至大(maximum)、至高(summum)的上帝存在着。

(一) 证明神的存在

由于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善的东西,那么,必然存在着这样一样东西,通过它一切善的东西才成其为善。

“唯有通过自身而善的才是至善者。这至善者是如此地超越于其他善者之上,以至于没有与之相等者,更没有比他更高者。”这种通过一个定义去论证上帝存在的方式,仍是柏拉图主义的体现。

对于《独白》中的论证,安瑟伦并不感到完全满意。他论证说,上帝乃“无法设想有比之更为伟大的存在者”(aliquid quo maius nihil cogitari potest)。这个对象不仅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因为那既存在于思想中又存在于现实中的存在者要比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存在者更伟大。

这个推论往往被简化为下面这样一个三段论:上帝乃无法设想有比之更为伟大的存

在者。既存在于思想中又存在于现实中的，要大于那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因此，上帝必然存在于现实中，而不能仅仅存在于思想中。这还是希腊哲学“存在论”的翻版。

安瑟伦的证明之所以落入哲学的迷宫，就是因为这种证明上帝的想法本身就脱离圣经，神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

罗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罗 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宗教改革后的改教家们都不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人有限的头脑怎么能证明无限永恒的神呢？

（二）救赎论

安瑟伦的救赎论是他一生中教会贡献最大的教义，1098年安瑟伦写下了他划时代的著作——《上帝何以化身为入》（*Cur deus homo*）。在那里，他提出并完整论述了救赎理论。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由安瑟伦本人与一位叫博索（Boso）的人进行对话，博索提问，安瑟伦回答。博索提问的基础是：“我来此的目的不是要你解除我在信仰上的疑惑，而是要你向我指出我之所以确信如此的根据。”他论证的步骤如下：

首先，救赎的前提是人有罪，因此，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罪。让我们首先思考，什么是犯罪，什么可以对罪加以补偿。安瑟伦认为，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理性受造物，理应完全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如果人不能顺从上帝的意志，他就是窃取了上帝应有的荣耀，在万有的秩序中，最不能忍受的是受造物攫取造物主的尊严，并且没有将他所夺去的东西归还祂。只要人还没有把从上帝那里窃走的东西归还给上帝，他就是有罪的。所以，罪不是别的，就是没有把所负的债归还给上帝。我们对上帝所负的债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完全服从上帝，因为理性受造物的所有意志都应该服从上帝的意志。

其次，既然上帝是无比仁慈的，那他能不能凭借他的仁慈把所有的罪都宽恕了而不要求作出任何的补偿呢？这是否适宜呢？安瑟伦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赦免罪就等于是不加惩罚，而既不要求补偿又不进行惩罚就赦免了罪是不正当的，那样的赦免是不合程序的赦免。也就是说，如果无条件地赦免了罪，就会混淆义人和罪人的区别，破坏世界的整个秩序，同时也与上帝所制定的赏罚律相冲突。世人既然冒犯了上帝，上帝为了维持其尊严与统治，要么坚持有罪必罚的公义，对世人施以惩罚，要么必须获得适当的补偿。上帝没有采用惩罚的方法，因为这样做就要毁灭了全人类，他创造人类的目的便无从实现。因此，上帝选择了获得补偿的方法。

第三，对上帝的补偿如何才是适当的呢？如何才与上帝的尊严相当？万有都是上帝的造物，它们的总和也与上帝完全不相当，整个世界不足以补偿对上帝意志的丝毫违反。由于人（包含他在内）得罪的是万有的创造者、无限的上帝，他必须付上除了上帝以外的比其他万物都更重大的代价来加以补偿。但是，那能够给出这样的补偿者必定是一位除了上帝之外比一切都更伟大者。可是，除了上帝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超越于万物之上，比万物有更大的价值，所以，除了上帝自己以外，没有谁能偿还这样的罪债。但是，另一方面，唯有有罪的人是应当进行补赎的。因此，补赎者必须同时既是神，又是人。赎罪的事情唯有上帝有能力做，而唯有人才应当做，因此，必须有一位神而人才能完成此事。这位神而人照他应该的那样对上帝完全服从，把他自己的生命自愿献给了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上帝。这样，他给予上帝的，无比地大于除上帝以外的一切，足以抵偿人类的一切罪债。

安瑟伦的补赎说，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开创了赎罪论教义历史的新纪元”。今天的改革宗神学的救恩论也是建立在这种补赎论的基础之上。

在《论信仰》中安瑟伦认为“一般”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观存在，越是“一般”的东西就越有实在性，神是最“一般”的，因而最实在。他也提出神权高于世俗君王。

3、伯尔纳

(1) 生平

克莱尔沃（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1—1153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修道院改革家、灵修主义者和神学家，马丁·路得称伯尔纳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修道士”。伯尔纳的父亲是贵族，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都进了天主教的修道院。伯尔纳在21岁时，带领了30个青年走入法国北部山上的一个山谷，在那里建造一个修道院，他任院长，这个山谷原名“苦谷”。在伯尔纳的领导下，修道士增至二百多人。后来这个山谷被改名为“光明之谷”（Clairvaux）。当时的德王、法王、教皇、主教都不时前来请教，其声望遍及全欧。

(2) 规劝教皇悔改的《劝思考书》

他根据《雅歌》写了86篇讲章，加尔文也多次引用其作品。伯尔纳的神学多是让人思想基督的受苦：“我们应默念基督之受苦，使祂成为犹如一束没药放在我们的胸膛上一般。”他的讲道有许多福音呼唤的内容，如“人若能望见地狱一眼，再刚硬的人也会立即成为基督徒。”

他写的对教皇起初劝勉甚至是斥责的书籍——《劝思考书》，虽够不上宗教改革的开始，但在教皇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这样的书籍也是犹如先知的最后呼唤。这可能是上帝对恶人最后的警告，劝勉这些恶人回头，不悔改的结局就是被弃绝。书中言语有时发自肺腑，有时犀利，如果这些教皇良心真的没有被烙铁烙得僵硬无比，那么听到这些呼唤，一定会感恩涕零的。请看这一段：

你不要太相信你目前的感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久而久之因疏忽而失掉其活力，无论它在心里怎样根深蒂固。假如你忽略旧伤，它就硬结起来，它愈丧失知觉，就愈成为不治，你就有了硬心肠。那对自己的刚硬不觉察的心，就是刚硬的心。为什么问我呢？且问法老吧！谁也不能医治自己的硬心，除非上帝垂怜他，并且照先知所说，除掉他的石心，赐给他肉心。

你决不得对我引证使徒保罗的话：“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林前9：19）。那是与你的情形相距遥远的。难道保罗使自己作贪财的奴仆吗？难道保罗像你们这样满有野心、贪欲、买卖圣职、亵渎神圣、蓄妾、乱伦、凶恶吗？难道人们从世界各处拥到他那里，是为求藉着他的权威获得教会的优待吗？那位“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的人，之所以称他自己作众人的仆人，是要为基督多得人，而并不是增加人的贪心。所以你绝不得把保罗的伟大、热忱和爱心，拿来为你辩护，你所过的绝不是基督奴仆的生活。

伯尔纳在书中甚至对教皇这种超过众王权力的体制也提出质疑，劝教皇们要好好思考：

教皇是谁？从何而来？我们必须注意你是谁，从何而来。我用了“从何而来”一词，但我想我最好不谈，将它交付给你的悟性。你要对自己说，我在主的家中原是地位低的。虽然我原来是贫贱的，却被升高去治理多民多国，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谁，或我的父家是什么，竟坐在众有权位者之上呢？那位对我说“朋友，请上坐”（路 14：10）的，确实信任我，真的将我当成是一位朋友，若是我不够做朋友，那对我真是不好了。那将我升高的袍，也能将我降卑。

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真是辽阔高深，远超过我们人的理解。对于那些看似无可救药的教廷，上帝依然用他的仆人耐心劝勉、诚心地呼唤。在旧约，面对那些一样败坏的北国以色列君王，神也依然兴起先知流泪呼唤他们，这就是神慈父的心肠。可是这样的心并没有引起教皇们和天主教会的反思，反倒使人心愈加刚硬。

4、彼得·伦巴德

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 1100-1160 年），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和主教。他的神学专著《四部语录》成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标准教科书。

伦巴德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诺瓦拉。他在博洛尼亚、兰斯和巴黎求学。约 1140 年，他开始在巴黎的圣母教堂学校教授神学。1150 年，他完成《四部语录》。1159 年，伦巴德成为巴黎主教。

《四部语录》（*Libres IV Sententiarum*）全书分列四大问题：（1）上帝；（2）受造物；（3）救法；（4）圣礼及后事，故称四部语录。他依当时人著书惯例，从各种信经及教父遗著中抄录了一些句子，分类汇编，而用辩证方法加以注解阐明，充满了哲学家那种似是而非的特色。特别是彼得·伦巴德在论到恩典时，他教导说：“我们需要两种恩典扶助我们，使我们能以行善。第一种恩典为‘圣灵独立的运行’的恩典，这恩典能使我们有效、自愿地行善。第二种恩典为‘圣灵与人合作’的恩典，就是圣灵依照人良善的意志帮助他。”可见他的救恩观仍属于半伯拉纠派。

5、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约 1225—1274 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曾被教会称为“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出身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省罗卡西城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其父阿奎诺是地方长官（伯爵），母亲是弗里腓特烈·巴巴罗萨国王的姐姐。他从 5 岁起被送进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受了 9 年的教育，14 岁时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深造，在临毕业那年，1245 年他来到被称为“哲学家城”的巴黎大学，受教于当时极负盛名的神学家阿尔伯特。1256 年获博士学位。1257 年起在巴黎大学任多米尼克（多明我）修会神学教授。1259 年重返意大利，在教廷学院讲授神学。1268 年被教皇召回巴黎去扑灭在巴黎大学内掀起的反教会的拉丁阿威罗伊思潮，并继续传授神学。1274 年，在赴罗马途中病逝，时年 49 岁。

他的《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等，奠定了天主教的神学体系和经院神学的根基。

6、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成就

神学的兴起也带来了科学、文学、艺术繁荣，一时间呈现出百花齐放、绚烂多姿的景象，人们开始公开讽刺教皇的腐败和教会的黑暗。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1) 文学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文学作品，如《意大利短篇小说》，特别是在诗歌艺术上出现了三杰：著有长诗《神曲》的但丁；著有《阿非利加》、《歌集》的彼特拉克；著有《十日谈》的乔万尼·薄伽丘。

(2) 艺术

圣画艺术虽然仍然以偶像为主，像吉贝尔蒂的《天堂之门》（1452）、达芬奇的《最后晚餐》（1495）、米开朗基罗的《创世记》（1512）、拉斐尔的《大公的圣母》、马萨乔的《逐出乐园》（1427），但画家们也开始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1503）、杨·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妮夫妇像》（1432）。

(3) 科学

科学上人们不再局限于教廷的定规之下，而是开始迈向更广阔视野，甚至是触犯到教廷权威的领域。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望远镜、行星椭圆轨道、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等。但说句公道话，罗马教廷对科学似乎还是比较宽容的，并没有像许多无神论教材所说的对科学家像对异端那样展开大规模的逼迫，教皇还打算讨论哥白尼的学说。

有一个谎言，就是说教会处死科学家布鲁诺的事，说布鲁诺因传扬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惨遭火刑，其实布鲁诺的火刑并非由于科学。布鲁诺是位强烈的激进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追随者，是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信仰者，他本身就是一位魔术师，因为这是源自古代的拜太阳教，所以他引用了哥白尼著作中的日心说的句子，试图通过法术的方式来发展他的邪说，因而触怒了教廷。（英国 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1987）

(4) 文艺复兴的意义

文艺复兴并非现代文明的发源，更不是宗教改革的动力，充其量不过是神的普遍恩典在中世纪黑暗时代闪出的火花。无神论者否认是宗教改革带来文明，以为编造几部画和几本小说就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再没有如此荒唐的观念了。

第四节 天主教的神学根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阿奎那的神学体系看似传承奥古斯丁的信仰，但他的理论和安瑟伦及伯尔纳不同。他是完全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为根基来建立神学的，而且里面有许多伯拉纠主义的成分，和正统信仰基本上是相背离的。然而，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能进行一些神学上的讨论和研究，制定一套神学体系，仍不失为一次进步，最起码能唤起人的理性思考。可惜思考的对象还是错了，不能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乃是在希腊哲学中打转转。下面摘录阿奎那《神学大全》的片段，他一开始断章取义地提出了奥古斯丁似乎矛盾的观点，然后给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左右转动、似是而非。（注：下面引用经文采用阿奎那原文翻译的思高本）

1、阿奎那的认识论

阿奎那写道：

按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卷十四第七章所说的，人的心灵是靠思想才能理解真

理。但是信徒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我们凭自己不能想出什么。”所以，没有恩典的帮助，人凭自己不能认识真理。

反之，奥古斯丁在《订正录》卷一第四章说：“我不同意我在一处经文中说的：‘上帝，你只愿意洁净的人才能认识真理。’因为可以回答说，许多不洁净的人也知道许多真理。人成为洁净的，是靠恩典，就如诗篇第五十一篇十二节说的：‘上帝，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所以，没有恩典，人能凭自己认识真理。”

下面阿奎那给出自己的解释：

我解答如下：认识真理是智性之光的一种运用或实现。因为按信徒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说的：“凡显明出来的，就是光明。”运用皆含有一种动态，这里是指广义的动态，若非是在上帝的推动下，它不能进而有所行动。但是上帝的推动是按其上智之措施，不是像天体那样出于自然之必然。动态皆是来自第一推动者上帝。

所以该说，为了认识任何真理，人都需要上帝的帮助，为使智性在上帝的推动下活动。但为在一切事物上人能认识真理，并不常需要在自然之光以外另加光照，只有在一些对超自然的事物的认知上才有此需要。不过，有时上帝以奇迹方式，用恩典使某人知道只靠自然理性也能知道的事情；正如有时祂也以奇迹方式，促成自然能力本来能完成的事情。为思想任何事，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因为是祂使智性有行动，按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卷十四第七章所说的，现实地理解即是思想。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看出阿奎那认识论的核心，就是人靠自己理性的自然之光就能够认识真理，不需要另外的光照。上帝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只是一个推动者，推动着人的理智去自己思想，而不是换一颗新心。这种论点的根基是否认人的全然堕落，认为至少人的理性仍在活跃。这和圣经是相背离的。

罗 3:10-11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2、阿奎那论善行

没有恩典，人是否能愿善及行善？

质疑：人没有恩典，似乎能够愿意并实行善事。因为：

(1) 凡人有其主人的，就属于在人的权下。但人是自己之行为的主人，特别关于愿意，这在之前第一题第一节、第十三题第六节已经说过。所以，没有恩典的帮助，人能凭自己愿意并实行善事。

(2) 此外，任何东西，对合乎其天性的事，比对于在其天性以外的事更有能力。但按大马士革的约翰在《论正统信仰》卷二第四及第三十章所说的，罪恶与天性相反；德性合于人的天性，既然人凭自己能够犯罪，更应该能凭自己行愿意行的善事。

(3) 此外，按哲学家在《伦理学》卷六第二章所说的，智性之善是真理。但是智性能凭自己认识真理，其它东西也都能凭自己实行其自然活动。所以，人更该能凭自己愿意并实行善事。

下面又是阿奎那自己的解释，所谓“正解”：

我解答如下：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人的天性：一是看其完整状态，即始祖犯罪以前的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状态；一是看始祖犯罪后，在我们身上的败坏的状态。按第一节已说过的，在这两种状态中，为了愿意或实行任何善事，人当然都需要上帝的帮助，因为祂是第一个推动者。但是在天性完整的状态（犯罪前）中，按其活动能力的自足性而言，人凭自己能够愿意并实行与其天性相配的善事，例如：修炼德性方面的事，但对超越其上的善事，如：灌输性德性的事，则不能为力。而在天性的腐化状态（犯罪后）中，连他自然能力所及的事也有所不济，以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全部这类善事。但因为人性没有全面被罪恶腐化，没有失去天性的全部美善，故即使在堕落的状态，人也能靠自己天性的能力行些个别的事，例如：建造房屋、种植葡萄等，但不能毫无缺失地实行一切适于其天性的善事，就如生病的人自己能够有些活动，但不能像健康的人那样动作完美，除非用医药加以治疗。在腐化状态则需要两层助力：一种使天性康复；一种使它能行超性的善事，即有功德的善事。此外，在两种状态下，人都需要上帝的帮助，来推动他行善。犯罪无非就是缺失适于物之天性的善。每个受造物既是由别的物而有存在，本身什么也不是，所以也需要由别的受造物保存适合其天性的善。

阿奎那善行的观点，是建立在哲学家的理论之上。他不承认人完全的败坏，所以堕落后按着天性也能够行出一些善行，但他把普通的行为和上帝定义的善混淆在一起。阿奎那把罪看成是某种善的缺失，既然缺失，就可以想办法填补，就可以通过其他人或自己的善行善工来填补。这样一来，天上人间就有了许多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成为“善人的道路”，所以彼得、马利亚、圣徒都成了道路，真不知阿奎那当时要如何面对下面的经文：

罗 7:18-19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3、阿奎那论遵行律法

人没有恩典，单靠自然能力是否能完全法律之训令？

质疑：没有恩典，只靠自己的自然能力，人似乎能够完全法律之训令或诫命。奥古斯丁在《历史异端辑览》第八十八段说：“因为没有恩典，人能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乃是伯拉纠派的异端。”

正解：我解答如下，所谓完全律法或诫命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行动本身，即是人做正义、勇敢和其它德性的行动。按这意义，人在天性完整状态能够完全一切诫命，因为犯罪无非就是违背上帝的诫命。但是在天性堕落的状态，若没有恩典的治疗，人不能行全上帝的一切诫命。另一意义，所谓完全律法之诫命，不只要做诫命内的行动，还要合于诫命所要求的行动方式，即出于爱德。按这意义，则人无论是在天性完整状态还是堕落的状态，没有恩典都不能完全上帝的诫命。故此，奥古斯丁在《论劝诫与恩典》第二章说了：“没有恩典，人什么善事也不能做。”以后又说：“人不只需要恩典使他知道该做什么，也需要恩典助他以爱的心情去做。”此外，按第二及第三节已说过的，无论在哪一种状态，为完全诫命，人另外需要上帝这位推动者的帮助。

释疑：

（一）奥古斯丁在《论精义与字据》第二十七章说：“至于他，信徒说，他们顺着本性去行律法上的事，这也无妨。因为这是恩典之神圣的作用，为在我们内恢复在受造时具有的上帝的形像。”

（二）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所能做的，不算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如哲学家在《伦理

学》卷三第三章所说的：“我们靠朋友能做的，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能做。”故此，热罗尼莫在那里说：“应如此承认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即同时也要说我们常需要上帝的帮助。”

（三）根据上面第三节所说的可以知道，只靠自然能力，人不能完全爱上帝的训令。如果是指以爱德完全，人是可以的。

阿奎那把行律法这最简单的道理弄得玄虚复杂，针对律法条文上人靠自己不能行全，但律法在爱德层面，人自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连律法上的条例都遵守不了，怎么还能遵守住在里面的总纲呢？阿奎那之所以把律法的总纲和条文如此区分，是因为他就是要绞尽脑汁地找到我们能遵行律法的借口，好在后面为我们能靠自己的功德称义找到理由。难怪今天也有许多基督徒说，我虽犯了什么罪，但我心里遵守了。

4、阿奎那论得永生

没有恩典，人是否能立功挣得永生？

质疑：没有恩典，似乎人能立功挣得永生。因为：

（一）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主说：“如果你愿意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由此可见，进入永生在于人的意志，是凭我们自己所能行的。所以凭自己能够挣得永生。

（二）此外，永生是上帝给人的奖赏或赏报，就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所说的：“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但是上帝给人的赏报或奖赏是按人的行为，就如《诗篇》第六十二篇第十三节所说的：“你按照各人的行为，给予各人以报酬。”既然是其行为的主人，所以获致永生是在人自己能力以内的事。

（三）此外，永生是人生的最后目的。但是每个自然物凭其自然能力都能达到它的目的，所以人既是较高的自然物，凭自然能力而不靠恩典，更能达到永生。

正解：靠天生的能力不能产生与永生相配的有功行为，这要靠较高的能力，即恩典之能力。所以，没有恩典，人还是不能挣得永生，但是他能做些产生合乎其天性之善的行动，就如奥古斯丁在《伪著》（Hypognosticon）对伯拉纠派的第三项反驳中所说的，例如耕田、饮食、交朋友等（反驳伯拉纠派及柴勒斯定派）。

释疑：

（一）人固然能以自己的意志而行的有功行动挣得永生，但是正如奥古斯丁在上面正解引用的书里说的，人的意志需要上帝恩典之准备。

（二）关于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句“上帝的恩典是永生”，“注解”（拉丁通行本注解）上说：“永生固然是归于善行，但是永生所归于的善行却归属于上帝之恩典。”何况上面第四节（原书）已经说过，为按正当方式完全律法之诫命需要恩典，而只有按此正当方式，完全方才有功。

（三）人性的高级部分，至少在恩典的扶助下，能达到更高的目的，这是其它下级物所绝对达不到的。正如哲学家在《天界论》卷二第十二章所说的，在医药的帮助下能恢复健康的人，比根本不能恢复健康的人，其对健康的自然条件较好。

对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阿奎那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也不好像伯拉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纠那样直接否认恩典，也不得不承认这在圣经处处显明的真理，就是永生是神的恩典。但是经过他的修改，他的恩典的定义不再是圣经里的十字架流血和圣灵重生的恩典，而是在上帝的帮助下，人自己能获得善功的“恩典”，上帝在这“恩典”中只是一个原动力。他所谓的恩典还是人自己的东西，所以，骨子里还是与伯拉纠同出一辙。

5、阿奎那论恩典

没有恩典外来的帮助，人是否能自力准备自己获取恩典？我们对论如下：

质疑：

（一）没有恩典外来的帮助，人似乎能凭己力准备自己获取恩典。因为上面第四节质疑2（原文）已经说过，不能要求人做不可能的事。但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你们归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准备自己获取恩典，无非就是转向上帝。所以人没有恩典的帮助，似乎能准备自己获取恩典。

（二）此外，人做自己能做的事，便是准备获取恩典，因为若人尽其所能，上帝不会不给恩典。《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说，上帝将“好的精神赐予求祂的人。”但是在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就是所谓我们能做的。所以，准备自己获取恩典，似乎是属于我们能力范围的事。

（三）此外，《箴言》第十六章第一节说：“准备心灵在于人。”但所谓在于人，是他凭自己能做的。所以，似乎人能够准备自己获取恩典。

在自己所提出的质疑后，阿奎那又开始自己解释了：

释疑：

（一）人归向上帝固然在于他的自由意志，故此才命令人归向上帝，但是只有上帝使自由意志归向上帝时，自由意志才得归向上帝。

（二）若非为上帝所推动，人一无所能，故所谓尽其在自己是属于人的能力范围，是说假定人为上帝所推动。

（三）所举之理由是根据常备恩典，这需要准备，因为凡形式都需要有相配的主体。但是为使人能受上帝的推动，不必另有推动，因为上帝是第一个推动者，因而不必推演到无限。

（四）准备心灵在于人，因为这要有自由意志去做，但是如正解已说过的，他做此，也需要推动者及吸引者上帝的帮助。

在这里阿奎那还是承认了人能凭自己预备自己获得恩典，但只是一开始需要上帝推动一下，然后就靠自己了，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种只承认原处的恩典根本不是恩典。为了清除这样的错谬思想，《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章第三节特意加上“所以一个属血气的人，既然完全与善悖离，又死在罪中，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或是预备自己的心去被改变。”

阿奎那在后面还讨论了没有恩典人能否自己悔改、没有恩典人能否自己不犯罪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总之，阿奎那都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一方面他好像是在强调上帝的恩典，但实际上他是透过哲学家所善用的高明的手段，巧妙地把概念复杂化，而后转移此概念，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告诉你，我们自己或藉着别人（不是耶稣）可以努力获得恩典，自己可以努力认识真理，自己可以努力获得永生，你的努力就是恩典，

第六章 教皇权势衰落和文艺复兴

就是善功。不论现在的天主教会怎样表明他的神学和伯拉纠没有关系，其实阿奎那的神学系统就是伯拉纠和希腊哲学的翻版，只不过在人的前面用一个“恩典”的名词。这正应验了本书第一部的一句话：“哲学是基督教的天敌。”

第七章 改教先驱

第一节 天主教更加疯狂地屠杀和迫害

1、异端裁判所

异端裁判所是罗马天主教的法庭，它成立于1233年。它的使命是铲除异端，是教皇英诺森三世为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而建立的教会侦查和审判机构，这是宗教裁判所的发端。任何人若有异端嫌疑，其刑罚就是被作为犯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修道士往往用严刑拷问，直到对方认错，或被折磨至死。无数阿尔比派及瓦勒度派的信徒，成为异端裁判所的最初牺牲品。

洪诺留三世继任教皇后，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都要建立异端裁判所。教皇格利九世又重申前令，强调设置该机构的重要，并任命由其直接控制的托钵僧为裁判官，要求各主教予以协助。于是异端裁判所在西欧天主教国家星罗棋布。

那时“异端”包括了一切不同于罗马正统教派的言行和思想。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通谕允许在审判过程中使用酷刑，虽然当时对刑罚的具体形式有一些限制和规定，但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裁判官个人意愿。



图 3.26 异端裁判所严刑逼供

异端罪的侦审秘密进行。控告人与见证人姓名可以保密，罪犯、恶棍乃至儿童，皆可作见证人。人一经被控，绝难幸免。为被告作证、辩护，有被指控为异端的可能，因此无人敢为。被告如能彻底认罪并积极检举同伙，则处理从宽。处罚包括苦行、斋戒、离乡朝圣、在公开宗教仪式中受鞭打、胸前或身后缝缀黄色十字架或受群众凌辱等，此类皆属轻罚。对裁判所认为不认罪、不悔过者，刑讯逼供，从严定罪，处以徒刑或死刑。

死刑多为火刑，对被判死刑或徒刑者，财产没收，归教会和世俗政权分享，或由政府全部占有。没收异端财产而获得的利益，是世俗政权积极支持异端裁判所的原因之一，从而在当时造成滥肆搜捕、定罪，株连扩大、冤案恒生的恶果。

2、西班牙异端裁判所

异端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五百年，其中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以历时最久、最凶残恐怖而著称。他们不仅用异端裁判所来镇压异端，并用来迫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5世纪以后，西班牙异端裁判的残暴骇人听闻，据巴瑞特博士统计，仅1483年至1820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就烧死了12000人，拉克尔估算在各国异端裁判所被判死刑的总人数有30000人，而仅仅在1480至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这都是一些较保守的数字，有的文献统计的数字达十几万人，虽可能过于夸张，但也足显异端裁判所的残暴令人发指。

3、天主教禁止平信徒读圣经

天主教禁止平信徒读圣经，理由是怕把圣经理解错而亵渎神。只有获得一定的神学资格者才有机会读到圣经。天主教当局甚至将圣经禁掉，把阅读圣经、翻译圣经、教导圣经的人统统视为“异端”而钉在木架上活活烧死！当时的圣经只有武加大译本的拉丁文修订本。当时说拉丁语的国家很少，懂古拉丁语的就更少，所以天主教的这一措施就使圣经成了一本封闭的书。这是中世纪之所以黑暗的主要原因，直到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这是教会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页。

第二节 威克里夫

1、威克里夫生平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年）生在约克郡，天资聪颖，但家庭并不富裕。父亲见他体弱，不适于务农，便送他到邻近的教会跟神父学习拉丁文。1345年，15岁时的他因为家贫，所以要靠奖学金入学就读，又因为没有马，要徒步二百里才能到达进入牛津大学的贝理奥学院（Balliol College）。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早的大学，开始于13世纪初，创立之时没有校舍，要租借房舍及教堂上课。14世纪初，规模渐具，到威克里夫的时候，有神学、法学、医学等科目，完全仿照巴黎大学的制度，但更严谨、更有名。少年的威克里夫勤奋向学。布莱华定（Thomas Bradwardine）是他的数学老师，却在神学方面给他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在神的预定和恩典方面的教义，为他打下良好的基础。

约在1350年，因为黑死病在英国流行、蔓延到牛津，导致很多人死亡，大学也被迫停课。但威克里夫并未离开牛津，而是忙于救助病患，安慰死亡临到的家庭。他看到罗马天主教的教牧人员，只顾自己、不管人民死活，并且多数人都已失去信仰，更不认识的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威克里夫的心就常为此忧伤。到1353年，瘟疫过去，学校才复课。

1355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1360年，威克里夫完成了硕士的学业，并被按立为斐令罕教会（Fillingham, Lincolnshire）的神父。为了要继续在牛津研读，他聘任助理来执行牧师职务，自己则留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教导并任住校监督。



图 3.27 约翰·威克里夫

1372年，威克里夫获授神学博士学位。他同情贫苦的人民大众，厌恶教职人员的腐败、奢侈。他也热爱真理，经过多年的研读，使他对圣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确定圣经是唯一的真理，而罗马教廷却是真理的敌人。

2、开始反对教皇

1374年，威克里夫获得英王任命的卢特沃（Lutterworth）教会牧职。那是林肯郡一个富庶的教会，薪俸丰厚。不久，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派威克里夫为七人使团之一，到布卢治（Bruges）与教皇代表讨论英国和教廷间的问题。使团由班格（Bangor）的主教领首，其次则是牛津学者威克里夫，随后，兰凯斯特公爵约翰也到达协助，约翰还对威克里夫提出改革建议。

这次罗马之行，使威克里夫彻底看清了罗马天主教的真面目，决心与之决裂。

回到英国后，他对罗马口诛笔伐，在公开演讲和所写的小册中，称教皇为“敌基督者”，称拥护罗马的教职人员为“该撒的教牧”。他勇敢直言，指出教会应有的改革，以圣经、道德和常理，斥责教廷的黑暗和错误。这在当时还没有人指出过，也没有人敢说。他更说：“教皇必须在使徒和王的职分中选择其一：如果他想要作王，就不能宣称自己是使徒；如果他作使徒，就不能要金子。”他说：“教廷已经拥有英国三分之一的产业，还要贪婪苛求，向英国的贫苦大众勒索大量的金子。如果他贫穷，我们可以济助，但没有义务奉献。”因此，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教职人员的任用权和经济上独立，这正是教廷和英王政府争议的所在。

他的观点同马丁·路德及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相似，是以后的清教徒信仰的部分来源。这些言辞必定会引起教会的激烈反抗，所以他毅然离开了神父职务，开始了向广大农村贫苦百姓布道的生涯。



图 3.28 威克里夫在农村传道

3、伦敦审判

1377年2月19日，伦敦主教寇特耐要在圣保罗大教堂讯问威克里夫，其实这就是宗教法庭。很少人不知道威克里夫博士，他是牛津大学里最有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替老百姓讲话，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专制、腐败，那正是人民想说的话。

威克里夫来了，他的相貌很平常。威克里夫不是一个人来，伴随着他的有牛津大学的四位博士。接着，还有一位穿着不同的人物，那是全国的公安总长泼奚（Henry Percy），同行的还有英王的次子兰凯斯特公爵干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辩论十分激烈，寇特耐提出威克里夫藐视教廷权柄，号召人民抵制教皇征税，而威克里夫针锋相对，揭露教廷搜刮钱财，致使英国百姓生活贫苦，已经脱离使徒的教导。最后，由于约翰的干预，寇特耐终未能将威克里夫定罪。

1377年5月22日，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I）发出三道谕旨：（1）致总管英国教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要他会同伦敦主教查明威克里夫的信仰，如果确与天主教的教训抵触，则必须绳之以法，并阻止其散播异端；（2）致牛津大学校长，叫他不可作懒惰的农夫，任由稗子在田间滋生；（3）致英王爱德华三世，要他监督认真执行。谕旨于11月才到达英国。

1377年6月1日，久病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崩逝。他的长子早亡，由长孙理查二世（Richard II）继位，因为年幼，由王叔约翰及王太后共同摄政。在那种情况下，政府当然没有兴趣去处理信仰上的问题。而牛津大学的校长艾伦·邓务慈（Alan Tonworth）是威克里夫的老朋友，处理办法是要他多在女王学院，自我约制。只有主教们积极要对付威克里夫。

1378年1月，英国教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保利（Simon Sudbury）写信诱骗威克里夫到圣保罗大教堂，要趁机抓捕他，结果被邓务慈识破。威克里夫对邓务慈说：“真难以相信，教会的人竟要使用暴力。艾伦，我知道这次我可以推辞不去，但无法长久抵挡教皇的势力。”不久，主教团又在南伦敦的兰巴茨（Lambeth）大主教公邸，抓捕威克里夫，又因约翰的随从及时出现而告终。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4、宣扬真理揭露谬误

1378年3月，教皇格利十一世逝世，使得威克里夫所受迫害松缓，暂时再得安息。那年，他连续发表了一些论圣经真理的文章，如《论教会》、《论赎罪券》等，加之他对预定论的认识，使更多的人知道人得救唯靠恩典，不在于教会，更不是由于善功或圣礼。

1380年，对于罗马教圣餐中的“化质说”，他在牛津提出批判，指出：这一百多年前兴起的传统，在圣经中找不到根据，是教职人员的迷信把戏。威克里夫还把这些观点写出来传播，特别是向广大贫苦的百姓传扬。

牛津大学起了骚动，议论纷纭。这新的学说，不像过去威克里夫的言论，不仅提出教会应从教义改革，连几百年的圣礼观也要被推翻。这已经不是单一地反对教皇了，而是对整个天主教宣战。那时，他的老朋友邓务慈已经辞去大学校长职务，接任的校长薄顿（William Berton）秘密遴选了十二人，组成委员会，审查威克里夫的信仰。其中七人反对，五人赞成，结果断定他的理论错误，不得在校内传播，并停止他的教授职务。威克里夫虽然不怕反对，而且预料会遭受反对，但想不到的是反对的声音首先是来自大学当局，更想不到如此严厉。于是他写信向政府和国会申诉。有一天，摄政兰凯斯特公爵约翰竟忽然临到，亲自过问此事。

公爵来到威克里夫的女王学院，落座后就说：“威克里夫博士，我读到你向王的申诉，也读了校长和委员会对你的处分。”威克里夫插口说：“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不在场，没能为自己的立场申辩。”约翰摆手说：“现在，你可以对我辩诉。”威克里夫说：“‘化质说’是百年前开始的传统，并不是圣经的原义。”约翰听了立即反驳，不认同威克里夫的看法。最后，在分别前二人约定：威克里夫可以仍然在屋子里写作，但要严守校方的规定，不能讲课，不得把他的意见传播，用英文写作时，不能够使用“饼和酒的本质”这句话，用拉丁文与学者讨论时可以。二人就这样分手了。

约翰公爵是讲实际的人。对于威克里夫所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道德和行为上的问题，他一直都同意和支持。从国家利益着想，天主教把持教产，剥夺英国财富，视英国如臣民，他更反对。不过，对于“化质说”这样的神学问题，他觉得太玄奥了，并不关乎爱国和政治上的利益，也不具体实际。他既不能领会，也就缺乏兴趣了。看来在宗教礼仪上的改革比教义的改革还难。这样，神拦阻了威克里夫的其它工作，因为有一项更重要的责任交托与他。

5、翻译圣经

威克里夫知道自己在牛津时日无多。1381年，他已经发现左手有时候会麻痹，不大灵活。那一年他决定离开他所爱的牛津。在那里生活事奉了36年之后，威克里夫来到林肯郡卢特沃教会。早在1380年左右，他就看出天主教的错误在于其违背圣经，而且他们限制信徒不得自己读经，以至很多教会都没有圣经。许多神父只会做弥撒，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做弥撒时自己的嘴里在嘟囔些什么。所以威克里夫认为解决信仰如此荒凉的根本办法，就是需要翻译本国文字的圣经，使人能够普遍诵读，明白真理。真理可以使人得自由，脱离罗马教的迷信桎梏。

圣经不能仅限于拉丁文，应该译成大众化的方言。如果基督的恩典，是要使他的圣言传到地极，岂能允许天主教从英国夺去神的话？如果你说译经就是异端，也就等于把基督贬为异端。

他便在牛津开始了这项工作。虽然没有教会的支持，但牛津的同事尼哥拉·赫尔浮（Nicholas Hereford）与他志同道合。他们一起从耶柔米的武加大拉丁译本，翻译成英文。威克里夫因为不擅希伯来文，所以只翻译新约，到1381年完成。赫尔浮翻译旧约，再由威克里夫审查修订。赫尔浮离开牛津以后，因为主教们对他恨之入骨，他所有涉嫌的旧友们，也为了“威克里夫异端思想”被整肃。赫尔浮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便天真地远去罗马申诉，结果自投罗网，被监禁在那里。威克里夫夫人，反倒像是在暴风圈外，安然无事。病弱的他虽近于日薄西山，但仍在教会讲道，也继续写作翻译。在他的牧师住宅中，有他两位忠诚的助理，其中一位是杰出的学者朴玮（John Purvey），接续赫尔浮未竟之工，夜以继日地翻译旧约，据说于1382年底完成。此外，他还把全部译本修订成为较易于了解的英文，也把威克里夫的拉丁文写作译成英文。

那时，因为活字印刷还未发明，圣经和他的著作需在朴玮的督导下，请人手逐字抄写在鞣制的牛皮上。牧师的住宅，仿佛是小型书坊，不仅缓慢，费用也极为浩大。哪里来的这许多费用？有的人不能不猜想，或许是由约翰及王太后昭恩，暗地里庇护支持。后来，朴玮自己翻译的全部英文圣经，于1395年问世，流行了一百多年，直到有丁道尔（William Tyndall）的译本出版。

6、威克里夫平安地离世

1384年的最后一天，威克里夫平安地离世。1411年中，牛津大学再度整肃威克里夫思想。审查结果发现有260项“异端”或“错误”，所有著作予以销毁。但反罗马教的思想，已经像燎原之火，无法扑灭。他的著作被牛津封闭了，却在较晚成立的剑桥大学开始流传，并且剑桥发展成为后来的清教徒的大本营。威克里夫不愧为十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晨星。

1414年，天主教在德国南部的康斯坦斯（Constance）召开大公会议，判定威克里夫为异端，决定将其掘开坟墓暴骨焚尸。1427年，新主教到任，在12月16日真的掘出离世43年的威克里夫的遗骸，焚烧成灰，撒在随弗特河（塞文河 River Swift）上。河水流经卢特沃圣马利亚教堂附近，载着骨灰远去。但宗教改革的种子，在全地上更加散播开来。

7、威克里夫的影响历久不衰

从外表看来，在威克里夫归回天家之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在受到残酷的迫害后，几乎沉寂下来。其实不然，罗拉德派继续向下扎根，在沉默中发展。在两百年间，成长为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不少与罗拉德派同心的爱主的信徒被保留下来。威克里夫的信息帮助和供应了不少信徒，一代一代地绵延下去，威克里夫的属灵遗产，喂养了成千上万属灵的接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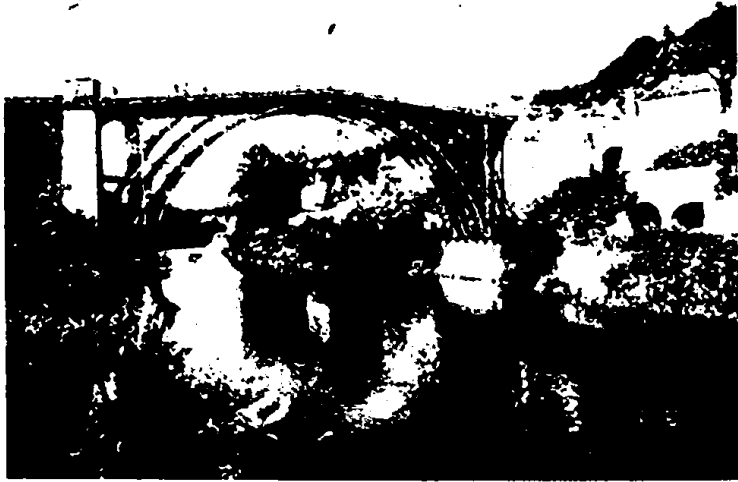


图 3.29 塞文河 (River Swift)

第三节 约翰·胡斯

1、约翰·胡斯生平

胡斯 (Huss 或 Hus, 1369—1415 年) 大约生于 1369 年, 他是胡斯尼克 (Husinec) 的一个农家子弟, 1390 年进入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 (University of Prag), 1401 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神学部主任, 1409 年成为该校校长。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布拉格大学教书, 还有在学校附近的伯利恒礼拜堂讲道。他也是深受捷克人爱戴的传道者, 并创造了新的正字法, 为捷克语的书面语言奠定了基础。

胡斯深受威克里夫著作的影响。1403 年布拉格大学的日耳曼教师约翰·霍伯纳以 1382 年英格兰召开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上谴责威克里夫的二十四条为基础, 又从威氏著作中抽选了二十一条组成了四十五条, 作为攻击威克里夫的证据。布拉格大学召开的会议最终宣布威克里夫属于异端, 但是胡斯却把威克里夫的许多作品翻译成捷克语, 使捷克的信徒能更广泛地接触到威克里夫的神学思想。早在胡斯出生前, 在查理四世统治期间, 捷克和英国交往频繁, 波希米亚的学生为牛津大学的名声所吸引, 纷纷前去求学, 从而使威克里夫的著作很早就从牛津传到布拉格。再加上英国教俗统治者对罗拉德派的残酷迫害, 使得他们纷纷逃到波希米亚, 促使威克里夫宗教改革思想在这里传播。此时, 波希米亚就已经发展出一股强烈反罗马教会的意识, 在神学思想上受英国的威克里夫很深的影响。胡斯在讲道中, 对教士的道德生活要求非常严谨, 务必过圣洁的生活, 导致许多人对他的仇视。

2、胡斯的神学观

(1) 圣经至上

胡斯认为圣经至上, 耶稣基督的话才是信徒的依归, 而非教皇或其他圣职人员所订的规条, 并强调教会的主权属耶稣基督, 为此他撰写了《论教会》(De ecclesia, 1413 年) 一书。里面甚至大肆批评教皇等圣职人员已偏离基督真道、贪爱钱财及滥权等等,

所以胡斯也不愧为改教的先驱之一。

(2) 圣餐改革

当时的教会规定只有神父可以领圣杯，因为怕笨手笨脚的平民会使“基督的血”溢出。这完全是对圣餐的曲解和亵渎，夺去了神在教会中给人的祝福。胡斯已经意识到这点，所以在圣礼中大胆地实行改革。他是提倡平民信徒可以领受圣杯的第一人，“杯的改革”成为胡斯派的表征。

(3) 反对赎罪券

胡斯自己过去曾花大把钱买赎罪券，但如今胡斯严厉地谴责此种违反圣经教导的作法。在胡斯看来，赎罪券所宣称的可以赦免罪人所犯之罪的说法在《圣经》中并无任何依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违背了上帝唯独通过恩典赦免人罪的教义。赎罪券更是教会众多腐败行为之一，体现了教会的贪婪。在呼吁改革教会的过程中，包括反对赎罪券，和胡斯形成对比的是以伊斯坦尼斯拉夫和巴莱奇为首的布拉格大学神学院的博士们，他们从教会法和世俗法律的角度支持教皇售卖赎罪券，因此正如胡斯所言：“出售赎罪券和发动十字军让我和巴莱奇最终决裂。”因此巴莱奇这位胡斯曾经的同学和好友，此后成为定胡斯为异端的关键人物。

(4) 胡斯的教会论

胡斯成名作《论教会》一书完成于1413年，陈述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如何看待威克里夫学说；二是承认圣经的权威还是承认教皇以及教会神职人员的权威。“唯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皇和红衣主教不是。”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简直是异端之极。



图 3.30 布拉格广场上的约翰·胡斯塑像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史

3、胡斯被审判定罪

当时教会正值大分裂（1378—1417年）的状况：罗马枢机院前后所选出的两个教皇，分别是位于罗马的贵格里十二世及位于阿维尼翁教廷的约翰二十三世，是为对立教皇。1414年底，由皇帝西吉斯孟召集，在康斯坦斯开了一次大公会议，目的是为解决教会有两个教皇的分裂问题。皇帝也邀请胡斯参加，胡斯在得到皇帝安全保证之后，慨然应邀动身前往。然而几星期后，就被教皇约翰廿三世捕捉，以异端罪名关进监牢。胡斯有机会逃跑，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当众辩驳。尽管胡斯在其书信中多次表达了要求召开公开听证会的愿望，但三次听证会根本不给胡斯申辩的机会，更没有给他表达信仰的权利，胡斯只能忍受不公的指控和宣判。胡斯只是被要求回答“是”还是“否”。

最终定罪胡斯的三十条罪状中，有一条是属于“威克里夫异端”，五条涉及混乱教会的组织，四条涉及教职人员，更有多达十二条涉及攻击教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涉及教皇的条款中所体现的胡斯“异端”思想，比如：“教皇并非教会的头、并非彼得的继承人”、“教皇也可能犯错、甚至是邪恶的”，“教会并非一定需要教皇的存在”等等。胡斯这些思想的认知基础根植于圣经是最高权威，作为基督徒要遵循的应该是圣经的权威而非人的权威。胡斯认为他所信仰的一切皆与圣经的教导相一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屈服，因此胡斯拒绝了可能的求生之路，选择了殉道士之归宿。7月6日大公会议的全体神职人员最终确定对胡斯起诉的三十条罪状，宣布他为异端，然后转交世俗权力执行火刑。

4、殉道

经过8个月牢狱的折磨，胡斯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被提出监来带上城门口。

太 27:28-30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1415年7月6日，教廷将他自狱中提出。首先给他穿上全套祭司礼服，然后一边咒诅他，一边将礼服从他身上的一件件脱掉，最后为他戴上一顶纸制的尖帽，上面画着三个丑陋的魔鬼，又写着说：“这是异端之魁。”于是将他绑在火刑柱上，殉道时胡斯以一首“主耶稣怜悯我”慨然归天。皇帝的背信弃义激起了胡斯所在地波希米亚人的愤怒，再加上教皇马丁五世发出谕令，要剿灭所有胡斯和威克里夫的支持者，于是开始了波希米亚人与支持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对抗，爆发了胡斯战争，直到15世纪三十年代才结束。



图 3.31 约翰·胡斯殉道

第四节 共同生活弟兄会

共同生活弟兄会于 1350 年，在荷兰及德国一带兴起，由革若特所创，他向许多渴慕的听众讲道。1374 年有些姊妹也聚集于他在荷兰德文特（Deventer）的住所，形成一个共同居住的社区，一起过着灵修的生活，随后有些弟兄，甚至也有圣职人员参加。共同生活弟兄会产生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强调基督徒宗教教育，希望借教育之法，带动全教会的改革。他们的学校，造就了许多推动宗教教育的敬虔信徒。

1、维塞尔的约翰

维塞尔的约翰（John of Wessel）是那一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从 1445 到 1456 年，他执教于德国埃尔福特（Erfurt）大学。49 年以后，马丁·路德在此获文学硕士学位。许多人称维塞尔的约翰为“世界之光”，因为他攻击赎罪券，清楚地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说：“一个人若以为自己可以靠善行得救，他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得救。”他说：“上帝要拯救的人，即或所有祭司都革除他、定他罪，上帝也会亲自赐他得救之恩。”他攻击赎罪券，也反对“化质说”。

马丁·路德后来说：“如果我曾读过维塞尔·约翰的著作，则我的观点看起来真像全部抄自他的著作。”

罗马天主教不会对维塞尔的约翰置之不理。他被带到麦音慈大主教前，以异端罪名受审，为了保全生命，他只得撤销所有说法，但他仍被下入监牢，于 1489 年 10 月死于狱中。

2、多马·肯培

另外一位深受共同生活弟兄派影响的人是多马·肯培（又译：托马斯·肯培，Thomas a Kempis）。他住在荷兰，写了一本伟大的书——《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书至今仍在属灵文学著作中名列前茅，被誉为世界名著之一。此书教导人研读圣经，逃避世界的虚浮，谦卑背起十字架效法基督跟随主。

3、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Erasmus）被称作“人文主义王子”。1466年生于荷兰的鹿特丹，1506年赴意大利。因对教会不满，于1509年返回英国，发表了《愚人颂》，辛辣地讽刺教皇和贵族的腐败。

伊拉斯谟希望能参与教会改革，但他并没有与教会关系破裂。他公然反对修道主义、经院哲学与拘泥形式的形式主义，他希望用知识和基督的教导使教会脱离迷信。他深信理性与信心、文化与宗教是可以且应该互相协调、融合的。他在个人的生活、写作和教导方面，致力于使文化与敬虔相融合的工作。



图 3.32 伊拉斯谟

1511—1514年，伊拉斯谟在剑桥大学任教。1514年，修道院要求伊拉斯谟回院。经教皇同意，伊拉斯谟保持了对修道院的独立性。1516年，他发表《希腊语圣经新约批注》。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爆发后，伊拉斯谟写了《论自由意志》批评路德，竭力维护天主教。加尔文称他是为了那红帽子（红衣主教职位）而出卖自己良心的人。

伊拉斯谟对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恩典的看法：虽然自由选择受到罪的破坏，却不是被罪恶消灭了。并且，虽然自由选择在这过程中如此软弱无力，并在接受恩典之前，我们比较倾向于邪恶而不是良善，但是除了具有变成第二天性的严重罪行之外，它并没有被全然拔除；只是在变成第二天性的情形下，判断力会模糊不清，并且压倒意志的自由，以至于判断力似乎是被毁了，而意志的自由则全然失落。伊拉斯谟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与《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章第三节的论述相冲突。

虽然伊拉斯谟最后改变了自己反对天主教的立场，但是他的《希腊语圣经新约批注》对宗教改革产生重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原文来重新阅读新约圣经，避免了几千年只有拉丁文对于圣经的垄断。它也动摇了一些天主教的权威，使圣经得以通过原文翻译成各国文字，包括丁道尔的英文圣经译本。当圣经回到人民的手中时，光明就会划破慢慢长夜。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第一章 神使用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

第一节 马丁·路德早期

1、马丁·路德早年生活

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生在德国埃斯勒本城（Eisleben），父亲是个辛劳的矿工。从1488年到1497年，路德在曼斯费尔德的城市学校学习，此后他在马格德堡的大教堂学校里待了一年。在马格德堡，他接受了共同生活弟兄派——中世纪晚期兴起的运动——的教导，深受伯尔纳、多马·肯培等人的作品的影响，真理的光芒开始触动这个少年。1498年，他的父母将他送到埃森纳赫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中，接受音乐和诗歌的教育，成为一名很好的歌唱家。

1501年，马丁·路德进入埃尔福特大学就读。1505年，路德获得硕士学位后，奉父命继续攻读法学。但这一年7月2日，在回家的路上，他在斯道特亨附近突然遇到雷电交加的狂风暴雨。心灵极度空虚和恐惧的路德对保护矿工的圣人——圣亚拿呼喊说：“圣亚拿，救我！我愿意成为一个修士。”出于这个誓愿，他不顾父亲反对，加入了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



图 4.1 马丁·路德

他非常虔诚地遵守修道院的教规，过着最严格的禁欲生活。他每天都做数次忏悔、禁食、鞭挞、折磨身体。就人的努力程度来说，马丁·路德是天主教徒中的天主教徒，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是好修士，我严谨地恪守修道会的一切规则；严谨到一个地步，如果曾经有修士因为修行的缘故而得以进入天堂，我敢说那就是我。”他这话并非骄傲，因为按着修道院的那些规条，他几乎将那些错误信仰做到了极致，修道院里没有人像他如此一丝不苟、苦待己身。一个人每天的心思、言语、行为总有违背良心犯罪的时候，如果他的罪得不到赦免，他里面的控告会不住吞噬着自己的灵魂。虽然路德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挣扎，但由于人的行为离上帝称义的标准仍有天地之遥远，所以称义后的平安和喜乐离一个渴望被称义之人也有天地之遥远。结果，路德不但无法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反而在神对罪人的震怒之中恐惧战兢。他的忏悔神父——修道院的院长约翰·冯·斯道皮茨看着这位已把自己折磨得骨瘦如柴的青年很快就要有生命的危险，就不住地劝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他：“孩子，上帝也不希望你这样。”但路德不为所动。最后，神父想出一个挽救他生命的办法，就是建议他学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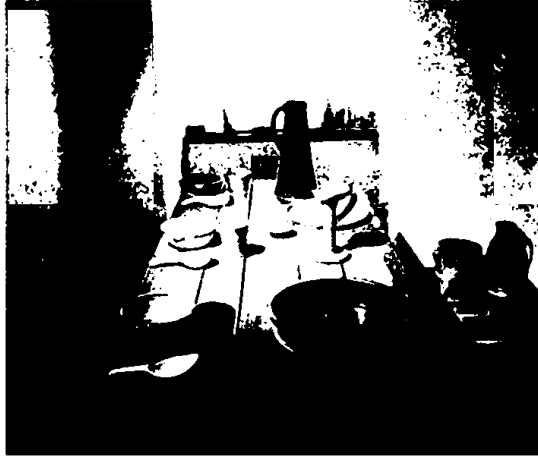


图 4.2 马丁·路德住过的修道院

2、路德到威登堡学习和教学

1508年，斯道皮茨将路德送往威登堡学习。在这里他深受伯尔纳、威克里夫的作品影响，宗教改革的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一年后，路德成为圣经教授，并且学会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除教授道德、哲学等课程外，他开始教授圣经。不过，那时他读的圣经都是教会对圣经的注释，并非原文圣经。

3、罗马朝圣

1511年，修会派路德前往罗马城，去商讨教廷关于将奥古斯丁修会与另一个非常严格的修会合并到一起的事宜。他如愿以偿来到了一直憧憬向往的天主教圣地——罗马，并有机会参加了一个集体朝圣忏悔的仪式。在这里他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在繁琐的宗教仪式中的无望，也亲眼看到了神职人员的腐败和荒淫，于是路德开始对罗马教廷产生了怀疑。

同年斯道皮茨将路德召回威登堡，并指定路德为威登堡的神学博士及他的继承人。斯道皮茨的一切努力虽然确实减轻了路德心灵的一些不安，但无法消除他灵魂的无助。两人始终是好朋友，经常彻夜长谈，直到1524年斯道皮茨逝世。

4、斗室中展开圣经

约在1512年底，路德坐在威登堡修院的斗室中展开圣经，神的恩典怜悯此时临到路德，路德本人后来将这段经历称之为“塔上经验”。至于此经历的具体时间，有人认为在1511年到1513年之间，其他人则说在1515年到1518年之间。在这期间，路德有机会和资格在斗室里认真阅读圣经。当他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经文“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时，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他灵魂的无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喜乐与平安。这就是路德归正的经过。从1517年开始，路德在签名时将Luder改为Luther（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词ελευθερος，意为“被解放的人”、“自由人”），以表明他内心的转折。

第二节 宗教改革的背景

1、天主教的黑暗

此时的天主教会，已将偶像迷信发展到极致，信仰堕落程度远超旧约时代拜诸巴力的以色列人。他们崇拜偶像，敬拜多神，拘泥于繁琐礼仪，从事迷信活动；有的人则直接交鬼，如参加驱魔礼。天主教的节期更是品目繁多，除了圣诞节、斋日、复活节、棕榈节、圣灵降临节、马利亚升天节这些大型节日之外，他们也庆祝诸圣徒的庆节、诸圣徒的殉道节以及来自教会各阶层圣人圣女的庆节或纪念日。从教会礼仪日历或瞻礼单中可以发现，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圣人圣女的纪念庆节。圣人圣女的庆节又分为节日（第一等）、庆日（第二等）及纪念日（第三等），而后者又分为必行纪念日与自由纪念日。下面列举说明他们的一些节期和崇拜仪式，其偶像迷信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1) 节日与庆日

他们的节日和庆日有圣母无原罪节日（12月8日）、天主之母节日（1月1日）、圣母献耶稣于圣殿庆日（2月2日）、天使报喜（圣母领报）节日（3月25日）、圣母访亲庆日（5月31日）、圣母升天节日（8月15日）、圣母诞辰庆日（9月8日），等等。

(2) 纪念日

他们的纪念日有露德圣母日（2月11日）、圣母无玷圣心日（耶稣圣心节后的星期六）、加尔默罗圣母日（7月16日）、圣母大殿奉献日（8月5日）、圣母元后日（8月22日）、痛苦圣母日（9月15日）、玫瑰圣母日（10月7日）、圣母奉献日（11月21日）、圣若瑟的瞻礼日（3月19日），等等。无论是节日的崇拜，还是平时的圣事，他们都完全将上帝的话语搁置一旁。神父僧侣们在其中自我陶醉和表演，善男信女则是无休止的膜拜偶像、焚香、画十字等等。

(3) 圣物的崇拜

中世纪教会搜集的所谓圣物多如牛毛，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找到而成为圣物。他们奉之为圣物的有荆棘冠、裹尸布、刺耶稣的铁钉、耶稣的裹头巾、包婴儿的襁褓布和刺耶稣的圣矛，诸如此类。这些圣物越来越多，不可胜数。不知在哪里捡来的一根木棍就成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木棍，大家便视之如命；不知在哪里弄到的一顶旧帽子，就成为三博士朝见耶稣时戴的帽子。教会借此大肆敛财，以建造放置各样圣物的大教堂。于是他们便建造了宏伟的科隆大教堂，让万人敬仰。各式各样的圣物纷纷被找到，教堂纷纷被建造，各国各民天天醉心于这些偶像。而且，此时巫术横行，每一城市、每一乡村纷纷寻找自己的保护天使或圣徒，仿佛这些天使和圣徒都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人们终日热衷于这些迷信的礼仪和自己神秘的经历，做异梦、见异象、见天使、见使徒甚至见耶稣已成家常便饭。

启 17:2 地上的君王与地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地淫乱的酒。

2、错谬教义

天主教的错谬教义更是数不胜数，最突出的是因功补罪的功德论。那些能替自己补罪的善功包括：念诵数遍祷告文、禁食、捐项、朝圣、斋期、参加十字军及苦刑。他们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还向那些有“分外功德”的圣人买功德来赎罪。

他们极为邪恶地扭曲保罗所说的话，即“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 1:24）！他们据此认为基督的患难于得救是不够的，得救还需要人的功德，但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要和基督一同受苦。加尔文对天主教的功德观如此评论：“他们甚至极端地将赎罪券定义为教皇以其谕令分发基督和众殉道者们的功德。这些人应该因精神异常接受药物治疗，而不是与人争辩……他们否定基督的血足以赦罪、使人与神和好、赎罪，除非对之不足的方面（就如基督的血已枯干和用尽）加以弥补，难道有比这更亵渎基督宝血的吗？”

赛 55:1-2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原文作“平银”）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此时的天主教已经加入敌基督的阵营，其教义完全脱离了基督福音的框架。

3、赎罪券

赎罪券是天主教教会向那些为了偿付某种罪恶、不用自己的善功而用金钱来代替苦刑或善功的信徒开出一张类似支票、在上面宣告该悔罪者已藉付款方式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的正式声明书。赎罪券也被称为“教皇票”。赎罪券不仅可以赎出自己的罪，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赎出死后在炼狱中的亲人。当时神父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刻升炼狱。”这一句极具诱惑力的“应许”，使那些思念死去亲人的善男信女们，不惜倾家荡产来购买赎罪券。

4、大量发售赎罪券目的

教皇利奥十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教皇，但他的雄心并不是要建造人的信仰、复兴教会，而是一心要重修圣彼得大教堂，使之超过其它所有教堂而成为整个世界最辉煌的建筑，借以重塑教皇国的权威。此时，经历了七十年的阿维尼翁之囚，教皇的势力已衰微殆尽；各国诸侯割据一方，没有多少人再理会教皇的圣谕。利奥十世认为，要想使教皇地位恢复到贵格利七世、英诺森四世时期的辉煌程度，只有通过宏伟建筑来实现。他根据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认为“更大的事”就是建更大的教堂。



图 4.3 教皇利奥十世

圣彼得大教堂最初是由君士坦丁大帝于 326—333 年在圣彼得墓地上修建的。利奥十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并于 1506 年破土动工。在长达 120 年的重建过程中，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和画家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相继对其进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直到 1626 年 11 月 18 日该教堂才正式宣告落成。教堂里面的壁画不仅充满偶像色彩，而且多为裸体，无不体现着天主教的亵渎。



图 4.4 圣彼得大教堂内部的豪华

第三节 马丁·路德发起改教运动

1、《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此时已经历了信仰的挣扎和转变，对教皇利用赎罪券大肆搜刮财富的行为深恶痛绝。1517 年万圣节前夕，他宣布反对赎罪券。1517 年 10 月 31 日，约正午时分，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外面，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马丁·路德在《论纲》中指出：“赎罪券的说法与作法完全违背圣经与理性。赎罪券的买卖鼓励了处于罪恶中的人不去思想基督，不去祈求上帝的饶恕，而是通过金钱去行贿于上帝。”虽然《九十五条论纲》的目的并非是号召宗教改革，并未提到“因信称义”的主张，也没有直接攻击教皇，只是路德以一位大学教授的身份对赎罪券作出的神学讨论，然而神却让这一举动成了燎原的星火，以至于后来新教将 10 月 31 日作为宗教改革的纪念日。

赛 52:8-9 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華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

以下是《九十五条论纲》的摘录：

(1)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信徒一生应当悔改。

(2) 这句话不是指着告解礼，即神父所执行的认罪和补罪说的。

(3) 这句话不是仅仅指内心的悔改而言，因为内心的悔改若不产生肉体外表各种的刻苦，便是虚空的。

(4) 所以罪恶的惩罚是与自恨同长久，因为这才是真正内心的悔改，而一直继续到我们进入天国。

(5) 除凭自己的权柄或凭教会法所施与的惩罚以外，教皇既无意也无权免除任何惩罚。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6) 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债，而只能宣布并肯定罪债已经得了上帝的赦免。那留下归他审判的，他当然可以赦免。他若越过此雷池，罪债便仍然存在。

.....

(91) 所以赎罪票若是按照教皇的意旨和精神宣讲的，那么这一切疑问便都要迎刃而解，而且根本就不会发生。

(92) 因此那些向基督徒说“平安，平安”实则没有平安的先知滚开去罢！

(93) 那些向基督徒说“十字架，十字架”而自己不背十字架的先知，永别了！

(94) 基督徒应当听劝，努力跟从他们的头基督，经历痛苦、死亡和地狱。

(95) 所以他们进入天堂，要靠经历许多艰难，而不靠人平安的保证。



图 4.5 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威丁堡教堂大门外面

2、教廷反击

路德此举也得到各阶层支持，并且一些诸侯眼看自己治下的百姓被教廷搜刮至家产殆尽却无计可施，正好借路德的举动遏制赎罪券的贩卖。《九十五条论纲》很快就使赎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销路大减，有些地方已无人购买赎罪券。路德的举动自然会触怒罗马教廷。1518年7月，教皇发出了传票欲将路德传到罗马，路德只要一去必定难免火刑。但由于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和其他德意志诸侯的同情和干预，此举未能成功，教皇只好取消了对路德的传票。此时教皇的代表迦耶坦（Cajetan）正在德国奥斯堡参加国会。教皇写信给迦耶坦，特别授权给他，命令他审问路德并责令路德公开撤销言论；假如路德不肯，则将他解送到罗马。1518年10月，路德和迦耶坦在奥斯堡三次见面。经过激烈的辩论，路德表示绝不撤回他的看法。最后，路德在夜间秘密地离开了奥斯堡。

3、米尔提次软计成功

教皇又派了一位特使米尔提次（Charles Von Miltitz）。此人与选帝侯腓特烈的私人秘书施巴拉丁（Spalatin）非常熟悉，施巴拉丁也是腓特烈派驻罗马的代理人。

米尔提次和路德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向路德陈明利害，并答应路德教廷会考虑他的意见，减少赎罪券的发行，但要求路德向教皇认个错，一切便会立即风平浪静，这样路德便能避免火刑的危险。路德毕竟是一个有限的人，在撒但这种软硬兼施的伎俩下，

于是就答应给教皇写一封屈服的信，承认自己的过失。教皇利奥十世接到路德的“悔改信”时欣喜若狂。1519年3月29日，教皇向路德写了回信，开头便称呼“我亲爱的儿子”，他邀请路德到罗马，并答应负担路费。如果路德真的去罗马，与教皇握手言和，那么刚刚要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便会立刻偃旗息鼓。但神既然动了工，怎会就此停止呢？

神首先使政局动荡。1519年1月，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逝世，帝国要选出一位新皇帝。教皇极其关心这次选举，便将路德的事搁置一旁有14个月之久，不再敦促路德来罗马，更无暇控告路德。同时，神又使用一个仇敌再次唤醒即将沉睡的路德。这个人就是约翰·厄克。

赛 55:11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4、约翰·厄克向路德提出挑战

约翰·厄克觉得如此放过路德简直太便宜他了，于是他写了一本反驳《九十五条论纲》的小册子，挑战路德。这一下再次激怒了路德，于是路德再写了十二篇论文反击。路德再次刚强起来，甚至开始反对教皇的权威了。路德宣告说：“罗马教会超越其它教会的要求，只是根据近四百年来的教皇的颁令。在这以前的一千一百年间，教会中根本没有这种至高无上权威的存在。”厄克无法容忍这种对教皇的攻击，提出要和他进行辩论。

为了准备辩论，路德开始精心研读教会历史和历代大公会议，沉痛地发现教皇的许多教谕都是伪造的。此时在他心里，罗马天主教的支柱近乎彻底崩裂。

5、莱比锡辩论

辩论安排在莱比锡大学。1519年7月，整个莱比锡（Leipzig）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辩论会场设在公爵的宫廷中，有武装的卫队护卫；在旅店中，在用餐时间每一张桌子都有卫兵看守，以防止威登堡学生与莱比锡学生打架。

厄克与路德彼此面对进行辩论。以学识和辩才而言，这次辩论差不多可以造成平手。但厄克用巧计对付路德，使他在最后不得不宣称“康斯坦斯会议对胡斯的某些教导作了不公正的定罪”。这样，厄克便达到了目的，因为他迫使路德公开承认自己与一位被教会正式定为异端的人站在一边。当路德宣称胡斯并没有什么错时，听众激动了起来，萨克森公爵乔治大声喊着说：“上帝啊，帮助我们，这真是可怕的瘟疫！”

路德已经和被定为异端罪的胡斯站在一边，所以他失去了很多支持，立刻陷于孤立的局面。但他和跟随者深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便更加团结，因为真理使他们更加合一。这些跟随者包括马丁·布舍（Martin Bucer）。布舍后来成为改教运动的主要领袖，也是加尔文的帮助者和同工。

藉着反对“教皇的至尊”及“教会会议的无误”，路德公开地和罗马天主教的圣品阶级制度一刀两断。路德立即出版一份报告——《莱比锡之辩的报告》。1520年5月，他又出版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论善行》。这虽是一本小书，却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书中，他开始宣讲“义人唯独因信得生”的真理，并将之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他说：“在所有善行中，最尊贵的一件，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也强调信徒的地位皆平等，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地事奉神。鞋匠、管家、农夫、商人若在自己的工作中荣耀神，就比修士、修女更能讨神喜悦。这是路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教导之一，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使教会脱离了古代及中世纪的伯拉纠主义和禁欲主义，后来也成为新教的重要教义。

之后，有两本书对路德影响很大。在辩论会中，来了几位胡斯派的人，其中两位于会后寄给路德一本胡斯的著作。路德读完此书后，发现他所讲的与胡斯所写的完全一致，从此便以波希米亚门徒自居。另一本书是意大利杰出人文学家瓦拉（Lorenzo Valla）的作品。该书揭露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赝品，这使他不再怀疑教皇就是敌基督。

6、革除教籍

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之教谕》。教谕开头写着说：“主啊，兴起！为你自己而辩；请记住愚昧人如何每日玷污你，狐群如何破坏你的葡萄园，这园早已赐给你的代理人彼得；然而森林的野猪践踏了它，田间的野兽吞吃了它。”

教谕提到路德的教导中的四十一一点，并将之斥为“异端、邪说、诽谤、虚假、冒犯敬虔的耳朵、引诱简单的头脑、拦阻教会的信仰……”。教谕也呼吁所有人焚毁路德的著作，并要求路德及他的跟从者于六十天内公开撤销观点，否则，他们都将以异端的身分被定罪。教谕中命令地方政府捉拿路德及其跟从者，把他们一一下监，所有窝藏路德派的城镇都将遭到“教会禁令”的处置。此教谕在德国的颁布工作交由厄克全权办理。但这时的教皇国哪有昔日的威严？在埃尔弗特，学生们纷纷把教谕投进河里。

为反击此教谕，路德出版了《驳敌基督可咒之教谕》，指出“这教谕用它自己的话，用无任何证明是从圣经而来的话谴责我，而我的论点都有圣经支持……我宁可死千次，也不收回那些被定罪文章的一点一画。而且，他们以异端的亵渎革除我的教籍，所以我如今奉上上帝神圣真理之名革除他们的教籍。基督必定会裁定谁的革除教籍才有效。阿们”。

7、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

路德于1520年下半年出版了三份论著——《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和《论基督徒的自由》。他在《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打破了天主教圣品阶级对恩典的垄断；在《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中，他抨击了天主教将圣礼当作得救功德的错谬，揭露了弥撒是偶像崇拜，化质说遮盖了基督的荣耀。他将圣礼的重点放在上帝的工作和应许上，指出圣礼向信徒印证了基督的工作是上帝教恩应许的实现，强调“圣礼的设立都是为了培养我们的信心”；在《基督徒的自由》中，他肯定了善行源于信心，而神的圣道——基督的福音是信心的源头，总结说“在基督里的信不是叫我们脱离行为，而是叫我们脱离关于行为的错误观念，即脱离那因行为称义的愚蠢道理”。路德的著作在各地疯传，他的小册子大量发行，人们如饥似渴地抢购阅读。全德国的百姓都屏息聆听路德所说的每一句话。人们不是欣赏路德的个人魅力和魄力，而是为他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等圣经真理所吸引。上帝藉真理之光划破了教会千年的黑暗，驱散了教皇国的幽暗，圣灵再一次照亮了人的灵魂！路德不但在自己的国家，甚至在遥远的国外地区也有许多支持者。

太 4:16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8、路德焚毁教皇诏谕

1520年12月10日，成群的学生、教授与市民聚在威登堡城外，欣赏一位教授将薪柴点燃。那教授就是路德，他严肃地将一份份教皇诏谕投入火中，说道：“你既毁弃神的圣者，愿永恒的火也将你毁弃。”直到火焰将法令集和诏谕焚烧成灰，大家才散去。

9、皇帝传唤路德

这时教皇几乎走到尽头，他用尽所有的权柄要使路德屈服，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向属世的最高权位人物——皇帝求助。马克西米连去世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卡洛斯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查理五世（Charles V）。他承继了奥地利与西班牙的领土，又统治荷兰、意大利的大部分，成为继查理曼大帝后领土最大的一位君王。查理五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皇利奥十世于是有了靠山，请求查理五世设法使路德屈服或置于火刑。皇帝立刻下诏，传唤路德出席来年将在沃木斯（Worms）召开的国会。

10、沃木斯国会

在皇帝的安全通行保证下，路德于1521年4月2日前往沃木斯。他知道此行是面对死亡，因此在临行前对他的同工墨兰顿（Melanchthon）说：“亲爱的弟兄，如果我不能回来，如果我的敌人将我置于死地，你必须继续努力，在真理上坚定不移。只要你能活着，我的死就算不得什么了！”

一路上，路德的行程好像凯旋的游行。凡他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瞻仰这一位敢于为德国人民站出来反对教皇，且正为着他的信仰坚定地面向死亡而行的英雄。

4月17日，礼拜三下午四点，路德出现在国会中。在壮观、华丽的场景中，在最高权位的皇帝宝座前，站着普通的修士马丁·路德。路德穿着奥古斯丁修会的黑色修士长袍，旁边站着他的法律顾问耶柔米·谢夫（Jerome Schurf）。一位官员指着桌上的书，质问路德说：“这些书是你写的吗？你要收回这些书，还是继续维护？”

路德以肯定的口气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他恳求皇帝给他时间思考。路德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请求，是想拖延到第二天，使自己在国会前获得听审和当众陈明信仰的机会，以免像胡斯那样，至死也不能分辩。在教皇大使亚良德（Aleander）的领导下，教皇党极力阻挠路德从国会获得听审的机会，但最后失败，国会暂时休会。这说明随着真理被光照出来，政府也受到了文明的影响。

11、“这是我的立场”



图 4.6 路德在国会受审辩护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第二天，4月18日礼拜四，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日近黄昏，整个大厅都挤满了人。现场多数人都记下了路德的演讲。路德用德文讲，后来他们要他以拉丁文重复一遍。当路德演讲完毕，审判官说他并没有讲到问题的重点——“到底要不要撤销所说的话？”，因为皇帝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于是路德说：“如果皇帝所要的只是简明的答案，我可以给他。对我而言，决不可能撤销，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我的良心持守神的话，违背良心的行为既不诚实，也不安全，这是我的立场（Here I stand. 我在这上站立得住）。神啊，帮助我，我无其它选择！”

12、路德被带到瓦特堡

在沃木斯城有一个小门。4月26日夜间，路德从这个小门离开了沃木斯。这门就是今天观光游客所看到的“路德之门”。

徒 23:23-24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亥初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

路德被命令离开沃木斯回到威登堡。等“安全通行保证”失效后，皇帝就将路德逮捕。但几天以后，路德消失了。有人谣传路德失踪，没有人知道路德到底出了什么事。教皇大使亚良德却被人警告说：“即或你躲进皇帝怀中，也会遭人谋杀！”事实上，腓特烈下令手下几位蒙面骑士化装成劫匪将路德“劫持”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瓦特堡（Wartburg Castle）。

这是一间坐落在美丽小城埃森纳的古堡。在瓦特堡期间，路德不再受到风暴的搅扰，写作便占据了他全部的时光。在瓦特堡的10个月期间，路德写了许多著作，并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还写作诗歌，但他强调人写的诗歌不可用于敬拜，在所编辑的歌本上写道：“这个歌本的前一百五十首诗篇是专门用作崇拜的，后面附录的部分在非崇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路德好像一座火山，在1517到1521年间爆发，引起强烈地震，震撼了整整一千三百年黑暗的历史。这不是路德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作为，祂要让祂的教会再次回到五旬节的巅峰。

第四节 德国教会的改革

1、路德改教后德国教会的变革

改教运动是指教会从教义、教会行政、崇拜与生活等各个层面进行的改革，绝不仅是对教会加以改良，而是使教会彻底脱离中世纪天主教的异端错谬并回归圣经的纯正信仰。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德国教会终于离开了捆绑教会千年的大巴比伦，开始回归圣经。许多重大改革被逐步地带进教会，教皇制被弃绝了。路德的神学思想颠覆了天主教神学体系和教会体制，敲响了罗马天主教在德国的丧钟。因此，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教会被冠以很多名字——新教（针对天主教）、复原教（回归初代教会正统）、抗罗宗（联合反抗脱离罗马天主教）等。主要的变化如下：

(1) 彻底颠覆了教皇在教会甚至世界上对基督位置的取代，除去了神人中间的其他中保。

西 2:10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弗 5:23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提前 2:5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2) 人得救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功德、遵守律法，更不是靠教会规条。

罗 3:28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3) 信徒皆祭司，教会没有圣品阶级，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别也被摒除。

彼前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4) 铲除了教会崇拜中(假教会)近一千年的偶像仪式，使基督的真教会再现光明。教堂拆毁的圣物车载船运，不计其数，撒但欺骗人到何等地步！

申 7:5-6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5) 圣礼回归到圣经的吩咐，只有两个，而非七个，打破了可憎的弥撒对人心的牢笼。

林前 11:27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6) 从威克里夫以来，圣经又回到信徒手中。唯有看到圣经，人心才再次苏醒，教会才真正找到她的根基而再次复兴。

诗 19:7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法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王下 22:8-14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希甘、米该亚的儿子亚革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7) 基本上恢复了初代教会的秩序，并在天主教之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条《奥斯坦堡信条》(墨兰顿执笔)，教会开始向使徒时代回归，在真理的规模上建造坚守。

提后 1:13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8) 各国开始掀起改教浪潮。各国君王百姓纷纷离开天主教这一奴役百姓近千年的巴比伦大城，改变了以教皇统治世界的格局，引起以后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

赛 52:11-12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来。你们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華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

(9) 路德的最大贡献也是后来所有改教家公认的教义：选民得救是神的主权拣选，根本不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路德在《论自由意志》中说：“自由意志是罪人自己幻想、捏造的事实，人在犯罪后，根本连分辨善恶的能力也没有。”路德同样强调圣约的家庭性，坚持几千年来为信徒的婴儿施行洗礼的正统思想。

罗 9:16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图 4.7 马丁·路德在为信徒的婴儿洗礼

教会的改革也使教会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时，许多讽刺抨击教皇和天主教的文学绘画作品也开始流行，如流行于 16 世纪的讽刺画《灵魂的运输车》。这幅画具有德国或荷兰风格，用极富想象力的夸张形式将教皇制度比喻为魔鬼向地狱运送灵魂的运输车。画中恶魔抡着木槌，将人的灵魂塞入大桶中，装在牛车上向地狱驶去；车身是教皇的身体，车轮辐条分别由主教、枢机主教和修士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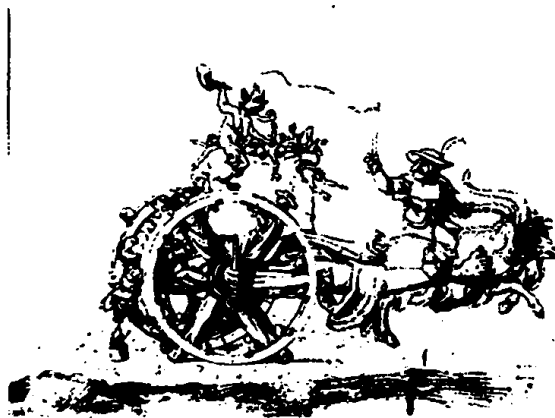


图 4.8 讽刺画《灵魂的运输车》

2、路德神学的局限

由于教会刚刚回归，所以路德的神学中存在着局限，主要如下：

(1) 在敬拜上，路德没有采用圣经限定原则，只强调圣经中禁止的不能在敬拜中使用。清除偶像上，路德认为圣经没有禁止的事物可以保留，所以保留了某些天主教的残余，如圣坛。这致使后来的路德宗和改革宗在敬拜上产生无法调解的分歧。

(2) 在圣餐观上，用基督临在说取代了圣餐化质说，仍有偶像崇拜的嫌疑。

(3) 因为恨恶天主教的圣品阶级制度，路德轻视教会的管理体制。

路德坚持教会在民主制下设立监督，不承认地方有形教会，并将教会置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路德推行教会“访问员”制度，不设主教，只有监督。路德的教会管理制度特点是他给政府很高的地位，认为政府应当高于教会。这有一定原因，当时路德的改教很大程度受选帝侯的保护，加上路德对天主教教会体制的憎恨，使他对改教后教会的体制十分轻忽。

(4) 路德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神学体系。他本人也接纳了其继承人墨兰顿的《奥斯堡信条》，并赞不绝口。因为比起天主教的错谬，《奥斯堡信条》确实是一份基督教信仰陈述，但路德没能及时发觉其中的错误和反律法主义倾向。

3、改革的干扰——闵采尔暴动

托马斯·闵采尔最初曾是路德的同工，宗教改革后开始反对圣经的天国观和因信称义的教义，强调宗教的现世性，提倡改革要用暴动。撒但借这个人再次将宗教改革中信仰的归正转变成地上的革命。路德撰写《为反对叛逆的邪恶致萨克森诸侯书》一文，将闵采尔称为“撒但的工具”，并要求诸侯对其采取行动。1525年初，闵采尔积极领导德国农民暴动，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525年5月，在弗兰肯豪森战役中，闵采尔负伤被俘并被处死。

闵采尔因提出暴力革命理论而被马克思大加赞赏，被其称为“欧洲精神之父”，所以他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五节 路德的助手和支持者

1、墨兰顿

(1) 生平

墨兰顿 (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原名为史瓦兹厄 (Schwarzerd, 德文“黑土”)。他的舅父、希伯来文学家卢希林 (Johanne) 为他改名为墨兰顿 (Melancthon, 希腊文“黑土”)，是要他以希腊人自居，以振兴希腊思想学说为念。墨兰顿从小在私塾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12岁就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一年后他又在卢希林的大力推荐下，进入杜宾根大学就读，并于1514年初获得人文硕士学位，年仅17岁。此后四年，墨兰顿于杜宾根留校任教。1518年，墨兰顿便担任威登堡大学希腊文教授之职，年仅21岁。

在威登堡大学任教期间，墨兰顿与路德成为好友，共同参与改教事业，并多方协助路德。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会上，路德立场分明地反对教皇与罗马教廷的终极权威，与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厄克针锋相对。辩论过程中，墨兰顿适时提供经文或要点提示，使得路德充分发挥其辩才。当然，除了莱比锡辩论，此后重要的神学辩论或对话场合，他几乎是无役不与。

墨兰顿后来撰写了一份信仰告白，提交到1530年召开的奥斯堡国会。这份信仰告白就成为后来有名的《奥斯堡信条》。它是改教后新教的第一份信条，得到路德的赞赏，被誉为“永世不朽之书”。这份信条中虽然有一些偏差，但作为改教后的第一份信条而对教会产生重大影响。



图 4.9 墨兰顿

(2) 墨兰顿的教义及其偏差

墨兰顿不仅执笔了奥斯堡信条，也写了《墨兰顿要义》来阐述他的神学思想，包含了因信称义、信心来源于上帝的恩赐、上帝主权预定、双重预定等基本教义。这些与路德的思想及后来的加尔文思想基本一致，也符合历史上正统的观念。但墨兰顿由于受了人文主义和希腊哲学的影响，在神的主权教义上有许多妥协之处，甚至后来的路德宗（信义宗）也不接受其观点。《墨兰顿要义》中明显提出了道德律也被废除的错误观点，也隐含着神人合作的思想，为后来的异端亚米念、反律法主义、时代论埋下祸根。

《墨兰顿要义》的一些段落摘录如下：

我把旧约则称为属物质的应许加上律法的要求，因为上帝藉律法向人索取义，也应许给人赏赐，即迦南地、财富等，就如申命记 29:10—13。在另一方面，新约无非是不顾律法的要求，而将一切美事应许给我们。新约无条件地应许给我们美事，而并不向我们索取代价，从这里你就看出上帝恩典和怜悯的丰富来。总而言之，福音的荣耀乃在于它毫不计较我们的不义，而使我们得救。

律法既是分作三部分，我要述说每一部分被废除到何种程度，特别是因为它们好像不是同样被废除的。然后我要述说一般作者一致的意见：司法律与礼仪律已经作废，然而道德律却也被重新修订。我首先要讲论道德律。那称为十诫或道德教训的律法已经因新约而作废了，这事从希伯来书作者说上帝因百姓背弃律法而把律法废除所引的话证明了。

墨兰顿最初在圣餐论上倾向于纪念说：“当你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要纪念福音和罪得赦免。圣餐并不是祭物，将它传下来仅是作所应许之福音的纪念。再者，领受圣餐并

不能除罪，只有信心才能。”后来因受路德的影响，墨兰顿也倾向于临在说。

2、施巴拉丁

施巴拉丁（Spalatin）是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私人秘书，腓特烈和路德之间的中间人。

3、妻子凯瑟琳

为了向长达千年之久的圣品人员独身制发起冲击，路德特意选择了一位修女凯瑟琳做自己的妻子。此举非常奏效。在路德结婚后，许多祭司、修士、修女都仿效他的榜样，纷纷还俗，成为改教运动中一大亮点，也是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关键步骤。凯瑟琳也是路德属灵的伙伴和帮助者。当路德软弱灰心时，她用圣经的话激励他。有一次凯瑟琳甚至亲自穿上死人的衣服，然后在背面写上“死里复活”，以此鼓励路德依靠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继续宗教改革的事业。她是神对路德一生的美好赏赐。

4、智者腓特烈三世

腓特烈三世（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与其弟约翰共同治理家族在萨克森的领土。他曾任神圣罗马帝国的助理教务主教，并积极参与了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在位时的改革活动。1500年，他出任新建立的所谓帝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正在此时，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去世。教皇本来是要推选腓特烈当选皇帝，但腓特烈深知，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已是日暮西山，做这样一个帝国的皇帝结局一定悲惨。于是腓特烈聪明地推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为皇帝，即查理五世，因此得到了“智者腓特烈”这个称号。

他是上帝直接用来保护支持马丁·路德的工具。因着他的保护，教皇数次对路德的通牒和抓捕化为泡影；甚至皇帝查理五世要对路德施以刑罚，但因腓特烈的干预也不得不罢手。尽管腓特烈本人的信仰并不明朗，但他也像君士坦丁一样，成为神用来祝福教会的用人。腓特烈退位后，其弟约翰继承了选帝侯职位，并继续支持宗教改革活动。



图 4.10 智者腓特烈三世

第六节 奥斯堡和约

1、哈布斯堡家族的发迹史

哈布斯堡家族显赫，其祖先在六世纪为法国的阿尔萨斯公爵，后来其领地扩张至瑞士北部。1020年，阿尔萨斯筑起鹰堡，名为哈布斯堡，并逐渐将势力扩展到莱茵河西岸流域。1273年，哈布斯堡公爵鲁道夫一世当选为德意志国王。

1282年12月27日，鲁道夫一世夺取被波希米亚国王奥托二世占有的奥地利与施蒂利希公国，成为欧洲新的霸主。而后哈布斯堡家族通过皇室联姻，获得数个国家的统治权。1493年至1519年，出身此家族的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统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

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像哲学家伏尔泰所说：“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人的帝国；更确切地说，它也不是一个帝国。”它所辖领土不过是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等一些领地。哈布斯堡家族都是坚定的天主教徒，这一家族在宗教改革后成为新教国家的死敌。

通过马克西米连精心安排的政治婚姻，他的孙子查理继承了勃艮地公爵一职，成为了西属尼德兰（今日的荷兰和比利时）的首位统治者。1516年，查理的外祖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病逝，查理又成为了西班牙国王（在西班牙被称为卡洛斯一世）。自此，西班牙全国、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撒丁岛、那不勒斯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都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管治领域。1519年，马克西米连一世病逝，查理继承帝位，史称查理五世。

2、查理五世致力铲除改教运动

自从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后，查理五世积极响应教皇的号召，不遗余力地铲除新教。他起誓说：“我要以王位和生命作赌注，全力铲除异端。”他果然一生守住他的誓言。查理五世刚即位就颁布了《沃木斯诏谕》，下令逮捕及处死路德。若不是上帝借智者腓特烈的保护，路德难免遭其毒手。

3、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黑森伯爵菲利普一世一直是坚定的新教支持者。为了使南部诸侯能和路德派联合，菲利普于1529年10月在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ic）安排了一次会议。路德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十七条条款，成为《施马尔卡尔登告白》或《路德告白》。路德在第十条“论祭坛上的圣餐”中坚持圣餐是主的临在：“我们对祭坛上的圣餐持有的观点是圣餐中的饼和酒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不仅被赐予敬虔之人，使他们领受，也赐给软弱的基督徒，使他们领受。”但南部诸侯因着慈运理的影响拒绝签字，因而第一次联盟失败。

1531年2月27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德语：Schmalkaldischer Bund）终于实现，由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大新教诸侯——黑森伯爵菲利普一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腓特烈（智者腓特烈的弟弟）正式建立，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进攻，加入条件就是接受《奥斯堡信条》。这一要求确立了路德宗信仰的地位。联盟决定接纳几个新教国家和城市，但因路德和慈运理在圣餐观上的分歧，联盟没有接纳苏黎世。1535年，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为抵抗哈布斯堡王朝而加入联盟，但后来由于不肯放弃天主教信仰而退出。1546年，新教联盟与查理五世之间爆发战争。查理五世利用莫里斯·冯·萨克森（Maurice）公爵与选帝侯约翰之间的矛盾，应许支持莫里斯出任萨克森选帝侯之

职。莫里斯退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转而支持查理五世，致使新教联盟在抵抗天主教的战争中彻底失败，黑森伯爵菲利普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均被俘虏。1547年3月，莫里斯虽然当选为萨克森选帝侯，但被自己的德意志同胞斥为背叛者。神再一次教导祂的教会，教会的改革决不能完全依靠在这些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君王身上。

诗 146:3-5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

1546年，路德离世，很可能与新教联盟的失败有关。当教会又陷入绝地，转向呼求神的时候，奇妙的事又发生了。正当查理皇帝打算乘机对路德派作进一步进攻时，1552年，萨克森选帝侯莫里斯这位曾背叛新教联盟转而支持查理五世者，却突然又背叛了皇帝。莫里斯本可将皇帝捉拿下监，却放他脱逃。有人问起原因时，莫里斯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够好的笼子。”莫里斯利用法国的支持，打败了皇帝军队。

4、奥斯堡和约

查理五世在攻击新教的最后努力中失败，被迫提出和解。1555年，和解会议地址选在奥斯堡，但查理五世本人拒绝参会，只派代表费迪南参加。费迪南代表皇帝被迫与路德派签订《奥斯堡和约》。根据这项和约，德国境内每个王侯有权在复原教及天主教之间选择自己的宗教，而他领土辖区内的人民则全体接受王侯所选择的宗教。结果德国南部仍为天主教，北部为新教。不久查理五世退位，将西班牙王位让与儿子腓力二世，将奥地利大公让与费迪南。

5、海德堡要理问答

1537年，王子弗莱德（又译：腓特烈）转信新教路德宗信仰，这与他的妻子——布兰登堡的斯巴克林马利亚公主有关。结婚前，公主让弗莱德熟读圣经和马丁·路德的著作，然后才可以结婚。1559年，弗莱德成为德国领地帕拉提那（Pfalz，德语，又译为普法尔茨）选帝侯，称弗莱德三世（Frederick III）。1561年，弗莱德接受了加尔文主义的信仰。自此，路德宗在帕拉提那被加尔文宗所取代。另外，为了教育青年人，弗莱德不顾信义宗所施加的压力，邀请了数位神学家来到帕拉提那的首府海德堡，担任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其中两位年轻的改革宗神学家乌尔西努（Zacharius Ursinus）和俄利维亚努（Caspar Olivianus）在此编撰了一本包括问题和解答在内的小册子——一本适用于学校、教会及讲台信息教导的信仰问答。

1563年的1月，这份问答在海德堡的议会中被采用，即《海德堡要理问答》，为加尔文主义在德国的系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学校和教会讲台都通过这个问答宣讲福音，用这本小册子进行教导。神的儿女们从中大得安慰。此外，弗莱德转信加尔文宗之后，还经常帮助法国的胡格诺派和尼德兰的新教徒进行宗教改革运动。

第二章 瑞士的改教运动初期

第一节 慈运理在瑞士发起宗教改革

1、慈运理简介

乌尔里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又译为“茨温利”，1484年1月1日—1531年10月11日）是瑞士宗教改革的领导者。1484年慈运理出生于瑞士德语区的威得赫斯城。因家境富裕，父母有机会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作神父。慈运理在巴塞尔、伯恩及维也纳各城接受教育，于15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他受到人文主义学者的熏陶，其中伊拉斯谟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对教会的腐败也深恶痛绝，但他一开始采取伊拉斯谟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教会内部的改良慢慢地消除天主教会的弊端。后来听到路德在德国进行宗教改革，慈运理认识到这才是教会的唯一出路，于是他抛弃了改良天主教会的幻想，开始在瑞士实施宗教改革。



图 4.11 慈运理

2、慈运理的改教

1518年，慈运理开始攻击赎罪券和拜马利亚等天主教错谬。路德在莱比锡之辩中的立场以及焚毁教皇诏谕之举深深地感动了慈运理，他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教会的行动。1519年，慈运理成为瑞士重要城市苏黎世（Zurich）的神父，这使他更有机会实施改革，对罗马教会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攻击。1523年，39岁的慈运理在苏黎世议会中主持教义的辩论，并发表了《六十七条》，呼唤人们离开天主教错谬，回归圣经正统信仰。慈运理的讲道很有能力，人们听了他的讲道就纷纷响应。苏黎世教堂中的图像被搬走；弥撒被废止；祭坛、圣人遗物及宗教游行都被弃绝，群众将教皇派往苏黎世兜售赎罪券的参孙逐出教堂大门之外。苏黎世教会和市政府很快宣布脱离天主教的辖管。教会的行政管理、穷人的照应等工作交给市政府来管理；学校制度也随之改革，放弃了修道院式的教学，并教授马丁·路德的教义以及科学知识。从苏黎世开始，改教运动蔓延到瑞士的好几个郡县，但瑞士仍有不少郡县维持原来的天主教信仰。

3、慈运理一生大事记

- 1484年（出生）元旦生于瑞士，家境富裕，受到相当良好的人文教育。
- 1498年（14岁）入维也纳大学，后转巴塞尔大学。
- 1504年（20岁）毕业。
- 1506年（22岁）从巴塞尔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 1516年（32岁）遇见伊拉斯谟，并成为伊拉斯谟的忠实门徒。
- 1519年（35岁）元旦，担任苏黎世大教堂教会之神父。
- 1522年（38岁）因天主教反对，与寡妇安娜秘密结婚。
- 1523年（39岁）在苏黎士议会主持教义辩论，发表了《六十七条》。
- 1523年（39岁）10月举行第二次辩论。多数赞成废除弥撒。
- 1525年（41岁）举行第三次辩论，指出重洗派的错误。
- 1529年（45岁）慈运理至马尔堡（Marburg）与马丁·路德讨论圣餐和教会体制。
- 1531年（47岁）10月11日在卡佩尔（Kappel）战役中受伤战死。

4、慈运理的重要著作

慈运理一生的著作颇丰。和马丁·路德一样，他不仅攻击天主教的错谬，也整理在迦克顿会议之前教会所传承的正统信仰，亦即改教后教会应持守的信经和正统教义，为新教神学思想再次向使徒回归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具体著作如下：

《始与终》（1522年）坚持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并认为人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利；

《六十七条》（1523年）攻击教皇、圣徒崇拜、善功、禁食、节期、朝圣、修道会、教牧独身、告解、赎罪券、炼狱等不合圣经的教导；

《真假宗教诠释》（1525年）详细说明宗教改革的理念及目的，并驳斥当时教会的败坏与谬误。此作品被视为第一本改革宗信条；

《论慈运理的信仰》（1530年）慈运理陈述他对洗礼的观点；

《论神的照管》（1531年）慈运理从自然和神学开始，阐述神的预定、创造和护理及救赎的关系，强调神至高的主权决定自然与历史。

第二节 慈运理和路德的分歧及慈运理的殉道

1、圣餐论的分歧

路德和慈运理都反对天主教的化质说，但在圣餐论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路德虽然也反对天主教的化质说，但没有完全脱离弥撒迷信的影响。他认为在按理施行圣餐的时候，主耶稣的身体临在于饼和葡萄汁的周围——“或在其旁、或在其下”，藉此与信徒相交。这种观点仍有偶像崇拜的残留。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慈运理则倾向于完全纪念说，只把圣餐当成纪念主受死的仪式，没有其他任何属灵意义。这种观点将圣餐礼拜变成了追思礼拜，忽视了圣灵藉信心带给信徒的属灵福分，更否认了信徒藉着圣餐和基督奥秘身体的相连。

直到后来，加尔文才对圣餐进行了完美的诠释，提出了最符合圣经的圣餐论。

2、在崇拜仪式方面

路德本人愿意保留中世纪那些圣经没有明确禁止的崇拜仪式，慈运理却主张简化崇拜仪式，摒除一切圣经所没有指示或命令的仪式。因此，在慈运理派的教会中，画像、雕像和乐器都被移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最简单的公共崇拜方式。在敬拜上，慈运理的改革要比路德更加彻底，其原则成为今天改革宗敬拜的原则，即圣经限定原则。

3、马尔堡会晤

由于慈运理和马丁·路德在圣餐论上的分歧，两位新教领袖始终不能共同合作以对付天主教的军事反扑。为了促成两位改教领袖的和解，德国新教诸侯黑森伯爵菲利普和另一位新教领袖马丁·布舍（Martin Bucer）在1529年为两人安排一次会晤，为两人提供了一次本着圣经进行充分辩论的机会。会晤地点选在德国黑森州的马尔堡，时间从10月3日到5日，持续三天。这就是马尔堡会晤（Marburg Colloquy）。



图 4.12 慈运理、路德在马尔堡的辩论

第一轮是路德对阵慈运理的助手奥克拉姆·帕迪乌斯，而慈运理对阵路德的助手墨兰顿。最后一天，由路德和慈运理这两位改教领袖巅峰对决。他们双方各持己见，但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最后路德在会议桌上愤然写下“这是我的身体”几个字，然后拂袖而去。

4、慈运理殉道

马尔堡会晤之后，路德向黑森菲利普伯爵递交了一份《奥斯堡信条》，以示自己坚定的信仰态度，而慈运理也呈交一份他自己写的《论慈运理的信仰》以表明立场。天主教皇帝查理五世看到支持路德的黑森伯爵菲利普以及萨克森选帝侯们因这场分歧不可能再支持慈运理了，认为这实在是扑灭瑞士宗教改教运动的绝好良机，所以乘机在1531

年命令瑞士天主教的五个州郡联盟共同进攻刚接受新教的苏黎世州郡。慈运理的苏黎世政府不得不得单独面对瑞士天主教州郡的攻击，最终苏黎世因寡不敌众而惨败，天主教州郡联盟取得胜利，慈运理在10月11日在卡佩尔战役中阵亡。据说，他当时正在为一位伤重将亡的士兵祷告，敌人从后面用长枪将他刺死，慈运理死时仅47岁。这位伟大的改教领袖如此死在宗教战争的战场上，实在令人惋惜。这是出于上帝的主权，神有祂自己的美意。然而，如果路德能和慈运理能精诚合作，局势也许就不至如此。我们也应理解这些改教家的软弱，因为他们如此爱慕、持守真理，不能容一点偏差，生怕再次回到天主教的错谬中，给教会造成伤害。但是我们毕竟是有限的，在教义的把握尺度上难免把握得不合宜。虽然如此，慈运理的死没有使瑞士的宗教改革停顿，他的继任者们仍然前仆后继，最终使瑞士成为后世宗教改革的大本营。



图 4.13 乌尔里希·慈运理故居

第三节 布林格继续瑞士的宗教改革

1、布林格生平

约翰·布林格（Johann Heinrich Bullinger，1504年7月18日—1575年9月17日）是瑞士的改教家，继慈运理之后成为瑞士教会的领袖。布林格1504年生于瑞士布雷加藤（Bremgarten），12岁时被父母送到克里维斯公国埃梅里希高级中学（Gymnasium of Emmerich in the Duchy of Cleves）学习。学校离家遥远但颇负盛名，是一所共同生活弟兄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学校。他父亲相信，为了使儿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贫穷是必须的，所以就没有给他任何钱。像路德一样，布林格被要求通过唱歌挣钱。1519年，布林格15岁时，他的父母打算让他仿效他的父亲成为神职人员，便把他送到德国的科隆大学。这是一所天主教大学，布林格在这里首先接触的是中世纪的经院神学。由于路德因反对买卖赎罪券变得家喻户晓，路德和墨兰顿的作品也吸引了他。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1520年至1521年，布林格意识到他需要为自己对信仰问题作出判断，并且在阅读了路德的著作后，他开始自己审视中世纪神学家彼得·伦巴德的《警句》（Sentences）和格拉提安的《教令集》（Decretum）。意识到这两部著作均基于教父的权威，布林格转而去阅读教父们的著作，包括安波罗修、金口约翰、奥古斯丁和耶柔米的作品。这些教父们对圣经权威的尊崇激励布林格亲自研读圣经并获得了学习圣经的第一手资料。他同时也阅读了墨兰顿的教义手册。通过这些阅读，布林格得出结论：路德的教导比中世纪的作家更忠实于教父的著作和圣经。布林格通过这些人的著作和研读圣经接受了改教思想。1522年，布林格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此时，作为一名坚定的“马丁主义者”（马丁·路德的跟随者），他停止接受弥撒并放弃了他之前加入加尔都西修会的打算。

1522年，布林格回到瑞士家乡，继续研究圣经，同时还继续阅读教父们、路德和墨兰顿的著作。1523年，在谈判好特殊条件——不需要起誓修道和参加弥撒之后，他接受了卡佩尔的修道院学校校长一职。布林格在学校为那里的修道士设计了一个阅读圣经和圣经注释的系统，并向他们介绍改革宗信仰。在他的影响下，弥撒被废止了，许多修士成为新教牧师。从1523年，布林格加入了慈运理的改教行列，是慈运理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苏黎世听了慈运理和利奥·尤德（Leo Jud）的几次讲道。在这期间，因受到瓦勒度派的影响，布林格倾向于将圣餐理解为耶稣受难的象征，并在1524年9月，与慈运理交流了自己的观点。1527年，他到苏黎世花了五个月学习各种古代语言，并定期参加慈运理的讲座。在那里，他给苏黎世当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派他随同他们的代表团参加伯尔尼辩论（Bern Disputation）。在那里他首次见到了布舍、安普罗修斯·布莱尔（Ambrosius Blaurer，1492年—1564年）和贝希托尔德·哈勒（Berchtold Haller，1492年—1536年）。1528年，在苏黎世议会的催促下，他离开卡佩尔修道院成为正式的教区牧师。

1529年，布林格的父亲宣布自己多年来都在宣讲错误的教义，现在放弃这些教义并转信新教教义。结果，布雷加藤的会众决定将他免职。几位候选人作为替代者被邀请去讲道，其中包括年轻的布林格。结果，布林格的讲道大有能力，以至于教堂里立即爆发破坏偶像运动，会众自发地将画像清除出教堂并予以焚烧。布林格在布雷加藤继续他父亲的改教工作，被称为“布雷加藤的改革者”而闻名。

同年，布林格和曾为修女的安娜（Anna Adlischweiler）结婚。他的婚姻非常幸福，被认为是光辉的榜样。他的家经常接待逃亡者、同伴和寻求帮助的人们。布林格关心孩子，喜欢和他的11个孩子玩，并写诗作为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他的六个儿子都成为了新教牧师。

1531年10月11日，卡佩尔战役失败，慈运理去世，包括布雷加藤在内的阿尔高州地区（the Aargau region）被迫回到天主教信仰。布林格和其他两个牧师被驱逐出镇。作为新教的重要牧师，布林格很快收到从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和阿彭策尔（Appenzell，瑞士东北部德州）而来的担任牧师职位的邀请。其中苏黎世的邀请最为迫切，因为慈运理在卡佩尔战役殉道后，苏黎世教会就失去了领袖。因为苏黎世民事长官仍然埋怨慈运理在卡佩尔的惨败，就要求布林格在不能评论政府政策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苏黎世牧师的职位。经过数次谈判，布林格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坚持自己有解释圣经的权利，即使该权利与市政当局的主张相冲突。最后，市议会经过商议，认同了布林格的主张，同意他有权利在私下写作中评论政府，保证教牧自由宣道。布林格才同意出任苏黎世牧师一职。

布林格同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了苏黎世。到达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布林格在格罗斯大教堂（Grossmünster，也称双塔大教堂）慈运理的讲坛上讲道。当时的人描述说：“讲坛上大声而强有力的讲道使人认为慈运理没有死，而是从死里复生了。”同年12月，27岁的布林格，被推选为慈运理的继承者，担任苏黎世教会的主席（the Zurich Antistes）——监督苏黎世其他牧师的职位。在议会明确地保证他可以自由、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讲道（即使他必须批评政府时也是如此）后，他接受了这一职位。此后40年他一直承担着这一改教重任，直到1575年去世。

布林格很快成为慈运理制定的教会体制的忠实捍卫者。1532年，当利奥·尤德（Leo Jud）提出教会劝惩应该和世俗权力完全分开时，布林格主张说当地方长官成为基督徒时就不需要单独的教会法庭；并且当民事长官成为基督徒时，施行旧约的制度是合宜的。然而，布林格并非相信教会应完全服从于国家。同样，在1532年，布林格帮助建立了一个地方长官和牧师的联合委员会，以监督教会。

布林格孜孜不倦地讲道。在苏黎世担任牧师的头十年，他每周讲道六到七次。1542年以后，他每周讲道两次，分别在周日和周五。这时他能够专心致力于一个严格的写作计划。布林格采用慈运理逐章讲道的方法，一节经文一节经文地来讲解整本圣经。他的解经式讲道恪守圣经的教训，通俗易懂，清楚明白，注重实践。据统计，布林格在苏黎世大概讲了七千到七千五百篇讲道。这些讲道成为他对大部分圣经经文注释的基础。

布林格还是一位慷慨好客的牧师。他的家向寡妇、孤儿、陌生人、流亡者、和受逼迫的弟兄开放。他免费地将食物、衣服和钱提供给那些缺乏的人。布林格还促使慈运理的遗孀得到抚恤金，并将慈运理的孩子与自己儿女一同教育。他也是一位怜悯人的牧师，写了新教第一本安慰病人和垂死之人的书。苏黎世也接待了很多从意大利北部来的逃亡者，以及在亨利八世于1539年颁布了《六条款法》之后和在爱德华六世死后来自英国的逃亡者。布林格和苏黎世对背井离乡的难民能殷勤诚恳接待，彰显着我们信仰先祖的美德，使宗教改革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英格兰的玛丽一世死后，这些英国的逃亡者返回英格兰并把布林格的作品带回英国。从1550年到1560年，在英格兰，布林格的拉丁文著作《十大论题集》（Decades，全集共分五部，每部十篇讲章，共五十篇）已经再版76次，它的英文译本《神学书籍》（House Book）已经再版136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布林格和马丁·布舍是对英国宗教改革影响最大的神学家。尽管布林格成为苏黎世的教会主席后一直没有离开瑞士，但他和整个欧洲的改教领袖们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发出和收到的信函多达一万五千件，他智慧而平衡的建议引导了許多人。布林格对欧洲的事了如指掌，甚至还编辑了一份关于政治发展的报纸。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承受了妻子安娜和几个女儿死去的悲痛——在1564年和1565年爆发的鼠疫夺去了她们的生命。布林格自己在第二次的鼠疫爆发中也病得很严重。尽管他幸存下来，但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在四十年孜孜不倦和满有果效的牧会生活之后，布林格于1575年9月17日离世。他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关于主权恩典的教导为宗教改革提供了神学和牧会的引导。

他死后，慈运理的女婿鲁道夫·沃尔特（Rudolf Gwalther）接任他的工作。

2、布林格的神学思想

布林格性情温和，能与其他教会保持良好友情关系，又能精准地制定信仰宣言，容纳各方见解而不失原则与真诚。他一生致力于真理的研讨和宣扬，为真道竭力争辩。他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反对路德在圣餐论上的同质说，驳斥重洗派和莱利奥·索西尼（索西尼派创始人）的错谬，但他对各种激进运动不持偏见，在与他们的通信中展现了他那令人赞叹的端庄和温柔。

布林格注重圣经真道，阐明真理，对圣经论、圣灵论和教会论等教义的整理均有贡献。在教恩论上，他论到上帝的拣选时注重以基督为中心，为苏格兰改教家约翰·诺斯克（John Knox）所采纳。在长老会的改革宗神学中，他的影响虽不如加尔文显著，但仍处处可见。他的神学思想能承前而启后，坚持在原则上不能妥协，成为日后改革宗的基础和导向。布林格对圣经的注重，讲台之精工，解经原则之坚持及信条的制定，均为当时的改革事工奠定了稳重的路线。苏黎士作为宗教改革的大本营虽为后来的日内瓦所取代，但布林格的思想仍蕴含在各地改革运动之中。

布林格一生著作丰富。无论圣经注释、神学要义阐明，还是信仰争辩、历史记录，他都尽其能力，写下大小著作 150 部。他对教育事工的改革亦甚有贡献。遗憾的是布林格的著作多为讲章性质，未有严谨结构，又无后继整理，故其影响虽深而不远，以致于当今的教会对这位改教运动领袖知之甚少。

（1）圣经论

布林格随从慈运理和其他改教家的传统，持守圣经为一切教义、真理的中心。圣经是上帝所赐予人的“全备、自足”的启示，使人可以因此得着教恩，也可因此得以成圣。圣经是信心的规范，是圣灵借启示和默示写下的上帝的话，为此圣经的权威是绝对的。圣经的权威在乎其本身，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它足够成为自己的可信的根基。上帝也借着圣经为圣经作证，圣经的解释权也应在于圣经的本身。因为那位默示圣经的圣灵，是用祂自己的话解释自己。布林格强调在解释圣经时应注意文理和脉络的应用，否则就容易凭私意诠释圣经。为此，解经时起码应注意两项原则——圣经文字知识和圣经作者的原意陈述。

（2）圣约论

布林格一开始从慈运理接受了“圣约”的概念并且继续详述。他在早期作品中首先使用“圣约”这个词，来支持他对圣礼的解释。

然而，彼得奥匹兹指出，在以后几十年的继续研究中，布林格的圣约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圣礼的范畴，成为涵盖整本圣经的主线。布林格用圣约阐明神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当他开始将焦点集中在圣约之基督论的性质，尤其在基督里神与人的和好以及人的重生时，这个主题变得更加成熟。布林格并不仅仅在神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议这一事实上面理解圣约，更是看见圣约是神拯救人的桥梁和纽带，基督则是成就此约的代表。他的研究让他成为改革宗圣约神学的先驱，其圣约思想非常接近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神学。加尔文阐述恩典之约以及新旧约的关系时应该在很多地方借鉴了布林格的圣约思想。

（3）教会论

布林格的教会论，奠定了改革宗教会论的基础。今天改革宗教会常用的许多术语和定义，如“教会的标志”、“争战的教会”、“得胜的教会”等，首先出现在布林格的著作中。

布林格在其《十大论题集》的导言中，专门阐述了初期教会的四大议会，目的是阐明宗教改革关于教会体制的教义，完全符合使徒们所写的圣经和初代教会的教导，由此

他肯定了改革后教会的统一性、大公性、神圣性和使徒性。在《十大论题集》之第五部，他以神圣大公教会为题，阐明关于教会的真理。他认定真教会的特征，乃在于正确传扬上帝的道和忠实施行教会的两项圣礼——洗礼和圣餐。使徒的传承并不在于主教职位的历史性传袭（即天主教提倡的使徒统绪），而在于忠实地传讲使徒们所领受和传扬的真理。

（4）教会的定义和标志

布林格为教会下了非常简明的定义：教会就是在天上和地上的所有信徒。他们在信心和真理的教义上合一，共同崇拜和领受圣礼。这教会被称为大公的普世教会，因为她包括了旧约圣徒在内的所有时代和地点的信徒，没有区域、国界、种族、宗派的分别。

然而，这教会会有两种状况：得胜的教会和争战中的教会。前者乃指蒙基督宝血救赎彻底得胜的信徒，是存在天上的，是自从亚当以来直到世界的末了，凡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的信徒。争战中的教会乃指在地上凡宣称基督为主的信徒，是参与属灵争战的教会。布林格认定在这二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罗马天主教所谓的“在炼狱中的信众群体”。

圣经预言教会是长存的（诗 89；诗 132；太 16），不仅天上的教会是长存的，地上的教会也是长存的。由于地上的教会存在于不同地点，因此布林格强调应该有以地名命名的教区或牧区。

布林格陈述的教会以真假形态显现，其中不乏以异教、异端和分裂等罪恶为特征的假教会。布林格承认真教会中有假冒伪善者，他们虽在教会中，但诚然不属教会。为此，教会有其外在和内在的标记。与加尔文一样，布林格认为有形教会的外在标记是真诚宣扬、教导上帝的道，以及合理施行圣礼。他特别强调，我们藉此两个外在标记的运行来肯定基督为自己所设立的教会。外在标记将真假信徒都包括在有形的教会里，使他们都在一位圣灵里，因同一信仰连结，成为一个教会。而教会的内在标记则是圣灵的重生和生命的成熟。

（5）教会的权威和体制

布林格认定教会的存在，不在于人的谕旨和决议的命定，而在于上帝的派定。教会的根基是上帝的道，教会是因基督的道得以建立、栽植和召集。为此，主教职位的传承虽然重要，但若无真道的印记，则毫无分量。布林格宣称，使徒的宝剑乃是上帝的话，上帝所赋予教会的，是传扬真理的牧师和教师（doctors），而不是宣布战争和虚言的首领（ductores）。

对布林格来说，得胜的教会绝不会有所差误。但争战中的教会是可能会犯错的，不仅在行为上会失误，在教义上也常会走偏，但上帝能保守促使她回归，使她重新站稳而更新。教会绝不能宣称自己的绝对无误，但教会却可肯定，她必不致完全抛弃纯正的真理，为此教会的改革和更新是必要的。

布林格极力抨击罗马天主教所坚持的六大教会权柄——祝圣权柄、天国钥匙、法制权柄、传道权柄、教政改造和教会支助权柄。布林格以权利（right）和权力（ability）论述权柄的要义。唯上帝拥有二者，并自己保有其绝对权柄。上帝只将有限的权柄赐予教会。这有的有限权柄乃为事奉性权柄（Potestas Ministerium），是神为了实施自己的绝对权柄所交付于教会去行的；是由上帝而来，单为成就上帝的旨意、建造教会而施行的。任何时候，当教会让这有限权柄越过其权限和使命时，她就成了魔鬼的暴力工具，不再是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上帝的仆人了。

布林格进而肯定了教会的基本职事和运作，包括设立和废弃牧职、教导所领受的道理规范、在爱里照圣灵及圣经原则的行动以及适当施行教会的规范和惩戒。教会能得以忠心施行以上各项职事，乃在于信心和爱的原则。总之，布林格有关教会权柄的论题，乃围绕三个要诀：（1）唯有基督持有教会绝对权柄；（2）基督已将事奉的权柄交付了教会；（3）教会应本乎上帝的道和上帝的灵来实施这些职权。

布林格视教会为信徒的母亲，借着道的传扬孕育信徒，用奶和干粮喂养儿女。罗马天主教已不能自称为信徒之母，因她已失信和失贞。罗马天主教已失真教会之特色，因真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只聆听基督的声音和教导，以祂为生命和救恩唯一的盼望。

布林格亦视教会犹如上帝的国，基督借着圣灵和上帝的道作王管理的国度。因基督每时都在教会中，故祂无须代理。他认定教会只能在恩约里并借着圣礼的约束来施行惩戒。教会一旦参与政务，则会易于趋近暴政。布林格为日后政教分离理念铺好了路，立场可嘉。

（6）教会的合一

宗教改革运动自然导致教会内部产生了分歧，但这不是分裂，而是分别。布林格在教会合一的论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先肯定了居普良传统的教会论的要点，又肯定居普良所指教会外无真救恩、无真光、无真理的论点。但布林格却强调，在争战中的教会却是真假混杂。虽然大教会是在尊基督为王，但这真教会实际上乃包括了世界各地的信徒。为此，灵里真实的合一虽然不变，但其形态上已不应成为一个固定模式，像初代的五大教区一样。故此，判断教会的真假是许可的，也是应该的。这样的判断不是对教会的分裂乃是更新。罗马教会才是真正的与初期使徒教会隔绝了，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不再有真教会的标记，失去了信仰，将圣经践踏在自己脚下，甚至以错谬的决议取代了基督，又败坏了圣礼。“因此，离开这样的教会，不能被视为分裂，而应被视为回归到真实独一的大公教会中，是应该行的必然的途径。”

3、布林格的神学著作

因其渊博的神学思想，布林格的著作颇多，并参与了多个信条的撰写。1536年，布林格与马丁·布舍及利奥·尤德（Leo Jud）等共同制定了《第一瑞士信仰告白》（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这是瑞士的第一份信仰告白，但因未能得到路德宗的认可而被废弃。

布林格在1549年《合一信条》的制定中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加尔文和布林格为消除新教在圣餐观上的分歧而作的一次尝试。为防止教会因圣餐论上的分歧而导致分裂，布林格与加尔文协商制定信条以解决这一问题。加尔文对此举深表赞同。为此，布林格邀请加尔文到苏黎世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加尔文接受了这一邀请，于1549年5月20日，和威廉·法勒尔来到苏黎世，与布林格进行了会谈。加尔文和布林格在圣餐论上达成一致，制定了《苏黎世协议》（Zurich consensus），又称《合一信条》（Consensus Tigurinus），其中含26条有关圣礼的条文。这份协议吸收了日内瓦和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成果，使苏黎士及日内瓦的教会联结了起来。通过这些信仰告白，布林格促进了处于宗教改革初期的瑞士更加坚定合一。

1566年的《第二瑞士信条》是布林格制定信条事工的高峰。德国帕拉提那领地的选

帝侯 (Elector of Palatine) 弗莱德请布林格预备一个清楚完全的宗教改革信仰告白, 要求这份告白应该合乎使徒的教训, 并且代表整个宗教改革的信仰; 不是个人的或地方性的, 而是德国、瑞士、荷兰、法兰西和英格兰许多新教徒所共同信奉的。按着要求, 布林格整理出来《瑞士第二信条》, 并将抄本送去给选帝侯。选帝侯大为赏识, 吩咐人译成德文, 以促进新教教会的统一。同时, 瑞士也觉得需要这样一种信条, 以作为加强联合的基础。加尔文的继承者伯撒 (Beza) 亲赴苏黎世与布林格商议。布林格谦卑地听取了伯撒的意见, 自愿稍加改动, 并且预备了德文译本。除巴塞尔 (Basel) 的教会对它暂时未加认可外, 瑞士的改革宗教会都立刻对它予以承认。1566年3月12日, 新信条以拉丁文和德文在苏黎世问世。不久, 在伯撒监督之下, 信条在日内瓦被翻译成法文。当选帝侯将它呈给德国国会时, 它已成为一本权威的信条。《第二瑞士信条》在苏格兰 (1566年)、匈牙利、法兰西 (1567年) 及波兰 (1571年) 被相继承认, 在荷兰和英格兰也大受欢迎, 甚至被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后来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框架和主要神学思想都与此信条及其一致。《瑞士第二信条》是改革宗教会第一本公认的信条。

第四节 重洗派的兴起

1、重洗派的产生

重洗派源自瑞士, 起源于格列伯 (Conrad Grebel, 1498—1526) 的重洗事件。

格列伯出身贵族, 曾为慈运理同工。他和曼斯 (Felix Manz) 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名门子弟, 并且受慈运理的影响脱离了天主教。然而, 他们觉得慈运理所推行的改革不够彻底, 并且过于缓慢。格列伯希望瑞士的教会能回到新约初期教会那种天天在家中彼此交接的情景。但他忘记了神借司提反的殉道让门徒四散的情景, 更忘记了使徒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建立教会。他那些天天在家中彼此交接的想法只是出于人的盲目热心和对圣经的片面理解。于是, 格列伯屡次催促慈运理照此方式运行, 但遭拒绝。失望之余, 他们开始召聚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晚上在曼斯的家中研经及祷告。

1525年1月, 在一次查经会中, 一位名叫乔治·布老洛克 (George Blaurock, 他原来是位罗马神父, 后来归信新教) 的弟兄突然受了所谓“圣灵的感动”, 请格列伯为他重新施洗 (因他曾受过婴儿洗礼)。在此之前, 他们早已对教会几千年施行的婴儿洗礼提出质疑, 因为他们开始趋向于字面解经, 认为圣经中没有婴儿洗礼的字样。因此, 他们所谓的感动其实是他们心底里早已经要迸发的声音。这声音究竟来自哪里呢? 我们只需看重洗派给后来的教会带来什么果子, 从果子的性质就能知道树的性质。于是, 几千年的教义被这一次的所谓感动推翻。格列伯当即布洛克重新施洗, 重洗派就此诞生。

在此后不久的一次主日聚会上, 布老洛克公然拦住正要上台的牧师, 不让他讲道, 他说: “今天圣灵感动蒙召讲道的不是你而是我。”随后他们便向慈运理表达他们的意见, 并敦促教会也废除婴儿洗礼。慈运理对他们的行径给予严厉的谴责。在重洗派拒不悔改的情况下, 慈运理决定将整个事件提交议会公开辩论。1525年3月, 苏黎世议会举行辩论会, 双方本着圣经, 按照议程进行公开辩论。大会结果证实了重洗派的错误, 决定保留婴儿受洗。不单如此, 议会更下令所有父母都当为婴儿施洗, 否则逐出教会。议会又下令停止格列伯及曼斯晚间私下的研经聚会。接到这命令后, 格列伯及曼斯当晚召聚那些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的人, 决定脱离教会, 秘密传播他们的思想。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2、重洗派遭多方追捕

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重洗派便遭到所有的改教家同声谴责和抵挡。马丁·路德称其为“怪物”，慈运理更是敦促市议会予以清除，布林格称他们为“可怕的敌人和摧毁教会的人”，加尔文也对其骨子里的撒但行径进行揭露。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对重洗派使用的语言甚至比对天主教还要激烈，称他们为“狂热分子”、“恶棍”、“疯狗”。

1525年3月，格列伯、曼斯连同二十位重洗派的信徒被捕。格列伯从狱中逃脱，却染上瘟疫死亡；曼斯则被判死刑。布洛克逃出苏黎士后，仍四处宣道，但于1529年8月被天主教当局捕获，被判火刑。在宗教信仰上不共戴天的新教和天主教，竟然在对重洗派的立场上一致，由此可见改教家们预见到重洗派日后会成为比天主教更可怕的摧毁教会的势力。他们的预见为今天教会的堕落所证明。

3、重洗派的发展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许米亚（Balthasar Hübmaier）于1525年被捕入狱，被释放后，逃到莫拉维亚（Moravia），在那里宣扬重洗派的信仰，使莫拉维亚成为重洗派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而且，这里的重洗派比其他地方更激进和极端，主张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张凡物公用，因此，后来的莫拉维亚成为敬虔运动的大本营，他们的信仰和重洗派如出一辙。

1533年，一位瑞士弟兄会传道人胡特尔（Jacob Hutter）加入奥地利的重洗派，后来成为他们的牧师。于1536年被判火刑之前，胡特尔采用一种严格的公社生活管理制度，将每个单位称为一个“弟兄社区”（brother-estate）。有些重洗派的领袖则更出格。一个名叫赫德（Hut）的领袖，预言基督将会来临，在地上建立王国，到那时候，基督便将刀剑交与被拣选的子民，杀掉那些贵族和教会权贵。不久赫德便被捕，判处死刑。

这几位重洗派的创始人相继去世后，重洗派仍迅速地发展，遍及瑞士许多县郡、奥地利、波希米亚、德国南部，直到莱茵河谷，又抵达荷兰。在迅速蔓延的同时，重洗派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异端。他们只按字面解经，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果真就站在屋顶上宣讲圣经；有些人真的变成小孩子的举动，甚至撇下家庭；有些人则声称遵从耶稣“不要为衣著、食物忧虑”的教训，竟然一丝不挂地四处游荡。他们也极“重视”末世的预言。有一位名叫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的人强调幻影说的基督论和千禧年王国的到来，预言主耶稣于1534年再来，而降临的地点斯特拉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霍夫曼被捕后，他的一位追随者面包师约翰·马提斯（Jan Matthys）声称自己就是主再来前的先知以诺，并纠正霍夫曼的说法，宣称主来不是降临在斯特拉斯堡，而是在明斯特，于是他在明斯特（Münster）领导重洗派起义，建立所谓明斯特王国。这是一个没有律法的“自由王国”，数以千计的人自德国、荷兰各地涌进明斯特城。当地的天主教和新教联合起来围攻这群疯子，将明斯特城重重围困，在短暂的“准许离城恩典时期”过后，旋即展开攻城。马提斯于1534年4月在企图突围中战死。

马提斯死后，雷登·约翰（John of Leyden）继任。他竟在被围的城中自封为正义之王，强迫信徒必须实践共产，即凡物公用，而且宣称自己每天都有从上而来的启示。由于在长期的斗争中失去了很多男人，他们根据旧约就实行一夫多妻制。明斯特最后于1535年被攻破，雷登被捕处死。从以上种种果子看出，这绝非是圣灵结出的善果，分明是假先知扰乱整个世界的毒枝。

4、重洗派的错谬思想

重洗派错谬甚多，下面仅列举一部分：

- (1) 他们否认信徒的子女接受婴儿洗礼；
- (2) 他们推崇个人的灵性神秘经验，认为人能完全圣洁；
- (3) 他们否认许多教会正统的教义，甚至否认三位一体；

(4) 他们主张信徒彻底脱离政府，认为政教合一使教会腐化最严重的罪，禁止信徒在政府内担任任何公职；

(5) 门诺在其《基督教教义根基》一书中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所有人的原罪，这观点演变成后来的亚米念主义的普救论。

5、门诺

门诺于1524年在自己家乡荷兰的弗里斯兰被立为天主教神父。直到1536年，他才脱离罗马天主教，加入弗里斯兰重洗派。他在荷兰及德国各地旅行，每到一处，就将信徒组成小教会，藉讲道及写作劝勉他们。不像重洗派的前任们那样异端放任，门诺采用许多温和的措施，反对政变和暴力。他承认一些正统教义，如原罪。他也承认上帝拯救人是出于祂的恩典，但否认这恩典是出于神的预定，因他认为这样说就把上帝当成罪恶的创始者，认为这是亵渎。



图 4.14 门诺

门诺更反对路德的因信称义观，认为因信称义就是反律主义，认为称义还是要靠人的行为。他曾讽刺路德，说：“他们唱起一首赞美诗，绳索断了，我们自由了，赞美上帝，啤酒的酒气从他们的鼻子里流出，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淫荡，他们都是好兄弟。”他这种将信心和行为完全割裂的思想是对因信称义教义的极大歪曲。善行是信心必有的果子，一个具有真信心的人怎么还会像门诺所说的那样继续过着放纵的生活呢？



图 4.15 美国滨州的某爱门派家园

起初的重洗派遭到多方追捕，但门诺采取了一些温和措施后，这批信徒就以“门诺派”取代了“重洗派”，其思想在荷兰传开。由于从前对重洗派的屠杀过于残忍，所以门诺派很快得到各国家的同情和接纳，新教也不再激烈地反对他们了。但他们反对婴儿洗礼、主张政教完全分离及强调个人灵修经验等观点并没有改变，甚至许多门诺派信徒至今仍过着极端的生活。今天在美国的宾州生活着一个极端门诺派——爱门派，他们拒绝一切现代科技用品，不用化肥，不用电灯，并乘坐马车。

重洗派的思想对后代世界影响之深超乎想像，许多异端如贵格会、塞尔维特都源于重洗派，后来的浸信会和弟兄会也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现代的五旬节运动也以它为前身。我国家庭教会多数都是弟兄会背景，所以现在多数人仍将重洗派视为正统。今天的福音派，其反对婴儿洗礼的教义也都源于重洗派。可以说，重洗派是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旁边生出的最大的野瓜藤。

第三章 加尔文的改教运动

第一节 法国的宗教改革初期

1、赖非甫尔

雅克·赖非甫尔·戴塔普勒（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法语），1455年—153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神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1512年，即在路德、慈运理开始宗教改革之前，法国巴黎大学的赖非甫尔在摩城已经写道：“上帝因信赐给我们义，使我们得以靠恩典称义而得永生。”



图 4.16 赖非甫尔

赖非甫尔后来着手翻译《新约圣经》。这一工作使他受到法国天主教索邦神学院的怀疑，但是他得到国王及其姐姐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保护。当路德的德文圣经在威丁堡出版时，法文的《新约圣经》也在摩城发行了。摩城主教不惜工本，在他的教区中努力购买后销毁以拦阻传播；但不久摩城的人民仍都得到了圣经。法国的宗教改革就这样开始了。1518年以前，路德的所有著作自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及巴塞尔源源不断地涌入法国。两年之后，没有一本书比路德的书更畅销，以致一位主教说：“老百姓都被这异端的生动风格带偏了！”

法国的天主教神学家们惊慌了起来，开始出版单张以对抗改教运动，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及赖非甫尔的法文译本均被斥为反教会、反圣灵之作。但改教运动已无法停止，在城里就已经有许多路德的跟从者。第一批投入改教运动的多是商人及技工、中产阶级及上层阶级。他们大多花大量时间读圣经及路德的著作。在法王的姐姐玛格丽特的鼓励下，一个“小组读经”聚会在宫廷中也秘密进行。许多宣传路德信仰的单张，持续不断地发行，“路德瘟疫”一直在扩散、流传。除了贵族外，社会各阶层中都有拥护路德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据1534年的一项估计显示，仅巴黎就有三万路德的跟从者。

2、威廉·法勒尔

威廉·法勒尔（William Farel, 1489年—1565年9月13日）生于法国东南部的加普，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是瑞士纳沙泰尔州（Neuchâte）、伯尔尼、日内瓦和沃州的改革宗教会的创建者。他原是赖非甫尔的学生，父母是虔诚的罗马教徒。法勒尔从小被教育要以绝对的顺服接受教会的训诲，就像保罗一样“按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徒 26:5）。

法勒尔心中火热，除了热心苦修和敬拜偶像，他还发誓要除灭一切胆敢反对天主教会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当我听到任何人说话反对教皇时，我就咬牙切齿，如同一只狂怒的豺狼一般。”

后来他听到了改教家的教导：“救赎乃是出于恩典”、“那一位无罪的被定了罪，罪人倒得蒙赦免”和“唯有基督的十字架能打开天国的门，关闭地狱的门”。这些话在他听来犹如从天上传来的声音一样。法勒尔欣然地接受了真理，在悔改之后得到了神儿女的自由，摆脱了遗传的束缚。

后来摩城就遭受了逼迫，传讲改革信仰的教师四散逃走。赖非甫尔到了德国，法勒尔则到法国东部他的故乡去，在他儿时的家乡继续传播真光。不久，法勒尔又逃到日内瓦。

徒 8:1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3、柏坤

柏坤（Berquin，1490年6月—1529年4月17日）是法国的律师、语言学家和改教家。柏坤大约于1490年出生在维厄柏坤（Vieux-Berquin，位于法国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时也是忠心拥护罗马教，还特别憎恨路德派。在接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学者如伊拉斯谟、赖非甫尔之后，被上帝引领去研究圣经，接受了真理，改信新教，并主张法国的天主教教会应该从内部进行改革。他强烈地希望法国能够脱离罗马教皇的辖制。柏坤以他的天资和口才，勇敢地放胆传讲福音。由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在巴黎有极高的声望，所以他的传讲大有果效，以致于天主教徒说：“他比路德更坏。”他的著作激起了传统学者的强烈反对。然而，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和他姐姐支持他。

一天，巴黎一个街口的童贞女马利亚神像被人损坏了。全城大大骚动起来，主教们把矛头指向柏坤，修士们抓住柏坤。但此时由于国王的態度举棋不定，所以修士们也拿柏坤无可奈何，不久便释放了他。国王法兰西斯一世虽然是天主教徒，但在政治上与支持天主教的查理五世是死敌，此时他正打算加入新教联盟，所以法国的逼迫暂缓一段时间。

当国王退出新教联盟，又开始支持国内的天主教时，逼迫又开始了。柏坤又遭到逮捕。国王为了避祸自巴黎引退，这样僧侣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吧柏坤带到刑场。

徒 6:15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整个巴黎万人空巷，都来看柏坤这一著名人士被处以火刑。看见柏坤临刑前面目安详，没有一丝惊恐和惧怕，人们感到十分诧异说：“他像一个人坐在圣殿中，默想圣洁的事。”他们在刑场上绞死了柏坤，然后把他的遗体吊在火焰中烧尽。看到他那安然死去的情景，在这人山人海，有一个年轻人的心被深深打动了，他就是在巴黎读法律也笃信罗马天主教的约翰·加尔文。

徒 7:57-58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第二节 加尔文早期

1、早年

约翰·加尔文于 1509 年 7 月 10 日生于法国巴黎东北六十里之诺阳（Noyon）。他的父亲格瑞德·加尔文（Gerard Calvin）是本城教会主教的书记，所以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为教会的神父，以承继父职。1532 年，诺阳流行传染性的瘟疫，父亲便立即让年轻的加尔文离开家乡赴巴黎大学读书，学习作一名神父所必须的知识，主修神学、拉丁文、伦理学与哲学。但加尔文对做神父似乎不感兴趣，反而喜爱法律，在这一点上正和马丁·路德相反。1527 年，加尔文转入奥林斯大学（University of Orleans）专攻法律。他的父亲可能也考虑到律师职业能使人致富，因而也改变了对加尔文的人生方向的期望。1531 年加尔文又转入柏吉司法学院，在著名的法学家阿凯琦（Alciati）门下受教。加尔文对法律的研究使其法理性得到训练，为他后来成为真理的斗士作了预备，这就如保罗在迦玛列门下接受了律法训练一样。

2、改信新教

加尔文在青年时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随父母过一个循规蹈矩的宗教生活。1523 年在巴黎读书的时候，他目睹了法国贵族柏坤（Berquin）因翻译传播路德作品被焚在火刑柱上而牺牲生命。加尔文的心灵被触动，便开始阅读一些被偷渡到法国的路德的作品，同时自己也深入阅读圣经。



图 4.17 加尔文

在奥林斯求学时，他住在一位路德派商人福尔治（Etienne de la Forge）家中。他的住处很快就成为宗教改革的聚会处。此时圣灵借着圣道已在加尔文心里动工，因信称义的真理越发牢固地占据他的心灵。1533 年神主权的恩典临到加尔文。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话：“当我的心固持虔信教皇的迷信时……可怜我的神，胜过我的心，以突然的改变制服我的心而使之温顺……”数年后在他给莎多立托（Sadoleto）写的信中说：“我所忠实遵守的律法把握住我的良心，叫我深深感到罪。我试过赦罪文、悔过苦行与代求，但我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与解脱。”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改信新教之后，他立刻着手研究圣经和宗教改革的信仰。他也阅读教皇派的文章和古代教父的著作，目的是希望在改革的幕后从事写作，以著书为宗教改革运动服务。他的信仰和思想，在法国新教徒中间已经小有名气。

3、克普事件

法兰西斯一世此时在与查理五世争夺权力上需要教皇的协助。为了讨好教皇，法兰西斯一世决心铲除新教。逼迫的爆发首先临到克普的头上。克普(Nicholas Cop)是加尔文的至友，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按当时的习惯，新选校长要对公众发表就职演说。克普于1533年11月1日发表题目为《基督教哲学》的演说，其中充满了新教的观念。该演说内容高举神的恩典，提到“人得教是因信称义，非靠赖人的功德”，并希望神“开通我们的心窍，得信福音”。

人们认为这篇演说词是出于加尔文所撰的稿。据说加尔文这篇讲词的手抄原稿现今仍存于日内瓦图书馆。究竟是加尔文的原创还是加尔文的抄写，已无据可考，但此演说词的确表现了他们共同的信仰。这一篇演讲惹起了当局的愤怒，当局立即将克普定为传播异端者，并决定将他和他的朋友都加以逮捕。克普逃往瑞士的巴塞尔(Basel)，有警官奉命至加尔文住所去逮捕加尔文。但加尔文被朋友通知，他像使徒保罗一样，被朋友用绳子由窗户把他放下，化装成园丁逃往城外，开始了他的亡命生涯。

林后 11:32-33 在大马士革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逃亡中的加尔文得到了倾向宗教改革信仰的国王姐姐玛格利特和法国改教前辈赖非甫尔的帮助。经过短暂的接触后，赖非甫尔很赞赏加尔文，预言加尔文乃是“在法国恢复神国的杰出工具”，虽然赖非甫尔和加尔文对改教有分歧——赖非甫尔受伊拉斯谟的影响，主张从教会内部着手改革；然而加尔文认为教会败坏到如此地步，必须拆毁重建。

4、《基督教要义》第一版

在法国，1534年10月19日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那一天早晨巴黎城贴遍了从瑞士输入的标语，包括公共场所、官厅、教会，甚至王宫。这些标语都反对天主教两项基本教义：弥撒——以圣餐为基督牺牲的重演和化质说——偶像崇拜。传单中也称天主教的神父为背道者、豺狼、渎神者、假牧人。张贴此标语者乃新教信徒马克特(Marcourt)及其门徒。结果，他们立即遭受残酷的迫害，多人被逮捕下监。有六位新教的领袖被捕后，被绑在悬木架上，下面有火焰，被人用绳子系下，置于火上，然后再悬起，上下数次，直到他们掉在火焰中被活活烤死(一种新的火刑)。天主教当局决心扑灭他们所称之“抗罗宗瘟疫”的改教运动。



图 4.18 新教的领袖被活活烤死

由于法兰西斯一世此时需要德国抗罗宗的协助来抵抗查理五世，而逼迫却愈演愈烈，法兰西斯一世担心事情闹得过大而得罪德国抗罗宗，所以他指控法国的新教徒为重洗派，诬蔑他们捣乱政府。他声明自己并非反对宗教改革的观点，不过是反对他们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意见而已。对这些卑鄙的谎言，亡命至瑞士巴塞尔的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他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第一版（与1559年最终版的八十四章比较，初版只有六章）。为了避免危险，加尔文在初版中使用阿路求那斯（Alcuinus）的名字。在正文之前，加尔文写了一封致法兰西斯一世的信，提醒他作为一名君王在神面前的责任，并为法国受迫害的新教徒辩护。加尔文以他那严谨的思路为强加在新教头上的罪状一一列举，逐条辩护。加尔文说：“我是为一切信徒辩护，因此也是为基督的真理而辩护。这真理目前正在法国遍地受践踏迫害，处于绝望的情况中。我们是和平诚实的人，即使在流亡中，我们没有停止为您国家的繁荣祷告，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学会更能忍耐，更为谦卑，更有节制。我们中间若有谁以福音为骚乱的借口，您可以依法惩办，但您却不可责怪上帝的福音。陛下，您若心平气和地坐下读一读，我们将不会轻视您的重新开恩……”但这位残酷的君王怎有暇去读这本能使他脱离地狱苦刑的书？加尔文以后在诗篇注释的序言中写道：“我的首要目的即在解放我的同胞脱离那耻辱，他们的死在耶和华中看为宝贵；其次因多人受同样残酷的威胁，希望至少在别的国家为他们的受苦可以引起一些同情感。”

《基督教要义》成为了改革宗教义的基本教材。1541年，完整的《基督教要义》被翻译成法语。1550年，欧洲印刷业创始人罗伯特·艾田奇迹般地从巴黎来到日内瓦，于是《基督教要义》得以大量出版。后来《基督教要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整个世界也随之改变。

第三节 首次在日内瓦的侍奉

1、加尔文第一次到日内瓦

因为法勒尔开始在日内瓦传讲福音真理，日内瓦的新教徒人数猛增。1532年，教皇克雷芒七世派人在日内瓦出售赎罪券，激起了市民的反抗。在法勒尔的带领下，日内瓦的新教徒开始抵制赎罪券的兜售，并与重回日内瓦进行镇压的主教和萨伏伊公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在伯尔尼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法勒尔勇敢无畏，在一些地方遭毒打和追杀，1530年至1535年期间，数次死里逃生。1533年，日内瓦议会召开了一个二百人的辩论大会。参加这辩论的是天主教人士与抗罗宗人士，目的是表决本城的宗教，因为二者不能共存，只能选择其一，结果抗罗宗获胜。1535年6月在圣皮埃尔教堂举行第二次辩论，持续四周，新教依然获胜。公爵的军队进攻日内瓦但被坚强的日内瓦民众打败。1536年5月21日，日内瓦议会发布了进行宗教改革的法令，废除了弥撒、圣像与圣物崇拜，宣布接受新教。从此日内瓦成为新教的又一个大本营。

1536年在加尔文看来乃是多事之秋。就如我们前面所说，加尔文打算专心致力于研究和写作，认为如此他能够有效地帮助宗教改革事工。在德国的斯特拉斯堡有几位著名的新教领袖，有一所兴盛的大学，还有有益于将来的出版工作的印刷工厂，于是他选择了斯特拉斯堡，以之为最适当之处。当年8月加尔文从里昂起程赴斯特拉斯堡。当时法国法兰西斯一世正在与查理五世作战，所以他必需绕道而行。有一天他计划先到瑞士的洛桑，但时间晚了，他只好在莱芒湖西岸的日内瓦先住下。在神的护理之下——神用历史上的事件（如战争）来实现祂的目的，加尔文抵达日内瓦城。

此时的日内瓦已经宣布接受新教，成为新教城市。加尔文路过日内瓦，本来打算只住一夜，第二天就起程前往斯特拉斯堡，但事情没有按照他所计划的进行。法勒尔自从读了《基督教要义》就颇为景仰加尔文，得知加尔文来到日内瓦，认为是神垂听了他的祈祷。法勒尔认为自己脾气暴躁、缺乏组织能力，而加尔文才华出众，正是领导日内瓦宗教改革的最合适人选，所以他马上到加尔文所住的旅馆邀请他留在日内瓦工作。加尔文婉言拒绝，他认为自己不能胜任。他是一个羞怯、勤奋与小心翼翼的人，他的心愿是安心写作。但法勒尔立即以神的审判来威吓他：“我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对你说，你若以自己的研究作借口不留下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要咒诅你，因为你寻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基督的荣耀！”性情本来懦弱的加尔文当即屈服，答应留在日内瓦。这实在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咒诅”。



图 4.19 法勒尔的“咒诅”

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用法语讲道。日内瓦的母语是法语，语言的相同也使日内瓦民众对加尔文产生一种语言上的认同感，而且他的讲道真理纯正、逻辑清晰，因此他的第一篇讲道就博得听众的好评，甚至有人邀请他第二天为头天不能参加者再讲一次。

2、洛桑辩论

1536年9月，新教城市伯尔尼为了解决从萨伏伊公爵夺得地区的信仰的争论，在洛桑召开由170多位神父和新教牧师参加的公开辩论大会。新教一方的代表就是法勒尔和维雷，加尔文也出席了大会。辩论持续了一周。一天，天主教一方发言人用古代教父的作品证明圣餐用的饼是如何变成基督的身体的。他说：“如果你们知道这些先贤教父们是怎么写的，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的观点是遭咒诅的。”加尔文按捺不住了，他在巴黎学习时阅读过的教父们的许多著作此时发挥了作用。他站起来以惊人的记忆力引述居普良、特士良、屈梭多模、奥古斯丁等教父们的话，甚至说出哪一句话出于哪本著作，反驳对方的观点。他的辩论简直无懈可击。讲完后，人们开始骚动起来，都争先挤上前去要看一看这位面色苍白憔悴的年轻人的尊荣。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尼西亚会场，看到了年轻的亚他那修的形象。他们是一位圣灵所雕琢出的器皿。听完加尔文的讲论，当场一位方济各会教士大声惊呼说：“这才是真正的教义。”他同时呼求上帝饶恕他长久以来跟随罗马天主教错误教导的大罪。接下来的一个月，洛桑周围地区有110位神父、80位教士纷纷脱离罗马天主教而转向新教。此时人们开始知道加尔文的名字。

3、被逐出日内瓦

日内瓦市议会（City Council）是由25人组成的小议会和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组成。小议会是政权的中心，其核心是由民众直接选举的四位执政官。到日内瓦后不久，加尔文与法勒尔共同草拟《信仰告白》（Confess of Faith），为后来教理问答的模型，被市议会采纳。议会要求人们陆续到皮埃尔教堂宣誓，忠于此《信仰告白》。但反对的声音也旋即而起，那些自由散漫惯了的人高呼：“谁给这几位法国佬这样的权力？”加尔文在市议会通过了《信仰告白》后，又将四项对日内瓦教会进行改革的措施交给了小议会。这四项措施是：

一、教会有权对会员施行惩戒，主要是停止圣餐和开除教籍。圣餐虽应每周举行，但考虑到人的软弱，可以每月举行一次（后来议会决定还是先以每年四次为宜）；

二、按圣经修改婚姻法；

三、儿童必须接受《教理问答》的教导；

四、敬拜时必须唱诵诗篇，而且不用琴伴奏。

四项改革措施中遭到最大反对的就是第一条。一直以来，对教会会员的惩戒都是政府的权力，今天这位牧师要将这权力收归教会所有。“这些外国人要干什么？”人们开始嘲笑这些牧师。然而，加尔文、法勒尔等牧师们依然坚守着讲台，忠心牧养，在谩骂声中不断探访各个家庭。

加尔文严谨执行《信仰告白》，按律法禁止跳舞、关闭赌场并限制酒楼营业时间，这引起了多人的憎恨。有人以为加尔文在控制圣餐的权利，因为加尔文规定长老在举行圣餐之前到各家探访，查问教友的行为，看是否具备分领圣餐的资格。他们认为这样做太过严格。至于劝惩的权柄，大多数的市议员也不愿把开除教籍的权柄交给教会。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这时教会内部也起了波澜。一位在洛桑刚转信新教的牧师卡罗利忽然指责日内瓦的牧师们不信耶稣是神，加尔文亲赴洛桑，为自己和同工们辩护，讲话激动时咳嗽不止。后来卡罗利又皈依天主教，回到法国继续攻击这些牧者。

反对加尔文的势力越来越强，1538年2月3日，日内瓦民众选举出三位新的执政官，都是与加尔文为敌的自由派子弟。他们一上台就找借口赶走了小议会中支持加尔文四项教会改革主张的议员，竟然在没跟教会任何牧师商议的情况下，规定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五旬节作为圣日来庆祝，并设立“公开圣餐制”（open communion），命令牧师必须向所有的人分领圣餐，否则禁止他们讲道。他们还把反对政府这些恶行的库劳德（Coraud）牧师——加尔文的一位同工投入监狱。加尔文和法勒尔前往市议会辩理无果，回来时竟被许多人围攻。议会要求他们明天复活节向所有人分领圣餐，并威胁他们：如果不屈服，就会被赶下讲台。晚上，捣乱分子向加尔文的住宅丢石头，并于夜间向他的卧室开枪，大声喊叫：“把卖国贼丢在莱纳河中。”

徒 17:5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举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

第二天，两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分别走向圣皮埃尔教堂和圣彼得教堂，他们谁也没有预备圣餐。加尔文愤怒地向下面的人群讲道：“你们如此地向十字架上的耶稣犯罪，怎么还可以伸手领祂的圣餐？”一些愤怒的人挥舞着宝剑冲向加尔文，加尔文的朋友们排成人墙来保护这位忠心的牧者。

徒 19:29-31 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局势如此混乱，为了维持所谓的稳定，议会于礼拜一召开紧急会议，并潦草通过了放逐的判刑——加尔文、法勒尔和库劳德必须于三日内离境，永不准返回。这些改革家们不得不匆忙地整理行装离开日内瓦。这是加尔文和法勒尔第一次被议会驱逐出日内瓦。加尔文此时已经在这个城市事奉了20个月。

4、斯特拉斯堡的传道（1538—1541）

当加尔文从日内瓦被放逐后，他首先想到的地方是巴塞尔，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写作。但途经德国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时，因为那里有许多从法国逃来的难民，急需一位牧者，该处的改教家马丁·布舍（Martin Bucer）便邀请加尔文留下。加尔文拒绝有十周之久，然而布舍仿效法勒尔所用的策略来威胁加尔文，说如果他拒绝，“上帝知道如何找到叛逆的仆人，就像找到约拿一样。”加尔文不得不留下。1538年9月8日，他在那里初次讲道；1539年7月他被拥戴为该城公民。

除了生活稍微贫困外，加尔文在此工作颇为愉快。他最初作牧师并无薪水，仅有在一所学校教书的微薄酬金。加尔文教授圣经解释与神学。他作了从法国流亡来的五百位新教徒所组成的教会的牧师，制定了一份崇拜规程——该规程后来成为改革宗教会的模范，建立起来一个井井有条、服从纪律的教会。他也写了许多圣经注释，并与许多改教家，以及同情新教的政府官员交通。这些人包括马丁·路德的同工墨兰顿，墨兰顿曾评价加尔文说：“这是一个世界上比任何人都熟悉古代教会和教父的年轻人，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后面是一颗怎样的脑袋啊！这才是真正的神学家。”但加尔文在这位改教前

辈面前仍以晚辈自居，他也敬佩墨兰顿的知识、敬虔和美德。马丁·路德虽然一生没有见过加尔文，但1545年晚年的路德在一家书店里读到了刚刚被译成拉丁文的《基督教要义》，赞不绝口，特别派人去向加尔文致敬，加尔文也是多么渴望能见到这位使徒般的教会领袖，可终未如愿。特别是，当路德读到加尔文对圣餐的论述，感叹道：“早知如此，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将整件有争议之事交给加尔文，如果反对我意见的人早这么说话，我们早就和好了。”是啊，若是早就如此，路德和慈运理能联手改革，抗击天主教，那今天的情景将会怎样呢？但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1540年8月，加尔文和依多莱特·德·布尔（Idelette de Bure）结为夫妇。依多莱特是一个寡妇，带来了两个小孩，其原夫是由重洗派改宗过来的，死于瘟疫。依多莱特和加尔文婚后生下一子，名叫雅各，但雅各不幸数日后死去。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但是不久也夭折了。加尔文用约伯来安慰自己和妻子。

伯1:21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1549年，加尔文妻子离世的时候，加尔文说：“我失去了我生活中的至好伴侣，当她活着的时候，她是我传道工作上最忠实的助手。从她我并未有过至微的障碍。”加尔文之后未再婚，直到离世。

第四节 重返日内瓦

1、重返日内瓦

这时的日内瓦不法与淫秽事件极为盛行，混乱不堪。天主教也死灰复燃，一些神父们又溜入城内开始在私人家庭里举行弥撒。天主教的大主教撒道莱特（Sadoleto）又给市议会写了封紧急公函，邀请他们重归天主教的怀抱。

日内瓦当局后悔了，认识到他们当初驱逐加尔文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有些人建议再请加尔文回来。1540年9月，市议会委托一位会员“设法敦请加尔文牧师重归日内瓦”。在以后数月之内，议会又发出一封请帖，又派一位代表亲赴斯特拉斯堡劝请他回日内瓦。法勒尔此时在纳沙泰尔（Neuchâte）牧会，他们也请求他来劝加尔文。

但加尔文也是人，坚决不肯再回到令他伤透心的城市。他写信给同工范来特（Viret）说：“我宁忍受千刀万剐，也不去背那个十字架……我宁肯立刻死去……我为什么还到那里去再流血负伤？”但日内瓦议会再三邀请，信件不断。信使告诉加尔文，日内瓦人甚至为此集会，高呼口号：“要加尔文回来！”有人也亲自给加尔文写信：“您要是再拒绝，您拒绝的就不是人，而是圣灵。”上帝这样的呼召，神的仆人最终怎能不顺从？于是1541年9月13日，经斯特拉斯堡议会和教会的忍痛同意，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城，受到市议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仿佛是在欢迎英雄凯旋。

2、牧养治理教会

回来后第一个主日，加尔文身着黑色礼服，站在讲台上，整篇讲道没有一句讲到自己离开归回的原因，没有一句指责怨恨的话，他接着着他第一次离开时没有讲完的圣经章节，一章章、一卷卷，犹如天上的春雨，滋润着这片干渴蒙福的土地。不久妻子依多莱特也搬到日内瓦。加尔文的薪水定为每年500先令，加上12袋玉米和两厢葡萄酒。除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了讲道和会客之余，加尔文继续开始书写那些不朽的著作。

加尔文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有秩序有规矩的教会，回来不久，他便立刻起草一份教会组织纲要，名为《日内瓦教会章程》（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稍加修改后，被议会及两千市民通过。《章程》包括一些律法的细节，诸如亵渎和淫秽的言语要处以罚金、禁止奢华服装、除假日外日用饮食不得超过四道菜、严禁夜宴等，甚至细致到禁止随地吐痰、楼顶上要安设栏杆等民事规则。

该《章程》的另一特点是废除了一切没有圣经依据的崇拜仪式，虽然路德比加尔文更早重视圣经的权威，但是在敬拜上，路德宗保留了天主教中的一些东西，如圣坛、管风琴等。加尔文在敬拜上首次采用“圣经限定原则”：在圣经上找不到根据的，一律不能加入到敬拜仪式之中。他坚持在敬拜中只唱诵诗篇。因为诗篇翻译后没有格律及诗韵，加尔文就请来法国宫廷诗人克莱门·马罗（Clement Marot, 1497—1544），将诗篇译为具有格律的法文韵文诗，以配合法语文字的格律。从1539到1543年，经过五年的努力，马罗完成了50首，却不幸于1544年去世。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接手翻译。诗篇分别于1551、1554和1562年出版，共出三版。

3、建立长老会体制

《教会章程》中规定教会内设有四种职分：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

第一种职分是牧师，牧师的团体称为“牧师团”（Venerable Company）。虽然各牧师在城内各教会可以轮流讲道，但每人有自己的教区牧养。牧师团按立新牧师。准试（即预备牧师）必须先受教义、圣经知识以及个人生活的试验，然后他要讲一篇试验的讲道，这时市议会要有代表参加。如果他通过这一切的考试，他要接受按手之礼成为正式牧师。作为牧师团中的一员，每个人享有同等地位。加尔文自己每主日讲道，而且每隔一个礼拜又天天教课。除此之外，他对牧师团每周还有三次解经讲座，一次对学院的讲课，每周一次公共演讲。教会只遵守安息日为圣日；禁止过其它如圣诞节、复活节这些被认为沾有罗马教气味的节日。敬拜只唱诗篇，反对有口无心的歌颂，并且不用乐器伴奏。加尔文说：“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免得我们的耳在听音调的谐和，内心却忽略字句中的隐意。”这些事项牧师要经常督促。

第二种职分为教师。此职分按加尔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的解释乃是神所立的。他的职责乃在于以要理问答来训导儿童。教师被认为是传道的职分之一。教师经牧师团的推荐，在市议会接受考核，然后经牧师团按立。

第三种职分为长老。这种职分在当时的教会中早已废止了。加尔文这次把平信徒代表介绍到教会议会里，使牧师与信徒之间早已断绝的关系又得到恢复。牧师和长老共同组成教会议会，治理教会，特别在于监督圣餐的神圣施与。他们看管会众不许亵渎圣餐，因为圣餐乃基督教崇拜中的最高点。牧师每年一次必须由长老和执事陪同探访城中每一家庭。长老与执事在此探访中应就奉献问题有所教导。探访的主要目的是询问信徒的个人信仰，看他是否有资格领主的圣餐。长老经市议会委派后方可领受此职。市议会另从议会成员中选举十二人为教会的长老，作为市议会与教会议会的桥梁。教会与政府之间虽然分派治理不同领域，但也有密切关系。

第四种职分是执事，他们受托管理教会的财政慈善事项。

加尔文按着圣经，首次使圣经中启示的长老会治理模式在使徒以后的教会得以实现。

虽然在教会治理上，圣经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而且使徒时代以后的教会多采用主教制的形式。主教制虽然使教会走过几百年的大逼迫时期，但毕竟不是最接近圣经启示的形式。所以，在平安稳妥的日子，这种模式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主教们开始争权夺利，最后终于演变成教皇制，因为这样的体制使权力得不到监督和限制，而基督徒都残存着败坏和私欲，没有一定的约束机制很难胜过自身败坏的影响。长老制则是透过层层民主与监督，既削掉了个人绝对的特权，也充分彰显神选立职分的恩赐，同时避免了民众政治的缺陷，所以它是旧新约所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教会治理模式。只可惜，教会历史上从古到今，能完全照此模式实施的教会简直是凤毛麟角。这主要还是由于人的败坏，即使长老制的教会也常陷在失败和困惑之中。但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的长老会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给后来的改革宗教会带来希望和光明。

1541年，加尔文首先在日内瓦教会指定5位牧师和6位议员组成立法委员会，筹划新的教会领导机构，负责教会组织工作。次年初，日内瓦教会按《章程》组织长老会。长老会的议会由教会选举产生，选举牧师5人、长老12人，共17人。人数为单数的目的是为了避开议案投票对等的局面。议会主席一定年限后更换。加尔文是首任主席。长老会主管所有宗教事务，并对日内瓦的市议会施加一定影响。

4、再起风波

教会在哪里复兴，撒但就会在哪里猖獗。首先是教会内部，一位中学校长卡斯提留（Castellio）想被按立为正式牧师，但遭到拒绝，因他怀疑《雅歌》属于正典，他不同意加尔文对《使徒信经》中“下入阴间”的解释，还疯狂反对预定论。加尔文和他的同工都认为卡斯提留是把他自己的理性凌驾于神的启示以上。

有一次，加尔文正在讲道，卡斯提留突然站起来，当场嘲讽侮辱牧师。为了维护聚会的公共秩序，市议会下令卡斯提留离开日内瓦，但加尔文还是为他写了推荐信，认为他虽不能作牧师，其他地区可以接纳他做一名学者。但仇恨的种子未能被爱浇灭，后来正是这位卡斯提留写了关于塞尔维特受火刑的书，极力谴责加尔文，影响至今。

此外还有个自由派领袖名叫阿莫克斯（Pierre Ameaux），他也是小议会成员。他是纸牌制造者，当纸牌被禁止的时候，他的营业受影响。教会对他要求与妻子离婚的事件也迟迟不批准。种种的因素都令阿莫克斯对加尔文心怀愤恨。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毁谤加尔文，说加尔文是传假道理的，并说他的生活颇有指摘之处。结果，阿莫克斯反被他的朋友告发，被判游街，向议会和牧师道歉。仇敌又一次失败了。

日内瓦内的一些自由派、匪类又掀起波澜。他们在严格的法律之下心怀不平，暗发怒气。一个叫法尔夫的自由派人物尤其痛恨加尔文，他的儿子加斯帕尔刚出狱就纠集一群无赖到教堂门外捣乱。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议员，即自由派的领袖之一阿米·佩兰（Ami Perrin）——一名军官，也是小议会成员。他们在朋友的婚礼上公然跳舞（跳舞是日内瓦法律早就禁止的），而使这位朋友受罚。从此，佩兰和岳父一家对加尔文更加恨之入骨。

自由派中第三个有势力的人物是伯提勒（Berthelier）。他是德国一位殉道者的儿子，却活得完全和父亲的信仰相悖，生活放荡，不满教会的法规。这些人联合起来，打算再次赶走他们一生最大的仇敌加尔文。他们有的拒绝参加崇拜、批评牧师讲道、称教皇为“好人”、穿着奇衣怪服等，有的醉酒、打架。虽然如此，教会的牧者们刚强壮胆，坚守主道，起来协助市议会对这些恶人加以处罚。日内瓦的文明还在继续，酒馆纷纷关门，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取而代之的是称为“雅培”的餐馆，每家都有一本打开的圣经，人们吃饭前必须谢饭，否则餐馆不准其用餐。

1549年春，更多的自由派人士被选进市议会，这样自由派在大议会里可以和支持加尔文的议员们抗衡了。局势又趋混乱，加尔文走到街上，听到的到处是嘲笑谩骂声。有的人甚至对着街上的狗呼叫加尔文的名。有一次，一伙暴徒甚至要将加尔文从桥上扔进冰冷的莱纳河。第一次被逐的情景似乎又要重演。就在这时，加尔文的妻子依多莱特·戴波尔去世，加尔文是内外交困，几乎陷入绝境。在他给维雷的信中写到：“请相信我，我灭亡了，除非上帝伸手救我。”

这时一名医生博尔色克（Bolsec）也起来从神学上攻击加尔文。此前他是一位天主教白袍僧，转信新教后一下子就自诩为神学家。他称预定论的教义不但不合圣经，而且不应该被支持，因为他说这样使神成为一个暴君。他又毁谤加尔文有不道德行为。加尔文拖着疲惫带病的身躯，又和这位假教师展开激烈的辩论。结果，议会对博尔色克下了逐客令，但博尔色克后来写了一本书恶毒地攻击加尔文。

这时法勒尔和维雷来到日内瓦，艰难中的加尔文又有了这些坚定的同工的帮助。这是神对祂仆人的安慰。

林后 7:5-6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就在这艰难的风浪中，神的道依然在开花结果，因着教理问答的教导，纯正信仰已经深入日内瓦民众的心中。人们看见以加尔文为代表的牧者们的言行，再反观那些自由派的生活，任何人的良心中都清楚哪一方是出于神的。就连原先参与攻击加尔文的佩兰的同伙们也纷纷放弃自己的观念，悔改自己的行为。

5、塞尔维特事件

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本来是天主教神学家和医生。当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出版以后，他即刻获得一本，并在书中写下许多更正的边注，提出很多反对观点，然后寄给加尔文。1553年，他又照着他自己的见解写了一本书名为《基督教信仰恢复》（Christian Restitution）。在此书中，他否认基督神性、婴儿洗礼、因信称义等重要的圣经教义。在他眼中，三位一体的道理最为无味，三位合而为一简直是荒诞至极。他亵渎的话语不堪入耳。他自己的神观乃是泛神论——他相信神即是万物，万物即是神。在他受审时，他说，他坐的板凳也有神的本质。当有人问他说：“魔鬼怎么样呢？他也是神么？”他笑着说：“他当然也是神，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

天主教已将他拘禁在维也纳，并定死罪、判以火刑，但他逃脱了。早在1545年，塞尔维特表示要来见加尔文，但是他当时食言了。这一次，他却来到了日内瓦。那是1553年春，正值加尔文的地位动摇时期。无疑地，塞尔维特想在日内瓦获得自由派的支持，来个浑水摸鱼。当加尔文讲道时，他还去参加礼拜，当场被人认出来，并被逮捕。市议会成立了专案组，组长正是加尔文的仇敌阿米·佩兰。

1553年8月14日开始审讯，市议会当局已特别留意处理此案件，致函给其他城市派代表参加，请求他们的建议。经过激烈辩论，从塞尔维特的著述中找出三十八处亵渎和异端的观点。经大议会裁决，大家一致表决将塞尔维特处以火刑，不可容忍。加尔文请求议会以斩首代之，但结果无效。加尔文、法勒尔曾至狱中探访塞尔维特，劝他悔改，

被他拒绝。10月27日，塞尔维特和他的书籍一起被捆在火刑架上，他就死于火焰之中。

奥古斯丁时代以来，人们都相信异端者应处以火刑，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观念在法国革命以后方才改变。后代的亚米念和无神论、各类主义者为了寻机攻击改革宗，便大肆宣扬塞尔维特，借以达到诋毁加尔文的目的。如潘宁（Penning）所说“加尔文的羽翼被我们认为错误的观念所捆绑”，因此以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来判断加尔文有罪是不合理的。再者，在欧洲大陆上，为了宗教而被处以火刑向来是常事。即便后来因受人本主义影响，人们似乎不再为了宗教的缘故打仗，可是各国因为思想错误而死在刀下的人还在少数吗？更何况，是议会而不是加尔文本人判塞尔维特死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这件事上定加尔文有罪呢？但人们还是于1903年10月27日在塞尔维特被处火刑之地立一木牌。其上有话说：“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批判他的这一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错。但是我们根据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正教义，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牌以示和好之意。”

加尔文确实是冤枉的，因为在判处塞尔维特死刑期间，正是加尔文对市议会影响最小的时候，因为此时正是加尔文和以阿米·佩兰为首的议会因伯提勒事件作殊死斗争的时候。

6、伯提勒事件

伯提勒和一群同伙在酒后竟然追打一位牧师到其家门口，教会决定停止其圣餐资格，但是这时以佩兰为首的小议会竟然无视教会的决定，僭越位份，擅自宣布恢复伯提勒的圣餐资格。他们打算用此事件再一次向加尔文挑战。加尔文面对市议会25位议员，声音激动而颤抖：“我发誓，我宁愿死也不让主的圣餐受如此玷污和嘲笑！”1553年9月领圣餐的主日来临，加尔文站在圣皮埃尔讲台上，对下面数千会众说到：“我求上帝加给我力量，无论发生什么事，使我都能按着主的命令去做。”但一直到加尔文举行完圣餐，伯提勒始终没有出现，此时加尔文还不知道，市议会已经撤销了恢复伯提勒圣餐的决定。下午加尔文回到家，以为又要被议会放逐，于是召齐了牧师、长老来到家中，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临行前的经文劝勉大家继续改教事业。但加尔文没有接到放逐令，是神要他继续完成日内瓦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7、日内瓦大学

加尔文和其他改教者一样特别重视教育。日内瓦三分之一人口都是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的难民，但是出乎整个欧洲的意料，日内瓦竟然筹建起一所大学！为此每一位公民都做出了牺牲，都与此有份。律师们忙着替人写遗嘱，不忘为他们的大学献上一分力量。由此可见，在加尔文等改教家的教导下，整个城市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

1559年6月5日，日内瓦大学成立，加尔文为新校舍举行献堂礼。洛桑大学的伯撒、维雷和几位同事离开那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任教。他们都是新教的杰出学者。从前多病、以后献身基督教教育的伯撒被派为初任校长。学校的董事就是本城的牧师团，由他们委派校长，教授需经市议会的同意而任命。学校是免费的，学生上课上午从七时至十时，下午从一时至四时，每年授课十一个月。课程表里充满了圣经研究与诗篇歌颂的安排。学生必须参加主日的三次崇拜和每日早晨的敬拜，星期六下午还有要理问答之研究。学校第一年便有九百名新生入学，他们都宣誓效忠于宗教改革的信仰。学校的发展突飞猛进，五年内有一千五百学生毕业，他们来自欧洲各国，其中有苏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作者之一俄利维亚努（Casper Olivianus）。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日内瓦大学的正门用三种语言写着：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 1:7，希伯来文）

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林前 1:29，希腊文）

唯独从上头来的，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满有怜悯。（雅 3:17，拉丁文）

日内瓦大学后来成为了许多新教大学的楷模。

8、日内瓦的改变

阿尔卑斯山脉横贯瑞士东西，日内瓦位于瑞士的最西头，与法国接壤，多山多水。上帝使用祂的仆人把日内瓦建成宗教改革的一颗晨星，上帝主权的荣耀在这里发出夺目的光芒。

从圣经中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在加尔文的辛勤耕耘下，日内瓦的教会如同一盏明灯驱散笼罩人心千年的黑暗，为欧洲各处的宗教改革提供帮助和引导，而且日内瓦城市被治理成为一个美丽文明、富饶的城市。无论在信仰还是道德生活各方面，日内瓦的文明美丽都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日内瓦让人们仿佛看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的美好图画。我们已无法还原当时日内瓦民众的信仰生活和社会风情。在那个敬虔时代，日内瓦并不仅仅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重要的是拥有真正的文明——对上帝的敬畏，因为没有敬虔，就无所谓文明。今天的都市里，闪烁的霓虹灯下，映照出的只是污秽的肮脏。然而当时的日内瓦，没有酒馆里的呼喊，没有凶暴的恶徒，没有争名夺利的嘈杂；日内瓦拥有的是赞美上帝的歌声，是餐桌前大人孩子对上帝的感恩颂赞，是高雅的举止，是彼此切实相爱相互照顾的风情。

日内瓦不但接待客旅，而且向各国受逼迫的新教徒敞开大门。从这种民情和民族胸怀，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罗得、利百加的影子。根据日内瓦政府的《居民登记册》，我们得到下面的统计数据，从中可以看到日内瓦信仰的复兴。

1543年，日内瓦城市的人口总数不超过13000人；1550年，仅仅过了七年，人口总数已经上升到两万人；1560年，人口总数已经上升到两万五千人。从教会的受洗人数来看，1550年日内瓦受洗的人数是443人，1560年是883人，翻了一倍。人口为什么会在短暂时间内突然增加？其次，在此期间，欧洲因战争和天灾，以小麦为首的粮食价格高涨。日内瓦粮食产量相对贫乏、主要靠进口，但从日内瓦的葬礼数据来看，在这些年间并没有一年因饥荒而导致死亡人数突然增加的现象。这一定与市民在信仰和生活上彼此帮扶有关。这里没有囤积放债，即使有一点粮食也是大家分着享用。当1572年法国圣巴多罗买惨案发生后，数以万计的胡格诺信徒逃亡到日内瓦，日内瓦的难民人数又大量增加。可是这个小城依然是祥和安稳，因为这是被上帝众山环绕之所。日内瓦人对待这些为信仰逃难而来的寄居者，不但没有一点歧视，反而视之如家人。早在1555年以前，加尔文的政敌极力阻止这些宗教难民获得日内瓦公民身份。但在后来的五年之内，包括加尔文本人，有350人成为了日内瓦公民。1555年至1585年，有800名宗教难民获得了日内瓦公民身份，在日内瓦享受公民待遇。在日内瓦避难期间，这些来自法国、尼德兰、英国的宗教难民受到了日内瓦教会和政府的妥善安置。日内瓦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敬拜环境与学习机会，并给予他们极大的尊重。下面是当时婚礼的统计数据：

表 4.1 日内瓦婚礼统计数据

| 年份 | 婚礼数目 | 法国新郎的数目（比例） | 法国新娘的数目（比例） |
|-----------|------|-------------|-------------|
| 1550-1552 | 370 | 142 (30%) | 110 (27%) |
| 1553-1554 | 365 | 172 (47%) | 147 (40%) |
| 1555-1556 | 431 | 214 (50%) | 183 (42%) |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法国的宗教难民在此过着喜乐的生活，年轻的法国难民在日内瓦能够纷纷结婚，建立家庭。这与他们在本国受到的非人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当时天主教声称加尔文的日内瓦就是“乌合之众汇聚的天堂”。

9、日内瓦教会的宣教

近代的人本主义一再攻击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教会不重视宣教，一些人本的亚米念主义群体纷纷以宣教创始者自居。其实，在日内瓦初具规模后，加尔文便立即展开宣教工作。由于当时正是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尔文的宣教对象多是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因为这些天主教国家也完全是异教国家。日内瓦成了新教信仰的大本营后，牧师、宣教士源源不断地从日内瓦大学走出。他们来到加尔文的门前，请求差派他们到欧洲各地去。加尔文告诉他们，在二十多个地方传来宣教士被杀的消息，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他们。法国国王正式向日内瓦发出抗议，抱怨从这个新教大本营出来的传道人竟然那么多。

日内瓦收容了许多难民，这些新教难民来自欧洲各地，包括法国、尼德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他们来到日内瓦躲避宗教迫害，不仅作为难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且作为宗教改革家在此接受了敬虔的宗教训练。随后，他们许多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宣讲真正的福音。日内瓦不仅是欧洲的难民中心，而且成为了一个宣教的大本营。

在 1555 年 4 月，日内瓦教会的牧师团登记册上第一次记录了日内瓦派出去到国外地区传福音的宣教士，而且提到在 1555 年 4 月之前就已经派出宣教士了。从登记册上我们可以看出，1555 年至 1562 年，有 88 位日内瓦牧师作为宣教士被派往不同地方。然而，总人数必定不止 88 名而已，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宣教事工是秘密进行的。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日内瓦教会有时会在登记册上故意模糊宣教士的姓名及其数量，例如日内瓦的宣教士登记册在 1561 年只提到了 12 名宣教士，然而另一些数据来源则显示在 1561 年至少派出了 142 名宣教士。

1562 年法国宗教战争爆发，记录宣教士的名字变得更加危险，所以登记册的记录就变得更加模糊。有数据表明，至 1555 年，法国建立了 5 个地下新教教会。至 1559 年，新教教会的数量已经超过 100 个。而到了 1562 年，法国至少建立了 2150 个教会，大约有二百万新教徒。从下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法国新教教会的增长情况。法国图卢兹的一位日内瓦的宣教士牧师在给日内瓦教会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现在已经有八九千信徒”。除了向国外派遣牧师以外，日内瓦的宣教工作还包括印刷与出版基督教书籍。加尔文去世之前，日内瓦至少有三十四家印刷厂，印刷数量每年大约有三十万册，包括欧洲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在日内瓦的宣教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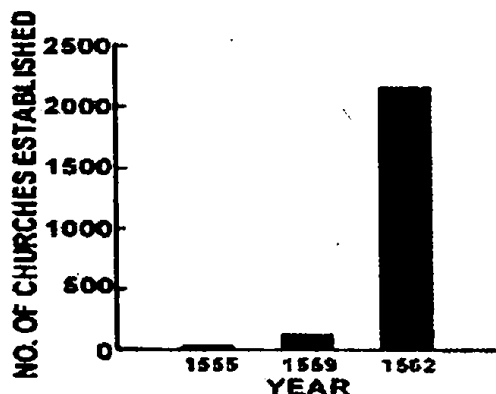


图 4.20 1555—1562 年日内瓦宣教时期法国教会的增长

日内瓦发起的宣教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使今天，短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前所未闻的。然而，近几百年来，随着教会的再次堕落，日内瓦这段辉煌的宣教历史被人遗忘，掩埋在尘埃之下。人们今天一提到宣教事工，只能想到摩拉维亚等地的工作。虽然如此，加尔文所领导的日内瓦教会的付出和做工的果效，在基督里永远被纪念。



图 4.21 风景秀美的日内瓦城

10、离开世界

1564年5月6日，加尔文带着重病写完了后世教会的宝贵财富《基督教要义》等巨著，又在日内瓦圣皮埃尔大教堂完成最后一次讲道，5月27日回到天家。

提后 4:7-8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图 4.22 加尔文离世

教皇庇护四世（Pius IV, 1559—1565 在位）听到加尔文去世的消息，虽然不表示哀悼，却真诚的说：“那持异端者加尔文的能力，在于金钱对他全无吸引力。如果我有些这样的仆人，我的疆域必然会扩展，从这海到那海。”

第五节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

1、启示论

加尔文的启示论和救恩论都是在上帝的绝对主权下开始阐述的。在《基督教要义》第一章谈到我们要认识神，但认识神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卑微：“不认识自己的人不可能认识神……我们具有的才智，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在乎神。除非我们对自己不悦，否则不可能真诚地仰望神。但反过来，不认识神的人也不可能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总是骄傲、自义，除非有充分证据指控我们的污秽、愚蠢。”

有人攻击加尔文及其代表的改革宗信仰只注重知识，不注重生命和行为。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开篇就告诉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包括对神的敬畏和依靠，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加尔文如此写道：“相信并真诚地惧怕神，这惧怕使我们甘心乐意地敬畏，且伴随着敬畏在律法中合法地敬拜，这就是基督教的敬虔。”有什么样的生命答案能比这样的阐述更加优美，加尔文一下子提出生命敬虔的实质，就是在律法中合法地敬拜上帝。

关于普遍启示，加尔文谈到人内心深处都有神的烙印，也称“宗教的种子”。加尔文说：“人越是想抹杀神存在的意识，这意识就越发活跃。”所以人不得不用迷信、妄想、假冒来压制他良心中的控告。但圣灵不接受一切人构造出来的宗教。惟独圣经才能引导人到神面前来，如此，加尔文把真宗教从世上一切的学说、哲学、宗教中分别出来。这正是圣经所强调的，天下人间没有别的路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圣经清楚地显明神的属性，让我们知道神的创造、护理、救赎的真正意义。当谈到圣经的权威，加尔文说：“圣经的权威绝不是来自教会或任何人的组织，只是来自神自己的印证，这印证就是圣经自身。”由此，加尔文建立了改革宗圣经论的基础，这也是一切教会教义的根基——惟独圣经。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2、神论

谈到神的三位一体，加尔文完全传承初代大公会议和奥古斯丁等正统信仰的论述，而且对三位一体这一定义的意义做了更精辟的论述：“除非我们明白三个位格，否则我们的脑海里就只有神这个单词飘来飘去。”加尔文同时针对天主教、重洗派、索西尼、塞尔维特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呼吁人的理性要伏在神的启示光照之下。人应限制自己的好奇心，以免走入迷宫而沉沦。加尔文似乎认为教会历史上在三位一体的讨论上已经画上了句号，所以不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却用了很大篇幅阐述上帝的创造、护理以及对我们的意义。他特别强调祂主权的护理，这种护理绝不是在乎祂的预知，而是祂照自己的旨意时时刻刻、不间断地托住和掌管万事万物。这种护理也不只是在自然界之中，也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件大小事情之中。这种护理不仅包括赐福和护佑，也包括灾难和管教。一切都是祂的主权，虽然我们有时不明白，甚至发怨言，大声呼吁询问为什么，但加尔文奉劝我们：“不要偏激地认为神有责任向我们交代祂的作为。”当我们有时觉得一切都糟糕透顶的时候，觉得无法再继续生活的时候，加尔文说：“天上仍然宁静如初。”

加尔文虽然强调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但这主权并非抹杀了人的责任：“神的护理也不应当成为我们不算计划的借口，更不应当成为我们懒惰的借口，我们反倒应该更加殷勤，谨慎小心地对待神托付我们的责任。‘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 16:9）”神话语所启示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唯一准则。所以神的护理不是让我们推卸责任，而是要鼓励我们更加有力量尽本分，这同时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无论是富足、患难，神都会祝福我们，实现祂的约。人如果不相信神的预定和护理，那么会立即感到周围充满了危险，这些危险时刻在威胁着自己的性命，因此惶惶不可终日，难怪那些外邦人要拼命地在偶像中寻找各种平安。

3、基督论和救赎论

(1) 全然败坏

加尔文的基督论是紧紧和救恩相连的，题目就是“在基督里认识神是救赎者”。说到救赎，首先就是要从人的堕落开始。堕落后，人最大的表现就是倾向虚幻的自我崇拜：“人生来就喜爱被人奉承，当发现自己的才能受到别人推崇时，没有比受到恭维更令人快慰的事了，便立即产生自信……因此，每一个时代，当有人用最动听的话语公开地赞美人性时，便立即大受欢迎。”加尔文在这里不仅解释了人骨子里的罪性的核心，也揭示了几千年教会一次次堕落滑向人本主义的根源。人能对自己失望，是人能来到神面前的前提。这前提是人自己无法逾越的鸿沟，除非神自己的动工，这前提也是救恩的开始。

加尔文承继了奥古斯丁的原罪观：因亚当一人的悖逆，罪债和败坏的罪性就传递给所有人类。人败坏不是存在于人灵魂的某一部分，而是灵魂各个方面，人从头到脚都被罪恶淹没。人的堕落与生俱来，但人受造时并不是这样的。加尔文说：“我们若说人能行最起码的神悦纳的事，那就是窃取神的荣耀。”我们从中看出加尔文论及人的善行乃是从救恩开始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正是那么多人痛恨他的教义的原因。哲学家们和天主教神学家们在救恩之外探讨人里面的良善、自由意志，认为人的理性就足以引领人行善的观点，是加尔文所憎恶和批判的。加尔文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人的意志有犯罪的自由（即选择犯什么罪的自由），绝没有行善的自由，它完全是罪的奴仆。”因此加尔文不但极力反对人有自由意志的观念，甚至认为教会保留这个词对教会的危害

都会极大。若除去这个词将成为教会的祝福，因为“自由意志这个词时常威胁着神的荣耀”。人一旦以为他有丝毫可夸的，便会立即得意忘形。所以加尔文说：“我自己决定不使用这个词，也真希望别人能听我的劝告。”今天教会的堕落正应验了他的担心。神兴起的时代的仆人往往都具有这种前瞻性。为什么如此？这还是与救恩的前提有关。“只有承认自己是奴仆，才有可能被神拯救；只有承认自己的缺乏、无有，才有可能蒙神祝福。”加尔文的救恩论不是单刀直入地从十字架谈起，而是从救恩的源头和原因讲起，这就是后来人们整理的五要义的第一个——全然败坏。如果失去这一根基，那么福音将会成为空中楼阁，立刻失去其最根本的价值。

虽然加尔文不否认人有艺术、科学等这些普遍恩典的天分，但这些天分对救恩来说如同虚无，除非有圣灵的光照，否则一切都是幽暗。这种认识也成为《威斯敏斯特信条》开篇第一句的阐述——“虽然天然之光、创造、护理之工能够彰显神善良、智慧、权能，叫人无可推诿，却仍不足以使人认识神及其旨意到能够得救的程度”。如此，加尔文的救恩观就将改革宗信仰和一切虚假宗教及各种谬误从源头上区分开来。“若石头有可塑性，我们的心也可能有被塑造的可能。”这样的论述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神的救赎大工不会有人的一点参与，惟独出于神的恩典。

(2) 主权的拣选

预定论在《基督教要义》里并没有占据很大篇幅，因为这显然是圣经的真理。神决定谁要相信并不是预知，乃是预定。《基督教要义》中说：“神所愿意的必定是公正的，因为那是祂的美意。”预定的教义不会使人成为宿命论者；相反，预定使人有勇气回应当上帝的恩典。但神对灭亡之人的弃绝绝不是单单允许或任凭他们自己死在罪中，圣经中多次记载神使他们看也看不见，刚硬他们的心，扭转、影响他们，甚至驱使他们去行灭亡之路：“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神令他们愈加刚硬的方法恰恰是差遣人向他们宣讲悔改的信息。然而，神越是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就愈发刚硬，所以，他们灭亡的责任完全在乎他们自己，但这又是神主动积极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感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所以，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在拣选和遗弃两方面都是积极的，都彰显了上帝绝对的主权。后面会继续讨论。

4、律法总论

虽然初代几次大公教会奠基了神论和基督论，但对律法的阐述却是寥寥无几，宗教改革初期墨兰顿又具有明显的反律主义倾向，因此可以说加尔文是宗教改革以来对律法诠释得最清晰之人。

首先律法并非要约束人，而是要在基督降临前给人救恩的盼望，这正是保罗在新约所讲述的“律法是引人归向基督”的观点。律法叫人无可推诿并且绝望，然而律法中的应许并非毫无意义：“神不藐视我们不完全的顺服，反而赦免我们的不足，并借基督赏赐我们律法应许的一切。”前面提到，人因沉醉于自爱而盲目，所以必须有外来的力量使他们明白和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污秽，律法就是这力量的准绳。根植人心的私欲深深被隐藏，人不会察觉它的存在。律法就像镜子一样，将它照出来：“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律法的指控正驱使人投奔恩典。

律法的第二重功用是借刑罚来约束恶人，包括重生前的神的儿女，免得他们愚昧地放纵自己，也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律法的第三重功用对信徒来说更是不可或缺：律法教导人明白神的旨意，过成圣生活，所以“律法不是严厉的督工，而是劝勉我们的良师”。律法被废去只是律法的咒诅和审判被废去了。在谈到礼仪律的废止时，加尔文强调：礼仪律废止的是形式而不是结果，道德律废止的是结果而不是形式。

加尔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人类所推崇的大部分善行都不是律法所要求的，并警告基督徒：若我们也热衷于那些律法以外的善行，就是亵渎。试看今天的教会，从敬拜到生活，还留有多少上帝律法的影子？

加尔文首先给出了正确解释律法的方法：神吩咐某种善行，与之相反的恶行就是神所禁止的；神禁止的，与之相反的就是神所吩咐的……在这些原则下，加尔文对十诫分别给予清晰的解释，就构成了后来的改教家们制定教理问答的律法部分的基础。

5、新旧约的对比

虽然新约的信徒比旧约信徒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救恩上是完全相同的。加尔文似乎预见到后代可能要出现将圣经割裂的时代论的错谬。所以他特别强调神在旧约与人所立的诸约与新约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只是方式不同。新约和旧约同属一个恩典之约，都是一位中保，而且旧约的信徒所盼望的绝不是这地上的祝福，而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在仰望天家：“在旧约时代，神的慈爱胜过死亡的权势。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这些人是活在天上承受应许的好处吗？”这些人在地上大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而且他们大多都颠沛流离，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赐给他们，除了坟地。加尔文称：神对犹太人的应许只在地上的论调是疯狂有害的。他们极力将基督的话和摩西的话分开。总之，申命记那些肉体的刑罚和祝福都是永恒的刑罚和祝福的预表。这样，新旧约的同本质保证了圣经的和谐一致性。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以色列民族和外邦民族间隔断的墙，这是旧约多处的预言。认为应将犹太人和教会割裂、区别是严重违背圣经一体性的邪说。

6、基督论

(1) 基督神人二性

加尔文基督论开篇就阐述了基督神人二性的必要性：基督只有是真人，才能赎罪，行全律法；只有真神，才能保证救赎功效。当时兴起的重洗派代表人物门诺竟然声称：“圣经没有一处记载了道取了人性。”这是初代幻影派异端的再现。所以加尔文又用不少篇幅驳斥这对当时影响颇深的异端，并完全按初代大公教会和教父们的正统信仰再次阐述基督的二性关系。神性和人性本质不是混合，而是在一个位格里的合一，就像人的身体和灵魂存在于一身而不相混合。圣经记载基督有时专指人性，有时专指神性，有时两者交替使用，加尔文称为“属性的相通”。

(2) 基督的三重职分

加尔文首次总结了基督作为中保的三重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基督的先知职分有别于其他先知。祂是智慧知识的本体，不仅宣扬天国的福音，也宣布旧约一切预言都应验在祂的身上，甚至整本圣经都是在为祂作见证，“唯有祂的教义使人获得完美的智慧。”

路 4:18-21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

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谈到基督的君王职分，加尔文认为，君王和祂主权的永恒性分不开。尽管撒但穷尽世上一切资源想毁灭教会，但最终只是徒劳，因为教会正是建立在基督永恒性君王的宝座上。基督的国在乎圣灵，不在乎属世的欢乐，这是我们平安喜乐的根源。加尔文解释：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意思是祂是父神的代理人，拥有神国度一切的权柄，神喜悦基督来保护祂的教会。基督的祭司职分是祂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永远地满足神的公义，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在神的面前，而且使我们的祷告和赞美成为馨香的祭物。基督的三重职分都与教会息息相关，祂掌管万事万物，但祂护理的核心乃是教会。

(3) 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和再来

基督的受死，使我们意识到神的忿怒：“如果我们对这永远的刑罚不深感畏惧，我们不会心存感恩。神对罪恶的震怒要先于我们在基督里与之和好。”可见加尔文的救恩观是以神的公义为根基的。

诗 89:14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这和今天福音派只讲神的爱而不讲公义是截然不同。基督一生的顺服和十字架的受死才使我们脱离咒诅。没有基督身体灵魂在地上及阴间的受苦，神大海般的忿怒何以平息？靠我们自己那一点功德和善行，等于用一杯水去熄灭森林的火灾。对于基督降在阴间，加尔文坚持认为那不但是指身体的埋葬，更是指基督的灵魂代替我们所受的难以想象的地狱的折磨和痛苦：“他必须与地狱的军队和永死的恐惧单独地、直接地交锋，也就是被神掩面的永死的刑罚。”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和许多诗篇的描写都证明加尔文的解释是正确的。试想：单单就肉体的疼痛能使我们的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吗？难道主耶稣对疼痛的忍受能力还不如世上如关羽这样的英雄人物吗？论及基督的复活，加尔文总结说，基督的复活证明了祂的神性，扶持我们软弱的信心，使祂的死所赢得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发挥功效。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凭据，确信自己将会复活。基督升天并不表示祂不再与信徒在世上的历程中同在，而是要以更大的能力统治天地，应验了祂从前的应许：祂将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今教会虽肉眼不能看见基督，却凭信心常有基督。从基督的升天，我们得到的益处包括：主已升天打开了从前被亚当关闭的天国之门；祂在父面前一直作我们的中保和代求者，使可憎的罪人原先所惧怕之神的宝座成为施恩和怜悯的宝座；祂天天厚赐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当基督再来时，祂将以祂国度测不透的威严、永生的光辉、神性无限的大能，以及天使的护卫，向众人显现，传讯活人和死人到审判台前。因基督的救赎，信徒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将得到尊荣而不是被定罪，因为审判主正是他们的元首、辩护者和代求者。

7、圣灵论与救恩

加尔文的圣灵论也是紧紧和救恩相连的，圣灵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实施者。神对我们一切良善的恩赐，都是圣灵恩典的果子，包括赏赐给我们的信心、悔改、重生。

(1) 信心

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知识上，而不是建立在假敬虔和无知上，而且信心的对象惟独是基督。这种信心观就把改革宗正统信仰和天主教经院哲学那种离开基督的信心以及后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来敬虔运动那种离开理性和知识的迷信式信心严格地区分开来，当然这里说的知识是指圣经真理的知识：“若偏离真道，信心必然垮掉；若夺走神的道，信心将荡然无存。”加尔文所说的知识不是福音派攻击我们那种仅限于头脑中的知识。加尔文认为真知识必然使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怜悯，这种认识会吸引我们不断地归向祂。如果一个人仅有外在的知识，却没有生命的表现，加尔文不认为这是像有人说的“光有知识，没有生命”的表现，而是认为这人所拥有的知识本身一定有问题，可能仅有粗浅的道理，而没有对神的话的更深的认识，因为那是圣灵内在的工作本质。

加尔文提出，真信心虽从理性蒙光照开始，但更多在于人心，而不在于头脑；在于情感，而不在于悟性，所以圣经称之为信服真道。信心决不能与敬虔的性情分开，这和后来的许多神学家如爱德华滋等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后来的敬虔运动者们攻击加尔文只讲死硬的教义，而不注重生命，其实加尔文才真正揭示了圣经中生命的本质。

约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道路、真理、生命是主耶稣救恩的彰显，是一位中保的不同方面的显现，绝不是可以分开的。真信心会不断地遭受来自撒但、世界和内心败坏的各方面攻击，会有软弱、疑惑、动摇甚至不信。为了抵挡这一切的攻击，信心会以神的道为武器。不断从软弱中站立起来，但信心所依靠使之刚强的途径竟然是想到神对一切罪孽的报应及对我们的怜悯、赦免，即先想到神的公义属性和赦罪之恩。加尔文的这种观点似乎和我们平时持有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通常认为在软弱犯罪时应首先想到神的慈爱，然而恰恰相反，不是慈爱而是公义。我们看圣经就知道，这才是真正悔改的道路。

约壹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赦免我们是基于祂的公义，就是祂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属性。这样的省察必然驱使人来到十字架前，回想神因我们的罪恶向基督彰显的忿怒，这才是使我们信心刚强的根基。这样的信心才是“不能朽坏的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信心是建立在基督和我们联合的十字架上，坚不可摧。

(2) 悔改和成圣

悔改则是信心的果子，是指整个人的生命归向神。我们能够顺服律法过成圣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否定自己，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与主同钉十字架。信徒由于仍存留着败坏，所以仍经常受情欲罪恶的捆绑，直到脱离这必死的身体才会完全，所以认为今生可以全然圣洁的想法只是幻想和自欺。但在信徒里面，罪恶不再是作主作王。加尔文反对古代的教父们夸大神对祂儿女犯罪的责罚，认为“这与神对教会的温柔极不相称”。是的，教会毕竟是彰显恩典的地方。加尔文注意到圣经所常提到的悔改多是出死入生的悔改。旧约所说的悔改多指脱离偶像，这与今天我们因肉体败坏、犯罪而在神面前的悔改不同。这样的区分极有意义，免得教会把圣经中对未悔改者的责罚过多地应用到今天的基督徒身上，重蹈多纳徒派和法利赛人的覆辙，使信徒不得安慰和建造。加尔文说：“报应和审判是不同的，一种是属于法官的，一种是属于父亲的；一种是彰显公义，一种是慈爱眷顾。”

加尔文用大量篇幅批判天主教的向神父告解和赎罪券功德等错谬。有人认为这对今天的教会意义不大，其实不然。看看今天许多的教会为了所谓福音的扩展，不择手段，

攫取金钱，有的甚至以捐献钱财多少来确定圣职人员的资格，这背后都是加尔文所驳斥的功德主义的幽灵在作怪。

(3) 背起十字架，否定自我

我们的十字架是神训练我们与祂的荣耀有份，我们越受患难，就必定越乐意与基督交通，使痛苦大大减轻。我们很容易过分看重自己的美德，所以神就以羞辱、贫困、疾病熬炼我们。当我们无力承受时，我们会立即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十字架实在是我们的良药。加尔文对十字架的认识是根植于整本圣经真理。十字架的真正意义是让我们谦卑、否定自我，而不是像人本主义那种建立在个人经历上的、肤浅的对十字架的认识，因为那样的认识反而让人更加自高自大。

(4) 今世的生活

加尔文对今世的生活观是建立在基督徒对永世的盼望和默想基础之上，即圣经所说的客旅的生活。但客旅的生活并非像中世纪那样离群苦修，而是让我们脱离恶者，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加尔文虽然鼓励人快乐地面对死亡，但也鼓励人在世积极、喜乐地生活，以感恩的心享用神在今世所赐的各样福乐和美物，只要不放纵和奢华：“神造了美丽芬芳的花朵，又造了我们的眼睛和鼻子，难道却不让我们欣赏享受这美丽吗？”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后来的清教徒们生活的写照。他们一面在美洲建立敬虔的信仰，一面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给原本蛮荒不毛之地带来空前的文明。加尔文仍然鼓励信徒要甘心贫穷，和保罗一样，不仅学会怎样处富贵，更要学会怎样处卑贱。加尔文说：“那些以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也会以豪华的衣服为骄傲。”

加尔文的工作观更是建立在神的呼召之上，我们的工作实在对我们有益处，因为“神知道人生来倾向过度急躁、善变，并贪心地想同时拥有许多不同的事物。所以，为了避免我们因自己的愚昧和轻率使一切变得混乱，神安排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当尽的本分，也为了避免任何人越过自己所当尽的本分，神称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为呼召”。确实如此，看看我们身边那些没有工作游手好闲的人，哪一个不是活在放荡浮躁之中？改革宗清教徒所经过之地，处处成为文明的绿洲，因为他们对工作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可见于各个行业，比如他们工作过的瑞士钟表行业至今仍举世闻名。

8、因信称义

加尔文对称义的定义包括罪得赦免和基督义的归算，这是基督的主动顺服和被动顺服所换来的。称义里面绝没有人一丝善行的成分，就连信心也不是称义的本身，只是途径和器皿：“就如盛金子的器皿本身不是金子”。这和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等的正统称义观完全相符。但是加尔文更加强调称义的地位以及称义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像路德那样过分看重称义的途径。加尔文让我们在称义的问题上留意两件事：一是神的荣耀既不受亏损，也毫无玷污；二是我们的良心在面对神的审判时坦然无惧。前者告诉我们称义不可以有任何受造者功德的掺杂，后者使我们获得完全的信心。

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结果，圣灵使我们确信自己蒙神喜悦，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平安，因为“除非我们抵达这港口，否则连最微小的声音都会使我们恐惧”。我们的善行是神恩典的果子，绝不是我们称义的凭据；而且我们最好的善行也尽掺杂了我们的污秽，所以不足以使神赏赐我们。神所赏赐的乃是祂自己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的代赎里悦纳了我们，正如加尔文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说：“因若你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看到我的工作，我将被定罪。若你看到自己的工作，你将加冕之。因我所拥有一切的善行都来自你。”这就是每一个改革宗圣徒的心声。

9、基督徒的自由

(1) 基督徒的自由是在律法上的自由

自由一词是近代最被误解和乱用的词语，人们竟然把放纵反叛都称作自由。自由是上帝的属性，圣经上所记载的基督徒的自由是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甘心乐意地顺服律法的自由。这是律法赐人自由的真正含义。

雅 1: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2) 凭感恩享用神厚赐的百物和恩赐

加尔文在引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时指出：心存感恩是我们圣洁地使用一切事物的唯一方式，而且我们应当毫不自责地使用，并承认神的一切慷慨；但是我们不要滥用神的赏赐，以自由为借口放纵私欲，奢侈地乱用，使本来是美好的东西被罪恶玷污。因此日内瓦议会规定：市民每顿饭不能超过四道菜，并禁止宴乐。但我们也应注意不能以贫穷的外貌为敬虔的实质。“丝绸和紫色衣服下可能包裹着谦卑的心，破烂衣服下也可能包着骄傲的心。”这就揭露了那些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灰衣派、黑衣派、托钵僧等的假冒为善。他们以穿破烂衣服为荣，甚至以之为自己的功德，为自表谦卑的方式。

提前 4: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3) 自由的真意

基督赐给信徒的自由也包括救他们脱离一切神没有吩咐的、捆绑人的仪式。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用圣经以外的各类繁琐的仪式和迷信的偶像崇拜，禁锢了人们的身体和思想，辖制了人的良心。路德的宗教改革基本上使教会脱离了这些桎梏，但是不彻底，仍然保留了一些祭坛等类似的天主教残留。加尔文的改革最为彻底，这也是源于慈运理等先辈的贡献。对今天有的走向苦修主义、有的走向放纵主义的人本教会来说，这些从圣经中整理出来的、合乎中道的教义仍不失为金石良言。

10、祷告

那些抨击加尔文只重教义不重生命的人，真应该好好读读这一段加尔文对祷告的论述：“圣灵使我们坦然无惧地在神面前表明我们的渴望，我们祷告祈求神的护理，求祂用祂的属性扶持我们，保守我们这软弱、常被罪恶压制的人……祷告使我们的内心预备承受祝福。神有时似乎不听是为了刺激我们这懒惰的人更加求告祂。”

加尔文的祷告教义也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之上。不仅祷告的心态要虔诚敬畏、谦卑，祷告的开始也应以祈求赦免开始：“任何人不管自认为自己多么圣洁，除非他被神赦免，否则他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加尔文认为神的怜悯就是信徒祷告的依据，只有仰望祂的怜悯，才能直到永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举手祷告时仍心存冷漠。”

神的应许和吩咐是我们祷告的动机，不祷告的人就是硬着颈项之人。加尔文鼓励我们祷告时要默想神的话语和属性，并且只有在中保基督的代求里我们的祷告才有意义。天主教相信圣徒或马利亚能在天上代求，纯属魔鬼捏造的诡计，使人亵渎神所赐的蒙恩

之道。圣徒祷告的内容应在神的管理和旨意之下，而主祷文就是我们最好的范本。尝试求神旨意之外的事和不祷告一样，都不为神所喜悦。但在祷告时，圣灵会适时地提醒我们，归正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祷告合乎祂旨意的事情。

加尔文反对公众祷告或代祷时用很长、很罗嗦的言语，以免我们以为繁琐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旨意。祷告的殿也不是教堂，而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加尔文考察了历史，得出结论说：古时教会的祷告都是以唱诗篇开始，人为了悦耳所作的歌曲与神的威严极不相称，也极其激怒神。

11、预定拣选

(1) 双重预定

加尔文对预定论的论述篇幅并不是很多，主要是为了约束我们不要因好奇心擅闯神的至圣所，但是决口不谈也是愚蠢无知的行为。预定的重点应该放在拣选教义之上，好让人因着神的恩典而感恩，生发得救的确据。

撒但使信徒丧胆的诱惑，也是信徒最难以抵挡的诱惑，那就是叫信徒怀疑自己是否被拣选。当人一想到“神在哪里向我启示我是祂所拣选的呢？”，人就会立即被这思想淹没。从来没有船只碰到这礁石而不沉没的。这时只有当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祝福——赦罪的平安时，我们才能从疑惑中逃离，得着神给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关于这一点，后来爱德华滋有更好的看见：当人被神自己的荣耀所吸引、完全没有自我的掺杂时，他就得到了得救最好的确据。

对于神弃绝之人，神将祂的预旨隐藏在祂的公义之下：“即使人千万次宣称他们的灭亡是神预定的，他们的良心仍不断提醒着他自己的罪恶。”所以，恶人灭亡是神所预定，但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罪恶和刚硬。责任在乎人自己，神却是公义的。谈到神为什么要允许罪恶产生时，加尔文只是解释说：“神预先知道邪恶将从这甚好的受造物产生，然后又知道再从邪恶中产生更好，这样的预定，要比从不允许邪恶进入世界更彰显神的良善。”对于这类问题，圣经说到哪里我们就学到哪里，圣经沉默的地方我们就应该沉默，再往深处思想就是窥探神的隐秘旨意，而且也非我们堕落的理性所能明白，加尔文似乎也于此为我们对预定论的探究画上一个句号。加尔文在后面谈论重点都是针对人对预定论的误解和异议，基本上对一般人所能想到的问题都给出了圆满的解答。可惜近代教会丢弃了这宝贵教义，否则亚米念主义何以能横行霸道呢？

(2) 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包括外在呼召和内在的有效恩召。外在的呼召邀请所有听到福音之人都归向神。内在的有效恩召是指圣灵在选民的心中感动并有效地吸引他们到基督面前得恩惠蒙拯救。若没有圣灵的内在引导，听到福音邀请的人反而会更加刚硬，这就是神封闭他们心眼的方法。

12、教会论

加尔文的教会论大部分批判天主教的错谬，主要从教义上论述教会的根基，但是较少涉及教会的体制。这主要是因为加尔文在写《基督教要义》时处于改教初期，信徒需要认清天主教的假教会性质，并认清何为真教会；而且当时各地教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体制，初代教会又多为主教制，所以加尔文对体制的探讨就相对较少。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1) 教会对信徒的必要性

和古代教父们的观点相同，加尔文认为教会对信徒的重要程度就如同婴孩离不开母亲。虽然神能叫自己的百姓立即完全，但神却喜悦让他们在教会的教导下成长。“有些人总希望神直接用声音教导他们，或认为自己读经就够了，但神却用牧师代替祂自己的直接教导，神借此考验我们的顺服。”是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上帝所设立的人面前谦卑，那么他就不可能在神面前谦卑。那些轻看公共聚会和讲道的人，是用有害、污秽的幻想欺骗自己。

(2) 教会的标志

加尔文认为只有纯正的真理和圣礼是真教会的标志，这和布林格的观点完全一致。后来的改革宗信条把教会的治理也作为教会的一大标志，这则是因为教会在经历一段复兴和完善后对圣经真理有更深认识。

加尔文认为分裂教会的罪等于否认神和基督的合一。无论教会有怎样的丑闻，道德上有怎样的败坏，只要教会还在传讲真道，信徒都不应该以此为理由离开教会。因道德问题离开教会的人幻想在地上能建立一个完全的教会，然而这种想法纯粹是来自魔鬼。“因为教会并不能在赦罪以外存在”，而完全的教会与赦罪相悖。但教会一旦离开了元首基督以及祂的真理，则神的儿女应立即离开。

加尔文关于教会合一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改革宗教会的信徒。有许多伟大的仆人，直至教会已经偏离圣经沦为异端，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的人被已经沦为假教会的教会开除，明明知道自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被开除，仍然郁郁悲愤，如普林斯顿的梅钦就因此忧闷而终。只有认信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才会如此爱基督的教会。相反，重洗派、亚米念主义者和敬虔运动的人物等处处轻忽教会，叫人随意脱离教会，用各种机构组织代替教会，与改革宗教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3) 教师和牧师的职分

神喜悦借人的口做祂自己的工，有时甚至使用不如会众圣洁的人，这就更显出瓦器中宝贝的珍贵。讲道是教会事奉的核心，凡毁坏这秩序的人就是摧毁教会。

加尔文认为圣经的有些职分如使徒、先知属于暂时性职分，在圣经封典之后这些职分就已终止。牧师和教师属于恒常性职分，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蒙召作牧师必须要有教会外在的呼召，这与教会的公共秩序有关。加尔文没有过多探讨这种呼召程序，因为那是教会章程的内容，只是阐述了牧师的呼召需要有教会会议、会众和民事政府的共同认可。同时，牧师也应该有内在的呼召——不是因为野心和贪心，而是因为对神的敬畏和有造就教会的负担，因而顺服神的呼召。

(4) 教会的纪律

纪律的来源要依靠钥匙权柄，纪律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使教会有秩序。不执行教会纪律、拦阻教会执行纪律的人就是摧毁教会。加尔文认为，执行教会纪律时首先要以私下劝诫为主，并且应该区分隐秘的罪和公开的罪、轻微的罪和严重的罪，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性质的罪。加尔文承认，再有分辨力的人在教会纪律上的判断力都会表现得十分有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交给自主自己审断，这对我们治理教会的人来说是一个极

大的安慰。主知道我们有限，所以我们不需为自己的某些失误而过分自责。同时加尔文也警戒我们，在教会纪律的执行上不要过分严厉——重洗派制定严格的惩戒方案，多纳徒派拒绝接纳悔改的人，他们因而给大公教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5) 加尔文的圣礼观

圣礼的意义就是主用这外在象征，将祝福的应许印在我们的良心之中。圣礼是恩典之约的证据，是主支撑我们这既微小又软弱的信心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圣礼与真道不可分割，这是加尔文圣礼观的特点。真道又离不开圣灵，因为圣灵和真道不可分割，因此圣礼和圣灵也不可分割：“若圣灵没有随圣礼而来，圣礼就如阳光照在瞎子的脸上一样无效。”

加尔文从洗礼、婴儿洗礼和圣餐三个方面论述圣礼。

首先，我们藉着洗礼进入教会的团契，主藉着洗礼向我们证明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被除掉和被涂抹了。洗礼的果效不只是针对过去，乃是一生。洗礼只是证据，其本身不能使我们获得赦罪，而是使我们常提醒自己称义的地位。关于加尔文提出约翰的洗礼和众使徒的洗礼相同，笔者认为这一点值得商榷，需另行讨论。

由于当时重洗派发展惊人，加尔文在论及洗礼之外又特别论述了婴儿洗礼的教义。婴儿洗礼的内容在整本《基督教要义》中可以说是篇幅最大，可见加尔文对婴儿洗礼的重视。加尔文甚至担心：这一教义如果被毁坏，教会几乎有被毁灭的危险。反观四百多年后的教会，加尔文的担心不无道理。

谈到婴儿洗礼的证据，加尔文根据的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连续性。

创 17:7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

这一恩典之约是给所有以信心为本的真选民，所以这约的印记——割礼也一定会有其连续性，在新约以洗礼代割礼。婴儿在这恩约应许的印记上一直有份，使之与外邦人的儿女有明显区别（林前 7:14）。有人反对说“小孩子不能来到基督面前”，然而这正是基督所吩咐的。虽然圣经没有婴儿洗礼的字样，但这却是圣经直接教导的，就如圣经也没有妇女领圣餐的字样，但谁能拒绝她们领圣餐呢？加尔文针对重洗派提出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反驳，证据确凿。重洗派常常引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等经文，说，婴儿不能领受真道，并且没有真正的信心，因此不能重生，所以不能接受洗礼。加尔文给出充分的圣经证据反驳他们的观点，并指出主使用特殊方式呼召祂的百姓实在是奥秘，而且洗礼和重生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神吩咐割礼和洗礼做在婴儿身上，乃是圣灵将隐秘工作的种子栽种在他们心里，割礼和洗礼的功效体现在他们将来的悔改和信心。至于受洗婴孩中的非选民，他们和成年后接受洗礼的非选民一样，洗礼的功效反而使他们更加刚硬。婴儿洗礼的焦点不是婴儿的信与不信，而是神記念祂的圣约。

在论述完婴儿洗礼之后，加尔文接着论述圣餐。加尔文的圣餐观纠正了路德的同质说和慈运理的纪念说，不仅彻底抛弃天主教迷信偶像的变质说，也与完全把圣餐当作外在形式而忽视其属灵意义的观点有别。加尔文认为：基督在这圣礼中确实与我们同在，就如同我们亲眼看见祂，亲手摸到祂，但这只是属灵地同在，并非真实的肉身。这种吃喝基督的身体和血的方式就是信心：“除了信心之外，我们想不到还有别的方式。”我们和基督的联合，是圣灵借信心的工作，虽然奥秘，但却是真实的。这种联合是我们（不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是身体而是信心)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又降临到地上。圣餐对信的人有如此大的祝福,但对不信的反而会像毒药一样,使其遭受更大审判。和洗礼一样,圣餐也不能在神的话以外存在。牧师必须解释宣布圣餐的奥秘,才会使领受的人获益。

关于按理领受圣餐,加尔文认为信徒不仅是要省察认罪,而更要思想基督所买赎的救恩,看其是否真正确信。所以在领受圣餐时,教会不应该教导信徒将罪认清、或觉得拥有完全的信心、或觉得配领圣餐,然后再去领圣餐。若是如此才能领受圣餐,我们就不能从圣餐中滋养信心,反而会陷入绝望,因为没有人能凭自己配领圣餐。现在许多教会一直陷在这一错误中,以致于许多人在领完圣餐后觉得自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罪,不可能完全认清;我们的分辨省察也都是不完全的;我们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心。加尔文说:“这样的教导就严厉剥夺了恐惧战兢和愁苦可怜的罪人从这一圣礼中得到的安慰。”

圣餐就是在教导我们:若没有基督,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神所要的配得就我们将自己的污秽不洁交给神,神的怜悯使我们成为配得。我们对自己绝望,好让我们在基督得安慰;我们谦卑,好让基督被高举;我们责备自己,好让基督称我们为义。

太 9:12-13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加尔文的圣餐观才是神要借这圣礼祝福我们的本意。可惜今天又有多少教会能用这样的圣餐观来教导会众,使他们蒙受这天上的祝福呢?

慈运理曾就圣餐问题与路德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然而,布林格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坚持慈运理的观点。1540年以来,布林格还常就圣餐问题与加尔文进行商议。经过几年的谈判,1549年,这两位宗教改革家在日内瓦达成了《苏黎世协议》。这个协议既维护了慈运理所坚持的圣餐具象征意义的立场,同时也强调了加尔文所坚持的基督属灵临在于圣餐的真实性。《苏黎世协议》的签订可以看作是慈运理派向加尔文派融合的一个标志。

13、后人对加尔文的评价

加尔文主义成为后代改革宗信仰的代名词。我们并非高举加尔文这个人,我们所高举的乃是上帝借着这个人教会光照出的伟大教义。加尔文写的各种解经书籍,特别是《基督教要义》,成为后代改革宗教会的信仰、信经、信条的基础。神使用加尔文成为后代教会的柱石。在各个国家,加尔文主义确实曾经受到主教、牧师、大学老师、以及信徒们的拥护。在英格兰,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代以及查理一世在位的大半时期,很难找到一位不宣扬英格兰教会教义(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今天则刚好相反,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宣扬加尔文主义的牧师。大多数教会的讲台和门楣上已经写上了“以迦博”三个字。

下面摘录了一些名家对加尔文的评价。有很多人觉得言过其实,担心把一个人抬得过高,类似于天主教的封圣,有偶像化的嫌疑。绝非如此!加尔文所阐述的教义,绝不是从加尔文堕落理性产生的遐想,而是圣灵使用这一位谦卑的器皿,发出的真理信息。我们乃是通过这些教义看到了神的荣耀。

林前 4:7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

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瓦波顿（Warburton）说：“我们其实很有理由称万有引力定律为牛顿定律，因为大科学家牛顿是第一个把这项原理解释清楚的人。牛顿还没出生的时候，万有引力从创造天地的第一天就已经有了，因为神以万有引力管理宇宙。只是世人对万有引力的原理不甚了解，直到牛顿研究清楚了，大家才明白。同样，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早在加尔文出生之前就存在了，甚至从神创造人类之后，加尔文主义的原则就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尔文只是最先把这些原则整理成一部思想体系的人，所以这套思想体系以及相关的信条都以加尔文主义为它们的名字。”

亨利·司密斯（Henry B. Smith）教授早在一百年前就预言过：“有件事绝对会发生，就是不信神的科学主义将横扫全世界，一切思想体系都应声而倒，只有彻底的基督教正统主义例外。”那么就让我们接受这挑战吧！我们应当欢欣鼓舞，因为蒙恩的罪人不能完全丧失他对神的依靠，全能的神也不能从他统管宇宙的宝座退位，所以加尔文主义也不会从地上消失。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兴旺，哪里就愈少犯罪。今天全世界公认最有道德的民族，也就是最彻底地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民族。加尔文主义在哪个地方的影响力最大，哪个地方的道德水准也最高，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是这样。这绝非巧合！

凯波尔博士说：“加尔文主义不只是我们前面的一条路而已，更是一条最正确的路。其他一切事都要土崩瓦解，如冰雪融化。研读加尔文主义确实耗费心力，使人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加尔文主义对一般人来说是太深了。不过加尔文主义能牢牢抓住人心，这也是因为这股特别的力量。”

华腓德说：“加尔文主义是方向正确的有神论，是观念成熟、登峰造极的信仰，也是纯正且唯一的改革宗思想的表现……加尔文对人类的贡献很多，而且每一项贡献都很有份量，其中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他善用神的恩赐，使我们的信仰体系焕然一新。他的天分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新的生机。”

第四章 英国初期宗教改革

英国改教运动的主要特点如下：藉着国王展开，也围绕政权发展；给教会带来纯正的信条，祝福世界，但自己国家始终不能归正；以敬虔的信仰生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清教徒却没有改变英国国教的命运。

第一节 威廉·丁道尔

1、威廉·丁道尔的生平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又译“廷达尔”，1494—1536）是16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改革先驱，被认为是第一位清教徒。

丁道尔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一个村庄。他颇具语言天赋，虽然他的母语为英语，但他却能流利地讲法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1515年7月，不到21岁便已考取到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转往剑桥大学。那时，伊拉斯谟刚好完成了希腊文新约圣经标注的第一版。丁道尔在剑桥认识了汤姆·宾尼。宾尼给他买了一本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神的话使丁道尔的生命更新，他欣然接受了新教思想，而且内心产生了一份渴望和负担——把圣经译成英文。丁道尔说：“如果神留存我的生命，我宁愿把此生的年日全部用来教导农村孩子认识神的话。”这是神赐给他的使命和呼召。当时德国因马丁·路德而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阵营，而英国仍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尽管英语是通行的语言，但所有形式的教育却采用拉丁语传授。教堂也使用拉丁语，圣经只有拉丁语的武加大译本。人们除非受过良好的拉丁语教育，否则就无法阅读这部拉丁语圣经。丁道尔在与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交谈中，发现那些神职人员对圣经的无知和轻忽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位神父对丁道尔说：“我可以不知道圣经，我只知道教皇的谕令就够了。”丁道尔答道：“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使农村放牛的孩子比你更懂圣经。”

2、翻译圣经

起初，丁道尔尝试藉着教会合法途径——得到主教的批准，来进行翻译圣经这项工作。因为1408年的牛津教会会议条例（即《牛津宪法》）有一条禁令，就是除非获主教批准，否则不准将圣经译成通俗的语言，也不准人阅读这些圣经译本。有的人因翻译一句主祷文便被处以极刑。许多称为罗拉德派的巡回传教士阅读和分发威克里夫的圣经（一部从拉丁语《通俗译本》译成的英语圣经译本），结果他们被判为异端而遭活活烧死。

1523年，他来到伦敦会见伊拉斯谟的朋友——伦敦主教滕斯托尔。他打算向主教提出请求：同意他将圣经译成英语。主教将他拒诸门外。后来丁道尔直接致函约见滕斯托尔。滕斯托尔后来是否接见他，后人不得而知。但滕斯托尔的回是：“这里没有地方。”

主教如此冷落丁道尔主要与英王反对路德派的态度有关。1521年，英王亨利八世下发了一篇措辞凌厉的专文，一面抨击马丁·路德，一面为天主教会辩护。教皇投桃报李，将“保教功臣”的尊号授予亨利。亨利属下的枢机主教沃尔西也积极参与其事。他把非法运进英国的路德的书籍通通销毁，以表对教皇的效忠，同时警惕一切受路德影响的人。他们知道，只要人们一读到圣经，“路德异端”就将无法遏制地在英国蔓延。滕斯托尔

身为天主教主教，觉得有义务远离甚至逮捕受路德影响的人，而丁道尔正是最有嫌疑的人物。

丁道尔便不得不冒着火刑的危险，开始私下翻译圣经。事实上，当时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已引起了天主教的恐惧，所以英国的气氛也是异常紧张。即使英语圣经被翻译出来，英国也不可能有印刷商敢印制。因此，丁道尔不得不在152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逃往欧洲大陆继续翻译圣经。

3、流亡德国

丁道尔被誉为“第一名清教徒”，不仅是因为他把圣经放在首要位置，也是因为他冲破重重拦阻，冒着生命危险来推动宗教改革的进程。除此之外，他在信徒中间成功地建立起紧密的联结关系。丁道尔的活动范围在一些繁忙的港口，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和伦敦、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及德国的汉堡。他常与各地的商人、水手和贩卖圣经和宗教书籍的小书商来往，原来当时不少书商已把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者的著作偷运到英国出售。他们帮助他渡过英伦海峡到欧洲大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此后十多年，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来逃避枢机主教的爪牙，日子过得异常艰苦。

丁道尔携带他的珍贵书籍到德国避难。他身上携带10英镑，这笔钱是他的朋友——一名颇具影响力的伦敦商人汉弗莱·蒙茅斯的好意馈赠。当时这笔钱差不多够他印制计划翻译的希腊语圣经。有些证据显示，丁道尔很可能在汉堡住了一年，也可能在威登堡大学受教于马丁·路德，直接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文翻译圣经。虽然在对蒙茅斯的指控中提及丁道尔见过路德，但他是否跟马丁·路德会面，目前仍不能肯定。后来蒙茅斯被逮捕，罪名是协助丁道尔及涉嫌支持马丁·路德。审讯之后，他被收押在伦敦塔，直至他向枢机主教沃尔西请求特赦才获释。

1525年初，丁道尔已经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把印刷圣经的重任交给德国科隆的印刷商彼得·昆内尔。正着手印刷《马可福音》时，有人向亨利八世举报，国王禁止昆内尔印刷丁道尔的圣经，并下令逮捕丁道尔。于是，丁道尔和助手威廉·罗伊带着已印制的《马太福音》又赶忙逃命，坐船沿莱茵河到沃姆斯——几年前路德受审之地。多年心血遭此破坏虽然令人泄气，但丁道尔并不灰心，继续在沃姆斯完成了最后的工作。1526年，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终于译成发行了，在沃姆斯出版，一共印刷了6000本。这版英文圣经和威克里夫的译本有两点不同：第一，威克里夫的圣经是从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的，丁道尔则直接从原文圣经（即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第二，丁道尔采用最新发明的印刷术来大量印刷圣经，使圣经在英语世界中大为普及，而威克里夫的圣经因一直受到天主教的清缴，拥有这版圣经的人甚少。

翻译和印刷圣经虽是艰巨的工作，但将这些圣经运返英国就更加困难。教会代表和世俗权威严禁船只运送圣经横渡英吉利海峡。然而有些同情丁道尔的友好商人暗中协助，将大批圣经藏在一捆捆的布料和其它货物当中，偷偷运到远至苏格兰的英国沿岸一带地方。于是伦敦主教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持有英文新约圣经，持有者主动交出可减轻罪责。有些运送圣经的人被捕丧生。1526年2月11日，枢机主教沃尔西在多名主教的陪同下，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观看人们将一篓篓的书烧毁，其中就包括丁道尔的圣经译本在内。同年10月，滕斯托尔截获了一大批丁道尔的圣经，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便在圣保罗大教堂发表一篇讲道，定罪丁道尔的圣经并将其焚烧。但大批圣经仍然从德国运来，并迅速贩卖到英国百姓的手中。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滕斯托尔后来改变策略，跟一个名叫奥古斯丁·帕金顿的商人达成协议，收购所有丁道尔写的书，包括《新约圣经》在内，然后送去烧掉。但帕金顿跟丁道尔谈妥，让丁道尔收取这些钱以印制更多圣经。哈雷的《编年史》说：“主教可以没收丁道尔的书，帕金顿得到滕斯托尔和丁道尔的感激，丁道尔则获得主教拿出来钱。后来，更多的新约圣经印刷出来，不计其数的圣经迅速运到英国。”

4、以身殉道

1526至1528年间，丁道尔移居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与他的朋友和赞助人托马斯·波因茨在一起，因此主教无法加害于他。在这期间，丁道尔尽力照顾病者和穷人，写了《邪恶玛门的比喻》、《一个基督徒男子所表现的服从》和《高级教士的行径》这几部书，并且继续从事翻译旧约圣经的工作。

丁道尔敌人并不罢休。1535年，一个名为亨利·菲利普斯的人来到安特卫普，先与丁道尔建立友谊，骗取了他的信任。同年在与丁道尔同途中，菲利普斯以一个特殊的暗号出卖了他，兵丁立即将丁道尔逮捕。丁道尔以异端的罪名被捕，被押送到布鲁塞尔以北10公里的维尔福德堡监狱——这所监狱模仿了巴黎的巴士底监狱。丁道尔在那里遭监禁达16个月之久。

太 26:48-49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太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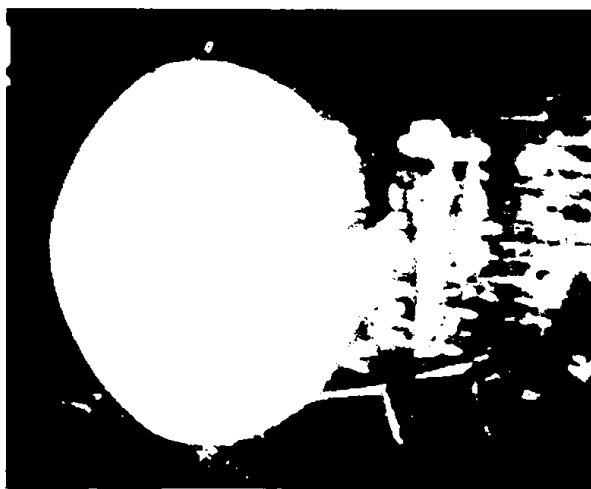


图 4.23 丁道尔在狱中继续翻译圣经

在丁道尔最后遗留下来的少量文献中，有一封信是在1535年冬天写给维尔福德堡长官的，此信让我们想起了被囚的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封信。丁道尔请求那人把自己一些充公了的物品发还给他，包括一顶暖帽和一件大衣，使他能抵御监牢严寒的天气。“但最要紧的”他说，“我恳求你，哀求你大发慈悲，请你尽快下命令给你的下属，准许我得回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文法书和希伯来文字典，让我在监牢中能藉学习和研究来打发日子。”丁道尔像保罗一样，即使身陷囹圄，还渴望为主工作。

提后 4:13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提后 4:21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利奴、革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

在维尔福德监牢中，他写下了一篇短短的神学论文《唯有信心才能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历史学家推测，丁道尔在牢中仍旧努力不懈地翻译旧约圣经。

1536年10月，年仅42岁的丁道尔被天主教以私译圣经的罪名判处绞刑，行刑地点在布鲁塞尔。丁道尔被绞死后，遗体被挂在柱上焚烧。丁道尔死前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一个祷告：“主，求你开英国国王的眼晴！”天主教对他的死拍手称快，但不久宗教改革在英国展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始终围绕王权发展。

5、丁道尔译本特色

中世纪将近七百年间，天主教在各国封闭圣经，凡是翻译研读圣经的人都被处以火刑，所以各国人民都没有圣经。瓦勒度、威克里夫、马丁·路德、丁道尔的这些圣经译本仿佛旷野的甘露、干旱之地的雨水一样滋润人们饥渴的灵魂。当圣经再次回到人们手中时，真理之光就再一次驱散了属灵的黑暗。

诗 63: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雅 5:7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由于普通的英国百姓无法阅读拉丁文的《通俗译本》，1526至1536年十年间，丁道尔首次根据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原文圣经，将全部新约及大部分旧约译为英国人可以阅读的英语。1534年，丁道尔修正了其新约译本。丁道尔翻译新约圣经是根据伊拉斯谟的希腊文版新约圣经，同时又对比拉丁文《通俗译本》；翻译旧约圣经则根据希伯来文圣经，并参考马丁·路德的德文版圣经及《通俗译本》。

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为例，丁道尔将希腊词语“ἀγάπη”译为“love”（爱）而非“charity”（慈惠）；将希腊语“ἐκκλησία”（教会）译为“congregation”（会众）而不是“church”，因为常用的“church”不仅指信徒的聚会，也意味着建筑物“教堂”。丁道尔首次在英文译本里将上帝的名字翻译为“耶和華”，这个名字在他的译本中出现了20多次，以区别天主教的“雅威”。

丁道尔译本采用“长老”代替“神父”，又用“悔改”代替“告解”，此举一下子剥夺了教士向来持有的神职权力。大卫·达恩利尔说：“他的译本，既没有炼狱，又没有听罪和告解，这两个曾为教会带来财富和权力的教义立时就失去效用了。”丁道尔的翻译彻底划清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界限。

后来的英语钦定版（KJV）圣经有百分之九十采用了丁道尔原来的翻译。许多国家的圣经译本（如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主要以KJV为蓝本，由此可见，丁道尔的事工对教会的祝福是多么巨大！由于组织英语钦定版的英王是亨利八世的后代，丁道尔又死于亨利八世之手，所以钦定版没有署上丁道尔的名字，丁道尔在后世也就鲜为人知。但他的事工及果效永远在上帝面前被记念，也永远被改革宗清教徒记念。

第二节 初期王朝开展的宗教改革

1、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是都铎王朝第二任君主，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国王，是英王亨利七世与伊丽莎白王后的次子。

1501年，亨利七世为长子亚瑟聘娶西班牙的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其姐姐疯女胡安娜是查理五世的母亲），以缔结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及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同盟。这两个人是哈布斯堡王朝坚定的天主教徒。1502年，与凯瑟琳结婚四个月后，亚瑟猝死。由于长兄亚瑟的早逝，12岁的亨利成为王位继承人，继任威尔士亲王。为保持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以获得友好关系，亨利七世说服凯瑟琳留下，并使凯瑟琳与次子亨利订婚。当时，这桩婚姻违反天主教教规，但教皇为了联合英国和西班牙共同对付法国，于是违心发布谕令允许这桩婚姻。

2、亨利八世的生活及发起宗教改革的原因

1509年4月21日，亨利七世去世。1509年6月11日，亨利和凯瑟琳正式举行结婚典礼。1509年6月24日，亨利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加冕仪式，继承王位，称为亨利八世。



图 4.24 亨利八世

起初，亨利八世坚决反对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称这些改革者为“异教徒”，把他们统统送上火刑柱。他还亲自撰文抨击马丁·路德的“异端邪说”，教皇利奥十世授予他“保教功臣”的尊号。马丁·路德则将他斥之为“戴着王冠的蠢参谋长”。

王后凯瑟琳曾多次流产，唯一幸存的孩子玛丽·都铎，就是日后被称为“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1525年，亨利八世以凯瑟琳不能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为借口要求离婚，并且和女侍官安妮·博林（Anne Boleyn）发生婚外情。因为凯瑟琳是西班牙公主，所以教皇生怕得罪西班牙王朝——这个王朝牵连到德国及整个天主教世界，就没有批准亨利的离婚请求。于是亨利八世让大法官沃尔西（即上节提及的枢机主教）与教皇交涉，谈判

失败，亨利一气之下将沃尔西流放。但大法官继任者托马斯·摩尔爵士（《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忠于罗马教会，仍不愿配合亨利。亨利又撤换摩尔，提拔托马斯·克蓝麦和托马斯·克伦威尔，这两人都支持他和安妮·博林的婚姻。亨利任命托马斯·克蓝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命克蓝麦继续和教皇交涉。克蓝麦曾率几十人组成的游说团前往罗马，利用圣经经文企图说服教皇允许离婚，但这位固执的教皇就是不肯应允。克蓝麦支持亨利的离婚也是后来玛丽一世痛恨他的原因。

1533年1月，在没有获得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亨利八世便迫不及待秘密地与安妮·博林结婚。罗马教皇闻讯后宣布将这位如此藐视教皇权威的亨利八世驱逐出教。作为报复，亨利八世宣布宗教改革开始，英国国会随即立法脱离罗马教廷。

后来亨利八世又娶了四位王后，一生共娶了六任妻子，其放荡不羁的生活可见一斑。这六任妻子分别是玛丽·都铎（血腥玛丽）的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博林、爱德华六世的母亲简·西摩以及没有子女的克里夫斯的安妮·凯瑟琳·霍华德和凯瑟琳·帕尔。这六任妻子的命运被后人编成顺口溜：“离婚、砍头、死，离婚、砍头、活。”虽然亨利八世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发起人，但他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从他一生的生活看不到他蒙恩得救的见证，与发起宗教改革的路德和慈运理完全不同。

3、英国开始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使国会于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又称《最高治权法案》），宣称英国国王取代了教皇，成为“英国教会在地上的唯一最高元首”；凡接受天主教教义的就是异端，当被定叛国罪而处死刑。天主教的大主教菲舍尔和摩尔爵士被斩。《至尊法案》的发布标志着圣公会——安利甘宗的诞生。

《至尊法案》的摘录如下：

被某些人称为教皇的罗马主教由自封的权力和篡夺的权威，长期以来背离、歪曲了上帝的圣言和圣约，以满足他的浮华、荣耀、贪婪、野心，并以人为的政治和虚构加以遮盖，尽其所能地将基督排除在教会之外。从1536年7月最后一日开始，凡出版、维护教皇权威的说教都当明令处罚。我们规定不承认英王的最高权威即是叛国罪，可判处死刑。取消给教皇的献金。

《至尊法案》同时还宣布凯瑟琳的女儿玛丽乃是私生女，安妮·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则为顺位继承人。

4、亨利八世的其他改革

亨利八世在取代教皇成为教会元首后，英国教会（圣公会）仍维持由主教治理的形态。与天主教相比，国教会在教义、崇拜仪式及某些信仰实践方面增加了一些改革。500间修道院被关闭，修道院的一切财产包括土地、珠宝、黄金被没收。国王将它们的土地进行划分，分配给自己的心腹；同时也开始清除教堂内的偶像。“所谓圣徒遗物，纯属欺诈”，各地教堂中整车的圣物全部被捣毁。

1539年，因拒绝新教徒进一步改革教会的请求，亨利颁布了《六条款法》，其中教义、礼仪大都以亨利个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为准，以六条法令的形式强迫教会遵行。《六条款法》肯定圣餐的饼和酒变质说，不准平信徒在守圣餐时自己执杯，圣品人员要严守独身，不得反悔修道的誓约，教会可为信徒举行私人弥撒，并且肯定了告解的重要性。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凡否定此六条中第一条，即否定变质说，便会被定死罪；否定其它五条的，财产充公并且受监禁。

由此可见，亨利所谓的宗教改革虽然外表脱离了教皇的统治，但根本上没有脱离天主教的敬拜和教义，仍然不属于新教信仰，这也是许多新教徒所不能接受的。亨利八世在此后的八年间对已经接受了新教信仰的许多新教徒发动了血腥的屠杀，其惨状不次于天主教对新教徒的逼迫。

5、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亨利八世于 1547 年去世，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即位。此时爱德华年仅九岁，便由舅父萨默塞特公爵 (Duke of Somerset) 爱德华·西摩——一位新教徒摄政。爱德华从小也特别受到他的希腊语老师剑桥的理查德·考克斯和约翰·切克的影响，这两人都是伊拉斯谟式的宗教改革学者。亨利八世最后娶的妻子凯瑟琳·帕尔也是一位新教徒，对爱德华的成长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上帝借助这些人的引导使爱德华成为一名真正的新教徒，和他父亲完全不同。

为了推进宗教改革，爱德华六世敦促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国会废除了亨利的《六条款法》，在礼仪方面先后颁布了《统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ity)、《反对辱骂圣礼者》(Against The Revilers of The Sacrament) 和《圣餐规程》(order of Communion) 等几个法案，颁布了一些符合新教的礼拜规定，并首次要求在圣餐礼中使用英语代替拉丁语。



图 4.25 爱德华六世

爱德华六世命令托马斯·克蓝麦大主教制定崇拜礼仪书。克蓝麦于 1549 年 9 月 6 日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作为信仰标准，给英国所有的教会使用，并要求所有人按照《统一法案》的要求遵守并使用该公祷书。1552 年，克蓝麦和伦敦主教里德利在布舍 (Bucer) 和彼得·马特的帮助下修订了《公祷书》，并被国会通过。

《公祷书》代替了弥撒经书，取消了天主教的许多繁杂礼仪，不再为亡者祈祷，用普通的面包代替无酵饼，废除了驱魔礼等。其内容分四部分，包括认罪文、婚礼文等，圣公会一直沿用至今。认罪文按照下面的格式：“仁慈的圣天父，我们犯下错误，偏离圣道，犹如迷途的羔羊，常随自己的心愿，违背了您的圣经。该做的事未作，不该作的事很多，

我们病痛缠身，无力行善。主啊，求你照耶稣基督给人类的应许，怜悯我们这可怜的罪人……”强迫人按照固定形式逐条认罪是加尔文一直反对的，因这不是基督所吩咐的。公祷书中还有婚礼文，如“某某，你愿意与某某结为夫妇，共同生活，无论疾病健康，你是否都……”婚礼中的礼仪也是后来清教徒所反对的。《公祷书》中许多固定祷文虽然仍带有弥撒气息，但比起亨利的《至尊法案》，这是英国教会向宗教改革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552年克蓝麦在六位神学家（包括约翰·诺克斯）的帮助下，起草、制定了《四十二条信纲》。这部信条与前面的几部法令奠定了英国圣公会的思想基础，它一方面从教义上肯定国王为英国国教会的元首地位，同时清除了天主教的许多迷信和偶像崇拜礼仪，另一方面也反对重洗派的立场，比较接近《奥斯堡信条》。《四十二条信纲》主要有以下几点：（1）神父改称为牧师（minister）；（2）用普通桌子代替祭台；（3）否认化质说，但仍承认基督神性临在；（4）肯定因信称义的真理；（5）圣经是唯一的权威；（6）承认两件圣礼：洗礼与圣餐；（7）承认上帝预定拣选的教义；（8）彻底废除圣职人员独身制。

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改革举措使英国向真正的新教国家迈进，但英国教会仍然存在天主教糟粕——固定祷文和圣礼服装等。在进一步改革教会的问题上，新教阵营内部分裂为两派：以大主教克蓝麦、伦敦主教里德利为首的温和国教派与以胡珀为首持守改革宗信仰的清教徒。围绕这些问题，两派之间开始了斗争。1550年，胡珀在任格罗切斯特主教时拒绝穿祭司服，也拒绝宣读带有“上帝和所有的圣徒帮助我”字句的就职宣誓书，最后被克蓝麦投入监狱。然而双方当时的矛盾还不是很激烈，他们毕竟还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天主教。1551年3月，这场斗争以胡珀的屈服而告终。

1552年，国会通过了新的《统一法案》，比前一部《统一法案》更加强烈，规定凡不参加公共礼拜的人将被开除教会，而参加其它未规定的礼拜的人将被处以半年、一年甚至终身监禁的惩罚。这样的激进措施未必能给教会带来好的结果，反而会埋下隐患，因为敬拜上帝是要用清洁与自由的良心，而不能用高压和强制手段。况且，当时教义、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如此不彻底，这样的激进措施只会阻碍宗教改革的步伐。此时驻留在英国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就预言英国的改教事业可能会产生大的波折。果然，好景不长，一个血腥的逼迫时代又要开始了。

1553年，爱德华因肺结核去世，年仅十六岁。由于玛丽是一个天主教徒，爱德华为了避免玛丽即位，就与议会拟定了《继承法案》，选择了15岁的新教徒表妹简·格雷为王位继承人，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都排除在外。然而，简·格雷在爱德华逝后登基不过九天便被玛丽推翻。1553年7月19日，玛丽即位，称为玛丽一世。

第三节 玛丽治下的天主教复辟

1、玛丽一生

玛丽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她一上台就开始着手恢复天主教，废止了爱德华六世的各项法令和制度，恢复旧制度、旧礼仪，英国立即与罗马教廷和解、复交。玛丽一世还用武力镇压了新教徒发动的怀特叛乱。要求继续宗教改革的呼声被玛丽一世斥为“下流腐朽的思想”。长期流亡在外的天主教枢机主教波尔回到了英国，立即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1554年11月，玛丽一世再次承认教皇对英国教会的统治权。在1554年的圣安德烈日（11月30日），女王率领国会议员下跪，迎接教皇特使布洛克斯主教。特使代表教皇宣布撤除英国异教的罪名，欢迎英国重返“大公教会”的怀抱。1555年2月，玛丽一世和波尔也恢复了英国的异端裁判所和火刑。此后，他们大力镇压新教徒。在玛丽一世统治的五年之间，约三百位新教领袖惨死火刑柱。仅在1555年这一年中，英国各地有75人被火烧死，包括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蓝麦、伦敦主教里德利和拉提默尔长老。玛丽一世因严厉镇压新教徒而被称为“血腥玛丽”。

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上帝怎么会让他自己在英国的改教工作毁于一旦？1554年，在表兄查理五世的安排下，玛丽嫁给了查理之子——西班牙亲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婚后，腓力和玛丽成为英国共治国王。1556年，腓力又继承其父之王位，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坚强阵地，事实上，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西班牙的一个行省。玛丽和腓力两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最终也没能生出一个继承人。玛丽晚年精神极度失常，常出幻觉，声称自己已经怀孕。1558年，42岁的玛丽一世终于在极度恐惧惊吓中去世。当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整个伦敦响起了欢庆的钟声。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当即跪倒在地，用拉丁语呐喊着：“这是上帝的杰作呀！这是我们看到的奇迹！”“血腥玛丽”（Bloody Mary）一词在今天的西方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鸡尾酒的名称，也是电影中鬼屋的代名词。



图 4.26 玛丽一世

2、克蓝麦殉道

1532年，亨利八世指派克蓝麦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蓝麦成为英国改教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在他的指导下，许多改革付诸实行，例如信徒圣餐时可以同时领受饼和杯、教堂里取消图像等。克蓝麦到各地游行讲道，教导圣职人员和百姓。他同时也是《公祷书》与《四十二条信纲》的主要起草人。

在爱德华六世去世前，爱德华六世让他签署拒绝玛丽即位的法案。克蓝麦起初拒绝签署，因为他曾起誓答应亨利八世辅助玛丽即位；此时他若签署，等于违背他的誓言。但个人的誓言怎么能高过神国度的利益？如果他继续拒签，那么英国将面临重返天主教的危险。最后在众人的极力劝说下，克蓝麦签署了排斥法案。但这一法案没能阻止玛丽

的即位，因为教会所受的患难是神所命定的。

1555年，克蓝麦被玛丽革除教籍，红衣主教波尔接替了他的职位。但为了暂时讨百姓的欢喜，玛丽没有立即杀他。待政权稍有稳定后，玛丽立即就把克蓝麦送去与牛津和剑桥的博士们辩论，假借看似公正而诚实的辩论来杀他。与克蓝麦一同被审问的还有里德利主教和拉提默尔长老。经过几天所谓的辩论后，他们都被定为传异端者。



图 4.27 克蓝麦

从此以后，大主教被拘禁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牛津大学的博士们和其他神学学者，整天络绎于途，不停地来劝告他放弃新教信仰，有时还给他美味的食物，又容他去散步或做其它能使他离开基督的消遣。他们又应许他说，若他肯屈服，不但能保全性命，还能再居高位。在这许多威胁、利诱、恳求再加上应许的围攻下，克蓝麦动摇了，他举手投降，亲自写下了放弃信仰的声明。

教士们迫不及待地把克蓝麦放弃信仰的声明大量地在国内外各地发行。女王得到他的声明后，高兴异常，但她仍不肯放过报仇的机会。她根本无意饶恕克蓝麦，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这仇恨在克蓝麦支持亨利八世和她母亲离婚时就已经埋在心底。这也是神让祂的仆人明白靠投降和出卖信仰断不能换得平安。这时，克蓝麦的良心受到了严厉的控告，仇敌的藐视也使他无法安静。

女王召集秘密会议，判处克蓝麦火刑。在火刑前一天，科尔到牢里去看克蓝麦，试验他是否仍坚持天主教的信仰。克蓝麦回答他说：“靠神的怜悯，我日益笃信天主教的信仰。”火刑当天一大早，科尔又去看他，劝他要信心坚定，不要再改变心意。大主教克蓝麦知道自己临近死亡，心里暗暗决定要对百姓宣告他对基督的信仰，并写了一篇劝导百姓的祈祷文，暗暗藏在怀中。这时克蓝麦请求国王，希望在死前能有机会帮助女王劝勉一下百姓坚持天主教信仰。这一次玛丽和波尔上当了。

1556年3月21日9点，圣马利亚教堂内外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教皇这边的人抱着很大的希望，要听克蓝麦在众人面前承认并持守他们虚无、错谬的观点。修士们把克蓝麦带到舞台上就走了。在舞台上站的这位老人曾是英国的大主教和国王的私人顾问，但是如今却头戴一顶旧方帽，身上披着一件破烂的长袍，赤着足站在那里受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众人的藐视。

科尔博士首先走上讲坛开始讲道。科尔博士讲了许多，最后一部分是特别为大主教说的，安慰并鼓励他平安地死去。神即使不减轻火焰的苦痛，也必赐他力量使他可以忍受。“我现在要请他亲自向你们表白。克蓝麦长老，现在我请你公开表白你的真信仰，让大家知道你确实已经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了。”

克蓝麦说：“是的，我有话要说。”他转向百姓，开始他这一生最后一次讲道：“我即将走完我人生的路途；将来，不是和我主基督一起快乐至永远，就是在地狱里和邪恶的众鬼魔一起受那永远的火湖之苦。我现在正面对不是天上预备接受我，就是地狱要开口吞灭我的关头。因此我要向你们宣布我的真信仰，绝不隐瞒或假冒，我过去所写或所讲的也都不算数！我相信创造天地全能的父神，也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还有他的使徒和先知们在新旧约圣经里所讲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要讲一件最重要的事，它至今使我的良心极不平安，远超过我一生所作、所讲的任何一件事。关于那篇我亲手所写，已被传送到国外的那份反对真理的声明，我要在此郑重地拒绝和否认。我因为怕死，想要救自己的命，才写下这篇违反我内心所明白的真理的文章。它是在我被罢黜后所写并签名的。因着我的手使我跌倒，写出违背我良心的文章，所以我要惩罚我的右手，在受火刑时，我要先烧毁我的右手……”

“我要重新申明：我坚决抵制教皇。他是基督的敌人，是敌基督；他的教训是假教训。”

听到这里，围观的人都惊愕地面面相觑，仇敌的期望显然落了空。有人又开始劝他放弃信仰，也有人谴责他的伪善。但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挽回，百姓们都已耳闻目睹克蓝麦粉碎了他们的希望。他们想利用这个人的放弃信仰而得着足以夸耀的胜利，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使他们失望到极点。尽管他们狂怒、焦急，却是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再也无法用报复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怒气，也不能再用死来威胁他——世上最可怜的人也只能死一次而已。

当克蓝麦继续讲圣餐的真理和教皇的统治时，仇敌不住地向他吼叫、咆哮。科尔吩咐修士说：“封闭这个传异端者的嘴！把他带走！”修士们立刻把克蓝麦从台上拉下来，解到火刑场去。一路上他们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折磨他，但他毫不反抗，只顾对众百姓说话。



图 4.28 克蓝麦殉道

与克蓝麦一起殉道的还有拉提默尔和尼古拉·里德利，克蓝麦走到火刑场时，他跪下来作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站起来脱掉长袍，仅穿着一件衬衣预备受刑。他赤足光头，胡须浓密，脸色非常庄严。西班牙修士约翰和理查再来向他劝说，但是徒劳无功。克蓝麦表示他必要坚定地持守他的信仰，绝不再改变。他又伸手向旁观的人告别，刽子用手用铁链捆住克蓝麦后，就把火点燃了。架上飞舞着炽烈的火焰，火舌在他身上舔舐，人们看到克蓝麦伸出右臂，坚定不移地把右手放在火焰里，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他的右手先被烧毁。他在火焰中寂然不动，只是举目望天，重复地说：“我的右手不配！我的右手不配！”在熊熊的烈火中他一再高声地说：“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然后平安地去见他的救主。

第四节 伊丽莎白时代的改教运动

1、伊丽莎白即位

1533年9月7日，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出生于格林尼治，是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二个王后安妮·博林唯一幸存的孩子。1536年5月19日，伊丽莎白三岁时，她的母亲安妮·博林因被判为叛逆罪而被处死。伊丽莎白被宣布为私生女，从伊丽莎白公主变成了伊丽莎白·都铎小姐。后来伊丽莎白在王后凯瑟琳·帕尔和其他教师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新教徒。

玛丽统治期间，她假称自己改信了天主教，才保住性命。但玛丽仍对她不放心，曾将她囚禁于伦敦塔两个月。随后伊丽莎白被释放，但一直被软禁在一处庄园中。

玛丽对新教徒的逼迫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残酷，但幸好玛丽在位不到六年便逝世。玛丽死后，妹妹伊丽莎白名正言顺地即位，这是“祭坛下殉道者的血的呼声得到的回应”。伊丽莎白于1559年1月15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加冕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是为伊丽莎白一世，是都铎王朝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虽然有包括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和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在内的许多王公贵族向她求婚，但她终身未嫁。

伊丽莎白一上台，便开始立即恢复英国新教信仰。1559年4月29日，在强烈反对下，国会再度通过《至尊法案》，摒弃了教皇在英国的所有权柄。



图 4.29 伊丽莎白一世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2、三十九条信纲

1563年，国会把原来的《四十二条信纲》缩减而成有名的《三十九条信纲》，也就是今天英国国教会（圣公会）正式公认的信条。信条除作出最基本的信仰陈述以外，也谈到天主教奉为正典的次经：“此外还有别的书，教会用作生活楷模和教训而诵读，但不用它们去建立教理”。在对因信称义、预定拣选等教义的阐述上基本合乎正统信仰。

论到教会的权柄，第二十条说：“教会有权柄设立礼仪规条，并有决定信仰之辩论的权威，但是，教会不可设立与圣经相违背的礼仪，也不可讲解一处经文的意义与其他经文相违。”其中第一句话和改革宗信仰不同，比较接近路德宗。我们的信仰敬拜是唯独根据圣经启示，亦即圣经没有启示的，即使不违背圣经，也不可以使用。

论教会会议的权威，第二十一条说：“会议未奉君王命令和意旨不可召开。”后来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中论到这一点时加上了条件，那就是君王要敬畏上帝；若君王违背神的旨意，成为敌基督时，教会有权自行召开会议。

论国家长官，第三十七条说：“女王在英国及她的领土内有超群的权柄。凡这国度里的产业，无论是教会的或国家的，其主要掌权皆属之，此权既不是也不当受制于任何国外的管辖。我们将主要掌管权归于女王之举，触怒了若干诽谤者的心。”这一条将国王确立为教会的元首，这成为后来清教徒运动的主要原因。

3、英西大战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与以诺克斯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者之间产生激烈斗争，后被控谋杀亲夫罪而遭废黜，逃亡到英国。由于玛丽·斯图亚特是亨利八世的外孙女，英国的天主教上层分子，打算利用西班牙等海外势力拥立玛丽而恢复天主教。于是，伊丽莎白于1587年2月以“阴谋分子”的罪名将苏格兰女王玛丽斩首，这是欧洲天主教会的又一次严重的失败。教皇立即颁发特别诏书，号召天主教徒去同英国作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首先响应。为了远征英国，他集合装备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号称“无敌舰队”，征讨英国，企图恢复天主教失去的英国地盘。这支舰队拥有一百多艘战舰，三千余门大炮，三万多名海军。由于当时西班牙的航海最发达，这支舰队曾一度所向披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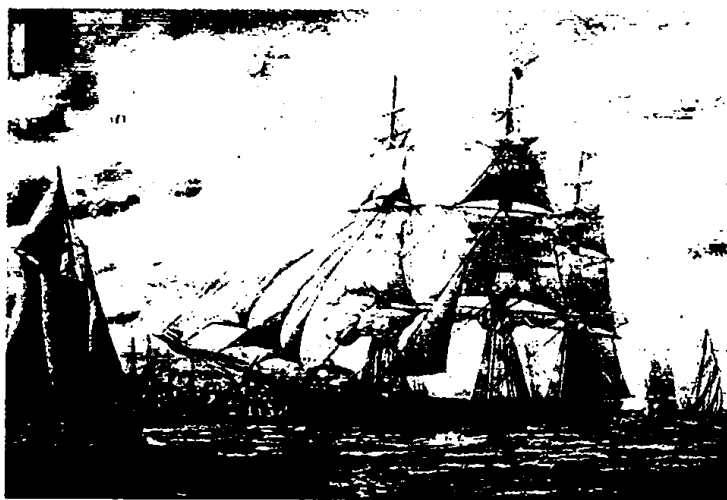


图 4.30 无敌舰队

1588年初，西班牙公爵梅迪纳率领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出航。刚走一半，舰队便遇大风，船只毁坏严重，他们不得已中途返回。但腓力二世对上帝的这次警告置若罔闻。整顿了三个月之后，“无敌舰队”于1588年5月以更大的阵容——150艘战舰——再次从里斯本港启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到达英吉利海峡。

英国方面也做好了迎击准备。英军由霍华德勋爵任统帅，虽然仅有197艘战舰，且都是小型战舰，只能装载九千多名作战人员，人数只是西班牙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小小的军队最后却战胜了“无敌舰队”。

撒下 14:6 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華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華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撒下 17:47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華。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伊丽莎白向对全国做了战前动员演讲，这是演讲史上几篇精彩讲演之一。以下是演讲的内容：

My loving people,

We have been persuaded by some that are careful of our safety, to take heed how we commit ourselves to armed multitudes, for fear of treachery; but I assure you I do not desire to live to distrust my faithful and loving people. Let tyrants fear, I have always so behaved myself that, under God, I have placed my chiefest strength and safeguard in the loyal hearts and good will of my subjects; and therefore I am come amongst you, as you see, at this time, not for my recreation and disport, but being resolved, in the midst and heat of the battle, to live and die amongst you all; to lay down for my God, and for my kingdom, and my people, my honour and my blood, even in the dust. I know I have the body but of a weak and feeble woman; but I have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 and of a king of England too, and think foul scorn that Parma or Spain, or any prince of Europe, should dare to invade the borders of my realm; to which rather than any dishonour shall grow by me, I myself will take up arms, I myself will be your general, judge, and rewarder of every one of your virtues in the field. I know already, for your forwardness you have deserved rewards and crowns; and we do assure you in the word of a prince, they shall be duly paid you. In the mean time, my lieutenant general shall be in my stead, than whom never prince commanded a more noble or worthy subject; not doubting but by your obedience to my general, by your concord in the camp, and your valour in the field, we shall shortly have a famous victory over those enemies of my God, of my kingdom, and of my people.

7月22日清晨，战争爆发。起初，双方各有胜负，但英军由于兵力和战舰装备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局面不利。这时，霍华德想出一个奇特的战术，就是用旧船装满火炮，冲入西班牙舰队内部，四面开花。英军战舰利用这一策略彻底打乱了西班牙舰队那几乎无懈可击的队形。西班牙舰队陷入混乱，相互冲撞；英国舰队则配合默契，各式火炮此起彼伏，打得有章有法。海战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由于风向突然转变，霍华德当机立断，命令舰队摆脱战斗。“无敌舰队”趁此机会，退出英吉利海峡，顺着风势向北逃窜，准备绕过苏格兰、爱尔兰回国。然而，受损的舰队在抵达苏格兰西北岸的拉斯角时，突然遇到猛烈的大西洋风暴，狂风掀起了十几米高的巨浪。战舰全部漏水、损坏，船员在饥饿、生病中孤立无援地在海上随风漂泊。风暴狂吹了一个月。许多战舰撞上了岩石，另一些战舰进水下沉，消失在浪涛之中。还有一些战舰在爱尔兰海岸外失踪，数千人淹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死。许多幸存者好不容易登上爱尔兰海岸，最后也饿死或者被杀死。

到1588年10月，“无敌舰队”近乎全军覆没，仅剩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而英军并没有大的损失，阵亡的海员水手只有百人左右。强大的“无敌舰队”就此覆灭，从此英国取代了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伊丽莎白女王将11月29日定为英国感恩日。

这一场战役，保住了英国改教的成果，给予天主教势力以沉重一击。若英军失败，那么新教和天主教已经趋于平衡的世界格局将会被打破，整个欧洲都会有再回到黑暗的中世纪的危险。这场战役也鼓舞了其他国家与民族，他们开始纷纷脱离西班牙的天主教统治，宗教改革继续扩展。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去世，遗体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右面。她的继承人是詹姆斯一世，从此都铎王朝为斯图亚特王朝所取代。

第五节 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今天，在苏格兰爱丁堡广场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人们以此来纪念苏格兰改教家约翰·诺克斯。纪念碑上写道：“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敬畏上帝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于不害怕任何人。”



图 4.31 苏格兰爱丁堡广场约翰·诺克斯雕像

1、苏格兰改教前的背景

16世纪的苏格兰王国非常脆弱，土地贫瘠，商业落后。

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出生的那个时代，苏格兰的信徒活在罗马天主教的辖管下，天主教的神父们——甚至众多的主教们——毫无羞耻地承认他们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主教们主持弥撒时，除了照着那些僵死的仪文喃喃作语，别无其他。当时人们所谓的基督信仰，不过是这毫无生命的弥撒，外加向神父的告解和忏悔。从信徒到主教，没有一个人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赎大工的教义。

当时苏格兰的天主教神父既无知又懒惰贪婪。有时为了增加收入，一人兼管几个教区，其目的只为牟利。所以大家争先购买圣职，比抢土地还积极。

这些所谓独身的神父们竟是生活放荡的代表，每个人都有许多私生子。他们利用手中职权，将这些私生子安排到政府和修道院担任公职。恶人升高，不法的事就愈加猖獗。下层百姓只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各类迷信和巫术，于是文化就愈加落后。教会黑暗，社会就混乱，罪恶横行。当时的苏格兰被公认为“中世纪的半野蛮人”。

2、传讲上帝真道的两位传道人

这时神兴起了两位传道人传讲祂的真理：一是帕特瑞克·汉密尔顿，一是乔治·魏沙特，他们二人先后殉道。

1504年，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富裕家庭。汉密尔顿早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德烈大学读书时，已经被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的信息所吸引。1517年，他到法国的巴黎大学深造，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法国，他深深地受到新教徒的影响。1523年汉密尔顿返回家乡苏格兰之后，开始抨击天主教的贪污和腐败。苏格兰的天主教当局大为震怒，决定把汉密尔顿交给宗教裁判所处置。汉密尔顿及时逃亡，前往德国，其间曾在马丁·路德门下受教。1527年，汉密尔顿再度回到苏格兰，亲自向亲戚朋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他前往圣米迦勒，更进一步地向天主教的神父们和王室成员传福音。“任何人的罪要得赦免，唯有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绝不是奉行天主教的仪式。”他又说：“神赐给人的是白白的恩典，人们不需要仰赖教皇的施恩，神职人员并不赋有赦罪的特权。”

1528年2月，圣安德烈的大主教毕顿诱捕了汉密尔顿，诬告他是异端者，把他绑在木架上活活烧死。汉密尔顿在临终时祷告说：“主啊，黑暗还要继续笼罩此地多久呢？这人对人的专制还要持续多久呢？主耶稣啊，请你接收我的灵魂。”帕特瑞克·汉密尔顿被烧死的时候，年仅24岁。

约翰·诺克斯本人并不认识汉密尔顿，但是当汉密尔顿被苏格兰天主教处死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他说：“如此迫害一个无辜之人，将会促使无数的苏格兰人开始质疑天主教的信仰和行径。”整个苏格兰因着汉密尔顿的殉难而震动。神所点燃的福音之火怎会被黑暗扑灭？

乔治·魏沙特（Sir James Wishart）出身于苏格兰的望族世家，是雅各·魏沙特爵士的儿子。自1538年起，魏沙特在欧洲大陆和剑桥逗留6年之久，其间接受了新教。由于富有学识和才赋，且精通希腊文，他很快成为一个大有能力和口才的传道人。在他返回苏格兰后，各地都有大批的人涌来听他讲道。故此，天主教当局视魏沙特为眼中钉，打算暗杀他。

大约有五十名学生自愿充当魏沙特的保镖，其中就有约翰·诺克斯。诺克斯是在1545年与魏沙特相识的。诺克斯不时佩戴一把锋利的剑，走在魏沙特前头，为魏沙特开路，并防备天主教差派的刺客的偷袭。1546年，魏沙特在被捕的前夕对他的追随者（包括约翰·诺克斯）这样说：“回去吧！一个人牺牲就够了！”诺克斯勉强地离开魏沙特。最后毕顿将魏沙特判为异端者，并处以火刑。当执行死刑的人奉命要吊起魏沙特时，行刑者跪在魏沙特面前，恳求魏沙特宽恕赦免。魏沙特吻着行刑者的脸颊对他说，“这是宽恕你的凭据。我饶恕你，尽你的职务吧！”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3、约翰·诺克斯的生平及蒙召

1513年底，约翰·诺克斯（1513年—1572年11月24日）生于哈丁顿小镇。1529年，他考进圣安德烈大学，1536年4月，被按立为天主教神父。由于当时苏格兰已有过多神父，因此诺克斯未能在天主教的教堂谋得一职位。但由于诺克斯读过法律，便在哈丁顿附近担任公证人。过了不久，他又在当地担任家庭教师，其中有一个家族——道格拉斯（Hugh Douglas）信奉新教。在这期间，威廉·丁道尔翻译的圣经以及马丁·路德的许多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入苏格兰。曙光开始照进这片在黑暗中呻吟的土地，在苏格兰信奉新教的人数急速上升。

1543年，苏格兰摄政王亚兰伯爵（Earl of Arran）采取亲英的新教路线，鼓励平信徒阅读圣经，并支持新教传道人的布道工作。摄政王委任多马·古廉（Thomas Guiliamc）和约翰·渥欧（John Rough）两位新教人士为牧师。他们二人走遍苏格兰的中部地区，按正意解释圣经，抨击天主教的谬误。他们的布道很有说服力，产生了可观的果效。诺克斯受其讲道的影响，改信了新教，成为魏沙特的学生，并曾持剑护卫魏沙特。

当时苏格兰的红衣主教毕顿非但残暴成性，而且荒淫无度，除了养有妾侍之外，还至少生有7个私生子。1546年3月1日，毕顿下令将魏沙特执行火刑之后，苏格兰的16名新教贵族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刺杀了毕顿。16名刺客潜入了圣安德烈城堡（St. Andrews Castle），亲手将毕顿处死，同时占据了城堡。

虽然约翰·诺克斯是魏沙特的贴身保镖，但他并没有介入这场刺杀行动，却也成为天主教当局缉捕的对象，以至于他到处藏匿。1547年4月10日，诺克斯带着3名学生来到圣安德烈城堡，请求庇护。

在圣安德烈城堡，牧师约翰·渥欧和刺客的领袖巴尔纳夫斯（Henry Balnaves）——当年苏格兰最有魄力的政治家之一，诚志邀请约翰·诺克斯担任圣安德烈城堡的牧师。然而诺克斯断然拒绝，认为他们没有权柄呼召他出来事奉神。

有一个主日，约翰·渥欧在讲到委身事奉神这件事时，当众呼吁约翰·诺克斯要委身传道，并更进一步要求全体会众印证这项呼召。这个呼吁当场得到了全体公众的认同。诺克斯目睹这情景，却仍婉拒这种公众印证的呼召。



图 4.32 约翰·诺克斯

不过，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诺克斯到教堂做礼拜时，听见一名天主教副主教约翰·安南（Dean John Annand）正在为天主教辩护，说：“天主教会是基督的新妇。”诺克斯听了约翰·安南的谎言，忍不住从坐椅站起来，说：“天主教已经从使徒时代的纯正教会堕落下来，再不是基督的新妇，而是不折不扣的淫妇。”教堂内的公众于是一致要求诺克斯在下一个主日阐明他的论点，诺克斯应允在下主日讲道。这就是他首次的公开讲道，同时也是新教历史上最有能力的讲道之一。

约翰·诺克斯那次证道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诺克斯强调说，罗马天主教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来，即是新约圣经所指的敌基督，紧接着他论述天主教的教义与新约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有矛盾。诺克斯的讲道完全根据圣经，并取得了会众良好的反响，会众一致印证他是神所呼召的仆人。

于是，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先前的几位殉道者虽然也宣讲过福音，但他们只是抨击天主教的腐败，而诺克斯则是从圣经教义上彻底地证明天主教是大淫妇和敌基督，使人不再留恋所谓“内部的改革”，而是要彻底离开并摧毁之。

4、流亡生涯

苏格兰天主教当局为了镇压日益发展的新教势力，决定向法王亨利二世（Henry II）求助。亨利二世为了讨好罗马教皇，便差遣 20 艘军舰，围攻圣安得烈城堡。1547 年 7 月 31 日，孤立无援的圣安得烈城堡只好向法国军舰投降。城堡内大多数居民作为俘虏被送到法国的鲁昂（Rouen），重犯则被囚禁在鲁昂邻近的城堡，另有 120 人被送到法国军舰上当苦役，其中就有约翰·诺克斯。

诺克斯被送到“圣母号”的军舰上，作为普通奴隶在军舰上服苦役。有一次，在船上的人唱过《向圣母致敬》一曲后，有人把一张“圣母马利亚”的画像送到他面前，要他亲吻。然而，他不向官长的淫威屈服，把“圣母”的画像扔入河中，说：“让‘圣母’救她自己吧！她是这么轻，让她学游泳吧！”经过这件事，官长不敢再强迫这个苏格兰新教徒跪拜偶像了。

这时，苏格兰的新教徒向英格兰寻求帮助，希望能从法国军队和天主教中得解放，并许诺胜利后效忠英王。于是，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1548 年，整个苏格兰陷入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场；人们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英国和法国各自为自身的政权不稳定和经济困难所扰，因而决定通过谈判解决苏格兰的混战。和平谈判的内容也涉及俘虏的释放问题。1549 年 3 月，经美森大使与法王再三交涉之后，约翰·诺克斯重获自由，至此他在军舰上被折磨了 19 个月之久。

1549 年初，诺克斯从法国回到英格兰。这时期英王爱德华六世虽已登基，但因未成年，所以大权掌握在他舅舅萨默塞特公爵手中。萨默塞特公爵倾向新教，故此在苏格兰对天主教徒采取偏激的手段，他认为凭借武力就可以平定苏格兰的动乱。然而，英国这种高压政策引起苏格兰人的反感，结果法军不断告捷，英军节节败退，苏格兰的新教徒被迫四处逃亡，有的逃到欧洲大陆，有的随着英军南下英格兰。

1549 年 4 月，英国的国会正式委任约翰·诺克斯为距离苏格兰较近的伯威克（Berwick）教区的牧师。在伯威克教区，约翰·诺克斯有充裕的时间读圣经，并同时读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加尔文的圣经注释。在神学观点上，诺克斯已经深受加尔文的影响，建立了坚定的改革宗教信仰。

1551年，约翰·诺克斯从小市镇伯威克被调往更大的城镇纽卡斯尔（Newcastle）担任牧职。在那里他发挥了更大的功用，产生了更大的属灵果效。1551年12月，小有名气的诺克斯被英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委任为御前牧师（Chaplain in Ordinary）。当年，在英国只有6名御前牧师，2名常在左右，4名外出讲道。这一年，公祷书正在通过评审阶段。诺克斯促成了圣餐仪式的一项重要改变，即完全排斥基督的肉身圣餐中真实存在的观点。在宗教条款递交议会批准之前，诺克斯受命对其内容进行修订。新公祷文于1552年修订完成。然而其中仍有一项保留，即信徒在领圣餐时要下跪。诺克斯认为下跪是偶像崇拜，是可咒可诅的。他所牧养的教会坚持信徒坐领圣餐，成为清教徒运动的开始。

1553年2月，爱德华六世与克蓝麦大主教委任诺克斯为伦敦圣人教堂的牧师，但他婉言谢绝了这一任命，因为他不想被纳入圣公会的教会体制。后来他又被任命为罗彻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但他仍是婉言拒绝这项令其他人梦寐以求的职位。他冒着激怒权贵的危险，任凭人误会他傲慢，丝毫不肯妥协、让步。其实，他是为了不向那些违背真理的地方妥协。

同年7月6日，爱德华六世驾崩。7月10日，简·格雷被加冕为女王，但仅9日便被玛丽·都铎推翻。7月19日，玛丽女王继位，开始疯狂逼迫屠杀新教徒。

1554年1月，诺克斯告别他的妻子，经法国逃亡瑞士。3月，他首次抵达瑞士的日内瓦，看到了“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最完美的教会”。加尔文很友善地接待了诺克斯，并把他介绍给在瑞士的几名被神重用的仆人，包括苏黎世的布林格和洛桑的比勒·威勒特。诺克斯虚心地在加尔文门下受教，这使得他在灵性上和圣经知识上大有长进。这一年，诺克斯已经41岁，但加尔文仍然督促他读希伯来文，不让时光虚度。

约翰·诺克斯到日内瓦后不久，经加尔文的推荐，就接到德国法兰克福教会任牧师的聘请。这是一个由来自英国的、受到玛丽迫害的新教徒所组成的教会。诺克斯于是接受这项聘请，于1554年11月抵达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有一位弟兄名叫威丁咸（William Whittingham），他曾于1552年在日内瓦受教于加尔文。他认为圣公会的改教工作不够彻底，虚有其表和耽于迷信，包括用公祷文、大声响应牧师、领受圣餐时必须下跪、牧师身披长袍等。诺克斯认同威丁咸的看法。在加尔文的影响下，诺克斯看到公祷文中明显充塞着迷信和不纯洁的天主教糟粕。于是约翰·诺克斯和威丁咸在1555年2月一同草拟了一份教会崇拜的仪文。

同年3月，前牛津大学校长考克斯（Dr. Richard Cox）博士到达法兰克福。他曾作过爱德华六世的教师，也属于英国的改教领袖，但他仍然主张必须沿用圣公会的公祷文敬拜。于是考克斯和诺克斯之间产生了激烈争执，双方互不相让。然而，考克斯采用一种卑鄙的手法，向德国当局诬告诺克斯，说他是因犯了叛国罪而逃到德国的。这种严重的陷害，使诺克斯无法在德国继续容身，被迫于1555年3月26日离开法兰克福，回到日内瓦。

这次因反对圣公会的思想而在法兰克福遭到的迫害，使诺克斯意识到必须成立独立的苏格兰教会，并彻底脱离英国国教的桎梏，只有这样才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唯一出路。对此，钟马田博士认为，约翰·诺克斯因最先具有这种独立、不从国教的思想，因而应该

被认为是清教派的创始人。在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之后，他所草拟的崇拜仪文被苏格兰教会普遍采用，直到今天。

5、返回苏格兰与皇太后的斗争

自从在外援之下征服了圣安得烈城堡之后，苏格兰天主教认为新教在苏格兰再也无法东山再起。然而，福音之火在苏格兰其实根本没有熄灭，仍然隐藏着许多新教徒。此时苏格兰天主教的僧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就麻痹大意起来，对新教在苏格兰的地下活动不加防范。

1555年8月，诺克斯潜回到伯威克，与阔别了两年的妻子玛卓丽·保维斯团聚。诺克斯在伯威克的娘家逗留了一段日子，便前往爱丁堡，与当地的新教徒秘密会晤，包括另一名新教领袖约翰·威乐（John Willock）。从此约翰·威乐成为约翰·诺克斯最主要的同工。

诺克斯秘密潜回苏格兰之后，发现那些信奉宗教改革的信徒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不惜屈服于天主教的偶像膜拜，并去参加天主教堂的弥撒。他刻不容缓地指出：天主教的弥撒充斥着不敬虔的和亵渎的东西，若参加这类弥撒，不啻认同它。苏格兰的新教为此论点隆重地召开了会议。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正式与苏格兰的天主教划清界限。这一决定使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踏出了第一步。

诺克斯继续进行他在苏格兰的秘密活动，马不停蹄地穿梭在苏格兰的南北之间，当苏格兰天主教当局察觉他已潜回苏格兰的时候，诺克斯已经在苏格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教运动。

1556年5月15日，约翰·诺克斯被苏格兰天主教当局传唤。他英勇地按时赴会应讯，使天主教的主教、僧侣们措手不及。天主教当局唯恐公开聆讯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决定取消这场公开审讯。如此一来，诺克斯更放胆地在爱丁堡讲道，来听道的人迅速增加。他连续10天，每天讲两堂道，天主教当局却不敢采取任何行动。诺克斯的勇敢行为使苏格兰新教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同年7月，日内瓦的英语教会不断写信给约翰·诺克斯，要聘请他担任他们的会牧。他与妻子玛卓丽·保维斯和新寡的岳母伊丽莎白·保维斯一起回到瑞士的日内瓦。

1557年3月16日，他从日内瓦写信给爱丁堡的兄弟姐妹说：“撒但尽管猖狂，但你们要靠着神站住，因着祂的名和祂的荣耀，祂一定会保守你们，你们要持守所相信的真理。”同年，苏格兰的新教拟定了一份信约，即《苏格兰第一信约》（First Scottish Covenant），苏格兰各地的改革宗教会被纷纷建立起来。

诺克斯在日内瓦英语教会担任牧师长达三年之久，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他还和威丁咸（William Whittingham）等学者共同把圣经翻译成英文，这本圣经被称为《日内瓦圣经》。1555年以来，加尔文在日内瓦彻底地摧毁了自由派的反抗。此时加尔文终于可以依照新约教会的模式建立日内瓦的教会了。诺克斯赞叹“这是使徒时代以来在地上最完美的基督教会”。

这一时期，约翰·诺克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吹出第一声号角反对女权的荒唐统治》的檄文。他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的血腥玛丽和苏格兰的摄政太后玛丽。在这个问题上，诺克斯的观点比加尔文和布林格还要激进。诺克斯说：“擢升一个女性至优越的、统领的、掌权的地位，让她凌驾在城邦、帝国之上，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令人嫌恶的。换一句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话说，女性不应该统领任何国家。这种事既触犯了神的旨意，又破坏了公正的法则。”诺克斯进一步向苏格兰的贵族和平民呼吁，要求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他说：众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那些支持天主教的女权统治。诺克斯发表这篇文章的几星期后，英国的血腥玛丽去世，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伊丽莎白觉得约翰·诺克斯所发表的文章也威胁了她的统治，从此对诺克斯心存芥蒂。

1542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James V）去世，由于他的两个儿子早逝，因此他的幼女玛丽·斯图亚特出生仅6天便即位为女王，由太后——法国的瓦卢瓦王朝法兰西斯一世的女儿——玛丽·德·吉斯（Mary of Guise）摄政。太后倚重法国，在1548年把她年仅6岁的独生女玛丽·斯图亚特公主送入法国王宫。1558年，玛丽·斯图亚特嫁给法国王储。婚后一年，法国王储即位，为法兰西斯二世（Francis II）。由于他年仅17岁，又孱弱多病，因而大权掌握在大名鼎鼎的母后凯瑟琳手中。

1558年12月，苏格兰的新教贵族们正式发信，催促约翰·诺克斯返回苏格兰。1559年5月2日，由于深知回国后所面临的争战和危险，诺克斯毅然离开妻子玛卓丽和两个儿子以利亚撒（Eleazar）、拿但业（Nathaniel），独自一人回到故土苏格兰。

早在这一年春天，玛丽太后看到她的女婿已经贵为法国国王，就不再敷衍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了，露出她罗马天主教徒的真面目。她发出指令，要求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于5月10日在斯得林（Stirling）接受审讯。然而，她没有意料到的是，改革宗教会领袖约翰·诺克斯已经从日内瓦回到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诺克斯抵达爱丁堡之后没有过多停留，就赶往斯得林，以便为改革宗教会答辩。苏格兰当局发现了诺克斯的行踪，宣告他是通缉犯，但是诺克斯毫无惧色，并且有多达六千人的改革宗大军一同前往斯得林，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却士气昂然，视死如归。玛丽太后得知此消息，顿时花容失色，通知改革宗领袖在伯斯（Perth）停步，不要再来斯得林了，并且告诉他们审讯已被中止。然而，这是太后的诡计。5月10日审讯如期进行，在改革宗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玛丽太后单方面宣布改革宗为不法分子。消息传开后，改革宗人士发现被骗，大为震怒。5月11日，约翰·诺克斯在伯斯的圣约翰教堂讲道，猛烈抨击天主教的弥撒和偶像崇拜。聚会结束后，一名儿童首先用石子打碎马利亚雕像的脑袋。会众如梦初醒，群起捣毁天主教堂的一切偶像、饰物等，同时还拆毁两座修道院。于是，太后以此为借口，派军队到伯斯平息所谓的叛乱。但是伯斯的市民武装起来，坚守城堡，结果军队不敢冒然进攻。6月，诺克斯在圣安得烈城堡讲道。讲道前，大主教组织了一支武装，决定等诺克斯一上台就开枪暗杀他。消息走漏，同工们力劝诺克斯取消这次讲道，但诺克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面对敌人的枪口放胆讲论。在上帝话语的大能前，刺客们竟然始终没敢开枪。经过三天的讲道，当地的信徒都涌入天主教教堂，摧毁教堂里的偶像，并拆毁修道院。其它地方也都争相效法。这时，太后想为天主教作最后一搏，于是发动了苏格兰的内战。

此前，诺克斯达信日内瓦，请求安排他的妻子到苏格兰与他团聚。6月13日，玛卓丽和母亲伊丽莎白·保维斯向英国驻法国大使托洛摩顿（Sir Nicolas Throckmorton）求助，请求英国政府让她们借道英格兰，进入苏格兰。托洛摩顿借此机会向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进言，劝说她淡化《号角》的风波，与约翰·诺克斯修好，同时也可把英格兰的影响力伸展到苏格兰，协助苏格兰摆脱法国的辖制。于是伊丽莎白一世作出决定，和诺克斯捐弃前嫌，并支持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诺克斯深信，为了更神圣和更崇高的目的，他全心全意赞同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这有助于援救在法兰西铁蹄下被蹂躏的苏格兰人民。但论到政治谈判，这不是诺克斯所擅长的，因此他有时也身心疲倦。

1560年2月，苏格兰改革宗教会的议会正式和英国签订了伯威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英国答允对改革宗教会提供军事援助，以对抗玛丽太后。这场内战有了外军的介入：在苏格兰皇家部队里的，有大批的法国军队；在苏格兰新教部队里的，有相当数目的英格兰军队。4月2日，英军进军苏格兰，遏止了法国在苏格兰势力的膨胀，压制了罗马天主教僧侣的嚣张气焰，使作为改革教会基地的伯斯城堡得以保存。6月10日，玛丽太后去世。在她去世之后，英法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双方军队自7月6日开始撤离苏格兰。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新教在苏格兰取得了领导地位。按着传统的承袭制度，继承苏格兰王位的是远在法国的玛丽·斯图亚特。她也是登基仅一年的法王法兰西斯二世的皇后。然而，在她母亲去世后的同年11月，她的丈夫法兰西斯二世也随即驾崩。原本可以同时贵为法兰西皇后和苏格兰女王的玛丽·斯图亚特，唯有返回故国苏格兰，继承王位。

在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之前，8月1日，苏格兰议会正式立法，成立苏格兰的改革宗教会总会，确立长老会制度。议会指派约翰·诺克斯和另5名同工，制定《新教信仰告白》（The Protestant Confession of Faith）。12月20日，苏格兰长老会的第一次大会在爱丁堡正式举行。大会会有40名委员，其中有6名牧师，包括爱丁堡城的主任牧师约翰·诺克斯。在大会上，诺克斯呈交了《第一纪律手册》（The First Book of Discipline）。

这一年年终，诺克斯心爱的妻子玛卓丽去世。当年，玛卓丽的父亲和许多亲戚曾齐声反对她嫁给一个一贫如洗、无家可归的穷传道人，但她义无反顾，并且忠心地跟随诺克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玛卓丽跟随他到处奔波，与他同甘共苦，并为他处理了大量信件。她既是贤妻良母，又是好的助手和同工。就在诺克斯最悲痛的时候，加尔文从日内瓦来信安慰他。加尔文称“玛卓丽是举世无双的才德妇人，是人间最甜美的妻子”。

6、与玛丽女王论战

玛丽·斯图亚特——这位法王法兰西斯二世的遗孀，是一名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当她返回儿时离别的故土时，这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的苏格兰已经转变为一个新教国家。

玛丽女王抵达苏格兰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到天主教的荷里屋教堂（Holyrood Chapel）做弥撒。在诺克斯看来，这一行径比一万名敌军登陆苏格兰更加令他愤怒。



图 4.33 玛丽·斯图亚特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1561年9月14日，玛丽女王召见了约翰·诺克斯，在这次谈话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女王指责诺克斯教导未经君主许可的信仰，不尊重她的权柄。诺克斯回应道：“一切权柄均来自于上帝，国王应该维护上帝的教会。”双方争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天主教会的地位上。女王坚持只有罗马教会是上帝真正的教会；诺克斯坚称天主教就是大淫妇，根本不是基督的教会。后来谈到圣经的时候，女王含糊其辞地推脱道：“你用一种方式解释圣经，而他们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圣经。我应当相信哪一方呢？谁又能充当裁判断定是非呢？”诺克斯回答道：“除了上帝的圣言对您的指教以外，您不应当相信任何一方。上帝的道本身是明显易懂的。如果某一处经文的意义模糊不清，圣灵会在另外的地方作出解释，因为祂从不会自相矛盾。”诺克斯就双方争论的条款中选择一个主题，即主的晚餐，指出教皇派制定的弥撒毫无圣经根据。玛丽女王决意避免这种争论，借口自己能力不足，昔日的老师们若在场，就可以回应诺克斯的挑战。诺克斯激昂地表示：“巴不得欧洲最有学问的天主教学者能和我辩论一番，到时候女王就能了解罗马天主教的空洞虚假和毫无圣经根据。”晚餐后不久，单独谈话结束。诺克斯通过观察发现女王骄傲、狡猾，并且对天主教死心塌地，所以他并不抱有希望，同时，他也敏感地觉察到新的斗争又将开始。

1562年3月1日，法国天主教徒制造瓦西惨案，大肆屠杀新教徒（后面的第六章提到）。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闻讯，悲愤不已。而玛丽女王身为天主教徒，不理睬新教徒的感受，竟在5月间在王宫举行盛大舞会，狂欢庆祝。诺克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在星期日讲道时，抨击王室人员的轻浮和不务正业。玛丽女王听了，再次召见诺克斯，责备他犯上、辱骂国君。诺克斯说，他讲道没有指名道姓，女王最好自己来听他讲道，而不是全凭小人打小报告，道听途说。女王抓不到他的把柄，对他毫无办法。



图 4.34 诺克斯和玛丽女王的辩论

1563年4月，在玛丽女王默许下，天主教的汉密尔顿大主教恢复举行弥撒。国会逮捕了汉密尔顿等天主教徒，因为他们触犯了1560年议会制定的法令——该法令宣布举行弥撒是犯法行为。玛丽女王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就传召约翰·诺克斯，说新教徒不该小题大作。诺克斯回答说：“国家领袖也应遵守法律。”

同年6月，诺克斯听到一个消息：玛丽女王准备再婚，对象是西班牙的王储卡洛斯（Don Carlos）。有一天，诺克斯在讲台上说出这个婚配的危险：“女王一旦嫁给一个天主教徒，就意味着苏格兰改教事业的失败。”玛丽女王认为约翰·诺克斯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讨论她的私生活，于是第四次召见他。女王诘问他，说：“我的婚事与你何干？在这国家里你当自己是谁？”随后她又哭了起来。诺克斯见此情景，虽然也心动了一下，觉得这样是不是对君主有些过分，但他随即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不该为她的眼泪所动。诺克斯说：“我只能说出主耶稣要我说的。”女王谴责他残忍、无怜悯心、无同情心。但是历史证明，如果诺克斯稍微让步，那么苏格兰将会立即变成血腥玛丽治下的英格兰一样，在西班牙和法国双重势力的压迫下，重新回到天主教。这实在是撒但的一条毒计。但上帝赐给祂仆人智慧，使他没有在这守望台上松弛。

于是，玛丽女王决定报复，等候时机逮捕诺克斯，让他永远消失，这样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8月，女王外访时，她的仆从在荷里屋教堂内参加弥撒，一些长老会信徒进入会场抗议。女王回宫廷后，勃然大怒，逮捕两个为首的长老会信徒。诺克斯知道这件事，就发出信件给各地的长老会信徒，要众人在两名长老会信徒被审讯时赶到爱丁堡，来声援他们。结果，诺克斯的通知信落入玛丽女王手中。玛丽女王定他叛国的罪名，传召他在当年12月到枢密院接受审讯。约翰·诺克斯的同工们认为这次他一定大劫难逃，劝说他向玛丽女王屈服。但是诺克斯不是软骨头。他说：“我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那些不信神的人尽管捏造我叛国的罪名，但我既不哀哭，也不惧怕，应该惧怕的是那些诬造我、陷害我的人。”在开庭审讯时，诺克斯勇敢辩护，枢密院找不出诺克斯叛国的根据，宣布他清白无罪。玛丽的诡计又一次失败。

林前 16:13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

钟马田说：“苏格兰玛丽女王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他话语的能力，往往因而流泪暗泣。这不是因为她信服这些话，而是出于对诺克斯的痛恨和愤怒。她对这个人充满了畏惧，惧怕他的祷告和讲道所发出来的能力甚于许多军团所带来的威胁。”

1564年3月，诺克斯再婚，娶了奥奇尔特里勋爵的女儿玛嘉烈·斯图亚特（Margaret Stewart）为继室。奥奇尔特里勋爵在信仰上热心支持诺克斯。诺克斯再婚时已经51岁，而新娘才17岁，这桩婚事在当年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女王也怒不堪言，因她实在不想要约翰·诺克斯这个死对头成为她的亲戚。玛嘉烈后来给诺克斯生了三个女儿。

诺克斯继续在讲台上影射女王错误的宗教信仰。为了尊重王室，有些担任议员的长老会信徒开始埋怨约翰·诺克斯对女王的态度过于偏激；而美貌如花的女王又用谄媚和阿谀的手段软化这些上层阶级的长老会信徒的敌对心理，胜利在即。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玛丽女王犯了致命的错误。

1565年7月29日，玛丽女王突然自作主张，下嫁给达恩利勋爵（又译丹尼勋爵）。当时玛丽女王23岁，达恩利勋爵才19岁。达恩利长得高大、英俊。8月19日，达恩利到爱丁堡的圣佳尔教堂听约翰·诺克斯讲道。诺克斯讲道时，指责以色列王亚哈纵容妻子耶洗别去事奉偶像巴力。达恩利勋爵已被册封为亨利王，因此认为约翰·诺克斯所讲的道实际上是影射他和妻子玛丽女王，于是勃然大怒。当天下午，诺克斯被捕，达恩利命令诺克斯不得继续在教堂里讲道。诺克斯预言，有一天，公义的神要借着玛丽女王把他抛弃。这个预言很快被应验了。

婚后不久，玛丽女王发现亨利王达恩利虚有其表，智商不高；这使得玛丽女王对达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恩利感到厌烦和嫌恶。就在这时，有一个意大利人里奇奥（David Riccio，又译利西奥）来到苏格兰，此人既风趣又机灵，遂即博得玛丽女王的芳心。不过，不少长老会的人怀疑里奇奥是罗马教廷派来的间谍，在苏格兰负有特殊任务，对里奇奥并不信任。

1566年3月9日，妒火如焚的达恩利暗中串通那些视里奇奥如眼中钉的苏格兰贵族，雇人将里奇奥刺死。达恩利因此更加遭到玛丽女王的反感，两人的关系完全破裂。如今，玛丽女王的新欢是博斯维尔（James Hepburn Bothwell，又译保兹维）伯爵。当玛丽女王为她和达恩利所生的儿子——未来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在教堂举行洗礼的时候，博斯维尔担当了主要的角色。

1567年2月9日，幽禁达恩利的房子被火药炸毁，而达恩利当场被人活活勒死。最大的谋杀犯嫌疑人是博斯维尔伯爵。3个月后，罗马教廷无耻地强行办理博斯维尔伯爵的离婚手续。5月15日，玛丽女王正式与博斯维尔结婚，并册封他为奥格尼伯爵（Duke of Orkney）。玛丽女王倚仗自己是一国之君而胡作非为，激起了全苏格兰人民的愤怒。为了镇压全国性的动乱，她召集军队来支持她，然而军队厌恶向女王效忠。博斯维尔见大势已去，仓卒逃亡。遭举国上下咒骂的玛丽女王被迫签字逊位，让位给她的儿子詹姆斯六世。但因后者是婴孩，所以由莫里伯爵（Earl of Moray, James Stewart）摄政，代理国务。

1567年7月29日，幼王加冕，约翰·诺克斯应邀在盛典中讲道。此时，玛丽已沦为阶下囚，被监禁在洛利文城堡（Locheve）。1569年5月2日，她成功地逃出洛利文城堡，集结余党，企图复辟，结果功亏一篑，惟有逃亡到英格兰。在英格兰，她又企图颠覆伊丽莎白的统治，结果被伊丽莎白处死，引发了前文所提到的英西大战。

莫里伯爵摄政时，新教在苏格兰站稳了脚根。1567年12月15日，苏格兰议会正式开幕，改革宗长老会在苏格兰得到更大的复兴。

7、苏格兰长老会

上帝使用诺克斯等人在苏格兰建立了长老会制度的模型，使苏格兰成为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个主要发源地。

第一次苏格兰大会于1560年12月召开。翌年1月，他们向国会提交了《第一纪律手册》。这本法规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实行的长老会制度应用到苏格兰全国。法规采用四级长老会体制：在每个堂会中，由一位牧师及数位从会友中选出的长老组成堂议会（session）；小地区的教会会议称为区会（presbyteries），由各堂会牧师代表及长老组成；大区域的会议称为大会（synod），由各地区牧师代表及长老组成；全国性的教会会议称为总会（general assemblies），由来自全国各教会的牧师代表与长老组成。每一级议会的权限和治理内容都有详细规定。从此，一个较为完善的改革宗长老会体制被建立起来，后来传至美国及世界各地，也就是今天大部分长老会的模型。

在崇拜方面，诺克斯撰写了一本《公用仪式书》。这本仪式书以日内瓦英国难民教会的崇拜仪式以及加尔文所编的仪式为蓝本，崇拜的内容包括祷告、读经、讲道、唱诗篇与奉献。书中也包括了各种处境下的祷告文，但仅为祷告的示范，并不强迫使用；信徒祷告时可自行随圣灵的带领。苏格兰教会成为后代几个改革宗教会分支之一。

和加尔文一样，诺克斯也积极发展苏格兰的教育，建立了许多新教大学，包括最著名的爱丁堡大学。这些大学为教会培养了许多传承改革宗信仰的优秀人才，如巴克斯特、

波纳尔等。神使用诺克斯将苏格兰转变为欧洲的第二个日内瓦，影响了后代教会历史。



图 4.35 爱丁堡大学

8、约翰·诺克斯离世

1572年11月9日，诺克斯在图布斯教堂（Tolbooth Church）作了最后一篇讲道。讲完道，他前往圣佐尔教堂，把牧师职位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劳森（James Lawson）。在临终前几天，弟兄姐妹每天为他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弗所书、诗篇和几篇加尔文的讲章。11月24日，诺克斯病情恶化，即将离世。他请求妻子玛嘉烈为他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玛嘉烈读完之后，诺克斯似乎陷入了昏睡，期间发出沉重的呻吟声。当他醒来时，人们问他为什么发出如此沉重的叹息，诺克斯回答说：“魔鬼不厌其烦的想说服我相信：我的功劳使我配得永生。但神使我想起了以下的经文：‘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彷彿不是领受的呢？’（林前 4:7）使我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当晚十一时，诺克斯安息主怀。

9、神圣盟约

诺克斯离世后，安德烈·麦勒维勒继承了他的职位。安德烈·麦勒维勒精通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与法文，也曾在日内瓦直接受过加尔文的教导。1574年，麦勒维勒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6年后任圣安德烈大学校长。在他的尽心服侍下，苏格兰长老会有了很大发展。麦勒维勒还修订并完成了《第二纪律手册》（The Second Book of Discipline），把苏格兰长老会推向更健全的长老教会体制。任长老会领导者期间，他与年轻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同是英格兰国王的詹姆斯一世）作了长期的斗争。

詹姆斯一世死于1625年，其子查理一世继承王位，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君主。他比其父更顽固，强制英格兰的清教徒与苏格兰的长老会采用英国国教会的体制与礼拜仪式，因而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关于和清教徒的斗争在后面有详细论述，这里只介绍苏格兰的情景）。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1637年7月23日，查理一世命令苏格兰全教会采用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当天，爱丁堡主教座堂参事会员到从前诺克斯讲道的圣吉尔斯（St. Giles，又译圣杰爱鲁兹）教会，要依照大主教罗鲁所编的祈祷书做礼拜。结果教堂内大乱，许多人向他投东西。不只圣吉尔斯教会，其他苏格兰教会也都反对使用圣公会的礼仪。

1638年，在亚历山大·亨达逊（Alexander Henderson, 1583—1646）主持下，苏格兰长老会总会决议拒绝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所强制施行的所有法令，号召苏格兰全境签订盟约，起誓维护他们的改革宗长老会信仰，反抗国王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强制推行英格兰圣公会体制的企图。这一盟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神圣盟约”（或“庄严盟约”）。此后，苏格兰长老会被称为“盟约派”。

由于事态演变至此，查理一世为了压制苏格兰长老会，准备出兵到苏格兰。另一方面，苏格兰也急速组成反抗军。国王由于缺乏资金与军队，于是召开议会要求募兵和资金（这就是短期议会），最后引发了“清教徒革命”（后面的第八章）。

第五章 荷兰宗教改革

第一节 尼德兰革命

1、血腥敕令

尼德兰由 17 个隶属西班牙统治的行省组成，范围包括了今日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东北地区。16 世纪初，这里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路德、加尔文的思想很早就进入了尼德兰。为了遏制新教在尼德兰的传播，腓力二世继位后变本加厉地迫害尼德兰的新教徒，企图一举将其铲除。他命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发布诏令，其中包括“禁止传抄、保藏、散发、买卖路德或加尔文等改教领袖的文集。凡散布异端学说者，男的杀头，女的活埋。凡已经接受异端者，必须处死并没收财产。藏匿与帮助异端的人与异端分子同罪”。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这一敕令使数不清的尼德兰改革宗新教徒被残酷杀害。

2、比利时信条

比利时信条的作者是德布利（Guido de Bres）。

1522 年，德布利出生于比利时（当时称为南荷兰）的卑尔根（Bergen），父母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当德布利还小时，路德、加尔文的著作已经传遍了全欧洲。德布利 24 岁时已是一名坚定的新教徒，并参与了在卑尔根的新教改革运动。

德布利目睹了卑尔根的两位牧师因为信奉新教而被当众焚烧。一位牧师的妻子被活埋，另一位牧师的妻子则下落不明。当其中一位牧师被烧时，圣方济各修会（圣法兰西斯修会）的修道士提醒众人，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不应得到同情。”火烧到这位牧师的脚上时，这位牧师却用诗篇第六篇第八节回答这些修士：“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掌权者意识到镇上的新教教会还在增长，因此在卑尔根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迫害。德布利也不畏死亡，他相信这是值得的。1548 年，他离开家乡，前往伦敦，1559 年，返回荷兰，住在多尔尼克城，在那里作了 3 年的牧师。由于迫害的威胁，这个时期的工作都在地下进行。德布利在夜幕的掩护下，挨家挨户探访信徒，讲解圣经，鼓励他的听众，然后又踏上新的征程。会众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1561 年，德布利终于完成了过去几个月一直在预备的信条的前言部分。在军队到达之前，他把一份信条的抄本及前言部分一起扔进了多尔尼克摄政王的墙内，希望能打动一下摄政王的心灵。然而，摄政王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将这份信条抄本转交给国王腓力二世。德布利旨在阐明：“归正信仰的跟随者并不是反叛者，而是守法的良民。他们按照圣经宣告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可是这并没有说服国王，就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前言没能说服法国国王一样，这些著作反倒引起君王更疯狂的仇恨。并非因改教家们写得不够感人，而是神使这些君王的心刚硬了。

出 9:12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德布利被迫再次逃亡，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1566 年，德布利去瓦朗谢讷城赴任。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这时宗教改革的果子继续增长，人们越来越勇敢——城里竟有 4000~12000 人在野外秘密聚会，听德布利讲道。1567 年 3 月，掌权者想要消灭瓦朗谢讷的新教教会，便占领了此城，逮捕了许多新教徒，德布利虽得以逃脱，但却在一个旅店停留时，被人认出，以致被捕，被带回多尔尼克的监狱。两个半月后，就是 1567 年 5 月 31 日，他被送上了绞刑架。

4 月 12 日，在临刑前，德布利在狱中给妻子写了一封感人的诀别信，也为他的信仰作出美好的见证。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爱的凯瑟琳·雷蒙，我最宝贵疼爱的妻子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姊妹，当你嫁给我的时候，你完全知道你嫁了一个必死的人，他的生命朝不保夕。然而我们良善的神却赐给我们在一起的七年时光和五个儿女。如果主的旨意是让我们继续在一起，他有办法这样成就，但这不是他的意愿。愿他的旨意成全，并使你能够承受。

别忘了，我落入仇敌之手绝非偶然，乃是藉着我主的眷顾护理。我的神，你让我生于你所指定的时代和时刻。在我的一生中，你在难以想象的危难之中看顾、保守我，你完全拯救了我。现在，如果这一刻已经来临，我必须撒下这个生命去见你的面，愿你的旨意成全。

.....

尤其不要忘记，神向你彰显的荣耀。祂赐给你一个丈夫。他不但是神儿子的仆人，也是一个得享荣耀和权柄的人——他要得着神所赐的殉道冠冕。我真是充满了喜乐和快乐。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一无所缺。神的丰富完全充满我，使我满溢。我从未想到神竟会如此怜悯像我这样可怜的一个受造物。

再会，凯瑟琳，我亲爱的好朋友。

读了这样的一封信，几乎很难使人无动于衷。在受尽折磨时，德布利仍然充满喜乐和平安。从信中可见他坚信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中，一切都出于神的良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能喜乐、凛然地面对死亡的原因。

诗 57:1-2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早在 1563 年，德布利所写的信条已被华伦教会所采用，被命名为《比利时信条》，又称为《华伦信条》。《比利时信条》后来成为改革宗教会最早的信仰告白之一。为了使改革宗教会与当时的重洗派有所区分，德布利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第十八条）、真教会的公开性（第二十八、二十九条）、婴儿洗礼（第三十四条）以及民事政府为神所赐的权柄（第三十六条），其教义与加尔文整理的正统教义完全相符。《比利时信条》除了对改革宗信仰做系统阐述外，还有两个目的：一是叫世俗掌权者知道，改革宗人士并未与重洗派同流合污，二者完全是两种信仰；二是为初期的改革宗教会立下信仰标准。

3、尼德兰起义

1566 年 4 月，由于大逼迫愈演愈烈，以奥兰治的威廉亲王（沉默者威廉）、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为首的贵族组成“贵族同盟”，向尼德兰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撤出西班牙驻军、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同时

也保证向腓力二世表示效忠。但西班牙政府拒绝让步，在荷兰执行更残酷的消灭异端的行动，于是反抗血腥屠杀的起义爆发了。



图 4.36 奥兰治的威廉亲王

1566年8月11日，大规模的起义首先在佛兰德斯的一些城市爆发。群众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和所谓圣徒遗骨，没收教会财产。起义来势迅猛，几周内就波及布拉奔、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12个省区，参加者达数万人，被毁教堂和修道院达五千五百多座。这是一次真正的“破坏圣像运动”。

对于这势不可挡的局势，女总督只好宣布废除宗教裁判所，对贵族的反叛行为不予追究，允许改革宗教会在指定的地点传道和祈祷。于是，起义停止了。然而政府当局的让步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不久，腓力二世开始反扑。他派阿尔发公爵担任总督，命令他带领一支一万八千人的讨伐队进入尼德兰，采用残暴手段对付群众。他们成立新法庭，命名为“除暴委员会”，又称“血腥委员会”。阿尔发还制定了新的税制，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尼德兰革命。新税制规定：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要征收财产税，所有的商品都要征收交易税。他扬言：“宁可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天主，也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据记载，委员会一到尼德兰便处死约八千人，就连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也未能幸免。

阿尔发的残酷屠杀引起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奥兰治亲王威廉多次组织军队进攻尼德兰；南方的农民和平民进入佛兰德斯森林，组成森林游击队，袭击西班牙军队；北方的渔民、水手组成被称作“海上乞丐”的游击队，在沿海一带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据点，使西班牙的军队屡屡遭重创。1572年4月1日，海上游击队攻占了西兰省的布里尔城，接着符利辛根取得独立，荷兰和西兰省各城市大都爆发了起义。到1573年底，继荷兰、西兰之后，弗里斯兰、乌特勒支、上伊塞尔、该尔德兰等省宣布独立，北方基本上已脱离西班牙。在北方各省的联席会议上，奥兰治亲王被推举为总督。

腓力二世唯有把阿尔发召回，改派列揆生担任总督。列揆生率大军攻打北方各省，但北方军民异常团结，通力抗敌，英勇战斗。在莱顿战役中，莱顿城被包围，城内弹尽粮绝，但城内居民誓死如归。他们说：“我们宁可吃掉自己的左手，来保全右手，用生命捍卫见证自己的信仰。”对一名真基督徒来说，能够自由持守自己的信仰、按圣经敬拜上帝是远比性命重要；因为对他来说，死亡早已经被得胜吞灭。这也是莱顿城能坚持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抵抗三个月的原因。最后在8月的一天，守城的战士突然打开水闸，莱顿城外顿时成了一片泽国，西班牙军队狼狈撤离。莱顿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北方革命的胜利，也推动了南方各省的斗争。

启 12:11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爆发起义。起义者占领了总督府，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关被推翻了。从此，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同年10月，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在根特城召开，签订了《根特协定》，宣布废除阿尔发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南北联合抗击西班牙。1579年，南方的贵族成立了阿拉斯特联盟，承认腓力二世为国君，违反了《根特协定》。北方各省随即成立乌特勒支同盟，以对抗南方贵族。次年，乌特勒支同盟成立“联省共和国”，因荷兰地域最大、经济最发达，所以又称“荷兰共和国”。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海军。“无敌舰队”的覆灭使西班牙元气大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腓力二世于1598年去世，腓力三世继位。1609年4月，腓力三世被迫与独立的荷兰各省签订所谓《十二年停战协定》，暂时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革命在北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改革宗信仰成为荷兰整个国家的信仰，而南方仍然处于西班牙天主教控制之下。

停战期满后，战争重新爆发，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1648年，西班牙和荷兰在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上签字的同时，也签订了《荷西和约》。西班牙终于正式承认联省共和国独立，承认尼德兰南部归荷兰共和国。

荷兰独立后，以殉道者的鲜血和纯正教义建立起来的教会立即得到大复兴，兴起了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忠心牧养群羊，研究教义，使荷兰教会继日内瓦、苏格兰之后成为改革宗教会的又一支。

第二节 亚米念主义和多特大会

1、亚米念生平

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又译：阿民念、亚米纽斯）于1560年出生在荷兰奥得瓦特镇。年幼时，西班牙的天主教军队毁掉了他的家乡，杀害了他的父母和亲友。阿姆斯特丹牧师鲁道夫收养了他。15岁时，亚米念被送到德国马尔堡念书，后来在荷兰莱顿大学继续接受教育。因他天资聪颖卓越，阿姆斯特丹市长资助他出国深造，将他送到瑞士的日内瓦学院接受加尔文继承者伯撒的教导。之后，他前往直利进修。1588年，29岁的亚米念已经被按立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会的牧师，成为较有影响的人。1603年他成为莱顿大学的教授。

2、信仰转变

亚米念本想撰写一本关于预定拣选的书。然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著书过程中，他的观念忽然转变，开始反对预定论教义。他认为这种教义缺乏爱心，便开始传播他那反对上帝主权预定的思想。亚米念的学生把他的教导带进各个教会，引致激烈的争辩。许多牧者看出这就是半伯拉纠主义的再现。正当全国激烈争论之时，亚米念却于1609年因患肺结核去世，年仅49岁。亚米念去世后，伊皮斯科比乌（Simon Episcopius）及

其他一些亚米念的追随者共同编写了《抗辩宣言》，简述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立场，因此他们被称为“抗辩派”。



图 4.37 亚米念

抗辩五点如下：

(1) 圣父的拣选是有条件的：神拣选一个人，因为神预见那个人有信心；反之，神不拣选一个人，因为神预见那个人没有信心。

(2) 基督十架代赎是为全人类：虽然只有信的人才能得救，但基督已经为每一个人而死。

(3) 罪人的堕落不是全然的：人没有完全死在罪中，所以当他听到福音时，他自己仍能选择悔改相信并得救。

(4) 圣灵有效的恩召是可以抗拒的：人可以拒绝神的救恩。人自己决定要不要信福音，选民或非选民都可以拒绝接受福音，完全要看他自己是否选择相信。但是不能确保任何人会真实得救，这要看人自己是否选择相信。

(5) 重生得救的人有可能灭亡：一个人即使真正重生，也不确定能守住信仰。得救之后，信徒要继续维持他的信心，若他失去信心就会失去救恩。人是否会得救到底，这要看他是否继续选择相信。

3、多特会议

为了解决这些争论，荷兰国会在 1618 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并邀请各国改革宗教会的代表参加。当时有荷兰本地的 35 名牧师、几名长老、5 位神学家、18 位国家顾问以及 27 位海外代表列席。这些外国代表分别来自苏格兰、英格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兰西等国家。这次会议从 1618 年 11 月 13 日开到 1619 年 5 月 9 日。多特会议（也称“多特大会”）是宗教改革有史以来最大的会议，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大公会议。

会议议程按着《抗辩宣言》的次序逐项讨论，但把第三和第四项联合起来讨论。亚米念的继承人伊皮斯科比乌和另外 12 位支持亚米念主义的学者被召来在会上进行答辩。经过半年的深入激烈辩论，抗辩派的提案被否定，亚米念的五点主张被定为异端。会议最终通过一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多特正典》或《多特信经》。与此同时，大会针对教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会治理还制定了一份《多特法规》。《多特信经》最终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教义。五要点简述如下：

- (1) 神拣选人没有条件，纯粹是恩典，连人的信心也是神的恩典。
- (2) 虽然基督受死能够救赎全人类一切的罪，但赎罪的功效只临到神所拣选的人。
- (3)、(4) 世上每一个人都堕落了，不能自救，只有神按着祂的主权和恩典所呼召的人才能重生、经历圣灵的更新。
- (5) 神所呼召的人，祂必保守到底。所以信徒即使在极大的软弱中，仍有得救的确据。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被后人总结为：(1) 人的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2)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3) 限定的赎罪 (Limited Atonement)；(4) 不可抗拒的恩召 (Irresistible Grace)；(5) 圣徒永蒙保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多特信经》对改革宗教会影响极大，三十年后完成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是建立在它的神学根基上。《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以及《多特信经》是今日改革宗教会荷兰系统的信条和教义的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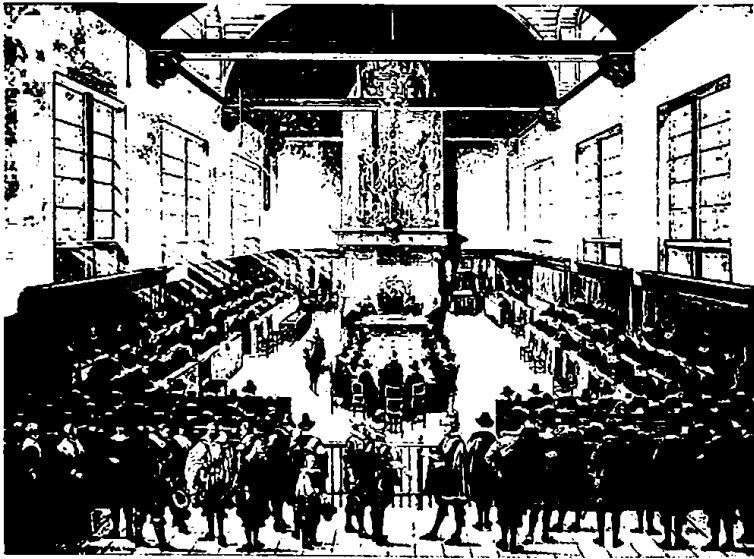


图 4.38 多特大会情景

亚米念主义完全是半伯拉纠主义——神人合作说的翻版(约翰·欧文)，其中每一个观点都是对上帝的荣耀和威严的干犯。亚米念主义乃是把人的地位抬高到和上帝同等，使之与神永恒的拣选旨意分庭抗礼的地步，其本质就是伯拉纠主义这一背后的古蛇在故技重施。但神允许这事发生有祂至高的美意——神要让祂的教会在与错谬争战的过程中继续被陶塑，教会也正是通过否定这个异端而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精辟地总结出来。

五要点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改革宗信仰和亚米念主义的分歧绝不是像有些人所妄论的那样——“加尔文主义特别强调神的主权，亚米念主义强调人的责任”。其实，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对上帝主权的认识，人就不可能有力量

尽上本分和责任；并且没有对上帝律法的敬畏，人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二者的分歧实质上是到底谁在掌管着救恩：

第一，神对人的预定，是基于神主权的决定，还是出于对人反应的预知？——决定权在神，还是在人？

第二，人得救是完全出于神无条件的拣选，还是要加上人的相信来配合？——主动权在神，还是在人？

第三，基督的救赎是只给预定拣选的人，还是谁相信谁就能得着救恩？——选择权在神，还是在人？

第四，人得救之后是否还有失去救恩的可能？——持有权在神，还是在人？

如果神不是预定拣选人得永生，而是预知谁相信就拣选谁，那么就变成神根据人的决定安排一切，神要看人的行为来决定祂的旨意。而且，一旦这人选择相信，神还要为这人安排一生，使他听福音、被教会牧养等等，就如同这人的仆人一样。不但如此，人一旦拒绝，神所有的计划旨意将成泡影。亚米念主义所描述的神哪里还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拥有绝对主权、绝对自由、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呢？所以，正如伯特纳所说：“亚米念主义就是变相的无神论。”

4、亚米念主义的发展及影响

(1) 亚米念思想的继续传播

在多特大会判定亚米念派为异端后，教会牧者们以为这异端思想已经就此铲除了。然而，正如亚流主义在尼西亚大会之后的几百年仍然兴风作浪一样，亚米念主义掳掠了后世的教会，直到如今。

多特大会后，亚米念主义者遭到暂时放逐。1626年，他们获准回到荷兰之后，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一间神学院，继续传播其教义。后来这间神学院逐渐发展成为偏离正统信仰的道德主义与敬虔主义的基地。近代兴起的自然神论、掺杂了亚流主义的索西尼主义等思想也都源于亚米念的思想。

(2) 亚米瑞都主义

亚米念主义在荷兰的影响力日渐衰微，但是却远播在国外。在法国改革宗教会里，有一小部分人士受亚米念主义影响，以撒母耳（Saumur）神学院的克麦隆与亚米瑞都为领袖，发展出“亚米瑞都主义”（Amyraldism）。他们接受亚米念主义的“普遍救赎（不确定赎罪）”的观念，但是宣称在其它四点仍持守改革宗信仰。亚米瑞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想要向愈见强大的天主教耶稣会妥协。1675年，瑞士改革宗教会制订了《瑞士联合信条》（*Helvetic Consensus Formula*），定“亚米瑞都主义”为异端。有人称“亚米瑞都主义”等为“四点的加尔文主义”，另有人说自己是“三点加尔文主义者”、“两点加尔文主义者”、“一点加尔文主义者”。其实这都是误解、误用。真正的改革宗信仰（或“加尔文主义”）不可能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妥协，放弃其中一点，就是拒绝了其它四点。因为五要点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紧紧相连，环环相扣。

(3) 亚米念主义在改革宗教会之外的影响

亚米念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极其有限，但是其对英国的圣公会与浸信会带来了不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后来的约翰·卫斯理将亚米念主义“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今天教会的主流。

(4) 亚米念主义对政治界的影响

在多特会议前亚米念主义者便投身于政治革命，发动政变，以建立亚米念政权，并将异端思想引入到各个领域。领袖奥登邦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在1618年7月的荷兰政变中被捕入狱，在多特大会后被斩首。亚米念的另一个学生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又译：格劳秀斯）则被判终身监禁，但后来通过躲在书中而成功越狱，逃至法国，开始将他们的信仰带进法律方面。他煞费心思地写了一部关于国际法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法》，意在用人本思想将国家从宗教——实质是从上帝中彻底独立出来。这部书成为今天国际基本法的准则。

从此，国家和政权再也不用考虑作神的仆人，而只需要考虑人民的利益。一切国内、国际法律原则必须根据自然法的道德和理性原则，再也不是根据上帝的律法。

就像马克思所说：“雨果、格老秀斯……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从神学。”

当异端进入社会时，整个世界就迅速地进入天翻地覆的人本主义革命，宗教充其量不过成为国家和社会业余生活的点缀。这就是亚米念主义对后世的重大影响。亚米念主义成为今天许多教会（特别是中国教会）的“正统”和主流，追本溯源，无不源于罪人企图将神从祂的宝座上拉下来，自己作主。具体演变过程见本书第五部。

5、索西尼主义

索西尼派是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莱利奥·索西尼与其侄儿浮斯土斯·索西尼创立的，是第二、第三世纪的神格唯一论思想的再现。该派否认三位一体、耶稣的神性等教义。

因有异端的嫌疑，莱利奥·索西尼于1547年离开了意大利。后因游历甚广，索西尼得以认识新教的神学家和领袖，其中包括墨兰顿和加尔文在内。浮斯土斯·索西尼于1579年前往波兰组织了一个神格唯一论的团体，名叫“波兰弟兄会”。他的活动由此扩展至匈牙利、外西凡尼亚及其邻近诸国。

1600年，索西尼在拉寇（Racow）成立了一个神格唯一论派的大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毕业。他在此地曾印行许多关于神格唯一论的书籍，其中包括1605年出版的著名的《拉寇问答》（Racovian Catechism）。这本《拉寇问答》广为流传，对荷兰、英国、美国等都影响很大。

索西尼派否定三位一体、基督道成肉身、耶稣的神性、婴儿洗礼、地狱以及圣经权威等基本教义，其实就等同于否认整个基督教信仰。索西尼派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人，“上帝赐他圣经、生命，又以基督作榜样。但基督不过是人，他一生完全顺服上帝，作人榜样，满有属神的智慧。因此上帝赐他复活，赋予他一种神性，所以他如今还能听人祷告。”

在教恩论上，索西尼派反对赦罪，也无须补罪，认为此二者乃互相排斥的观念。他们说：“以无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受罚是绝对不公平的。基督受死是表明顺服的最好榜样；在必要时，这种顺服也是每一基督徒所应该表明的。但基督的顺服虽大，却不超过他所应有的，所以他不能将他顺服的价值转移给他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昭彰的异端，

至今仍被一些教会所推崇。

第三节 神学家布雷克

荷兰教会在平稳中得以建造兴旺，教会经历一波又一波的复兴，一大批神学家被神兴起，使荷兰不仅成为改革宗第二个大本营，也成为改革宗教义和神学发展阵地，传承着大公教会的信仰，彰显着她“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光辉。本节只介绍一位代表人物威莱姆斯·阿·布雷克的生平和他的神学思想。透过此人侍奉的一生，可以看见当时教会的复兴光景。

1、生平和呼召

威莱姆斯·阿·布雷克（Wilhelmus a Brakel）1635年1月2日生于荷兰的利瓦尔顿镇（Leeuwarden）。他父亲名叫西奥多斯·阿·布雷克（Theodorus a Brakel），母亲是玛格丽萨·霍玛（Margaretha Homma），二人生有6个孩子，而威莱姆斯·阿·布雷克则是其中唯一的男孩。布雷克因从小敬畏主，所以经常被人拿来与圣经中的俄巴底相比。

王上 18：12 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

那时他父亲在利瓦尔顿镇西南部一个名叫比尔斯的村子里牧会。1654年，布雷克19岁，注册进入弗兰尼克（Franeker）学院学习。他全面学习语言、哲学、历史，还学习医学。当然，他也学习他的主修课——神学。后来他写到：“一个牧者需要接受全方面的教育，思维的能力需要通过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来锻炼。”

24岁时他完成了学业，利瓦尔顿镇教务区会对他进行考核。这次考试包括试讲一篇讲章。他证道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一节。负责考试的弟兄们对于他的证道非常满意，一致决定他为圣职的候选人。他也得到授权，可以主持圣礼。

2、牧会

在获得圣职候选人的许可后，布雷克认为自己作为牧者的责任非常重大，因此他郑重而迫切地写出了他关于侍奉职分的看法。在他看来，没有一个人比尚未重生的牧者更为可憎，假如他们去作鞋匠，也许会更幸福。对于牧者而言，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圣经起初就是用这些语言写成的。他说，假如一个教会的牧者只是满足于已经掌握的、有限的神学知识而不思进取，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可悲的教会”。

布雷克还指出牧师的四大职责是为会众祷告和讲道、圣礼、教授教理问答和探访。他还特别提到，教理问答是常常被人忽视的：“假如牧师在作教理问答之事上不尽心，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都不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家庭探访时首先应当查问是否举行家庭敬拜，因为家庭敬拜是每个基督徒家庭都当进行的。”布雷克认为，家庭敬拜应该一天进行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布雷克的讲道记录保留下来的不多，但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讲道，却可以使我们与这位严谨的牧者相遇，受到他的警告和安慰。在他的一篇讲道中，布雷克牧师把堕落之人的记忆比作过滤网：好东西漏下去不见了，坏东西却保存下来。因此，人忘掉了他首先应当牢记的。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1659年，布雷克在弗兰尼克完成学业并取得候职资格之后，并没有接到一个邀请他前往牧会的呼召，因为那时在弗里斯兰的教会几乎没有任何牧职空缺。于是他去了乌特勒克（Utrecht）。当时，布雷克24岁。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662年，接受著名神学家吉斯伯特斯·沃艾舍斯（Gisbertus Voetius）和安德烈斯·艾森纽斯（Andreas Essenius）（圣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教导。以后的49年里，布雷克在厄克斯莫拉、哈林根等地牧会，有贫穷的农村，也有富庶的城市。然而，布雷克在这些地方并非安逸悠闲，虽然是在教会复兴的年代，神的仆人依然生活在激烈的争战和攻击中。

3、在弗里斯兰

1672年，法国、英国、蒙斯特（Munster）和科隆（Cologne）对荷兰共和国四面夹击，这突然来临的进攻也给人们带来了惊慌和不安。面对重重险恶，可能是根据政府的要求，教会决定召集弗里斯兰地区的所有牧师在利瓦尔顿开会。牧师们从各个教区来到省会。这次集会在1672年7月召开，有156名牧师参加。然而，大会并未讨论面对战争应采取的军事策略，而是首先代表荷兰民众向上帝认罪。国家的危机是神对罪恶蔓延的警戒和管教，因此教会应担负起祭司的责任，首先省察认罪。大会也“劝诫那些体面的绅士们，以基督的名义请求他们调查和消除社会中存在的那些罪恶因素。这些罪恶也污染了他们自己，在他们当中也引起了混乱。通过这些措施，希望上帝施怜悯，从而让这片土地得到赦免，教会和国家得蒙更大的祝福。”牧师们强有力的行动使弗里斯兰省大得鼓励，弗里斯兰人在战争中安然不动，而从蒙斯特来的敌军则停止前进，不久就从弗里斯兰东南部撤走了，对格罗宁根的围困也结束了。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上帝的信实和全能。

王上 8:37-39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原文作“灾”），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们（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恢复稳定之后，全弗里斯兰总会召开了大会，会议决定：在礼拜天下午，所有牧师都当宣讲《海德堡教理问答》。那些未能履行此项职责的人，将被坚决地从所属的总会和区会中予以摒除。会议也强调了教会劝惩的执行。总之，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其目的就是大范围地推动社会的进一步改革。

1673年至1683年这段动荡时期过后不久，布雷克收到了他的第四个邀请——这一次是来自弗里斯兰首都利瓦尔顿。布雷克到利瓦尔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教会无论是从教义上还是体制上都按圣经得到建造和复兴。但教会的争战不会止息，神仆人的十字架道路也不会改变。

恰在此时，拉巴第派从德国艾尔托纳（Altona）返回荷兰，并且定居在弗里斯兰的威艾沃德（Wiewerd）。这些拉巴第的跟从者们从教会中分离出来，组织了一个排他性的团体，只有与他们信仰相同的人才能加入。教会决定采取措施，禁止私下聚会。1676年10月，布雷克受到利瓦尔顿区会的控告。指控上说，布雷克仍然继续带领“他那不正当、未得到授权且秘密进行的教理问答班”。其实，利瓦尔顿地方政府所通过的这项决定本来是针对拉巴第派的，但如今却被反对布雷克的人利用这项规定来对付他。这个教理问答班后来由所有的牧师轮流带领，布雷克虽有冤屈，但还是顺服教会的决定。

4、克尔门之争

克尔门牧师是一位正直的牧者，因推动教会进一步的改革而闻名。他和布雷克都察觉到教会中存在非常严重的灵命上不冷不热的状况。因为许多牧师在讲道方面以及堂会在施行劝惩方面十分粗心，这种不冷不热的状况更加恶化。教会许多成员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诸如频繁赶集、在大庭广众之下醉酒、玷污安息日、亵慢圣礼等等。政府的职责就是制定法律来抑制百姓的犯罪。1662年，当克尔门在职时，他就不断提醒民众要对付罪，在必要时严格施行劝惩。他惩戒了两名政府官员，这两个人都犯有酗酒罪，其中一名甚至还当众斗殴。克尔门因而得罪了掌权者。克尔门也反对施行洗礼和圣餐时所宣读的那些仪式化的条文和成文的祷告。他还批评教会的节日。这些节日的设立在圣经中并没有任何教导，不过是人为的发明而已。主设立安息日，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在这一天记念与耶稣降生、受苦、受死、复活和升天等有关的救赎性事件。

由于种种原因，反对克尔门的人正式对他提出控告。市政当局介入这件事，并且把选择摆在克尔门面前：或者是让步，或者是离开斯路易斯。他既不能，也不愿意屈服，宁可选择离开。1675年6月17日，与会众道别之后，这位牧者便离开了斯路易斯。布雷克牧师十分关心克尔门的境况，并允许克尔门在他侍奉的地方讲道。在1676年和1677年区会会议期间，有人向布雷克提出，他让克尔门讲道一事没有得到区会的批准。布雷克提出的最关键论据就是：克尔门从来没有受到教会的劝惩，也从来没有被剥夺牧职；相反，禁止他讲道只不过是市政当局提出的。他认为“任何政治团体都无权废除牧者的职分”。弗里斯兰市政府议会的代表们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但对布雷克牧师来说，一个牧者在教会事务上无需向民事政府负责。不允许克尔门讲道一事是不合法的，因为他并没有被教会会议解除职务。布雷克以两份向市政府的《抗议辞》（申冤书）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加 1:10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然而，布雷克《抗议辞》并没有说服市议会。他们由于坚认布雷克冒犯了“他们的威严”，所以对布雷克实施惩罚——暂停四周的牧职，并将这项决定通知给堂会和区会。布雷克牧师在议会面前毫不畏惧地宣称他绝不会屈从这项惩罚决定，“即使不久就搭上自己的性命，他也有责任继续讲道。”7月21日星期五，又轮到布雷克讲道了。矛盾在激化。他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他们都建议这次讲道由别人代替他。同时，由堂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市议会，要求任何对布雷克实施的惩罚都由教会会议执行。他们认为民事政府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但是，很多区会代表认为这样直接对抗还是太危险了。

然而，布雷克牧师谢绝了这些用心良苦的建议。7月20日星期四，深夜，一位警察局的官员来通知他，说他收到了来自市议会的书面命令，要他阻止已遭暂时停职的牧师讲道。他要求布雷克不要为了讲道而去教会。布雷克回答说，他不会反对强制执行，但他既不想也不能故意呆着不去教会。第二天，布雷克照常来到教会。毫无疑问，来教会的人一定比平时多得多。可是，那些期待发生混乱的人大失所望，因为既没有警察局的官员，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来阻止他讲道。没有任何扰乱，他仍然得享宣讲他主人的圣言的特权。他晓得这是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聚会结束后，几位堂会成员代表议会去见他，问他是否愿意为那些难于接受的表达认罪。如果他愿意，他们将把劝惩之事留给教会处理。这正是布雷克的目的。如果确实无意间得罪了政府，他当然愿意道歉。于是，他起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草了一份声明，保证对政府给予应有的尊重，并且呼吁其他人也当这样做。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市政当局承认，在这种涉及原则的事情上，教会有权管理自己范围内的事务。实际上，政府有责任支持教会，但是不当介入教会事务。由于上述勇敢的举动，布雷克的名声变得人人皆知，特别是在《威莱姆斯·阿·布雷克牧师为教会权利辩护实录》中记载了这件事。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为了使尼德兰那些趋炎附势的牧师知罪，使那些胆小怕事的牧师刚强壮胆。”弗里斯兰政府可能对这本书的出版比对在布与布雷克争议时让步感到更遗憾。

虽然发生了以上的争战，但仍然令我们感叹：在这种复兴的时代，不仅是教会，就连政府，都能为自己的过错认罪。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当年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接受教会劝惩的过程。当教会真正成为真理的柱石时，神会感动君王生出敬畏的心。因此，若世上的政府不敬畏上帝，我们教会，特别是牧者，应首先悔改。

5、范基芬之争

范基芬（David Flud van Giffen）是一名柯齐派（Cocceian）牧师。柯齐派的追随者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相信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处处都能找到关于耶稣的预表。如果一个特定的预言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清楚，他们就会以非常不自然的方式加以解释。这种解经方法即灵意解经。这样一来，一些并不能在经文中发现的东西就会被读进去。作为利瓦尔顿的一名牧师，范基芬在达尼普（De Knijp）附近的一个村庄侍奉。有一次他用《诗篇》第八篇讲道。在讲道中，范基芬极其强调，说这首诗篇是期盼基督到来的预言。非常明显的是，这篇讲道是在为柯齐派的立场辩护，因此在参加教会崇拜的人员和堂会成员中引起了不满。布雷克牧师非常清楚，这首诗篇所表达的是上帝的孩子对上帝的荣耀的惊叹，而不能把它解为关于新约时期教会情况的预言。

布雷克以讲章《大卫的赞美诗——诗篇第八篇释义与应用》为书名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两位牧师幸运地达成和解，布雷克就删掉批判柯齐派的那部分文字，写了一篇关于恩典之约的长文取而代之。新书（最新重印是在1979年）的书名是《大卫的赞美诗与恩典之约——诗篇第八篇释经成果汇编》。

1683年，鹿特丹的教会向布雷克发出邀请。鹿特丹是荷兰共和国最大的城市之一。然而他回绝了这一邀请。鹿特丹教会感到很失望，决定向他发出第二次邀请。他们派出一位特别使节北上，带着鹿特丹行政长官和教会堂会写给布雷克本人的信，布雷克无法回绝第二次邀请，于是他向利瓦尔顿堂会告别。至此，布雷克在弗里斯兰教导上帝的圣言整整21年。

6、在鹿特丹及与拉巴第派的斗争

布雷克在鹿特丹讲了第一篇道。他选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以这些令人扎心的话语，布雷克开始了他在鹿特丹的侍奉。在鹿特丹就职一年半之后，布雷克与拉巴第派“开始了激烈的争战”。

他给哈林根的一群朋友写了两封信，坦诚地写到，他在任职斯达沃伦期间，对拉巴第派持同情态度，而且曾经相当严肃地考虑过加入他们，因为当时拉巴第派就居住在那里。布雷克也和拉巴第本人有过大量的谈话。尽管听到很多吸引人的事情，布雷克还是无法信服。于是拉巴第建议他把这件事托付在主的面前，祈求主赐给他智慧，尽可能独

自一人向上帝祷告。根据信中所言，布雷克接受了这一建议。“清晨一大早，我就进入我的花园，一整天都呆在那里，直到深夜。我禁食，祷告，乞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也读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主非常清楚地从圣经中向我显明，拉巴第派偏离了真理。”但是，拉巴第派对布雷克仍然颇有吸引力，所以他继续祷告，请求主允许他参加这个团体。结果，主更清楚地向他显明了拉巴第派的谬误之处。此后，布雷克下定决心，留在改革宗教会内。上帝拦阻他，使他没有迈出那致命错误的一步，为此他不断地向上帝献上感恩之心。

拉巴第和那些追随他的人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以致于连威廉斯·阿·布雷克这样坚定的改革宗牧者都受到十分强烈的吸引呢？他自己也说，既然连他都犹豫到这个地步，那些受过教育比他少、经验比他浅的人必定会有更大的挣扎。在第二封信中，布雷克使用可能找到的最强烈的字眼，揭露拉巴第派的错误。

让·德·拉巴第（Jean De Labadie）是一个法国人，曾经在耶稣会作为修道士接受训练，后接受新教。1639年，拉巴第离开修道院，当时他29岁。直到1650年，他一直作为一个巡回布道家在各处布道。同年，他加入蒙托班（Montauban）改革宗教会，成为这间教会的牧师，并且在学院任教。1659年至1666年，他住在日内瓦。他以巨大的热情讲道，连续讲了几个小时，说明伟大的理想必须变成现实：一个纯洁的教会，尽可能严格地施行基督教。拉巴第派主张：真信徒应脱离有形教会，建立完全由重生的人组成的纯洁教会——“家庭教会”。这种主张就导致以下的看法：只有真正的信徒，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与基督的灵有份的人，才能构成纯洁的教会。

这样，在作为组织的有形教会的重重限制之下，拉巴第组织了所谓“真信徒的‘非正式小组聚会’”，努力带领教会回到使徒时代。在这一点上，拉巴第派与重洗派无二。

拉巴第的宣讲方式非常迷人，打动人心。他能够连续不断地讲四个小时，而不让听众失去兴趣。拉巴第在哪里呆上一段时间，那里就产生骚动。不久拉巴第接受邀请到米德尔堡的法语教会去牧会。1666年，当他来到荷兰共和国时，他呼召人们祷告和禁食，也产生了果效。最终导致议会介入，并把拉巴第驱逐出境。

于是他断绝了自己与改革宗教会的联系。他把这群追随他的人看作重生者群体。他们离开世俗的国家教会而加入拉巴第新成立的“家庭教会”。在荷兰的其它地方，类似的家庭教会也产生了。很明显，他们跨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在飘荡了一段时间后，定居在利瓦尔顿南部的一个村庄维沃德（Wiewerd）。1670年，布雷克开始与拉巴第建立联系。从后来所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那时布雷克已经住在鹿特丹，布雷克起初并没有拒绝这位外表颇有恩赐的牧者和他的想法。

就在此时，拉巴第过世了。靠着出色的组织才能，彼得·伊万（Peter Yvon）成功地在这个教会找到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大约1680年，他在维沃德的跟从者有三百人左右。拉巴第派人士都身着一样的手工缝制、朴实无华的衣服。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城堡周围种田。奶品生产是他们养活自己的方法。吃饭时有唱诗和祷告，一人或多人讲些话。世俗的交谈被减至最低点，他们宁愿分享自己的属灵经验。根据拉巴第派人士所言，这些经验可以在上帝的圣言之外发生。特别是在圣餐礼之中或之后，会友相信圣灵正在他们身上做工，会进入一种狂喜的境地。那时，他们就会互相拥抱，跳起来，舞起来，以属灵的基督徒之爱使对方开心。这种所谓属灵气氛正是“使选民迷惑”的最大原因。当神的儿女把信仰注目在这些外表的现象时，立刻就被这些天使般的光明所吸引，陷入网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罗。

沃艾舍斯和克尔门都认识到拉巴第教导的危险，就警告改革宗教会反对这种谬误。克尔门还写了著作《拉巴第派史录》（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Labadists）揭露其错谬。

布雷克牧师和拉巴第派都承认教会的腐败。但是，从这样一个败坏的教会离开是不允许的！布雷克说：“我们可以说，因为她败坏，就不再是基督的教会了吗？难道我们应当蔑视她？难道我们应当从她那里走开？不，这样做是愚昧的。很显然，一个败坏的教会仍然是一个教会。从起初到现在，上帝总是准许她的教会充满许多败坏。因此，由于教会的败坏而蔑视她，并且由此而否认她是教会的人，所作所为违背上帝的圣言和所有的经历。”

布雷克使用圣经中的例子，说明罪、败坏和灵命匮乏在许多教会都可以见到。想想哥林多教会的混乱，想想约翰对小亚细亚众教会的劝诫。一个人怎敢把自己与她隔离，因此而藐视上帝和基督自己呢？所以，布雷克强烈地反对拉巴第派分离主义的灵（或分裂主义的灵）。除此之外，他区分了三个神学上的不同。首先是关于称义的教导，特别是有关带领灵魂归主方面的教导。彼得·伊万让悔罪之人等候的时间太长了。根据伊万的讲法，人一开始就当看清楚旧人的罪，并且努力对付罪、魔鬼和自己的肉体，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寻求脱离罪的辖制。这种方法能使人过上圣洁的生活，在其中安静地等候圣灵。这种安静的分离必须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灵与肉之间不再有任何争战，他就可以不再为新生命而祈祷。按照伊万的讲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相信基督之前，此后，上帝使人与基督联合。布雷克牧师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罪人不可能靠自己对付罪，进而靠过圣洁生活来到基督面前。相反，我们凭信心接受基督已付的赎价和公义，以至于每时每刻都能够，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与上帝和好，被祂称义。

拉巴第派的所谓纯洁之爱，不是从对上帝的爱发出来的，而是自己情感努力的结果，因而不能是重生的直接原因。按照伊万的说法，“这种纯洁之爱已经是上帝的工作”，这样一来属灵的生命在人相信基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个人怎么能在既未重生，又未相信基督，圣灵也没在他里面的情况下，成为在基督里面上帝的儿女呢？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啊！我们确信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相信基督之前，人既没有生命，也不可能在上帝面前作任何让神悦纳的事。最后，布雷克反对伊万所主张的人们能够绝对知道他人是否重生的论调。只有当他们确认一个人已经真正重生时，拉巴第派人士才会允许他或者她加入他们的团契。布雷克教导说，只有上帝知道人心，而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眼前的事物。进一步而言，真信徒与假冒为善者和暂时性信徒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牧者既不可以，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并以绝对肯定的语气对一个人说，他已经重生了。这样的判断唯独属于上帝。接纳人成为教会会友的条件就是对真道的认识和告白。当初使徒们在人认罪时就为他们施洗，而在受洗的人里也有并未重生的人，例如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以及行邪术的西门等。认罪是使徒为人施洗的基础，而并不是晓得对方已经重生了才为他施洗。

布雷克更反对拉巴第派主张可以随自己决定是否领圣餐。他教导说真信徒不当不领圣餐，因为你不领受圣餐，只会在教会中增加不安和混乱。

7、支持教会独立

在鹿特丹任职期间，布雷克与市政府再起冲突。1688年由于原有牧师离世，堂会按照通常的程序邀请一位继任者。堂会最终选择的是一位来自乌特勒克的牧师，一个行为

无可指责的人。教会把这一决定通告市政府，但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市政府的认可。执政官决定不批准这一邀请，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布雷克牧师当时正是教会议会的主席。他派委员会继续发出这一邀请。然而教会议会的记录显示，委员会没有完成任务，但记录并未记载任何理由。教会议会可能决定不再继续执行这件让市政府不悦的事。经过重新安排，教会向市政府表示屈服。但是，布雷克是不会默认此事的。几个星期之后，布雷克在格罗特堂（Grote Kerk）讲道。他选择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第六节，强调市政府无权废除教会对一个合法蒙召的牧师的邀请，并强迫教会邀请另外一个人。他的讲道建基于圣经，并且合乎《比利时信条》，也合乎当时最优秀的神学家的观点。只有亚米念派才支持市政府介入教会事务。然而，布雷克的这篇讲道惹火了地方执政官，他被要求把这篇讲道以书面形式送到市政厅。他予以照办。市政官员已经认为布雷克开始与他们作对，布雷克这样做已经破坏了官员们的声望和权威。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暂时禁止布雷克讲道，停发他从市政府领的薪水。但教会议会赞同布雷克讲道的要义，就努力与市政府协调，但市政府还是坚持实施已经作出的惩处。7月28日，星期三，布雷克继续服事，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因为他自己冥顽不化，而是出自对他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之命令的顺服。他宁可被流放，甚至丧失生命，也不能不讲道。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市政府要求教会议会调解，教会议会做出紧急决定，要求布雷克“明天保持沉默，允许其他人代替他这次讲道”。对于这一要求，布雷克并没有置之不顾，而是予以顺服，因为它是出自教会。在调解过程中，教会议会进一步提出事实，证明布雷克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位愿意顺服教会组织的牧师。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和平协约。但布雷克继续坚持他的立场，就是市政府无权禁止教会发出呼召牧师的邀请。他出版了原来的讲道词《圣经宣告主耶稣是其教会至高无上的主》。这使得执政官非常愤怒。执政官认为，为了杀一儆百，必须惩罚布雷克。布雷克似乎很快就要遭到放逐。就在此时，一个富有影响的保护人站在了他这一边——总督威廉三世（William III），他写信要求市长允许把有关布雷克的事件暂时搁置下来，等到他与执政官本人讨论之后再谈。上帝护理的大手再一次向祂的百姓显明。

箴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在最后的冲突中，教会会议毫无疑问地选择与布雷克站在一边，执政官不得不让步。但这件事之后，教会与市政府的关系变得很差，以致市政府数次拒绝批准教会的一个邀请函，这种矛盾直到1690年1月才得以缓解。

8、出版巨著《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

与市政府冲突过后，布雷克周围的环境变得较为平静。现在他能够投入到一部书的写作当中。这部书成为他最主要的著作，就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布雷克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源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部书没有按照当时的习惯献给在教会或者在国家中担任高职的人，布雷克把它题献给“上帝在尼德兰的教会”。他所特别想到的是他当时在鹿特丹所牧养的教会，以及此前在利瓦尔顿和米德尔堡所牧养的教会。然而，何止是这几间教会受益？这是上帝赐给普世教会珍贵的礼物。这部著作甚至可以和《基督教要义》相媲美，使我们这后代的教会也从中大大地被建造。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布雷克认为，印刷术在宗教改革前不久被发明出来，这乃是一个神迹。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一个传道人一生只能影响很少的听众。然而，藉着印刷术，他可以向整个国家、甚至向全世界讲道，在他死后也照样传讲。布雷克说：“照着上帝加给我的恩赐的大小——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非常高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在我死后多年仍然向荷兰传讲上帝的真道。”

这部著作超过两千多页，分为三卷：第一卷是教义解释；第二卷所讲述的是信徒如何在上帝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其中阐述了十诫、祷告、忍耐、真诚和其他重要的主题；第三卷涉及其他一些内容。《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俨然成为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的继承者的标准参考书。这部著作被再版二十多个次，并且被翻译成了德文、英文和中文。

1711年8月30日，主日，布雷克最后一次讲道。当天下午，一辆马车把他载到教会，照顾他的人帮助他登上讲坛。当时他的疾病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在患病期间，他经受了很大痛苦，特别是由于肺充血所带来的痛苦。这是许多讲道过多的牧者容易患上的疾病。在他过世的前一个晚上，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问他情况怎么样。他回答说，“很好，我可以在我的耶稣里安息啦！我与他相聚，我正等着他来接我，但是，我还是安静地交托吧。”之后，他就安静地去世了，享年76岁。

启 14:13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安息着一位无法休息的人，他讲明真道，为耶稣赢得灵魂。他曾经为故土切切祈祷。”

如今，这位神的器皿已离开三百年，但是他不朽的著作，仍是许多改革宗教会讲台上的声音。“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 11:4）不是他们在说话，乃是上帝在藉着他们说圣经上的话。

第六章 法国后期宗教改革和大逼迫

法国的宗教改革最为惨烈，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法国的命运，但是对普世教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第一节 法国王室的更迭

1、法兰西斯一世

法兰西斯一世（又称：弗朗西斯一世、弗朗索瓦一世）1515年即位为法国国王。这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却是诸天主教国家中唯一一个对教皇不忠的国王。他先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发动五次战争，均告失败。为了对抗罗马和德国的势力，他积极参与苏格兰的国政，并将其女玛丽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后来玛丽成为苏格兰的摄政太后（即与约翰·诺克斯斗争的摄政太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序言中写给他的信也没有唤起他的思考，甚至他可能也无暇读一下这一封出自新教徒的信。他对宗教改革置若罔闻，因为他所关心的只是争夺权力和地盘，由此可见，对他来说信仰不是首要的，政治才是第一。但由于他和天主教国家的斗争以及和新教国家的复杂关系，上帝也使用他帮了教会不少忙，例如由于他挑起了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致使查理五世无暇镇压德国的宗教改革，从而使新教得以发展壮大。

1547年，法兰西斯一世死后，其子亨利二世即位。

2、亨利二世

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也是一个顽固的天主教徒。在他执政期间，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遭到无情的迫害。1547年，亨利二世在巴黎高等法院中特设了一个被称为“火焰法庭”的机构来审判新教“异端”，迫使许多改教家流亡国外，其中包括加尔文。

3、法兰西斯二世

1559年7月，亨利二世去世，15岁的王储加冕为法国国王，称为法兰西斯二世。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法语名 Catherine de Médicis，又译：卡特琳·德·梅第奇）担任摄政。太后来自意大利德·美第奇家族的教皇亲族，是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和随后三个国王（法兰西斯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母亲。法兰西斯二世体弱多病。1548年，在他4岁时，他的父亲亨利二世就安排了他与青梅竹马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订婚。玛丽·斯图亚特从此开始了她在法国的童年生活，直至返回苏格兰。

4、凯瑟琳·德·美第奇

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叔叔就是教皇克莱芒七世，即那位拒绝批准英王亨利八世和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教皇。尽管克莱芒七世称凯瑟琳是他的侄女，事实上他是她祖父的堂兄弟。正是克莱芒七世和亨利的父亲法兰西斯一世商定了凯瑟琳的婚事。凯瑟琳1564年在枫丹白露举办的皇家宴会以奢侈闻名。她尤其精通建筑，而且喜欢打扮，据说女士们中流行的高跟鞋、紧身衣都是她的发明。当然，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位太后成为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屠杀新教徒的刽子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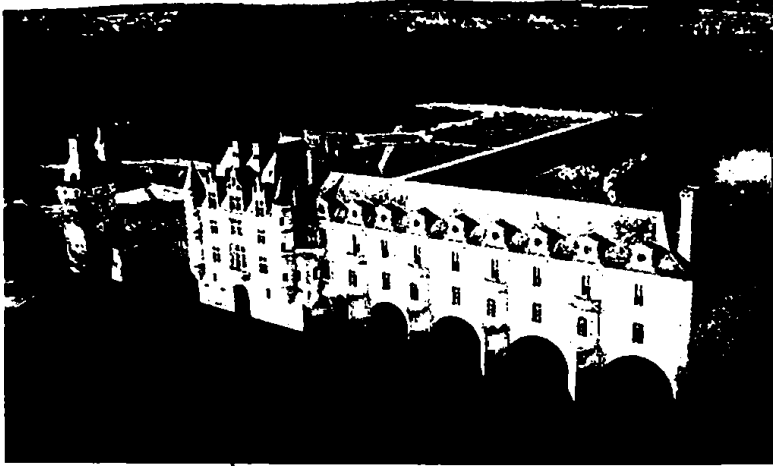


图 4.39 凯瑟琳·美第奇的舍农索城堡

5、查理九世

1560年兄长法兰西斯二世去世后，当时只有9岁的奥尔良公爵于1561年在兰斯被加冕为法国国王，即查理九世。他完全受自己野心勃勃的母亲凯瑟琳的控制。在此期间，法国爆发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战争。

6、法国的王室家族

以下是法国的几大王室家族：

(1) 吉斯家族（信奉天主教）

吉斯家族源于洛林公爵家族的旁系，16、17世纪时归附于法国。1528年，洛林公爵勒内二世的次子受封为第一代吉斯公爵。该家族信奉天主教，在法兰西斯一世时，家族地位大大提高，并逐渐控制了法国北部与东部诸省，并在法兰西斯二世时代干预朝政。

(2) 波旁家族（倾向新教）

波旁家族是一个在欧洲历史上曾断断续续地统治纳瓦拉王国的家族。14世纪时，波旁家族分为长幼两支，1527年长支绝嗣，幼支旺多姆公爵查理承袭为家族首领，称孔代亲王，是法国波旁王朝（1589—1848）时期的贵族称号。该家族支持新教。

(3) 瓦卢瓦王朝（信奉天主教）

瓦卢瓦家族在1328年至1589年间统治法国，就是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家族。这是一个典型好战家族。瓦卢瓦王朝统治法国这三百年，法国内外战争频繁，其中包括英法百年战争。到了法兰西斯一世，更是战火纷飞。这个家族名义上是信仰天主教的，但其实政治才是他们所真正且唯一热衷的。

第二节 法国宗教战争

1、改革宗信仰在法国

法国的新教徒起初都是接受马丁·路德的信仰，在《基督教要义》出版后，几乎全部接受了加尔文的改革宗信仰，被法国人称作胡格诺派（法语：Huguenot，一般认为出自德文 Eidgenossen，意为“结盟者”）。

到了1559年，全国总共有72个胡格诺派教会，这些都是具有加尔文思想的信经长老会教会。1559年，法国召开了第一次“法国新教牧师大会”。这次牧师大会是一个奠基礼，它建立了一个与天主教平行的教会，并拥有自己的领袖、教义、机构和章程。法国的新教徒有了统一的教义与组织，形成了胡格诺派。一年后，胡格诺派信徒已增至三十万人，以波旁孔代家族和将军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又译：克里尼）等人为首，主要集中在法国中部和西南部。

同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即位，年仅10岁，由太后凯瑟琳摄政。她想利用当时法国两派贵族（一派是以东北部的吉斯家族为首，仰仗罗马天主教会支持；另一派是以西南和中部波旁家族为首，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不和，使之彼此互相制约以维护她的王权，所以她就改变了亨利二世以来对新教的残酷逼迫政策。在1561年，她宣布停止对胡格诺派的迫害，并释放被捕的新教徒，改革宗教会自此更是迅速发展。根据费舍（Fisher）《改教史》的记载，到了1561年，全法国已有四分之一的人信奉加尔文主义。这也与日内瓦在这期间大量差派宣教士有直接关系。1562年，查理九世颁布《圣·戈尔曼法令》，也叫《一月法令》，给予胡格诺派一定的自由，允许他们在城镇之外进行公开崇拜或者在私人家里崇拜。太后原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出乎她意料的是，新教徒人数大大增加，而早已不满的吉斯家族也虎视眈眈。国内矛盾更加激化。

2、瓦西惨案

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法兰西斯·德·洛林路经瓦西镇，正值胡格诺派信徒举行礼拜。吉斯公爵的武装随从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胡格诺派信徒，当即死23人，伤两百多人。天主教军队在其它城市也举起屠刀，镇压新教徒的流血事件接连发生，全国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为了自卫和抵抗，胡格诺派信徒也武装起来进行反抗。法国第一次宗教战争爆发。

3、反抗逼迫的宗教战争

吉斯家族的军队占领了巴黎，控制了王室。胡格诺派在各省起事，他们在奥尔良设立了指挥部，并有两名统帅：一位是孔代亲王路易一世，另一位是海军大将科利尼。战争结束于1563年3月19日，双方颁布《安布鲁瓦敕令》，保证胡格诺派新教徒的信仰自由，但宗教礼拜仪式只限在贵族家中及少数城镇中。不久，冲突再起。

1567年9月，路易一世和科利尼率新教军队包围巴黎。11月10日，在巴黎北郊圣德尼一战双方不分胜负。德意志新教选帝侯弗莱德三世派兵支援胡格诺派，天主教徒和宫廷不得不屈服。1569年3月，双方又签订了《隆朱莫条约》。然而，这次和约仅仅促成一段短暂休战。同年9月，第三次战争又起。

从1568年到1570年，天主教势力怂恿太后将胡格诺派的传道者逐出法兰西，而且制订了计划要捉拿路易一世和科利尼。路易一世在1569年的雅尔纳克战役中牺牲，胡格诺派在同年的蒙孔图尔（Moncontour）之战中败北。但天主教势力也未能巩固其战果。于是双方于1570年8月，又签订《圣日耳曼敕令》，确定设立新教的设防安全区（城堡）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为战争结束的标志。

在这段历史中，主耶稣的话得到最明显的应验：无论对方是亲人朋友还是王公贵族，面对信仰的抉择时，双方只会以死相拼。

太 10:34-35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第三节 圣巴多罗买惨案

1、背景

1571年，和平的希望粉碎了。3月的一个主日，天主教徒在里昂游行期间，40名胡格诺派信徒因为拒绝在圣体前跪拜而被杀。由此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徒的关系又开始恶化。这时天主教的狂热分子吉斯家族在宫廷里失宠，查理九世甚至聘请科利尼为自己的宫廷顾问。科利尼逐渐影响着查理九世的信仰，引起了太后凯瑟琳的担心。国王一旦接受新教信仰，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将不保。

这时尼德兰的宗教改革爆发。1572年4月，海上乞丐控制了布里勒，进而即将控制尼德兰。科利尼是尼德兰革命的主要支持者。这场革命有可能成为一次针对西班牙（当时西欧天主教最重要的力量）的主要战争。然而，太后正是出身于西班牙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室家庭，因此，在信仰抉择面前，她那政治手腕的虚假面具被撕扯下来。天主教的主教此时又挑唆，说：“新教要利用波旁家族取得法国王位。”于是，太后凯瑟琳决心刺杀科利尼。但是，这次刺杀失败了，科利尼只受了重伤。巴黎的新教徒很不满，开始骚动起来。纳瓦拉的亨利（即亨利·德·波旁，时为纳瓦拉国王，也是当时法国胡格诺派领袖）也探望了科利尼，并会见查理九世，后者声称一定要查处凶手。

这时，太后秘密地告诉国王，她就是那个凶手；而且新教徒现在已经蠢蠢欲动了，如果不先下手为强，新教徒会在巴黎发动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懦弱、无主见的查理九世崩溃了，下达了屠杀新教徒的命令，实际执行屠杀的是吉斯公爵、安茹公爵以及他们手下的天主教极端分子。屠杀在一场骗局中开始。

2、经过

太后假借女儿玛格丽特公主和纳瓦拉的亨利联姻，邀请了许多胡格诺派新教徒，说要藉此结好新教徒。婚礼定于1572年8月24日，这一天是圣巴多罗买日。这些胡格诺派信徒都觉得这是王室转变的好机会，便纷纷穿着婚礼服在巴黎聚集，前来祝贺公主和王子的婚礼。不料，太后埋伏了大批军队，突然展开屠杀，当场就有3000名新教徒殉难，尸横街头，黎明前，科利尼和其他12个胡格诺派的领袖也在巴黎被暗杀。屠杀进行了三天三夜，并且在各城市同时展开。全国共有5万多新教徒殉道，二十五万名新教徒被迫流落到德意志新教诸邦、英国和荷兰，远的则抵达南非的好望角或北美。在柏林，被迫到此避难的法国难民人数占到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此法国成为教会荒芜之地。

启 6:9-10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3、撒但的庆祝

死难者的尸体堆积在塞纳河里长达数月，以至于没人敢吃河里的鱼。闻此消息，教皇贵格利十三世欣喜若狂，罗马所有的钟都为庆祝这次胜利而敲响。意大利教廷竟然为此发行了纪念币，以示纪念；教皇还委任著名画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绘制了一幅壁画来庆祝这次屠杀（见图 4.40）；在巴黎，现代诗歌和音乐学院的创始人让·安托万·德·巴伊夫（Jean Antoine de Baïf）也写下了极度赞美这次杀戮的十四行诗，以示庆祝。我们再次看到撒但所露出来的狰狞面目。著名作家大仲马在 1845 年根据这段历史写了小说《玛戈皇后》。



图 4.40 乔尔乔·瓦萨里《圣巴多罗买之夜》

第四节 南特赦令

1、三亨利之战

被太后胁迫而签署了屠杀令之后，查理九世可能始终为此自责、郁郁寡欢，两年后去世（传说是被太后误毒死）。太后安排自己与亨利二世的另一个儿子亨利从波兰回国即位为法国国王，称为亨利三世。但他从小叛逆，对任何宗教都不感兴趣，只是小时因传统而归入天主教。纳瓦拉的亨利在大屠杀中被迫改信天主教，才保住性命。

1576 年 5 月，亨利三世签署了《博利厄赦令》，谴责圣巴多罗买之夜的大屠杀，给予胡格诺派信徒担任公职的权利，引起吉斯家族强烈不满。1585 年，在取得西班牙的支持之后，吉斯公爵在南特重组天主教同盟，巴黎、里昂、波尔多、马赛、第戎等城市纷纷归附。1588 年 5 月 12 日，吉斯公爵的亨利一世进驻巴黎，国王亨利三世逃出巴黎，并在里昂签署联盟赦令，假意满足了天主教联盟的一切要求。同年 12 月，国王设了一次“鸿门宴”与天主教会晤，命近卫军暗杀了吉斯公爵亨利一世与其弟。在吉斯公爵的继任者梅恩公爵夏尔·吉斯的领导下，吉斯集团在巴黎宣布废黜国王亨利三世，拥立天主教的查理为国王，称“查理十世”，并成立以吉斯家族为首的新政权。受到两派夹攻的亨利三世不得已同纳瓦拉的亨利结盟。1589 年 8 月 1 日，两亨利一同进攻巴黎。屯兵巴黎

第四部 宗教改革史

西南郊时，亨利三世在雅各宾修道院被一名多明我会修士刺死。

亨利三世被刺身亡，死前将王位传给纳瓦拉的亨利，后者即位为国王称亨利四世。然而天主教对此拒不承认，内战战火继续燃烧。亨利四世不断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无法攻入巴黎。而巴黎此时绝大部分人口都信仰天主教，新教徒死、走、逃亡，所剩很少。为取得民众支持，亨利四世于1593年7月25日在圣德尼大教堂正式改信天主教。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凯旋进入巴黎，受到隆重欢迎。此后的四年中，各地纷纷归附。亨利四世还赶走了混战之中攻入法国的西班牙军队。亨利四世最终统一了法国，开创了波旁王朝。

2、颁布《南特赦令》

在纳瓦拉时，亨利·德·波旁（即亨利四世）跟随母亲信奉胡格诺派。由于亨利的法国贵族身份，在继位为纳瓦拉国王的同时，他也就成了法国胡格诺派的领袖。尽管亨利四世因惨案的发生和王权继承而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但他心中对新教毕竟仍存好感。即位后，亨利四世立即发布《南特赦令》，承认天主教仍为法兰西国教，但也让胡格诺派改革宗信徒享有宗教自由。但亨利四世这种靠否认主名换来的赦令自然不是教会的长久保护。他竟然又娶了天主教美第奇家族的玛丽，使得子女尽归天主教。他死后，长子路易十三即位。撒但借婚姻再一次占领法国的计策似乎成功了。

3、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出生于1601年9月27日，是波旁王朝开国君主亨利四世的长子。1610年，路易十三登基，因年幼，其母玛丽·德·美第奇摄政。太后的家族与西班牙关系密切，所以太后实行了天主教统治，天主教贵族势力再次恢复。1615年，在太后的主导下，路易十三与西班牙公主安娜结婚。

4、路易十四

1643年5月14日，路易十三因骑马落水引起的肺炎而去世，长子路易十四即位。上台后，路易十四立即撤销了《南特赦令》，再次对新教徒展开逼迫，法国的改革宗再也没有兴旺起来。从此之后，法国成了人类历史上大革命的发源地。路易十四一共执政72年，是世界上有准确历史记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

第七章 天主教反改革会议与三十年战争

第一节 天特会议

1、天特会议内容

为了应对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教皇保罗三世召集了一次大会，地点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的小城天特（Trent），时间从1545年到1563年，一共18年。这次会议象征教皇制反改革的“成功”，也为罗马天主教会拟订一份信经——《反改教运动信经》。

《反改教运动信经》包括以下内容：（1）废止售卖赎罪券；（2）反对改革宗一向秉持的教义；（3）重新肯定武加大译本为圣经权威版本；（4）制定弥撒礼仪（Tridentine Mass），即只能用拉丁文举行的弥撒礼仪（这使得弥撒完全成为偶像崇拜的仪式。因为当时懂得拉丁文的民族已经很少，包括神父、主教们自己也不懂，所以在弥撒中念诵的祷词和佛教念经一模一样）；（5）在教理方面，天主教会采取“完全闭关主义”，对改教家攻击的天主教教义既不作妥协，也不加修改。

对于如何看待新教，罗马教廷采取以下措施：（1）宣布罗马教会的一切传统和教义与圣经具有同等地位；（2）所有信徒必须承认教皇之神圣性；（3）宣布马丁·路德所谓因信心而获赎罪的“因信称义”之说为异端；（4）罗马教会的所有神甫、主教及大主教都必须以基督之清静生活为道德标准。

2、天主教复兴举措

为了复兴天主教，教廷采取了以下措施：

（1）颁布禁书目录

教廷总结出经验和教训，认为新教之所以传播甚快与他们的书籍分不开，所以在天特会议上提交了一份禁书目录。1559年，第一版《禁书目录》在教皇保罗四世的亲自监督下编定及颁布，凡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均列于其中。教廷禁止自己管辖领土内的任何人阅读。这一招可谓毒辣至极，从此天主教内宗教改革几乎停止。

（2）加强异教裁判所

异教裁判所继续工作。凡加入改教运动的人，即刻下监、被杀或被逐。教廷故技重施，却没有明显效果。

（3）支持耶稣会

1534年，罗耀拉和方济各·沙勿略二人在巴黎大学组织了耶稣会，旨在领人归回天主教，得回他们所丧失之地。天特会议上，耶稣会得到教皇支持，并在后来的一百年里获得巨大成功。由于后代教会的再一次堕落，几乎大部分基督教领地重新回到天主教怀抱。1580年进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就属于耶稣会。

第二节 三十年战争

1、导火索

三十年战争，是指1618年至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大陆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是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的最后大对决。

1609年7月10日，天主教诸侯在慕尼黑召开会议，成立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为首的天主教联盟。

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撕毁了《奥斯堡和约》，在捷克（波希米亚）恢复天主教，指定斐迪南二世为捷克国王。斐迪南二世下令禁止布拉格新教徒的宗教活动，拆毁其教堂，从而引起新教徒的不满。一些激进的群众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口抛入壕沟，史称“掷出窗外事件”。1619年，新教徒成立临时政府，由30位成员组成，宣布波希米亚独立。

天主教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大规模收复被新教占领的失地的运动，而新教联盟也纷纷参战，抵抗天主教的军事复辟，于是三十年战争爆发。



图 4.41 掷出窗外事件

2、经过

整场战争共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捷克阶段（1618年—1624年）、丹麦阶段（1625年—1629年）、瑞典阶段（1630年—1635年）和全欧混战阶段（1636年—1648年）。

1619年，波希米亚革命政府成立后，马克西米连突然驾崩，斐迪南二世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新教徒拒绝承认斐迪南为德皇，自行推选腓特烈为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正式即位为波希米亚王，称为腓特烈五世，他积极抵抗德国天主教军队。1620年，波西

第七章 天主教反改革会议与三十年战争

米亚军直逼奥地利的维也纳。德皇斐迪南二世一方面派代表同新教领袖谈判，另一方面派人去西班牙搬救兵。新教贵族同意谈判，西班牙军队却在一天夜里抵达，斐迪南二世的军队也发起进攻，新教军队两面受敌，溃不成军，只好退回捷克。11月初，布拉格陷落，波希米亚再次被天主教占领。占领波希米亚后，德皇斐迪南二世展开一连串行动：逮捕新教领袖并处死；没收新教贵族财产；撕毁“宗教自由令”；下令禁止一切宗教自由，国民一律改信天主教。1621年，“新教联盟”被迫宣告解散，新教徒惨败。

1625年，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信奉新教的丹麦王与新教联盟共同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动进攻，节节得胜，天主教军队节节失利。后来，斐迪南二世启用了著名的军事将领瓦伦斯坦，天主教又取得主动。丹麦被迫退出战争。

危机时刻，信奉新教的瑞典军队加入战斗，形势逆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卢塞恩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战死。瓦伦斯坦后来被斐迪南二世猜忌，被刺。1634年9月，斐迪南二世联合西班牙盟军于纳德林根会战大败瑞典军，逼使瑞典军撤回波罗的海沿岸，最终双方签订了《布拉格和约》。

此时历来是天主教国家却又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合的法国突然参战，支持新教联盟。丹麦也加入战争。欧洲进入混战阶段。参战双方展开拉锯战，持续14年才告结束。三十年战争使整个德国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使法国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

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45年3月，瑞典军在波希米亚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同年8月法军又于纳德林根会战击溃神圣罗马帝国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领土大部分被占领。1648年，法、瑞两国联军再在马斯豪森会战及兰斯会战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但战至此时，双方都已元气大伤，结果于该年10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彻底结束。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本质就是格老秀斯国家法律思想的体现：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民族或个人，信仰是小事，最主要的是和平共处，所以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其实这个谎言欺骗了多少神的儿女！看看今天的世界，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他们的确能和平共处，但是他们和神的儿女能够和平共处吗？人们此后不再为宗教争战了，但那些所谓“为了国家利益”的战争却如潮水般涌入这个罪恶的世界。

启 12:17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第八章 英国清教徒运动

钟马田这样评价清教徒：当初“清教徒”这一名称只是对不从英国国教者的称呼，而今天“清教徒”一词已成为那些在敬拜和生活上都严守圣经的敬虔信徒的总称。

今天，“清教徒”所指的已经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种对待信仰的精神……绝没有理论和学术上的清教徒。不错，有人对清教徒的思想很感兴趣，但是，除非他能实践出这些思想，否则他就是清教徒的敌人。

第一节 清教徒的产生

1、亨利八世残暴统治下的对抗

1529年，亨利八世进行了宗教改革，但其改革主要是将教皇对教会的绝对控制权纳入王权之下。此时的基督教改革只是从形式上与罗马教会分离，而内容上保留了大量的天主教遗产。1536年，国会颁布了《国王陛下为基督教安定制定的条款》，通称《十条条款法》（The Ten Articles），其中五条论述教义、五条论述礼仪。《十条条款法》仍然肯定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和礼仪，其中涉及改革的内容微乎其微，甚至连炼狱说和教堂偶像也未被否定。理查德·雷克斯教授说：“亨利八世所有改革的目标都是以扩张王权为基础的。”因为除了取缔修道院和使用英语版圣经这两项改革带有新教性质之外，其他的改革都没有真正触及英国教会的天主教性质。所以亨利八世仍是新教的逼迫者。

1536年，亨利八世处死了改教家丁道尔。1538年，一位名叫兰伯特（Lobort）的教士也因反对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被投入火堆。1539年，亨利八世又操纵议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法案》，简称《六条款法》（当时被称为“带六根刺的血腥鞭子”）；其中规定凡轻忽圣事或否认圣餐饼酒的变质说的人都是犯异端罪，处以火刑，没收财产。它颁布后两周之内，仅伦敦地区就有五百人被捕。1540年，三个坚持路德“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的人成为殉道者。1543年，亨利八世又颁布诏令，禁止下层阶级人民阅读圣经。在1546年6月的一天里，亨利八世就处决了三名私自阅读和翻译圣经的新教徒。

到了晚年，亨利八世骨子里的天主教信仰表现得更加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改变传统的礼拜仪式和教会戒律的企图。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后期，无数人民被指控为异端，遭受残暴的刑罚，但是为了坚持真理而宁可舍掉性命也不屈从于强权的种子，借着这些殉道者的鲜血已经种在教会的田里。这就是清教徒的精神。

2、《公祷书》之争

1547年，爱德华六世召开第一届议会，废除亨利八世的《六条款法》，确立了英国国教会（又称为：圣公会、安立甘宗）的正统地位。

早在亨利八世时期，克蓝麦所起草的四十五条《公祷书》，就遭到约翰·诺克斯等人的反对。1549年12月，约翰·胡珀（Hooper, 1495-1555）对刚刚诞生的爱德华六世《第一公祷书》提出非议，这是迄今所能发现的英国宗教改革家对带有天主教成分的正统教会进行抨击的最早记录，因此标志着清教主义的出现，胡珀因而获得了“清教之父”的美称。胡珀对《第一公祷书》中有关圣品阶级的规定极为不满，对其中的圣餐条文也表示反感，特别是里面强迫信徒跪领圣餐这项条款。后来胡珀和约翰·诺克斯通过极力反对，

并利用爱德华六世的改教热忱进行不懈努力,最后使得爱德华六世同意在后面加上附注:“跪领容易导致偶像崇拜的覆辙,应注意。”但许多人对其他多处仍存有不满,特别是主教在分领圣餐时必须穿圣餐服。

1552年,克蓝麦写成了《四十二条信纲》,全面而概括地阐述了英国国教会的信仰原则。1553年的宗教会议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这份宗教文件《四十二条信纲》,因此具有绝对权威性。

3、伊丽莎白一世坚持圣公会体制

伊丽莎白继位后,于1534年再次承认由亨利八世制定并由爱德华六世发展的《至尊法案》依然有效,只是把“国王是英格兰教会在地上之唯一最高元首”改为“女王(即国王)是英格兰教会在地上之唯一最高长官”。伊丽莎白第一届议会也通过了《信仰划一法》。

此时,清教徒们要求废除《公祷书》中所有无圣经根据的天主教崇拜仪式,例如,洗礼时在额前画十字架、婚礼上交换戒指、敬拜用管风琴、领受圣餐要下跪、妇女要带面纱进入教堂等。这时的斗争已经从法衣之争扩展到礼仪之争。起初,清教徒以为国教会保留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是暂时的。

1563年,清教徒在坎特伯雷教职会议的总会议(Convocation)上提出方案《六点措施》,要求全面改革国教会的崇拜仪式。《六点措施》的主要内容有:取消除主日及圣诞节等主要节日外的所有节庆;牧师在公共崇拜时,应面对信徒,阅读指定的圣经,以使在场的人都能够听到并领受启示;取消洗礼时在额前划十字的仪式,以免把人们导向迷信;各主教区自行斟酌是否跪领圣餐;牧师在举行圣礼时只需临时穿一下白色衣服即可;停止使用教堂内的管风琴。

虽然《六点措施》的语气比较温和,但结果却是,清教徒以58票比59票的一票之差落败。这次事件成为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清教徒在英国国教内改革努力的失败。

总会议规定,全国教堂都应以新制定的《公祷书》作为唯一的礼仪标准。任何人如若不按《公祷书》作祈祷,或怂恿他人这么做,或蓄意破坏《公祷书》,将被剥夺教职或公职;情节严重者,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伊丽莎白由于刚刚执政,内忧外患非常多,所以对反对《公祷书》的人士给予宽容和默许。

16世纪70年代以后,有一些人开始抨击主教制度,主张改革教会组织,建立日内瓦形式的“长老会”。剑桥是英国长老派的起源地。1569年,著名的长老派首领卡特·赖特在剑桥发表一系列演讲宣传其主张。卡特·赖特根据《使徒行传》提出,由牧师和长老共同管理的长老会制度是符合圣经的,主张按加尔文宗的组织体系建立改革宗长老制教会,由平信徒选举的长老和牧师组成长老会主持教会工作,国家不得干预教会。地方堂会由众长老进行管理,各堂会的长老和牧师组成教区长老会,各教区的长老会组成全国性的长老会议,由全国的长老会统一协调全国的宗教事务。长老制教会体制可以有效地削弱个人专权,并限制君主的权力。

1571年,著名的牧师约翰·菲尔德(Field)在伦敦创立了“先知会议”和“圣经研讨会”。到了80年代,全国不少地区都有其分支机构,参与的人多是国教会中的长老派。这些组织机构的形成和发展是清教徒从国教会分离的先兆。此时长老派虽然没有同国教会公开分裂,但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从这时起,清教徒已经基本成形了。

第四部 宗教改革

1572年，约翰·菲尔德和托马斯·威尔科斯出版了《致议会的劝告》（An Admonition to The Parliament）一书，试图通过议会来扩大清教徒的影响。他们抨击主教制，指出主教制是“反基督的、与圣经相抵触的”；并要求以长老制取代主教制，以实现牧师权力的平等。他们主张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王权不能违反上帝的话语，而是应该服从圣经——该主张的实质是用圣经来限制王权。长老派把斗争矛头直指向国王的御用工具——主教制，并要求议会改组教会，废除主教制，实行长老制。这时的清教徒还并不主张脱离国教会，只是希望通过内部改革来使英国教会由主教制逐步过渡到长老制。

1583年，惠特·吉夫特继任坎特伯雷主教，并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下，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清教徒，对清教徒进行大肆搜捕迫害。

1587年9月，长老会代表齐聚剑桥圣约翰学院，在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长老会会议。这些长老会代表主要来自伦敦、英国东部和中部。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主要讨论敬拜的仪式，颁布了《教规》，并考虑脱离国教会，建立独立的教会组织。

1588年7月，英国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一举消除了天主教国家的入侵威胁，国内的天主教集团也随之土崩瓦解。当天主教危机缓解后，伊丽莎白便一改之前对清教运动的宽容态度，在全国实行宗教统一，宣布全国必须统一在英国国教会的旗帜下。女王的宽容态度已经不复存在，清教徒运动面临着第一次大逼迫。长老派的领袖菲尔德去世，卡特·赖特被捕入狱，特拉弗斯流亡外国，清教长老会的运动自此由盛而衰。

4、分离派清教徒产生

早在1567年，理查德·菲茨就曾经尝试过脱离国教会，自行建立教会组织，但遭到国教会的镇压。菲茨等领导人被捕遇难，致使他们的分离活动失败，这是清教徒脱离国教会的首次尝试。

80年代初期，随着国教会对清教徒的逼迫，那些立志于改革国教会的清教徒渐渐失望，于是分离派清教徒产生了。清教分离活动的时机成熟了，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1582年，分离派的领袖罗伯特·布朗写了《改革不为任何人而耽延》、《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和方式》等著作，为分离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此，分离主义者被称为“布朗分子”。

无论是现在的都铎王朝，还是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国教会一直具有这一特征——与国家联系密切。布朗认为，教会应该独立于国家之外，是一群或若干在上帝和基督的统治下自愿与主立约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组织。每一个教会都在基督之下，由全体信徒共同管理。“他们不允许神职作为一个独特的阶级给人不可磨灭的地位或印象。”他们选举一个信徒，给予他管理教会的权威，但是大众也有权利解除他的职务。教会间的关系也是同等的、平级的，一个教会的权力不应超越另一个。“若是其他教会无序或是放弃了首要的基督真理，一个教会可以给他忠告、建议或警告；如果一个犯罪的教会不接受，那么其他教会就要集体否认他是一个基督的教会。”

布朗分子否认英格兰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也否认英格兰教会发布的命令。之后，布朗和哈里森建立了教会，分离派正式形成。由于分离派的激进主张，布朗曾先后两次入狱，后决定把分离运动迁到尼德兰。但是在英国仍有分离派的活动，主要领袖是格林伍德和巴罗。他们也秘密地建立了教会并举行礼拜，后遭到逮捕；但在狱中仍坚持写作，

主要抨击国教会，阐述其分离的重要意义。长老派中的清教徒也有受其影响并成为分离主义者的，主要有约翰·彭利和法兰西斯·约翰逊。

1589年，大主教班克罗夫特在伦敦布道时宣布“主教制的英国教会与外国的加尔文宗教会，尤其是与苏格兰的长老制教会截然不同”。这一讲道确定了英国国教会的性质，国教会从内部改革的可能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理查德·胡克出版了巨著《论国家教会组织的法律》，提出了“宗教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王对国民统治决不能放弃管理教会的权力，主教制是最合理的制度”的观点，为国教会和伊丽莎白女王辩护，也为英国国教体制奠定了神学基础，使国教会给人以积极、正面的形象。然而，在清教徒看来，这些言论使得国教会不再是一个没有彻底进行宗教改革的宗派，而是一个脱离元首基督、和天主教一样的假教会。在这种情况下，清教徒依附于国教会已彻底没有希望和前途，唯有与其决裂，离开这牢笼选民的巴比伦。

1593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针对分离分子的《女王臣民效忠法》，规定无故不参加国教会，或是反对女王对教会权力的人，应给予严重处罚。之后，因为宣扬分离派的主张，格林·伍德、巴罗和彭利等其他一些弟兄陆续被推上了绞刑架，惨被处死，其余大部分逃到荷兰，分离派的教会也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分离运动失败了。

第二节 詹姆斯一世对清教徒的第一次逼迫

1、詹姆斯一世的国教政策

詹姆斯一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与第二任丈夫达恩利伯爵亨利·斯图亚特(Henry Stuart)唯一的儿子。詹姆斯出生后5个月，其父死亡，其母遭苏格兰贵族驱逐、流亡英格兰。1567年，苏格兰贵族废黜玛丽·斯图亚特，詹姆斯被立为国王，称为詹姆斯六世。1583年，詹姆斯六世亲政。1587年，玛丽·斯图亚特因卷入暗杀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阴谋而被处死。同年，詹姆斯迎娶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女儿安妮公主。1603年，在指定都铎家族唯一至近的后人詹姆斯为英格兰的国王继承人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即位为英格兰国王，称为詹姆斯一世，英国从此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图 4.42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同时又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

第四部 宗教改革

还在苏格兰作国王的时候，詹姆斯一世就写过两篇论文《皇帝的天才》和《自由君主制的正确规范》，在其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专制思想，其封建专制观点中极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仇恨英国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公然说：“宗教改革是件坏事情，因为它宣扬平等，而平等是秩序和秩序奠基者统一的大敌。”但这一切竟然没有引起教会的注意。

詹姆斯一世认为维护和实现宗教的统一是国王的宗教职责。詹姆斯一世登基后面临的第一个宗教问题便是“千人请愿书”——有超过一千名清教徒牧师在此请愿书中抗议《公祷书》改革不够彻底的地方，故称之为“千人请愿书”。清教徒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向新国王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主张，并提出四项改革要求：（1）废除国教会保留的天主教的礼仪；（2）清除教会中的腐败现象；（3）重申讲道的重要性；（4）对不同宗派的人士放宽限制。

1604年1月，詹姆斯一世在伦敦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召开会议，听取清教徒和国教会信徒各自的宗教见解。在会议开始期间，詹姆斯一世的态度和蔼，并没有严厉斥责清教徒，然而最后却一反常态，宣称“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并反对清教长老会干预政务。这样他就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圣公会的立场。

这一年，在詹姆斯一世的支持下，国教会的主教们制定了141条的《教规法典》，其中涉及宗教的各个方面和教会的各个领域，强迫清教徒必须完全服从国教会，以维护国教会的统一。《教规法典》包含以下内容：

（1）宣称英国国教会是真正的使徒统绪的教会；

（2）谴责那些坚持认为《公祷书》、《三十九条信纲》含有迷信成分的人；

（3）反对任何宣扬由大主教、主教、教长、执事长及其他官员组成的英国国教会的组织和戒律是反基督和与圣经相抵触的观点；

（4）要求所有获得圣职或讲道许可证的教士必须宣誓声明他们自愿地、由衷地赞成《至尊法案》、《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

詹姆斯一世立即批准了《教规法典》，并指示所有教士必须在12月1日以前按法典的要求做宣誓。国王威胁清教徒，说：“如果你们不服从，我会把你们赶出这块地方，甚至更糟”。

2、组织翻译圣经

对于清教徒的要求，詹姆斯一世唯一满足他们的，就是同意组织翻译圣经。在汉普顿宫会议上，雷诺兹提出应该重新将圣经翻译成英语并统一发行。这一主张得到了詹姆斯一世的赞许。詹姆斯一世针对圣经版本纷杂、内容各异的情况，组织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威斯敏斯特的大批学者，要求他们在尽量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前提下重新翻译圣经。

1611年，英国出版了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简称KJV）。这一圣经译本直到今天仍在英语世界通用。钦定版圣经主要以丁道尔圣经为蓝本，但由于丁道尔为亨利八世所杀，所以KJV里面未署他的名字。

3、独立派清教徒成立公理会

17世纪初期，亨利·雅各和约翰·罗宾逊组建了一间教会，为第一个公理制教会或独立派教会。

雅各曾经参加长老派的请愿书活动，但遭到失败的打击。在1605年左右，一群有相同想法的清教徒聚集在一起，商讨组建独立的教会。他们与分离派不同——分离派否认国教会和国王的权威，而独立派承认国教会和国王对教会的权威。“他们愿意承认英格兰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在英格兰国教会之内，无论如何都有真的教会和真的基督徒；他们也并没有把自己完全从其中分离出去。”而且当有分离主义者谴责国教会不是真正的教会时，雅各还特意撰文为国教会辩护，所以独立派只能算是半分离主义者。雅各曾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教会观：“一个真正可见的，或者说是有牧师的基督的教会，是一个特别的集会，是众信徒完全的属灵协作。它自身拥有直接来自于基督的能力，以管理它的成员的所有宗教信仰事务。”而对于如何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他也有自己的主张：“众信徒自由地认同基督和他的使徒们在福音中所建立和实践的宗教和道德责任，从而彼此联结和立约，共同成为一个神圣的社群的成员。”教会就是在基督带领之下，信徒彼此认同并共同管理的一个团契。沃尔克认为独立派持有这样一种理念，就是“不主张脱离国教会的公理宗观点”。总之，独立派承认国教会的权威，采用公理制的教会管理模式，独自举行礼拜仪式。

1610年左右，曾是分离派的约翰·罗宾逊受到雅各文章的影响，也变成了一位独立派人士。之后他发表的两篇论文《教义问答》和《与国教分离的合理性》，成为公理宗的权威文献。1616年，雅各和罗宾逊建立了伦敦的萨瑟克（Southwark）独立教会，雅各被按立为牧师。

当时，当地的原分离派教会几乎被消灭殆尽。他们向这些零星的教会纷纷发出邀请函，阐明公理会的二十八条主张。我们从其中摘录部分主张如下：（1）基督的职分；（2）圣经的全备性；（3）教会的标记；（4）有形教会的形式；（5）教会会议和大公会议；（6）关于主教、大主教；（7）关于牧师任命，牧师的呼召本质是众会赞成；（8）清楚有序的语言是为更好地解释圣经……

在教义上，公理会基本采用加尔文的思想，属于纯正的改革宗教会；但在治理形式上，公理会和长老会有很大不同——他们不赞成设立统管各教会的上级机构（教区、区会制度），仅允许设立各教会自由参加的联谊性机构。他们主张堂会间完全独立治理，堂会间的联合只是在教义真理上的互助，没有任何体制上的联系。堂会就是教会的最高代表，全体信徒对教会事务行使平等权利，民主选举、聘任牧师。

公理会的有些思想比今天的长老会显得偏激，比如其中第23条：“牧师不应该举办婚礼和葬礼，那是民事长官的事，他们的事奉就是上帝的圣言。”其中第26条也和长老会观点不同：“不把十分之一作为劝惩信徒的条例，并要让信徒自愿奉献。”

第三节 詹姆斯一世的继续逼迫和五月花号

1、詹姆斯一世逐渐靠近天主教政策

詹姆斯一世统治初期对天主教若即若离。他表面上利用国教会彻底镇压天主教，但本质上还是要国教会越来越趋向天主教的信仰。

他不仅迫使英格兰的清教徒、天主教徒统一服从于国教，而且还将此要求扩大到整个不列颠。在1618年8月的珀斯会议（Assembly of Perth）上，为使苏格兰教会和英国国教会的礼仪保持一致，詹姆斯一世强迫苏格兰神职人员接受下列条款：跪领圣餐，严

第四部 宗教改革

格遵守圣餐礼、洗礼以及儿童的坚信礼。他还试图在苏格兰强制推行主教制。然而他的统一愿望遭到了苏格兰长老会的抵制。

在外交上，詹姆斯一世主要还是联络天主教国家。他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德国新教的腓特烈（Frederick），却试图让自己的继承人查理王子和西班牙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公主结婚。但查理最终娶了法国信奉天主教的路易十四的女儿。当三十年战争时，尽管德国王储腓特烈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而且他们都是新教国家，但詹姆斯一世却未对之进行有力援助。而且他继续暗暗与天主教的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继续进行与西班牙联姻的谈判。1621年，议会反对詹姆斯一世同西班牙联姻的政策，触怒了国王。詹姆斯不理会议会的反对，放松对天主教的处罚法律，开始对天主教执行宽容政策。议会的新议员约翰·皮姆（John Pym）指出：“如果天主教得到默许，天主教徒就会要求得到宽容，进而要求平等，进而获得宗教优势，最终将铲除其他对立的宗教。”

2、抵挡诫命颁布《娱乐声明》

虽然国教会与清教徒之间势如水火，但斯图亚特王朝的一些主教对清教徒却是极其宽容和友好。约克大主教赫顿（Hutton）以及他的继任者马太（Mathew）就不干预教区内清教徒的活动，使清教徒牧师能够广泛地进行讲道传教。坎特伯雷大主教艾伯特（Abbott）也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他同情清教徒，在任职期间用相当被动的方式来维护圣公会的权威。这些主教的宽容和友好使得16世纪晚期改革宗清教徒的人数猛增。他们努力照上帝的道德律生活，特别是在安息日的诫命上，在主日这一天整日合乎律法地敬拜神。在主日禁止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英国民间流行星期日围绕五月花柱跳舞的习俗，但由于清教徒改革宗教会的见证，许多乡镇停止了这些传统活动。撒但历来拆毁教会的三大工具就是偶像、安息日和婚姻，而现在人们尊重安息日，魔鬼可慌了手脚。

1618年，詹姆斯一世颁布了《娱乐声明》（Declaration of Sports），反对清教徒在部分地区强制禁止众人在星期日敬拜后参与娱乐活动。《娱乐声明》记录了一系列安息日可以进行的活动和消遣，并指出清教徒禁止人民在星期日进行娱乐活动会使得民众身体羸弱，从而心怀不满、威胁社会安宁。詹姆斯一世指示所有教士在教区教堂中宣读这一声明，各级神职人员应认真训诲信徒遵守国法教规，信徒务必在星期日礼拜后参加娱乐和体育活动，违者严惩。

3、五月花号前往新大陆

国王的大逼迫日趋厉害。在司克罗比，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独立派的秘密聚会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些清教徒们萌生了向大洋彼岸逃亡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准备，在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的领导下，第一批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和柏泊娜号从英国的一个港口普利茅斯起航，前往新大陆去寻找他们的宗教自由。然而，刚启程时由于柏泊娜号受损严重，两船的人就合并到五月花号一艘船上。

1620年9月6日，102名乘客登上了重180吨长90英尺的木制帆船——五月花号，开始了哥伦布远征式的冒险航行。对于航海来说，这艘船只未免太小了，而且由于形势所迫，他们“选择”的，又是一年中最危险的渡洋季节。但这些不利因素拦阻不了他们寻找信仰自由的决心。这群饱经忧患的人虽然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不过，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为了找回失去的权利和自由，靠着上帝赐给他们的坚定信仰，依然前行，且蒙上帝一路保守。

他们从英国南安普顿市（Southampton）的普利茅斯出发，船上的 102 名乘客历经艰辛。海上风急浪高，五月花号就像狂风暴雨中的一片树叶，艰难地向前漂泊着，几乎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危险。但在大家的共同祷告和努力下，船只没有遇到大的损害，并在航行了 66 天后，于 11 月 21 日安抵北美大陆的科德角，即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港。稍事休整后，五月花号继续沿海岸线前进。由于逆风和时差，他们没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反而在圣诞节后的第一天，被大风送上了新英格兰的土地——这就是他们在美国的普利茅斯家园。



图 4.43 风浪中的五月花号

按照古老的航海传统，他们首先登上了一块高耸于海面上的大礁石。这块礁石就被称为“普利茅斯石”，成为美洲新英格兰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的历史见证。在这次充满危险的远征中，所有探险者中只有一人死亡，但有意思的是，由于旅途中诞生了一名婴儿，所以到达美洲的人不多不少，仍然是 102 名。移民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大家无不衷心感谢上帝的眷顾。1863 年，美国总统林肯正式宣布每逢 11 月第 4 个星期四为国定假日感恩节。

4、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清教徒的领袖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又译为：布莱福特）写了一本《普利茅斯拓荒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译本名为《五月花号公约签定始末》。

在船上，人们憧憬着美好的信仰生活——那里再也没有逼迫，再没有屠杀，人们完全按圣经自由地敬拜上帝，建立国民政府。为此，他们在船上签立了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公约中如此说：“我们所有在下列文件上签署姓名的人，是我们所敬畏的全权上帝的忠顺臣民。为了荣耀上帝、传播基督信仰以及我们国君的荣誉，我们远涉重洋，在弗吉尼亚北部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和彼此之间共同而神圣地宣布：为

第四部 宗教改革

了建立良好的秩序，保护我们的生命，推进上述的目的，我们在此立约组成一个公民政体；我们将不时地实施、制定和建立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最有效的和最有利于殖民地共同利益的公平的法律、法令、宪法及官员，我们承诺将服从和遵守这些法律和官员的管理。”

《五月花号公约》源于清教徒的以下思想：国家是民众以契约的形式同心合意组建而成，国家的公共权力源于国家是上帝用来维护民众信仰敬虔的工具；法律真正的实施力量来源于圣经，民众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而自愿服从，而不是慑于国家暴力；法律是为了维护上帝的荣耀和教会秩序及民众生活而制定的。

德国的兰克以及美国的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都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的真正国父，其立论基础当然是基于美国早期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清教徒是美国独立的中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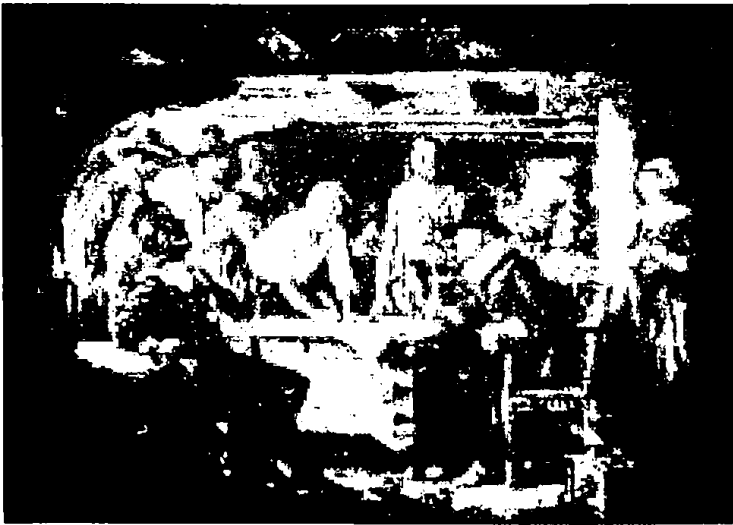


图 4.44 签立五月花号公约

5、新家园的新生活

不过，对这些渴望宗教自由的移民来说，第一个冬天并不美好。从大西洋上吹来了凛冽的寒风，移民们缺少必要的装备，也缺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经验。在繁忙劳动的重压下，不少人累病了、累倒了。就在移民们束手无策时，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名印第安人走进了普利茅斯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临近村落的印第安酋长派来察看情况的。这是移民们来到美洲后接待的第一个客人。几天后，这名印第安人把他的酋长马萨索德带进了移民们的房屋。酋长是个慷慨热情的人。他向移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给他们送来了许多生活必需品作礼物，并派来了最有经验、最能干的印第安人。他们教移民们捕鱼、狩猎、耕作以及饲养火鸡等技能，告诉移民们怎样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这一年，神格外赐福，风调雨顺，再加上印第安人的指导和帮助，移民们获得了大丰收，终于闯过了生活的难关，过上了安定、充裕的日子。就在这一年秋天，已成为普利茅斯总督的布拉福德颁布了举行盛典、感谢上帝眷顾的决定。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感恩节。印第安人欣然接受了邀请，提前送来了五只鹿作为礼物。11月底的一天，移民们大摆筵席，桌子上摆满了自山林中打来的野味和用自产的玉米、南瓜、笋瓜、火鸡等制作的佳肴。



图 4.45 第一个感恩节

从此，英国国内受迫害的清教徒纷纷投向这片自由的土地，出现了大批移民潮。1630年，七百人以温索为领袖，启程前往新大陆，马萨诸塞州海湾区的人口增加到9000人。这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后，在自由的氛围中建立他们的教会及家园。他们大多是极其敬虔、勤奋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采用长老会的形式管理教会，是日后美国民主政制的形成基础。他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以敬拜荣耀上帝为宗旨，同时也注意敬虔教育，创建了一批中学和训练传道人的大学，使真理在这片土地生根结果。

第四节 查理一世的天主教复辟

1、查理一世利用高派恢复天主教礼仪

1625年，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当了国王，称为查理一世。这位娶了天主教徒为妻子的国王，自己里面也一心想要恢复英国特色的天主教统治。

早在1610年左右，国教会中出现了—个崇尚传统的保守集团“高派教会”。他们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其中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为首领。新国王查理一世对劳德也十分赏识，英国国教会开始进入劳德时代。1633年，身为高派教会领袖的威廉·劳德成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强调在国教会实行更多传统天主教的礼仪。

这一时期恢复天主教传统这一宗教政策主要体现在教义和礼仪两方面。

首先，在教义方面，高派教会猛烈抨击加尔文主义，因为他们知道加尔文主义和主教统治势不两立。劳德明令禁止教士讲道时宣传预定论和拣选说，主张以亚米念主义取代加尔文主义。亚米念主义成了此时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会）的主要特征。

其次，在礼仪方面，他们直接恢复天主教传统。他们主要有以下主张：—、强调礼仪的重要性，贬低讲道的作用；提出高尚的外在习惯会潜移默化地使内在在灵魂变得高尚，教会礼仪的力量会在人的感官上留下深刻印象；二、反对简化礼仪，倡导礼仪上“神圣的华美”；提倡各教堂要安装各种木刻和彩色玻璃，以体现教堂的神圣，并制定了一项重建所有被废弃的教堂的庞大计划，试图耗费巨资修缮和装饰圣保罗大教堂；三、凡进入教堂的人必须行礼，不得随意走动，听到耶稣的名字要鞠躬。

第四部 宗教改革

除此之外，劳德的宗教政策还挑起了“圣餐桌之争”。按照天主教传统，教堂的圣餐桌安置在东端祭坛旁。以此增强圣餐的“神圣性”，劳德于1633年和1635年两次下令将所有教堂内的圣餐桌都要按照传统放回原处，并用钉子固定，不再做任何移动。劳德还解散了保护清教徒不动产继承权不受损害的机构。他的一系列宗教举措成了赤裸裸的复辟天主教的行为。

1634年，查理一世将教皇代理格雷·戈里奥安插进法院。继他之后，一大批教皇派教士被引入政府。劳德本人也身兼多种政府要职，伦敦主教贾克森（Juxon）被查理一世任命为财务大臣。教士们重返政界，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天主教的全盛时代一样。

2、严厉镇压清教徒

清教徒利用教师的职位继续在教会宣讲圣经正统教义。与此同时，人们心中继续被真理照亮。劳德也意识到了清教徒宣讲的危险，于是开展了清洗清教徒讲员的运动，以此来遏制清教徒势力的膨胀。劳德首先清洗掉暗中支持清教徒的国教会各教区主教，将这些主教送到高等宗教法庭受审讯；然后对大小教堂逐一排查。

劳德镇压清教徒的措施还有：（1）凡是拒绝穿法衣、带方形帽或举行圣餐时故意略去《公祷书》中某些内容的教士给以中止圣职、剥夺薪俸的处罚；（2）凡是宣扬或者同情改革宗观点的讲道人士则吊销其讲道许可证；（3）凡是倾向或者信奉清教的地方行政长官将受到最高宗教法庭的审讯；（4）凡是从事分离活动的人则被逐出英国。

1633年，在劳德的支持下，查理一世重新颁布了詹姆斯一世时期流产的《娱乐声明》，并且规定教士在各教区教堂宣读该声明。

国教会强行实行严格的宗教仪式，凡未到国教会做礼拜者被法庭传讯并给予罚款。劳德迫害清教徒也异常残忍，依仗宣传管理机构——星法院（Star Chamber）对各种出版物严加审查。出版物的审查权此时尚在主教手中，劳德则利用这项大权取缔了一切反对的言论。清教徒作家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不得擅自出版和报道任何关于宗教、国教会和国家事务的书籍。为了进一步加强这项法规，1637年，星法院重新颁布了一项法令：“未得到国教会许可，任何书籍和小册子不准印刷和再版，任何外国书籍不得销售。如果有人未经允许擅自出版书籍，那么他将受到上枷锁或者鞭笞的惩罚。”

劳德对清教徒作家更是施行血腥的迫害政策，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便是国教会镇压清教徒的莱顿（Leighton）、布莱恩（Prone）、巴斯特维克（Bastwick）和伯顿（Burton）等案件。

1630年，莱顿撰写了《告议会书：基督教反对主教统治的请求》，为此他受到残酷的迫害。在被判缴纳一万英镑罚款及终身监禁后，他先后受到上枷锁、鞭笞、额头烙印、切开鼻子及割去一只耳朵等一系列酷刑。之后，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寒冷的小室内。那里住满了老鼠和虱子，风与雪直入窗子。他的头发落光了、皮肤也脱落了。1634年，律师布莱恩在《来自伊普斯威奇的消息》（News From Ipswich）一书中攻击安息日娱乐活动以及教堂里的风琴和绘画，谴责劳德的主教制度是教皇与恶魔的奴仆。因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缴纳五千英镑罚款后，他被割去双耳，打入终身监禁的牢房。医生巴斯特维克因著书宣称长老和主教具有同等权威而被革除教籍、判处罚款1,000英镑和关押到公开认错。牧师伯顿则由于对“高派教会”宗教政策表示不满而被投入监狱。

1637年，劳德下令对除了莱顿之外的其他三人重新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是：布莱恩三年前被割下的耳朵根部再被完全剃去，巴斯特维克和伯顿则在威斯敏斯特受枷刑，并被割去双耳。受刑后，三人都被押往海岛服终身劳役。

劳德残酷的迫害政策使得一些清教徒不得不逃亡。1630年至1640年劳德任大主教这十年间，逃往国外的清教徒约有65,000人；新英格兰在马萨诸塞涌现出20座城镇和教会，总共16,000人。到1640年，移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达两万多人。国内清教徒的势力也没有因逼迫而消亡，反而仍然不断扩大，重演了初代教会在狮子坑的大复兴。

3、查理一世镇压苏格兰的反抗

1637年，查理一世下令全苏格兰教会在主要礼仪上必须使用英国国教会的《公祷书》，激起了全苏格兰人民的武装反抗。1638年，起义人民订立“神圣盟约”，反对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英国国教会。同年12月，苏格兰取消主教制教会。查理一世先后于1639年和1640年两次派兵镇压苏格兰，均遭失败。查理一世为筹集对苏格兰的战争经费，曾先后两次召开议会。这时候清教徒已经成为议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反对国王的天主教复辟政策。

4、议会重新恢复

议会恢复后就宣布：“由于过分纵容导致的对天主教的容忍和由此而来的天主教徒的增加，是本届以及前任议会最大的失误。”议会恢复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释放被劳德判为终身监禁的三名清教徒布莱恩、巴斯特维克和伯顿，以此表明其与国教会对立的立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议会采取一系列宗教措施来取缔圣公会。

他们以圣经为旗帜，反对迫害清教徒，并开始弹劾大主教劳德、指控圣公会的权威。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大主教劳德的历史，控告其犯有叛逆罪。1641年2月，议会通过针对大主教的十四条弹劾令，劳德遂被禁于伦敦塔中。不久，劳德的助手雷恩与皮尔斯也被关进了伦敦塔。在成功清除了高派教会派的领袖之后，议会又在弹劾名单上列了其余13个主教的名字。

有人不禁会想：英国政局为何如此迅速地从乌云密布的黑暗中逆转呢？这皆是因为那些在讲台上辛勤耕耘的牧者们的传讲，改变了英国教会的命运。上帝使用祂的圣言和祂所赐下的真正牧职，顷刻就扭转那个黑暗的时代。在这最黑暗艰难的时代，如果这些牧师们全部闭口不讲，如果他们躲避起来不再劝勉、牧养他们的会众，真理怎会被传出，怎会像春雨一样，悄悄地改变英格兰的土地？所以我们作为牧者，任何时候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和忠心，效法我们的先辈，即使在刀剑皮鞭下、在被捆锁的监牢里，也要至死忠心。

提后 4: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1641年7月，议会通过决议，取消臭名昭著的教会法庭，推翻劳德宗教政策的执行机构——星法院和高等委任法院及整个的特权制度中心，并明确规定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司法审理，教士强制他人作神职宣誓是非法行为。1642年2月，议会通过《主教排除法》（Bishops' Exclusion Bill），将全部主教驱逐出教会。

第五节 内战时期

1、奥利弗·克伦威尔

1599年4月25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业小镇亨廷顿。克伦威尔从小就受到清教徒的熏陶，他的整个家庭环境完全是改革宗信仰，所就读的亨廷顿小学也同样充满了严肃的清教徒气氛。1616年，17岁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进入剑桥大学。

1620年8月，克伦威尔和伦敦一个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开始全力以赴经营农业。当时英国正处于詹姆斯一世昏庸统治时期，王权和议会间的裂痕逐渐加大。1621年，在第三届会议上，下议院因反对詹姆斯同西班牙结亲而更加遭到詹姆斯嫉恨，詹姆斯因而宣布禁止议会讨论内外政策。1625年，查理当了国王。仅仅4年过后，国王与议会彻底决裂了。

1626年，由于急需资金，查理一世被迫重新召集议会。当国王命令在亨廷顿选举两名代表出席他的第三届议会时，克伦威尔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议员，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议会于1628年3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克伦威尔第一次走进了下院，并发表了首次演讲；其发言简短而有力，猛烈地抨击了受宫廷保护的天主教，主张捍卫清教徒的信仰。这次发言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院多数议员拒绝服从国王命令，并且通过《三项决议》提案，反对天主教，反对国王任意征税。国王查理一世迅速调集军队，强行解散了议会。

1638年，苏格兰人民举行了起义。为了筹集资金镇压起义，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这时克伦威尔已被选入议会委员会（当时有18名议会委员，职能各不相同）。他号召议会反抗国王对清教徒的残酷统治，查理一世惊恐万状，迅速调集军队企图再次强行解散议会。作为议员的克伦威尔率先违抗国王的旨意，议会继续履行其职责。国王不得已北上，在诺丁汉调集军队征讨议会，议会在伦敦征集军队，内战爆发。

2、组建新模范军

内战初期，王党军队屡屡得胜。到1643年，英国西部国土的四分之三和几乎整个英国北部都落入了国王手中。此时，克伦威尔回到剑桥，组建了一支由清教徒组成的军队。他们唱着诗篇，一面敬拜，一面训练作战。这是一支敬畏上帝、不畏牺牲的军队，史称新模范军。约翰·班扬就是其中一名战士。

1644年7月，克伦威尔率领议会军新模范军，在马斯顿荒原一役，重挫国王军，大获全胜，并最终树立了克伦威尔的军威。

1645年6月14日，以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克伦威尔为正副司令的新模范军又在纳斯比战役中大胜国王军。



图 4.46 战斗中的克伦威尔

3、成为护国公

1646年春，议会军围困牛津，国王军投降，查理一世化装逃脱。5月5日，在一些被改革宗教会压制的苏格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下，查理一世发动了第二次内战。1648年，反动的苏格兰军被议会军击败，第二次内战结束，查理一世被俘，王后逃亡。特别法庭开始审判查理一世。27日，135名特别法庭成员中59人签署了处死国王的命令。克伦威尔被推举为英国的护国公。议会一些人在1657年反复督促克伦威尔称王，但均遭到克伦威尔的拒绝。克伦威尔认为：“我自己只不过是维护国家太平的好警察，而不是像查理一世那样的国王。”他相信，国王制度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在1657年4月13日的演说中，克伦威尔说：“因为根据神的启示：上帝不仅除去了国王的家族，而且除去了国王的头衔。我不会试图建立神意已经摧毁并丢弃在尘土中的东西，我不会重建耶利哥。”

4、克伦威尔后期的宗教政策变化

1654年2月16日根据新宪法，在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为克伦威尔担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护国公一职举行了庄严的“登基”仪式，开始了他将近四年的护国公生活。克伦威尔在内政外交中表现出杰出的治国才干。在内政上，他对王党分子实行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在外交上，通过长期谈判，1654年同荷兰签订了《航海条例》，此后同瑞典、丹麦缔结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商贸协定。9月份，克伦威尔召开了护国政府第一届会议。1655年，克伦威尔平息了王党骚乱，粉碎了平等派的反护国起义。同年夏天，他把全国划分为12个区，分权管理，让其具有清教徒特色、秩序井然。

在拥护宗教自由的同时，克伦威尔也让他的政府承担了维护牧师权益的警察职责。1654年3月20日，克伦威尔颁布了一项对公众的牧师进行审查的法令，并在伦敦成立了由38人组成的委员会——这38人就是参加威斯敏斯特大会留下来的牧师，负责审查教区传教士的全部候选人。各郡也成立类似的委员会，政府授予他们解除“不中用的”牧师和学校教师职务的权力。国家保证供给“合神心意的牧师”的薪俸和生活费。这一系列措施为那些能够胜任和适合传播福音的牧师们提供了生活保障。为了真正恰当地选到合适的人，政府于1654年8月又公布了第二个法令，指定每个郡的本地委员在所属范

第四部 宗教改革

围内将那些劣迹昭彰的和无能的牧师们开除出去，其中劣迹包括言论涉及亵读圣经、不忠于政府和使用祈祷书等。同年10月，政府又颁布了第三个法令，将小的教区和人口稠密的分教区联合起来选举牧师，这样就选出了品行端正的非天主教徒、忠于改革宗教信仰的合适牧师。牧师的水平和恩赐得到提高，教会和国家也大受祝福。但可惜后来的独立派将长老派逐出议会，使得英国再遭危机。

第六节 威斯敏斯特大会

1、简介

1643年7月1日，根据英格兰议会的命令，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办了被称为“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会议。与会人员中有121位牧师和长老（其中4位牧师和2位长老来自苏格兰），20位英格兰下院议员和10位英格兰上院议员，共151人。这151人中，大部分来自远方地区。他们在这动乱年代，为了信仰与良心的自由，离开妻子、儿女，乘坐驿站的马车赶赴会场，修正英国教会的信仰标准。

威斯敏斯特大会开始于1643年7月1日，结束于1649年2月22日，是为五年零六个月，其间共举行了1163次会议。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外，每天都是从九点开始开会，直到中午一点或两点结束，下午的时间留给各个委员会工作。与会的神学家几乎涵盖了当时各个不同的正统派别。会议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次暂停、全日禁食祷告。这些仆人几乎对每一个信仰字句的表达都要进行仔细推敲和辩论。

来自苏格兰的委员罗伯特·贝利牧师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会议期间的一次禁食祷告：

“这天会议以特维斯博士简短的祷告开始。随后，马歇尔以深思的态度和逻辑，在上帝面前承认委员们的罪。他的认罪祷告充满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感动，并持续了两个小时。此后，史密斯讲道，约一个钟头。我们唱诗篇。之后，维恩又带领我们祷告了将近两个小时。巴尔讲道一个钟头。西蒙又祷告了约两小时。我们又唱诗篇。然后汉德森才带领我们，就如何改进会议的日程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讨论。最后，特维斯博士再次以简短的祷告和祝福结束了今天的会议。因为上帝临在于一切事工的进行之中，所以我们这群人深信，祂必赐福于会议和祂的国度。这是我此生在英格兰所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天。”

开始的时候，大会只是打算以《三十九条信纲》为蓝本，对英国教会的信仰教义作一系列的系统整理。但是上帝用奇妙的方法，使这次大会改变了初衷。

1643年10月12日，大会收到了来自议会上、下两院的命令，要求他们先考虑教会劝惩、崇拜指南和教会治理等这些重要议题。命令如下：

“由于慎重考虑到我们国家当前状态下的紧急形势，因此上、下两院颁布命令，大会和其他人应立即开会商讨：（1）教会劝惩和治理，使教会劝惩和治理最符合神的圣言，最有利于取得和保守国内教会的和平，以及最接近于苏格兰教会和国外的其他改革宗教会。会议应促成在本国教会中建立这样的治理，以取代已决定要废除的当前教会治理模式——由圣品阶层下的大主教、主教以及他们的助理、代理、总铎、主教参事会、执事长和其他的教会神职所构成的治理模式；（2）关于教会今后将施行的崇拜指南——敬拜仪式，会议应尽快将其观点和建议呈递给议会的两院或其中之一。”

从这个命令可以看出，此时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国会已经完全倾向于苏格兰教会的治理模式，即改革宗长老会模式。这一事件还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教会治理，还是改革宗信仰告白各个教义的制定，英国教会不再以《三十九条信纲》为蓝本，而是重新系统地制定合乎圣经的、全备的改革宗教义。这是神护理的大能及时调整了大会的目标，使这次大会成为教会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



图 4.47 威斯敏斯特大会

由于该命令的发出，大会的注意力从进一步审查《三十九条信纲》——他们最初被召集要完成的这项重要任务——中转移出来。经过初步的安排和禁食祷告，大会宣读了来自议会的命令，并指明他们将着手进行认真讨论的新领域。

至于讨论次序的问题——先从教会治理还是先从教会劝惩开始进行讨论，大会则赞成从教会治理的议题开始。然而，这引起了另一个基本问题，即圣经是否包含一种治理的准则。古德温（Goodwin）确信，神的话语必定包含治理的准则。他不仅表达了对这一点的确信，而且和其他的独立派参会者一同极力催促大会应首先讨论和确立这一问题。而莱特福特（Lightfoot）反对这样的进程，他希望大会首先给出“教会”的定义，因为教会是他们所有讨论中最主要的用语。

显然，首先给出“教会”的定义，然后再探讨教会的治理，最后讨论治理的施行（即劝惩），这应该是最合理的进程。但大会认为这样的进程会把一些焦点首先提出来，而与会成员正是在这些焦点上存在着最大的分歧。虽然所有人都承认教会和教会治理的存在，但许多人对其性质和施行范围的看法可能不同。因此，大会决定：“为了能够首先使所有人达成一致，并使他们的分歧逐步消失或者大体得到解决，这些议题可以暂时搁置，他们应该从教会中的职分承受者——即‘教会治理者’这一议题着手。”就这样，圣灵借着这些分歧，把人们引向关于教会治理者的讨论上来。

尽管会付上了长时间的代价，但他们认为，既然大会的召集是为了给国家制定一个最终且长久应用的教会治理、劝惩和崇拜模式，因此，对于如此伟大工作的每一部分都应当给予最详细而审慎的讨论。

第四部 宗教改革

根据通常的安排，大会任命几个委员会，分别准备有关“教会治理者”的议题，以备公开讨论，并各自呈交报告。第二委员会的报告开篇为：“在查考新约教会的治理者时，我们首先看到基督是教会的祭司、先知、君王和元首，祂无限卓越，拥有一切的权柄和其他所有职分；因此这许多职分之名都归诸于祂。”第三委员会呈递的报告在性质上类似，用圣经的语言将治理归于耶稣基督，祂高升远超于诸天万有，为造就祂的教会，赐下了所有必需的职分；其中一些是特殊的职分，例如使徒、传福音的、先知，另一些则是通常的职分。他们从圣经中发现了如下的职分：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和寡妇。

既然教会是神亲自呼召建立的，所以大会就不得不首先讨论神论的有关内容。此时这些仆人们才立定心志要展开一个长时间的神学讨论。这是神亲自带领他们为真道打了一次美好的仗。

1646年11月26日，藉着圣灵所赐的智慧与合而为一的心，会议通过了《威斯敏斯特信条》。在一千多个日子里，信条中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自由而公开的辩论。“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14:40）。在151名委员的投票中，只有一票反对。《信条》最初的版本是没有经文附注的。根据英格兰国会的要求，威斯敏斯特神学会议再次于1647年4月29日，通过了附注经文的完整版本。1647年11月9日，在完成《大要理问答》后，最后一位苏格兰委员撒母耳·卢瑟福（《律法是王》的作者），在众人的感谢声中起身回国。余下的145名英格兰委员，于1647年11月25日完成了《小教理问答》的撰写。

至此，上帝使用威斯敏斯特会议，在长达4年4个月24天（1643年7月1日—1647年11月25日）的时间里，完成了信条、教理问答、崇拜指引等信仰准则的查考与制定。

此后，这个会议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其主要功能变成了对牧师资格的审核与监督，直到1652年3月25日才解散。换言之，在英国废除主教制、且名义上成为长老教会体制的短暂时期内，威斯敏斯特会议也部分履行了临时总会的功能。然而，从1648年清教徒革命胜利，克伦威尔起初是支持长老会体制的，但在大会以后，克伦威尔逐渐转向支持独立派，并和他手下的独立派议员，将保守派的长老会议员赶出国会，之后便是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不久，查理二世复辟，英国恢复了君主制和主教制。

著名的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说：“自从使徒时期以来，再没有任何会议能够与这个会议及多特会议相比，有如此之多的杰出的牧者参加。”

大会最早制定并通过的文件，针对成人、儿童主日学的《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后来这些文件也被苏格兰、北美地区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教会所推崇、采纳，其中尤其以《小教理问答》流传最广，最为著名。

2、《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内容

《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内容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和公开的辩论。《信条》按照圣经启示的逻辑顺序，依次论述了圣经、神、世人、基督、救恩、教会及末世等教义，成为现代系统神学主题划分的先驱。

《信条》共33章，其标题依此为：论圣经、论神与三位一体、论神的预旨、论神的创造之工、论神的护理之工、论人的堕落及罪与刑罚、论神与人所立的圣约、论中保基督、论意志的自由、论有效的恩召、论称义、论得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论善行、论圣徒的坚忍、论蒙恩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

由和良心的自由、论崇拜和安息日、论合乎律法的宣誓和许愿、论国家官员、论结婚和离婚、论教会、论圣徒相通、论圣礼、论洗礼、论圣餐、论教会的劝惩、论教会总会和会议、论死后情况和死人复活、论末后审判。

上帝使用英格兰的教会和国会，制定了这部伟大的改教运动的信条，但它却几乎从未在英格兰真正被采纳和施行过。它却首先成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信仰告白，直到今天，成为全世界绝大部分长老教会和其他许多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告白。

第七节 《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摘录和特点

《威斯敏斯特信条》（又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完全以加尔文的神学系统为主线。在加尔文后一百年教会的黄金时代里，无数神学家领受了丰富的圣经亮光，建立了以上帝主权拣选和圣约架构为基础的神学体系。《威斯敏斯特信条》正是总结了这些全备的救恩真理，并将其精准地阐述、表达出来。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博大精深，绝不是我们用只言片语就可以总结概括的。但为了使读者对教会历史中最光明的教义有所了解，我们在下面摘录几段内容，

1、唯独圣经

《信条》高举圣经的权威，如第一章第六节所言：

神全备的旨意，包括神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等一切的知识，若不是明明记载在圣经里，就都是已经从圣经引申出来正当且必要的结论；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刻，不论是假藉圣灵新的启示，或是凭借人的传统，都不可以加添圣经的内容。然而，我们承认：为了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得救之道，上帝的灵在我们内心的光照是必须的，某些关于敬拜神、教会治理的处境，与人类一般处事为人有相通之处，这时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总规则（这是我们随时随刻要遵守的），凭着人的天然之光、以基督徒的慎思明辨来安排。

最大的准则就是“唯独圣经”。

圣经是教会与信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与坚实根基！如果根基偏移了，建筑就必然倒塌；如果根基失落，建筑就必然失落；如果根基毁坏，建筑就必然毁坏！这就正如罗得一步步挪移帐篷，就进到了所多玛的境界。因此，我们只有杜绝教会在圣经论上跨出偏移正路的第一步，才能防止教会一步步地挪移帐篷。神的呼召就是要祂的儿女坚守并护卫对圣经的信念！这是一切敬虔与真理的根基！倘若这唯一的根基毁坏了，我们又能在何处寻求别的根基呢？如果这根基失落了，那么上面的建筑将如何存立呢？就算暂时存立，也必然立刻倾倒！如果我们失去了在真理中对主耶稣基督切实的认识和忠心，那么就算我们能做出一些所谓的善事，也只是凭着我们的私欲和血气而已，不过就如“社会福音”一样不被神记念。

2、唯独恩典

在论述到预定拣选时，《信条》高举神的恩典，如第三章第五节所言：

这些蒙神预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先，按照祂永远与不变的目的，也按照祂奥秘的计划和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他们得永远的荣耀。神这样选定他们，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惠一慈爱，并非根据神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也不是因为神预见他们在

第四部 宗教改革

信仰与善行上的坚忍，或受造界其它任何事物，成为神拣选的条件或原因。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在论述到重生、称义、成圣等教义时，《信条》也是高举神的恩典，如下所言：

第十章第二节：这有效的恩召，是唯独出于神白白所赐的特别的恩典，完全不是因为神预见在人里面有任何善行；人在这件事上完全是被动的，直等到蒙圣灵的感化和更新，他才有能力回应这个恩召，并投向神在这个恩召中所要赐予的恩典。

第十三章第三节：在这场争战中，那残存的败坏虽然可能暂时占有优势，但是基督成圣之灵不断加力量给人，那蒙神重生的新人靠这力量终必得胜；所以圣徒会在恩典中长进，敬畏神得以成圣。

以上只是举两个例子。《信条》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唯独恩典”的思想。不仅是在对罪人得救、称义等教义的论述上，也包括在对信心和善行、赏赐的论述上，《信条》都宣称这一切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动作存留也是上帝为人类存留的普遍恩典，出于上帝恩典的护理。作为受造者——人，我们应当知道：除了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功劳。因此，对一个深深领悟信条含义的人来说，亚米念主义的书籍就如同蛆虫令人作呕。

3、唯独基督

在论到救恩的中保时，《信条》强调唯独基督，如第十一章第三节所言：

基督藉着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一切被称为义人的罪债，并为他们使父神的公义得到合宜的、真实的、完全的满足。然而，父神既是为了他们赐下基督，使他代替他们顺服，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蒙父神悦纳，这顺服与满足都是白白的恩典，并非因他们里面有任何功德，所以他们的称义是唯独出于白白的恩典，使神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称义上可以得着荣耀。

不仅人的得救唯独藉着基督，就是天地的起源和终结也是唯独基督，这就是信条在每一章都要表达的思想。若有人声称和基督无关之人也可以得救，《信条》告诉我们：对于这样的观点，不是要批判，而是要唾弃。

4、唯独信心

在论述到得救的管道时，《信条》强调唯独信心，排除了一切人的功劳，并指出何为被称义者的信心。

第十一章第二节：信心使人接受并倚靠基督和祂的义，这乃是称义唯一的管道；然而在被称义者的心中，不单只有信，而是伴随着其他使人得救的恩典，并且这不是死的信心，而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第十四章第二节：藉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凡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因为那是神以自己的权威说话，又对圣经各处经文以不同的行动来响应——对命令要顺服；对警戒要畏惧；对神所赐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要欢喜领受。但使人得救之信心主要的表现是：凭恩典之约领受、并单单接受、依靠基督、得以称义、成圣、得永生。

人因为无善可陈，所以唯有借信心能来到神面前。可是什么是信心？在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却把信心这最重要的定义忘却了，竟然把医病、神迹、方言称为信心，甚至把

相信神能让自己的生意兴隆发大财叫信心，把有病不用吃药打针就能痊愈也叫信心，使整个基督教再次回到中世纪的迷信，甚至陷得更深。

《信条》明确地告诉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信心。圣经在说什么呢？圣经不是让我们终日陶醉于圣诞节的欢乐，而是欢然领受神赐下的恩典之约。

5、唯独神的荣耀

《信条》在论述到信仰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如下所言：

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可能因为教会的见证而受到感动与影响，因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对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功效、文体的庄严、各部的一致、整体的要旨（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对于人类唯一得救之道的完整彰显，和其它许多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

第五章第一节：伟大的神创造万物，藉着祂至高的智慧、至圣洁的护理，根据祂无误的预知，以及祂自由、不变的旨意，祂确实地维护、指导、安排、并统管一切受造物，包括他们一切从最大到最小的行动与事物，为要使自己荣耀的智慧、能力、公义、善良、恩惠得着称赞。

整本圣经都在述说神的荣耀，整个宇宙都在述说神的奇妙，所以在天上地下，若不称颂上帝的恩典，受造之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6、以圣约为主线的圣经观

《信条》在论述到恩典之约时，强调新约与旧约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第七章第六节中略见一斑：

在福音时期，当“约的本体”基督显现时，施行这约的方法乃是（1）传扬圣道、（2）施行洗礼、（3）施行圣餐；这些条例虽然数目比较少，实施方式比较简单，外在的荣耀比较少，但是藉着这些方法却把这约，以更完整、更多证据、更有属灵果效的方式带给万国万民（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表明这约的意义；这约称为新约。这样看来，这并不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一个相同的约，但施行方式不同。

圣约框架在《信条》里面得到最完美体现。通过圣约，把圣经整个脉络清晰地整理出来；通过圣约，看到圣经是那样和谐一致，看到神为人设立的救恩是那样牢靠安稳；通过圣约，我们才会深深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 10:29）。

7、神学家对威斯敏斯特大会的评价

众多的神学家都对这次大会及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们在这里仅列举其中几例。

华腓德论到《威斯敏斯特信条》时说：“这是人所构思并写出有关我们所称‘改革宗信仰’中最齐全、最清楚、最周延、最完美、又最生动的信条。”

梅钦在 1936 年发表的《信条和教义的发展》时如此评价这次大会的成果：“改革宗信仰通过几个类型相似的伟大信条来表达。其中之一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另一个详尽陈述改革宗信仰的伟大信条由《威斯敏斯特信条》及其大、小要理问答组成……这些教义准则正是我过去两个冬天在星期日下午的短讲中经常提及的。”

第四部 宗教改革

伯特纳论到这次大会和信条时如此说：“这套神学体系通常称作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信仰，而把它表达得最清楚的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大会……无论从工作的范围与效能来看，或是从它对后代的影响来看，这个会议应该都是抗罗宗会议之首。”

第八节 清教徒的危机和查理二世的反攻

1、克伦威尔执政时期对敬虔信仰的维护

作为清教徒，护国公克伦威尔始终竭力维护英国国内的敬虔。1654年3月31日出台的法令规定：“以斗鸡为名的各种集会经常会扰乱治安，并带来赌博、酗酒、咒诅、争吵及其它放荡行为，这些行为是对上帝的不敬。因此从今天起，所有这些集会都会被认定为非法集会并受到处罚，所有地方官员都有责任查禁、制止、解散这些集会。”法令的第二条是反对挑战、决斗和所有挑衅行为。1654年6月29日的法令对决斗等行为做了惩罚规定，法令宣布决斗行为“为上帝所厌恶，为基督所不容，并违背所有良好的秩序与管理制”，并规定：挑起决斗者必须受六个月的禁闭，杀死对方的决斗者要判为谋杀罪。

政府对于亵渎主日的行为也进行处罚。例如，在主日里，街上叫卖的货物经常被没收；旅人和车夫如果在神圣的安息时间内旅行的话会被罚款10先令；在主日签发的令状和许可证是没有效用的，传送它们的人会面临5镑的罚款；除非是前往教堂，任何人不得使用船只、马匹、马车和轿子，否则必须支付10先令罚金；同样的罚款还会落在那些去小酒馆和啤酒店的人身上。军官们被授权去搜寻违规者，并且法官和治安官们如果失职的话也会被罚款。克伦威尔是继君士坦丁之后的第一个以法律维护主日的君王。

2、克伦威尔执政后期的宗教宽容

在克伦威尔执政后期，他主张国家政权对不同宗派给予保护，使其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和公理会的思想比较一致。此时他坚定地支持公理会，并任命约翰·欧文为牛津大学校长。

1658年9月，来自独立派120个教会的200多位人士聚集萨伏依宫，通过了由欧文、格林希尔等人草拟的《萨伏依宣言》。《萨伏依宣言》在礼仪和教义上继承了威斯敏斯特会议的精髓，但在制度上则对长老制彻底否定，否定各教会之上的任何权威机构，认为只有基督是各教会之上的唯一权力所有者。这份宣言首次以纲领形式明确地阐述了公理制原则，是独立派教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克伦威尔执政后期完全以独立派教会的治理模式为英国教会的治理模式。

公理会的体制虽然给予各教会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但也给教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选任牧师上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各教会独立行事，致使选任的牧师水准参差不齐、教会形态各异；第二，对错谬异端没有一个统一抵挡的机制，致使许多错谬极端异端横生，教会无法联合分辨和抵制，各教会虽有信仰告白，但可以按着自己对教义的理解来解释。此时不仅有长老派、独立派，还产生了浸礼派、贵格会、第五王国派、平等派、掘地派等。宗教的无政府主义造成无秩序、无纪律、人人自由而为的乱象，为教会的建造和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由于克伦威尔采取公理会的治理模式，所以国家治理政策必定以宽容为主，因为你无权干涉每一个教会的“内政”。当时以巴克斯特为代表的独立派认为：“只要接受主祷文和使徒信经，就是兄弟姐妹。”

1654年，克伦威尔成立由欧文、巴克斯特、马歇尔等组成的委员会，拟定基要主义十六条。此信条虽然将天主教、索西尼派和贵格会排除在外，但其他一些异端、极端派别全被包容进来。独立派甚至建议天主教徒也应该获得宗教自由，克伦威尔本人还试图赦免一位天主教牧师。虽然这一提议遭到国务会议的强烈反对而被阻止，但这足以表明克伦威尔时期在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问题上迈进步之大，否则不可能提出这种连斯图亚特君主都不敢直言的要求。

3、从清教徒中分裂出去的极端组织

就像德国宗教改革后出现闵彩尔的农民暴动一样，撒但总是愿意把纯正信仰的属灵争战转为地上的政治运动。这个时候，由于独立派没有一个总体的监督机制，每个教会各自为政，一些极端派别就像野草一样应运而生了，他们又打着清教徒的旗帜，因此给后来的人本主义攻击改革宗教会带来很多借口。这一节我们简要介绍一些从清教徒中分裂出去的极端组织。

(1) 掘地派

掘地派是17世纪一些少地农民的空想共产主义派别，领导人是温斯坦莱和埃弗拉德。

温斯坦莱原为伦敦小商人，破产后到乡间为人放牧，同情贫苦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他认为独立派于1649年3月建立的自由共和国并不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所以他主张土地公有，自称“真平等派”。1649年4月，退役军人埃弗拉德带领4个农民到伦敦附近圣乔治山岗开垦荒地，人数渐增至二十几人。温斯坦莱也加入这次开垦的运动，并发表宣言《真正的平等派举起的旗帜》。1652年，温斯坦莱发表《自由法》，详细地阐述了掘地派的主张，描绘了公有制共和国的蓝图。该著作被认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与莫尔的《乌托邦》齐名。

(2) 第五王国派

第五王国派为首的是木匠托马斯·维纳。该派主张亚述和巴比伦为第一王国，波斯为第二王国，希腊为第三王国，罗马为第四王国。前三者均因偶像崇拜而灭亡，第四王国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也接近末日。第五王国是以基督为王的千年王国，即将降临人间。但在千年王国到来之前，基督的“圣徒”就代表基督来进行统治。1661年1月6日，该派在伦敦举行起义，参加者约有60人，企图在英国宣布成立“耶稣王国”。后来“第五王国派”分子被镇压。

(3) 平等派

平等派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李尔本、R·奥弗顿、W·沃尔温等人的著作中，其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说和自然权利说。第一次内战期间，平等派的思想已在伦敦和其他一些地区传播。1646年，平等派从一个思想流派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1647年4月底，在平等派思想影响下，“新模范军”的一些士兵已成为与议会对立的第二个政治中心。1647年

第四部 宗教改革

8月6日，这伙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里反对他们的长老派议员。11月15日，平等派士兵企图趁机起义，遭到克伦威尔的镇压，士兵阿诺德当场被枪决。1648年，第二次内战爆发，独立派、平等派重新联合。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平等派继续为实现他们的理想与克伦威尔等新当权者作斗争。当年春，平等派的士兵在伦敦和牛津郡发动起义，均遭到镇压。

4、克伦威尔之死和查理二世燃起的新逼迫

1658年9月3日，奥利弗·克伦威尔溘然长逝，享年59岁。克伦威尔的时代过去了。克伦威尔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国家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其子理查·克伦威尔即位。

克伦威尔统一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奠定了英国的国家基础。1658年去世后，其子理查继位护国公，但理查软弱无能。苏格兰人要求减轻赋税，老年将领劝理查宽宏对待战火连年的苏格兰，但理查手下一批年轻人却怂恿他更加严厉地对待苏格兰人，情景和罗波安时代一样。这些年轻人甚至轻易解散议会，苏格兰不得已叛乱，理查无力镇压这些少壮派，也无法继续安抚苏格兰，干脆宣布退位。权力出现真空。苏格兰将军蒙克趁机南下，恢复了议会，并迎回查理一世国王之子，让他继承王位，称为查理二世。结果这又是一个企图恢复天主教和国教会的人。



图 4.48 查理二世登上王位

查理二世虽然和议会签署《布列达宣言》，保证大赦一切清教徒革命的参加者，保持清教徒的信仰，然而他继位后很快就粗暴地破坏了大赦。查理二世首先要替父报仇，对“弑君者”（即审判查理一世的参加者），均不得赦免，必须惩办。“弑君犯”中，被判定为与处死查理一世直接相关人员共87人。其中，审判查理一世的58个最高法庭成员，除24个早已去世以外，十余人已逃往国外，剩下二十余人。查理二世将其中一些人赦免死罪，而把9人定为“弑君犯”，判处死刑。至于与“弑君”无关而被株连者不计其数。

自登上王位，查理二世一直致力于恢复安利甘宗（即圣公会）的影响。1660年9月，查理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恢复了17年前的主教圣品礼，任命许多人为主教，其中大部分是安利甘宗信徒，也有少数清教徒。恢复主教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挠。和他的父亲不同，查理二世希望以温和的态度来处理宗教问题，希望对国教进行一些改动以使温和派

的清教徒也能接受。为此，国王发布《伍斯特宫宣言》，削弱了主教的一些权力，并允许自由选择祈祷书中颇有争议的词语和仪式。他还给予不服从国教的少数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召开宗教会议的自由，但是不具备平等的政治权力。可是好景不长，1661年5月8日，新一届议会召开了，议员大多数都是王党分子，史称“骑士议会”。内战前清教徒把议会视为免遭国王迫害的保护者，而现在议会大多数议员都决心要将非国教徒从政治和宗教领域中完全排挤出去。

第一次会议的十天之内，主教们已经重组了贵族议院（即上议院）和下议院，并以228票对103票表决结果，废除确认长老派为全国统一教会的《庄严盟约》，并当众烧毁了它。议院还投票通过了以下决议：全体议员必须宣誓接受国教教规及其一切礼仪；军队指挥权属于王室；凡加害国王，挑拨国王和王政机构之间关系的人，按叛国罪论处；废除将主教排斥于议会之外的法令，恢复高级教士的立法权；禁止十人以上的联名申诉；等等。此后，这一系列法案构成《克拉兰敦法典》（Code of Clarendon）。

1661年，克伦威尔的坟墓被复辟的查理二世下令掘开。查理二世将遗体处以绞刑并砍头，尸身被遗弃于坑中。受残害的头颅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示众直至1685年，其后被转手数次，被多次买卖，直到1960年才最终找到，被葬在了剑桥的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地下。

这座教堂有一块非同一般的匾，上书：“英国、苏格兰及北爱尔兰之贵族保护者，本校1616—1617年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头颅，1960年3月25日埋葬于此左近之处。”苏塞克斯学院旁人们修建了一座叹息桥，名称取自诗篇九十篇。叹息桥见证着人生的短暂和虚空。一生纵使恢宏如克伦威尔，最终也不过被一堆悠悠黄土所掩埋，只有那在基督里的金银宝石的工程才真正具有永恒价值。

诗 90:9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图 4.49 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叹息桥

5、再次恢复国教

1662年5月，国会通过一项新的《教会统一条例》。安利甘宗的一些主教，如谢尔登等人，致力于全国宗教统一，加强对清教徒的监管，但是在实施时态度仍较温和。但撒但的作为绝不会止步，它会得寸进尺地置改革宗教会于死地而后快。不久议会就出台

第四部 宗教改革

了一系列打击不遵从国教者的法令。又一次宗教大迫害开始了。

由于这些法令针对的是大专院校中的同类人员、学监和校长，1662年8月，伦敦教区的清教徒牧师们就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要么屈从议会的法令，宣誓接受国教会的《公祷书》及其仪式；要么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辞去教职，由此失去薪金俸禄。法令规定的最后限期是8月24日，也就是国教规定的圣巴多罗买日举行祝祭的那一天。全国约五分之一的圣职人员、伦敦的两千名长老派和独立派教会的牧师，由于拒绝宣誓而被迫放弃牧职，并从他们长期服侍的教区中被赶出来。这些被驱逐者，既丧失了职俸，又因受到严密的监视而不能私自布道和教学。他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靠，携妻带儿，到处漂泊；有的到农村去打零工，有的往城市学手艺，不少人徘徊在他们过去所在的教区里靠教济度日。这时期约有二千名长老派教牧人员，因拒绝宣誓而被免职过着穷苦的生活，其中包括马太·亨利的父亲。

来 11:38-39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1664年的《第一集会法》规定：若五人或五人以上的非家庭聚会举行不符合《公祷书》的宗教仪式，参加者将被处以罚款、监禁的刑罚。1665年的《五英里法》规定：凡不宣誓对国王永远忠诚者，他们虽无意颠覆王权制度，但仍禁止其在任何市镇及从前布道的地区五英里内居住。1670年的《第二集会法》规定：不从国教的讲道者和听众被处以罚金，如若一些贫困人士无力缴纳，则全体负担罚金。

苏格兰议会在逼迫信徒上更甚，苏格兰的“盟约派”像鹿一样被人到处追赶，甚至那些躲在山洞里秘密聚会的信徒，也被拉出来淹死。在英国为信仰受苦的大批圣徒中，约翰·班扬就在此时入狱，并在狱中写成《天路历程》；清教徒弥尔顿则在孤单、贫苦中写下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

6、灾难频发

1652年，由于海外商业利益的冲突，英荷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战争。1664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双方在非洲西海岸开始交战，后来战争逐渐转移到英国领海。战争的巨额费用造成了英国国内的财政困难。此时查理二世企图与法国结盟来缓解战争的经济问题，并扭转不利战局。由于法国的干预，英国虽然在海战中重新夺回了面子，可在财政上难以为继。

另外，1664年末，英国爆发黑死病，这是中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瘟疫。仅伦敦全市40多万人中，7.5万人亡故。国王和宫廷逃离伦敦，由蒙克驻守首都。瘟疫从伦敦蔓延到乡村。紧接着，在1666年8月底9月初，伦敦又发生了特大火灾，损失重大，伦敦城区大部分化为灰烬，有13,200所房屋被毁，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89座教堂荡然无存，被焚毁的货物约值350万英镑，死亡人数达7万人之多。财政严重赤字、经济萧条，再加上外交上的挫折、大瘟疫以及大火灾，英国政局和经济濒临崩溃。

清教徒相信，瘟疫、大火以及海战失败是上帝在惩罚这个苦待祂选民的國家。

申 28:22 耶和華要用癘病、熱病、火症、疰疾、刀劍、旱風（或作“干旱”）、霉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灭亡。



图 4.50 伦敦大火

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临终前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信仰，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詹姆斯二世更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因此上台伊始就发动了第二次迫害高潮。

第九节 浸礼派与贵格会

1、浸礼派产生

浸信会（又称浸礼派）源于公理会的分离派。1600年，因英国国内逼迫，一伙分离派在公理会牧师约翰·施密特（John Smith, 1554—1612年）带领下逃亡荷兰。他们接触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重洗派，并受其影响，接受了重洗派的主要思想，认为婴儿洗礼是不合圣经教导（圣经没有直接记载婴儿洗礼的事情）。1609年，他为自己和其他会友再施洗，采取了浸礼——用水浸过全身的洗礼方式。1612年，这些人回到英国，在伦敦建立浸礼派教会。同年，浸信会的首次聚会在伦敦医院广场（Spitalfields）举行，浸信会创始人亨利维（Thomas Helwys）发表了一则关于《罪孽的奥秘》的宣言。这是最早呼吁宗教自由的几本书籍之一。17世纪，浸信会信徒拒绝遵从英国国教会，强调唯有基督（而非国王或者女王）是教会的元首，为此受到信仰迫害。

亨利·雅各（Henry Jacob, 1563—1624年）于1616年回到英国，在南华克区（Southwark）成立了英国第一间公理会教会。因为各堂会完全独立，许多人受施密特影响接受成人浸礼的思想，但他们其他的教义仍然持守加尔文主义。1633年，这一部分人从雅各的公理会教会中分离出来，在伦敦成立第一间浸信会教会，被称为“特别浸礼派”。

另外一些人在荷兰不仅接受成人浸礼的教义，也接受亚米念主义。1624年，五个亚米念—浸信会联合，后来被称为“普通浸礼派”。他们拒绝信条，认为信条捆绑人。

为了将自己同重洗派和亚米念区别开来，七间特别浸礼派教会在1644年第一次组成了联合会，其中包括著名的浸信会牧师约翰·斯皮尔布雷（John Spilsbury）。约翰·斯皮尔布雷可以说是第一个有记载的浸信会牧师，曾写过《论教会敬拜》，他与其他几位浸信会教会领袖共同发表了第一个《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联合会曾经申请参加威斯敏斯特大会，但遭驳回。1855年，浸信会牧师司布真将此信条修改后发表，成为现在的《浸信会信条》。

第四部 宗教改革

2、《浸信会信条》和圣诗

《浸信会信条》在教义上和《威斯敏斯特信条》相似，但在教会治理与公共崇拜等方面与《威斯敏斯特信条》大相径庭。

(1) 与《威斯敏斯特信条》显著不同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第三节：民事长官为上述目的而设立，所以我们应当服从他们合法的命令……（此段中删去了《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民事长官维护公共崇拜、防止教会腐败和异端、可以召开宗教会议等条文，体现了浸信会的公理会背景。）

第二十六章改动较大，基本上改变了长老会的牧职和治理意义。

第二十九章第一节：惟独那些确实向上帝悔改，并信服主耶稣的人，才适合领受这一圣礼。

第二十九章第四节：施行浸礼的合宜方式是，将受浸者全身浸入水中（删去婴儿洗礼）。

1689年7月22日，伦敦特别浸信会领袖给全国各地的教会写信，邀请他们差派代表参加9月3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这样，特别浸信会教会开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或联合会。

(2) 特别浸信会引入圣诗

由于亚米念派的普通浸信会属于异端性质，所以本书不作记载，本书只分析特别浸信会的一些特点。首先在体制上，特别浸信会承袭公理会传统，反对长老会的区会等组织，以联合会代之。其次浸信会给教会历史带来最大的危机就是首先引入圣诗。

在宗教改革后，无论是长老会还是公理会，原本在公共敬拜的时候都只唱诗篇，并无争议。然而，浸信会的本·纪慈（又译本·吉斯，Ben Keach，1640—1704年）则是最先开始在崇拜时吟唱圣诗。本·纪慈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后在伦敦教区任浸信会牧师。他于1673年在伦敦郊区的特别浸信会开始将圣诗引入崇拜，他自己也为公共礼拜写了大量圣诗。1691年，他出版了三百首的《灵歌集》（Spiritual Melody），但是由于内容贫乏，至今无存留。但他在崇拜时吟唱圣诗的方式却被大肆应用。圣诗起初遭到包括浸信会在内的许多新教牧师的反对。然而，这些所谓的圣诗就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教会历史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敬拜自由开放的时代。

3、贵格会

(1) 贵格会的产生

贵格会的创立者为乔治·福克斯。“贵格”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贵格会的特点是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最初他们也没有专职的牧师，无圣礼与节日，而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来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他们的信仰始终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

福克斯是个纺织工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鞋匠。福克斯称圣灵的光照为“内心之光”，接受福克斯教导的人被称作“真理之子”。贵格会提倡“因主的话而战栗”。在聚会中，尤其是祷告时，他们因情绪激动而战栗，所以被人们称为“战栗者”。他们聚会的场所里面没有讲台、没有乐器；他们也不唱诗，而是坐在一起，安静地等候“圣灵

的感动”。

17世纪40年代末贵格会形成后，福克斯及其追随者四处云游布道，抨击英国国教会及清教徒教会。贵格会因对其他教派的攻击和干扰而受到各教会抵制；许多信徒，包括福克斯本人，多次被投入监牢。1654年时，贵格会增加到三万人。今天，在美国有115,000名信徒，美国的胡佛总统便出身于贵格会世家。贵格会也制定了自己的信仰告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该会在英国开始获得合法地位。



图 4.51 贵格会聚会情景

(2) 贵格会的特点

贵格会在很多方面与正统的基督教不一样，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 贵格会认为每人都有“内心灵光”，人均有能力借助此“灵光”和“种子”识别真理，接近上帝，获得正确的生活指南。因而该派强调人类本性中善的因素，不相信人有原罪。

(二) 信徒个人可以与上帝直接联系，无需任何中介。他们认为圣经有其价值，但圣经并非上帝对人类启示的全部，只是诸启示中的一部分；最新的启示为信徒个人依“内心灵光”而获得的对上帝的直接体验。

(三) 他们反对外在权威和繁琐的形式，因而无圣餐和洗礼。聚会时信徒聚集一堂，各自凝神默思；没有讲道，“听凭圣灵引导”；任何信徒如获启示，可发言或祷告。该会信徒称教会为聚会处，分为月会、季会和年会三级，聚会处设长老和监督主持工作。

(3) 贵格会信条《巴克雷十五条》摘录

巴克雷在1675年出版了《辩护》(Apology)一书，后来书中十五章的主要内容被单独印行，成为《巴克雷十五条》。书中体现了贵格会反对教会、圣经、圣礼、知识等特点。以下摘录其中一些内容：

第二条：上帝藉圣灵所有的启示，无论是藉外表的声音和现象、梦兆或内心客观的表现，在古时是圣徒信仰的正式对象，现在仍然如此；因为各时代圣徒信仰的对象是一样的，不过表达各异而已。再者，上帝在我们内心的这些启示，就是我们认为建立真信仰所绝对必须的启示。

第三条：因为圣经不过是源头的一种宣告，而非源头本身，所以它不能被尊为一切

第四部 宗教改革

真理和知识的主要根基，也非信仰和行为足用的主要法则。然而，它既为最主要的基础作真实的见证，所以可以被尊为次于圣灵的法则。

从他们的信条来看，贵格会属于典型的异教，因为就连许多贵格会会员自己也不认为自己与基督教有什么联系。他们根本不承认圣经的权威，他们所谓的个人带领的权威都要超过圣经。所以今天贵格会对基督教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第十节 英国国内逼迫时期清教徒的生活

查理二世复辟后的英国政府始终支持圣公会。虽然查理二世对清教徒的迫害比起查理一世时相对减弱，教会环境相对宽松，但清教徒的生活愈加恶劣，牧师得不到足够的供养，与今天的中国教会相似。下面通过几个著名的清教徒作家的经历，我们可以略窥当时神的真选民的生活和信仰光景。

1、约翰·欧文和《圣灵论》

约翰·欧文（John Owen, 1616—1683年）是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素有“英国的加尔文”之称。他曾任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对改教运动贡献卓著，共著有十六册神学、讲章及七册希伯来书注释。其作品除教义、护教外，特别重视灵修实践，对于如何顺服圣经真道与圣灵的引领以及如何制服罪、过圣洁的生活、与主合一等，皆有精辟的教导，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

欧文于1616年出生在英国牛津附近的史达亩（Stadham）。他的父亲也是清教徒信仰的牧师。欧文12岁就进入牛津大学的皇后学院，1635年获得硕士学位。这些岁月正是英王查理一世及其大主教劳德当政之日，他最终为良心顺服真理的缘故于1637年离开大学。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后，欧文去了伦敦。欧文没有受邀参与次年召开的威斯敏斯特会议，因为他此时太年轻、尚未出名。

1643年3月，27岁的欧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揭露阿民念主义》（A Display of Arminianism），此书也使他在该年7月受聘为福特汉姆（Fordham）教会的牧师。1646年4月29日，他首次被国会邀请去讲道，可见年方30岁的欧文已经受到教会及国会的器重。后来圣彼得教堂请他担任牧师。这一年对欧文而言，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改变了对教会体制的看法。他受到约翰·卡腾（John Cotton, 1584—1652年）所出的新书《天国的钥匙权》（Keyes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1644）的影响，由赞成长老会体制转变为赞成公理会体制。

1651年，35岁的欧文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基督教堂的主牧，次年升任为副校长（校长是克伦威尔自己）。1657年，他的牛津大学副校长职务被解职了，原因是他和克伦威尔的执政意见不合。离开行政圈反而使欧文能在教会界及神学思想领域发挥所长。1658年9月底，公理会提出《萨伏伊宣言》（Savoy Declaration），欧文是主要起草人，宣言清楚表明了公理会教会的信仰。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以后，和两千位忠心爱主的清教徒传道人一样，欧文的基督教堂主牧的职份也被解职了，并受到不少国教的为难。但他还是在伦敦集结了一群会众，成为一处教会；他也激励、帮助了许多受迫害的传道人。约翰·班扬之所以能将《天路历程》完成，也是出于他的建议。有一次，查理二世问欧文：“那位焊锅匠（班扬）是何许人也？”欧文恭敬地答道：“陛下，我若能拥有这位焊锅匠的能力，我宁可欣然放

下我一切的学问以换取。”欧文晚年为气喘与胆结石所苦，于1683年8月24日离世。

约翰·欧文的《圣灵论》是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以来关于圣灵论的系统论述最正统优美著述，不仅对圣灵的位格工作有清晰论述，而且对圣灵在人重生和成圣中的工作更是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他根据圣经，纠正了人们对圣灵工作容易产生的偏差，对今天的教会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汤姆·华森和《系统神学》

汤姆·华森（Thomas Watson）的生卒年月未详，青年时在剑桥的以马内利学院读书，是剑桥最勤奋用功的学生之一。以优等生的荣誉完成学业之后，华森成为座落在伦敦的正中心区沃耳布鲁克（Walbrook）圣司提反（St.Stephen's）礼拜堂的牧师，在此忠心服侍近16年。

一位富有学养的主教理查森（Bishop Richardson）到圣司提反听他讲道，他甚喜爱华森的讲道，尤其是他讲道之后的祷告。聚会结束后，主教跟着他回家后向他致谢，并且殷切地表示想向他要一份祷告文。华森回答说：“这不是我所能给你的，因为我不用笔写我的祷告；祷告不是学来的，而是发出来的。”

1662年5月，查理二世颁布《教会统一条例》，禁止一切不从国教者继续讲道。圣司提反礼拜堂的会众在看见他们的牧者要被迫离开他的羊时，充满了泪水与悲戚之情，特别是当他们听到他的离别之言时，更是感到锥心之痛。华森与他们道别，他往前去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在临别证道（Farewell Sermons）的选集中有：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最后他说道：

“即使我不再被允许向你们讲道，但我却不会停止爱你们以及为你们祷告。然而，为什么会有拦阻的情形发生呢？到底罪恶在于何处呢？有些人真的说我们是不忠诚且煽惑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国王陛下所作的事及现在我们所受的苦难祷告，如果我们能进入荣耀里，纵然经过枪林弹雨这也是有益的。”

汤姆·华森不久因偷偷讲道而被捕入狱，三年后被释放出监，但他不畏罚款及监禁，继续秘密地为那些不怕逼迫的清教徒们讲道。在教会、庖厨间，或者户外和山谷森林里，对于这一小群敬虔的人而言，这些短短的秘密聚会时刻无疑地是迷人的时光。

在1666年的大火中，教堂被彻底焚毁之后，华森先生和其他的非英国国教者为那些有意愿来聚会的人整修了一些大的房间，直到1672年的豁免。由于受到约翰·兰罕爵士（Sir John Langham）——一位上层非国教者的支持，华森在位于主教门街（Bishops Gate Street）东边的克劳斯比厅（Crosby House）开始有了合法讲道的资格。爵士还将尊贵的房间任他们使用，因此这实在是个令人快乐的环境。华森在这里传讲了好几年的道。

1675年，华森与司提反·查纳克共同成为克劳斯比厅的牧师，大约在1689年或1690年间，华森先生最后还回到了艾赛克斯，在祷告中突然离世。至于他出生与离世的具体时间，由于没有任何的记载，所以我们不得而知。

汤姆·华森的著作包括《创造主》、《基督精兵》、《悔改真义》等，深为各国信徒所喜爱，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系统神学》（A Body of Divinity）。《系统神

第四部 宗教改革

学》是清教徒中最珍贵、无可比拟的诸多作品中的一部，这是一本拥有 176 篇关于《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讲道集。这本书是在作者离世后才出版的。1692 年，此书以最大版面之单行本发行，并加上画家斯图亚特（Sturt）所绘作者的肖像和威廉·劳瑞莫牧师（Rev. William Lorimer）的推荐序言，并且当时有名望的 25 位牧师签名认可并推荐此书。多年来这本书在神学上培训了許多人，实为各地改革宗信徒必不可少的灵修典籍。



图 4.52 汤姆·华森

3、托马斯·文森特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释义》

托马斯·文森特（Thomas Vincent, 1634—1678）是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的第二个儿子，1634 年 2 月出生于赫特福德（Hertford）。中学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648 年进入牛津基督教学院，1651 年获文学学士，1652 年获文学硕士，并被选为学校教授教理问答的教师。1656 年被伦敦第六长老会按立为牧师，成为罗伯特西德尼的牧师。1662 年，和其他清教徒牧师一样，文森特也因查理二世颁布的《教会统一条例》而被放逐，并被禁止讲道。和大多数清教徒牧者一样，文森特也没有屈服，仍在霍克斯敦（Hoxton）一带秘密讲道，牧养信徒。1665 年，大瘟疫爆发，他仍然无畏地坚持在众多濒死的伦敦人中讲道服事。期间包括文森特的 7 个家人都相继死于瘟疫中。我们再次看到，在上帝刑罚不敬虔的国时，神的选民似乎也受牵连，但他们不是受罚，而是被主迁到更美的家乡。

紧接着，1666 年伦敦爆发毁灭性的火灾。这时文森特在讲道中宣告这些灾难明显是上帝忿怒的声音。这时来秘密听他讲道的会众云集霍克斯敦，因而受到政府官员的注意，不久文森特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包括：

《上帝在城市可怕的声音》（God's Terrible Voice in the City）；

《基督必然和忽然降临审判》（Of Christ's Certain and Sudden Appearance to Judgment）；

《神的根基永恒不变》（The Foundation of God standeth Sure）；

《真正的基督徒对看不见的基督的爱》（The True Christians Love to the Unseen Chris）。

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影响后世最深的，就是今天妇孺皆知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释义》。他在 1674 年发表此书，当时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John Owen）

和汤姆·华森（Thomas Watson）连同其他 38 位人士一起在序言中签字，向众人推荐这本书，认为这本书“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极大的惠益，特别是每个家庭”。

托马斯·文森特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释义》逻辑清晰，通俗易懂。他在原《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基础上，对以圣经为基础的每一条问答再逐条阐述，并对其教义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论述，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白《小教理问答》要表达的意义及其根源。今天堕落的教会学习当年为儿童主日学预备的教材时，就连成人的牧者也已经不能完全理解，但是通过文森特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释义》，无论文化高低都能很快明白。这不仅一下子将宗教改革的精华之门向所有人打开，也为改革宗真理向广大普通信徒传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所以，今天这本书已成了各国改革宗教会的首选教科书，祝福着末世的教会。

4、约翰·班扬

约翰·班扬（本仁·约翰）生于英国贝德福镇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个铜匠。约翰天性活泼好动，喜欢跟一班粗野的孩子嬉戏、说粗话，不用功读书，所以在校学习的时间不多。他少年时在一家铜店里当学徒，十六岁从军，参加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和国王军的内战。有一次指挥官想选出突击队员突击敌人防线薄弱处，选中了约翰·班扬。但班扬的一位同伴艾尔逊认为自己乃单身汉，毫无牵挂，而班扬仍是一个孩子，若有什么不测，必使他的父亲悲痛欲绝，所以要求代替他。班扬起初不肯接受这样大的爱心，但终被艾尔逊说服了。没想到艾尔逊真的在那次突击中阵亡。这件事既使他对这位朋友感激不已，又使他联想到主耶稣为罪人舍命，使他开始认真对待信仰。这一次神让他活下来，必定有更重要的使命交给他，所以他决心用余生事奉神。



图 4.53 约翰·班扬

战事结束后，他解甲还乡，重操故业。不久就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玛丽，但她的嫁妆只有一个木瓢和两本书：贝理主教（Bishop Lewis Bayly）所著的《敬虔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Piety）和登特（Arthur Dent）的《平民步上天国的路程》（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班扬深受这两本书的影响，开始过敬虔的生活。这两本书也使他产生阅读的兴趣。不久班扬就被任为当地清教徒的公理会教会的传道人。他讲道的特点

第四部 宗教改革

是不拘形式与地点，随处都可聚集。他也时常到乡村讲道。由于他富有想象力，很受欢迎，有人送他一个“班扬主教”的赞誉头衔。

玛丽生下四个孩子以后突然去世，他不得已在第二年续弦。继室伊丽莎白也非常贤淑。她是约翰的贤内助，又是与他同奔天路的良伴。约翰在《天路历程》一书中把她述为“心慈”。

班扬强烈地反对贵格会的教义，并且在 1656 至 1657 年间与该派的许多领袖进行书面上的辩论。班扬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福音真理之开解》(Some Gospel Truths Opened)抨击了贵格会的信条。

英王查理二世登位后强迫人民参加国教，禁止其它教派聚会，又不准他们的传道人讲道，违者将被拘禁。因为国教会即安立甘宗的教义和敬拜规条中有许多旧日的迷信习惯，带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所以清教徒们不与国教妥协，因而有的被捕，有的被处死，还有的被放逐外地。

曾有人劝约翰·班扬放弃讲道的工作，回老家去。他却认为：如果他因惧怕被捕而逃跑的话，那就是能说而不能行的法利赛人；若他受威胁时不敢坚守立场，那就会使弟兄们胆怯，审判时会遭主丢弃。他克尽己任，不负呼召，既不逃走，也不放弃讲道，任由巡警来把他捉去。圣公会的牧师质问他有什么权力讲道，他以使徒彼得的教训“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回答他们，为此他被判入狱。狱中的生活环境相当恶劣，且受尽精神折磨。在狱中 12 年，他以结绳工作所得的利润来维持妻儿生活。他的妻儿缺乏人照顾，生活贫苦。妻子在奔走上诉时，宁愿自己饿死，也不愿丈夫答应不讲道。班扬曾几次获得允许短暂回家与家人见面，他就乘机暗暗地继续向人讲道。在被囚之时，他经常读圣经和福克斯的《殉道史》，心灵仍享自由。他说：“尽管别人把我的躯壳困在铁窗之后加上锁链，但我对基督的信心能遨游星辰高天。”监狱里有许多空闲的时间，于是班扬开始写作。妻子探望他的时候，用纸卷当作牛奶瓶的塞子，以供班扬写稿，然后回家保存。他用这方法竟在狱中写了十二本书和册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不朽的《天路历程》。1672 年出狱后，班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不远处讲道和布道。但约在 1676 年时又再度入狱，然而他始终不忘写作。约翰·班扬卒于 1688 年。后人给他写了不少传记。



图 4.54 《天路历程》插图

5、马太·亨利

马太·亨利（1662—1714）是著名清教徒，也是最伟大的解经家之一。怀特菲称他为“继保罗之后最伟大的传道者”，并说：“我每天清晨五点起来，就借助马太·亨利的圣经注释来过新的一天。”司布真也说：“如果一个人只能买非常少的书，我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让他买最好的书，也就是马太·亨利的圣经注释。”

马太·亨利出生于不从国教的清教徒牧者家庭。敬虔的父母使马太·亨利从小便受到纯正真理的教导。1675年10月18日，13岁的马太·亨利写了以下的蒙恩记录：

祷告：“主耶稣啊，为你的圣言，为我虔诚的父母，为我所受良好的教育，为我借着洗礼进入上帝所立的圣约中，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我现在是属于你的，以后也一直属于你。”

我认为我是在三年前听了父亲根据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所做的讲道之后开始悔改归正的。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想那节经文融化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寻求基督。

1673年12月7日，安息日的一个早晨，我听了一篇讲道，其中谈到了真恩典的标记。我根据那些标记来省察我自己，然后向父亲讲述了我的证据。父亲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如果那些证据是真的（我认为是真的），我就真正蒙恩了。然而，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处在对地狱的极度恐惧中，直到后来主安慰了我。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省察——当我离开这世上的临时居所时，将会被接到天上去，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啊！我找到了几个标记来证明自己确实是上帝的孩子，因为上帝和祂的仆人说：

1、用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立约的人，是真正悔改的人。我发现我的灵魂已经与上帝立约了，我希望我自己是在诚实和公义之中与上帝立约的。如果我以前没有与上帝立约，我现在就这样做。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已经把上帝当做我的上帝了。我以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永恒之约作纽带，把自己献给祂。但我是在诚实之中与上帝立的约吗？就我对我的内心的了解而言，我认为自己是在诚实和真诚之中与上帝立约的。我曾在9月5日、10月13日、12月7日以及别的许多时间与上帝立约，我每天都与上帝立约。

2、真诚的为罪悔改的人，为过去的罪恶感到担忧、羞耻和伤心，有悔改的一切表现，如认罪、痛悔、自我审判、自我定罪等。我发现我自己里面有这一切的表现，只是还没有达到我所希望的程度。我真心实意地为过去所犯的罪感到忧伤。我在上帝面前审判自己，为自己过去曾经冒犯上帝而感到羞愧。但牧师让我确信，为罪悔改并相信基督之后，我已经得到赦免。这是基于以下经文：箴28：12；赛1：18；赛55：7；太5：4；徒2：37；徒2：38；徒3：19；约1：9。上帝还借着圣经中别的许多经文，明确地呼召人回到祂面前悔改。但人的忧伤是真诚的吗？就我自己内心的了解而言，我的忧伤是真诚的。但我经常犯罪，我为此在上帝面前痛悔哀哭；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竭力不再犯罪。

3、真正蒙恩的人，是真正爱上帝的。因为尽心尽意地爱我们的上帝，胜过献上一切的燔祭和平安祭。现在，就我自己内心的了解而言，我认为我是真诚地爱上帝的。但我的爱确实是真诚的吗？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上帝的爱是真诚的，理由如下：

（1）我爱上帝的百姓，上帝所有的百姓都是我的百姓。

（2）我爱上帝的圣言，我尊重它胜过一切。我发现自己的心非常喜欢它。我渴慕它，

第四部 宗教改革

把它当作心灵的粮食。我以读经和听道为我极大的喜乐，我的心灵可以见证我在一定程度上顺服它。我想我是因为上帝话语的纯净而爱慕它。我也爱传递上帝圣言的牧师和使者。我经常读经，为上帝圣言的巨大功效而欢喜。在我最近听到的一篇基于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四十四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所做的讲道中，这些都被列为真正爱上帝的标记。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蒙恩见证，以小见大，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清教徒的敬虔家庭教育。虽然重生是上帝主权的恩典，但上帝也是藉着敬虔父母、家庭和教会尽上责任，使这么幼小的心灵扎下如此美好的生命根基。所以，那些鼓吹只有阿米念主义才讲人的责任的人，实在是清教徒对上帝的敬畏和信心一无所知，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的责任。

马太·亨利青年时曾前往格雷律师学院学习法律。1687年退学，接受不从国教的长老会按立，担任切斯特的长老会牧师。他忠心牧会，并笔耕不辍。当时天花、麻疹流行，他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女儿。1712年迁至哈尼克服侍。两年后，在外出服侍返回的旅途中，马太·亨利死于突然中风。



图 4.55 马太·亨利

第十一节 光荣革命

1、詹姆斯二世全面恢复天主教

1685年，55岁的查理二世因中风去世。由于《排斥法案》未能在议会通过，约克公爵詹姆斯继任英国国王，为詹姆斯二世。这位原约克公爵詹姆斯最迟在1669年时已秘密皈依了天主教。詹姆斯的原配妻子在1671年去世，他于1673年9月与意大利的摩德纳的玛丽亚（Maria Beatrice）结婚。玛丽亚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此时詹姆斯的天主教信仰更加明显。为了平息议会的怨气，拉近与新教徒的关系，1675年，丹比伯爵提出了一个建议，让詹姆斯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玛丽与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结婚。即位前，詹姆斯是英国的海军大臣，即位后，为了逐步地排除新教军官对军队的控制，任命他信任的爱将天主教徒海尔斯担任新建步兵团的指挥官。由此可见，詹姆斯时刻不忘扩充天主教的势力。

詹姆斯的宗教信仰问题使得国王和议会的关系又变得紧张起来。不仅如此，英国与新教国家荷兰持续多年的战争也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即位后的第二个星期日，詹姆斯二世就到他的小礼拜堂去做了天主教弥撒，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1686年3月，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教会原有《传教的规则》失去了任何可以依赖的权力。英国国教会的讲道不能含有对抗性的神学，绝对不能有晦涩和使人沉思的观念，讲道内容只能涉及道德准则。”根据这道命令，詹姆斯又于同年7月设立管理教会的宗教委员会。詹姆斯的命令和做法实质上就是让人不再使用理性听道，好回到中世纪的偶像迷信之中。为了全面恢复天主教，詹姆斯先拢络安立甘教徒，以镇压清教徒，对清教徒展开了比查理二世时代更为严厉的迫害。此前查理二世的迫害常常只是免除和剥夺不愿屈服和“拒不悔改”的清教徒的教职和薪俸，而此时的詹姆斯二世不仅如此，还对清教徒使用酷刑，他颁布“血腥法令”对清教徒处以绞刑或流放，其残酷性比血腥玛丽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汉普顿郡有一名叫阿丽丝·莱尔（Alice Lisle）的妇女因向逃亡的清教徒提供食宿就被判处死刑。

詹姆斯二世为了达到目的简直不择手段，竟然依靠天主教会最反动的分子“耶稣会”。这样的极端做法就连英国国内的天主教徒也不赞成，因为他们认为，如此公开地恢复天主教，只会促使天主教的反对派更紧密地联合，使天主教徒的处境更加险恶，而不会得到实际的改善。大量不顺从詹姆斯二世的地方官和市镇机关人员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天主教徒和忠于他的人员。

詹姆斯二世即位后不久，英格兰就爆发了两次起义。一次是1685年5月阿盖尔（Argyle）伯爵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同年6月，另一次清教徒起义——蒙默斯（Monmouth）起义爆发，六千名起义者要求政府停止对清教徒的宗教迫害，并把查理二世的私生子、一般人认为是辉格党的蒙默斯拥上王位，结果起义还是失败。仅萨摩赛特和德文两郡，至少有320人被以叛乱罪名处以绞刑，约有一千人被卖到殖民地巴巴多斯作奴隶。

1687年，詹姆斯二世发了几个特许令，其中一个发给英国国教教区主教普特尼（Putney），威胁英国国教的在职主教只有转信天主教的才能保命。同年4月4日，詹姆斯二世发布了《赦免宣言》，宣称：所有人都可以选择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受任何惩罚，所有的政府官职向全体宗教信仰者开放。实际上这只是国王对天主教徒赏赐的礼物而已。《赦免宣言》还取消了反对天主教的刑事法和“宣誓条例”。同时，詹姆斯也开展天主教教义的宣传工作，鼓励王室皈依天主教，政府将给予现金的资助，尤其是资助以传播媒介的方式进行宣传，例如，出版王室天主教堂的讲道内容。

自17世纪40年代革命以来，英国人民普遍对英国的主教制和主教们怀有反感，认为它是专制君主制的支柱。然而，这时英国国教的主教们由于强烈反对詹姆斯二世，似乎变成了反对君主专制和天主教的英雄，群众对主教们的态度很快改变。当7名安立甘宗主教因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而被国王下令送往伦敦塔囚禁时，沿途群众对他们欢呼致意。6月29日，这7名主教被带到法庭受审时，许多人密切注视着审讯的结果。次日，当法庭不顾国王的旨意而宣布7名主教无罪释放时，群众沿街欢迎，包括清教徒在内。这时，许多清教徒都忘了国教会对他们几十年的迫害，忘了国教会偏离真理和不以基督为元首的事实，他们只想着他们和国教会共同的敌人——天主教。从此，安立甘宗堂而皇之地在英国人民心中登上首要位置。

第四部 宗教改革

到了1688年春，全国上下各种政治派别和宗教界的人士，包括议会的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人士，都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

2、光荣革命

原来人们还抱有一种希望，即在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死后，王位将由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或安妮公主继承，君民之间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可望逐步消失。然而，1688年6月10日，突然传来了玛利亚王后生了一男孩的消息。国王有了男性后裔，王位将来必将由他继承，而这个王子很可能将是一个天主教徒。人民的希望破灭了。

为了避免内战，议会写信给荷兰亲王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王后，邀请奥兰治的威廉率军进入英国。此时上帝也创造一些其他有利的因素。同年9月，法国决定派军去攻打德意志的选帝侯国，解除了威廉的后顾之忧，使威廉可以放心大胆地向英国进军了。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不让英国回到天主教，否则世界格局将再起变化。

威廉率领1.4万军队，分乘500艘船舰扬帆西驶。他们原拟定在英国北部登陆，英国的丹比等贵族已按预定计划等候在那里准备与他会合。但由于风向不定，威廉率领的船舰先被吹回，后又被一股“清教之风”（人们的称呼）吹过多佛海峡，船只于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而英国在海岸警戒的船舰则因为逆风，只得停泊在港口内无法驶出。如果按原计划登陆，将会有一场苦战，胜负难料。在托尔湾登陆后，威廉率军向内陆推进。当时威廉的军队共1.4万人，而英国的军队有4万人，此时英国军队的数目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虽然众寡悬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变通之意，也不命令军队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军队向伦敦撤退，就如同当年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和凯撒战争方酣之时，突然放下军务和埃及艳后旅游一样不可思议。詹姆斯二世的决定致使军心涣散，众叛亲离。而威廉则在进入厄克赛特之后，缓缓向伦敦推进。他避实就虚，采取迂回的方式以减少战斗中的伤亡，最后取得胜利。他这次胜利的进军，被看作是17、18世纪军事战略的典范。

威廉刚刚在英国登陆，立刻就受到当地地方官的欢迎。他所到之处，都遇到同样的场面，有些城市还发表了拥护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辉格派，也包括托利派。

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来由于威廉不希望詹姆斯二世成为一个“殉教者”，所以威廉故意让詹姆斯二世又出走法国。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时议会向威廉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内中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并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这项宣言最终被议会制定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同意了这项法案，并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至此，革命竟然未经流血便获得成功，所以史称“光荣革命”。

詹姆斯二世最后死于德国。至此英国的清教徒与圣公会以及二者与天主教近一百年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教会还面临新的挑战 and 危机，教会历史还要按着上帝的预旨进入新的篇章。外面的逼迫似乎退却，但教会内部将再起乌云，使教会再被遮盖，上帝的儿女仍要在其间继续被陶塑，直至像精金宝贵。

3、光荣革命后清教徒运动在英国的衰微

威廉三世因光荣革命登上王位后，于1689年通过《宗教容忍法》容许浸信会、长老宗、公理宗、贵格会的信徒拥有有限度的宗教自由，规定他们必须偶尔到圣公会领圣餐，领取证明书，他们便可到大学读书，成为公职人员或从政，这种做法被称为“间偶奉国教”。这种软硬兼施的计策获得巨大成功，那些在大逼迫时不惜放弃生命而坚守圣经的清教徒们及他们的后代，在这种似乎内紧外松的试探面前纷纷跌倒，特别是因经济及社会利益的诱惑而渐渐妥协。当时圣公会牧者的薪俸主要由当地一至二个地主、政府的拨款及教区的款项所支持，而不像非国教的牧师那样主要由信徒筹集。一些清教徒认为：只是稍微作以妥协，又没有大的良心挣扎，偶尔去一下国教会似乎在信仰上也没有很大牺牲，而自己以及子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就有了保障，何乐而不为？但没想到就是这渐渐挪移一点帐篷的举动，最后却一发而不可收拾。有的人一开始一年去一次，于是政府就给予一年去两次的清教徒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实惠，于是他们当中有的开始一年就去两次，然而国教会却允许一年去三次的清教徒子女可以读著名大学，于是有更多的人开始一年三次、四次、五次……不少人甚至转入圣公会。除此以外，国教会容忍各个宗派，这里不再有任何神学上的争论，因神学分歧而争论得精疲力尽的清教徒们似乎在这里得到安息——其实不是安息，乃是安逸。所以许多人乐此佳境，再也不思念那个充满十字架艰辛的“西蜀”了。

17世纪初，即使在最艰难的逼迫环境中，清教徒占英国总人口数也有半数以上。可是光荣革命后，到了18世纪初，英国不奉国教者及天主教徒加在一起也占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理论上其余的国民皆圣公会会友。真教会如此衰落，必然导致社会道德迅速下滑、异端错谬如雨后春笋横生。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重新审视基督教信仰，打着圣洁的口号，追求神秘经历、个人感觉的敬虔运动开始产生。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太 13:24-27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种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种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种子呢？’”

第一章 敬虔运动与摩拉维亚弟兄会

第一节 施本尔和富朗开

1、敬虔运动的背景

三十年战争末期（1648年），德国被划分成30个以上的领土与邦国，每块领土各由一位王子或领主来治理。每个领土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信仰，这样势必造成教会间失去联结而杂草横生，路德宗的主导地位越来越被削弱。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改革宗传进德国许多领土，如安哈尔特（Anhalt）、巴登（Baden）、黑森（Hessen）和布兰登堡（Brandenburg）等地，路德宗和改革宗神学家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的神学研讨会，希望达成更多的信仰共识。就在人们专注于神学教义的研究和争论时，一些人开始默默地向中世纪和重洗派的神秘主义靠拢。他们开始传播个人敬虔灵修的经验，反对神学教义的研讨。

耶拿大学教授、黑尔德堡教会监督格哈德（John Gerhard, 1582—1637）一方面呼吁教会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发展出一套源自中世纪晚期奥秘派的理论，其理论见于著作《神圣静思》（Sacred Meditations）。迈斯纳（Balthasar Meisner, 1587—1626）这位威登堡大学教授是一名坚定的亚米念主义者。他斥责当时社会中神职人员与执政人士个人灵修经验的缺失，并对此提出改进意见。安卓亚（John Valentine Andreae, 1586—1643）开始反对神学家们教义的争论，批判王子干涉教会事务。葛罗斯格包尔（Theophilus Grossgebauer, 1626—1661）则是哀叹神学上的争论带来教会的冷淡，发表了《锡安守望者的哭泣》。

这一股暗流竟然没有引起各领地新教教会的注意，他们以为这只不过是几个不见经传的普通信徒的牢骚罢了。然而，不想一场给宗教改革带来致命冲击的运动就要开始，真正掀起这运动的就是施本尔。

2、施本尔的生平

1635年1月13日，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又译：斯彭内尔）出生在德国拉坡斯坦（Rappolstein）的亚塞先（Alsatian）村。他的父亲是一位拉坡斯坦公爵的管家。在早期的信仰启蒙阶段，施本尔特别受到他母亲以及史陶勒（Joachim Stoll, 1615—1678）的影响。史陶勒是施本尔的牧者，后来娶了施本尔的大姐，一直是施本尔最尊敬的顾问，也是他《敬虔愿望》附录二的执笔者。

施本尔幼年时从父亲藏书找出许多书籍，让他印象深刻。他最喜欢的书就是阿恩特的《基督教真义》（True Christianity）。阿恩特（John Arndt, 1555—1621）是一位神秘主义作家，他坚决反对任何教义和神学，他在书中断言正统的教义并不足以培育基督徒的生活，并且提倡一种大体源自中世纪的神秘经验方法。他指出：“首先，我希望将学生与传道者的注意力从辩论神学中抽离出来。这辩论神学使人毫无节制，竟几乎被视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同为初期神学教育。其次，我希望能够帮助基督信徒，使他们从没有生命的神学思想转向能结果子的能力。第三，在外在表现上，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从知识和理论的追求转向信心与敬虔的操练。第四，我希望向他们陈明一个真正与真信心调和的基督徒生活，并且懂得使徒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的真正涵义。”这种反神学的思想非常迎合反理性、靠感觉经验来寻找信仰的罪人的心理。在人堕落之后，撒但更愿意借着人肉体的感觉和幻想来欺骗、掌控人心，使人依靠肉体情欲和功德主义。总之，对撒但来说，人越远离神的真理越好，越不去思想神的话语越好。

诗 1: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16岁时，施本尔完成预科教育，接着就读于斯特拉斯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学习哲学、历史和语文。他在两年内获得了硕士学位。也许是受贝利《敬虔操练》影响，他每周有一天实行晚餐禁食，一直到后来因健康问题才被迫放弃习惯。他遵从未来的姐夫史陶勒的劝告，主日不研读神学，除了上教堂以外，将时间花在和少数朋友讨论所谓信仰经历上。

1659年夏天，在完成了神学的学业后，施本尔花了两年的时间游历。他在日内瓦停留过一段时日。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较有影响的神秘主义传道人拉巴第（见第四部第七章）。拉巴第对这位青年人非常看重，施本尔也经常去听他讲道。六年后，施本尔将拉巴第的一本法文小册翻译成德文并出版，使拉巴第所谓脱离教会、追求完全圣洁等主张和教训在德国也得以广为流传。

回到斯特拉斯堡以后，施本尔从事一些教学上的工作。两年之内，他被册封为国家助理传道士，同时完成了他的神学博士的论文。1666年春，他接受了缅甸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的监督一职。到任后，他立即着手加强主日下午儿童教义回答的学习，并且试图振兴坚信礼。他也开始与许多人大量通信，特别是与贵族，因而在当时有些人称他为“全德国的属灵导师”。

在这些年间，他认识了几位主张用爱和包容使教会合一的人士，其中包括杜利和莱布尼兹。杜利（John Dury, 1596—1689）是苏格兰人，在欧洲大陆努力了半个世纪，试图使改革宗与路德会和睦。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是青年哲学家，曾在施本尔任职的早年在法兰克福住过一段时间。两人私交甚笃，日后也以书信讨论文学、历史以及莱布尼兹所关心的教会合一问题。施本尔也学习了神学家迦利图斯所提出的教会合一理念。迦利图斯（George Galixtus, 1586—1656）认为，藉着回归公元五世纪初期教会的共识，教会合一的目的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合一几乎包容宗教改革以来的大部分错谬和异端。施本尔对此不表认同——“因为这样做会使传统的地位凌驾于圣经之上”。

在担任法兰克福执事期间，施本尔在讲道中开始提倡基督徒应先在道德上有好见证：“若是几个好朋友在主日聚集，不是拿出酒瓶、纸牌、或骰子，而是拿起一本书，使众人同读而得造就，或是温习一篇所听过的道；若是他们彼此讲说神圣的奥秘，而那从神多得恩典的人会试着帮助他软弱的弟兄；若是他们遇到不明白之处，会请教牧者替他们解惑——这将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1670年，施本尔最终像拉巴第一样脱离了教会的公共崇拜，在自己的家里进行主日聚会，称之为“造就性聚会”，实际上暗指教会的聚会已不得造就。他还组织了周三的

小组分享，男女均可参加，称为“造就性的研讨”。小组分享可以复习主日的讲道，或是谈论一些信仰书籍的读后心得。这些书籍大多如路基曼（Joachim Luetkemann）的《圣善预尝》（Vor-schmack der gottlichen Gute）和贝利的《敬虔操练》。有一些法兰克福的神职人员及施本尔的同事也加入了这样的聚集。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施本尔最早组织的私人聚会，后人称之为“敬虔会”（Collegia Pietatis）。敬虔会的出现并不是施本尔一个人的“杰作”，而是许多呼声和思想暗流汇集的后果，是教会没有一个完美体制、牧者疏于治理的必然结果。

1675年，施本尔的《敬虔愿望》出版了。这本12开、内容长达344页的单行本一经出版，便立即风靡德国各领地，可见当时敬虔主义早已深入人心。1678年，施本尔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发行，并增加了一段关于犹太人信主悔改的论述。1712年以前，德文版又另外再版了三次。此后，《敬虔愿望》就一直没有再发行。直到19世纪新派福音派兴起，人们对它的兴趣被再度唤醒。

后来由于选帝侯下旨禁止一切可疑的聚会所和私下集会，施本尔在法兰克福和德累斯顿（Dresden）两地艰难地建立他的敬虔小会。后来他应邀请去了柏林，直到1705年在那里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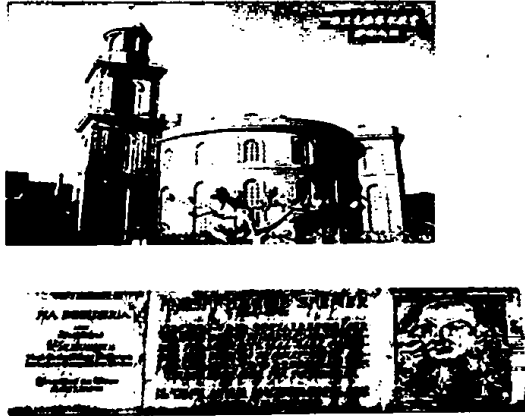


图 5.1 施本尔在法兰克福的住宅和关于他的介绍

3、敬虔运动的主要思想

1675年，《敬虔愿望》出版后进一步掀起了敬虔主义运动。在书中，施本尔提出了六种具体的教会改革方法：

- (1) 不要单单依靠牧师，而要在家里的小聚会中用心阅读全部圣经。
- (2) 所有的信徒都当领悟到自己是研究圣经、教导并安慰他人和实践敬虔生活的祭司长。
- (3) 信徒要从单纯的教义知识集中到作为活的信仰的敬虔训练中。
- (4) 减少神学争论，通过悔改和敬虔生活确立真正的教义。
- (5) 改革神学教育，即通过德国神学家托尔勒的证道，以约翰·阿恩特和多马·肯培的著述为依据，强调不仅是改革课程，而且也包括改革基督徒生活和敬虔的制度。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6) 弃绝修辞学式的证道，回到培养道德、提高灵命的证道。

总之，这些教导就是要教导人脱离教会、脱离牧者、脱离职分、反对教义，这些也就是后来“弟兄会”的宗旨。

弗 4:11-12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施本尔断章取义，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的经文“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解释为传道人都当有个人的属灵经历，并且在生活上有见证，讲道不可以是教义式或辩论式讲道。施本尔可以说是今天见证式讲道的鼻祖。

4、《敬虔愿望》摘录

以下是施本尔所写的《敬虔愿望》中一些摘录和评析：

当人的心思被这样一种神学——虽有圣经中的信心为根基，却以人的好奇作为草木、禾秸来建造这工程，而没有金子（林前 3:12）——所填满时，他们就很难从纯净的基督和他的教训里得着喜乐。这是因为人们的胃口已经习惯于逻辑推理，所以一段时间以后，纯净的基督和他的教训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这种没有爱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林前 8:1）。这等人只爱自己。诚然，知识只会不断地助长并加强人的自爱。圣经以外的狡猾事物总有其源头，人们引入这些事，无非就是为了展现自己英明睿智、出类拔萃，以得着名声和属世的利益……他们不清楚也不关心什么才是教会中那一件“不可少的事”。他们很难不推销这些令他们快乐的事，而他们专注的多半不造就那些寻求救恩的听众。一旦目的达成，这些宗教辩论的基本常识就会渗入那些心思敞开的听众心里，他们也就认为辩论是一件最高贵的事。

在这一段论述中，施本尔含沙射影地攻击路德、加尔文所整理的教义系统，似乎他们是在沽名钓誉。特别是，加尔文神学都是在争辩中建立起来的，因为只有充分听取对方的理由，从圣经真理中分辨是非对错，才能建立正确的教义。然而，施本尔以及后来敬虔运动的观点却是极力取消、拆毁这种基于圣经真理的分辨。如果信仰的权威不建立在圣经之上，那么这权威又建立在哪儿呢？无疑地，个人属灵领袖势必粉墨登场，个个璀璨明亮过于圣经，教会必然要进入人本世代。

所以，除了重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和第五节的话，人还能如何？“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实在可以说，这位满带启示的使徒今天若是来到我们中间，恐怕也无法听懂这些油嘴滑舌的天才们在神的圣所里所传讲的道。保罗的知识不是出于人的聪明，而是出于圣灵的启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如天之于地。人的聪明如何难以领略神圣的启示，同样的，那些满有神圣启示的人也难以委屈于人的空想。

施本尔在这一段论述中把信仰和教义、教义和圣经完全分开。在他的笔下，讲教义成了油嘴滑舌的代名词，领受圣经不再需要通过教会历史所整理的教义。那么通过什么呢？只有通过那些属灵大师们的神秘经历和梦境来建立人们的信仰。教会的根基若被更换，那么教会必然要从这个世界坍塌。

人们收集许多圣经以外的书籍典藏，将其与圣经并列，尤其是胡乱地抓取各种“教父”、“大公会议”和“学者”的著作，以为这些会给教会带来什么好处。它们不仅浪

费时间，使人忽略读经，更使人失去对神话语的纯净领会……我们将圣经译为德文的用意和盼望是：人们能少写作而多研读圣经，因为所有的写作都该指向圣经……教父、大公会议、甚至我们自己，就算用尽全力，也无法做得像圣经——也就是神自己。我以诸般的仁慈请求那些想要购买我书的人，绝不要让这些书拦阻了你们对圣经的追求。

施本尔在这里把大公会议、教父整理的教义说成是完全外乎圣经的东西，读这些东西就是忽略圣经。离开了这些，那么我们怎样理解圣经呢？结果只能是“我认为圣经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圣经是那个意思”。撒但几乎要把两千年来圣灵在教会历史中对圣经的光照彻底推翻，从而建立一个崭新的“我认为”、“我经历”、“我看见”的人本信仰。

5、敬虔主义的严重错谬

(1) 只追求经历，不追求真理，将圣灵和真理脱离

人们讲道不用教义，不许在真理上分辨，必须讲见证和经历，从而人们就会去努力追求那些吸引人的神秘经历，不再追求真理教义的预备，结果像中世纪只追求外在的仪式，致使后来的神父都不认识圣经最基本的经文。今天福音派在讲台上除了一开始讲一些耶稣的十字架等口号式的经文外，便立即转入自己的经历见证，信徒的信仰就是以这些经历为根基。这怎能不带来今天教会一片片的荒凉！施本尔曾说：“活的信仰不是从圣经来的，乃是通过圣灵的引导产生的。”将圣灵和圣经分开，是教会走入黑暗的根源。

诗 119:49-50 求你記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约 6:63-64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2) 注重人的道德、只靠行为讨上帝喜悦

敬虔派称非敬虔派的人为不属灵的人，后来将人三分后，便将他们称为“属肉体的人”（另外两种是“属灵人”和“属魂人”）。他们反对教会分阶层，这是对的，因教会所有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但他们里面那些属灵人却更是高人一等，竟然能达到全然圣洁，人的虚谎和假冒在此原形毕露。许多敬虔运动的领袖似乎确实有极高的道德，但这是在他们的自传和自吹自擂的书籍里。且不用说把他们的行为对照上帝的律法（因为我们都满了污秽），就是对照今天一般的改革宗教会的治理章程，他们中许多人的行为都会使他们处于被劝惩甚至被开除的行列。所以他们所推崇的圣洁不过是自以为义的圣洁，是人的道德，而不是律法所要求的圣洁。

对于不会讲自己得救经历的人，他们则不承认是基督徒，他们就是如此将属灵的重生和人的特殊经历紧紧相连。敬虔主义更是反对教义，这为后来的自由神学主义及现代主义铺了路。

(3) 打击、淡化了神借教会信徒的牧养

从施本尔的敬虔小组开始，敬虔运动用“小组”、“团契”、“小群”等这些非圣经组织取代了教会的地位和圣工，这一点对今天教会影响极深。离开了神的教会，就像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婴孩离开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历来教父和改教家所一致强调的。但撒但就是要借着这一场运动，让更多的婴孩离开教会，离开神在教会中设立的圣职，进入到他们所谓属灵的、敬虔的、圣洁的“羊圈”。直至今日，福音派的小群弟兄会的传道人领袖都不称自己为牧师、长老，仍称自己为弟兄，以表自己的谦卑。其实这并不是谦卑，乃是人要表现超越圣经的“谦卑”。

提前 3: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6、富朗开

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 1663—1727，又译：弗朗克、法兰克）是莱比锡大学的年轻教师。他在年轻时就接受了施本尔的敬虔运动信仰，于是就脱离了教会，与几位好友组成“爱经团”，其成员皆是大学教师。有一次富朗开正在预备讲道，突然经历了所谓奇妙的感觉，他确认自己经历了重生得救。1696年，富朗开前往哈雷附近的格劳查（Glauchau）小镇牧会，倡导信徒积极参加建立孤儿院及学校等社会服务活动。1694年，他因其组织能力和才华出任哈雷大学（Halle University）的教授。因受其长达三十年的影响，哈雷大学成了敬虔运动的中心。

哈雷的敬虔运动也积极鼓励海外宣教。1705年，丹麦国王征召传教士到印度开展宣教事工，其中就有两名哈雷大学的学生。18世纪期间，哈雷及其教育机关更是差出了不下六十名的海外宣教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士瓦次。士瓦次（Schwartz）自宣教后一直在印度传道，直到逝世。

在神学方面，哈雷的敬虔运动开始淡化正统和异端的一切界限。他们主要是为亚米念主义平反，但他们为异端平反不是根据圣经教义，而是基于他们所提倡的爱和包容的理念。一位激进敬虔派信徒亚尔·诺德（Gottfried Arnold）在1699年发表了《中立的教会与异端史观》，认为我们不能因当代潮流而判定异端，必须深入其思想。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说谁是异端，包括亚流主义等大公会议已经定论的异端，否则就是论断。

第二节 亲岑多夫和摩拉维亚小群的兴起

1、早年成立芥菜种会

亲岑多夫（Nicolaus Zinzendorf）是早期奥地利贵族的后裔。他于1700年出生在德累斯顿。10岁时，他被送到富朗开的哈雷大学。在那儿，他接受了敬虔运动的信仰。

亲岑多夫不久就显出了他的领袖才能。他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社团，名叫“芥菜种会”（芥菜种团契）。芥菜种团契强调团员要向人作见证，在人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在言语上和行为上活出基督徒的榜样，彼此相爱，远避赌博、跳舞等属世的事。除此之外，团契还要求团员破除宗派的界限和隔阂，援助那些因信仰受逼迫的人，并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教会之外的“团契”。三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教会的概念已经陌生，许多大学校园内外的学生聚会都以“团契”命名。他们以消除宗派的“善良愿望”为目标，企图建立一个超宗派的基督教体系。

芥菜种团契每个团员都戴上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希腊文“没有人该为自己活”。芥菜种团契的标记雕刻在金制的徽章上，徽章的一面刻有“基督的鞭伤”，另一面刻有“我

们得医治”。身为芥菜种团契领袖的亲岑多夫胸前更是挂着一个金十字架，十字架的中间刻有一棵芥菜树。

芥菜种团契逐渐扩展，由于依靠通信，分成各处所谓“细胞小组”，形式非常隐秘。一些圣经中没有的体系立刻吸引千万人的追捧，从此，后代的基督教也纷纷开始建立“小组”、“细胞”等形式的组织。离开圣经定规的教会模式，人们真是倍感“快乐”和“自由”！

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显示，芥菜种这一以反对组织群体的团契竟发展成一个最大的国际性组织。许多国际上的显要人物都是该团契的成员，包括美国乔治亚州州长奥格托普、英国圣公会的埃特布里的大主教朴特、法国天主教的巴黎枢机主教诺埃勒斯等，芥菜种成了一棵覆盖全球的大树。

在差传事工上，芥菜种团契有着遍布全球的想法，实不亚于贵格利一世的“普天之下为我牧区”的思想。当亲岑多夫离开预科学校时，校长富朗开评述：“有朝一日，这位少年人会在世界上光芒夺目。”

亲岑多夫的伯父地位显赫，是萨克森王国（King of Saxony）的陆军元帅。由于膝下无子，他视亲岑多夫为自己亲生的儿子。他是一位正统的路德会信徒，对敬虔派很反感，希望亲岑多夫换一个学校环境，到路德宗的大本营威登堡大学读书，于是亲岑多夫在1716年8月25日入读威登堡大学。

在威登堡大学期间，亲岑多夫尝试为哈雷大学的敬虔派和威登堡大学的路德宗的合一而努力，极力地宣扬那极其吸引人的敬虔派思想。亲岑多夫回忆说：“其实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归入哪一个宗派，我实在厌烦这么多的宗派区别。在我里面，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事物。”他说自己具有这种看起来无比属灵高尚的超宗派情结，实际上是自己抬高在各派之上，超越了持守真理教义的各派，超越了神兴起的那么多真理的斗士，似乎他们所持守、所争辩的真理教义毫无价值。

和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毕业后的亲岑多夫也四处游历，当他到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美术展览馆参观时，一幅描绘主耶稣受难的油画——多明尼可·法迪（Domenico Feti）的名画《荆棘的冠冕》——吸引了他。画的下面用拉丁文写着：“为你，我舍去一切；但是为我，你舍去几多？”他的心忽然深受感动，觉得基督舍命的大爱完全征服了他。

这是敬虔派典型的感动方式，这种感动不是通过他们学习圣经真理，而是借着这些外在的景象使他们心潮澎湃。爱德华滋分析道：他们为之感动的不是神话语本身，因为这话语早已经写在圣经上，他们为之感动的是神话语出现的方式是那么独特，使自己的灵命超凡脱俗，成为信仰群体中特殊的属灵人。

1721年10月，亲岑多夫回到故乡德累斯顿，在萨克森王国的奥古斯丁法庭（Court of Augustus the Strong）担任御用律师。在这期间，亲岑多夫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如《耶稣领我》。

2、摩拉维亚弟兄会

胡斯战争期间，在捷克波希米亚东北部的康瓦特（Kunwald）村庄，一些人成立了合一弟兄会。宗教改革后，摩拉维亚是重洗派受到新教和天主教双重打击后的主要流亡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地，重洗派的信仰在摩拉维亚得到兴旺。为了逐渐摆脱“重洗派”这一名称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他们便以“胡斯派的弟兄会”自称。重洗派由于没有领地的保护，所以始终面临新教和天主教的双重危险。但此时他们找到了和他们信仰相近的神秘主义敬虔派领袖亲岑多夫伯爵，请求他的庇护。出于同道和信仰上的同情，亲岑多夫慨然应允。于是这群重洗派的后裔便移居到亲岑多夫的封地。1722年6月17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守望村，也称“主护村”（Herrnhut，另译：赫仁护特）。

1723年8月，根据芥菜种团契的精神和信念，亲岑多夫在守望村和另外3名同工共同决志，四人决意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带领团契进入更深的灵命。经过他们的不懈耕耘，到了1727年初，团契迅速膨胀和扩展，守望村团契人数达到三百多人。但有些人本来是路德宗和改革宗信仰背景，由于弟兄会的信仰与传统教义相差甚远，因而产生分歧。这立即被那些“灵命高深”的人斥为撒但分裂的行径，许多人为此大哭祷告，求上帝除去这“魔鬼的作为”。

1727年5月12日，这一天是摩拉维亚运动的纪念日。亲岑多夫召集了三百多名守望村的信徒，向他们讲了三小时道。亲岑多夫陈述了教会分裂的害处和邪恶，并与众人缔结了两份协约：一份协约表明他们应承担的责任，在庄园里不得违法乱纪，这协约称为《庄园约束令》；另一份协约要求他们只接受《使徒信经》，不可在其他教义“细节”上产生分歧和论断，并且当用所有时间灵修祷告，这份协约就是《仅以使徒的准则来规范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地弟兄们言行的协议》。守望村的信徒同心合意地接受了这两项协约。人们都认为以往那种为了教义而起的争论是属血气的，都渴望作一个凡事接受圣灵直接引导的人。

亲岑多夫又读到约翰·夸美纽斯于1650年在波兰利沙写的《临危母亲的见证》。夸美纽斯的遗作中特别强调合一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们的母亲，所谓母亲临危，就是教会处于分裂的光景中。

3、摩拉维亚“圣灵大浇灌”

1727年8月13日，星期三，这一天被视为摩拉维亚聚会的五旬节。那天，罗泽牧师先在守望村讲道，然后与会众一起步行一里路，到伯色杜夫教堂参加聚会。等到在教堂唱诗的时候，人们很难分辨什么是唱诗的声音，什么是哀哭的声音。

亲岑多夫带头跪下，会众也随着跪下，大家痛哭祷告。来自汉勒斯多城堡的苏斯牧师站起来说：“祈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分裂、脱离宗派思想和分门别类的罪，祈求主的大能保守我们，叫我们专一地倚靠宝血和十字架。”

当大家恳切祷告的时候，突然发生近代灵恩派聚会常有的所谓“圣灵浇灌”现象，很多人失去自控，当会众离开教堂时，他们分不清身在何处。守望村的另两位负责人克里斯谦·戴维（Christian David）和梅尔乔奥·聂克文（Melchior Nitschmann）正在六十里外的撒伯拉（Sablat）的一间孤儿院，突然里面也同时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催促他们跪下大哭祷告。

亲岑多夫和大家一致认同，这一天是摩拉维亚信徒们的五旬节。

1727年8月27日，24位男信徒和24位女信徒立下志愿，要开始从午夜至午夜每小时不止歇的祷告，称为每小时连祷，这种二十四小时连祷的形式一直流传至近代福音派教会。就像许多人禁食非要超过四十天一样，这样祷告似乎也要超越了耶稣天不亮就退

到旷野祷告的行动。

真理和错谬本来就只一步之遥，但却有天壤之别。丢弃真理的确性和真实性，把为真道竭力争辩之举皆视为撒但的分裂作为，这是对合一的最大误解，正如有一位神学家所说：“合一绝不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衡量这次以合一为由的“圣灵大浇灌”，我们不妨看看其二百多年后为教会结出的果子——今天的教会抛弃传统教义，反对神学知识，将基督教再次带进愚昧和迷信的深渊——我们由此不难判断当初带来复兴的背后之灵的实质。保罗是讲合一最多的使徒，但他的心充满了对犹太教等异端假道的愤恨；约翰是讲爱心最多的使徒，但对持否认基督人性这种错谬教义的仇敌，他没有一丝包容和合一！

约壹 4:1-2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4、摩拉维亚的差传事工

1728年2月10日，在聚会中，亲岑多夫讲到土耳其、西印度群岛、北欧各国、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美洲的格陵兰（Greenland）等地方，让大家看各人差传的异象。从此摩拉维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差传运动，世界各地的摩拉维亚差会都受其指挥。亲岑多夫到过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西印度群岛。

1731年，亲岑多夫在哥本哈根遇到两位爱斯基摩人。回到守望村后，亲岑多夫就把这项传福音的负担和挑战摆在弟兄们面前。1733年，约翰·贝克（John Beck）等三位摩拉维亚宣教士乘搭“克里达斯号”（Caritas）大船到达格陵兰，但果效甚微。

虽然摩拉维亚的信徒在宣教时，也宣讲基本的十字架福音信息，但由于其本质是人本信仰，一味追求神迹感觉，所以虽然起初似乎很有果效，有成千上万的人所谓归主，但这种建立在感觉经历的福音没有力量，而且容易造假，使信仰虚浮化，和后来的灵恩运动一样。摩拉维亚当初到过的那些国家民族现今多数仍是比较迷信落后——从非洲到印度，民族的信仰没有大的转变，仍以当地土著的原始宗教为主。这与摩拉维亚所谓的包容和相爱分不开。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一点当初整个岛屿或整个国家在摩拉维亚的带领下全部归主的痕迹，和改革宗清教徒的足迹所到之处皆蒙祝福截然相反。

第三节 循道派

1、约翰·卫斯理的家庭

约翰·卫斯理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是在1662年被逼迫的清教徒，被剥夺了圣职。但是到了其父母时，他们却离开了加尔文主义的不从国教派，加入了当时亚米念派的圣公会。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在英国林肯郡的埃普沃思（Epworth，另译厄普卧）任圣公会牧师。撒母耳·卫斯理和妻子苏珊娜（Susanna Annesley，又译苏撒拿）生有十八个孩子，其中九个夭折。约翰·卫斯理生于1703年6月28日，是第十五个孩子。

约翰·卫斯理从小受父母的影响，特别是受母亲苏珊娜的影响最深。苏珊娜要求小孩子背诵主祷文和圣公会的祷告文。卫斯理22岁时，在写给他的信中，苏珊娜清楚提到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她的亚米念派“预知论”：“神预定拣选某些人得救是根据祂的预知，他们会以自己的信心来接受救恩。”约翰·卫斯理后来一直都是持守此立场。

撒母耳·卫斯理常需外出布道，苏珊娜就经常召集家庭聚会，不少左邻右舍也应邀参加，家庭聚会的人数激增，有时多达二百人。后来有人向撒母耳·卫斯理投诉，认为苏珊娜·卫斯理是姐妹，不适合带领聚会。苏珊娜辩称：“这是那位天地的主给我的托付，我不过尽力领人来聚会。”苏珊娜由此开创了基督教女性带领聚会的先河。

卫斯理这时也开始集中精力仔细地研究圣经和书籍。他尤其喜爱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荷兰亚米念派的大师）所写的圣经注释与布尔（George Bull，颇负盛名的道德主义者）的神学著作。所以，卫斯理年轻时从父母学习了亚米念主义，耳濡目染，后来又受这些大师的思想熏染，自己自然而然就跟随父母的脚踪行，成了“道德主义式的亚米念主义者”。

1720年6月24日，约翰·卫斯理17岁。他离开查特公立学校，就读于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1725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开始阅读中世纪多马·厄·肯培的名著《效法基督》。约翰·卫斯理认为：多马·厄·肯培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不苟和质朴，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令人敬佩，却是无法效法。他同时阅读了道德主义作家劳·威廉（William Law）的著作《敬虔和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Holy Life）。劳·威廉的书打动了他的心，他开始向往过那种完全圣洁的道德生活。

2、加入“圣洁会”

1727年2月14日，约翰·卫斯理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里，他任希腊文的讲师，又兼教导哲学和逻辑学。1728年9月22日，约翰·卫斯理在牛津正式被圣公会按立为牧师。这时，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法兰西斯·戈尔（Francis Gore）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在伦敦创立了“圣洁会”（Holy Club）。卫斯理从家乡回到牛津后不久，就被选为圣洁会的领袖。

圣洁会会员后来被称为循道友（Methodists），因他们循规蹈矩地祷告、济贫和探访监狱犯人，因而得名。

3、卫斯理弟兄在美洲遇到摩拉维亚宣教士

1734年，奥格托普上校从美洲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回到伦敦，想找寻一位牧师到乔治亚，年俸五十英镑。苏珊娜认为这是良好的事奉机会，支持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的圣公会传播福音。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也应邀担任了奥格托普上校的秘书。兄弟两人于是在1735年10月乘搭鲜敏号（Simmonds，又译：希盟斯号）前往美洲，同船的还有另一名圣公会的成员便雅悯·殷涵（Benjamin Inghem）。



图 5.2 鲜敏号上的摩拉维亚信徒

在船上，约翰·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从德国外出的摩拉维亚派的信徒，他们在船上的领袖是大卫·聂克文（David Nitschmann）。这些教徒的行为表现非常严肃谨慎。据传鲜敏号轮船遭遇暴风侵袭，船客处境危险，然而摩拉维亚信徒神态镇定，给约翰·卫斯理留下很深的印象。

1736年2月15日，鲜敏号轮船抵达美洲的萨凡纳河（Savannah River，或译撒万那河）口岸。在那里，摩拉维亚传教士史宾真堡（Augu Spangenberg，又译：斯潘根贝格）迎接了约翰·卫斯理。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你自己里面有确据吗？上帝的灵是否与你的灵同作见证，证明你是上帝的孩子？”这是敬虔派惯有的交通方式，以显他人的平庸。即使面对一个牧师，他们也毫不例外地发问。往往即使一个真基督徒，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也会懵然不知所措，约翰·卫斯理感到惊讶，不知道如何回答。史宾真堡又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卫斯理回答说：“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史宾真堡接着问：“对，但你是否知道他救了你吗？”他回答说：“我希望他死是为了救我。”史宾真堡最后问：“你认识自己吗？”约翰·卫斯理答道：“我知道的。”

后来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我恐怕自己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缺乏真正的内在平安。”因为敬虔派的所谓“认识”，无非是必须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经历，否则你就是不认识基督。

1736年5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在美洲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这时，约翰·卫斯理遇见了少女苏菲·赫琪（Sophy Hopkey），她是萨凡纳首席地方法官柯士顿（Thomas Causton）夫人的侄女。当约翰·卫斯理给苏菲·赫琪诵读属灵书籍时，她既安静又全神贯注；当他教她法文时，她学得很快。两人彼此倾慕，但卫斯理一直不敢向苏菲·赫琪求婚。由于拖得太久，结果引起苏菲·赫琪的反感和怨气，最后苏菲·赫琪突然嫁给威廉·威廉逊（William Williamson）。

卫斯理于是觉得自己在乔治亚已经无法立足，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就在1737年12月3日深夜，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的港口查理斯顿（Charleston）乘搭撒母耳号轮船，黯然回到英国。

4、在伦敦经历“重生”

回到伦敦之后，1738年5月24日，约翰·卫斯理到艾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那里的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那时有一位弟兄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正在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当威廉·荷兰读到“神藉着人对基督的信在人心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实施改变的工作”时，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样的温暖。就在这一晚，他自述：“九点差一刻，我听到路德描写神如何藉着人归信基督而在人心中作改变之工，我心中感到异常的温暖，我知道我已经真正归信基督、单靠基督了。”单靠基督，这确实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人的重生也确实是藉着神的真理，但这些神秘主义人士的重生过程不是心灵蒙神光照，而是都寄托于这些外在的肉体感觉，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实质。圣灵是用真理光照人心，使人心里能够唯独信靠基督。

聚会一完，卫斯理立刻前往弟弟查理·卫斯理的住宅，告诉弟弟他已清楚知道自己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了。卫斯理兄弟俩合唱一首弟弟查理·卫斯理刚作成的赞美诗。

此后数月，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聚会，这些聚会的主要成员是摩拉维亚信徒。费达巷（Fetter Lane）的聚会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五至十人不等，每星期聚会两次，每月则有一次爱筵。约翰·卫斯理开始向往敬虔运动的圣地——德国的摩拉维亚总部。

1738年6月29日，卫斯理终于来到德国，在马里恩邦（Marienborn）会见了亲岑多夫，与亲岑多夫伯爵长时间地谈论。接着，卫斯理在8月1日前往“守望村”。“守望村”是摩拉维亚信徒的总部，距离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三十里。那里有一所孤儿院，还有一座可容六七百人的教堂。卫斯理在“守望村”住了两个星期。他在日记中有此记载：“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



图 5.3 约翰·卫斯理和亲岑多夫

5、开始露天布道

卫斯理从德国回来之后，他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这时候在英国的海港布里斯托（Bristol），正展开户外露天布道工作。怀特腓虽然是改革宗信仰，但不忘在圣洁会时和卫斯理的友谊，所以在他前往美国布道时，便把布里斯托户外的布道工作正式移交给约翰·卫斯理。起初卫斯理不愿前往，但他后来和费达巷会社的弟兄们讨论这件事。他们抽签之后（抽签的方法一直是许多敬虔运动的人寻求“神旨意”的方法），便决定让约翰·卫斯理接受怀特腓的邀请。这样，上万听众之前听怀特腓传讲的改革宗信息，如今便被卫斯理传讲的亚米念信息所取代。

1739年4月2日下午4时，卫斯理站在布里斯托的一座小山丘上，开始第一次露天

布道。在布里斯托布道期间，他用收到的奉献款项在马市场（Horse Fair）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房子，来容纳听了怀特腓和卫斯理讲道而脱离圣公会的信徒。新房子被称为“循道会”，而事实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间循道宗的教堂。

那时候查理·卫斯理也参加摩拉维亚教派，并参加在费达巷的会社。因一些看法不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于是一些费达巷的摩拉维亚信徒向德国的亲岑多夫伯爵求助。前往美国的摩拉维亚派的摩尔德（Philip Henry Molther）在途中抵达伦敦。但双方看法仍然不同，关系出现了裂痕。

1740年7月20日，约翰·卫斯理在费达巷的一次聚会中，很坦然地陈述了他和伦敦的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某些看法上的分歧。谈到最后，他呼吁那些和他看法一样的人可以起来跟随他。当场就有20人站到他这一边，他们脱离了摩拉维亚教会，转而支持卫斯理。卫斯理和同工多马·马斯费（Thomas Maxfield）将聚会地点改在伦敦的铸造厂，称为“桎梏巷会”（Fetter-Lane Society），由此伦敦的循道会成立。多马·马斯费从未被正式按立为牧师，但是约翰·卫斯理打破教会几千年的传统，特别委任多马·马斯费担任讲道和主持圣礼的职务，开了非圣职人员讲道和带领圣礼的先河。



图 5.4 循道宗伦敦会社

约翰·卫斯理又展开了他在纽加塞尔（Newcastel）的传道工作，于是纽加塞尔也就成为循道宗的第三中心。他们在那里买了一座大厦，大厦内设有教堂、学校、书店。有一次，他站在他父亲的墓碑上，面对着参加聚会的埃普沃思群众，卫斯理大声读出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讲完三天道后，他说：“我在父亲墓前讲道三天所结的果子远胜过我在他讲台讲道三年。”



图 5.5 约翰·卫斯理

6、循道宗在各地兴建

卫斯理为了方便到处旅行布道，就开始骑马。差不多五十年之久，他不断地在循道宗的三大重要据点——布里斯托、伦敦、纽加塞尔作巡回布道。他陆续地在英格兰各地将循道宗教会建立起来。

他又下定决心，要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进发。为把工作范围扩大到上述两个地方，他便频繁前往爱尔兰，前后总共涉海四十二次，涉足爱尔兰各地长达六年。1751年，约翰·卫斯理来到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在那里主领了聚会。苏格兰的信徒因长老会信仰打下的根基，对亚米念派的循道会分辨并加以抵挡。因此直到今日，循道会在苏格兰仍被局限在南部一带，聚会的人数并不多。由于怀特腓的布道，在威尔士的加尔文派教会得到复兴。后来怀特腓又将威尔士数万改革宗信徒拱手让给卫斯理牧养，所以又有了循道宗的威尔士大复兴。

1769年，约翰·卫斯理觉得英国的循道会应该支援在美洲的事工，于是派遣数位宣教士抵达美洲。后来，引起美洲大复兴的怀特腓又返回英国，邀请卫斯理接替他在美洲的工作，于是循道宗在美洲也迅速发展起来。

不久，美国爆发革命。约翰·卫斯理极力偏袒英国政府，他出版了两本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和《冷静地谈谈我们在美洲的殖民地》（A Cal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Lonies）。约翰·卫斯理公然地拥护英国的殖民地当局，反对美国人民的独立，实际上与他的圣公会背景有关。虽然他建立的循道宗与圣公会格格不入，但一旦涉及到与改革宗信仰的美洲清教徒的战争，那么这些素日的仇敌也会立即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们真正的敌人——改革宗信仰。

1776年，美国的独立运动升级为武装斗争，约翰·卫斯理催促所有循道会的传教士返回英国，那时惟有法兰西斯·亚斯贝立（Francis Asbury）一人不肯离开美洲，他不愿遗弃当时在美国的七千名循道会教友，于是赢得了美国循道宗上下的尊敬。

英国循道会牧师临阵退缩后，美国循道会正式脱离了英国循道会的怀抱。许多教友主张由他们心目中的领袖法兰西斯·亚斯贝立来主持美国循道会，但是法兰西斯·亚斯贝坚持一定要尊重约翰·卫斯理的领导地位。

1784年9月1日，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的戴顿街（Deighon Street）按立了两位传道人为执事，他们是查理·华库（Richard Whatcoat）和多马·瓦西（Thomas Vasey）。次日，卫斯理又提升他们，按立两人为长老，以便差遣他们到美国的循道会服事及主持圣礼。另外，约翰·卫斯理又按立他多年的密友多马·科克（Thomas Coke）牧师为美洲循道会的监督。1784年9月18日，他们三人从布里斯托乘帆船出发，并于11月3日抵达纽约。到了圣诞节，美国循道宗在美国的巴尔的摩（Baltimore）举行了一次年会，将美国循道宗命名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宗教条款》上，约翰·卫斯理删除了圣公会原有条款中的十五条，至此美国的美以美会完全脱离了英国的圣公会。

至此，循道会成了几乎覆盖全世界的庞大的组织体系。卫斯理把各地循道会划分成各个层次的片区，称之为“禾场”，差派同工逐级管理、讲道，自己成为这“金字塔”的顶尖。

7、卫斯理的生活

到了18世纪的中叶，循道宗的会友已经接近十万人，内中大半是女性。当代的评论家形容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最显赫的一位女权运动倡导者”。他安排姊妹们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甚至让她们担任领导职位。

1745年，卫斯理任命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同工葛丽丝·莫瑞（Grace Murray）为纽加塞尔孤儿大厦的管家。此时有许多单身的姊妹暗中倾慕卫斯理，这在亚米念派教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三年后，1748年8月，约翰·卫斯理在纽加塞尔病倒了，头痛、作呕、发高烧。这期间，葛丽丝·莫瑞细心地给他喂食，并炖清汤给他喝。她似乎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她以手探测他额头的温度，鼓励他：“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此时两人没有任何恋爱关系，就这样单独地在一起。对敬虔派的人来说，两个男女信徒单独在一起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自认自己已“全然成圣”，又没有任何教会和规章的约束，只有那些深知自己仍充满败坏罪性的改革宗信徒才会对此谨小慎微。

卫斯理毕竟是一个人，日久天长，他自然对莫瑞产生感情和倾慕。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可能是性格使然，更可能是神秘主义者所养成的对待一切都很含蓄的性情，约翰·卫斯理就是不向她作婚姻的表白，只是说：“如果我结婚的话，我想你就是我最适合的对象。”莫瑞的答复很大方得体，她说：“先生，你高抬了我。”

直到有一天，卫斯理得到消息，他的同工约翰·宾勒（John Bennet）不日将与葛丽丝·莫瑞结婚。约翰·卫斯理听了这消息，就急急忙忙地找到了葛丽丝·莫瑞，抱怨说：“我们不是讲好要结婚的吗？”葛丽丝·莫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实际上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经过了长时间的交谈，葛丽丝·莫瑞终于答应作约翰·卫斯理的未婚妻。

这件事一传出去，许多循道会的同工就起来反对，包括查理·卫斯理。同工们认为，约翰·卫斯理是以教会领袖的身份，把一个忠心同工的未婚妻夺过来。查理甚至怒气冲冲地夹起正和卫斯理谈话的莫瑞，把她放在马背上，策马扬鞭将她送到宾勒的住处。卫斯理只好再度放弃自己心爱的女子。

后来有人特地为他介绍一个富有银行家的遗孀，她就是玛丽·花雪莉（Molly Vaveille）。玛丽已年40岁，并且有四个已经长大的孩子。1751年2月8日，约翰·卫斯理又通过他传统的寻求神旨意的方式——抽签，结果娶了玛丽为妻。婚后，玛丽·卫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斯理的性格暴露。她粗暴、狂傲，而且嫉妒心极强，不允许卫斯理和其他的女同工多交谈；无论到哪里去，卫斯理都要向她报告行踪。有一次，约翰·卫斯理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卧室时，竟然在卧室内受到玛丽·卫斯理的扭打，结果约翰·卫斯理躺在地上，玛丽·卫斯理揪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在她手里还握着一把连根拔起的头发。当然，玛丽的确是一个悍妇，不需同情。但卫斯理不顾自己配偶的感受，经常和姐妹单独同工，也应对此负有责任。到了1776年，玛丽终于和约翰·卫斯理离婚。

8、卫斯理及循道宗的神学观点

卫斯理从小就接受了父母的亚米念主义信仰。他后来强调说：信徒如果努力靠神恩典，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成为圣洁”的状态。卫斯理的“完全成圣主义”正是“神人合作说”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结果，使人们以主观感觉经历代替真理。早在露天布道初期，他自己以及查理还有当时许多会众都经历倒地、痉挛的现象，和摩拉维亚的信徒一样，他们却都坚信这是出于圣灵的能力。许多人感到好奇，开始追求这种感动，以标榜自己的灵命程度。结果，这种观点给后来的教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卫斯理十分憎恨加尔文主义。他在其著作中写道：“追求圣洁的卫斯理循道派，其直接的对头就是加尔文主义。”他把加尔文主义说成是宿命论：“人得救是借着蒙拣选，不需要成为圣洁。”

卫斯理认为加尔文主义必然导致：（1）拦阻人追求圣洁；（2）反对向世人传讲神的爱；（3）命中注定的宿命论，摧毁了人的道德责任。虽然卫斯理有许多加尔文派的朋友，如怀特腓，也经常和怀特腓争论，但在童年就培养出来的、根深蒂固的亚米念信仰在他里面不会有丝毫动摇。

1739年，卫斯理讲了一篇严厉攻击加尔文及预定论的讲道（这篇讲章后来被编录进《卫斯理作品集》），讲道题目为《白白恩典》。以下是摘录：

这完全是一种亵渎上帝的教义，我本不应当提及那些亵渎的话，但为了我们恩慈的上帝之荣耀及真理的缘故，我不能保持沉默……我要指出这个可怕的教义中一些可怕的亵渎的话。

这个教义把我们神圣的主——公义的耶稣基督——描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骗子、不真诚的人。

这就是预定论的可怕预旨中清楚包含的亵渎的话！这是我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要与每一个支持这种教义的人辩论。你们把上帝描绘得比魔鬼更坏、更虚假、更残忍、更不公……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啊，为什么还四处吼叫呢？……上帝的仇敌和人类的敌人该何等快乐啊！他将叫嚣着不肯放过人类。他将大声呼喊说：“哦，以色列人啊，到你们的帐篷里去！逃离这位上帝的面，否则你们将会永远灭亡！”但是你能逃到哪里去呢？上到天堂？他在那里。下到地狱？他也在那里。你不可能逃离一位无所不在的暴君。

然而听到了这样一篇如此恶毒咒骂加尔文的讲道之后，怀特腓只是感到非常痛心，仅仅提出了温柔的责备。在卫斯理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仅仅过了四个礼拜，怀特腓就邀请卫斯理开始在布里斯托附近向矿工们露天布道，把几万忠实的听众交给卫斯理牧养，自己则去了美国继续布道。

第一章 敬虔运动和摩拉维亚弟兄会

卫斯理精通多种语言。他在 1777 年主编一份刊物，命名为《亚米念杂志》（The Arminian Magazine），借此宣传亚米念主义的思想。因着卫斯理一生的努力，还有循道宗在世界各地的势力和威望，亚米念主义从此脱去了大公教会所定的异端的帽子，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教会历史正统教义的舞台。

第二章 英国圣公会开放和新派丛生

第一节 循道宗成为基督教主流

1、安立甘宗打开信仰大门

随着清教徒改革宗信仰在英国的衰落，真教会逐渐被黑暗遮蔽，1779年，英国国会修改了《信仰容忍法案》，以“接受圣经”取代接受《三十九条信纲》。由于几乎所有与基督教有关的宗教派别、异端、极端都声称自己接受圣经，国教会一下子就为各种异端、异教敞开大门。这样一来，只要说自己是相信圣经，就都是兄弟姐妹，大公会议和宗教改革积累下的所有信经信条都形同白纸。再过不久，国会又取消对否认三位一体者的刑罚，异端也可以明目张胆地注册登记为合法的正统教会了。

2、循道宗教会成为主流

怀特腓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传讲加尔文主义的布道家，但令人琢磨不透的是，他自己虽然坚定地持守改革宗信仰，但却与亚米念派的卫斯理友情至厚。在教会观上，怀特腓更是表现出一位加尔文主义领袖前所未有的轻忽。怀特腓在英国的露天布道影响了几十万人，但他却从未组建过一间改革宗教会，反而使他们继续留在安立甘宗教会中，接受与改革宗信仰完全相悖的牧养。怀特腓每当复兴一个地方，就把他的听众转交给约翰·卫斯理牧养，让他们再接受完全相反的亚米念主义信息。卫斯理藉此机会，使怀特腓掀起的“大复兴”中成千上万听众纷纷脱离安立甘教会，加入循道宗，因此国教会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告白——《三十九条信纲》。实际上，国教会此时已经没有了了自己的信仰观点，这便促使循道宗成为英国教会信仰的主流。循道宗不仅担负起治理英国道德的责任，也成为抵制天主教复辟的主要力量，从此英国的改革宗清教徒信仰几乎彻底没落。关于怀特腓的经历，我们在下一章《美洲大觉醒运动》中再详细介绍。

结 22:26 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清净的，又遮眼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

第二节 英国弟兄会的兴起和分化

1、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兴起

在循道宗大放光彩的时刻，摩拉维亚弟兄会自然也不甘落后。

1825年，在都柏林，爱德华·克伦宁（Edward Cronin）和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决定脱离国教会，开始在家中自行聚会、擘饼。后来，爱德华·威尔逊离开英国，但是法兰西斯·赫契生、约翰·贝勒特、约翰·纳尔逊·达秘和安东尼·葛若弗斯等陆续加入了这个家庭团契。几乎同时，约翰·柏纽尔（第二任刚克利顿男爵）和他的朋友也在另一处开始了类似的聚会。后来，他们都发现了彼此的存在，于是集中在赫契生位于都柏林菲茨威廉广场9号的住所聚会。他们开始不提教派，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各人家中聚会，一同读经、祷告、自由交流属灵经验，特别是在每个主日一同举行纪念耶稣的擘饼聚会，表明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随着人数增多，已经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容纳他们，约翰·柏纽尔于是租下安及亚街的一座拍卖场所，以作为聚会场所。这是爱尔兰小群聚会的开始。

由于他们到各处旅行，类似的聚会就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各地兴起，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特别强调弃绝形式上的组织，没有总会、分会，没有牧师，所有信徒互称“弟兄”或“姐妹”。他们每周举行擘饼聚会，不要求十一奉献，无支薪人员，事奉的人完全靠“信心”生活。后来由于他们在普利茅斯聚会，所以人们称呼他们为“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2、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分裂

1848年，因是否接纳所有信徒参加擘饼聚会的问题，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产生分裂。支持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及毕士大聚会的被称为“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这一群人认为应将圣餐向社会各界开放。支持达秘的聚会（Assembly）则被称为“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当然他们从不这样称呼自己。从1901年开始，弟兄会被倪柝声引入中国，弟兄会运动在华人教会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教义上还是体制上，20世纪的中国教会多数都是采用弟兄会的形式，因而被称为“小群”，直到如今。

3、开放弟兄会的乔治·穆勒

开放弟兄会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布里斯托的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他因富朗开的激励，建立了孤儿院，这项孤儿院工作以“凭信心”而闻名。所谓凭信心就是在做任何事情前根本不看环境条件是否允许，而是要祷告，有带领就立即实施。穆勒一生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世界各地开办孤儿院，传播弟兄会思想。我们在读到他很多“伟大”的见证时，难免觉得有些虚构和夸大的成分。例如在《穆勒传》里大部分都是类似如下的记载：

孤儿院在一次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处境。有天早晨，孤儿院已经没有食物可以摆在桌子上。管理的人对穆勒说：“没有什么作早餐了。”穆勒回答：“神必预备。”又过了十分钟，那人再来提醒他，穆勒只是祷告。在只差五分钟到早餐的时间，有一辆马车载来了面包和牛奶，足够所有的人用。过后，穆勒叫那人来，多给他一个月的工资，对他说：“你过去事奉很忠心，但今天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不相信神，所以无法与我们同心。你不能继续在这里工作了。”便辞退了他。

穆勒相信神是管理万有的神。在一个冬天，孤儿院的锅炉坏了，需要几天的时间修理。穆勒祷告神，求神赐给好天气，免得叫孤儿们受寒冷之苦。结果，那天转了南风，一连几天格外地温暖，直到锅炉修好了。

对于这些玄之又玄的见证，我们当然并非完全否认，因为神的权能和神性何止是只能做到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教会一味推崇这类神迹，而却轻视神借着创造、护理使事情正常发生的规律，必然导致基督教会越来越滑向迷信。

后代弟兄会、循道会背景的人也纷纷仿效这些“神迹”，仿佛自己真成了神人。例如有一个坐火车去念神学的弟兄的见证就是如此。坐火车要预备路费买票是常理，可是这位弟兄竟一分钱不带。经过祷告后，他径直走向车站，恰巧另一位弟兄来给他送行，临别时赠他一本书。然后他凭着信心翻开书，发现里面果真夹着够火车票的钱。下火车没有吃的，他又祷告，结果又有个好心人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他。诸如此类的见证不胜枚举。如果教会里的人真的靠这样的“信心”生活，那么整个社会将会陷入怎样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呢！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箴 21:5 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主耶稣也从未吩咐我们在盖房子前无需计算。恰恰相反，主耶稣警告我们，不要因未提前计算将工程进行到一半未成而遭人嗤笑。可是这些以神秘主义为基础的信仰发展至今，任何出于智慧的筹划、计算都被视为“没有信心”，教会怎能不陷入愚昧的泥潭！

真正的信心是相信整本圣经，根本不是我们作任何事时不要筹算、计划。《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样论述信心：

信心的恩典是基督的灵在蒙拣选之人心中的工作，使他们得以相信，以至灵魂得救。这信心通常是借着道的传扬而产生，又同样借着道的传扬，以及圣礼的执行和祷告而增长并加强。

借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凡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因为那是神以自己的权威说话，又对圣经各处经文以不同的行动来回应——对命令要顺服；对警戒要畏惧；对神所赐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要欢喜领受。但使人得救之信心主要的表现是：凭恩典之约领受、并单单接受，依靠基督、得以称义、成圣、得永生。

信条对信心的定义和敬虔主义所讲的“信心”相差何止千里，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4、达秘与闭关弟兄会

达秘不是弟兄会的创始人，却对弟兄会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并且影响了后代福音派教会。他发明的“时代论”神学思想成为今天掌控基督教的主要力量，全世界绝大部分所谓的基督教会都对时代论的思想深信不疑，从而坚决拒绝改革宗归正教义。他也影响了许多著名人物，包括慕迪、麦钦韬和司可福等。

约翰·达秘（John Nelson Darby）生于1800年11月18日，父亲是海军将领。达秘幼年时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受教育。15岁时，他随家移居爱尔兰，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并于1819年毕业，获得古典文学金奖章。之后他继续攻读法律，于1822年成为爱尔兰的律师。

约在1825年，达秘放弃律师业务，全心事奉。1826年，他被圣公会按立为牧师，在威克罗郡（Wicklow）的科拉兰（Calary）教会服侍。和约翰·卫斯理一样，他时常骑马巡视他的教区。1827年10月，他在骑马时猛然被摔下，撞在门柱上，受伤甚重，被送往都柏林就医。后来他在爱尔兰的姐姐家休养了三个多月。在这长时间的疗养期间，他的心灵起伏，即所谓经历了基督。他以奇特的新观点解释历史的规律，归纳出“邪恶的进展”的思想，类似于“教会在退化”的观点。他说，人败坏了神的计划，神就无法做恢复的工作，只能用新的方法，从而开始新的时代——“时代论”由此诞生。关于时代论的主要思想，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达秘健康复原以后，短时期担任教区的牧师一职。他和几个年轻人开始在家中聚会，有时他也接受国教会讲台的邀请，传讲信息。后来他彻底地离开了英国圣公会，在都柏林租了一个拍卖场，做聚会之用。到礼拜六，弟兄们到那里动手移开家具，主日则在那里读经，祷告，擘饼纪念主。

达秘的另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830年5月。那时他到英格兰去，法兰西斯·纽曼安排他与牛敦（Benjamin Wills Newton）见面。牛敦住在普利茅斯（Plymouth），离牛津不

甚远。那时，牛敦 23 岁，是埃克赛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院士。他们一见如故，一起创建了普利茅斯弟兄会。不久，人数就急剧增加，达到七百人，普利茅斯弟兄会由此得名。从 1836 年至 1879 年，他多次到瑞士、德国等欧洲各地，并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脚踪所到之地，弟兄会运动也随之展开。



图 5.6 约翰·达秘

1845 年，由于在末世论、圣餐论及基督论等许多教训、立场上不同，牛敦与达秘之间产生分歧。经过数方面的疏导无效，达秘与他们分离，并斥责牛敦为异端，开除了他们。但毕士大的开放弟兄会接纳了他们，所以达秘和毕士大的弟兄会彻底分道扬镳。因此，毕士大的弟兄会被称为“开放弟兄会”，达秘这一派被称为“闭关弟兄会”。

达秘不久之后到了美国。在芝加哥，亚米念信仰的慕迪曾邀请他主持查经聚会。达秘一开始读了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不在乎那定意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慕迪以为达秘要讲加尔文预定论，当场起来拦住他，聚会于是不欢而散。

在《司可福圣经注释》出版后，达秘的时代论思想传播得更广。约在 1920 年，弟兄会的信仰由宣教士传到中国，有两位福州海军退役军官王载、王连俊（约翰）也开始了类似弟兄会的聚会。后来倪柝声继续领导这样的聚会，最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地方教会，称为“聚会所”或“小群”。神学家贾玉铭也放弃原来的长老会改革宗信仰，转而接受达秘的国度教训。因着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的推广，时代论一举成为华人教会的主流神学思想。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

5、救世军

救世军是由卜维廉（William Booth）和妻子卜凯赛琳（Catherine Booth）于 1865 年 7 月 2 日在英国伦敦东部创立。根据圣经中“基督精兵”这一个词，他们便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教会”模式，将基督教变成一个国际性宗教及慈善的公益组织，并以街头布道、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等著称。当初成立时他们所使用的名称是“东伦敦基督教传道部”（East London Christian Mission）。救世军今天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 117 个国家，组织内包括不同年龄层的成员约两百多万人。他们的组织里没有长老、牧师这些圣经中的称呼，用大将、上校这些军队头衔来编制。

卜维廉原本是一个循道会的牧师，后来辞去了牧师的工作，在伦敦街头传教。之后，卜维廉就成立了“基督徒会”，并租用一些场地，定期举办福音聚会。

基督徒会的成员在英国迅速的扩展，并在 1878 年更名为“救世军”。这个组织开始扩展到世界各地，卜维廉也成了该组织的“大将”，同时也是其领导者。救世军后来开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始建造房舍供穷人居住，同时设立食物分发中心。



图 5.7 救世军英国伦敦万国总部



图 5.8 救世军徽章

在救世军中，女性被视为和男性平等，也可以得到和男性同样的圣职任命与按立。这在当时的教会界也挑战了以男性圣职为主流的思想。救世军的“军官”通常每隔二到五年会接到一个“前进”的命令，这个命令有可能要求军官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继续执行任务。

在圣言开端上，救世军的神学观点基本接近正统，如相信圣经为上帝默示、三位一体论、信徒因信凭恩蒙救、灵魂不朽、身体复活和最后审判等教义，但他们排斥一切圣礼，强调个人道德与个人得救。他们没有主日敬拜，聚会以街头露天布道的形式为主，并用各种容易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传教活动，如以世俗流行歌曲的曲调配上浅易的宗教歌词，用铜管乐伴奏。所以救世军不具有教会的形式。



图 5.9 救世军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大游行——传“福音”

第二章 英国圣公会开放和新派丛生

此时，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义基本被淡忘，教会、职分、治理等神设立的样式越来越少见。各种名目繁多的基督徒组织、机构纷纷涌出，却不见真正的教会。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一节 改革宗再遭逼迫

1、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

1598年的《南特敕令》使胡格诺派暂时获得许多自由，但亨利四世毕竟名义上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为着王权的利益，他在自己和儿子的婚姻上又完全逞着自己的私欲，娶了天主教徒为王后，使其子孙尽归天主教。所以，不出两代，到了其孙子路易十四时，逼迫基督徒的火焰就再度燃烧起来。

1643年，路易十四（1638—1715）继任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全名路易·迪厄多内·波旁（Louis Dieudonné），自号太阳王（the Sun King）。上台后不久，路易十四就撕毁了《南特敕令》，颁布基督教新教为非法的敕令，展开逼迫法国新教徒即改革宗的胡格诺派的运动。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许多胡格诺派信徒被迫移居国外，大多数移居荷兰、普鲁士、英国和美国。剩余的国内改革宗教会不得不在东躲西藏中继续维持自己的信仰和敬拜，有时在荒郊野岭偷偷聚会，因此这些教会被称为“荒漠教会”。

来 11:37-38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2、“荒漠教会”的库尔与拉波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逼迫暂时中止，却又于1724年再度以新的气焰爆发。参加复原派崇拜的男人被抓去当军舰厨房里的奴隶，女人被终生监禁；凡不把儿女送进天主教学校就读的父母被科以重罚；凡让复原派举行聚会的市镇，全体居民需缴罚款。

虽在难以忍受的逼迫压力下，“荒漠教会”仍继续成长，但是他们的教会生活完全没有组织。后来将教会重新组织起来的是神的仆人库尔，他被誉为“法国改革宗教会的恢复者”。

库尔（Antoine Court）生于1695年。5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坚毅的母亲禀承丈夫的信仰，谨慎地造就、训练儿子。在库尔年幼时，母亲已经将他带去参加胡格诺派的秘密聚会，因此库尔很小就有了敬畏神的心。青年时期，他决定奉献自己，传扬福音。

库尔服侍分散在各处的胡格诺派信徒。看到他们没有组织、紊乱无纪，库尔便在1715年8月召集了一次教会会议，当时他才20岁。虽然他未曾进过大学，但他藉着自修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教育水平，对改革宗教义有充实完善的装备。尽管年轻，但库尔也有丰富的才干和管理恩赐，因此他立刻成为胡格诺派的领袖。他在这次会议中的讲道激动人心，鼓舞了在逼迫中灰心的信徒，并增添了他们的勇气。

由于逼迫夺走了法国改革宗教会的所有牧师，而按照改革宗的传统，平信徒是不能在教会中讲道的，所以在缺乏讲员的情况下，有的教会只能暂时让读完神学的学生讲道，但多数教会仍持守只许按立的牧师才能讲道的条例。于是荒漠改革宗教会的会友们一致同意将他们中间两位有资格作讲员的弟兄——即库尔和科尔德兹（Corteiz）——偷偷地

送到瑞士去接受按立。

为了当时的需要，库尔于1730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创办了一间神学院，用来训练传道人，因为洛桑是法国政府的逼迫鞭长莫及之地。神学院极其简陋，只有一间二楼的房间作为课室，却有许多极具恩赐、完全献身的年轻人在那狭小简单的房间中受教。这间洛桑神学院又被称为“死亡学校”，因为大部分受完训练回到法国改革宗教会事奉的传道人迟早会在逼迫下殉道，这是又一支改革宗教会的“敢死队”。



图 5.10 库尔

库尔认为，荒漠教会的精神是一种内省、智慧、殉道的精神，它教导信徒天天向自己死，治死私欲，预备自己；在神呼召时，勇往直前；面对折磨与绞架时，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拉波就是这种呼召的响应者。

拉波（Paul Rabaut）比库尔小23岁。当他20岁时，他就将自己献身于法国改革宗教会。拉波在库尔的洛桑神学院进修一段时期后，由于恩赐突出，被派回法国。他在法国改革宗教会工作了56年，经历了说不尽的艰难，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然而他以“灵巧像蛇”的精神，一面躲避政府无数次的追捕，一面不懈地牧养各地教会，人们称其为“荒漠教会的使徒”。

3、人本主义思想大兴起

教会被打压而隐藏的时候，堕落之人的理性就开始异常活跃。随着亚米念主义高举的人主权思想进入社会，这个时期兴起了被无神论历史学者推崇的所谓“启蒙运动”，产生一大批后来被誉为“西方圣人”的哲学家，其中代表人物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虽然他们外表上不是无神论，还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但这时的人已经把上帝置于人的理性之下来思考，而人的理性却成了真正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一切宗教、政治都要以此为基础。



图 5.11 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1) 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原名法兰西斯·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是启蒙思想家、剧作家和政治宣传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他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相同的,不存在信仰的分别”。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甚至说“即使没有上帝,人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他反对“君权神授”,认为君权完全由人民所赋予。他主张在所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开明的君主制,主张言论出版自由、人身自由等。伏尔泰被誉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伏尔泰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著作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和诗集。伏尔泰一生非常推崇中国文化,认为“最值得尊敬的时代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2)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1689—1755)也是一名自然神论者、法学家。他的著述不多,但影响却相当广泛。他最著名的著作是《论法的精神》,这是一部反对神学、提倡所谓科学的名著。他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会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产生巨大影响,这一观点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制度的人。

孟德斯鸠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个共和国的不幸,就是它不再有阴谋秘计的时候,这情形发生在国家用金钱腐化了人民。这时人民变得冷静了,热衷于金钱,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离开了上帝,人的思想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难怪今天的无神论政权都推崇这样的哲学家,更热衷于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而人良心中的诚实和敬虔反倒成为人人唾弃的牺牲品。

赛 59:13-15 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 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 说欺压和叛逆的话, 心怀谎言, 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 公义站在远处; 诚实在街上仆倒, 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 离恶的人反成掠物。

(3) 卢梭

卢梭(1712—1778)的祖父原是法国新教徒,但他却开始反对宗教,把宗教描述为原始人所处的原始状态。《忏悔录》是他最早、最有影响的自我暴露的作品之一。他提出“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的观点,这是在亚米念高举人的信仰背景下产生的奇谈怪论。卢梭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

卢梭的政治主张是人民主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他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观念的产生是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消灭不平等的办法就是建立人民政权。他这番言论对法国大革命及后来各国的革命影响最深。

(4) 狄德罗

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主编了《百科全书》,提

倡唯物主义自然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无神论的代表。

1752年，法国巴黎的贵族妇女都喜欢在梳妆台上放上两本精装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这种作法很快风靡一时，几乎成为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一种时尚。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

1、《容忍诏论》

1774年，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六登基。在迎接帮助美国独立战争归来的拉法叶将军后，他被美洲清教徒的精神所感动，便在1787年颁布《容忍诏论》，决定停止对复原派信徒的逼迫。于是在经历了整整九十年的逼迫后，胡格诺派总算又一次获得政府的认可，暂时松了一口气。这是法国近代少有的宽容对待复原教的政府。

可是这时的法国以及整个世界的人心已经全部因着那些人文学者们的鼓噪，对神的教会充满了不屑和敌意，岂能再容忍自己的国王袒护教会？这是大革命爆发的根源。



图 5.12 路易十六

2、三级议会召开

从路易十五开始，由于对新教不断打压，随即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人物，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思想纷纷产生，并且日益深入人心。

就在这时，法国接连发生创历史记录的旱灾，民不聊生，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当法国还没有从这三年前的旱灾中恢复过来时，又因干旱饲料不足出现了大规模的屠宰牲畜的情况。由于法国以牲畜的排泄物为主要肥料，大片农田因缺乏这种农家肥而不得不闲置。1788年7月13日，直径达10厘米的冰雹从天而降，连续敲打着农田，造成大量土地颗粒无收。毁灭性的雹灾之后的一年里，面包的价格涨到最高。同年冬天，法国又处于少见的严寒状态。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造成法国粮食短缺、哀鸿遍野，饥饿的民众也越来越愤怒，暴力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这时法国的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教士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平民为第三等级。代表法国这三个等级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到此时已经有164年没有召开了。由于财政困难，路易十六极力主张向贵族教士增税，以填充空虚的国库，但遭到上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层贵族的激烈反对，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最终未能果断地实施自己的政策。1789年5月5日，为了获得广大下层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破例召开了三级会议。国王希望在会议中解决增税、限制新闻出版和民事刑法等问题，并且下令不许讨论其他议题，但国王的希望仍然在贵族阶级的反对下流产。6月17日，受民主人权思想的影响，第三等级代表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广大贫苦人民，于是他们宣布成立国民会议。6月20日，他们在网球场集会并发表誓言，即为《网球场誓言》。

3、大革命爆发

路易十六怕政局不稳，于是关闭了国民会议，宣布它是非法的，其一切决议无效，并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制宪议会”，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路易十六意识到这已经危及了自己的王位，于是调集军队，企图强制解散议会。7月12日，巴黎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支持制宪议会。次日，巴黎圣母院响起钟声，市民与来自德意志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展开战斗，在当天夜里就控制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7月14日，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监狱，释放四名犯人。战斗中98位起义群众阵亡，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混乱中以赞成君主立宪派为多数的制宪议会在起义中最终夺取了巴黎市的政权，并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后来这一天成为法国国庆日。这时巴黎也出现了一批新的革命团体，其中有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8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0月份，国王再次筹划利用雇佣军推翻制宪议会，但是计划失败，王室被迫从凡尔赛宫迁到巴黎郊区。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失败，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法国大革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联军攻进法国。巴黎民众一面抵抗普鲁士联军，一面再次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开始领导反君主运动。但在1792年8月10日，比雅各宾派稍温和的吉伦特派攻占了国王住宅杜伊勒里宫，拘禁了国王和王后。

4、吉伦特派的统治

吉伦特派领导巴黎市民攻下王宫取得政权后。9月20日，法国军队和各地组织的义勇军在瓦尔米战役中打败外国联军。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1793年1月21日，经过审判，国民公会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教士埃德热沃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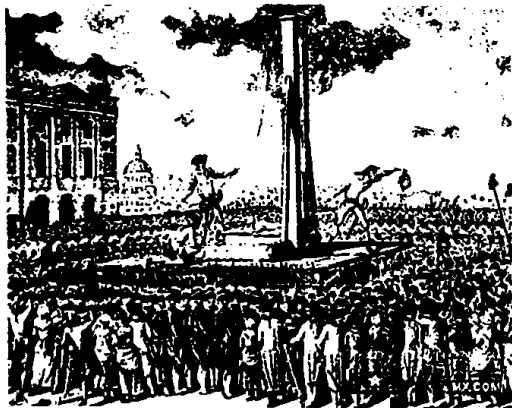


图 5.13 路易十六被砍头

大革命不仅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同时也把无数革命者和民众送上了断头台，仅在1792年9月就有1200名贵族、教士、天主教徒、新教徒被屠杀。

吉伦特派的暴力和血腥相对轻微，远不能满足人们心中要大开杀戒的胃口。1792年，在雅各宾派的煽动下，人们纷纷反对吉伦特派的温和政策。1793年5月31日，巴黎又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5、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专政又称“恐怖时代”，是指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统治时期。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时期，仅仅14个月内就“正式”处决1.7万人。1794年3月至4月，雅各宾内部又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1794年7月27日，热月党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将他斩首。

6、热月党上台

“热月党”上台，展开更大规模的屠杀，他们干脆在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内被斩首的“反革命分子”达六七万人之多。断头台遗址位于今日的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



图 5.14 位于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的断头台

热月党人于10月解散国民公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但政局仍然不稳，波旁王朝无人敢出任国君。

启 6:4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第三节 拿破仑时期及以后的教会

1、拿破仑两次执政

因着对抗英德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1797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



图 5.15 拿破仑

2、拿破仑的宗教政策

拿破仑本人其实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他很明白教会对国家的影响之大，于是他决定先与天主教会合作。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达成重建天主教信仰的协议，人们不由大吃一惊，这些早被革命扫除的东西竟然又重见天日了。

在恢复天主教的地位之后，拿破仑又开始着手解决其他宗教问题。1802年，拿破仑颁布了《新教组织条例》，条例承认新教与天主教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承认法国的两个最主要的新教教派——加尔文的改革宗和路德派，允许教会自由选举牧师，教会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不允许新教与其他国家有任何联系。

这使拿破仑在法国民众的地位逐渐升高，于是他又开始解决犹太教问题。他向犹太教的拉比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犹太教是否实行一夫多妻制？犹太教徒是否被允许与基督教徒通婚？离婚是否不用取得行政当局的批准？在犹太人眼里法国人到底是同胞还是外国人。（2）拉比的权利和地位如何？（3）高利贷是否合法？有没有犹太人禁止从事的职业？

拉比们的回答是：“犹太教禁止一夫多妻制，犹太教徒可以与基督教徒通婚，离婚需要行政当局批准，法国人是兄弟，法国是法裔犹太人的祖国，拉比没有特殊权威，高利贷违反犹太教摩西律法，犹太人可以从任何职业。”这和拿破仑的治国观没有冲突，所以他无比高兴，因为他又得到了一个教派的支持。于是，他宣布犹太教也是合法的，与其他教派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法国乃至欧洲历史中，犹太教第一次得到政府的保护。

此时，天主教仍是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由于前二百年的大逼迫加上大革命的屠杀，信仰新教的人数很少，不到几万人。然而，三个宗教的地位与权利是平等的，这使得法国出现了人民大团结的局面，人民得到空前的宗教解放。

通过宽容的宗教政策，拿破仑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使他得以数次打败反法联盟。这是神再次借着这位统治者使法国已经快熄灭的真理之光没有立即被扑灭，教会仍然在黑暗中生存。

3、拿破仑后的法国动荡

拿破仑稳固政权后，穷兵黩武，不断向其他国家扩张。1815年6月18日，在布鲁塞尔南部的滑铁卢，英国、荷兰联合普鲁士王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展开了一次著名战役，拿破仑帝国军队覆灭。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又发动七月革命，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1847年至1848年，亲政府的保守党派领袖基佐（Guizot）掌握实权，但政府统治仍然软弱。法国的天主教也不满基佐偏重自由主义的宗教政策。

1830年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法国广泛流行，出现了圣西蒙（Saint-Simon）、傅里叶（Fourmier）等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成立民间组织，积极宣传其主张，更增加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1840年，对拿破仑的崇拜再次抬头，法国民众把拿破仑再次看成是一个英雄。自由主义者开始举行很多“宴会”，踊跃活动。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聚集一起呐喊，要求推行改革。他们高唱《马赛曲》，并在街上燃烧杂物。路易·菲利浦眼见大势已去，仅做了某些无用的挽救措施，如撤销基佐的职务等，以讨好革命者，但他最后还是被迫放弃王位。拉马丁等人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52年12月2日，议会宣布恢复帝国，拿破仑一世之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1870年9月4日，随着普法战争惨败，巴黎再次发生革命，共和派在市政大厅宣布废黜波拿巴家族。1871年3月18日，共产主义的巴黎公社成立，公社立即取消了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没收教会财产，从此改革宗教会在法国几乎消失。

4、天主教在法国的恢复

从1830年的七月革命开始，天主教不再被称为法国国教，而只不过是大部分法国人生活的点缀而已。但天主教也并未甘心退出法国主流，仍积极活跃在政治、教育领域，并获得了重要胜利。1850年，法国天主教徒得到了完全的教育自由权。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进入共和时期，宗教相对自由起来。一直到今天，天主教仍占据法国宗教的主流。

法国近代王朝谱系见附录三。

第四章 天主教收复失地和西欧教会的衰落

天特会议，特别是《禁书目录》的制定，虽然成功地阻止宗教改革在天主教内继续传播，但教皇不会满足于只守住现有的统治范围。新教中的敬虔运动兴起之后，亚米念主义、神秘主义信仰被广传，正统的宗教改革教义几乎遭到倾覆性的冲击。趁此机会，在耶稣会等组织的不懈努力下，天主教也在各个国家开始了大规模收复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疆域的运动。这一次运动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思想领域的斗争，但却收到了在战场上厮杀流血所得不到的巨大成功。

第一节 德国的大学失落和改革宗教会的衰落

1、新教教派的大学

16世纪时，大学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力量。《奥斯堡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各领地的独立性增强，德意志的各诸侯纷纷组建大学，并加以资助。路德宗被确立为国家教会之后，新教的诸侯随即组建了一批大学，如马堡大学、柯尼斯堡大学等。

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即腓特烈一世，并从此展开了普鲁士王国二百多年的显赫历史。1789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境内共有大学40所，其中天主教大学19所，新教大学19所，这些大学都受单一教派信仰的限制。只有下面这两所大学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争夺的阵地——海德堡大学和马丁·路德的母校埃尔弗特大学。

2、海德堡大学失落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期，海德堡大学曾经成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该校对欧洲的影响在16世纪后半叶达到了顶峰。1588年至1618年之间，海德堡大学以加尔文派为主导。三十年战争期间，大学的教学活动曾被迫停止。在巴伐利亚占领与统治之下，海德堡大学被天主教化。1652年，重新获得权力的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将其重建为加尔文派改革宗大学。

1706年前，该校只有五位新教教授和四位天主教教授。三十年战争和普法尔茨的继位战争期间，学校曾经两度停办，大学濒于破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时期，大学得以重新开办。耶稣会却狡黠地利用政府竭力稳定各宗教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组成反法同盟的机会。耶稣会让其成员竭力进入海德堡大学各专业任教。为了表示宗教宽容，在选帝侯的压力下，该校五位新教教授作出妥协，和原来四位天主教教授一起将另五位耶稣会的教授请进大学，新教从此失去这座宗教改革的阵营，学校成为天主教大学。

随着时代的推进，到19世纪初，海德堡大学竟变成德国“理性主义”和自由派（新派）神学的中心之一。18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下令，强迫路德宗与改革宗联合，当时已经衰落的改革宗教会只能提出微弱的抗议，最后新教成为德国宗教界很小的一部分。

3、埃尔弗特大学

宗教改革以后，埃尔弗特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新教徒，17世纪初，在路德母校埃尔弗特大学，新教教授仍占多数，迫于政府的压力，这些新教教授必须转让几个系给天主教，以达到宗教宽容的目的。这些新教教授受敬虔运动的影响，认为应该在法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中发光，而那些教义、神学的研究对教会的意义似乎不大，所以他们一致决定把神学系的教席让给天主教徒。17年后，埃尔弗特重归美因茨选帝侯。1651年，学校内天主教和新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法学家、医学家、哲学家组成的新教诸系强烈反对耶稣会教士不断介入校长的选举。但全校公投结果公布后，这些新教教授才发现全校师生已经被天主教思想所同化，新教在此大势已去。

4、其他几所大学

其他大学大都受单一教派信仰的限制。启蒙运动思想渗入到德国后，各大学教派限制天主教的原则开始松动，新教的大学在世俗化诱惑下纷纷跌倒。

哈雷大学本来也是改革宗基地，后来在富朗开的努力下成了德国敬虔运动的中心。这些去除一切神学教义的敬虔运动根本抵挡不住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联合冲击。18世纪时，哈雷大学也成为天主教大学。

哥廷根大学成立于1734年，并在1737年将英国的自然神论引入课堂，同时在课程内容中增加了历史神学、帝国历史和统计学。受敬虔运动和启蒙运动影响，哥廷根大学不久也全部成为现代理性主义的基地。

由于敬虔运动反对知识、反对神学，所以教会主动失去了教育这一块重要阵地，整个国家的信仰没有了根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开始莫衷一是。一方面，由于敬虔主义者认为只要有经历、见证就行，结果教会陷入迷信而更加被世人藐视。另一方面，人们的心必然要崇尚那些理性、哲学，因此人文主义、理性主义、高等批判学和无神论开始大行其道。

第二节 德国自由主义学说及新派神学兴起

1、原因及背景

一方面，此时的教会打着神学教义无用的旗号，抛弃了神学教义，因此教会势必要走向神秘主义，走向迷信，愈加无知，并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随着亚米念主义的广泛传播，人在救恩中的作用得到肯定，从而人的理性地位越来越高。此时芬尼在美国兴起复兴主义，更加重了人可以成就一切的梦想，连人自己的得救甚至圣灵的复兴都可以完全通过人的方法获得成功，那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这个世界必然再次拿着理性的光环，引诱着基督徒走进另一个泥潭——不要再那么迷信了，应该用你的头脑去思考，那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初代教会的马吉安和孟他努给教会带来的悲剧再次重演。这就是自由主义学说产生的根源。

随着自由主义哲学的泛滥，自由主义神学也悄然兴起。自由主义神学的特征就是用理性解释圣经，而拒绝用信心领受启示，理性通不过的东西就是假的，因而他们必然要否认一切神迹，否认耶稣的复活和救赎，人能靠自己选择得救，人也照样能靠自己的努力成圣，所以教会只要强调宗教的道德就足够了。这正是初代伯拉纠所强调的。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启 12:15 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她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原文作“河”）。

2、自然神论

（1）自然神论定义

自然神论（Deism）就是把神和世界的关系比喻成表匠与表的关系：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后，就不再管这个世界，只让它依循自然规律自己运行。虽然他们似乎承认神的存在，也承认神的创造，但他们完全否认神的护理，却认为通过人的力量、人的努力，他们就可以掌管未来，把神赶到遥远的天外。他们完全不信圣经，只强调自然启示的重要性。他们胡诌宗教不应该有教义和体制，宗教没有那么实在和具体，宗教应该是浪漫的、朦胧的，是神在遥远的过去留给我们的一些美妙的记忆。在他们看来，宗教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只能在虚幻中享受，这又是柏拉图主义、诺斯底主义发出的蛊惑的声音。这一时期的文学、音乐、艺术都以这种虚幻的自然主义为主。

自然神论是这个世界对敬虔运动反对教义和体制的协奏。但圣经毕竟是真实的，怎么办？自然神论者只能用理性解释圣经、用历史解释耶稣、用内在感觉实现天国。对于耶稣的复活，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样强解圣经：“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又是对敬虔运动提倡的以感觉经历为信仰的回音。

（2）自然神论的代表学者

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有马修·藤德尔、托马斯·乔伯和罗德·赫尔伯特等。在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富兰克林和杰弗逊总统也接受了自然神论，还有许多自然科学家也纷纷加入这个领域，成为自然神论学者。

自然神论者大都是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例如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他在1772年发现了二氧化氮、氧气。他做过教师，也当过牧师，一生反对基督教，写过《基督教腐化》。他一生盼望英国也能发生大革命，彻底铲除基督教，但理想终未实现。还有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曾写了《常识》一书，以鼓舞争取独立的北美民众的士气。后来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潘恩撰写了《人的权利》，成为启蒙运动的指导作品之一。在《理性的时代》一书中，潘恩强烈地反对基督教，富兰克林虽为其好友，但迫于教会的压力，一直拒绝出版该书。1792年，他被选入法国国民公会。他在1809年死去，由法国房东太太将其埋葬，参加葬礼的仅有六人。

3、休谟、笛卡儿的自由哲学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人们不应该再相信启示，那么人类对知识的获得要通过什么途径呢？此时欧洲哲学思想对知识的获得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以洛克、休谟等为首，强调一切知识只有通过经历、经验才能获得，而且应该用自己的经验可以去怀疑一切。休谟曾经举过一个“人能下蛋”的例子。他说，就连这样妇孺皆知的“人不能下蛋”这样一个常识你也不要完全相信，当有一天你看到一个人真的生下一个蛋后，你就会改变你的看法。连这样最起码的世间现象都不可以相信，那么圣经上叙述的那些事物就更不要相信了，这才是休谟等人的真正目的。这些怪论正和敬虔运动强调经历感觉的信仰形成一曲完美的四重奏。

理性主义以笛卡尔为代表。笛卡尔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判断，理性是一切知识

的来源。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表达的意思就是连人的存在都是因为人在思索，人若不思想就不存在。他干脆把人的理性抬高为万有的本源，视人的理性与神同等。这没什么好稀奇，这就是古蛇那句呼喊的再现：“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4、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这一时期兴起的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康德综合了休谟和笛卡尔的观点，认为知识只能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经验可以转换为知识，这就需要理性的检验，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人的理性。康德提出即使是圣经也要伏在人的理性之下来检验和批判，因此他成为第一个提出用理性批判圣经的人。他认为基督只是征服被罪恶腐败的历史的战胜者，是我们的道德典范、导师。在这一点上，康德也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开拓者。

对他来说，所谓与上帝和好，就是通过行善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康德与神学有关的主要著作是《在理性局限里的宗教》，他在这本书中将基督教完全说成是一个道德宗教。

5、新派（自由派）神学创始人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出生在德国，幼年在摩拉维亚弟兄会虔敬派学校读书，从小就深受敬虔运动和神秘主义信仰的熏陶和影响，宗教在他的心里就是感觉、情感、经历的代名词。他在1785年入读巴比神学院；1787年进哈雷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由于哈雷大学是敬虔运动的大本营，他在那里受到系统的敬虔运动的训练，像禁食、守夜等。

1810年，毕业后的施莱尔马赫担任柏林三一教会牧师、新柏林大学神学教授。此时的德国已经全部被敬虔运动和启蒙运动侵占，许多大学干脆退后到天主教信仰，宗教改革的场景已不复存在。施莱尔马赫开始著书立说，更大胆地冲击正统信仰的底线，主要著作有《论宗教》、《基督教信仰》、《新约导论》和《耶稣传》等。



图 5.16 施莱尔马赫

他以个人主观情感为宗教的起源，主张圣经里只有能带动情感的内容才是真确的。他也是第一个否认圣经无误的人。这种依赖感情的“基督教”信仰最终还是发展成道德目的论，还是回到伯拉纠的邪路。他认为信仰重点是人对上帝的认识，而不是上帝的启示，这种认识只能从情感中去经历。比如，他提醒基督徒要注目于活在历史中的耶稣，而不要思想从上而来、具有神性的基督，所以耶稣只是我们的模范，因此他的基督论中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并不包含童贞女生子和基督的复活、升天、再临等主要教义。施莱尔马赫发明的新派神学迅速在教会内蔓延，世界各地教会开始传颂“这位历史中的耶稣”，再也不提“你是神的儿子”了，最后就连圣公会这样大的宗派也把这种信仰当成主流。人们开始在缠绵婉转的歌声乐声中去寻找宗教的体验，醉心于圣诞节、复活节等节日，在舞台表演中找到宗教的乐趣。

由于自由派迅速发展，所以急需一个理论阵地。于是在1837年，自由派在纽约市设立了“协和神学院”（Union Seminary），这间神学院今天在美国仍为自由神学的大本营，自由派后来被称为“不信派”。



图 5.17 纽约协和神学院旧址

第三节 圣经批判学和无神论的诞生

1、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是德国最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之一。1788年10月黑格尔到杜宾根神学院（又译杜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816年黑格尔开始在海德堡担任哲学教授，他根据讲课提纲编辑成《哲学全书》，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是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在哲学领域提出较系统的无神论思想的人，无神论思想家马克思就是他的学生。



图 5.18 黑格尔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分成几个时期：作为“幼年时期”的东方国家，只有王一个人是自由的；处于“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的希腊和罗马，不仅是王，连罗马和希腊的元老阶级和贵族阶级等都有自由；到了历史的“成熟时代”，普鲁士王国（德国）所有的人都得到自由，历史的完成将由德国民族来实现，这一理论后来被纳粹利用。黑格尔以后，杜宾根大学成为圣经批判学的中心。

2、祁克果

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译作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被称作存在主义之父。

祁克果将“因信称义”中的“因信”解释为决断的“信”，这一定是受了亚米念的启迪。他认为信仰就是实存过程，他所说的实存的三阶段如下：第一阶段是美的存在，第二阶段是伦理的存在，第三阶段是宗教的存在，所以需要信仰的飞跃。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没有任何绝对的概念，“黑非黑……罪非罪”，什么东西都可能是颠倒黑白，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黑的东西，它可能是白的，你看到一个人正在犯罪，他可能正在作善事。这样一来，撒但用这些迷惑人的伎俩，不仅把绝对的实实在在的圣经真理完全颠倒，而且因着这种反常思维，多少人会进入精神错乱和分裂之中。那些今天仍在称颂这些自由派哲学家和神学家如何伟大的传道人，真该带他们到精神病院，让那些因这些错谬言论而错乱的人唤起这些传道人一点同情心。

3、圣经批判学

所谓圣经批判学，就是撒但用各种理性科学、哲学证据，使用一些工具，来否认圣经的真实性。圣经批判学包括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和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低等批判着眼于圣经文字本身的构成和含义，即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亦作经文校勘，或经文鉴别学）；高等批判着眼于圣经各个章节的作者、写作日期以及写作地点等。

20世纪以来，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历史批判方法，也被用于圣经批判。这些方法包括：文本批判、来源批判、形式批判、校订批判、社会—历史批判、修辞批判、叙事批判等等。施莱尔马赫之后，又涌现出许多差役批判圣经的权威，主要有：

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另译黎秋，1822—1889），这名德国基督教的神学家像施莱尔马赫一样，教导宗教不单单是理论，而且也有实践。他反对一切传统的教义，他说这些教义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与实践无关、与道德无关。基督的死也不是抵罪的死，最重要的是他留下一个道德典范，感召他人过相近的生活。

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另译哈内，1851—1930），是一位德国神学家，是立敕尔的跟随者。哈纳克透过《基督教是什么？》一书，普及了立敕尔的观点。哈纳克否定耶稣曾经宣称为神，否定神迹。

包珥（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另译鲍尔，1792—1860），主要批判新约，否定传统基督教教义，并且发展出一种历史批判的方法。他将黑格尔的“正反合”哲学应用在圣经上，刻意地在新约中找寻矛盾的元素，来支持他的理论。

史特劳斯（David Strauss，另译施特劳斯，1808—1874）是包珥的学生，否定圣经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记载的历史准确性，指出那些记载都是由耶稣的跟随者加以粉饰的，视圣经是充满了“神话”的，这概念是从黑格尔的哲学而来的。他主要从事对旧约的批判，发明了“底本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理论，认为《摩西五经》是在五个世纪期间由不同文件汇编而成的。

布士内纳（Horace Bushnell，另译布须奈尔，1802—1876），这位美洲的神职人员，如欧洲的施莱尔马赫一样，被称为“美洲自由神学之父”。他反对原罪教义，提出小孩出生时是良善的，如果培育得法，他就是一个好孩子。除此以外，布士内纳也反对圣经默示的教义，并且提倡基督之死的典范理论（example theory）。

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另译饶申布须，1861—1918），是一位美洲浸信会的圣职人员，传讲社会福音，被称为“社会福音之父”。他大力提倡社会关怀的神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因他认为那是由于人的贪婪所引起的。对饶申布士来说，福音不是个人得救的信息，而是耶稣的爱的伦理，这爱可以解决社会邪恶，改良社会。

一时间群魔乱舞，阴风凄凄，似乎神的教会就要被这些淤泥所淹没，但教会依然在风雨中屹立，散发着魔鬼永远也遮蔽不住的馨香。自由主义神学没有铲除神的教会，却给世界带来无尽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就是要击碎人们对这些群魔的信任和欣赏的梦想。

诗 46:4-8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细拉）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也是产生这些错谬邪说的温床，著名布道家孙培理（Billy Sunday，又译比利·桑戴）甚至愤怒地说：“把地狱翻转过来，你知道底下写的是什么呢？——德国制造！”

1850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启蒙运动、自由神学和一切宗教批判学走到了巅峰。宣言开篇：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法国、俄国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类历史进入新的篇章。

第四节 英国教会的衰落

1、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教会状况

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继位。他的母亲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儿，信奉天主教。威廉最初的教育是由7个不同宗教背景的荷兰家庭教师负责，当然这些荷兰教师有的也是有英国血统的。从1655年4月起，威廉开始接受新教教育，师从于加尔文主义者康纳利斯（Cornelis Trigland），在接受新教教育的同时，他也受着不同宗教的影响，因而威廉里面有着对教会各个宗派包容的愿望。

威廉三世继位不久，于1689年提出《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这是威廉三世宗教思想和宗教政策的体现。法案中阐明了反对者的权利，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贯彻

到底，针对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进行处罚的法令都不再使用。《宽容法案》提出了两条必须要忠诚地接受并宣誓的条例，第一条是“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我真心保证我将忠心于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从心底憎恨异端的教义，任何外国的王子、高级教士、政权或君主都不能在这块领土上获得任何至高的管辖、司法等权利”。另一个需要宣誓的是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誓言：“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新约和旧约组成的圣经奉为神圣的启示。”如果仅以这两条作为教会的信仰告白，那连天主教和几乎所有异端都可以接受。抛弃了对纯正教义的详细阐述，教会将开放手持圣经的各类异端错谬的闸门，英国进入所谓宗教自由时代。

威廉三世于1702年3月在一次骑马中不幸摔亡，根据《嗣位法》，王位将传给詹姆士二世的第二个信奉新教的女儿安妮。安妮女王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加之她一贯采取亲国教的托利派的国内政策，使得在安妮统治后期终于促成保护国教权威的宗教政策。17世纪，天主教不再视托利党为主要的威胁，托利党支持英国国教会，但保持着对清教的反感态度，而辉格党比较同情清教徒，他们在政治上最关心新教的继承问题。所以安妮女王统治早期，托利党三次向议会提交《偶然遵奉国教法》，为了支持高派教会，提出了关于加强安立甘宗国教会地位的《反教会分裂法》，由于托利党始终支持英国国教会，所以国教会中极端的倾向于天主教的高派教会再次得势。高派教会便继续通过种种软硬兼施及用经济利益诱惑的手段，使清教徒渐渐脱离原来持守的信仰，改革宗教会在世俗诱惑面前大大萎缩，前面第四部已有所陈述。

2、汉诺威王朝对教育的掌管

安妮女王因没有子嗣，将王权移交给了汉诺威王朝。汉诺威本来是德国的王室，英国进入汉诺威的乔治时代，英国的王室就等于进入了德国的时代，那些德国的淤泥自然要流向英国。这时随着国会势力的加强，又因着卫斯理亚米念主义的影响，基督教不再关心任何文化、社会使命，英国进入议政时代，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教完全分离。19世纪中期，对国教的改革使得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为松动。当时，国教只是一个地位特殊的宗教组织，它的教区按着国家基层行政组织划分，但此时国教会（即圣公会或安立甘宗）仍负责在各地管理学校、主持婚礼等。19世纪70年代之后，政府与教会之间在教育上开始实行“双轨制”，地方政府办的学校中保留公共宗教课程，如果有家长要求，则其子女可免受宗教教育，这就使教育从宗教中逐渐被分离出来。到了19世纪后期，在这种国教日益丧失其原先职能的情况下，教育等领域的改革被提上日程，国家逐渐垄断了教育、救济等行业，教会逐渐退出社会文化舞台。

3、改革后的国教与政教分离

通过循道宗的复兴，使教会脱离政府、脱离社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就连圣公会在这场运动中也未能幸免。原来的大学包括牛津、剑桥这些著名大学，都是教会研讨神学教义的地方，是把握国家宗教方向的信仰阵地，但此时那些受神秘主义熏陶的基督徒们视这些研究教义学问的地方为远离敬虔的象牙塔，教会也将其视为阻碍灵命成长的沉重包袱。那么因着工业革命，经济腾飞，政府官员们自然有能力也乐意接过这个包袱，使教育彻底脱离宗教的影响，成为带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所以自1830年以后，汉诺威王朝的国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改革现有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制度，增设“商业学院”之类培养实务人才的学院。政府大力发展以科技教学为主的世俗化的开放大学。这些大学大多建在新兴工业城市，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如伦敦（1836年建）、达勒姆（1837年建）、谢菲尔德和伯明翰（1840年建）、曼彻斯特和圣戴维（1850年建）、纽卡斯尔和利兹（1870年建）等，其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还在科技工程方面，成为近代新型大学的榜样。

（2）阿诺德以“拉格拜”为试点的“公学”教育改革，政府不再让教会（无论是国教会还是非国教会）参与学校的教育，强调学校要减少古典课程，特别是对圣经的研究课程，鼓励多增加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课程。

（3）针对“公学”中如牛津、剑桥这些在19世纪上半叶的“落后”守旧的大学，议会于1850年成立旨在促进教学改革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和“公学调查委员会”，考察牛津剑桥，以督促这些大学尽快脱离宗教。1861年确立了培养各类“社会精英”人才、去除培养教会牧师的教育理念。

19世纪30年代之后，议会先后通过一系列立法使国教已不再享有政治特权，但英国仍是名义上的新教基督教国家，所以宗教与政治表面上尚未完全分离，原因如下：一、国王是国教的领袖，全国的几个大主教要由他任命，但另一方面国王的加冕礼又要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二、主教名义上要由大教堂的教长和驻堂牧师选举，但他们必须选国王提名的人，而国王提名的根据又是首相的提名。首相也是听了有关官员的建议；三、国教会如有重大变革，要经过国会讨论通过。实质上这时的宗教已成为纯粹的个人精神领域的事，已与政治、经济分离，换言之，社会变得日益世俗化、多元化，这已是大势所趋。宗教改革的呼声、清教徒的斗争，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梦，信仰的持守、永生的盼望再也不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只能是餐桌上的闲聊的话题。

4、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

虽然在世俗洪流的冲击下，基督教会退出社会的历史舞台。但天主教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正好借助这一股洪流卷土重来。19世纪中期由英国牛津大学部分教授发动了一场天主教复兴运动，称为牛津运动，又称“书册派运动”。该运动主张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天主教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运动领导者纽曼、凯布勒、皮由兹等人发表了一系列书册或论文，为这些主张作了理论说明或论证，故被称为“书册派”。反对他们的英国政界和国教会人士则斥之为罗马主义派（纽曼后来确实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会），该运动对英国国教会的影响不大。

1833年6月，基布尔做了一场题为《举国叛教》的布道，揭开了这次运动的序幕。紧接着，纽曼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文章，后称《时论册集》（Tracts for the Times）。

基布尔和蒲赛又在其中加入了《神圣大公教会神父丛册》，宣传回归教会中世纪的信仰和习俗，1841年，纽曼和曼宁干脆将运动转向为恢复罗马天主教的运动。但是牛津运动内部的多数人也反对这种转向，在蒲赛的领导下，仍保持对国教的忠诚，并超越了运动起初的学术气质而成为国教会改革乃至社会改革的契机。

牛津运动本来是为了恢复天主教昔日的教会权威和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最后成为力图发展宗教社团生活的运动，这些社团成为慈善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从1845年开始在各地成立了多个姊妹会，男性团体相对较少。

牛津运动强调崇拜活动的过程，尤其在后期对教堂样式和礼拜仪式做了许多改变，比如教堂的装饰、布道时的声调、礼服的穿着，并重视圣歌的歌唱。每一项恢复天主教仪式活动的努力都引发轩然大波，有时甚至引发骚乱，其中1860年伦敦东区圣乔治教堂

就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因为其支持者试图以暴力使国教会承认天主教的古老礼拜仪式和教条教义，因此牛津运动也被叫做“盎格鲁天主教运动”。

187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礼拜章程法》，明确表示要“打击礼仪主义”。至1887年，有神职人员拒绝议会的法令而坐牢，但此后这样的抵抗被认为有理而得到尊重。牛津运动末期，其追随者日益强调基督徒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而重视社会问题，并在1889年建立了“天主教社会联盟”。在世俗冲击面前，天主教这一段时期的表现似乎比基督教更勇敢，可是最后只能是混淆视听，使人们更加反感厌恶各类宗教的复兴。这就为后来的无神论成为英国的主流宗教铺好了路。

5、现代英国向无神论的妥协

1859年11月3日，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从此几千年人们心中的上帝创造万有的信念被倾覆，无神论似乎找到了源头。对于进化论，即使是较开放的英国圣公会起初也难以接受，国教会纷纷批驳和谴责这种亵渎上帝的行径，可是时隔一百年之后，英国的国教会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开始产生松动。

2008年9月15日，英国圣公会向已故生物学家达尔文道歉，承认一百多年前误解了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圣公会在致歉函中写道：“查尔斯·达尔文先生，在你诞辰二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圣公会向你致歉，我们当初对你（的理论）作出错误反应，误解你且影响其他人对你的看法。”达尔文的后人对圣公会的做法并不领情，达尔文的玄孙认为，迟到百年的道歉“没有意义”。此文曾被许多无神论国家大肆宣传，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一次胜利。

第五章 教会在美洲大陆

第一节 教会在新大陆扎根

1、南美洲为天主教所占有

探险家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经过 70 个昼夜的艰苦航行，于 1492 年 10 月 12 日最终发现了美洲大陆。他当时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从此开创了美洲大陆的历史。

早期探险者与殖民者为不同目的而纷纷前往新大陆，多数是为了淘金，也有人是为了传扬“福音”。不久，航海最发达的西班牙、葡萄牙便在墨西哥、西印度群岛、中美及南美洲各地兴建了大批殖民地。这两个国家都是坚定的天主教阵营，所以移民者把南美这块土地变成了坚定的天主教国家。后来各国移民也开始涌入，特别是从法国因迫害来避难的胡格诺派新教徒也纷纷来到这片土地，结果这些人刚逃出虎口又入狼窝。1565 年，南美洲的西班牙人为了铲除从法国来的这些追求宗教自由的新教徒，将 142 人施以绞刑，理由是“非因他们是法国人，乃因他们是异端”。

从此，新教徒对这片土地望而却步，再也不敢冒险前往了，因此中美洲和南美洲至今仍以天主教为主。



图 5.19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耶稣铜像

2、圣公宗第一次踏入美洲

1584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占有美洲这块未知土地，令其宠臣罗利爵士派遣探险队考察北美东部沿海一带，提前将这一带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1607 年 4 月 26 日，英国有 3 艘船在史密斯等人的带领下在弗吉尼亚亨利角登陆，帆船“苏珊恒久”号停泊在詹姆斯河口。他们在此定居下来，并将此地命名为詹姆斯敦（雅各镇）。

这是英国改教后第一次的远航，标志着英国开始统治美洲殖民地。但此时由于这些移民船队乃是奉国王命令前来，他们的信仰自然属于安立甘宗，所以圣公会最先在北美扎根，这为后来美洲清教徒为争取信仰自由进行的斗争埋下伏笔。由于近代美国改革宗信仰的衰落，所以一些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就任后第一个参观浏览的地方就是停泊在詹姆斯河口的“苏珊恒久号”，以表明美利坚民族的根在这里。



图 5.20 帆船“苏珊恒久号”停泊在詹姆斯河口

3、第一批清教徒在北美

在英国国内受迫害的独立派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后，在当地一些土著人的帮助下，开始在此建立家园，大家终于可以同心合意的建立改革宗教会了。他们按照《五月花号公约》，以上帝的律法治理这地，不久许多村镇被建立起来。此时英国国内的逼迫仍在继续，不从国教者沿着“五月花号”的航程，纷纷逃亡美洲这一片自由的土地，英国一时间形成了向美洲大陆的移民潮。

1630年，当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带领700人乘船前往新大陆时，他告诉船友们：“北美应该是一个山巅之城，应当成为一个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和示范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清教徒们深深知道，教育是建立教会后第一项重要任务。专心研讨圣经，传承教会正统的改革宗教义，为教会培育传道人才，这一切都离不开基督教教育。所以，1636年，他们在马萨诸塞州又设立了一间基督教学院。为了纪念为这个学院大批捐款的哈佛牧师，而定名为哈佛学院，就是今天的哈佛大学。由于这批清教徒不少都是剑桥大学的校友，所以就将大学所在地也命名为剑桥镇。1701年，清教徒们在康涅狄格州建立耶鲁大学（以利大学），以圣经中的“老以利”命名，意思是我们虽然软弱，但我们会尽心培育出撒母耳那样杰出的领袖，带领教会进入复兴。

1683年，苏格兰长老会差派了第一位北美的长老会宣教士弗朗西斯·马克迈（Francis Makemie, 1658—1708）。弗朗西斯·马克迈是一位爱尔兰牧师，他被认为是美国长老制的奠基人。马克迈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多尼戈尔郡拉梅尔顿镇（Ramelton）的阿尔斯特—苏格兰社区，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1682年在西阿尔斯特的拉根（Laggan）长老会被按立为牧师。1683年，马克迈抵达马里兰州，当年在雪山镇建立了第一个长老会社区，后来又在这里建了几座长老会教堂。马克迈很有传福音和组织的恩赐，上帝透过他的不懈努力，使长老会的教会先后在弗吉尼亚、北卡、纽约等地被建立起来。仅仅过了23年——1706年，第一个长老会区会组织成立，当时有六位牧师被按立。1707年，因为没有传道许可证，马克迈被纽约州州长科恩伯里勋爵逮捕，后被宣判无罪释放，这也成为了美国宗教迫害的里程碑。马克迈于1708年在弗吉尼亚州的东海岸逝世。现今美国长老会在东弗吉尼亚所拥有和经营的马克迈森林露营地，就是以弗朗西斯·马克迈命名的。又过了13年——1719年，长老会第一个总会成立，当时包括三个区会：费城区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会、纽卡斯尔区会和长岛区会。

4、荷兰改革宗教会抵达新大陆

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也开始了向美洲的移民，来自荷兰的移民，在神学上保守的改革宗教会中，有一直存留到 20 世纪的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和其它一些派别。多特会议后 9 年，他们在新大陆建立第一间改革宗教会，这是于 1628 年在迈可留斯牧师的领导下成立的。新荷兰殖民地最有名的牧师是范·米可兰伯（Van Mekelenburg），他被认为是复原教宣教士中第一个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人。有些人本主义书籍诬陷改革宗教会不向土著传福音，实在是歪曲历史事实。

5、其他宗派也来到美洲

1631 年初，一位年轻的英国浸信会牧师威廉斯去普利茅斯担任“天路客教会”的牧师。经过一些艰辛，他在 1642 年建立了美洲第一所浸信会教会。

1681 年，贵格会信徒威廉·潘恩获英王特许状，在宾夕法尼亚为贵格会的生存和发展寻找庇护所，建立了美洲的贵格会（教友派）。由于早期传教活动的发展和移民不断增加，教友派教徒数量迅速增长。到了 1776 年，教友派教会的数量达到 310 个，在各教派中位居第五。

1727 年至 1745 年间，有许多德国人也开始移民美洲，其中最大的团体就是信义宗，从此信义宗也在美洲安了新家。

循道派是较迟到达美洲的宗派，由于循道派运动 1739 年才在英国开始，所以一直到独立战争后，循道派才在美国成立教会，但却成长迅速，这还是有赖于怀特腓的宽容所致。

第二节 教会经历大觉醒

1、大觉醒的背景

到了 18 世纪初，由于各宗派纷纷在美洲安家落户，美洲居民的信仰越来越远离了清教徒初到时的敬虔纯朴，特别是亚米念主义人本思想侵入美洲，使美洲教会灵性低落、教义混乱、世俗化严重。于是神使用一些器皿，一系列奋兴聚会在殖民地各处展开，史称“大觉醒”。之所以称之为真正的复兴，因为这次复兴正是具有使徒时期教会复兴的标志。关于复兴，神学家作如下定义和解释：

复兴并不是发明一套新的信仰、敬拜，而是教会在已有的恩典基础上，以通常的方式（蒙恩之道），在程度上更上一层楼。所以判断复兴的依据和判断真假基督教的依据相同，那就是真理是否被传扬、教会是否归正。教会历史中称为复兴的运动很多，比如克吕尼复兴、摩拉维亚复兴，但这些是否是真正的复兴，我们只有透过真理来检验。所以教会一味地追求复兴，却不关心复兴真义的时候，常常中了魔鬼的圈套，因为“魔鬼从未想阻止复兴，它只是想驾驭复兴”。

2、怀特腓早年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又译怀特菲尔德）1714 年 12 月 14 日生于英国叶罗斯德。怀特腓两周岁时，生父逝世，遗下孤寡 8 人，乔治最幼。15 岁时，怀特腓被

迫辍学返家协助母亲料理旅馆。他在日记上写着：“他每日围上蓝色围裙、洗拖把、扫房间，作他母亲顾客的童仆。”

18岁时怀特腓得着读书机会，赴牛津上学。最初一年平淡地过去，学校的功课占据了全部时间。后来怀特腓加入了卫斯理在牛津的“圣洁会”，和查理·卫斯理建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他在里面循规蹈矩、热切追求，但始终没有得到卫斯理说的那种“神奇的新生命”。

于是怀特腓恐惧自己没有重生而将沉沦，所以开始用苦修的方式追求，不再吃美味的食物，穿着肮脏破陋的衣服，一天很少讲话。他以为这样就能有那种重生的经历，结果仍没能经历到重生，反倒强大的精神压力下，身体变得极其虚弱。但他不但没有调整自己的生活，到1735年，他的苦修反而更加疯狂，不住地禁食，六天只吃一点面包，每天流泪，大声呼喊。最后他也像马丁·路德一样，将自己弄得骨瘦如柴，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在床上平躺，却还是没有得到那种“神奇的新生命”。

此时怀特腓几乎彻底绝望，不得已离开了学校，回到格罗斯特静养。修养期间，他向朋友加布里埃尔·哈里斯（Gabriel Harris）借了一套《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借助这套注释书，怀特腓接受了已经在英国几乎消失了的改革宗信仰，他再也不去追求那种神秘莫测的经历了，而是在圣经中扎根建造。怀特腓原本在圣洁会中轻忽教会牧职，但现在他完全变了，他要作一位牧师，宣讲神的真理。由于当时清教徒的改革宗教会已经没有了，所以在1736年6月20日，怀特腓接受了圣公会格斯特主教的按立，并在圣玛利亚教堂开始了第一次讲道。但此时他心里仍割舍不掉卫斯理的循道宗，这一牵挂影响了怀特腓一生，也影响了整个教会历史。

3、怀特腓在美国开始露天布道

1737年，怀特腓收到卫斯理由美洲寄来的邀请信，卫斯理邀请他去美国的乔治亚州。1737年12月，怀特腓应邀乘“魏达格号”（Whittaker）轮船抵达乔治亚州，此时正是约翰·卫斯理沮丧地离开美洲返回伦敦的时候。怀特腓在乔治亚的侍奉颇见成效，教会人数迅速增加，礼拜堂很快就显得拥挤了。为了申请办理官方许可证以及筹措资金建堂、开展孤儿院等各项工作，怀特腓于1738年返回伦敦。这时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已经加入了伦敦的摩拉维亚弟兄会，而且此时二人又经历了所谓“圣灵浇灌的重生经历”，成为坚定的亚米念主义者。

怀特腓回到英国后，首先来到布里斯托，在一个叫金斯伍德的矿区，他开始尝试第一次露天布道。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爬上一座小山，向二百人讲话，我终于做出了破冰之举。虽然可能有人会反对，但我如果只讨人的喜悦，不讨主的喜悦，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怀特腓放胆宣讲加尔文的教义，这个刚刚在英国消失不到一百年的教义使人们觉得耳目一新。结果第二次聚会就来了两千人，礼拜五再去的时候就来了四千人，最后露天聚会竟然达到三万人，可见此时英国社会的荒凉和饥渴。

聚会人数和次数越来越多，怀特腓想找一个人接替他在布里斯托的露天布道工作，所以他不顾信仰教义的分歧，写信邀请卫斯理兄弟二人。开始卫斯理对这个新生事物颇感疑虑，犹疑不决，最后他和“桎梏巷会”的成员们用传统的方法，就是随手打开圣经，看出现什么字。他们四次打开圣经，结果出现的都是有关受苦和死亡的经文，于是想到这可能正是经历十字架死亡的机会，因此弟兄二人就来到布里斯托。又到聚会的时间了，人们等待着怀特腓来继续宣讲，但此时出现在高坡上的却是卫斯理。从此，卫斯理开始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了循道宗在布里斯托的工作。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对循道会来说，这毕竟是一次重大转折。

此时怀特腓又开始了在伦敦的露天布道工作，听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增加到五万人。但怀特腓回英国毕竟是暂时的，他真正的托付是在美洲，所以，怀特腓仍想把伦敦这五万听众交给卫斯理牧养。但就在这时，卫斯理讲了那篇激烈地攻击咒骂加尔文主义的讲道，甚至称预定论是魔鬼的工具，同时又提出“人能全然圣洁”等违背正统教义的思想。于是怀特腓犹豫不决了，但里面那种“相爱”、“包容”占据了他大脑的主导地位，所以他又决定把这五万听众拱手交与卫斯理，并力劝他们加入循道宗，自己则去了美洲。循道宗从此成为了英国主流。



图 5.21 怀特腓在露天布道

4、怀特腓在美洲的复兴

1739年10月，怀特腓重登美岸。从1737年开始一直到1770年，他在美洲七次旅行布道，足迹踏遍美洲的各个城市山村。无论他走到哪里，听众都蜂集云涌地前往，要听这位满有激情、大有能力的传道人的呼喊。他的听众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官员，也有后来的政治家富兰克林，有第一位向印第安人宣教的大卫·布瑞纳德。这期间，他也来到大觉醒中神重用的另一位仆人约拿单·爱德华兹所牧养的地方——北安普顿，并在那里持续几天进行布道。虽然爱德华兹在某些传福音的细节上不全赞同怀特腓，但二人的信仰教义完全一致，都是改革宗信仰，所以二人相互尊敬。怀特腓称赞爱德华兹，说：“在新英格兰没有见过能与爱德华兹相提并论的人。”

在美洲的数年间，卫斯理曾数次写信给怀特腓，二人就教义问题分歧严重。怀特腓表示不愿意和他们就此分离，为此，他不愿回到英国，以免产生更大的争论。但在怀特腓的影响下，查理·卫斯理的亚米念信仰有些动摇，甚至几乎欣赏预定论的教义了，也对他哥哥约翰提出的“人能全然圣洁”的教义也颇感质疑，他创作的诗歌里就有许多表达上帝恩典的内容。怀特腓去世后，查理还写了536行长诗《献给已故的乔治·怀特腓牧师》以表纪念。

1743年，怀特腓回到了英国的威尔士，在那里掀起了复兴运动，但为了搞好和卫斯理的关系，又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于是他将那里的聚会命名为“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宗”。

他继续邀请卫斯理来协助牧养。卫斯理欣然来到这里。但毕竟两人的教义相差甚远，无法同工，怀特腓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里的工作。1748年，怀特腓又决定放弃他在英国一切露天布道的听众，全部交由卫斯理牧养，同时也辞去他在循道会的一切职务。此时他无限感慨：“愿这里的人忘了我怀特腓，也不纪念卫斯理，只知道耶稣基督。”可是事隔几百年的今天，人们只知道是约翰·卫斯理带来了英国的大复兴，带来了循道宗的大复兴，却很少有人知道怀特腓的工作。

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怀特腓这样一位神重用的仆人，却一生就是不与和自己信仰完全相背的亚米念主义人士分别，而且也不建立改革宗的教会？答案只有一个——人的有限和有罪。我们是站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看这段历史，对那些错谬异端及教义的偏差给教会带来的可怕后果一目了然，但在怀特腓的年代，在人们开始对信仰冷淡的时候，他心里的托付就是唤起人们的火热，其他的因素在他心里都不重要。

5、塞缪尔·戴维斯

塞缪尔·戴维斯也是大觉醒中一位重要人物。1723年，塞缪尔·戴维斯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年轻多病，曾在布莱尔牧师的木屋学院学习。1748年，在弗吉尼亚的汉诺威，戴维斯脱离圣公会，建立了独立的教会，戴维斯的讲道充满激情，对丧失灵魂充满了爱和焦急，对罪恶和不冷不热严厉鞭策，特别是针对当时新英格兰牧师的痛斥毫不留情，下面是他一次讲道的摘录：

让我感到悲伤而吃惊的是，就牧师们的日常表现和他们的讲道来看，他们都表现出愚昧的平静和冷漠，仿佛他们的听众正摩肩接踵地进入天堂，没有任何危险情况发生一样。“平安了、平安了”，他们的冷血让大批人走向毁灭，却不告诉他们灭亡的痛苦何等可怖。在上帝面前，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当事人的良知，他们平常的谈话也体现不出活泼的信仰，除非这里的牧师愿意改变自己，否则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希望。

神要复兴教会，首先要复兴一批牧者，所以对牧者们如此严厉地责备，确实唤醒了许多人的心灵。数年内戴维斯的教会人数达六百人，并建立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拿骚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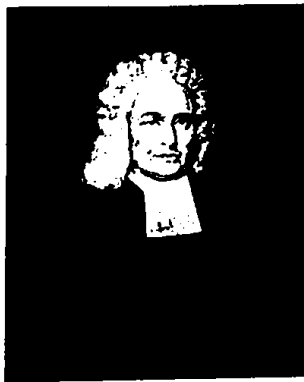


图 5.22 塞缪尔·戴维斯

6、贾勒特

贾勒特（Devereux Jarratt, 1733—1801）是宾夕法尼亚州长老会牧师，他的讲道也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带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复兴。可是后来他却脱离了长老会，加入圣公会，再后又邀请卫斯理循道会接管其牧养的许多间教会，结果使循道宗在北部彻底扎根和复兴。

第三节 约拿单·爱德华滋

1、爱德华滋早年的服侍

17世纪初期，威廉·爱德华滋（William Edwards）即爱德华滋的曾祖父，是一位不从国教者，从英国移民到新英格兰，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d）。威廉·爱德华滋是一个桶匠，制作木桶、铁桶等。威廉·爱德华滋于1647年5月在哈特福特生下理查德·爱德华滋（Richard Edwards）即爱德华滋的祖父。理查德·爱德华滋于1669年5月14日在哈特福特生下提摩太·爱德华滋（Timothy Edwards）。1687年，提摩太·爱德华滋18岁时，就读于哈佛学院，这是当时美洲殖民地唯一的神学院，并于1690年毕业。

1694年11月6日，25岁的提摩太·爱德华滋娶了23岁的以斯帖·斯托达德（Esther Stoddard）。婚后两人就从哈特福特搬迁到康涅狄格州的东温莎（East Windsor）。以斯帖·斯托达德是一位敬虔爱主的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的女儿，斯托达德牧师是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和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Valley）一带所公认的属灵伟人，很受当地人敬重。提摩太·爱德华滋在东温莎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六十年，在1703年10月5日生下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另译乔纳森·爱德华兹）。爱德华滋有四个姐姐，六个妹妹，所以他是提摩太·爱德华滋牧师唯一的男孩子。

爱德华滋小时候在家里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育。父亲不断要求他练习作文，目的是培养他的写作能力。儿童时期的爱德华滋，神就赐予他极强的观察力，他写的有关动物行为的文章如《蜘蛛拉网的过程》等后来都被写进大学生物教材中。

1716年秋天，13岁的爱德华滋进入康涅狄格州的专科学校。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逻辑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第三年学习算术、几何学和一些天文学的知识。1719年夏天，爱德华滋进耶鲁学院读高级班时，年仅16岁。1720年9月，爱德华滋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还不足17岁。获得学士学位后，他继续在耶鲁学院进修神学课程两年。19岁时，他领到一张允许他讲道的证书。

1722年，爱德华滋开始写《立志》（Resolutions）。《立志》是祷告文，用来鞭策自己，为自己设下一个目标，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他后来停止写《立志》，原因有可能是他觉得不应依靠自己的能力立志行善。《立志》共有七十项，估计是在他重生之后写的，而最后一项是在1723年8月17日写成的，现摘录如下：

一、立下志愿，我愿做任何我认为最能荣耀神，而与我有益的事。在做这些事时，我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不论是现在，或是在无穷尽的年代里。我将尽我的责任作我认为对人类有帮助和有益的事，无论在这过程中遭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我亦毫不退缩。

三、立下志愿，若我来日跌倒或消沉，以致忽略遵守我曾立下的志向，当我情形正常时，我要为所能回忆起的，一一认罪。

.....

五、立下志愿不浪费一寸的光阴，并尽我所能的，以有益的方法，运用所有的时间。

《立志》并非是福音派那种重生决志，而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向神表达自己愿意效法基督成为圣洁的心愿，从而也鞭策自己不断殷勤地过圣洁的生活。

1723年9月，爱德华滋前往新哈芬，去接受耶鲁大学授予他的文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接受担任耶鲁学院教员的聘请。在耶鲁教书期间，爱德华滋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聚精会神地阅读牛顿和威斯顿两位科学家的著作。他的兴趣完全集中在自然界的一些物理现象中，包括虹的出现、流星的现象、水的蒸发、燃烧的过程、血液的循环和冰的凝结等等。但爱好终归只是爱好，并不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

这时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失去了早期的热心和虔诚。在耶鲁大学教书时，爱德华滋看到教会普遍荒凉的现象，对教会有了负担，于是开始装备自己，大量阅读加尔文、约翰·欧文等清教徒的书籍。有一次，爱德华滋在回家途中生病，疗养数月，在他生病的时候，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人生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荣耀神而活。一个人得以献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有价值 and 荣耀的事。他病后在东温莎长期疗养，实际上是仰望神更进一步的带领和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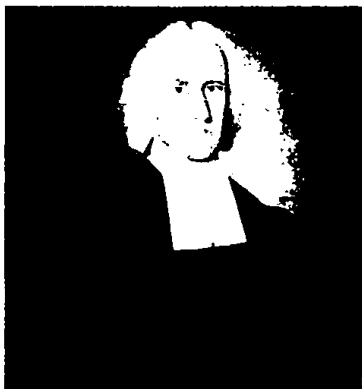


图 5.23 爱德华滋

1726年夏天，他虽然回到耶鲁教书，但他心里知道，只要时机一到，他随时都会放下教书的职业，而分别为圣、专一地出来服侍主。1726年8月29日，在北安普顿（North Ampton）的教堂担任牧师的所罗门·斯托达德，即爱德华滋的外祖父，邀请爱德华滋任助理牧师。心里早已准备服事主的爱德华滋立刻接受这项邀请，毅然放弃在大学任教的职位。在1726年9月26日的日记里，他记述了决心出来事奉主之后的心情：

大概有三年之久，我的灵性大多数时间是消沉的和低落的，我对属灵事物的知觉是迟钝到极点。屈指一算，这情形从毕业典礼前一星期开始直至今日，恰好三年。今年在同一时候，我开始或多或少恢复到我已往的属灵情形。

1727年7月28日，爱德华滋娶了一位贤淑的18岁女孩子撒拉·皮尔庞特（Sarah Pierrepont，又译：彭勒达）为妻，从此撒拉被称为撒拉·爱德华滋。美国传记作家米勒（Samuel Miller）说：“在爱德华滋的一生中，可能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他的婚姻那样，给他那么多用处和安慰。”撒拉带给爱德华滋一个温暖和美满的家庭。怀特腓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对这么甜美的夫妇。”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2、北安普顿牧会和复兴

1729年2月11日，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德牧师逝世，爱德华滋从此替代了外祖父，担负了牧养整个教会的责任。爱德华滋担任教堂牧师之后，一般是每星期讲道两次。他并没有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准备讲章，而是每星期都用大量时间勤读圣经。他的起居饮食很有规律，他视暴饮暴食为可耻和罪恶。每天早晨四至五点之间，他必起床灵修。在1728年1月的一篇日记里，爱德华滋记着：“我认为基督是主张早起的，因为他从坟墓中复活乃是在清早。”他每天虽然用十几小时来灵修和读经，仍会抽一小时作园艺和家务。在冬天，他会花数小时伐木或割草，在春天他会与妻子撒拉结伴骑马到郊区去散步。

爱德华滋一生喜欢写作。他能有许多流传后世的佳作，实在要归功于妻子撒拉为他担起全部的家务，使他不必要为家务分心。婚后22年，她生下第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这个家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家族。

1731年7月8日，爱德华滋28岁，就在美国波士顿（Boston）公开讲道。那天讲道的题目是《神因人的依靠得着荣耀》，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篇信息里，爱德华滋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并讲到救赎的工作以及人对神的依靠、坚忍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为彰显神的荣耀。

在爱德华滋讲完这篇道之后，波士顿有两位牧师——普林斯（Thomas Prince）和古柏（William Cooper）认为该篇信息太宝贵，应该印刷成书，于是该书成为爱德华滋出版的第一本书。在18世纪中叶有关自由意志的争辩中，爱德华滋成为加尔文主义的代表，他全力驳斥亚米念主义，恰巧亚米念主义的代表约翰·卫斯理和他同在1703年出生。

1734年12月，神的灵开始在北安普顿奇妙地作工，几乎每一周主都将得救的人加入到教会。到了1735年3月至4月间，聚会的人每星期大约都增加超过三十人，这种情形持续了五六个星期。在短短的数月，教会增加了三百多人，教堂坐满了人，会众都全神贯注地听爱德华滋讲道，常有人为罪忧伤，泣不成声。从北安普顿四周的城镇和乡村都有人慕名来听爱德华滋讲道，在北安普顿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以及邻近的康涅狄格州也有许多市镇有了复兴的迹象。1736年11月6日，爱德华滋出版了《神的奇妙工作的忠实叙述》，详细地叙述了新英格兰大复兴的实况。

1740年10月17日星期五，怀特腓到达北安普顿，给这里的复兴增添了活力。最令爱德华滋开心的是，北安普顿的小孩子和青年人，在他们信主之后，生活行为明显改变，还有一些青年人自发地组织起小组聚会，但爱德华滋只能偶尔参加这些青年人的聚会，毕竟他要做的事太多了。无数的聚会点和教堂邀请爱德华滋前去讲道，以致爱德华滋应接不暇，无法兼顾。威廉·古柏牧师也亲口说，爱德华滋在一星期之内所接见的慕道者超过自己先前24年以来服侍主期间接见人数的总和。

1741年7月8日，爱德华滋到康涅狄格州的恩菲尔德（Enfield）讲道，讲的就是那篇最震撼人心的讲章《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引述了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爱德华滋讲这篇道的目的是要警告那些不关心自己灵魂归宿的人不要过于自信，不要自以为是，要接受主耶稣的救赎。

爱德华滋平静地、诚实地说出神有权柄，随时能将人投入地狱：“罪人哪，你们的处境是何等危险，何等可怕！你们被神的手握着，悬在一个忿怒的火湖上。这火湖是无底的深坑，充满了忿怒的火！”这时，圣灵在听众的心中作工，有些人恐惧地抓住座椅或栏杆，唯恐掉入火湖。在那时刻，爱德华滋停止讲道，一直等到听众情绪稳定，才继续讲下去。末了，他这样结束这篇讲章，说：“所以，凡是还未归向基督的人，如今要醒悟，逃避那要来的忿怒。来自全能神的震怒现在必然要临到大部分会众的头上。各人要赶紧逃离所多玛。逃命吧！不可回头看，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讲完道，爱德华滋带领会众一同作认罪悔改的祈祷。一时间，许多严重的罪行，如偷窃、淫荡、捣乱、亵渎等，几乎都销声匿迹。在大街小巷，一般人不再谈世俗的和虚无的话题，而是纷纷饥渴地阅读谈论神的话语，家家户户传出唱诵诗篇的声音。

1742年2月1日，爱德华滋从列斯特来到沙顿（Sutton）。在沙顿，爱德华滋对众多的会众讲解诗篇第十八篇第二十五节，沙顿也经历了一次大复兴。很明显，圣灵使用这些器皿，使美洲获得空前的丰收，这是清教徒们二百年来的汗水和鲜血在这块土地结出的果实。

3、爱德华滋的同工大卫·布雷纳德

大卫·布雷纳德（David Brainerd，另译大卫·布莱纳）生于1718年，是耶鲁大学的学生。1743年4月，大卫·布雷纳德开始对印第安人做宣教工作，他宣教的地点在高脑密（Kaunameek），该地荒僻落后、生活艰苦。他虽然恳切祷告，不停息地向印第安人传讲福音，工作却始终不见果效。他身心疲乏，打算在年终放弃他的差传工作，但1745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新泽西州的印第安人地区克罗斯卫森（Crossweeksung），许多印第安人忽然悔改信主，此时大卫·布雷纳德的已经疲惫不堪。受到了这次印第安人大复兴的勉励，他马不停蹄地驰骋了三千英里的路程，平均一星期有二十小时坐在马鞍上，穿梭于新泽西州的各个山村部落讲道，到处都有印第安人蒙恩得救。新泽西州印第安人大复兴的消息传到了爱德华滋耳中。1745年11月20日，爱德华滋写信给苏格兰的一位弟兄，亲笔为大卫·布雷纳德作见证。爱德华滋这样写道：“大卫·布雷纳德，一个做差传工作的传教士，最近在传福音给印第安人的事工上，甚有果效。我祝愿他得着神更大的祝福。”

1746年冬天，大卫·布雷纳德的最终垮下来，他必须停止其它一切的事奉。1747年春天，29岁的大卫·布雷纳德到北安普顿拜访爱德华滋时，爱德华滋也看不出大卫·布雷纳德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1747年7月25日，当大卫·布雷纳德稍微能走动时，在爱德华滋女儿耶路沙（Jerusha Edwards）的陪同下，他到爱德华滋家里养病。1747年10月9日，大卫·布雷纳德，这位带领印第安人大复兴运动的差传工作者，在爱德华滋家里不治身亡。

1749年，爱德华滋出版了《大卫·布雷纳德的生平记载》（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erend Mr. David Brainerd），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叙述差传工作的传记。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曾带着这本书到印度，以这本书为座右铭，用来不时鼓励自己克服翻译圣经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这本书被神大大使用，推动了数世纪以来许多在世界各地的差传事工。大卫·布雷纳德传讲的教义和爱德华滋一样，都是纯正的加尔文教义，亚米念主义者污蔑加尔文的改革宗教义不适合传福音，只适合知识分子研究，但大卫·布雷纳德用这福音使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土著获得新生，这就是对此谬论的最好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回答。

4、被自己的会友遗弃

复兴过去了，许多人在复兴中没有得到真正救赎性恩典，只是随着圣灵的普遍光照而受感动，于是又开始显露出其内在本质没有改变的旧人本性。许多北安普顿的信徒并没有因着神赐他们这么一位优秀的牧者而高兴。他们说爱德华滋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买新书，甚至责怪他不应该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增加教会的经济负担。后来通过两个事件，这里的会友彻底地离弃了爱德华滋一家。

(1) 圣餐资格的争论

按照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以往的作法，既然任何人在小的时候接受过婴儿洗礼，长大后即使是口头上没有承认、相信主耶稣基督，也仍可以领受圣餐，圣餐是全镇所有人的权利。结果教会里就有了很多没有明显悔改信主甚至口头都不认信基督的挂名领餐会友。1748年12月，爱德华滋正式通知教会管理人员，他不会让口里都没承认耶稣的人领受圣餐。爱德华滋勇敢地破除不合圣经的人的传统，却受到了教会大多数执行委员的强烈反对，爱德华滋为此出版了一本关于教会体制的书《论有形教会圣餐资格》，可是这样的书对复兴过后的人们来说已经是索然无味了。那些没有认信基督的人则发动签名，联名要求爱德华滋辞去牧师的职位，竟然获得二百多名会友附和。

(2) 坏书事件

1744年，在北安普顿的年轻人中开始流行几本近似黄色书刊的读物，一些年轻人纷纷暗地里传阅。爱德华滋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惩处那些传阅坏书的年轻人。这一下子得罪了那些年轻孩子的家长，他们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希望和一切，谁要是敢碰他们的心尖宝贝，他们就会不惜以命相搏。在这一点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是一样。所以爱德华滋立即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那二十几年的牧养之情即刻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开始在教会大肆弹劾爱德华滋。

1750年6月，这位在新英格兰大复兴中神所重用的仆人，竟在自己教会的委员会中，以230票对23票的投票结果，被赶逐离开北安普顿。1750年7月1日，爱德华滋心平气和地走上了自己牧养了24年的北安普顿的第一区教堂的讲台，作离别的讲道。面对着自己辛勤喂养二十几年的七百余会众，这位被自己信徒离弃的忠仆，丝毫没有怨忿的心情！因为他所追随的主耶稣也曾被这些祂所爱的世人弃绝！那天他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

林后 1:12-14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

他没有谴责，更没有毁谤，只是给大家最后的祝福：“传道人和他们所看顾的人将来都要在主的台前交账，作为牧师，我已经辛勤地在这里服侍了23年，现在我要向你们说再见了，我把你们不能朽坏的灵魂交托给祂，正如祂曾将你们的灵魂交托给我一样，直至那日我们将在祂面前相会。我永不会忘记你们，我会不时为你们祷告。”

钟马田在《清教徒》一书中这样评述这件事：“弟兄们，不要在你们教会里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感到惊奇。”另一位作家华伦·魏斯比（Warren Wiersbe）在他的书《你应该知道的得胜的基督徒》中这样说：“历史证明爱德华滋是正确的，他的会众是错误的。凡反对圣灵工作的都已改变了信仰；但那些信仰纯正的人，那些追随爱德华滋的人，会继续在上帝的祝福之中。爱德华滋的工作继续得着扩展。”

停职后的爱德华滋一家的经济情况急趋恶劣。他的妻子撒拉和几个女儿被环境所迫，要编织一些刺绣等用品，然后拿到波士顿的市场去卖，来补贴家用。爱德华滋也很软弱，但他心里知道神必看顾祂的仆人：“我已经46岁了，除了学习，我不善于做什么，恐怕很难养家糊口。但无论神怎样待我，我都不应挂虑。”这是一位深知上帝护理的人的心声。

这时候，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听到这个消息，就发出邀请，希望这位备受苏格兰信徒景仰的属灵伟人能远涉大西洋到苏格兰服事主。厄斯金并为此筹集奉献款项七十英镑，当这笔奉献款到达爱德华滋手中的时候，他深受感动，写了一封信，说他从来没有期待这种事会发生，他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主并没有遗弃他。

5、到印第安人中事奉

1751年8月8日，爱德华滋接受了东部马萨诸塞州的斯托布里奇（Stockbridge）的邀请，去牧养那里的印第安人。爱德华滋答应了邀请，举家迁往斯托布里奇。

斯托布里奇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教堂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小房，爱德华滋通过翻译员，向几家白人和42名印第安人讲道。这些印第安人用野熊油涂满全身，以御严寒，其中有一位名叫大卫的，作召集人，他负责用海螺吹号，通知印第安人来聚会。

不只是语言上的隔阂，还有文化上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滋只好调整自己的讲章，以切合印第安人的文化程度。慢慢地，爱德华滋的事工发生了果效，有两三个已往很败坏的印第安人，听了福音之后，生命有了改变。

撒拉刚到落后的斯托布里奇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她希奇神为什么将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埋没在这简陋的印第安人村落，但她相信神的带领必有祂的美意。几年后，爱德华滋的好朋友伯拉米（Joseph Bellamy）到斯托布里奇探望爱德华滋，那时候，印第安人正经历一次灵性的大复兴。伯拉米在爱德华滋家里用饭的时候，忽然传来优美感人的歌声。原来是印第安人在那里敬拜赞美。伯拉米很受感动，对爱德华滋说：我在你家里用饭，想不到却听到天堂美妙的音乐。

6、爱德华滋的晚年

爱德华滋的第三个女儿以斯帖于1752年嫁给新泽西学院（New Jersey College）的院长伯尔（Aaron Burr）。1754年9月，伯尔邀请怀特腓在新泽西学院开学典礼上演讲。新泽西学院当日颁予怀特腓荣誉文学硕士的学位。怀特腓曾说过，当时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比伯尔更有才华。1754年10月1日，新泽西学院开学典礼已经完成，身为大学校长的伯尔，亲自陪同英国来的嘉宾怀特腓，前往波士顿，与从斯托布里奇赶来的爱德华滋会晤。这三位基督教的杰出人物，一起住在波士顿的普林斯牧师（Thomas Prince）家里，实在是历史上罕有的约会。一方面，他们毫无拘束地分享每个人从神所领受的，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知道，这样美好的时刻，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1755年，苏格兰爱丁堡的郝格直接写信给伯尔，说他可以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筹集不少于四千英镑的款项，支持新泽西学院另觅一永久的校址。因着郝格的支持，1755年2月，新泽西学院董事会决定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Princeton）兴建永久的校址。该学院后来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爱德华滋在斯托布里奇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把他已往的许多讲章，重新整理出版。在斯托布里奇宁静的环境里，爱德华滋更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钟马田认为，是神让爱德华滋到斯托布里奇去，因为爱德华滋最伟大的著作，有好几册都是在那里写成的，如《论自由意志》、《为原罪论辩护》，这些书为传承改革宗正统信仰作出不朽的贡献。

1757年初，神的灵大大地作工，普林斯顿经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许多师生的灵性得着苏醒。伯尔从爱德华滋的经历中知道，在大复兴中，切忌过分地狂热以免失控，被邪灵欺骗。另一方面，伯尔不报导得救的人数，因为神的祝福不是人的头脑可以计算的。1757年9月，伯尔因操劳过度，终于英年早逝，时年41岁。伯尔过世后四天，新泽西学院——后来改名普林斯顿大学的董事会决定邀请爱德华滋接替他的女婿伯尔，出任该大学的校长。爱德华滋认为斯托布里奇的教会正走上轨道，需要他继续牧养，况且还有两本书等着他完成，他的体力和精神，不足以应付一间大学浩繁的事务。他回复新泽西学院说：“我的身体情况和心理状况都欠佳，灵性低沉，谈吐幼稚，仪表生硬，令人见之生厌，实在不适宜管理一间大学。”爱德华滋的婉拒，被大学董事会视为是他谦逊的表现，大学董事会于是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斯托布里奇，向该地教会的信托委员会游说，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比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布里奇灵性更加荒凉，更需要爱德华滋。结果斯托布里奇的教会也同意放人，让爱德华滋到普林斯顿出任大学校长。

1758年1月，爱德华滋又向斯托布里奇的教会说再见了。他引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三十二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惠的道。”没有像北安普顿的那些文明人冷漠地看着他们的牧者离开，这些原本生活在蛮荒中的印第安会众却是哭声一片。恰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八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爱德华滋于1758年2月16日正式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向全校师生的第一次讲道，是引用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思想丰富，学识高深，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当爱德华滋讲完话，学生们才恍然发觉，原来爱德华滋足足讲了两小时。

1758年2月23日，因新泽西州天花流行，爱德华滋响应医生的号召，成为疫苗实验者。结果由于当时的技术问题，自己反倒染上了天花。1758年3月22日，约拿单·爱德华滋息了地上的劳苦，回归天家。上帝使用爱德华滋不仅为当时的教会带来许多福益，也给后代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特别是他的著作《宗教情感》，堪称继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事奉》后，又一只吹响教会回归真道的号角。今天在我国许多角落、许多讲台，都回响着爱德华滋那浑厚有力的声音。“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来11:4）爱德华滋家族也在美国成为著名的家族，根据调查研究发现，从爱德华滋和撒拉生下的十一个孩子所繁衍的1400个后人中，产生了13位大学校长、65位教授、100位律师、30位法官、66位医生，及80位政府高官——包括3位国会议员、3位州长、1位副总统。当然，属灵的人不会以这些地上的荣耀为乐，但是，这见证了美国的文明与这些敬虔的教徒们的信仰息息相关。有敬虔的信仰，就一定会有敬虔

的生活，有敬虔的生活，就一定带来敬虔的文明。

申 5:10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四节 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感》选读

1、本书背景

在 18 世纪大觉醒初期，针对在聚会时有些信徒出现情绪过于激动的状况，长老会以及公理会都产生不同看法，由于这种分歧，后来在 1741 年，长老派教会干脆分裂为两派：一派以爱尔兰的传统为依据，反对福音复兴运动中情绪过激的现象，此派称为“旧边派”（Old side）；另一派以木屋学院为代表，认为这种情绪化为圣灵工作的正常方式，应重视个人的宗教经验，此派称“新边派”（New side）。两派围绕圣灵呼召人的经历、牧师的资格及巡回布道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日趋严重，导致了长老会组织上的分裂。“新边派”于是退出费城总会，重建自己的教会，成立了新布伦瑞克和伦敦德里联合长老会，1745 年又与别的教会组成纽约总会。新的总会重申宗教复兴是上帝的工作，他们特别强调教牧人员的教育水平和经验水平，希望与其他长老派联合。他们与旧边派的费城总会分庭抗争，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 17 年之久，在这种背景下，爱德华兹写下传世之作——《宗教情感》，本书根据圣经，充分论证，指出并不能因在布道中听众的情绪激动就判断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出于恩典的情感，但反过来，也不能因一些听众过于激动就下结论说这一定不是圣灵的作为，而是出于撒但。恩典情感的基础绝不在于这些外在的表现，不在于种种宗教经历，甚至不在于是否明白圣经，真情感乃是超出这一切，是来自上帝的荣耀的光。这本书对人类得救过程分析透彻，感人至深，特别是对人内心诡诈的剖析，达到了自加尔文以来的巅峰，就在爱德华兹离世的那一年——1758 年，分裂的长老派两派握手言和，重新达成一致。这正是这本书结出的第一个果子。

2、《宗教情感》序言摘录

人类最基要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最基要的问题就是：得神恩宠，走向天堂之路的人，有什么显著的特征？换个问法就是：真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神赞许的个人宗教应是什么样子？

真伪宗教的混淆向来是撒但抵挡基督最大的武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区分真伪宗教，也就是区分真正从救恩而来的情感与经历。假宗教在外表看起来很吸引人、很合理，但实际是错误的仿冒。在真伪宗教之间若未能予以区分，就会产生可怕的结果。

当基督徒见到人们把虚假宗教当成真宗教后产生的可怕后果，他们的心就游移不定。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该如何思想。许多人便怀疑在基督教中究竟是否还有真理。于是异端、不信与无神主义信仰就开始滋长茁壮。为此之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了解真宗教的本质，这一点实为重要。否则，我们不要期望复兴持久，而且我们从宗教的讨论与辩论上也得不到什么益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所辩为何！

读了这本书的序言，仿佛看到作者那一颗焦急的心灵，如果基督徒在宗教上不认真区分真假，那么将会使许多人被蒙骗一生，一直到死。

3、第一部 情感的本质以及其在基督信仰中的重要性

(1) 开场白——关于情感

使徒彼得论到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时，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 1:8）

(2) 什么是情感

上帝给人的心灵两种主要的能力：第一是理解力，藉此我们可以查验判断事情。第二种能力则使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不会只是个漠不相关的旁观者，而是里面会产生喜欢或不喜欢、高兴或不高兴、赞成或反对这些事。有些喜欢或不喜欢的意愿，只比完全漠不关心稍微多一点。而对别的事情喜恶的程度强一点，当这倾向强到一个程度，就会以一种积极有力的热切的方式行动出来。而这些更积极有力、热切的意志行动，就是我们所称的“情感”（emotion）。

我们从前认为真宗教在于理性和意志，而爱德华滋提出真宗教的本质在于情感，乍一读觉得很新奇，但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无不拍案称奇，下面作者就阐述意志和情感的关系。

(3) 真实信仰主要在乎情感

谁能否认真实的信仰主要在乎情感旺盛热切的意志行动呢？在神的话语中，上帝非常坚持我们对祂的爱应是认真的、属灵上的、积极有力的，而且我们的心在基督信仰中也应该是活泼而旺盛的。我们应该：

罗 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申 6:4-5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无二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种内心活泼有力地投入真信仰，正是属灵割礼即重生的结果。如果我们对基督信仰不认真，而我们的意志也不是旺盛地活动，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有时圣经会把我们与属灵事物的关系，拿来和世界一些充满活力的活动相比。比如像赛跑（林前 9: 24）、摔跤（弗 6:12）、争取奖赏（启 2:10）、与强敌争战（彼前 5:8-9）以及全力应战（提前 1:18）。创造我们的上帝不只给我们情感，也让这情感引起我们的行动。根据我们的本性，除非我们受到爱、恨、欲望、希望、惧怕或某些其它情感的影响，否则我们是不会有所决定或行动的。属灵的真理若非激起我们的情感，便不能改变我们的态度与行为。圣经提到真信仰时，常常都会把它和我们的情感相连，如：敬畏、盼望、爱、恨恶、渴慕、喜乐、忧伤、痛悔、感恩、怜悯、热心。

(4) 真实信仰的总归就是爱

爱是一切情感之首。当人问耶稣最大的命令是什么时，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缺少神同在时的喜乐、对神荣耀的热切盼望。都不能说我们对神有真正的情感。同样，我们在基督里对肢体的爱，也会使我们产生对他们的正确情感。

(5) 圣洁情感的榜样

这一节里，作者举了大卫、保罗、约翰和基督的榜样，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包括基督自己，对上帝那种强烈的爱的情感。大卫的诗篇中，处处表达了神的儿女对上帝和祂话语的爱慕之深，“昼夜思想”甚至“心碎”。保罗因爱基督看万事都如粪土一般。约翰也是一样，代表信徒热切盼望主的再来。当然这一切都是圣子对圣父之爱的荣耀的彰显，基督的情感更是何等丰富。神要向祂掩面，促使祂大声呼喊，因为这爱是不容祂和父神有片刻分开。同样，他们对弟兄的爱也是强烈的，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6) 天上的情感

无疑地，天上的信仰是绝对纯净与完全的。根据圣经的描述，这个信仰绝大部分是爱与喜乐，并在最炽热、最宏亮的赞美中表达出来。所以，如果天上的信仰是一种情感，那我们在地上的信仰也一定如此。

(7) 情感与职责

上帝指定我们去作一些表达崇敬的职责，在这些职责中也需要用属灵的情感来进行：祷告、赞美、洗礼、主餐与讲道。

(8) 情感与刚硬的心

真实信仰之所以特别强调情感的另一个证据是：圣经常称罪为“刚硬的心”。我们一起来思想下列经文：“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可 3：5）“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很明显，一个刚硬的心就是一个不易被属灵情感打动的心，它就象块石头，对神的话语是冰冷、无感觉、迟钝的；它和关心正好相反，关心是满有情感、易动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圣洁的心主要是由属灵情感组合而成的。

(9) 反省与学习

一、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如果我们以为属灵情感算不得什么而拒绝它，那可犯了相当大的错误！

另一个极端，就是太看重宗教性的情感，对这些情感的本质与来源也不作一番探究，就以其为真实归正的标记。只要一个人表现的非常热切，又一直有些属灵的谈论，其他的人就会下结论说，他一定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撒但就在这两个极端里工作。当他看到情感正在兴起，他就马上把稗子撒在麦子中，他会把错误的情感混淆在上帝属灵的工作中；他籍此法欺骗且使许多人永远沉沦。

前面作者谈到情感的重要性，但认识辨析真假情感更加重要，这是本书最大的主题。

一个基督徒对宗教情感正确的态度不是全然拒绝，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要在二者间作一分辨。我们应当赞成一些东西而拒绝另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区分麦子与稗子、金子与渣滓，宝贵与无价值的。

神赐给我们情感的目的与赐给我们其它能力是一样的，就是要达成人类的终极目的，也就是人类与神的关系。但人类的情感却被许许多多非属灵的事物所占据。如世俗的利益、外在的欢愉、名誉，以及他们的一些天然的关系等等，在这些事中，他们的渴望是热烈的，他们的爱是温暖的，他们的心是激昂的。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但绝大多数人对属灵事物却是迟钝、无动于衷的！在这些事上，他们没什么渴慕，也没什么感激。他们可以坐着听有关神在基督里无尽的大爱，基督为罪人死亡的痛苦，以及基督宝血将人从地狱的永火中救拔出来带到喜乐的天堂，但他们却是对此冷淡、没反应且没兴趣！如果这些宝贵真理都不能打动他们的情感，那么还有什么能叫他们感动呢？还会有其他任何更重要、更奇妙、更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事吗？许多基督徒只知享受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道理，而情感却毫无所动，神的义怒是何其可畏！倘使这些事都无法摇撼我们的心，那我们是何其可耻啊！

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太了解爱德华滋说的光景，对于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有多少时候，能迸发出那种本该有的激情和敬畏。

4、第二部 一些不能证明我们的情感是否来自真正救恩经历的事情

宗教的情感可能源自天性，也可能源自精神层面。这两者在未得救者身上都会发生，同样地也会发生在真信徒身上。

(1) 强烈的情感

即使我们的情感是很强烈的，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属灵或非属灵的。圣经记载一些最杰出信徒的经历时，常常会表达出他们热烈的情感。就以诗篇作者为例，他说到对神的爱时，好象难以用言语说得完全：“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诗 119：97）他描写心灵中极度的渴望：“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诗 42：1）由此可以证明，高昂的宗教情感必然有强烈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只因某人的情感是强烈的，便指责他为狂热分子，就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

但另一方面，我们热烈的情感，并不能证明它们就一定是属灵的。圣经明白显示，一些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也会非常热衷于宗教。譬如，在旧约中，以色列民在出埃及时，因神所赐的恩惠，大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情感，于是他们歌颂赞美神。在新约中，耶路撒冷的群众，对基督公开颂扬、高声赞美：“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和散那！”（太 21：9），但是在这批人里面，真正的基督门徒，何其稀少啊！不久之后，这同一批群众又喊叫：“把他钉十字架！”（可 15：13）

(2) 即使我们的情感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非属灵的。

情感对身体有一种影响力，这是因为身体和灵魂、肉体 and 心灵之间，有着亲密的连合。因此，当强烈的情感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时，这个并不为奇。然而，强烈的情感可能源自肉体也可能源自圣灵。所以，有身体上的影响，并不能证明这种经历一定只是属肉体的。另一方面，产生这种身体影响的情感，也并不能证明就一定是属灵的。那些并非源自圣灵的强烈情感，也能产生很大的身体影响。

(3) 热爱谈论信仰之事

即使情感使我们非常热烈地愿意谈论基督信仰，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非属灵的。

(4) 外来的情感

即使这个情感不是出于我们本身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外部的声音或力量，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非属灵。圣灵能从天上赐给我们这能力，邪灵也能够伪装。

(5) 由经文而来

即使是伴随圣经经文而来的情感，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非属灵的。真正的属灵情感是可以伴随着经文而产生的，那常是由于对经文所教导的真理，在圣灵的引导下，使我们明白，茅塞顿开，从而产生了属灵的喜乐和感恩等属灵情感。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只因为由于一处经文突然地、强而有力地闯入我们心思意念中，就证明随后产生的情感就一定是属灵的。有人甚至于认为这种情感就是他们得救的标志。特别是当经文使他们产生希望和喜乐的时候，更是让许多人有如此看法。他们说：“这节经文忽然出现在我心里，就象是上帝直接对我说话一样。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节经文，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圣经里有这节经文。”或者，他们还会说：“这些经文一节一节的来到我的心里，都是那么积极而有鼓励性，我高兴得哭了起来。我无法怀疑上帝真是爱我的！”

很多人认为如果某个经历与圣经有关，那这个经历一定是来自上帝。我们怎能知道那不是撒但把一些圣经经节放在我们心里？他也曾经用经文去试探和欺骗耶稣（太4：6），如果上帝允许撒但用圣经去试探耶稣，祂也能把经文放在我们心里来欺骗我们，甚至他也能用一些积极、鼓励性的经文来迷惑我们，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关键要看让我们喜乐和愉悦的是经文本身，还是经文出现的方式。

(6) 充满爱的情感

即使是具有爱的情感，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是非属灵的。爱是也可以被伪造的，事实上，愈是宝贵的东西，被假冒的也就越多。许多人可能暂时感到非常爱上帝和基督，但却没有那种真实而持久的得救经历。在耶稣的时代，许多犹太人就是这种情形，所以未得救的人是可能具有各种假象是真的属灵情感，但实际却是虚伪的，所以也没有理由说他们不可能同时拥有好多种这类的情感。

这样一来，在一位罪人心中，会产生多少种情感！难以估量。他会对他所想象出来的救主充满了热爱，因为他救他脱离了地狱之灾。他也会对他所想象的救恩，充满了感激，他会感到一种不可抑止的喜乐。这种种的情绪，会使他向别人大谈他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也会使他很容易地在他所想象的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他更会舍己并且热心地提升他想象中的信仰，只要他情感的暖流还持续着，他就会这么做。

所有这些真宗教情感，都可以由这种方式产生。然而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这位经历了各种情感的人，却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情感，都是来自他自己心意的自然运作，并不是上帝的灵所作的救赎工作。如果有人怀疑这怎么可能发生，那他对于属血气的人性的虚假和败坏，真可说是一无所知了。

(7) 安慰与喜乐

即使一种情感带着安慰与喜乐的顺序而来，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属灵或非属灵的。许多人坚持属灵情感和经历必须顺着一定次序而产生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在悔改之前，一定需要确信自己有罪、惧怕上帝的审判，以及具有属灵的无助感这一连串的意识。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人为的理论；所以他们怀疑一个人的宗教经历，要真实按着一定的次序，那这些人的情感也值得怀疑，是他们自己心意的自然运作，而不是由圣灵而来。对于那些先强烈知罪，而后有确据的感觉的人，他们更加不相信是得救的人。

然而，上帝在拯救一个罪人之前，让他有种急需救恩的意识，也是很合理的。人类是有理智的存在，上帝与人接触也是用一种理智的方法。既然在基督之外罪人是被定罪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的，那在他们得救之前，使他们了解这一点，岂不是理所当然？毕竟上帝一旦拯救一个罪人，是要一个基督徒晓得他是已经获得了救恩的人。但也绝不能说，真情感一定按这个顺序发生，因为神拯救人的奥秘不一定让人能感觉到有一定的顺序。

(8) 虚伪的知罪

另外也有一种虚伪的知罪。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人们觉得自己真是罪孽深重的时候，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罪的本质，他们并不是从属灵的角度来了解罪，知道罪是触犯了神的圣洁。在他们的良心中，从没有这种感动，即使有感动也很轻微，有时，他们对于罪应受责罚没有自知，有时对罪也感到困扰，但这种困扰与属灵的感觉无关。这样的人，即使有上述悔改的次序相伴而来，也不能说明他的情感是真实的。

(9) 外表的敬虔

即使情感会促使人花很多时间在外表的基督教崇拜上，但这也不能证明它一定是属灵或非属灵的。有些人认为宗教信仰就是花时间在读经、祈祷、唱诗或听道上，但这种宗教经历也不见得是健全的。亦或在宗教信仰的外在责任上表现热心，都不一定是得救的明证。但正好相反，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人如果真获得了救恩，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10) 开口赞美

即使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开口赞美神，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非属灵的。因为有一些人极力强调赞美是属灵生活的一个标志。因而很多人认为，假如人们热烈地赞美神，这就是归正的明证。

当然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因别人在热烈地赞美神而加以责备。然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强烈并非是归正的标志，就象我们看过的一些例子，撒但也是能模仿各种属灵情感的，而圣经也给了我们许多未得救的人热烈地赞美神与基督的例子。

(11) 自以为具有得救之确据

即使我们的情感使我们产生对得救的确信，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属灵或非属灵的。有些人认为，假如我们对自己的得救有确信，那我们一定是被骗了。相反的，新教徒一直相信，得救的确信是基督徒一种恰当的感觉。圣经中有许多神子民对他们与神的关系深信不疑的例子。所以，只因为一个基督徒深深确信他自己的得救而去批评他，这么做是很不合理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得救的，只因他确信如此，这也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人可以有最伟大与最振奋的得救确信，然而却仍未得救。他可以显得和神很亲近，并在祷告中用非常大胆和亲密的言语，称呼神为“我的父”、“我亲爱的救贖主”、“我甜蜜的救主”、“我所爱的”等等，他也可以说：“我有完全的把握知道神是我的父，我知道我将去到天堂，就好象我已在那儿一样。”他可以对自己如此地确定，以致他认为不再需要任何理由来测试信心的真实性；他也可以鄙视任何说他可能是尚未真正得救之人的告诫。然而，这些行为没有一项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12) 动人的见证

不能只因为某人对其情感和经历做了一番动人的见证，就证明其为真基督徒。任何一个类似属神的工作，一定会感动信徒的。信徒喜欢看到罪人悔改，因此当某人自称已

悔改归主，并对自己得救经历做了栩栩如生的陈述，我们的心就受到感动，这并不足为奇。然而，这还不能证明他的归正是真的。

作者把撒但利用真基督徒所具有的一些情感来欺骗假冒者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作者之所以如此大篇幅阐述，并不是让我们判断他人，甚至也不是让我们判断自己，乃是要把我们一个个错误信仰的根基拆毁，好建立正确的根基。真假基督徒之间竟能如此相似！只有神才能无误地予以区分，假如我们妄想自己能区分，那就是傲慢。

5、第三部 真实属灵情感的明显标志

(1) 源于内心

真实的属灵情感起源于心中那属灵的、超自然的、神圣的影响力。新约圣经称基督徒为属灵人，好与仅仅属血气的人作一番对比。“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林前 2：14-15）在这些经节中，“属灵”这个字眼并不是指人的灵，也不是因它存在于与肉体相对立之人的灵魂中，就说它是属灵的。即使它是存在于人里头的灵，圣经也称某些特质为“属血气的”或“属肉体的”。例如：保罗描述骄傲、自义、自恃为“属肉体的，”（西 2：18）虽然这些特质存在于人的灵里。圣经称基督徒和他们的美德为“属灵的”，主要是指：圣灵在基督徒里面结出的果子，因它是与圣灵本身的属性一致的。

圣洁是神的灵的本性，所以神的灵称之为圣灵；圣洁是神本性的荣美和甘甜，是圣灵的本质，就如热是火的本质。唯有在真正的基督徒里面，圣灵才如此工作。犹太说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犹 1:19）。圣灵住在真信徒心中成为生命的泉源，涌动在他们里面，保罗说，惟有真基督徒才有圣灵的內住：“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 9：9）。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圣灵在真基督徒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是迥然不同于籍血气所产生的任何事；这就是我所说的：真实属灵的情感起源于“超自然的”影响。

许多人将这新的灵的感觉与想象力搞混了，其实两者全然不同。想象力是一种每个人都有的能力，有些人对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鲜血滴流有着极生动的想法，便说他们看到基督钉十字架的属灵景象。有人看见基督向他们微笑，伸开双臂要拥抱他们，他们便说这是基督恩典与爱的启示。有人看见栩栩如生的天堂，在那里基督坐在宝座上，有灿烂发光的天使及圣徒的列队，他们便说：天堂之门向他们开了。有人想象响声和声音，也许还引用圣经经文，他们便说心中听见基督的声音或圣灵的见证……

可是这些经历算不得是属灵的或神圣的。这些经历只是外在东西的想象，一道光线、一个十字架、一张宝座、一个声音，这些想象的观念，在本质上并不是属灵的。一个属血气的人也能够对形状、色彩、声音有生动活泼的想法。想象到神外在的荣耀和光辉，还比不上数以百万计的不信者在末日大审判时，所要面对基督外在的荣耀更真实。即使神的确在某人心中产生这些想法，也不能保证那个人一定得救，从圣经有关巴兰的例子就可以了解：神说耶稣基督是出于雅各的星、是兴于以色列的杖之异象，生动活泼地印在巴兰心里。从想象产生的情感不算是属灵的。当保罗说到“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时，并不是说圣灵给我们某些超自然的暗示或启示。前面的经节让我们知道：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罗 8:14-16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内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意思是：圣灵的内在、引导，影响我们对神的举止行动象父亲的儿女，这些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证据，确保我们是神的儿女。

真正爱神的最深原因乃是因为神属性的无上荣美，惟有这才是最合理可信的事。使一个人或任何受造者显得可爱的主要因素，是在于他的优点、长处，在神也是同样的道理。神的属性本身是无限地好、是无限地美、无限地光明和荣耀。除非我们因为神的美善、荣美本身而爱神，否则我们如何能正确地爱神呢？还有些人因他们坚定深信神爱他们，就感觉对神有活泼的爱。有的人经过极大的痛苦或对地狱的甚为恐惧，便猝然领悟相信神爱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接纳他们为祂的儿女。这种情况，或许籍着在他们想象中的意念或内在说话的声音，或某些非圣经的方式发生的。

假基督徒在快乐中，眼目所注视的全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心被他们自己的经历盘据着，没有神的荣耀、基督的荣美在内；他们总是在想，我所得的是多么了不起的经历！多么伟大的启示啊！多美好的经历！我该告诉别人！他们以他们的经历代替基督，不喜爱基督的荣美与丰盛，他们喜爱他们了不起的经历。这些都显示在他们的谈论中，他们高谈阔论。那真基督徒当他感受属灵的火热与活力时，喜爱谈论神和基督并福音的荣耀真理。假基督徒满口吹嘘自己：自己的奇妙经历、神多么爱他们、他们的灵魂多么安全、他们如何知道他们将会上天堂等等。

作者在这一段将那些敬虔运动的“伟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属灵经历”揭露得昭然若揭，谦卑仔细地读此书，会使神的真儿女不再热衷于那些经历，而是借着圣经仰望神的荣美。

(2) 神本性之美

属灵的情感是以属灵之事的道德优美性为基础的，这不是指许多人所谓的“道德”，我是指着一种属乎神道德品格的优美，换句话说，我是指着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他一切道德完美的总和，就如他的公义、真理和良善，我已经说过，属灵情感是源自于属灵之事的优美，现在我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优美就是道德上的优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属灵之事的喜爱，就是因着它们的圣洁，基督徒爱神，是因着他的圣洁之美。

我并不是说基督徒看不见神在能力、知识及永恒上的优美。然而，我们是因神圣洁之故，才爱他的能力、知识及永恒，没有圣洁，能力和知识就不会显为优美。有谁会在一个恶人身上看见优美，只因他有能力和知识？因此，对神的爱始于对他圣洁的喜悦，而非其他属性。是从神的圣洁才衍生出其他属性的美好。除非我们先看到神圣洁的全然优美，否则我们也看不见神的知识、能力、永恒或其他属性的美好。圣经指出，圣洁之美才是属灵胃口的真实对象，是我们永远赞美歌颂的。

启 6:10 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

我们可籍此原则来测试自己对天堂之事的渴望。我们向往天堂，是因神圣洁荣美照耀那地呢？还是基于我们自私的享乐？

爱德华滋在这一章里揭示了人被神荣耀吸引的最根基的本质，就是神的道德属性，

我们虽也应歌颂神的伟大、威严和能力，但我们能来到祂面前，一生跟随祂，乃是最先看见祂道德属性的荣耀——被祂的圣洁大爱吸引。

限于篇幅，我们只选读这些。总之，爱德华滋在本书中所描述的现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是撒但牢笼欺骗神的教会的最主要手段，所以，盼望每一个属神的教会，都能仔细阅读这份神在几百年前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礼物。

第五节 大觉醒后教会的复兴

1、圣公会在美洲的衰落

早在1607年的春天，安立甘宗的随军牧师罗伯特·亨特就和100多个志愿者来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墩，其后的继承者于1611年颁布了一套法令，其中首次规定新英格兰仍为安立甘宗国教管辖。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安立甘宗的教会出现在波士顿、费城、纽约等地，在英属北美13个州，都有安立甘宗的教会，安立甘宗成为唯一合法的教会。在大觉醒运动之前，安立甘宗迅猛发展，拥有强大的势力，这种势力主要来自英国政府的支持。但随着清教徒的大量涌入，到了1776年安立甘宗的教会数量下降为495个，远远落后于公理派和长老会以及贵格会，仅位居第四位。18世纪50年代，安立甘宗在纽约建立起了代表自己事业的“皇家学院”，企图再次推广圣公会的礼仪，但遭到了以长老派为首的其它各教派的强烈反对。

随着大觉醒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在弗吉尼亚，许多信徒纷纷离开国教，组织起自己的教会。弗吉尼亚当局便以强制的手段来维持原有的教区制度，这样作法适得其反。遏制不住圣公会的衰落，于是弗吉尼亚州政府黔驴技穷，竟然想出用大幅度提高圣公会牧师薪水的方法来加强国教会势力，结果不但没有祝福安立甘宗的教会，反而使圣公会的牧师和国教会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圣公会在美洲更加衰落。

2、改革宗教会在大觉醒中的复兴

17世纪初，公理派教会最初控制着北部殖民地并逐渐向南部和中部殖民地扩展，几乎成为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等地的官方教会，教会的数量由1700年的246个、1750年的465个、到1776年增加到668个，一直保持着第一位的优势，公理派教会不仅非常重视普通公民的教育，而且也重视牧师和传教者的培养，事奉于新英格兰的1586个传教士中，只有79个不是大学毕业。

到17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约长老派教会被纷纷建立起来。1706年，6个长老派基督徒团体在费城组建北美第一个长老会议。1710—1750年左右，每年约有3000—6000苏格兰和爱尔兰长老派信徒因英国国内的逼迫而逃到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1729年长老派基督徒召开区会，同意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为美洲长老会的统一的信仰告白，标志着长老会体制在美洲诞生和成熟。经过这场大觉醒运动，长老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更加回归圣经，特别是新边派和旧边派两派统一后，更是取得迅速发展，教会数量由1750年的233个发展到1776年的588个。

3、浸信会的复兴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拓展，浸礼派中的两个分支普通浸信会和特别浸信会一同传到了北美，在北美的第一个根据地是素有“宗教自由摇篮”之称的罗得岛。1639年由罗杰·威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廉斯普罗维登斯创建浸信会数间教会。到 18 世纪初，由于其内部分裂，外部又受官方国教会的迫害，浸礼派发展缓慢，但浸礼派仍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在大觉醒运动后更是迅速崛起。北部“费城浸礼派协会”的传教活动从北部的康涅狄格延伸到南部的弗吉尼亚，南部的浸礼派教会也建组成许多联合会，1750 年浸礼派教会数量是 132 个。

4、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成立

由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长老会教会的迅猛发展，牧师的培养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教会增长的速度，这导致很多教会没有牧者。一位著名的长老会牧师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ent）于 1736 年创建木屋学院（Log College），开始在自己的教会指导帮助下，由自己亲自培养传道者，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差派牧师候选人远赴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学求学。1746 年，普林斯顿大学（最初名为新泽西学院）位于新泽西州也由长老会创立，旨在培养未来的牧师和公众领袖。爱德华滋曾经担任普林斯顿第三任校长，牧师约翰·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六任校长，他曾以圣约政治观影响美国宪法的制定。大学培养的学生当中有包括“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内的数十位著名政治家、四位总统、许多科学家等。普林斯顿大学成为正统改革宗神学的中流砥柱，涌现出亚历山德（Archibald Alexander）、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和华腓德（Benjamin B. Warfield）等一大批被神重用的神学家，这些人被后人称为“普林斯顿学派”。到 19 世纪末，普林斯顿神学院也终于被自由派神学“攻陷”。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上面是一本打开的新旧约圣经，下面的拉丁文表达了这些清教徒建校的宗旨：“在上帝护理下学校欣欣向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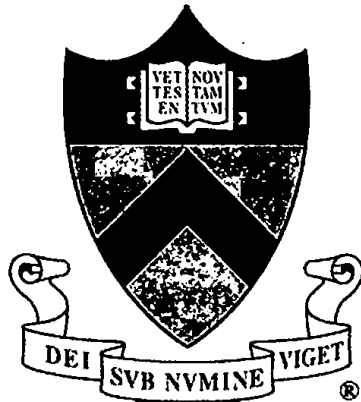


图 5.24 普林斯顿大学校徽



图 5.25 普林斯顿校园里优美的林荫路

世界现今排名前四位的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有两座为清教徒建立，难怪有一位哲人说：“基督教是愚昧的天敌。”特别是，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文明的天堂。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证明，带来人类文明的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上帝的主权，而加尔文主义正是彰显这一主权的金灯台。

第六章 独立战争

第一节 独立战争的背景

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一直被无神论历史学者说成是殖民地人民只是为了经济利益的缘故而发起的，其实，与天主教、圣公会流血斗争了二百年的清教徒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按着圣经纯正教训敬拜和生活，才是他们拿起武器，走向民族独立的真正原因。

1、抗税运动

为了维护英国国教会即安立甘宗在美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英国政府不断指派英国国内的主教来到殖民地各个州，强令推行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清教徒再遭逼迫，尤其在以圣公会为主的弗吉尼亚州最甚。弗吉尼亚法令规定：16岁以上男子，每人每年必须交纳十磅烟草及一蒲式耳（计量单位）谷物。每一种植园指定专人从各家收取最好的烟草及谷物。非官方教会还要把自己的十一奉献缴纳到国教会。其实，如果是向政府缴税，那是基督徒的本分。但把自己的十一奉献都缴纳给圣公会，意味着自己又回到了国教会，这等于失去了大觉醒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各派教会。

弗吉尼亚州政府还规定，每个公民要宣誓接受官方教会的教义，否则就被定性为异教徒。同时规定，异教徒无权主持婚丧礼仪，没有当牧师的资格，没有选举权和其他各项政治权利。最后，殖民地政府干脆故技重施，再次燃起屠杀清教徒的火焰。南方各地，均立法对“亵渎上帝者”处以死刑。

1771年，当一位浸礼派牧师正在讲道时，一个地方警察用马鞭抽打他的嘴唇，同时抽掉了他手中的赞美诗集，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会众不知所措。警察又抓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往地上撞，把他拖向大门，一个绅士又用马鞭抽打这位牧师二十下。面对这再度燃起的逼迫，清教徒们又开始同官方教会展开斗争，他们反对强迫向官方教会缴纳捐献，争取建立世俗民主政府，最后由争取宗教自由发展到争取民族独立。

2、反对委派主教

英国国教会在北美本来不设主教，所以，各英属殖民地都归伦敦主教区管辖，国教教会在北美的组织始终是松散的。为改变这种情况，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王室和殖民政府将在北美设立主教一事提上日程，但这一举动立刻遭到殖民地各教派的反对。公理派、长老派和浸礼派等非国教教派坚决抵制这一提议。公理派和长老派每年都召开联席会议，与安立甘宗牧师召开的要求委派主教的会议相对抗，人们认为接受一位伦敦任命的主教，意味着重返一百年前的英国了。

1770年这场斗争达到高潮，康涅狄格的公理派和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地的长老派为此建立了“通讯委员会”，结成“非国教联盟”。在反对主教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北方土生土长的安立甘宗则坚决支持英国在北美设立主教，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的牧师与其说是忠于自己的教会，不如说是忠于英国国王。1767年，一位新泽西安立甘教徒，托马斯·布瑞波瑞·昌德尔在一封《致公众的呼吁书》中写道：“英国国教向北美委派主教的提议是迫切的，合情合理的，必要的，不应受到任何的抵制。”

3、波士顿惨案

1770年3月5日，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以保护执行关税条例的英国官员为由，向进行抗议的一群当地民众开枪，结果打死四人，伤六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惨案”。

1774年英国颁布了《魁北克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在魁北克组建政府，将13个殖民地以西的俄亥俄河流域和伊利诺伊地区划入魁北克的管辖范围；允许保留原来的法国民法，同时实行英国刑法及其程序；承认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教会保留征收什一税的权利。这一规定扩大了魁北克天主教的影响。从这一法案看出，英国政府宁可加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也要打压清教徒。这一法案遭到了信仰新教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而激化了美利坚民族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魁北克法案》就是其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1774年英国上议会相继通过了4项针对13个殖民地的惩罚性法案，这些法案和《魁北克法案》并称为《不可容忍法案》。英国议会所推行的这些高压政策，终于激起了美洲民众的反抗。他们自发组织成民兵武装，威胁着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

第二节 战争经过

1、莱克星顿的枪声

1775年4月18日晚，北美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组织“自由之子社”的两名民兵在波士顿打探到总督兼英国驻军总司令盖奇即将派军队到康科德搜查反英秘密组织的军火仓库，并要逮捕其领导人。于是他们连夜骑马向各地的民兵报警，他们很快集结到近郊的莱克星顿村，埋伏在树林里、公路旁，等候英军的到来。

1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800名穿着赭红色军装的英国轻步兵，在少校指挥官史密斯的带领下，乘着薄雾，偷偷地来到莱克星顿村边。他们正要摸进村子，忽然发现村前的草坪上列队站着几十个村民。这些人个个手握着枪，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谁开了第一枪，英军少校指挥官史密斯挥动军刀命令英军士兵开火，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被拉开，在激战中有8位民兵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各教会对革命的态度

(1) 安立甘宗对革命的态度

英国国内的安立甘宗中大多数牧师，都成了英国政府的狂热的效忠派，他们咒骂独立革命是反对合法政府的邪恶叛乱。由于安立甘宗在北美各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较复杂，因此，对革命的态度也各异。南部殖民地的大部分牧师都是效忠派，只有三分之一的牧师支持独立革命，在北部和中部殖民地，安立甘宗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几乎都成为亲英分子，他们人数不多，但破坏性很大。来自纽约的乔·斯图阿特写道：“在该州，安立甘宗对英国的效忠程度毫不逊色于英国本国国教会，因此，他们会把不明智的政策付诸实践。”安立甘宗有一些死心塌地的亲英分子，康涅狄格的代理主教塞缪尔·西布瑞就是一例，当革命开始时，他管理纽约的外斯彻斯特教区，立即分发一系列宣传效忠主义的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他攻击大陆会议，并且表示他们坚决效忠英国，后来，当他返回到康涅狄格时，由于分发侮辱革命的小册子被投入监狱。1776年，他设法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逃到了英国，并且成为皇家军队的一个元帅，指挥由效忠派组成的军团。

在北部和中部也有一些支持革命的牧师和信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伊和罗伯特·莫里斯都是安立甘宗信徒，但他们却坚定地站在美国清教徒一边。有的安立甘宗牧师，以宾夕法尼亚的威廉姆·怀特为代表，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甚至接受了随军牧师的任务，尽管他知道如果英国获胜，他将付出生命，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2) 公理会

1776年6月18日，公理派的“康涅狄格总协会”公开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和教会自由的合法战争，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起来，为了真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传扬，拿起武器来与英政府战斗。在独立革命爆发后，公理派的牧师们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战斗中，哈佛大学的校长塞缪尔·朗丹和耶鲁大学的逛莫斯·杜外特向学生们宣传独立革命的意义，鼓励学生们支持革命。马萨诸塞的约翰·克利兰得不但劝说本教区的人报名参军，而且自己也成为自愿者。沃尔芒特的道克特·艾沃瑞在听到莱克星顿枪声打响后，立即进行了一次布道，号召公理派信徒拿起武器，自己也报名参军，并且沿途布道，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队伍。公理派领袖还为革命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新英格兰的民兵大都在当地公理派牧师的支持下组织起来，马萨诸塞的牧师乔瑟夫·威尔拉得为支持战斗，帮助供奉两个军团。毫无疑问，在牧师的宣传下，群众积极报名参军，使革命队伍迅速壮大。

(3) 长老会

当独立革命到来时，几乎所有的长老派信徒都积极投身于反英的革命战争。大陆会议召开不久，就得到纽约和费城长老派的承认。《印花法案》的散布者——宾夕法尼亚镇压清教徒的约翰·哈弗兹在1775年报道：“当加尔文主义毒害公众的思想时，他们公开叛乱的时机成熟了。”殖民地第一个官方承认《独立宣言》的宗教实体是弗吉尼亚的翰欧沃长老会，他们把独立战争当作自己的事业，在给弗吉尼亚议会的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按着这个《宣言》，确保我们自由实践我们的宗教信仰。”长老派的牧师们利用讲坛支持大陆会议，宣传革命的正义性。长老派中也涌现出一大批热忱的爱国青年和革命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是长老派领袖——新泽西学院院长约翰·威瑟斯朋，他被约翰·亚当斯誉为“富有活力的自由之子”。在他的影响下，这所学院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新泽西学院中有九人成为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的成员，他本人也被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成为1776年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唯一一名牧师。长老派中还涌现出一批积极参战的牧师，以乔治·杜菲尔得为代表，1776年他成为在纽约附近军队中的一名元帅，在整个战役中始终身先士卒。

(4) 浸信会

早在1774年11月22日，他们的领袖——被称为美国浸信会之父的以撒·巴库(1724—1806年)向马萨诸塞议会表示，浸礼派像北美大陆上的其它教派一样，随时准备参加革命。莱克星顿的枪声一响，几乎所有的浸礼派信徒都立即投身于北美独立事业。1779年，波士顿第一浸礼派牧师塞缪尔·斯第尔曼在选民布道会上按着“圣约神学”的思想，讲到英国国教会是背约的教会。他号召人们起而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弗吉尼亚的浸礼派组成了民兵。在1775年8月，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因为在美国有压迫，因此，进行战争是合法的，由于英国非正义的侵略，他们应该抵制英国。”众多的浸礼派

信徒都成为大陆军的战士，在库派婆尔县，托马斯·麦克林翰组成了一个浸礼派的军团，支持独立革命。

(5) 循道会

美国独立革命爆发后，约翰·卫斯理极力偏袒英国政府，他出版了两本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和《冷静地谈谈我们在美洲的殖民地》(A Cal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本来卫斯理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因为反对圣公会的信仰而加入循道宗的，但面对这场清教徒为独立流血牺牲的战争，循道宗此时完全站在圣公会一边。

3、大陆会议和《独立宣言》

弗吉尼亚议会在杰斐逊领导下呼吁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杰斐逊建议召开由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会议。1774年9月5日到10月26日，在费城召开了殖民地联合会议，史称“第一届大陆会议”。除佐治亚州缺席外，其他12个州的殖民地55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大陆会议通过了《权利宣言》，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对殖民地的各种经济限制和五项高压法令，重申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不得向殖民地征税，要求殖民地实行自治，撤走英国驻军。

1776年7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通过并且发布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断绝与英国的隶属关系，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后尚没有一个正式中央政府期间，大陆会议起到了临时政府的作用。美国正式成为一个邦联国家后，大陆会议改称邦联会议，在邦联宪法的基础上，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直到1789年新宪法诞生，大陆会议被三权分立的美国联邦政府所代替。

《独立宣言》摘选：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坚定地信赖上帝的护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ONGRESS, JULY 4th, 1776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a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el them to the separation.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created equal ,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 that they are among these are life ,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图 5.26 第二次大陆会议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之后，宾州费城的州议会大楼顶上的自由钟被敲响，市民听到钟声都聚集到楼前来听大陆会议的代表宣读《独立宣言》。自由钟象征美国建国的根基，那就是美国要建立在真正的自由之上，而真正的自由不是罪人的任意和放纵，而是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自由钟上镌刻的字出自圣经上的经文：“你们要当作禧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利 2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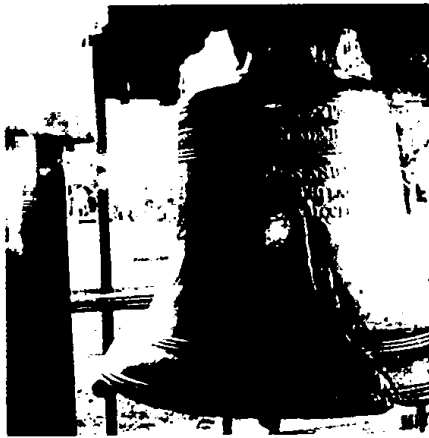


图 5.27 费城自由钟

4、独立战争的胜利

战争初期，双方力量悬殊。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工业发达，拥有世界一流海军；驻北美英军约三万余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北美殖民地人口仅 300 万，其中约 50 万人为亲英的“效忠派”；正规军刚刚组建，兵力不足，装备落后，缺乏训练。

1777年9月26日，英军攻占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英军统帅伯戈被胜利冲昏头脑，统领 1.9 万英军孤军冒进，被乔治·华盛顿率领的 1.2 万美军和游击队围困在萨拉托加（今斯凯勒维尔）。1777年10月17日，五千余英军被迫投降。萨拉托加之战成为战争的转

折点，促使法国于1778年3月也对英宣战。又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1781年9月28日，约1.7万名法美联军（美军约9500人，法军7800人）从陆海两面完成了对约克敦英军康沃利斯的8000人的包围。

1781年10月16日，英军试图出击，被迅速打退。康沃利斯又孤注一掷地试图将部队撤过约克河，结果忽然起了暴风雨，使康沃利斯的计划受挫。康沃利斯从陆上海上都撤退无路，于是在1781年10月17日，亦即伯戈投降的第四个周年纪念日，也请求投降。华盛顿接受英军投降。

1781年10月19日，8000名红衫军走出约克敦。当服装整齐的英军走过衣衫褴褛的美军面前并一一放下武器时，英军的军乐队奏响了《地覆天翻，世界倒转过来了》的著名乐章。独立战争以美国胜利告终。



图 5.28 华盛顿接受英军投降

第三节 美国成立后的信仰状况

1、建国后宗教自由

美国独立后，围绕国家和教会间关系展开争论，最后以宗教自由被写入1791年的《权力法案》而告终，并被加在了联邦宪法中。宪法第一个修正案保证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有关宗教的法律，或是禁止自由举行宗教活动的法律。最后，彻底清除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也开始实施。1833年马萨诸塞彻底结束了国教制度，废除了州立教会，所谓州立教会，是指被州政府所认可的教会，所有百姓照理都属于州立教会。从这时候起，古老的政教合一的宗教观基本上在美国消亡了，宗教自由成为整个国家的事实。政教分离最终得以实现。与君王用政权辖制教会相比，政教完全分离是一种进步，使教会彻底摆脱政府的辖制，可以自由发展和敬拜。但政教完全分离也并非圣经启示的模式，宗教的这种自由也带来了种种弊端，最大的弊端就是政府成了保护所有宗教的工具，而不再是保护真宗教的工具。所有真假教会、各个宗教都有平等的地位，不得相互歧视，甚至不可以相互攻击。那么当我们在台上揭露斥责异端、异教的时候，有可能会触犯到国家法律。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2、各派教会的发展

(1) 安立甘宗（圣公会）的改组

受独立革命打击最重的是安立甘宗，作为与英国国教相关联的官方教会，它倍受谴责和怀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有的特权、地位和支持。圣公会也日益不得人心，因而在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安立甘宗教会数量急剧下降。其中的大批信徒在独立后改信了循道宗，也有许多信徒迁移到加拿大，加入了“加拿大效忠英国联合会”。因此，战争结束时，安立甘宗信徒已是寥寥无几。这些残存的安立甘宗教会，脱离了与英国国教关系后，在威廉·怀特等几位牧师努力下，借着各宗派均脱离原隶属关系的契机，联合了美国的各个圣公会，在1785年召开了大会，拟订成立美国主教制教会，修改圣餐仪式，安排主教任命事项。1789年，终于实现了美洲各主教制教会的统一，又通过了一系列教会章程和崇拜使用的《公祷书》修订本，从此美国的圣公会成为自治的教会。

(2) 公理派

在大逼迫和争战中，强调各教会完全独立的公理派教会，纷纷表现出舍己的清教徒精神。但和平来到，进入安逸，教会内部便滋长了不冷不热的自满情绪。教会安于现状，没有福音的使命。随着许多州先后通过了政府和教会分离法案，公理派在许多州中占主要教会地位的局面也逐渐丧失。其次，亚米念改头换面，成为加尔文主义者，只不过是温和一些，不那么极端，这些主张温和地解释加尔文主义的自由派与大觉醒运动复兴时期坚守改革宗的牧者展开激烈的论战。内部的争战日趋激烈，最后终于导致公理派分崩离析，信徒锐减。

(3) 浸礼派

战争结束后，浸信会也得到大规模发展，到1800年，浸礼派教堂数量位居榜首，信徒数目超过长老派和公理派。独立战争后，浸礼派开始意识到联合的价值，他们发起了在教会间的合作运动，不同地区展开自愿联合，从1751年到1799年一时间出现了49个联合会，产生了广泛而有益的影响。

3、长老会的复兴和总会的成立

由于教会此时可以自由发展了，长老派于是把各地的长老会划分为四个地区性的分会，在西部地区，长老派又吸引了大批公理派信徒，因为两派在教义上本来就相同，都是清教徒的后代，只是在教会治理上不同。所以许多持守改革宗信仰的公理派教会纷纷走向长老派。1785年，长老派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条例，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起草长老派的政策、规章、制度，并于1788年表示愿意服从美国政教分离的制度，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

彼前 2: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1789年，美国长老会总会(PCUSA)成立，又称美北长老会(相对于与美南长老会)。1789年美北长老会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大会，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和《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作为《圣经》之外的次要标准。这次大会修订了信条，以符合美国习惯，删除了《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教皇为敌基督”的说法。美国长老会下设4个分会：纽约—新泽西、费城、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然后再分为17个区会和419个堂会。

4、长老会反对奴隶制导致南北内战

1818年，长老会总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奴隶制是最终和上帝的法则并不一致的制度”。1864年，新泽西州的阿尔伯特·伯纳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圣经反对奴隶制观点之探索》。1850年，解放南方奴隶制的南北战争爆发。我们再一次看到，教会是世界的良心，教会所发出的光，是推动世界进步的真正动力。

第四节 美洲的第二次大觉醒

1、第二次复兴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教会历史又经历了第二次复兴，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到这次复兴的果效：

(1) 基督徒人数：1800—1810 长老会从7万增加到10万，浸信会从1800年的9.5万人增长至1810年的16万人。

(2) 真理上：改革宗教义再得发展，改革宗信仰的刊物达37份。

1808—1827年，新增17所神学院。许多优秀的改革宗牧师兴起，他们像前辈爱德华滋一样，深刻揭露人内心罪恶，谦卑来到神面前痛悔。下面是其中一位牧师托马斯·裴森的讲道摘录：

“当我看见主俯身搀拉我这个罪人时，我们应向主大喊：‘哦，主啊，请不要对我这么好，这样的恩典，应该赐给那些不曾像我这样忽略你爱的人，如此恩典临到如此不配的人身上，这是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这样的怜悯不应该降临给如此不配的人。如果你现在饶恕我，我将来还会得罪你，如果你现在将我治愈，我将来还会从你身边离开，如果你现在洁净我，我将来还会沾染污秽，哦，主啊，你离开我吧，让我自生自灭吧，将你的恩赐赐给那些更配得的人，那些不会像我这样得罪你的人。’”

这是一个悔罪者撕心裂肺的心声。这样的讲道确实能带来听众痛悔的泪水。当时许多牧师的讲道都是这样疾呼，这是圣灵浇灌的工作，但是哪里有圣灵的大做工，在那里撒但的种种伪装和拆毁就开始大行其道了。

2、出现的问题

此时的许多聚会采用营会方式，有脱离教会的倾向。这主要是来源于怀特腓的露天布道的模式，而且有的聚会连续几天几夜，于是带来种种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聚会时情绪过于激动，有些人甚至开始抽筋，情绪异常。虽然复兴带来了教会的繁荣，但里面夹杂着许多虚假和假冒，人们已经分不清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撒但的搅扰亦或是人心理的反应。后来长老会和公理会都发现了这种危机，便不再采用这种营会聚会的形式了，但营会却被此时已经悄然兴起的循道宗趁机大力推广。

第二个危机就是真理再次受到冲击。1783年，晚年的约翰·卫斯理写信警告他在大洋彼岸的循道会弟兄：要小心那些“将新的教训带入你们中间的人，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循道会向加尔文紧紧严防，但改革宗教会却纷纷向循道宗敞开大门，有的长老会将自己的教堂借给他们使用，而有的浸信会干脆就和循道会联合起来。这10年间，循道宗人数增长1.6倍。秋雨过后，庄稼猛长，但杂草和荆棘也随之丛生。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就连循道宗的历史学家威廉·沃伦施威特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大多数复兴运动都开始于加尔文主义。”但这次复兴的结果却使许多新兴宗派产生，而每一个新兴宗派的共同特点都是反对加尔文主义。早在1789年，循道宗在美国开始创建《美洲亚米念杂志》。当时美洲人对亚米念还了解不深，但短短二十年过后，有许多人开始批评持守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为保守和极端了。

第五节 芬尼的复兴主义

复兴主义就是被撒但驾驭了的假复兴。——约翰·慕理

1、芬尼生平

芬尼（Finney Charles），于1792年8月29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由于父母都不信任任何宗教，年轻的芬尼也是一名无神论者。1818年芬尼在亚当斯的一家法律事务所作见习律师。他有时也去邻近的礼拜堂走走，去听牧师的讲道，但对于只热衷于理性推理的芬尼来说，牧师所讲的道是不屑一顾的。

1821年的秋天，芬尼在上班的路上做了一次信主的决志，从此他自认为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由于他的能力突出，芬尼信主仅三年，就于1824年在长老会被按立为牧师，由此看出此时长老会在治理上的松懈。

2、芬尼的人为复兴方法

芬尼属于伯拉纠信仰，他强调神的工作主要是道德层面的管治，人自己能悔改和创造新心。芬尼认为，只要人的方法得当，复兴是必然产生的结果。从此复兴这一完全属于圣灵的工作似乎也也能掌握在人的手中了。芬尼开创了几种人为“复兴”的方法。

（1）忧伤者之座——决志

聚会时，前面空出一定数量的座位，在布道的高峰时刻，呼召人来到这些座位上进行决志，从此便可成为教会成员。

（2）心理学的大声胁迫催逼法

在呼召人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芬尼反复用同一个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加之以音乐的配合，使人感到越来越紧迫，如“回来吧、回来吧……”加上下面一些信徒的协助催促，一些人似乎被什么力量牵引，于是来到前面决志。有时芬尼等人甚至用表演的方式威胁催逼。如有一次讲到“凡是今天不决志信主而继续刚硬的人，将受到天使的惩罚”时，讲员忽然朝向天空，大声呼喊：“加百列啊，先停下你的宝剑，再给下面的人5分钟！朋友们，时间不多了，来吧，还有5分钟了、还有3分钟、2分钟、最后1分钟。”如此一些人在恐惧之中来到忧伤者之座，决志悔改。

（3）鼓励听众做出身体反应

如讲到谦卑时，要极力晃动、抽搐，最后则身体仆倒，场上顿现“复兴”景象，人们做出各种奇怪反应，有些人因这种反应而决志“信主”。

（4）使用妇女哭泣讲道

由于妇女在煽情方面的能力比较突出，所以芬尼也使用妇女，让她们在台上撕心裂

声地痛哭，呼召人来到前面，以感动下面刚来的人也跟着哭泣，便真的来到前面决志。

通过这些方法，芬尼带领的教会真的出现了“复兴”，当然这只是人数和情绪上的“复兴”。但芬尼讲的信息，却是几千年基督教的死敌——伯拉纠主义。

3、芬尼的信仰

芬尼是一位坚定的伯拉纠主义者，他反对基督救赎功效、义的归算等许多基本教义，他认为人得救完全在于人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他讲的所谓悔改就是决志。他也否认人的堕落，他认为人的得救只是道德的层面。根据他自己写的《芬尼回忆录》，他说：“人信耶稣只是一个决定……复兴不是神迹，正如撒种和收割不算神迹一样……救赎本身并不能保证任何人得着救恩。只有当罪人自己悔改的时候，在那种情感的状态下，上帝才会饶恕他。”

4、正统牧师同芬尼的斗争

提后 4:3-4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

许多改革宗正统信仰的牧师早就开始对芬尼的这些做法提出批判，并竭力抵挡这些做法的蔓延，但此时大多数人已经陶醉在这种“复兴”的果效之中。因循循道会的亚米念主义已经在美国被人广为接受，而亚米念的教义和芬尼的伯拉纠主义一拍即合，所以人们根本漠视这些来自圣灵担忧的呼声，反倒认为这些人是“吃不着葡萄的人”。这些呼喊反对芬尼的牧师们就像当年的耶利米、以西结先知一样，暗地忧伤，其代表人物有阿萨赫尔·内特尔牧师，他在写给《彼切尔牧师谈复兴》中发出本书绪论提及的感慨：“这些复兴的新措施损害了教会，是玩火自焚，会给教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虽然那时我们已经归于尘土，但我们的见证将会存留下来，神会把我们的见证公诸于世，这些对复兴的错误偏见，会像旋风一样势不可挡，我们的一切担心都会成为事实，我们这块土地的教会将会变得破败不堪。”看看今天美国教会的光景，看看这个荒凉的世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历史。

5、复兴主义的后果

复兴主义使教会开始迅速抛弃正统教义，反传统、抬高人能力的美国精神诞生。过去的一切正统教义都黯然失色，人们开始蔑视一切传统的东西，什么大公教会、什么信条，统统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人们习惯于把那些还在坚持正统教义的牧师和教会称作“沉睡教会”。人们的所谓觉醒其实就是反传统——反对传统的职业，反对传统的教育，反对传统的文化。人们看见芬尼仅信主三年就成为“大有能力的牧师”，所以许多文化不高、信主时间较短的人纷纷走上讲台。这些快言快语的人更容易找到听众，只要能赢得听众就是成功，这是他们复兴的唯一标准，真理的标准开始退下讲台。世俗音乐，各种技巧，甚至世俗的表演也粉墨登场，成了教会聚会的重头戏。1963年陶恕博士在去世前说到：“今天广为传播的基督教的复兴，不是复兴，而是基督教的悲剧，不仅是基督教的悲剧，也是整个世界的悲剧，我们挣扎了几百年却不能从其中解脱。”

芬尼的复兴不仅冲击了其他教派的教会，也冲击了原本坚定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的长老会，为了能达到芬尼的复兴果效，一些长老会教会也纷纷脱离原有的长老会体制。芬尼趁机制定了一个长老会联合计划，迅速得到边疆地区长老教会的积极响应。反过来，甚至东部地区，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长老会接受其教导，这就是所谓的新学院派（New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School)。以普林斯顿大学查理·贺智为代表的“旧学院派”(Old School)完全反对这种搅乱教会次序的做法。1837年,旧学院派主导的大会正式通过了《遣散法案》(The Excising Act):认为芬尼的“联合计划”违背长老会宪章,《法案》宣布所有在“联合计划”下建立的地方教会和区会均不合法,必须解散,重新按照长老会的原有章程建立体制。这一“釜底抽薪”的做法,导致了新学院派的极大愤怒,最终,他们正式脱离原来的总会,成立了自己的四级体制——即新学院派长老会。

1861年,旧学院派一方再次分裂为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在教义上是非常保守的加尔文主义,却错误地支持奴隶制度,但在神的护理中,这一分裂在南方保守了相当数量的加尔文主义长老会,使这些长老会没有受到后来美北长老会自由化的侵蚀。后来在1973年“美洲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简称PCA)成立时,其绝大部分成员的教会都是来自美南长老会。新学院派则在芬尼和循道会的影响下越来越走向亚米念主义,终于在20世纪向自由神学打开大门。

第七章 美国近代错谬神学泛滥

第一节 时代论和千禧年主义兴起

1、达秘和千禧年国度说

时代论起源于1830年的弟兄会运动，创始人是达秘（John Darby，1800—1882，另译：达尔培）。在著作《还原几千年真像》中，达秘提出了以千禧年为代表的时代论思想（他的一生经历在第二章已详细介绍）。其实早在18世纪，这种地上千禧年国的构想就曾被英国灵恩派爱德华·欧文（Edward Irving）大力传扬。千禧年国的构想是初代孟他奴主义的再现，却因达秘把此构想整理成时代论而被基督教界广泛接纳。而且，时代论中的千禧年国度、教会秘密被提和预言字面应验等思想皆出自灵恩派爱德华·欧文，所以说时代论是灵恩派的产物。但真正使时代论在美国及全世界广为流传的是司可福。

2、司可福的圣经注释

司可福（C.I.Scofield，1843—1921）于1843年8月19日出生在美国密伊利诺州那威郡，后迁到田纳西州的威尔逊郡。正当他入大学之际，司可福被南方政府征召入伍从军。1866年，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1869年，他顺利通过律师考试，进入堪萨斯州律师席。

1879年，司可福归信基督。归信之后，他喜欢去参加慕迪所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接受著名的圣经学者布鲁克（James H. Brooks）的教导。1882年，司可福放弃律师事务，在德州一个小教会牧会。1895年，司可福应慕迪的聘请，担任北田镇东部公理会牧师，在此有七年之久。他同时兼任北田慕迪圣经学院院长。

1902年，司可福回到达拉斯城任第一公理会的牧师。在这一年，他与波尔等几位圣经学者一起开始编撰圣经注释，并将达秘的时代论思想和亚米念主义巧妙地编入为圣经原文所加的注释之中。人们读了这样的注释书，最后不再区分哪些是圣经原文，哪些是他们加的注释，如此他们便把时代论思想以“神话语的权威性”的方式牢牢印在人的脑海之中，以致人们对这些新奇错谬思想不再有任何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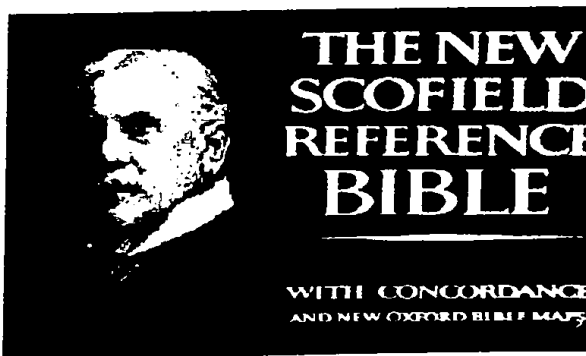


图 5.29 司可福和《司可福圣经注释》

1909年，《司可福圣经注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917年，修订版又发行。这本书一经出版便风靡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发行了200万册。整个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基督教可以说发生了宗教改革以来天翻地覆的逆转。为了更好地拓展时代论思想，司可福等人以达拉斯神学院为基础，大力兴办时代论大学，如恩典神学院、慕诺马圣经学院等，新一代时代论工人进入世界各地。

3、时代论说的基本要点

(1) 将人类历史划分成七个时代

时代论将人类历史划分成七个时代，即无罪时代（在伊甸园中）、良心时代（逐出伊甸园之后）、人治时代（挪亚时期，洪水以后）、应许时代（亚伯拉罕至摩西）、律法时代（摩西时期，从摩西至基督）、恩典时代（耶稣受死复活以后）和国度时代（耶稣第二次再来，建立千禧年）。

根据司可福的圣经注释，在不同的七个时代中，神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或显明的旨意来试验人心，观察他是否愿意在他所生的时代中顺服神在该时代中所施行的试验。这些时代在历史过程中，一个连接一个。当神发现人在第一个试验上失败后，就给他们另一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来试验他们，以此类推。

(2) 时代论者特别区分所谓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

时代论认为恩典是与律法相对立的：在律法之下，神要人交出义来；在恩典之下，他将义赐给人；律法是与摩西和行为相连的，恩典是与基督和信心相连；律法祝福好人，恩典拯救罪人。按照时代论的观点，恩典是自基督受死复活开始，这试验的结果就是犹太人弃绝基督，并且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时代论主张律法之下福音是人自己赚得的，恩典之下福音是神白白的恩赐。

关于律法和恩典，时代论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一、律法是靠行为称义，而恩典则是靠信心称义；二、律法时代是包括摩西到基督的时期，而恩典时代则是从基督第一次来临后受难时起，至第二次来临后为止之间的一段时期；三、律法和恩典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上，有律法就没有恩典，反之，有恩典就没有律法；四、在恩典时代中，人还是失败了。

4、对时代论的批判

时代论的错谬显而易见：

(1) 时代论者将神对人的旨意——特别是他拯救人的旨意——切成断片。圣经清楚地指出，神施行祂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及所给他后裔的应许是一致的。因为圣经的特点就是一致性，所以这样讲圣经的割裂是在诋毁圣经的权威。

(2) 时代论者完全忽视了人在犯罪之前和犯罪之后在本性上的改变。人犯罪之后，因本性的败坏，已经没有能力再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他们主张神试验人——看人自己是否能选择顺服以致得救，纯粹是伯拉纠和亚米念主义的思想。

(3) 即使在洪水发生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人也不能按着良心来决定。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和十六节中清楚讲明，在每一个时代中，没人能行律法，没有人能顺服良心。

(4) 时代论者称洪水以后的一段时期为人治时代。其实那个时代也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护理之中，神用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就是表明恩典。

(5) 时代论者称，在西乃山时，以色列人同意接受以遵守律法为顺服之标准，而进

入了律法时代。那么羔羊的流血意义又是为何？献祭本身就是预表恩典。

(6) 根据时代论，神在每一个时代中，用某一种旨意来试验人是否愿意顺服他，忽略了因信称义是从亚当、亚伯、亚伯拉罕到世界末了的唯一得救方式这一最基要的真理。

创 15:6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来 11:4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7) 时代论的末世论

时代论前千禧年派相信，教会在灾难前被提。神会在灾难中审判不信的外邦人和不服从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此时得救。灾难结束时，基督与教会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在千禧年国度之后，撒但会再被释放，与基督进行一场大争战，但撒但和他的随从者都会被丢在火湖里，随即永世来到。

时代论的末世论有几点错误：其一，基督两次再来，第一次是偷偷地来；其二，基督两次再来都没有最终得胜；其三，将教会和以色列完全分开，教会只是插曲；其四，旧约的诸约都在千禧年实现，对我们今天没有意义。

时代论以亚米念主义为基础，将神贬低成为一位经常无能为力的神，总是失败，不得不经常调整自己的计划。这实在是大大地褻渎了上帝的永恒权能。

诗 33:11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

时代论严重地割裂圣经，将圣经解释得支离破碎，又将以色列单独拿出来，从而完全否认神救恩的一体性，否认教会的一体性。而且在他们看来，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似乎对信徒的救恩于事无补，信徒反而还需要到千禧年后的大灾难去继续陶塑。他们的观点和天主教的炼狱说相似，仿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成了”只是一句空话。总之时代论的错误罄竹难书。

第二节 慕迪带来现代福音派复兴

1、慕迪的传道

福音派原本是一个好的名词，是指那些忠实圣经传讲福音的人，但到了近代，福音派只讲所谓的“福音”，废弃了一切传统的教义，以致持守亚米念主义、时代论的教会比比皆是。慕迪就是带来现代福音派复兴的主要人物之一。

慕迪生于1837年2月5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六。他父亲离世之时，他才4岁，1854年2月5日，慕迪17岁，他离开家乡北田，前往芝加哥城工作，做了一名皮鞋推销员。在一个主日学聚会里，慕迪受感动放下生意，作了一名传道人。这是一家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主日学。受敬虔运动的影响，慕迪里面充满“知识无用，只要有爱心”的思想，因而神迹经历接连不断。现在在基督教界广为流传着他的见证，这些见证玄而又玄、神乎其神，仿佛慕迪处在使徒行传的时代。

比如某晚他回家时，看见有一个人靠在电灯杆子上。他就上去，按手在他的肩膀上，问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人勃然发怒，握拳将慕迪打到水沟里去。隔了三个月，在一个寒冷的清晨，有人叩慕迪的门。他开门一看，就是那位咒骂他的朋友。那人告诉他说，“自从那晚起，我一直不得平安。你的话扰乱我心，使我烦恼。昨晚我没有办法睡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觉，我想还是来请你为我祷告。”之后那位朋友就接受了基督。

慕迪不停息地工作，到处奔跑，“大聚会，大工作”。他忙到一个地步，几乎一天之中没有五分钟安静等候，所有讲道完全是临时应付的。慕迪自己也承认在那些年间他“有热心，却少知识”，不过他也说：“比起只有知识而无热心的人，这种人还是更有希望。”

那年他访问英国，在爱尔兰偶遇“孩童传道人”慕尔好（Henry Moorehouse）。慕迪自己这样回忆说：“这少年不足17岁。我自忖，他怎能讲道呢？他要我乘船返回美国的时候告诉他，因为他喜欢与我同去。我认为他不会讲道，所以未曾通知他。不料我回芝加哥仅仅数周，他就来信告诉我他已抵达美国。”

后来慕迪趁外出之际允许这个少年在自己的教会讲道。慕迪这样描述了这次讲道：“我在礼拜六早晨回来，急忙要知道情形如何，我一进屋子，就问妻子：‘那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怎样？人喜欢听他讲道吗？’妻子回答说：‘那晚，我去聚会，看见人人都带着自己的圣经。慕尔好开始就说：‘我的朋友们，你们只要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可以找到我的经题。’我从来不晓得神是这样地爱我们。我的心开始溶化，眼泪不禁涌流，好像是听到远方新闻似的，我完全被吸引进去。’”

就这样，知识文化、对圣经教义的研读在这些“大有能力”的牧师面前变得一无是处，人只要有爱心、有热情就可以随时走上讲台。

1872年，慕迪觉得有神的引导，就第二次访问英国。因为这时发生了重要的事，就是慕迪经历了所谓的被圣灵充满、得了光照，自己见到要复兴英国的异象，而且据传他见了三层天上的荣耀。于是自1872年至1892年，慕迪的足迹走遍英美各大城，有几十万人听他讲道。

2、受“圣灵的浸”

慕迪回到美国，开始传讲“受圣灵的浸”。在北田学院里有几个教员，他们不信个别基督徒受圣灵的浸的道理，相信凡是基督徒都已经受过圣灵的浸。其实这是圣经明明的道理（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不过此时这样的道理在这些热心的人看来已经是陈词滥调了。据慕迪同工叨雷记载：

1894年7月8日，礼拜天，这天是北田学院学生灵修会的最后一天。慕迪请我在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上午讲论“圣灵的浸”。我就先在礼拜六晚讲“圣灵的浸”的大纲，礼拜天上午讲“如何受圣灵的浸”。我讲完的时候是正午十二时，我就在会中报告说：“慕迪弟兄要我们下午三时到山上去祷告，专求圣灵的浸；但你们若不能等到下午三时，你们现在就可以在你们的房间里，或是其它安静的地方，祷告亲近神。”午后三时，我们要先聚集在慕迪弟兄母亲的家里（那时他的母亲还在），然后我们一同上山。

那一天共有456人，因为慕迪已数过。到了山上，慕迪说：“你们学生要说什么话么？”那时，我记得有75个人起来说：“慕迪弟兄，我们没有等到下午三时，已经求主赐我们圣灵的浸。我们信我们已经得着了。”他们说完以后，慕迪仍请学生跪下求圣灵充满我们如同在五旬节充满使徒一样。我们刚跪下去，天色忽然变了，四面乌云起来，大雨随风而下，但我们的祷告，经过那天空的云，直到神的面前！圣灵充满我们，真如霖雨普降无异。

这些东西就是后代灵恩派的主要内容，慕迪也可以说是灵恩派又一派别的创始人。

3、聘请司可福

1895年，司可福应慕迪的聘请担任北田东部牧师，有七年之久。司可福来到这里之后，有更大机会传播他的时代论思想、编写圣经注释，慕迪对这一思想深信不己。时代论思想和慕迪的信仰如出一辙，都是对圣经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不考虑整本圣经真理、以偏概全，用强解圣经和神迹奇事来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司可福后来在慕迪的丧礼中致词说：“慕迪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却能被神大用，他的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对圣经深信不疑。在慕迪的眼中，圣经仿佛是神的声音，慕迪是以神的声音唤醒人的良知。”

第三节 自由派神学和基要主义

1、新派神学猖獗

新派神学，又名近代神学、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派、不信派神学，泛指19世纪以后敌基督之神学，创始人是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36年，自由神学家们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创办纽约协和神学院，协和神学院后来成为美国新派神学的基地。

美国自由派神学的另一个基地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因而新派又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马修斯（1863—1949）和麦金托什（1877—1948）。麦金托什是著名的经验主义自由派神学家。他出生于加拿大，在1916年至1942年担任耶鲁大学神学院神学与宗教哲学的教授。他的著作颇丰，主要有《交战世界中的上帝》、《神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基督教的合理性》、《宗教实在论》、《社会宗教》和《关于上帝的沉思》等。他认为：神学必须以一种完整的哲学为基础，以人的宗教经验为开端；宗教真理的标准并不是圣经或教会会议制定的教义，而是人们实在的“经验”。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派神学已发展成一套普遍为社会所接受的学术体系。他们共同特点是：（1）宣称上帝之国通过社会改善、理性教育和消灭不公就能在世上建立，否定一切传统教义；（2）否认基督神性，只承认基督在地上建立一个道德榜样；（3）圣经中所体现的耶稣教义只是道德层次，人们只要通过新的科学、哲学、历史和道德将传统信仰加以扬弃、改造，按其内心所体验的至善至爱来作为现代生活的指南，遵循历史的发展，就能确知上帝、获得永福。

自由派神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风靡欧美。其实自由派神学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但一个这样明显的无神论却打起了基督教神学的旗号，迷惑人心。

2、基要派产生

（1）尼亚加拉圣经大会

为了抵制自由派对教会的侵蚀，一些福音派教会组织了尼亚加拉研经大会（The Niagara Bible Conference）。从1876年到1897年（除1884年以外），研经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最初几年的会议都是在美国的一些地方举行的，会议从1883年起改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湖畔的女王皇家酒店举行。出席尼亚加拉研经大会和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支持千禧年的时代论者，慕迪和司可福都曾是大会讲员和创建者。

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尼亚加拉圣经大会是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形成的起点，许多与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会者后来成为基要主义者。尼亚加拉圣经大会多次举行，且几乎每次都要制订和公布会议信条，多则十几条，少则几条。这些信条的核心内容正是后来基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1878年，尼亚加拉研经大会制订了美国基督教历史上有名的《尼亚加拉圣经大会信仰宣言》，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尼亚加拉信条》。《尼亚加拉信条》共有14点，里面不乏正统信仰的内容，但有一些内容已经偏离正路，开始逐渐挪移教会的帐篷。下面摘录一些内容如下：

在近来的几个时代，已经有如此众多的人们远离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关注的是罪恶的引诱和魔鬼的信条……

第一，我们相信：圣经中的每一句话，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所有关于我主耶稣基督的内容都是确定无误的。

……

第六，我们相信：圣灵并不是一种影响，而是一个圣人，是所有可接受的崇拜和服务的力量源泉，是我们永恒的安慰和帮助。

……

第八，圣经的所有内容，包括旧约的每一章，从头至尾都是为我们的实践而设计的。我们有责任在和平的规约下保持这种灵魂的一致，超越所有的派别歧视和宗派偏见，带着一颗纯洁的心热情地彼此相爱。

我主耶稣将亲自回到这个世界来宣布千禧年时代的到来。那时以色列将重新恢复他们的领土，大地将充满主的智慧。我主在千禧年前的亲自降临是我们在福音中一直期盼的结果，是我们幸福的希望。

……

尼亚加拉会议提供了20世纪初期基要主义运动教派合作的基础，推动了传教活动和福音主义的传播，促成了大量基要主义作品的出版。该会议鼓舞了许多基督徒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基要主义教会、学校、传教团和公共事业的热忱。

基要主义的另一次重要会议于1878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纽约举行，会后由《纽约论坛》杂志出版社出版了一份5万页的增刊，题目为《预言大会中前千禧年论文集》（Premillennial Essays of the Prophetic Conference）。

从此，基要派登上教会历史的舞台。针对自由派的理论邪说，1895年，尼亚加拉城圣经研究会通过了基要主义五大主张：（1）圣经的逐字灵感论（逐字默示）；（2）耶稣基督的神性（因自由主义神学强调人性）；（3）神迹、童贞女诞生说（因自由主义神学否认成圣和神迹）；（4）代赎的赎罪论；（5）身体的复活和基督的再临。

3、基要派对历史的影响

基要主义五要点的产生标志着基要派的诞生，撒但此时已巧妙地将教会的关注点从“加尔文五要义”转向无需争论的“基要主义五要点”。只要相信基要主义五要点，那就都是弟兄姐妹。虽然五要点中没有强调千禧年论的字样，但此时人们已经全部接受了时代论思想，真教会——改革宗教会反而被悄悄地排除在基要主义之外。

1903年，尼亚加拉会议的“北美圣经联盟”成立，并出版了名为《圣经学生和教师》的期刊——《基要主义：真理的证据》。该系列丛书在1910—1915年间出版，共12卷，包括90篇论文。一般认为，《基要》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基督教基要派运动的开始，更加推动了时代论基要主义运动。在1895年的美国尼亚加拉圣经大会提出的五条基要原则竟然在1910年美国长老派教会大会上得到确认，这就等于长老会在自由派攻击下也甘愿退守到基要派的程度。这一次退步对教会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基要派兴起，立即取代了世界各地的改革宗信仰体系，使亚米念主义和时代论这些哪怕是经大会议定为异端的信仰体系成为基督教的正统，时代论、亚米念的思想随着基要主义的宣教活动推向世界各方。《司可福圣经注释》成为各国传道人最权威的解经讲道内容，在1909—1967年间大约卖了500万到1000万册，1967年再版后又卖了300万册，购买者主要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今天在传讲改革宗这几千年传承的真理时，许多人立即将之定为异端并加以唾弃。有的人面对强大的真理之光也不好直接否认，于是就将改革宗里面的核心内容改头换面，称自己为温和、宽松的改革宗，其实里面就是不肯动摇的时代论根基。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啊！主啊，求你兴起！

4、一战后基督教协会成立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信徒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炮声摧毁了那些后千禧年派的美梦，人类命运看来不那么乐观，而此时真教会已无暇去探讨末世论这一真理中的末节问题。由于《司可福圣经注释》中时代论思想在人们心中已根深蒂固，人们也不会接受无千禧年这一比较正统的改革宗思想，反而觉得时代论的千禧年论似乎更符合实际。及时行乐的观念开始充斥美国社会和教会。在许多人看来，既然宗教的意义就是缓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痛苦，那么什么派别、教义都不重要，只要人能得安慰就好。1919年春季，周刊《基督教世纪》刊登了一则广告，愿出价100美元征集最好的连载故事，这些故事将是关于现代教会生活情况的作品。出于这一宗旨，战争前引发的团结精神已经燃起了人们新的希望，他们希望在广阔自由的基础上，各教派之间能够相互合作并最终走向统一，“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The 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 WCFA）于是应运而生。

凡是拥护尼亚加拉会议上提出的基要主义五点主张的都应该属于基要派，浸礼派率先响应这一观点。对于美国南方浸礼派和基要派来说，1919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虽然许多浸信会的人起初对这种宗派大联合表示怀疑，但在1918年费城预言大会上，多数浸信会就决定下一年和其他基要派组建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1919年5月，该组织在费城建立。组建者除了赖利之外，还有贾斯珀·科尼利厄斯·梅西（Jasper Cornelius Masee）等，这些人多半是浸礼派成员。查尔斯·布朗夏尔（Charles Blanchard）起草了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的成立宣言。基要派的目标不仅仅是在美国，他们要发展到全世界，所以才命名为“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

1921年，北方浸礼派大会在德梅因（Des Moines，又译：狄蒙尼）召开，基要派与其他保守的浸礼派还是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用词，当时的一份全国性浸礼派报纸——《守望季刊》的编辑柯蒂斯·李·劳斯（Curtis Lee Laws）——这位坚定支持浸信会要与基要派联合的主编，在发言介绍会议时首次使用“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这个词来描绘那些准备“为基要而庄严战斗”的人。不久，基要主义这个词开始被人们用来描述美国新教中在神学与文化变迁问题上与现代主义开战的各种派别，所以基要派一词就成了囊括除自由派以外的所有基督教派别的代名词。但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真正的改革宗教会仍然是不与万民掺杂的一群人，只是此时这样的教会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第四节 长老会的几位著名的神学家

1、查尔斯·贺智

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 1797—1878）在1821年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在1851—1878年担任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他著有三卷《系统神学》，在圣经研究方面也深有造诣。在新派、福音派渐渐占据教会主流时，查尔斯·贺智继续传承着正统改革宗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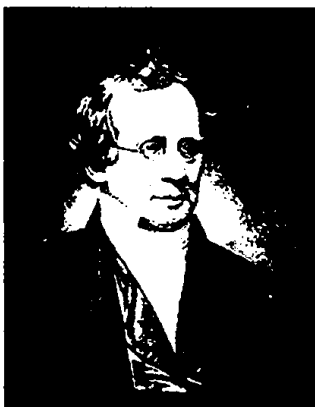


图 5.30 查尔斯·贺智

2、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贺智

（1）生平

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贺智（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 1823—1886）也是一位美国长老会的领袖。他的父亲是查尔斯·贺智。他的名字取自普林斯顿的第一任院长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Archibald Alexander）。

贺智就读于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他于1847年到1850年间在印度做过三年的宣教士。他于1851年至1855年在马里兰州的西诺丁汉（Lower West Nottingham）、1855年至1861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里德里希堡（Fredericksburg）以及1861年至186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克斯巴尔（Wilkes-Barre）担任牧职。1864年，他接受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的西部神学院（后来的匹茨堡神学院）的邀请，担任系统神学教授。他一直在那里待到1877年。之后，他去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做他父亲的助手。他父亲查尔斯·贺智是著名的普林斯顿系统神学的教授。1878年，他接替他的父亲担任该职位，一直到1886年他去世为止。

（2）事奉经历及著作

他是新泽西学院的托管人和长老会的领袖。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年内，他并没有放缓他的工作，而是继续写作、讲道、做讲座、演讲，与人接触，影响人们，通过这些来扩大改革宗的影响。

作为神学家，他有与众不同的思维能力，他的思维非常的敏锐。在整理神学教义上，他并没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他在这一点上和他的父亲一样。他的父亲在去世之前承认他并没有教过也没有写过什么新的东西。亚历山大·贺智的第一本也是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神学大纲》（1860年于纽约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威尔士语、现代希腊语和印度语。《赎罪》一书在1867年于费城出版；目前为止仍是教恩论最好的著作之一。紧接着，他写了《威斯敏斯特信条注释》（目前已经出版中文版，由圣约翻译小组译），这本注释思维清楚论述紧凑，对信条有精辟系统的阐述。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贺智也已经受到了人本主义思潮的些微影响。他也为一些百科全书撰写过文章。他是《长老会评论》的创刊人之一，并且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

3、华腓德

(1) 生平

华腓德博士（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于1851年11月5日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莱克星顿郡一个敬虔的家庭。他幼时即背诵附圣经章节的要理问答，19岁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成绩优良。21岁时，他蒙神选召，为造就自己将来为主使用，遂于1873年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在普林斯顿读神学时，有查理·贺智等为教授，他在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门下受教。1876—1877年，他又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归国任短期牧职后，他即被聘为宾州的西部神学院的新约文学讲师，后升为教授。由于其早期著述，他赢得教会人士的赞赏。1880年，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在西部神学院九年的执教为后来胜任普林斯顿神学院33年（1887—1921）的辩证学教授的工作作了预备。他不仅忙于写作和教学，还要长年照顾患病的妻子。和以往的多数改革宗神学家相似，华腓德博士于1921年2月16日因肺病逝世。也就在这一阶段，相继逝世的还有另两位改革宗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1920年11月12日）和赫尔曼·巴文克（1921年7月29日）。他们三人不仅是真道上的同工，也是生活中的至友，一生都在竭力维护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就像约书亚等老一代神仆人离世后以色列进入混乱的士师时代一样，神的教会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因此开始进入黑暗时期。

(2) 事奉及著作

1921年5月2日，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巴顿博士（Dr. Francis L. Patton）发表纪念演讲。他说华腓德博士是语言学专家，关于新约的解经方面有正确的见解；他精通教义史，系统神学的知识也非常渊博。柏博士宣称华腓德对于其终生致力的工作所带来的明显果效、其神学立场之稳固，乃在于他对圣经的坚信和追求。

华腓德论到加尔文时，说：“当他观测主权之父的尊严时，他整个的人都肃敬地在他面前拜伏，他整个的心灵为了祂的荣耀热烈地燃烧起来。当他想到这位伟大的神在他自己儿子成为罪人之救贖主时，他就充满感情地将自己奉献给神，去传播祂恩典的荣耀。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愿意他整个的心灵受神的支配，这才是真正的“受圣灵的引导”。凡在他里面属乎良善的，或在他里面想要成就的良善意愿，都是出于圣灵的大能，惟有神的荣耀和圣灵的引导才成为他整个思想与生活的二大原则。”

当高等批判学在美国学府日受重视之际，华腓德与其他保守派学者就联合起来，疾呼圣经的启示性和完全可信性。1881年，他与亚历山大·贺智联手，写了一篇闻名的文章《启示》：“历代以来，圣经源于神启示的观点已经建立。教会历代以来的信仰指出，圣经的字义及精意均是本于神。”而且直到今天，这仍然是重要的立场。华腓德在这篇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文章中提出了对一个基督徒一生都当坚信的真理：“当圣经说话时，神亦说话。”

这一立场就和后来巴特的新正统派以及现代的灵恩派从起点上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改革宗正统信仰和这些错谬信仰之所以有现在的天渊之别，是因为在一开始就走了截然相反的路。错谬信仰都是从感觉、异象去寻求神的声音，而正统信仰是我们打开圣经谦卑阅读时，神就在向我们说话。

19世纪末，美国长老会正为要不要遵守《威斯敏斯德信条》而辩论之际，华腓德写了一系列文章。他以坚定不移的立场指出：“《威斯敏斯德信条》是亚当以来圣经以外最宝贵的作品，是教会信仰的框架和规模。”神借着这些忠仆的努力，哪怕是在信仰堕落的今天，许多教会仍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自己的告白，尽管这些教会多数只是在外表的遵行。

1904年，华腓德发表了努力多年的专著《何为加尔文主义》。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以救恩论为主线，精辟地论述了加尔文主义深层次的意义：人的得救就是神的再造，是再一次的超自然的大能的彰显。华腓德如此说：

用一句话说，加尔文主义者就是那看见神的人。他看见了那不可言喻的异象——自然界中的神、历史中的神、恩典中的神。他不容这异象从他眼中有片刻的消失。在每一处他都看到神大能的步伐；在每一处，他都感受得到神大能臂膀的动工、祂大能的心的跳动，所以最主要的，加尔文主义者是思想领域的超自然主义者。世界本身对他来说是超自然的产物，人自己是属于神的——为神的荣耀被造。人存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荣耀他的创造主，也要永永远远以祂为乐。因此他在每一个步骤和阶段都是属于神的。他在神的爱中被安排设计，通过神自己的儿子在这罪恶世界上的超自然的生和死得以成就，就如同在圣灵感孕下童贞女生子、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一样超自然的作为被运用在人的身上——这完全彻底是一种超自然的作为。所以，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神的教会和第一次创造本身一样，是神直接的创造。加尔文主义者全部的思想，感情和生命都沉浸在这种超自然主义里面。没有超自然主义就不可能有加尔文主义，因为这正是加尔文主义。

4、伯克富

(1) 生平

伯克富（Louis Berkhof，1873年10月14日—1957年5月18日）是一位美籍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他的《系统神学》影响了整个20世纪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神学院和圣经学院，以及许多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

伯克富于1873年在荷兰的埃曼出生，并于1882年举家迁到美国密歇根州。在美国期间，他完成了神学院的课程并和雷卡·戴慧思结婚。他们育有四名子女。他的妻子在1928年去世，他之后娶了已有两个女儿的戴娜·海恩斯·犹德斯玛为妻。

1900年，伯克富毕业于大急流城的加尔文神学院，之后在密歇根州艾伦代尔查特小镇的第一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担任牧师。两年后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于是回到大急流城，在奥克戴尔帕克教会担任牧师。自1906年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伯克富在加尔文神学院做教员，前二十年教授圣经研究，1926年进入系统神学系，1931年成为神学院院长，并继续从事其工作，直到1944年退休。



图 5.31 伯克富

(2) 伯克富作品：

伯克富一生写了二十二本书，他的主要著作是《系统神学》（1932 完成）和《基督教教义史》（1937）。他为新学院派（New School）和大学的学生写了一本更简要的系统神学，题目为《基督教神学概论》。1951 年伯克富在普林斯顿系统神学的“磐石讲座”中发表演讲，这些演讲稿都被收录在《神的国度》一书中。除此之外，他为改革宗基督教教会写了很多论文和讲道集。

5、霍志恒

霍志恒（Geerhardus Johannes Vos, 1862 年 3 月 14 日—1949 年 8 月 13 日，又译：魏司坚）也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杰出代表。霍志恒从小在一个敬虔的荷兰改革宗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荷兰改革宗的牧师。在霍志恒 19 岁时，他父亲被聘为北美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他们全家就移居到美国。霍志恒从小受凯波尔和巴文克的影响颇深，到达美国后，他先在加尔文神学院求学，后来又转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在普林斯顿，他在当时最著名的长老会神学家如威廉·亨利·格林（William Henry Green）、弗兰西斯·兰德·巴顿、亚历山大·贺智等手下受教，只用了两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样的成长背景使得他有非常扎实的改革宗传统神学的根基。之后，他又转去德国求学，第一年在柏林大学，后面两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只用了三年，他便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他才 26 岁。在德国求学期间，他的老师中有许多是当时的自由派神学家，如奥古斯特·迪尔曼（August Dillmann）、伯恩哈德·魏兹（Bernhard Weiss）、赫尔曼·斯达克（Herman Strack）等，这使得他非常熟悉自由派的圣经批判法。当然，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护理和恩典，这些经历反而使得他更加坚定地站在改革宗神学的根基上对自由派进行批判，最终形成了他的“改革宗圣经神学”的思想。巴文克和凯波尔想要说服他成为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一名旧约神学教授，但霍志恒决心回美国。于是在 1888 年秋天，霍志恒回到美国，在加尔文神学院任职。1892 年，霍志恒入住普林斯顿神学院，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圣经神学教授。在普林斯顿，他的学生有梅钦和华腓德。这一段时间他也完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保罗的末世论》（1930）和《圣经神学》（1948）。霍志恒的妻子是凯瑟琳，他们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其中一个儿子就是魏司道（J. G. Vos）。

霍志恒的《圣经神学》一直以来都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加尔文神学院等改革宗神学院的权威性教材，也被广泛地翻译成各国文字，包括中文。《圣经神学》影响建造了许多地方的改革宗教会。

第五节 北美长老会倒向新派《奥本宣言》

1、美国长老会逐渐向新派妥协

正如长老会神学家查尔斯·贺智所预言的那样，长老会居然同意弱化《威斯敏斯特信条》中一些非常强烈的加尔文主义教义，并对所谓的“新方法”更加包容。当时，新学院派中有些牧者已经开始接触欧洲的自由派神学，他们也将这些神学思想带入了联合后的美北长老会中。他们以“合一”、“在爱中包容”、“良心自由”等名义，开展所谓的“新神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讨论，一步一步地、偷偷地侵蚀着美国长老会，而区会、总会、大会这么多级保障体制居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和归正功能！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个标志性事件，足以证明到 20 世纪初，美国长老会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第一个是金巴伦（Cumberland）长老会接受亚米念主义，金巴伦早在 1906 年之前就已经分裂出去，后决定重新加入美国长老会，美北长老会竟然予以批准，此时居然不觉得彼此有教义上的分歧！第二个是大概 1909 年，有三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毕业生申请美国长老会纽约区会的牧职。在区会考察时，按牧委员会有人问了这个问题：“你相信童女怀孕生耶稣吗？”三个牧师候选人一致地否定了这个问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通过了按牧考试，而且被纽约区会按立为牧师。

长老会中的保守人士再也坐不住了。1910 年，长老会大会首先正式通过了“基要主义五点主张”，将其定为基要教义，要求所有的牧师和长老必须认信这五点。然而，对于长老会而言，这是何等悲哀的事！这些教义都不是新的教义，乃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清清楚楚的宣告，但如今却需要大会的权威加以明确。《信条》的权威已经被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次，区会已经无法胜任判断基要教义和次要教义的使命了。

2、福斯迪“牧师”

哈里·埃默森·福斯迪（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又译：富司迪）是纽约城第一长老会牧师。他的讲道不但让教会的听众着迷，NBC 电台每个礼拜天下午的“国家晚祷”也交由他主持，使得他的讲道更是在全国的听众中流行。他反对基督教一切最重要的基要真理，例如神迹（特别是童女生子）、圣经无误、基督宝血的赦罪、基督再来等，认为这些教义都不合时宜。

1922 年 5 月 21 日，他在第一长老会讲了《基要信条派将取得胜利吗？》，呼吁成立一个心灵开放、有知识性、有容忍的“基督教团契”。洛克菲勒立即把这篇讲道印成小册子，分发全国。福斯迪所描述的耶稣是一位喜爱户外活动的“男人中的男人”，是一位自我牺牲、善良的“超级英雄”。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信的假先知，但长老会却一直没有惩罚他，可见长老会的管理已经瘫痪到一定程度。但这篇讲道实在已经偏离基督教太远，长老会不得不审查，福斯迪最终被迫放弃了在长老会的教职。他后来受邀成为公园街浸信教会的牧师，并最终成为纽约城由洛克菲勒所支持的河边教堂的牧师，直至 1946 年退休。福斯迪承认在自由派与基要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认为双方仍然可以和平共处。“我曾站在长老会的讲坛上坦率地说出了现代派的某些看法——处女感孕不是什么历史事实，圣经完全无误论不可相信，基督的二次降临是过时的信息。”



图 5.32 福斯迪和洛克菲勒建立的自由派河边教会

3、奥本宣言

自由派当然不甘心被这五要点限制，他们不断地辩论，力图破除大会对牧者和长老“良心的辖制”。1924年，长老会自由派牧者共同发表了《奥本宣言》，有超过1200位长老会牧师参与。在《奥本宣言》中，他们宣称：

(1) 1910年的尼亚加拉大会的决议违背长老会宪章，因为根据宪章，考察和按立牧师是区会的权力，只有区会有权决定哪些是基要教义或次要教义；

(2) 1910年尼亚加拉大会的决议只是对《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一种解释，但信条本身并不必然如此解释。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基督代赎不应再作为信条的必然阐述。（这等于在说：“信条岂是真这样说吗？”）

教会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令人吃惊的是，面对这样的形势，很多保守的区会为了 avoid 分裂居然选择了退缩。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我们守住区会，不再按立自由派的牧师，他们就不能过多折腾。”然而，这样的退缩换来的却是自由派趁机全面抢占长老会。

第六节 普林斯顿大学的改革宗阵营被现代神学占领

1、格雷山姆·梅钦

普林斯顿神学院一直是坚守长老会抵制现代主义的坚固堡垒，其中有许多保守的加尔文主义的牧者和学者，像查尔斯·贺智、亚历山大·贺智和本杰明·华腓德等。在自由主义、基要主义占据全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时候，普林斯顿几乎成为改革宗神学的最后一座堡垒。普林斯顿学院的最后一位基督的精兵就是梅钦。

约翰·格雷山姆·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 1881—1937，又译：格莱山姆·梅钦、梅晨）于1881年出生于巴尔的摩。他的父亲亚瑟·梅钦是一位律师。他的父亲来自圣公会，他的母亲来自长老会。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教导他《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他们家庭周日在富兰克林街长老会聚会。梅钦早年接受的应该是私立的教育。他上了一个私立的大学并在那里学古典文学，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小时候也学过钢琴。1898年，17岁的梅钦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习，由于成绩优异而获得奖学金，他的专业是古典文学。经过一番犹豫，1902年，梅钦选择了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神学，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硕士。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1905年他在德国读了一年神学。在一封写给他父亲的信里，他承认由威尔海姆·赫尔曼教授所教导的自由派神学使他的信仰进入了一个困惑阶段。尽管他对赫尔曼教授本人非常尊敬，但他在德国的经历和与现代派神学家的交往没能使他误入歧途，反而使他更坚决地拒绝了自由派神学，对传统的基督教更加确信。和霍志恒一样，这完全是上帝特殊恩典的护理，也与母亲从小的敬虔教育所打下的美好根基不无关系。



图 5.33 约翰·格雷山姆·梅钦

1906年，梅钦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担任新约圣经的讲师。在那个时候，梅钦对信仰还没有确信，所以他没有签署信仰告白。在普林斯顿，他碰到了华腓德(B. B. Warfield)。他认为华腓德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华腓德认为，正确的教义是基督徒影响周围文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华腓德重视圣经的权威地位和基督教的超自然来源。应该是在华腓德的影响下，梅钦解决了他信仰上的所有疑问。1914年，梅钦被按立为牧师，第二年，他成为新约的助理教授。

在一战期间，梅钦跟随基督教青年会(YMCA)去法国前线做志愿者。在那里，他目睹了现代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毁坏。从欧洲回来后，梅钦继续在普林斯顿做新约教授。在这一期间，他成为维护基督教和抵抗现代派神学的著名学者。

2、梅钦的著作

《保罗宗教的起源》(1921)是梅钦最著名的学术性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证明现代派神学的观点——保罗的宗教是来源于希腊哲学，并且和真正的基督教毫无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基督教真伪辩》(1923，又译：《基督教与新神学》)是梅钦批驳现代派神学的又一力作。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比较了基督教和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派神学，使人看出新派神学的悖逆本质。在《什么是信心》(1925)一书中，他驳斥自由派神学的反理性，把基督教灵意化，并且把基督教仅仅当作一种个人的体验，而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督教。

3、自由派的范戴克

范戴克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现代主义者，他高度推崇布里格斯的“高等批判”，大力推动修改《威斯敏斯特信条》，减少其神学气息。这位多才多艺的“牧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纽约作过17年牧师。



图 5.34 范戴克“牧师”

他的写作生涯始于牧师任上。他后来曾经参与诗歌编辑，出版过一本厚厚的具有份量的诗歌集。从 1899 年起，范戴克在普林斯顿开始教授英国文学，后被校友威尔逊总统派作驻荷兰以及卢森堡的公使。在一战时，他在海军作过随军牧师。他晚年专事写作，并担任过全美艺术文学协会的会长。作品丰富，有：《疑惑时代的福音》、《罪世的福音》、《第四位博士》、《第一株圣诞树：森林的故事》、《伤心的牧人：圣诞节的故事》和《蓝色花》等。他的诗歌《快乐崇拜》（曲用《欢乐颂》）被许多赞美诗歌集引用。

在《疑惑时代的福音》的序言里，他写着：“信心的活泼经验远比神学理论更为重要。”在《罪世的福音》的序言里，他告诉读者说自己的书不再讨论救赎的理论：“相反地，它在教导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够宽、够深地解释事实。”在他的作品中广为流传的是《第四位博士》，主角阿特班（Artaban）感受到内心的光照，这种内在意识激励他做出无私的决定，他按照自己的能力尽力帮助穷人，这就是他的救赎。

这些著作反映了他的神学思想。他在作品中谈到对上帝的信仰就像圣诞礼物一样美丽动人。这完全是新派的思想，所讲述的都不过是一个个人类自己的和平温馨的故事，不存在神的参与。他故事的信息多是道德感召以及主角自己的觉醒，否认基督教的恩典观和赦罪观。他的基本立场是：耶稣的人性远比他的神性重要，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完美的人性去体会他的神性，我们在不断经验上帝的爱时才能体会“救赎”的意义。

4、梅钦与新派的斗争

为了遏制范戴克对普林斯顿的影响，梅钦利用自己神学院主任牧师的职务极力抵挡自由派在学校的泛滥。在梅钦的斗争下，范戴克在 1923 年被迫宣布放弃自己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的牧师身份，并要转到其他教会。范戴克认为自己的日子太宝贵，不能浪费在聆听这种令人沮丧、充满愤怒和嘲弄的福音上。他称后者的教导是“苦涩、制造分裂和不合圣经的”。他说到做到，他利用户外布道的方式继续宣传他的思想。

普林斯顿虽暂时保住了改革宗神学的阵地，但好景不长，此时整个北美长老会已经普遍倾向于自由派，这种倾向甚至超过了基要派。美国长老会总会不断向普林斯顿施压，并在 1929 年投票决定重组普林斯顿神学院，并任命两位认信《奥本宣言》的人为新董事。因为学校董事会的这次改组，梅钦被迫辞职，于是范戴克再次回到自己的教授席位。普

林斯顿被新派占领。



图 5.35 范戴克在南加州户外崇拜中作祷告

1933 年，由于自由派已经完全控制了长老会的宣教委员会，梅钦几次上诉无门后，决定另行联合保守人士组建独立的国外宣教委员会。此事被大会宣布为违背长老会宪章，大会因此停止了梅钦、范泰尔等几位保守牧师的牧职。然而，长老会内部的保守派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给予梅钦等人应有的支持，这位神的仆人又一次背起了主那孤单的十字架。最终，1936 年，梅钦他们决定脱离已经越来越败坏的美国长老会，另行组建新的保守的长老会宗派，这就是“正统长老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简称 OPC）。并且梅钦与约翰·慕理（John Murray，又译作梅锐）、范泰尔（Cornelins Van til）等人共同创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但是，刚脱离出来不久，1936 年 12 月梅钦就得了胸膜炎，最终在 1937 年 1 月 1 日离世，享年 55 岁。梅钦的离世与他被长老会开除牧职有关，因为真正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人是那样热爱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一直为此悲愤，这也是因为教会变质时候必然要有一批殉道士为主摆上。他在死前，他口述了一封电报给他的好朋友和同事慕理，这封电报的内容反映了他一生的信仰：“我感谢耶稣的主动顺服。没有这，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梅钦离世后被葬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绿山墓地，他的墓碑上仅仅刻着他的名字、学位、出生和死亡日期，以及希腊文“ΠΙΣΟΣ ΑΧΡΙ ΘΑΝΑΤΟΥ”（至死忠心）。

启 2:10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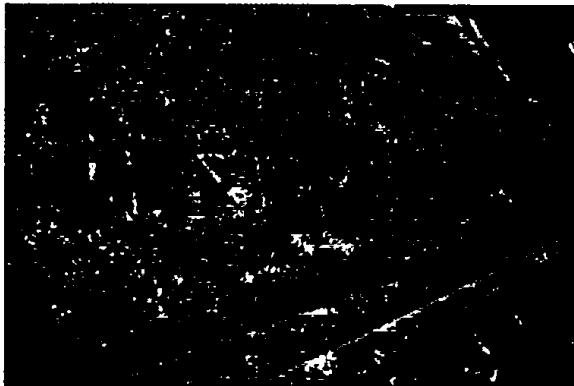


图 5.36 梅钦墓

5、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立

自由派最后在 1929 年占领了普林斯顿，梅钦、范泰尔、慕理等坚持改革宗的仆人被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开除，创建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为近代有名的改革宗神学院、正统信仰的新阵地，钟马田牧师曾在此学院任教，学院也栽培出许多华人教会的牧师。但事隔不到一百年的今天，这所改革宗的大本营就开始面临着被新派、新正统派攻破的危机。



图 5.37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6、范泰尔

1930 年，忠于圣经启示的梅钦博士被迫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接着又被美国长老会开除牧职，成为当时基督教界乃至舆论界、社会的一大新闻。范泰尔勇敢地站在真理一边，成为梅钦的坚定同工，和他一起创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1) 生平

范泰尔 (Dr. Cornelius Van Til, 1895—1987) 1895 年在荷兰出生。父亲是农夫。他的家虽然贫穷，但满有基督的爱。1905 年，他们一家人移民到美国中部，依然务农为生。19 岁那年，范泰尔蒙召传道，于是成为家里第一位受高等教育的子弟，两年后他进加尔文神学院攻读神学。范泰尔在 1927 年得到哲学博士后，就回乡下牧会。他只牧会一年，就被普林斯顿神学院聘为卫道学讲师，可是那年普林斯顿发生基本的改变，范泰尔于是又回乡下牧会去了。此时梅钦亲自来访，要求他加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行列。所以他们一家人（当时他的独生子刚生下来）一起搬去费城。几年后，他还成为正统长老会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会员。

(2) 思想

范泰尔的著作多是从哲学角度维护圣经，对一些主要的哲学如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这种风格影响了神学院后来的护教学风格，但也带来一些危机，容易使牧者沉迷于哲学的思辨。范泰尔在神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地遏制了当时流行的新派和新正统派侵蚀教会的步伐。范泰尔承认他有缺点，也不会认为可以因他在卫道学上的成就而夸口。他喜欢以幼年所学的《海德堡教理问答》来表达他的人生观：“无论是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是我的身体与灵魂都不属我自己，乃是属我信实的救主。祂的宝血已完全满足我的罪债，已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能。”

第八章 欧洲近代改革宗教会

第一节 其他国家的改革宗教会状况

1、苏格兰的长老会

威廉和玛利当政时，长老教会是苏格兰的国家教会。在继任的女王安妮的统治之下，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恢复了“平信徒委派权”（又称“牧职推举令”），也就是说，国王和领主有权委派他所拣选的人在苏格兰担任牧职。这几乎摧毁了苏格兰长老教会体制的根基。

1733年，艾贝尼撒·亚斯金（Ebenezer Erskine, 1680—1754）首先站起来反对“平信徒委派权”，说：“人只因有一块土地，就在基督的王国里使人与人之间有差别，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若要服从这个法律，就表示我们必须尊敬那些戴金戒指、穿着华丽衣服的人过于那些穿着卑微的衣服者。”亚斯金与其同伴脱离苏格兰长老教会，另成立长老教会，称“协和长老教会”（Associate Presbytery）。由于这些敬虔热心信徒的离开，国家教会的灵性随之低落。

1843年，托马斯·查玛斯（Thomas Chalmers, 1780—1847）与472名牧师脱离苏格兰教会，组成苏格兰自由教会（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这473名牧师的脱离是苏格兰长老教会历史中的大事件。他们抛弃不按圣经治理教会的国家教会，撇下丰厚的薪金，这样做只为持守教会治理的最基本原则：会员选立牧师、长老和执事。这是长老会主义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直到1874年时，这项“平信徒委派权”才最终被废。

1900年，苏格兰自由教会和协和长老教会合并，成立了苏格兰长老教会。但近代在自由派主义和世俗潮流的冲击下，苏格兰长老会也逐渐衰落。

2、瑞士的改革宗教会

现代主义不信派的思潮侵入各地改革宗教会，包括瑞士、法国、德国、荷兰和苏格兰等地。

19世纪前期，瑞士有三位伟大的布道家：马兰（Malan）、薇内（Vinet）和哥得（Godet）。薇内主要是向法语教会传讲福音，并写了名著《话语的权威》（1841年）。在他们的影响下，瑞士有一次大规模的复兴，加尔文信仰再度在讲台上被传讲。

但是，过了不久，马兰就被禁止讲道，于是他带领一批信徒脱离国家教会，另成立自由教会。然而，现代主义也逐渐垄断这个新教会，到今天，瑞士的自由教会只剩很少一部分信徒了。

3、匈牙利的改革宗教会

在加尔文时代，匈牙利改革宗教会在1567年采纳了《瑞士信条》。当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决定要镇压宗教改革时，匈牙利人在波士开的领导下，为争取信仰自由而举兵起义。他们的胜利，迫使鲁道夫签署《维也纳和约》，匈牙利终于获得宗教自由。因此，波士开的像被刻在日内瓦改教运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纪念，虽然今日匈牙利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而且近五十年都是在前苏联的共产主义统治之下，但匈牙利仍有大批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信徒。

第二节 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复兴

1、荷兰改革宗教会脱离国家教会

《多特法规》加上《海德堡教理问答》及《比利时信条》组成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准则。然而多特会议无法将亚米念主义完全自荷兰铲除，加上敬虔运动的影响，改革宗教会便陷在极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义被讥为过时的论调。

在几位牧师领导下，数千位中、下层热心的信徒回到信经与教会法规，使国家教会再次得到复兴。但他们遇到政府和教会的双重反对，荷兰教会便于1834年产生了一次大分裂，许多信徒不顾当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脱离国家教会，成立自由的基督徒改革宗教会，其经历和英国的不从国教者一样。1847到1848年，一些改革宗教会在他们的牧师舒特、范饶德率领下由荷兰到了美国，他们不久之后加入了美国改革宗教会。

2、凯波尔担任牧师之职

凯波尔 (C. Abraham Kuyper, 1837—1920, 又译: 凯柏尔) 于1837年10月29日生在荷兰海边城市马斯莱斯 (Maassluis) 的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凯波尔 (Rev. Jan Frederik Kuyper) 是那儿的牧师，照他祖父的名字，给他起名为亚伯拉罕。他在加尔文改革宗敬虔教育的熏陶下长大。



图 5.38 亚伯拉罕·凯波尔

1849年，约翰牧师应荷兰南部莱顿 (Leiden) 教会的邀请，于是举家迁往那里，担任那里的牧师。亚伯拉罕·凯波尔就入读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1862年，9月20日，凯波尔还不到25岁，就获得了莱顿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1863年7月1日，他和约安娜 (Johanna Hendrika Schaay) 结了婚。新婚夫妇都来自城市，却被派去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乡村卑斯得 (Beesd)，去牧养一个乡村小教会。凯波尔的父亲本是正统的改革宗信仰，但趋向宽容，成了一位温和的加尔文主义福音信仰的牧师。虽然凯波尔受过教育的莱顿大学是有名的自由派学府，但他自己从小受母亲影响，坚定持守改革宗信仰。

1870年，凯波尔被选为牧师。8月10日，他在阿姆斯特丹大教堂中，作第一次讲道，题目是《生根建造》：教会是有机体，也应该有一定组织结构。他证道的经文为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说明教会是有机体，是自然的合一与和谐，要向下扎根，才会生长；“有基”说明教会是建构，要在真理上立基础，并且按照神的规制、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信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徒不只是成为基督徒，而且是成为归正的基督徒，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3、荷兰教会与新派的斗争

在1867年时，教区议会大多数被自由派（新派）人士控制；在1871年时，胡根霍兹牧师（Rev. P. H. Hugenholtz）在复活节讲道时，他否认基督身体的复活。一位长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区会，请求依法革除这位牧师职务，区会依情转呈上级大会。大会却认为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教会法规并无明确的规定，所以不予处理。其实，教会法规主要是关于治理的内容，就教义内容阐述很少；但无论是哪个法规，都要有自己认信的信仰告白的名称，如果抛开告白，只能惩戒在治理方面的过失，这样，就等于任凭牧师们随便讲论，并不采取任何纪律行动，就失去了教会的根基。

1872年3月27日，17名忠于真理的长老联名发表宣言，声明他们自此以后将不参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会或圣礼，特别拒绝接受自由派牧师主持的圣餐。他们说，这样做不是造反，而是基于心里的宗教信仰“我们是为了信仰”。后来中国的王明道先生也曾引用这句话为题开始了对新派的斗争。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鼓动了一千余名男会友并245名女会友签名表示抗议，声势显然浩大，不亚于可拉的叛逆。4月17日，他们把文件送交区会，文中称那17位长老是“哗变”。

区议会随即于4月18日召开特别会议，检阅双方文件，确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答复，提交区会讨论；委员会则委任凯波尔为主稿人，凯波尔欣然接受。9月27日，区会特别会议接纳了委员会的文稿，会议通过后印发给全体会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信了解整个的事实经过，并让区会内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信仰立场。结果区会出版了一本长达141页的小册子，上面记录了双方全部来往文件及全部签名，并对自由派的抗议逐一分析答复。凯波尔笔下的文字客观、心平气和、道理分明，用字遣词完全温文有礼、无懈可击，但却是毫不留情地把自由派的抗议驳得体无完肤。对于这样的文笔和才华，自由派的人也佩服不已。虽然他们对于文件的内容忿恨不满，但只能悻悻于心，而哑口无言。

4、凯波尔通过论坛抵抗新派

在1870年，荷兰国教总会受到了新派神学更大的压力，竟然准许施洗者在洗礼时只需要说：“归于信、望、爱”，或说他们认为适当的语句，就可以施洗。这标志着教会的重大变质，因为“奉父、子、圣灵的名”是表明承认三一神的位格，也表明神的主权，但他们竟改为一个抽象的观念。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的主体被挪去了。这种改变刺激了正统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信徒甚为激忿，看出这分明是敌基督的手段。

凯波尔早就看到，对抗自由派神学不能只局限于讲坛上的教导，还要在社会文化领域。1871年3月14日，凯波尔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批判自由派神学，指出其虚假、空泛和贫穷。他指出，自由派神学不过是海市蜃楼、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之后，这讲座也推广到荷兰其它城市。

凯波尔总结了自由派的错误信仰，仿照《使徒信经》的字句，替他们制订了一个不信派的“信仰告白”，这样说：“我，现代主义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稣不是基督，不过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就可进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对的；罪得赦免不过是人发明出来的。我相信所有人类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类都能得救，而没有末后的审判。”

这个“信仰告白”，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自由派神学的不信嘴脸，直指他们骨子里就是败坏的异端邪教，使他们无所遁形，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谨防危险。当然，此时自由派对凯波尔已是恨之入骨了。

5、另组改革宗教会

不过最令人痛心的是，大部分正统信仰的信徒宁愿保持寂静的敬虔，在家做循规蹈矩的基督徒，过平安喜乐的生活，也不愿牵入信仰的战斗。他们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却是活而不动、不冷不热，甚至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教会牧者和学者。他们不仅置身事外，而且对加尔文主义信仰心存畏惧，甚至有时还加以批评攻击。这对教会改革的阻碍和伤害是难以想象的。由于这些保守基督徒的冷漠，自由派必然又占上风。1886年，凯波尔和75名教会领袖，被荷兰国教会开除。他们申诉辩解，却得不到结果，奋斗多年的改革不仅走了许多个第二里路，更走到了尽头。他们开始迈出艰难而早就该迈出的一步——约有十万信徒、200个教会正式脱离国教会，另组成荷兰改革宗大会。

6、创立自由大学

荷兰在近代历史上一直受到法国辖制，直至19世纪初，荷兰才完全摆脱法国。虽然如此，荷兰在思想上却仍深受当时流行于法国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只在名义上仍是基督教国家。本来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由教会管理、由教会教育培养人才、为教会服务的。但现在的情形是，教会和学校都由政府经营、由政府把持、当然也为政府服务。也就是说，自由派和反教会的人控制了教会和学校。

1870年的荷兰，全国约有四百万人口，有三所大学：莱顿大学、哥宁根大学、悟垂克大学。当时，只有这三所大学是政府所承认的，它们也各有其神学院。所授的专业学位包括法学学位，医学学位、工程学位和神学学位，并且获得政府许可。无疑的，在这几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获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光明。问题是他们的信仰。许多青年人，包括牧师的儿子，一进入大学之门，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义只是享受物质财富，他们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追求学术知识，他们是达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并不限于今世，还有永生。可是，教会在信仰上的堕落开始了，社会就会更快、更深地滑落下去，有谁还关心永生的事。

高等教育的沦陷不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机，使他们迷失，更失去了供应教牧人员的训练基地，使教会没有从神来的信息，使神的言语稀少，造成教会荒凉，影响将来的世代。关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预见这令人担忧的后果，认识到这是根本的问题，尽量想办法，努力求主施恩。

(1) 将人的心意夺回

教育是信仰的开端，是教会的根本。因此，教会不仅要防止信徒后代被引诱进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仅要使被掳的回归，还要进而装备圣徒，使他们能作基督的精兵。

林后 10: 5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归服基督。

独立以后，荷兰采用君主立宪制政体。早在1848年的宪法就明文规定高等教育自由。不过，当时的教会人士没有觉悟到创建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义者真假借科学的美名渗透各学府，神学的自由主义也趁着理性主义的风势，披上科学的外衣，联合起来反抗神的权威。在教会里面，敬虔运动的余波仍在，敬虔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教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恩经验是最要紧的，得救后的工作则在于保持与神的关系，并活出敬虔的道德生活。他们以为神学教义可以忽略，更进而反理性、反知识，几乎到以无知为美德的地步。离开真理教义的敬虔是撒但的假敬虔，这样的敬虔在基督教里泛滥成灾，不信的人便趁机顺利地占领了教育的领域。宪法虽然规定高等教育自由，但没有规定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到信徒觉悟有此需要时，所遭遇的则是立法与实施的双重难题。

1878年12月5日，荷兰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会(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在悟垂克成立，并在次年2月获得皇家认可立案。1879年6月4日，他们选出4名董事和4名信托人，正式筹办建立大学。经过努力，这些真敬虔者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荷兰再一次有了自己的改革宗大学。

他们将学校命名为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国教教会辖制的私立大学。他们旨在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不与自由主义(不信派)妥协，造就尊基督为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各个生活领域，使主的名得荣耀。

正当筹划的时候，试探来了。一位国教会牧师传出消息，筹划人凯波尔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教授。但他们二人觉得，如果去为自由派的大学效劳，就是叛离改革宗信仰原则，所以他们断然拒绝了这项邀请，放弃了荣誉、厚俸和安定的职位，宁愿选择艰难而不确定的窄路。

在《先锋报》(De Heraut)上，凯波尔和他的同工们刚一发布筹办大学的消息，质疑和批评甚至反对的信件就蜂拥而来。有的问：“在我们这小国家，现有的大学难道不够？何必再办一所大学？”有的怀疑：“如此大学若没有雄厚的财源，怎能够持久？”有的诋毁说：“办一所狭隘的加尔文主义的大学，乃是破坏国家团结，亦同叛国。”自由派神学人士则更是深痛恶绝、咬牙切齿，极不愿见到一所信仰纯正的高等学府即将成立。这就如同灯光照入黑暗，见证了黑暗的不是，黑暗则拼命抵挡光明。也有人对新大学的学术水准表示怀疑，不肯参与。还有人讥讽说凯波尔是愚蠢的疯子，癫狂到极点。

(2) 取回兵器

像基甸选择他的精兵一样，凯波尔不怕人少。1880年9月10日，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阐明原则性问题，里面宣告了三个原则：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二、严格采取科学治学；三、严格认真办事。

坦白地说，办一所大学需要的是财源、教员、学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实际的筹备重任多半落在凯波尔和洛哲斯二人身上。这实在是信心的考验。他们家财都不丰裕，但必须率先投入这艰巨的事工。从1879年11月9日董事会通过他们二人为自由大学神学院教授，到正式开学期间，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各样的团体作推动的工作，校址最后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10月20日，自由大学正式开学了。10月19日，开学日前夕，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罗宗教堂举行祈祷奉献典礼，这表明在主的事工上唯有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奉献什么呢？先要奉献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们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献辞，经文来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九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一个是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以色列人制造刀枪。’”

这真是一个适切的题目。正如当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识，使以色列人没有用以反抗的装备，因而屈服在他们的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聪明厉害，他们今天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夺取教会和圣徒的装备，使他们不能传播福音、拓展主的国度。最后，凯波尔向所有基督徒呼吁：“现在，教会觉醒的时候到了，圣徒们要起来从仇敌手中取回军器供应，取回教育的主权。”

7、自由大学诞生

1880年10月20日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凯波尔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们的理想实现了：自由大学诞生了。

那天下午群贤聚集，表明是改革宗圣徒同心合意的行动，体现了他们对于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实在说来，这伟大的结集就是一项教育，就是一个宣言。

自由大学的财源哪里来？苏特悟(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个简单愉快的致辞，呈献了十万盾荷币，作为政府规定的开办费。对于一项有价值的事工，必须有人认知这事的工的价值，认为值得尽量予以道义上和资源的支持。以后的经费要凭信心仰望神感动属祂的有识之士的供应。这仿佛是一项互信之约。

自由大学的教授哪里来？董事会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目前聘任五位教授：凯波尔、洛哲斯、浩德莫克为神学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为法学教授；狄卢(Dr. F.W.J. Diloo)为文学教授。然后，风琴奏出信心昂扬的“以利亚”曲调，由大学创办人凯波尔博士致鼓舞人心的开幕辞《神在人生活范畴中的主权》，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点，扬起了自由大学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学的学生哪里来？在开学那天，共有五名学生。他们都是为了维护真理，忠于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在乎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来到这里的。

他们没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学生就借阿姆斯特丹苏格蘭宣教会的礼拜堂上课，但他们极为严肃认真，明白他们是为了事奉主而做的。第二天早晨，教授们发现在教堂的门上有粉笔写的正楷大字：一入此门全绝希望。这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狱门上铭刻的字，不知是谁恶作剧地写在那里，作为对他们的嘲讽。他们擦去了，第二天又被人写上了。但对于出入此门的师生来说，那毋宁是一个激励，一项歌颂：他们敢于为主而冒险，弃绝一切属世的希望，只求主的荣耀，只为主的真理。这是何等的见证！

1884年，董事会买下了一幢雄伟的四层楼建筑，自由大学总算有了自己的校舍。在1890年，建校已经十年，自由大学仍在艰苦挣扎中，经济上仍然困窘，没有足够的发展基金，学术上也没有达到光荣的成就，更没有全国性的声誉。虽然艰苦，学校仍然前进。师生们与董事会合作，坚持信心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不畏反对和拦阻。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有时，他们和国家教会商量，借教堂作大规模的聚会，但也遭到拒绝。

在暴风雨中，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长、壮大。几年后学生数目达到约90名，而那时三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人数总共有1800名。到1920年，凯波尔离世的时候，自由大学有学生2000名以上，教员200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和国立大学相提并论。1980年是自由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学已经列名世界著名大学之林，有教员600余人，全日制学生12000名以上，图书馆藏书六十余万册。凯波尔凭信心种下的芥菜种子发展成了大树，祝福着荷兰的教会。



图 5.39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校园

8、凯波尔走向政坛

1873年11月，凯波尔在悟垂克发表一篇重要演说，题目是《加尔文主义：我们基本宪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证》。1874年5月20日，这篇引起荷兰反思的讲道印成单行本小册发行，一个月后即行再版，可见其受到欢迎的程度。讲道大意说：瑞士、荷兰、英国都是在加尔文思想中孕育和发展塑造的，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美国也是由清教徒创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动力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信仰，英国清教徒为信仰的独立而斗争信念是法国胡格诺复原教派的传承与延续。这些伟大运动的基本思想都是源于崇高的加尔文主义，它是自由成长发展的动力。由于博览群书，凯波尔繁征博引，说明这个历史观点。

1886年，凯波尔连续发表了三个小册子，用的是同一个标题：《争战临到了》。在这些小册子里，他宣称荷兰归正教会被掳七十年——1816至1886年。什么是“被掳”？凯波尔指的是荷兰国王威廉在1816年下诏宣称他自己是教会的立法者，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这期间也是自由主义信仰渗透教会的时候，所以教会就被掳了。就如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时，他认为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满了（参但9:2），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满了，神的子民应该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现在也正是这时候。

早在1869年，全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在悟垂克开会，会期为5月19至20日。5月18日晚，凯波尔应邀发表预备会演讲，题目是《向国家良心的呼吁》。他说：“在同心合意的人中间，我们的运动进展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唤起国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葛瑞恩。这几句开始的话进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灵的共鸣。那位老人已经69岁了，他几乎是孤军奋斗，作旷野的呼声，三十多年来的侍奉就是希望国人的良知觉醒，今天总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凯波尔动人的演说中，他说到国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并学校教育的自由。凯波尔在台上所讲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润着那位老战士枯萎的心。多少年来，他所要作的就是唤醒国人的良心，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天，他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认定凯波尔是能够振奋国人的领袖。和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见到婴孩耶稣相似，葛瑞恩感谢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丰富，毕业于莱顿大学，是有名的基督教历史学者、政治领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尔文信仰。此后，他的政治理念，就完全建立在加尔文信仰上面。他研究法国流血暴乱的革命历史，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没有神，没有主人”那种所谓平等自由的革命实质是造反，是在背叛神，背叛创造并管理宇宙万有的至高主宰及其设立的秩序。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偏行己路，随从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话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对神的主权。因此，他认为当前的任务是“高举福音，反对革命”。只有高举神的话，扬起真理的旗帜，遵守主的道，才是国家拨乱反正的道路，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方法。这种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荷兰完全是崭新的。

葛瑞恩主张，回到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归正或改革宗的信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组织了一个政党，名叫“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现在如果望文生义，这个名字听来有些迂腐可笑，甚至被认为有不好的涵义，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这却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对法国式革命的暴乱。反革命党不仅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且是保守的基督教政党。“革命”（Revolution）这个字本来是说明天体运行的现象，中文译为“革命”，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先人本对此词寓以褒意。这样，反革命就变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19世纪的欧洲，对于法国18世纪无法无天的恐怖暴动，人们记忆犹新，仍心有余悸。不过，研究法国革命的背景，我们发现那时的皇室和教会也确实是腐败黑暗，统治者专制而奢侈，不顾人民死活，这些都成为促成暴力革命的条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夺权，结果酿成大规模屠杀。但这条血路是错误的，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条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稣基督所开的，不仅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与人和好。这是唯一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正路。

1871年，凯波尔开始努力在全国性的大会提名，争取本党议会席位，但由于本党在国内影响甚微，所以均以失败告终。1872年，《旌旗日报》出版了，反革命政党有了自己的喉舌，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快大幅度提高。1873年，又是选举年，凯波尔任全国初选大会的主席。凯波尔在荷兰南部高达（Gouda）地区的初选获胜，但在总选中再度落败。这次又是自由派最终获胜。不过，在这次选举中，反革命政党共得了一万二千票，比前年跃增了27.5%，令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达地区中期选举中，凯波尔当选了国会下院的议员。但他此时必须面临艰难的抉择，因为宪法第九十一条明文规定国会议员不得任教牧。凯波尔必须在议员和牧师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在写给葛瑞恩的信中，凯波尔说，他在经历灵魂的忍耐等候，他必须得到主特别的指示，才能作出决定：“我绝不愿违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离神的道路。”

在讲坛上宣扬、教导真道，并从内部改革教会，这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基督岂不曾吩咐祂的门徒作世上的盐吗？凯波尔自己迫切祷告，也请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会众在聚会中为他祷告。最后他决定向大会申请光荣退休。大会批准了，凯波尔于是在1874年进入了国会。一个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则、讲道德的人能够与狡猾的政客们周旋吗？凯波尔自然不会不知道“羊进入狼群”的危险。在教会，他是与进入羊群的豺狼争战，护卫主宝血买来的羊群；在国会，他却是羊入狼群，需要有更大的勇气，用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凯波尔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动人的雄辩之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习神的话，懂得基督徒的法则。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问题，他都从基督徒伦理和圣经出发，选择自己的立场，寻求解决的方法。

凯波尔绝不是奴颜婢膝巴结资本家的人。他建议特别立法保持社会正义，他认为满有怜悯的主耶稣绝不会对被压榨的人群视而不见。在下议院中，他打开袖珍圣经，朗诵雅各书第五章：“**噫！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他接着说：“如果这是我说的话，在你们耳中听来可能会是过激、是革命，你们可能会予以拒绝，但这是主的使徒写的。你们能口里承认基督，却对劳工的哀诉置之不顾，不同他们站在一边吗？”

凯波尔也反对当时欧洲使用童工的做法：“7岁的孩子们每周要工作6天、85小时，甚至87小时。这种不人道的恶行是那么严重！我知道，有五六岁的孩子从睡中被摇醒过来，头上被浇冷水，然后被送到工厂去工作！”

他这样直言，不管别人诬指他助长工人阶级革命。但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本乎圣经真理和良知发言。凯波尔不管自己的言论多么不合时宜，是否与政治路线“合拍”。

他反对鸦片贸易。他强调荷兰对于印尼等殖民地有道义的责任，应该使他们归信基督，并扶持他们走上独立。他说：“如果有人以为我不够爱国，那是因为我更爱神的国，更爱真理。”他确实走在时代的前面。在凯波尔的国家政策对国会的影响下，1890年，卢森堡摆脱荷兰国王的统治，卢森堡大公爵独立。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自由教育，教育不该属国家和国教会控制，而应由家长督导。凯波尔认为：政府可以立法设立标准规范学校的管理，检定教员合格证书，可以督导教学。但政府也有责任对学校予以经济上的支持，使贫苦儿童也能就学，而且应由他们的家长作良心上的自由选择，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学校。

凯波尔这颗政坛的新星，在国会闪耀的光芒，引起国人的注意，人们对他寄予希望。凯波尔是反革命政党的领袖、自由大学的创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先锋报》总编辑的工作上，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让人民知道国会的运作，使政府的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因为基督徒本来就是光明之子。

9、凯波尔担任荷兰首相

1901年，新世纪开始了。那年的选举，右翼联合阵线获得胜利：右翼联合阵线58席，左翼共得42席。1901年8月1日，凯波尔众望所归，成为首相。这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次创举，上帝使用一个真教会——改革宗教会的仆人成为世俗政府的领袖，使上帝之城在山上发光，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

1902年，英国同凯波尔达成和平协议，停息了战争。这是凯波尔正义和平外交的成果。作了首相以后，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为殖民地大臣；任命休兹（General Van Heutz）为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辅助之下，奠定了殖民地自治及独立的基础。1903年1月9日，荷兰的航运工人借口不满公司待遇，进行罢工。2月24日，国会复会。凯波尔提出了法案：设立铁路警察；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关心工人福利，政府设立调查仲裁的机构；对破坏性的非法罢工行动则将予惩戒。

4月8日，鼓动罢工的反抗组织号召全国性罢工。但凯波尔不为所动。4月9日，国会下院以86对6票通过凯波尔的提案。两天后，上院以口头表决通过。同日，女王签署法案，法案成为法律。反对的人极力反对，他们咒骂、讽刺凯波尔，丑化他的形象，但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在凯波尔的果断措施下，全国秩序恢复了，从而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荷兰重演。

为了个人利益，凯波尔本党的投机分子起来制造分裂。结果，在1905年的选举中，反革命党的右翼联盟失去五席，从而成为国会的少数政党。8月15日，凯波尔的内阁辞职。凯波尔于1908年重被选任下院议员一直到1912年，在1913年又被选任为上院议员。

凯波尔从政坛退休，自由大学请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凯波尔宁愿作海牙的居民，谢绝了自由大学的邀请，系统神学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继任。凯波尔则向大学请延长假一年。1898年8月，凯波尔访问美国，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0月间，凯波尔在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一系列的加尔文主义讲座：(1)加尔文主义生活系统；(2)加尔文主义与宗教；(3)加尔文主义与政治；(4)加尔文主义与科学；(5)加尔文主义与艺术；(6)加尔文主义与将来。这些历史性的讲座成为经典性的论述。他也在宾州费城的长老宗历史学会讲《象征与启示的对比》，在芝加哥的麦考米克神学院作了三次讲座，并讲《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原则》。凯波尔在美国旅行了三个多月，于12月回国。1907年，满70岁的凯波尔正式离开自由大学。但他继续写作，绝不肯放下他的笔，直到1920年11月8日在主里安息。

太 28: 18-20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段经文不仅是教导我们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还包括把上帝的律法向这世界去宣告，我们当遵守主的教训，使神的国度在黑暗的世界得以扩展。凯波尔在这使命上是上帝放在教会前面的一朵光明的云彩。

10、神学家巴文克

(1) 生平

巴文克(Herman Bavinck)出生在1854年12月13日，父亲约翰·巴文克(Jan Bavinck)是教会中的一位牧师。1880年，巴文克从莱顿神学院毕业，论文题目为《慈运理的伦理观》。毕业后，他在富兰克教会任牧师；一年后，他成为肯本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

巴文克是一位系统神学家。1895至1901年，他出版了《改革宗教义神学》(Reformed Dogmatics)，是四大卷本的系统神学教科书。《我们合理的信仰》(该书的荷兰语名称则为《神奇妙的作为》)也在1909年出版，这本书较其他系统神学书籍更通俗易懂，而且完全以圣经经文作基础，清晰地陈明有关圣经教训的基本要道。

巴文克在著作中常常鼓励信徒要扩展视野，不只是在教会内部，而且整个世界都是基督徒扩展神国度的战场。针对重洗派和敬虔运动所提倡的脱离现世独自追求个人灵命的错谬思想，巴文克指出：“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天国却的确要求每件事都为它效命。天国是独一的，不容许有任何独立的或中间性的国度与它平行存在。我们所从事的战役就是抵抗罪，因此无论我们信徒处在如何复杂的关系，也无论社会、政治——特别是科学上的问题如何严肃困难、无法克服，但如果我们假藉基督徒的分别为口号，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或认为此世代是属魔鬼的文化，而想从此争战中退缩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忠与懦弱了。”巴文克对教会光照世界之使命的立场和凯波尔等所有改革宗神学家是相同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

太 5:13-16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盐失了味是盐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盐就成为假盐。敬虔派、新派使教会成为假盐，使教会被这个世界丢弃、践踏，但真教会如果都就此隐藏在斗底下、偏安一隅，那么真教会也会照样变质，成为死海。教会对这个社会的使命当然不是为了改良社会、改善生活，乃是使人看见教会发出的真理的光芒，从而使神的名得荣耀。

(2) 《我们合理的信仰》开篇

在《我们合理的信仰》一开篇，巴文克就以大气恢宏之语写出了人生的真谛：“人之至善就是神。”作者从人被造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虚空无望的根源，因为神造人是将永生安置在人心，永生就是认识神，所以无论是世上的物质财富，还是科学、哲学，都远远不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相反由于人的堕落，这一切会使人更加不安。今天的电子通讯等科技产品如此发达，人们越是沉迷其中，就越是烦躁不安。离开了上帝，就绝没有真正的安息。

认识上帝的途径只有透过上帝自己的启示：“我们不能说这认识神的知识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人自己的发明、调查或反应的结果。如果不是神白白赐给我们这种知识，我们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认识神的知识。”神向我们启示祂自己是祂“自觉自愿”的，是出于祂的乐意，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强迫影响祂这么做。

作者谈到我们认识上帝的根源，提出了改教家们都没有思想过的理由：“我们人类对上帝的认识基于、渊源于上帝对自己的认识”，“上帝的启示是自我启示”。这一观点彻底划清了改革宗信仰与外邦宗教、无神论、人本信仰等在认识论上的界限。一切知识的本源和终极目的都是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实施于人的。那今天的科学、哲学以及人本信仰否认和扭曲上帝，这些知识看似没有让人荣耀神，但是上帝那深不可测的知识和公义正是藉着人的悖逆抵挡从天上显明在这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罗 1:18）。这显明正是前面谈到的：科学不能带来满足，哲学不能解人饥渴，假宗教不能带来安慰。相反这一切更会令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和将来的审判。“人类因着堕落，反倒在这些本应该认识上帝的知识前迷失。”（加尔文）。

11、荷兰教会近代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荷兰有三大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天主教人民党（KVP）、新教的反革命党（ARP）和新教的基督教历史联盟（CHU）。教会由于妥协而趋向三党联盟。1973年，在政府的压力下，联盟正式成立，组成联盟政府。

联合后，荷兰教会无法继续持守传统的改革宗信仰，于是新派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教会进入世俗化。而且此时天主教信仰在荷兰也得以死灰复燃，他们反倒因坚守着传统的天主教信仰而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第三节 英国司布真浸信会的复兴

1、司布真生平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年6月19日出生在英国爱赛斯州的凯维敦镇（Kelveden Essex）。他的祖先是荷兰的改革宗难民。在1568年，当时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差遣阿尔发公爵赴荷兰镇压更正教，结果有18000人被杀。许多人逃往英国躲避宗教的逼迫，其中就有司布真的族系。

司布真的祖先约伯（Job Spurgeon）因为参加独立派的聚会而被禁于邱司福监牢。司布真曾见证说：“我宁愿作一个为真道受逼迫之人的子孙，也不愿在我的血脉里含有君王的血。”司布真深受清教神学影响，他有清教徒的藏书上万册。他3岁时就开始阅读《天路历程》的插图版，6岁时就可以熟练地阅读圣经。

1850年8月，司布真进入剑桥李丁先生的学校任助教。在剑桥，司布真加入了圣安德烈街浸信会。司布真第一次讲道就在这儿。

1851年10月底，司布真被派往离剑桥五英里的水滩村的浸信会教会。那天他讲道的题目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虽然那天只有18人出席，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司布真，请他继续到那教堂讲道。他在那里连续讲了几个月，最后该教堂正式聘请司布真在那里讲道。司布真放弃学业，专心事奉主，他在那里有两年半之久，会众由原来的40位左右迅速增加到400多位。

司布真讲道教义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加尔文主义所宣讲的古老的真理，奥古斯丁宣讲过，保罗也宣讲过，也是我们今天必须宣讲的，否则愧对我的良心和我的上帝。我也不能修改这样的真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去掉棱角，约翰诺克斯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那曾经震动苏格兰的，必定会再次震动整个英格兰。”

他在伦敦讲道38年，常是人山人海，听道者中，有维多利亚女王、格兰斯顿首相。司布真在结婚那年创立“牧师学院”（现在改称为“司布真学院”），又创立孤儿院和数间宗教慈善机构。

司布真的服侍范围很广，他不仅建立了牧师学院培养年轻的传道人，也组建了流动售书者协会，以到全英国各地推广圣经、他的讲道稿以及其他属灵书籍。50岁时，司布真本人亲自建立的福音性组织就已经达到了66个。他还身体力行地关注慈善事业，建立了一所为老年妇女开办的救济院和一所为有需要的孩童开办的孤儿院。今天，许多英国人还在享受着神借着司布真带给社会的进步。

2、浸信会中亚米念派获胜

司布真大有能力地传讲加尔文主义的真理，批判亚米念主义，讲道震撼人心，但却发生了使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人们一面蜂拥听司布真的讲道，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却纷纷倒向亚米念派的普通浸信会，使坚持加尔文主义的特别浸信会数量越来越少。这是人心里悖逆的明证，越被真理感动越选择相反的路。

最后特别浸信会联合会不得不考虑和亚米念派的普通浸信会联合。到1891年，就是司布真去世的前一年，大部分特别浸信会都同先前的亚米念派普通浸信会联合起来。持

守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的特别浸信会几乎不复存在了。虽然司布真为坚持真理，坚决反对这一联合，但已经于事无补。司布真被迫在 1887 年退出浸信会联合会及牧师学院。司布真感慨地说：“上帝知道我所走的道路，我把这件事交托上帝来裁决，我已经为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友谊和名声，损失了金钱，遭到了恶意的指责，我已经尽了全力，从今以后，我与他们分道扬镳。”

我们最后再看一段司布真在离世前的一次讲道：

难道因为那良善的古老事业看起来只有一天的时间不那么兴旺，在我短暂的生命中，国人没有归向基督，我就要坐下来哭泣吗？不，我只是即将成就那神圣旨意的无数人中的一份子——一只小小的珊瑚虫——正在贡献我的一份力量，协助堆起那巨大的珊瑚礁石，有朝一日这礁石上将长出香柏树、棕榈树和绚烂娇媚的花朵。我仍将尽我的一份力，做我那份工作，虽然是在海浪下面，我仍将做我那份工作，然后死去，其他人将同样这样做。但礁石正在上升，神的旨意正在被成就。用摩西的祈祷中的话说，正是“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1892 年 1 月 31 日，司布真悲愤离世，享年 57 岁。

3、神学家宾克

亚瑟·沃金顿·宾克（Arthur Walkington Pink）1886 年 4 月 1 日生于英国，是近代改革宗神学家，以他坚定的加尔文主义信仰和清教徒式的教导著称。

1910 年，他报读了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但他在慕迪神学院只呆了两个月，然后就接受邀请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矿业城镇的一家教会当牧师。在这里他也没有久留，他在美国继续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开始阅读一些好书，包括约翰·加尔文和约拿单·爱德华兹的著作。在阅读这些书籍时，他开始深信他们所教导的教义是来自神的话语。

1936 年，他又回到英格兰，在英格兰的南部海岸定居下来。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地区变得很危险时，他就搬到了苏格兰北赫布理斯群岛的路易斯岛，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1922 年，宾克开始发行一份月刊，称为《圣经学习》。杂志艰难地维持了 40 年，这份出版物的订阅量很少有超过 1000 份的时候。然而宾克感到神在祝福他著作的事工。他将自己的连载文章整理为后来著名的《神的主权》。

1918 年，宾克带着一本《神的主权》，找到在宾夕法尼亚的小出版商希伦丁（I.C.Herendeen），叫希伦丁为他出版。希伦丁此时是一位亚米念主义者，他写信问宾克所说的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宾克在一封回信中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并且划线强调：“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主使用这句话来打开了希伦丁的悟性，他开始更进一步地学习恩典教义。希伦丁也同意出版宾克的书，2000 册印出来了，结果 95%（换句话说，也就是将近 1900 本）都没有卖出去。这样一本如此不景气的书竟然使这个小出版社破产，因为这时候恩典教义是很不受人欢迎的。希伦丁只好找了一份推销鞋的工作。



图 5.40 亚瑟·沃金顿·宾克

1952年7月15日，宾克在外赫布理群岛的斯多诺威去世。

宾克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事奉的果效。但是在天国聚集着一大群曾经因他辛勤的工作而受益匪浅的人。这位曾经辛劳工作的人虽然死了，仍旧藉着他的著作说话。宾克著作的受益者中，有一位曾是他期刊的订购者，此人就是英格兰的钟马田。

4、钟马田

钟马田 1899年12月20日生于英国南威尔士。他在小学读书时已表现得相当优异，后考入皇家医师协会为会员，担任皇室的御医。1927年，他毅然决然辞去了高薪的医职，投入全时间的传道工作，在长老会担任牧师达十年之久。1939年，他正式接受伦敦威斯敏斯特教会的邀请，担任坎伯·摩根的副牧。他一共在该教会牧养了30年之久。他每主日早晚讲道一次，同时担任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钟马田的许多讲章后来被整理成书，译成多国文字，有《登山宝训》、《罗马书注释》、《以弗所书注释》、《人的处境与神的能力》、《只夸基督十架》、《救恩的确据》、《灵性低潮》和《清教徒的脚踪》。

钟马田虽然是一位坚定的改革宗牧师，但由于他从小深受循道宗的影响，有些讲道略微带有神秘主义倾向。

5、英国教会境况

1828—1832年是近代英国历史上继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分水岭。英国在1828年废除了《市政法》和《宗教考查法》，在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从此各宗教信仰一律平等。

自从圣公会失去了英国国教地位后，英国国内的信仰一直处于衰落状况，启蒙思想、自由神学思想一直冲击着英国国内各派教会。到了20世纪初，大批宣信的基督徒从加尔文主义转向亚米念主义，又从亚米念主义转向对圣经的全部默示性的怀疑。有学问之人大肆宣传不信派的思想，使英国的教会处于乌烟瘴气之中，连有关基督完全的神性和祂为选民的罪而死这些教义都面临着危险了。他们起初说加尔文主义太严厉，然后说福音的教义太陈旧，此时甚至圣经本身都必须服从于人的善变和喜好了。就如一位牧师所言：“过去我们一度辩论是限定救赎还是普遍救赎，而现在人们质疑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是救赎。”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1869年，英国议会废除爱尔兰国教会，标志着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信仰告白时代的结束。1886年，无神论者布雷德洛的下院议员资格正式得到承认。1891年消除宗教限制法，最终取消了一切宗教考查，任何人不论什么信仰均有担任议会议员的资格。19世纪末期，英国的光景正如爱德华·诺曼所说：“英国已经不是一个政教联合的认信国家，而成为一个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国家已经超脱于宗教事务之外，转变成为一个更高的、中立的仲裁者。”

没有了教会的光照，英国政府在二战后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从反对巴勒斯坦自治到反对各殖民地独立，再到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徘徊，这一系列事件都显出英国的观念衰老缓慢，早已失去一个超级大国的风采。

但神借清教徒四百年的流血斗争在人心建立的信仰底线要被彻底拆毁还是需有一大段时间。1995年，英国天主教教阶制已经恢复了大约一个半世纪，英国女王才第一次参加天主教活动，当时仅仅是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00周年纪念庆典所举行的一次晚祷。但这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从外表上看，有形的真教会似乎已经消失。虽然今天的英国教会仍有一定的人数，所不同的只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虔诚，而是在更加世俗化的概念和观念中走人生之路，同时把上帝放在一个神圣而又更加虚无缥缈的地位上，信仰变成了精神寄托，甚至只是娱乐生活中的一种。近代福音派的兴起也迎合这种观念，那种在圣诞节来到教堂唱唱跳跳的所谓的基督徒在英国也不乏人数。那曾经躲在山洞里的先知的呼声似乎被彻底淹没，但神在天上永远耻笑那些抵挡基督的人，受膏者的旨意永不改变。



图 5.41 英国的“基督徒”在欢庆圣诞节

第四节 教会在宣教及社会的见证

1、改革宗教会的宣教工作

前面讲过，宗教改革后开始兴起宣教工作的是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教会，但那时的宣教对象主要是针对被天主教统治黑暗千年的欧洲国家，而到了今天，随着宗教改革在欧洲国家的停止，教会的宣教开始向亚洲、非洲等国家展开。这样的宣教首先也都是从改革宗教会开始：第一个向印第安人宣教的是大卫·布雷纳德（David Brainerd）；第一个创建的清教徒公理会宣教组织是伦敦宣道会；第一个向中国人宣教（指新教）的是马礼逊；第一个成立海外宣教机构的是威廉·克理；第一个成立的欧洲差会是1815年建立

的巴塞尔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巴塞尔会即日后的崇真会，是由一班从瑞士巴塞尔信义宗转向改革宗长老会信仰的信徒组成。他们哪一个不是改革宗信仰，哪一个宣教机构不是由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改革宗信徒所建？他们的脚踪绝不会被现代福音派污蔑“改革宗不传福音”的声音所掩埋，神纪念他们。我们接下来会简单介绍几位宣教士。

但到了后来，随着教会在信仰教义上的堕落，宣讲纯正真理的宣教士已经很少，他们多数都是亚米念、时代论的思想，这样的福音至今也没有使那些被宣教的国家像清教徒所在的国家那样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2、威廉·克理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被称为“现代宣教工作之父”。他在1761年8月17日生于英国的诺定顿（Northampton）。他年少时在圣公会接受水礼和坚信礼，但后来却加入了不从国教派的行列，并在1783年重浸，成为加尔文派浸信会的信徒。

1792年，克理组织了第一个浸信宣道会。第二年，他带着全家前往印度宣教，后来他把全本圣经译成26种印度语言。

3、马礼逊及巴塞尔的改革宗教会在华传教

由公理会信徒组成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并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此外，苏格兰传道会亦于1796年成立。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782年1月5日生在布勒格林（Buller's Green），英国北边近苏格兰的一个村镇。他的父母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所以他在清教徒信仰熏陶下长大。他早年作过鞋匠学徒，后进入奥克斯屯学院（Hoxton College）学习神学、天文、医学，并初步学习中文。



图 5.42 马礼逊

1807年，伦敦宣道会按立马礼逊为牧师，差他往中国宣道。那时候的中国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禁外人居住，传福音更不必说。到这样一个遥远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最理想该是至少二人结伴同往，但没有别人肯去，马礼逊只得孤身登船。马礼逊另一个困难是他找不到航海的船肯带他去中国。他只得先横渡大西洋，绕南美洲到美国，然后转往中国。航程既长，行船又苦。那年1月8日离岸启航，9月7日才抵达广州，历时八个月。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到了广州，他却因未获准居住而不能进行传教。最终他凭借通晓中国语文，在1809年接受了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份，才得以合法居留。不过那时的中国政府不准华人教授洋人华文，违者处死，更严禁洋人向华人传福音，英国当局也拦阻他传道。当时，受聘教授他华文的老师常身怀毒药，预备被察觉时即服毒自尽，免得身受酷刑。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礼逊不能不靠自己认真苦学。同时，他开始把圣经翻译为中文。1811年，他首先译成出版了《使徒行传》。1812年，清政府再颁禁令：“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因此，马礼逊的译经与刊印工作冒着极大的危险，必须秘密进行。虽然在困难之中，但1813年，中文新约圣经出版。在1807年，马礼逊同玛丽（Mary Morton）结婚，但新婚夫人没能得到居住广州的准许，只得居住澳门，夫妇只好分居异地，马礼逊需要往返奔波，甚少家庭之乐。他们第一个儿子夭折，竟然没有葬身之地——当地华人不准他埋葬，英国在澳门也没有墓地。后来经过了许多交涉，这个小小的躯体才得以安葬在澳门北一个小山上。1815年，马礼逊夫人因为一家水土不服，不得已带着年幼的女儿返回英国，留下了马礼逊孤身一人继续艰苦奋斗。马礼逊在1818年创建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由米怜（William Milne）担任校长，书院宗旨是“教导华人青年英文，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并教导宣教士学华文”。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全部新旧约圣经，并在1824年出版，成为新教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圣经，马礼逊同时也翻译了《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

马礼逊的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名叫蔡高，是首先承认主名的华人基督徒。还有一位协助印刷圣经的刻木版的工人名叫梁发，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清廷的禁令偷偷印刷圣经，成为早期信徒之一。1817年，米怜在马六甲为梁发施洗。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成立恒河移动传教差会。1820年秋天，梁发的妻子信主，她是中国第一位女信徒，儿子也在11月20日受洗。马礼逊为这家人祈祷说：“愿这个中国小家庭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向人民传播真理的器皿。”



图 5.43 马礼逊和梁发在印刷第一本中文圣经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与李文斯顿医生合作，开办了一间诊所，专为中国人治病，为贫穷的中国人免费施以药物和指导。1820年，马礼逊夫人带着小儿女从英国返澳门，马礼逊一家正可重享相聚之乐。但他妻子因染霍乱症，遽然逝世，而他的同工米怜也于1822年病故，马礼逊伤痛的心情可想而知。

1823年，马礼逊来华16年后，在回国度假前按立了梁发为牧师。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病逝于广州，年仅52岁。马礼逊在华传道27年，只见到10人受洗归主，但这些东西用眼泪撒下的种子，花朵必将开遍山野。神藉着他，中国出现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第一所现代学校、第一份报刊杂志、第一座西式医院、第一位中国基督徒和第一位本土牧师。

三年之后，1837年，一位宣教士手里拿着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分发给广州考场的考生，其中一份到了屡次落第的秀才洪秀全手上，引发了后来的太平天国革命。

4、崇真会在香港广东开始宣教

1847年，改革宗长老会信仰的崇真会（巴塞尔会）派黎力基（Rudolf Lechler）和韩山文（Theodor Hamberg）两牧师来华，主要在广东客家地区传扬福音。总会设于广东老隆，下设有香港、李朗等13个区会。到1949年，该会有堂会112处、牧师45人、传道111名、信徒达2万多人，并有中学4所、医院2所和神学院1所。

崇真会的建造完全按着长老会的体制，最高领导机构为总会，总会下设区会，区会辖若干支会和宣道所。各区支会划分几经变更，或由小区并为大区，大区缩为小区。这种加尔文纯正的福音正是今天香港、广东从客家少数民族部落走入文明的源泉，只可惜今天的内地教会很少有人纪念他们，但他们做工的果效会在天上随着他们。



图 5.44 香港的基督教崇真堂

5、李文斯顿

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于1813年3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的布兰泰尔（Blantyre）。他的父亲是棉纺工人，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16岁那年，他在读了来华宣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的传记后深受感动，立志投身宣教工作。在念医科时，他决定充当医疗宣教士，并与伦敦传道会联络，同时亦在一所独立的神学院修读神学。有一次教会让李文斯顿讲道，他一到讲台竟然将事先准备的讲章全部忘记，从此他更加确信神对他的呼召并不是讲道，而是宣教。他起初打算到中国，刚巧爆发鸦片战争，前赴中国的计划无法实现。1840年，李文斯顿被清教徒公理会创办的“伦敦传道会”差派到非洲宣教。



图 5.45 李文斯顿

在非洲头数年时间，如其他宣教士一样，他主要负责数个传教站的工作，包括医疗、牧养和在生活上帮助当地土著等。但他希望更深入非洲的内陆，特别是那片尚未为白人政权占据的“黑色非洲”。

1848 到 1865 年，李文斯顿三次深入非洲，里程达三万里。他穿越卡拉哈里沙漠，多少次冒死危险，深入非洲土著蛮荒地带，传讲基督福音。

李文斯顿 1873 年 5 月 1 日在北罗得西亚的衣拉拉 (Ilala, Northern Rhodesia) 逝世。据说，李文斯顿死时维持一个祈祷姿势。当地人以最尊敬的纪念方式将李氏的心脏挖出，埋在一棵树下，然后把他的尸身运回英国，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后院。



图 5.46 李文斯顿首次发现的维多利亚瀑布

6、威伯福斯废除奴隶制度

18 世纪末，奴隶贸易在英国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有 1100 万非洲黑奴被运往美洲大陆。在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中，他们被禁锢在一个只有棺材大小的空间中，大批奴隶在运输途中悲惨死去。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转卖、鞭打和遭受各种虐待。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有大量的黑奴。

威廉·威伯福斯（1759—1833）是英国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780年成为议员。他在1787年在国会提出废除奴隶制的法案。我们很难想象威伯福斯所从事事业的艰巨、孤单和危险。他这样做，不仅是要摧毁庞大的奴隶贸易，还会损害英国巨大的国家利益，更损害了诸多议员们的个人利益，因为很多议员就是奴隶船的船主或南美种植园的投资人。他从普通民众中搜集支持废奴的签名行动也容易被戴上颠覆政府的帽子。



图 5.47 威伯福斯在议会打开万人请愿废奴的条幅

经过数次失败后，他就以议员的身份与另外一些人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克拉鹏联盟。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呼吁废除奴隶制度，他们写书、演讲，现身说法，搞民意测验，上百次向国会提交议案。经过了20年努力，英国国会终于通过一些法律来禁止奴隶的买卖。他进一步推动立法，要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度，1833年8月，即威伯福斯去世后一个月，下议院投票通过释放奴隶和全面废除奴隶制度的提案。从此，奴隶制这个几千年来违反上帝创造之人性的制度在世界上消失。

7、中国的改革宗翻译家赵中辉

赵中辉牧师出生于1916年8月30日（即农历八月二日）。他的故乡是辽宁省开原县中固镇，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是基督徒。

赵中辉在1935年参加焦维真教士在东北营口圣经学院举办的第一届东北基督徒培灵会，讲员是王明道先生。赵中辉很受感动，于是入读营口教会培真中学，后在1936年入读东北营口圣经学院（圣经神道院），但东北营口圣经学院主要教导的内容是时代论。

1938年，来自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魏司道博士（Dr. J. G. Vos）来校执教系统神学。魏司道博士的改革宗神学深深地影响了赵中辉的一生，从此，赵中辉的神学立场由亚米念神学和时代论神学转变为改革宗神学。

1939年，赵中辉从东北营口圣经学院毕业后，在东北的教会参与事奉。1940年，营口圣经学院重组，魏司道博士担任校长，邀请赵中辉担任助手，负责翻译魏司道博士的讲义。在这期间，赵中辉牧师翻译了伯特纳博士（Dr. Boettner）的《基督教预定论》一书前一部分。1941年，东北营口圣经学院因战争和政治原因被迫关闭。1942年至1945年8月，赵中辉在大石桥教会牧会。后因战乱，赵中辉一家人辗转流离，经沈阳、上海到达广州，在广州改革宗长老会参与事奉，并创办《改革主义信仰》双月刊杂志，该刊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物后改名为《改革宗信仰》。同时，赵牧师从事梅钦的《基督教与新神学》的校对和出版工作，并继续翻译伯特纳博士的《基督教预定论》。1949年，赵牧师举家迁往香港，在美国改革宗长老会宣教士包义森（Samuel E. Boyle）牧师的倡导下，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成立，由魏司道牧师任驻美代表，赵中辉任执行秘书，旨在向中国基督徒介绍改革宗的神学思想。他继续出版《改革宗信仰》（于1950改名为《信仰与生活》），并完成了《基督教与新神学》，并于1951年在香港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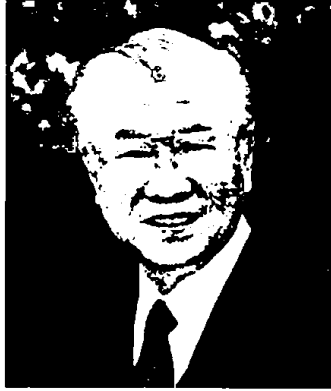


图 5.48 改革宗翻译家赵中辉牧师

1950年到1956年，赵中辉在日本事奉和学习，1954年5月13日，赵中辉在日本被北美改革宗长老会正式按立为牧师。1956年9月，赵牧师只身到达美国，入读匹兹堡改革宗长老会神学院。1957年夏天，在美国各地改革宗长老会教会以及与改革宗长老会教会友善的教会中，赵牧师介绍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的工作，行程遍及十四个州。1957年秋，赵牧师转学至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完成学业。1958年，赵牧师全家在美团聚。赵牧师夫妇共有子女10人，其中二子为赵得恩与赵天恩。

赵牧师在美继续他的翻译事工。1968年，改革宗翻译社搬到台湾。到1977年赵牧师获日内瓦大学（Geneva College）荣誉神学博士为止，除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圣经的默示》和与包森义牧师共同翻译的梅钦的《基督教与新神学》之外，赵牧师的译作还包括华腓德的《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威斯敏斯特信条》、巴刻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加尔文的《罗马书注释》（与宋华忠合译）、简河培（康恩）的《现代神学论评》和伯克富的《基督教神学概论》。迄今为止，赵牧师共有神学译作和著作达40余部，他的译著和著作作为中国改革宗真理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九章 错谬异端的兴起和改革宗教会的艰难

第一节 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

1、天主教宣布教皇无误

虽然近代的天主教会已经和基督的真教会无关，但天主教的影响在基督教里仍阴魂不散，有时与教会内的异端错谬遥相呼应、巧妙配合，几乎再次将教会拖入中世纪黑暗的泥沼。

1869年12月8日，教皇庇护九世召开梵蒂冈大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44名教长（主教、修会会长等），其中欧洲代表500人，其余教长是来自亚非拉传教区的代表。会议预定讨论信仰、教义、教规、修会、传教以及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等问题。当时欧洲政局动荡，意大利面临革命，普法战争迫在眉睫。会议因“教皇首席性”与“教皇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无谬误”问题发生激烈论战。最后经过两轮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载有教皇“永无谬误”条款的《永恒牧人宪章》。宪章遭到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教廷随即将这些派别革除出教。天主教会从上到下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国天主教会充分运用自主权，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推动改革，出现了神学多元化、礼仪民族化、教会生活民主化的势头。与此同时，各国天主教会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影响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运动就此展开。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又称纽曼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于1965年9月14日由次任教皇保罗六世结束。这次会议将马利亚的升天加入天主教教义之中。会议重申并加强了“教皇无误论”。天主教在教义和教皇神化上不但不做一丝调整，反而越走越坚定，但这样坚定的异教信仰却开始打算与新教进行无法遏制的普世联合。

2、天主教开展普世合一

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由欧美等地的基督新教教派发起。来自159个基督新教团体的代表同意基督徒之间应互相尊重，决意谋求各教会宗派在宣教地区的合作，以见证教会的合一。1921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的国际宣教协会（IMC）和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都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产物。

作为对普世合一运动的回应，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讨论通过了罗马天主教会参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提案，制定《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主张接纳所有基督教派别的神学理论为其基础，天主教会大力开展了普世合一运动。

3、近代东正教

虽然很多基督徒几乎忘记了希腊正教会的存在，但这个宗教却一直存留到今天，而且在全球教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因它拥有两亿信徒，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希腊、巴尔干国家、东欧及俄罗斯等地。

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了东罗马正教会。在15世纪，东罗马帝国因君士坦丁堡战役败亡，东正教徒于是逃往巴尔干和俄罗斯，从而将希腊正教形态的基督教传到那里。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为止，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的国教。十月革命以后，东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正教徒遭到屠杀。1961年，俄罗斯正教会作为东正教最大的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1964年，大主教雅君高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在耶路撒冷见面。1965年，罗马教会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同年10月11日，两人先后在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发布《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声明》，相互废除了九百年前加给对方的绝罚，展开圣事和教义的共融讨论。

第二节 新正统派

1、巴特兴起

新派神学兴起的结果是一方面高举了人的能力，另一方面贬低了圣经的价值，他们对人类有无上信心，认为藉着教育、文化及科学之进展，人自己可以改进而臻完善，如此便可建设地上乐园。

在正统信仰竭力抵挡这一潮流的时候，瑞士的卡尔巴特也起来批判新派的错误，但他不是根据圣经及教会的正统教义，而是自己发明一套以正统自居的信仰理论，所以人们称之为新正统派。

巴特于1886年5月10日生于瑞士的巴塞尔（Basel），巴特本人在数处大学攻读，其教授包括哈乃克及赫尔曼（二人皆为圣经批判之创始人）。1935年，巴特在德国工作时被希特勒逐出境，于是返回瑞士。后来他除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授外，也开始写他的长篇巨作——《基督教教义学》。巴特宣扬他的新正统理论，故新正统神学又称为巴特神学（Barthianism）。从外表看来，新正统派好像是在宣扬真道，引领新派的人回归真神，但仔细分析之下并不如此。新正统派虽然引证圣经，并且使用正统神学所常用的名词，如十字架、悔改、信心、神的道等等，但他们却对很多名词有新的解释。新正统派的思想非常狡猾，他们用圣经的名词而予以新的解释，使很多信徒一时不能察觉其伪，甚至很多信仰纯正的神学家初听时也不能分辨其虚，直到后来被这种思想灌输日深，就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了。

2、新正统派的圣经论

新正统派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新正统派采纳新派神学的圣经批判法，但他们却用得更巧妙，悄无声息。他们将“道”（Word）解释为“话”。他们仅仅相信耶稣是神的道，而圣经不过是神的道作见证，圣经的本身不完全是神的话。但他不能这样明说，因为信徒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他就换了一种说法：“圣经里面‘包藏’神的话。任何一处经文必须先对我们发生了作用，然后这一处经文才能算为神的话。”他就这样就把圣经本身的神圣性掺进了我们的经历，然而人还浑然不知。比如受新正统影响的传道人在台上动情地讲：“当你遇见耶稣，神的话语才成为你的生命，祂的话会变得那样真实。”这样的讲论一般人很难听出问题，还以为这是在高举圣经，巴特的狡猾就在于此。而且他一方面把主耶稣在世时所讲的话和其他处经文区分开来，无疑贬低了大部分圣经内容，但另一方面却又以高举基督为旗号，真是诡诈至极，前些年流行的红字版圣经（把耶稣直接说的话用红色标注）就是这种理论的表达。

巴特说：“圣经中不但包含历史方面或年代方面的错误，甚至包含神学教理上的错误。”在《上帝之言与人之言》一书中，巴特写道：“圣经是由一个古代种族的宗教以及一个近东古希腊教派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的融合。作为一份人类的文献，如同任何一份

其他文献一样，对于特别的关注与思索而言，圣经并不能产生任何先天的教理主张。这是今天万口都承认、万民都相信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是一扇已经敞开的门，我们不需要再继续试着破门而入。因此当我们很严肃但可能不是那么热情地来关注圣经的客观内容时，我们不应该刻意去招惹那宗教狂热主义和科学的愤慨，以挑起另一场反对‘固执的正统’与‘字句中已死的信仰’的战斗。因为这实在是太明显了，当圣经中属人的、属历史的以及心理学上的特质被作出评判，并置于我们之后时，一个对于圣经的有智慧、有成果的讨论才开始。”

3、新正统派的神论

新正统派相信神藉着基督将自己显示给人类。巴特提出“神的自由”原则暗示神可以变为与祂完全相反的一位，而同时又忠于祂自己。巴特把似是而非这一手段运用到极致，以辩证的方式来言说上帝。他说：“上帝超越了我们所言说的‘是’和‘不’，上帝是在彼岸的，是在‘是’与‘不’言说的彼岸，也就是在道成肉身中‘上帝成为人’，这是我们言说上帝的最根本的前提。在上帝面前，保持沉默或许才是我们本该有的状态。”他认为圣经的记载不一定可靠，因此只着重他的十字架，并不重视耶稣一生的事迹。在他看来，十字架就象征着人类的一切希望。

巴特神学既然如此微妙难测，一般信徒在读神学书籍或聚会听道时很难分辨其真伪，不知不觉就把神的真实变成虚谎。

4、巴特对道的教义的混乱

(1) 启示的道和成文的道

巴特说：“其实，启示和耶稣基督的位格及祂所完成的圣工并无二致。启示就是‘道成肉身’。通过耶稣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和本性，了解上帝的拯救人的计划。”表面上这样的描述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妥，但其实这里已经把基督的位格完全虚化了，将位格和言行完全等同，在本质上和主张耶稣是人类模范的新派思想别无二致。

巴特又提出更具诱惑性的观点：“圣经只有上帝的临在时才是神的话。”巴特从来就不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巴特巧妙地说：“圣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话，完全是因为上帝允许、并且愿意透过它来发言。‘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一个命题是一种认信。圣经的存有（being）是在启示的行动（becoming）中被确立的。”按照这种观点，人读圣经时就和读其他作品没什么区别了，只有上帝在人读经时突然临到，人像过电一样，这时圣经才具有神话的特质。巴特说的临在绝不是指圣灵在人读经时的感动，而是指一种虚幻的、朦胧的特别意境。

接下来，巴特又把圣经经文和上帝的行动开始完全对立起来：“如果上帝不做工，那么圣经就失去了所谓上帝话语的本质。”巴特绝不会肯定圣经乃神的道的教义。在他看来，写在纸上的圣经都是死的，本身不是道，只有在人读经时，道会像成肉身那样进入到文字中。只有在这种特别的朦胧的感觉中，圣经才成为神的话。对于这样的谬论，主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63）。

巴特在《基督教教义学》里说：“上帝之道，首先既不在于新教‘唯独圣经’所倚重的圣经中，也不在于天主教的教会所倚重的教会里，更不用提各种基督教传统的信经和教义，最原初的上帝之道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之中的自我启示，就是在上帝为了自身而拣选了人的恩典行动中。”巴特似乎在高举上帝的荣耀，但他却极巧妙地将这荣耀架空，使其和上帝的所有作为脱节，最主要的和祂自己所默示的圣经脱节。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2) 宣讲的道——讲道或宣道：

巴特认为“道”的第三种形式是基督徒的讲道，包括个人生命的见证分享、儿童主日学或福音聚会等方式，这些方式都是今日上帝向人说话的“形态”，而不是上帝工作的本身。同样，要是没有上帝的突然临在，这一切毫无意义。巴特把神在教会中一切的工作和神本身完全分开，使我们的敬拜、聚会、读经、听道等一切工作都变为虚幻和徒然，只有在这些通常的蒙恩之道中寻找那些奇特的感觉。

巴特接着狡辩说：“如果直接将圣经等同为上帝的道，就会使上帝被冒称。当一个人（包括牧师）拿着一本圣经说：‘这是上帝的话！’那么一个凡人就等于控制了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此该说什么，信徒知道我们的无知。”（巴特《罗马书释义》42页）

巴特用高举上帝为借口，如此公然地诋毁圣经和讲道，背后目的极其阴险毒辣。我们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给其最好的反驳。

《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八章第三节：既然圣灵使真信徒得知“神开恩白白赐给他的事”，他就可以不藉由特别的启示，只要正确使用一般的方法（读经、祷告、守圣礼等），便可有此确据。所以，信徒都竭力殷勤，使自己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坚定不移。

5、对基本教恩的诋毁

和其他部分一样，巴特不会直接反对因信称义等基本教义，而是先以反对宗教为借口，狡猾地把休谟等人的怀疑主义揉进基督教信仰中。对巴特而言，信仰则是宗教的反面。他说：“当我们有勇气去说我相信时，我们便永远保持在怀疑之中……只有当我们在耶稣的名字下遇见基督时，对上帝之信才被建立起来了。”（巴特《罗马书释义》155页）巴特在这里的所谓“遇见耶稣”绝不是在圣经真理里的遇见，而是在那些神秘的感官经历中朦胧地遇见。

巴特的神学错谬还有许多，如混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等。他的神学就像启示录中那“说谎羊话的兽”，极具有迷惑性，而且影响至今。就在前不久，改革宗神学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举行了“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的纪念大会”。据传绝大部分师生欣然参加，许多中国的文化基督徒也开始积极踊跃地翻译巴特的著作，纷纷开展“巴特神学研讨”，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更加悲哀的时代将要来临。

第三节 近代几位改革宗神学家

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代，神的教会也绝不会从这世界上完全消失，哪怕教会的光再微弱，但主绝不会熄灭这将残的灯火。那些不向这世界的错谬妥协的仆人们依然用各种方式传承着正统的光芒，但限于篇幅有限，这里只介绍几位改革宗著名的神学家。

1、魏司道

魏司道博士（Johannes.G.Vos）美国籍，其父就是普林斯顿著名的圣经神学教授魏司坚。魏司道在1930到1941年间曾在中国东北作宣教工作，在齐齐哈尔一带地方建立改革宗长老会（当时原名为约老会），后担任营口圣经学院院长，赵中辉就是他的学生。魏司道牧师与赵中辉牧师同工一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才离华返美牧会。1955年魏牧师任日内瓦大学圣经及哲学系主任，一直到离世。魏司道著书甚多，译成中文的著作有《基督教与世界宗教》、《创世记研究》、《基督再来》、《神、人与宗教》、

《启示录研究》和《罗马书研究》等。魏司道的著作文体生动，语言通俗易懂，详细地阐明真理，令读者获益良多。

2、伯特纳

(1) 伯特纳的生平

劳瑞·伯特纳 (Loraine Boettner, 1901—1990) 于 1901 年 3 月 7 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林顿。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的校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劳瑞·伯特纳从小在他父亲的教会聚会，一直到 18 岁为止。之后，他加入了她母亲的教会——世纪循道会 (Centennial Methodist Church)。他母亲所在的宗派和他父亲的不同。1917 年，劳瑞·伯特纳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他进入密苏里州大学主修农业，一年后转到塔城长老会学院 (Tarkio Presbyterian College)。他最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取得了科学学士学位。在那里，他深受沃克教授 (J.B. Work) 的影响。沃克教授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沃克教授是改革宗背景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但他没有完全接受改革宗的教义，因为当时他觉得预定论的教义不适合他。他在 1925 年到了普林斯顿神学院继续学习，1928 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29 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就是在普林斯顿，他发现了加尔文主义的“甘甜之处”。在他第二年暑假期间，他读完了查尔斯·贺智的《系统神学》的卷二和卷三。深受贺智的影响，他选择了预定论作为他的神学硕士论文。在普林斯顿学习期间，他受教于查尔斯·贺智的孙子卡斯珀·贺智 (Casper W. Hodge)。卡斯珀坚固了伯特纳的改革宗信仰。伯特纳有时也和他的另外一个导师兼朋友撒母耳·凯奇 (Samuel G. Craig) 见面，撒母耳是《长老会》杂志的编辑。撒母耳和伯特纳经常在一起吃晚饭，彼此谈论学院里的自由派和受梅钦影响的改革宗之间新近发生的事情。



图 5.49 伯特纳

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以后，伯特纳开始在东肯塔基的皮克斯威拉长老会学院 (Pikesville Presbyterian College) 教书，一直到 1937 年为止。在这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莉莲·亨利 (Lillian Henry)。他们在 1932 年结婚。在同一年，伯特纳出版了《基督教预定论》。

1935 年至 1939 年间，伯特纳和阿里斯博士 (Dr. Allis) 在《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和现在的《今日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的杂志社共事。1937 年他离开皮克斯威拉长老会学院，开始在国会图书馆和税务总局工作。在这一人生阶段，尽管他在一个与圣经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研究和神学没有关系的环境里工作，他仍然继续撰写了许多基督教书籍。他修订了《基督教预定论》，将硕士论文从最开始的八千字修订到三万字。

在纽约，他在纽约大街长老会教会聚会，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是那个教会的牧师。1948年，由于他妻子的健康原因，他移居洛杉矶。他妻子的两个姊妹来帮助他照顾他的妻子，直到他的妻子1958年去世为止。就在同一年，他回到洛克港（Rockport）继续写作。1962年，伯特纳的新书《罗马天主教》超过了他的前著《基督教预定论》，成为了基督教界的畅销书。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归功于它的可读性。1989年，伯特纳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白血病和癌症。1990年1月3日晚上8点，伯特纳在一家医院（Fairfax Hospital Montana）去世。

（2）伯特纳的著作

除了《基督教预定论》外，伯特纳还写了许多改革宗的书籍，后来都经好友赵中辉牧师翻译成中文，所以，伯特纳对改革宗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许多中国改革宗教会的信徒都是通过伯特纳的书籍认识了改革宗信仰，即加尔文主义，特别是对预定论的认识。伯特纳的著作还有《灵魂不灭》、《赎罪论》、《圣经的默示》、《基督的位格》、《改革宗信仰》、《三位一体》和《千禧年论》。

3、巴刻

詹姆斯·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 1926年一）是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维真学院的教授。1926年，巴刻在英国西南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出生。1944年，巴刻赢得了奖学金到牛津大学的考帕斯克莉丝蒂学院就读，攻读古典文学。1948年毕业后，巴刻曾到伦敦橡树山书院（Oak Hill College）任教，讲授新约希腊文。



图 5.50 巴刻博士

1949年，他返回牛津的威克里夫学院（Wycliffe Hall）接受神学训练，随后还攻读博士。1955年至1961年，他任教于布里斯托市的丁道尔学院（Tyndale House, Bristol）。1978年，他带头签署了主张圣经无误的《芝加哥宣言》。1979年，他到温哥华维真神学院执教，后来被选为神学教授（Sangwooo Youtong Chee），直到退休。

巴刻博士虽然属于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但他却是近代圣公会中少有的坚持正统教义和上帝主权的神学家，基本属于改革宗信仰。他的著作有《基督徒须知》、《认识神》、《字里藏真》、《活在圣灵中》、《生命的重整》和《传福音与神的主权》等。

他的著作从圣经出发，特别体现在《生命的重整》第五章《神的引导》这一章精彩的阐述中。他在这一章教导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应根据圣经和天然之光，避免神秘主义那种以个人感觉甚至幻觉寻求的方法，对今天深受灵恩派影响的教会具有深刻意义。

第四节 几个异端兴起

1、摩门教（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约瑟·斯密特（Joseph smith）生于佛蒙特州的莎伦，但是他一直住在纽约的波密拉城（Palmyra）。根据摩门教经典《无价珍珠》中的摘录，1820年春天，约瑟·斯密特14岁时，他开始考虑几个基督教宗派哪一个是真理，并进到他家附近树丛里面去祷告祈求一个答复。他说“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并且命令他不要加入任何一个当时存在的宗派，并给了他新的启示。约瑟·斯密特据此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神所呼召的先知。1830年4月6日，约瑟·斯密特在另外56人的见证下于纽约州菲也特（Fayette）建立了“教会”。

传说1823年9月21日，摩罗以荣耀复活之身向“先知”约瑟·斯密特显现，指示他有关古代纪录的事，命他将此纪录译为英文，成为《摩门经》。他们认为该书是由许多古代先知藉预言及启示之灵所写成。他们的话写在金页片上，由一位名叫摩门的先知加以引述、节录而成。约瑟·斯密特于1830年出版了这本《摩门经》。1845至1847年，约瑟·斯密特的继任者杨百翰带领摩门教徒进入盐湖城，摩门教从此主要盘踞在犹他州，以盐湖城为其总部。据官方统计，2012年摩门教徒有600万。



图 5.51 摩门教印制的中文版圣经和摩门经

由于摩门教一直采取不符合美国婚姻制度的多妻制，所以针对摩门教多妻教义，美国国会分别在1862年和1874年颁布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及《普兰法》。摩门教却以宗教自由为借口，在1874年抛出了“雷诺德案”。他们通过摩门教兴盛的犹他州州政府以多妻的罪名对教徒雷诺德进行起诉，使用这个苦肉计来获取向高等法院申诉的机会。1875年12月，法院判决雷诺德重婚罪，判处两年监禁。然而，雷诺德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1878年，他的辩护律师在最高法院替他辩护，主张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雷诺德享有信仰自由，所以他多妻为无罪。然而，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因为信仰自由不代表可以破坏律法，《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支持多妻制。

然而，雷诺德案虽然结束了，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却还有更多以自由为借口破坏宪法、违背宪法的事情，甚至为了所谓的个人自由连宪法都可以修改。我们由此看到，自由若

不在上帝律法之下是何等可怕！这样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而是为所欲为了。



图 5.52 豪华气派的摩门教教堂

2、安息日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源自 19 世纪中期美国的米勒派运动。米勒是新英格兰的农夫兼浸礼派平信徒传道人。他根据但以理书及启示录，并经过一番推算，将基督复临的日子定在 1843 年 3 月 21 日，有许多人相信并跟从他。到了这一天，结果自然是一场空，但米勒尔解释说：“在这一年中，基督随时会复临。” 1844 年 12 月 31 日也过了。米勒又称因基督在天上要检查案卷延长而耽搁。这样一再反复的谎言竟然没有激起人的反感。相反，1846 年，米勒的继任者贝约瑟（Joseph Bates），一名退休船长，继续传播米勒的讲论，而且强调该守旧约整个律法及安息日（即周六）。1863 年，这群守旧约安息日的安息日会信徒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Battle Creek）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总部在 1903 年迁至首都华盛顿，在 1989 年迁到马里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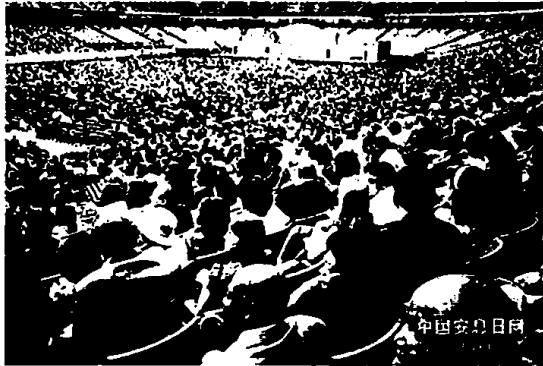


图 5.53 2010 年亚特兰大国际会议中心安息日会的聚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观点大致和福音派相像，表面也相信三位一体等教义，但另外有一些独特的教义，包括死人无知觉和查案审判等。安息日会要求人严守旧约礼仪律法，如饮食条例。他们在讲道时强调用历史事件揭示预言，以获得生动、吸引人的效果。

第九章 错谬异端的兴起和改革宗教会的艰难

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全球人数超过1700万,在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驻有组织。除信徒聚会外,教会对外传道的主力是教育、医疗、文字印刷、广播和救灾。

3、耶和華见证人会

耶和華见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以前曾称为“千禧年曙光派”、“国际圣经学生会”,又在1939年改名为“守望台圣经与单张协会”。

耶和華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始于1870年代末,由查尔斯·泰兹·罗素(Charles Taze Russell)在美国发起。耶和華见证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正确的,是唯一由上帝耶和華创立的宗教。现在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际性宗教团体。1931年,在一次国际大会上,他们根据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十节“耶和華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于是宣布将自己的团体更名为“耶和華见证人”。

他们教义的核心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神,声称“耶稣基督在降临人世前是天使长米迦勒”,其实就是索西尼主义的翻版。

2014年末,耶和華见证人的信徒人数已超过八百二十万人,并在全球二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他们的圣经外观和真圣经一样,里面的话语也多处相同,只是在略微改动彰显耶稣神性的经文,但这已经是篡改圣经了。人通常难以察觉,很多人不小心便落入其中的网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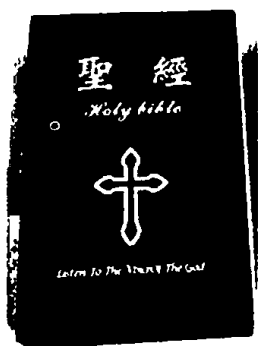


图 5.54 耶和華见证人印制的中文圣经

耶和華见证人定期发行两本主要的刊物:《警醒!》(Awake!)和《守望台》(The Watchtower)。《守望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警醒!》杂志次之。它们都是非卖品,并且每一期在其官方网站上分别提供对应的电子版,供人免费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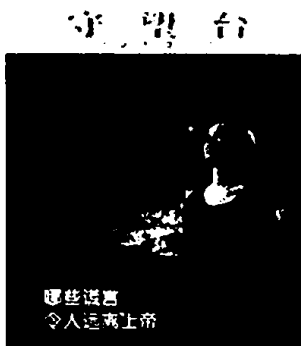


图 5.55 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中文杂志《守望台》

第五节 20世纪最大的异端——灵恩派

1、灵恩派对教会的巨大毁坏

20世纪以来，从美国兴起的灵恩派成了囊括亚米念、时代论、循道宗等几乎所有基督教宗派的一个庞大的超宗派。它已然不是一个宗派，却成为一股把从前各宗派错谬推向高峰的潮流。它完全以个人经历取代圣经真理，以外在感觉取代理性分析，以成功神学代替意志更新，把基督教的内涵全都淘空。在撒但邪灵大肆运行和人为的虚假的神迹面前，许多教会纷纷加入灵恩派，因为从重洗派、敬虔运动开始，撒但早已为这场运动铺好了道路。万事俱备，只欠神许可的命令。我们从这场运动的到来，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神的话如此准确地得到应验。

太 24:24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启 13:13-14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它因赐给它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受灵恩派冲击最大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本来就因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对西方世界羡慕不已，这些地方的教会对那些从西方汹涌而来的垃圾不但不加分辨，却像如获至宝。当那些西装革履腰缠万贯而又大有能力、呼风唤雨的“牧师们”一踏入这一片片贫瘠的土地，他们就立即被奉若神明，被当成真正的基督教使者的化身。一波波的灵恩运动就在这些刚刚兴起的教会展开，没有多少教会能站立得住。虽有神的仆人昼夜呼喊，但在这洪流面前犹如雀鸟之声。

然而，这样的基督教所走过的土地留下的却是更加荒凉和愚昧。因为灵恩派提倡有病不用打针和吃药，所以教会里的“基督徒”就视医院、医疗为没有信心之人的摆设，认为病人只靠那些巫术般的赶鬼就能痊愈。这岂不是要把世界带回到巫师蛮夷时代？灵恩派一切都是靠“信心”，一切科学文化都被视为不合潮流的表现——他们连盖房子都不需筹措资金，只祷告；学生不需要努力学习，只要考试时求神迹就行；工作更不需要双手，只要有信心就有神迹发生……这些做法实实在在是令人触目惊心！凡灵恩之风刮过的国家和土地都成为更加落后愚昧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最愚昧的人群就是所谓的“教会”，所以在灵恩派对教会的负面影响下，教会越来越被社会轻视和厌弃。本来是带给

世界文明的基督教，撒但却成功地让其成为愚昧的代名词。

最关键的是，灵恩派剔除了使人得救的福音中的一切核心真理，将圣经当成异教的灵符，导致成万上亿的人拿着圣经、高唱着哈利路亚，却奔向地狱。

2、五旬节教会灵恩运动的兴起

过去的几世纪中，这股潮流中最重要的物是约翰·卫斯理。事实上卫斯理可以说是灵恩派教会的鼻祖。他说他自己的心“奇怪地热起来了”。他曾强调内在的“圣灵的见证”，并教导“成圣”是第二重恩典，和称义不同，是在称义之后发生。这些观念从早期的循道会开始，通过19世纪的圣洁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教导圣洁的导师们在夏令营、退修会和“更高生命”的大会上宣称：“信徒成圣的‘第二祝福’是洗去心中一切的罪。”有时人们把它叫做“灵洗”或“圣灵的浸”，慕迪就是提倡灵洗教义的布道家之一。

19世纪末期，美国宗教界有两个重要发展，预示了灵恩运动的来临：一是老派教会内部，特别是循道会，对圣洁教导与日俱增，结果形成了几个另外的极端“圣洁”教会；二是在圣灵与火中受洗为“第三祝福”的信仰愈趋普遍，同时这些教会对圣灵的恩赐，尤其是对医病的恩赐，兴趣盎然。

20世纪初，圣洁运动获得决定性的发展，在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灵恩派的教义初具雏形：“说方言”（“说方言”原是指圣灵通过信徒的发音器官，说出信徒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是信徒受了圣灵的洗（灵洗或圣灵的浸）的证明。20世纪早期，这个教义开始在美国南部各州得到零散的支持。

然而1906年，在洛杉矶亚苏撒街的一次奋兴会上，灵恩派才正式将灵洗和说方言连在一起。这次长达三年的奋兴大会，是20世纪灵恩派教会的起飞点。数以百计的基督徒，先是从北美各地，后来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前来亚苏撒街，然后又把这里的信息和“灵”带回去。星星之火发展极快，结果产生了许多新教会。大多数圣洁运动的教会或团体都受到影响，成了灵恩派教会。

亚苏撒街之后的70年内，灵恩派教会遍及全世界。有一点必须清楚，灵恩派教会已不是一个宗派，也不是新教的一个教派。它成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连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圣公会和许多异端也纷纷加入这场运动。

美国重要的灵恩派中最大的有“神召会”，包括“上帝在基督中教会”（最大的黑人教派）、“上帝的教会”和“五旬节圣洁会”等。欧洲的灵恩教会以斯堪的纳维亚教会最为兴盛，意大利的灵恩信徒比该国所有新教信徒的总数还多。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灵恩教会成为天主教以外最大的群体。根据1973年的估计，仅拉丁美洲灵恩派就有一千四五百万信徒，最显著的例子是巴西。巴西的灵恩派信徒估计有400万，占天主教以外所有基督信徒的70%。但还是在亚洲，灵恩派取得了最为可观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到了上世纪末，中国的基督教会都纷纷开展大规模的灵恩运动。

3、灵恩派的信仰

美国灵恩派教会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独位格神论者，他们认为神只有圣灵一个位格。几乎所有灵恩派先驱都只是把灵洗为“第三祝福”的信仰附加在神使人成圣的信仰之上，同为“第二祝福”。可是在1910年过后那几年，更多的人支持成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尚未完成了的工作”。他们把十字架和个人的经历、身体感觉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将身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上过电、热水浇身这些肉体感觉都加上耶稣十字架美丽的光环，使得自己的经历更加栩栩如生。

灵恩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否认了圣经作为上帝的启示的地位，追求并高抬异梦、异象、声音和幻像，正如加尔文所预言的：“他们在打鼾时脑海里存留下来的思想都远比圣经重要得多”。他们即使提到圣经，也不是来自白纸黑字的圣经，而是来自他们脑海中断章取义的一个字或一句话。所以撒但在灵恩运动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藉着这种方式取代了人们拿在手中的圣经，这远比中世纪天主教强令禁止人读经更加奏效。

灵恩派的崇拜遵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二到第十四章所述的模式，认为那里列出了圣灵恩赐的清单，是信徒所能得到的恩赐的标准。在聚会中作话语服事的通常被视为“先知”或“智慧的言语”的恩赐的表达。他们聚会没有固定的程序，当被这种“灵”所浇灌后，人们通常是精神暂时失常，打滚、哭闹和蹦跳。然而这些明显被鬼附的行为竟然被诸多的基督教会歌颂了一个世纪，被称为“圣灵充满”。



图 5.56 灵恩派聚会混乱的情景

4、灵恩运动近代的发展

从 1901 年开始直到 1950 年末，灵恩运动都是局限在灵恩派各教会内部，一直都被其他主流教会排斥，并且被指摘为“分裂教会的异端”。这段时期的灵恩运动我们称之为“旧灵恩运动”（或“第一波灵恩运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因为灵恩运动渗透了基督教各主流教会、弟兄会、新派教会、天主教等宗教，在聚会的形式上也有了少许的改变，没有旧灵恩运动那么激烈、混乱，而且分裂教会的现象大大减少，各教会反而借着灵恩运动全面进行起“大合一运动”，各教派企图从灵恩派教会那里学到教会增长的秘诀。灵恩运动不再局限在以前的灵恩派教会内部，我们称之为“新灵恩运动”（或“第二波灵恩运动”）。

“新灵恩运动”的发展过程如下：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普世基督教协会（WCC）的领袖开始承认灵恩派为真正的基督教，甚至是基督教会里的“第三势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当时出任世界五旬宗教会协会总干事的杜普里西斯（David du Plessis）相信上帝要他和普世基督教协会取得联系。此后，他在普世教协圈子里担任灵恩派教会的全权大使，影响极为广泛。

灵恩运动蔓延到了 80 年代之时，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领域。例如富勒神学院干脆开办“神迹奇事”课程，使灵恩运动这种野蛮文化进入了大学课堂，发展成为“第三波灵恩运动”。一些大师纷纷提出了“权能布道”和“权能医治”的观念。第三波运动现在席卷全球。

第六节 心理学登上科学和教会讲坛

1、心理学深入教会

1879 年，德国学者冯特从自由派大本营杜宾根大学毕业，随后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的诞生。1880 年，艾宾浩斯受聘于柏林大学，在那里继续研究记忆，并重复验证了他的早期研究。1885 年，他出版《论记忆》一书。1905 年，艾宾浩斯离开布雷斯劳大学去了哈雷大学。1908 年，他出版了受人欢迎的教科书《心理学概论》。

在 20 世纪，这一个完全产生于异教世界的理论竟然像灵恩派一样，悄然渗入基督教会，成为除灵恩派以外对教会的第二大威胁。

心理学因为需要回顾过去的事情和预测将来的情景，就必然要结合新纪元的交鬼，所以这些心理学家的经历都与交鬼有关。弗洛伊德曾经使用催眠术，但后来他放弃催眠，改用自由联想和解梦。另一个心理学鼻祖容格更十分灵异，他研究、练习、推荐各种冥想术，又研究瑜伽、佛教等。容格交鬼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曾形容自己的整个房子“充满了灵体”，他家人都觉得在闹鬼。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家喻户晓，他所讲的第四层需要，就是“自我实现”和“高峰经历”。人若达到此境界，就实现了自己的潜能。换言之，藉着各种冥想或瑜伽等新纪元技术，人便能提升潜能，成功致富。

但对这明显来自邪灵界的产物，基督教会却视如珍宝，使教会面临再一次被毁坏的危险。这些学说将东方宗教、西方玄学和各种迷信邪术重新包装，让教会难辨真假。如果你请一个基督徒学习冥想打坐，他一定拒绝，甚至非基督徒也很有可能回避。但若你对他说“这是一个心理科学技术，叫做积极思想之类，或是松弛技术”，那么他们的疑心就会顿消。因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心理学是导引新纪元走进社会、学校、教会的最佳桥梁。走进教会的心理学就成了“基督教心理学”，其中亦有催眠和冥想，与其他心理学一般无二。

2、心理学惯用方法

之所以教会愿意接受心理学的侵蚀，是因为教会已经被掳亚米念，心理学提倡的自尊、自爱和成功迎合了亚米念自我得救的声音。他们以家庭阴影、原生家庭伤害为借口推脱责任，正迎合了人刚硬不肯认罪的本性。

基督教心理学不过是一大堆世俗心理学理论和技术，经基督徒心理学家把这些理论和基督教混在一起而成，然而心理学是有问题的。心理治疗虽然只有一百年左右，但是它已经非常流行，持有执照的专业心理学家数目更是每十年增加一倍。近年来流行“内在医治”，其前身就是记忆治疗（Memory Healing）。虽然每个作者或治疗者的办法都略有不同，却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祈祷的时候想象“耶稣”来临，治疗心灵所曾经受过的创伤。举例如下：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好几年前，《海外校园》曾经有一篇介绍记忆治疗的文章写道：“想象耶稣带你领进入一座花果丰盛的园子，你在那里接受耶稣的代祷……从在母腹成孕开始，回顾过去人生中的每个阶段，每到一处都尽可能重组现场实况，并察觉耶稣临在的位置。”这种离开圣经的冥想和灵恩派的异象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内在医治的基础正是：一个人的过去会留在潜意识中，影响其情绪和行为，而且受创的经验，不会被时间冲淡或自行愈合，而记忆更重复其杀伤力，日益蚕食心灵，所以需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无意识中去医治。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腓 3:13），何必天天让苦毒蚕食心灵，被记忆继续杀伤？圣经吩咐我们：“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弗四 3:1）即使未信主的人，受创的经验都可以被时间冲淡或自行愈合。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些欺骗！

3、教会争先引入心理学

1956年，在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的支持下，卡尔·亨利开办了《今日基督教》杂志。这个杂志的作风开放，成为传扬“新福音派”理念的重要出版物。这是一份以自由派为主导的刊物，下面摘录其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离教者一代》，作者是《今日基督教》国际事工部编辑主任大卫·达克（Drew Dyck）：

童年信仰受害者

关于童年信仰的受害者，对于在孩提时代因为国度追求“神圣化”而遭受过虐待的人，属灵里面所受的伤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所受到虐待的经历是从神的名而来的。他们在信仰里面开始醒悟，认为是神圣化让他们变得堕落，所以他们认识上帝是邪恶的。

就这样，通过心理学，人把自己不信上帝的悖逆刚硬的罪归结为童年的影响，似乎上帝在审判时就没有任何理由让人承受永恒的刑罚了。如此，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被抽空，人们再来到教会就完全是为心灵上的快乐了，而不是为寻求真理。对于这些风靡全世界的思想，我们只有一句话：“主在天上嗤笑他们”。

第十章 世界大背道与普世福音

第一节 猴子事件

1、事件背景

虽然教会在正统教义上堕落，但美国毕竟还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不可能直接容纳无神论的存在。然而随着教会一再向世界妥协，一切不可能都成为了可能。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公共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学教育，到1920年时中学生数目达250万。这自然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大家深深懂得，教育能改变孩子们的一生。

面对进化论和无神论对教育的威胁，三次参与总统大选的威廉·布莱恩在一次演讲中说：“当一个人获取学校教的所有知识但却丢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他将得到什么好处呢？”从1921年起，布莱恩在美国南部各州四处宣传达尔文思想对青少年的威胁，他指出：“纳税人对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有权把达尔文主义赶出他们自己的学校。”

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1923年2月，俄克拉荷马州在一项议案的附加条款中规定：禁止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同年4月，佛罗里达州也规定：“禁止在公立中学或大学学院讲授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或者把达尔文学说当作真理来讲授，或者讲授任何其他关于人与低等生命形式有血缘联系的进化假说。

1925年3月，田纳西州议会则通过了包括一条带有惩罚性条文的刑事法《巴特勒法案》，其中规定：“禁止田纳西的所有大学、师范院校和其他所有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无论这些学校是全部还是部分由州公立学校基金资助的，并且对违反该项法案的行为予以惩处。”

总之，从1921年到1927年，美国各州共通过37项禁止教授宣传进化论思想的法案。但此时向新派开放的教会已经成为主流，教会对这些法案并不积极维护，而许多人权组织开始准备对法案发动攻击。

2、事件经过

美国反基督教的公民自由联盟（ACLU）打算资助一位高中老师，让他违背《巴特勒法案》，施以苦肉计。于是他们选中了田纳西州戴顿一所中学年轻的生物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在这个自由联盟的暗中支持下，斯科普斯在1925年无视州法案，公开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结果遭到逮捕。于是全国许多早已准备好的组织立即提出声援，并聘请了全国最著名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作为辩护方主要律师。达罗与ACLU的律师亚瑟·加菲·海斯（Arthur Garfield Hays）、来自国务院的律师达德里·费尔德·马龙（Dudley Field Malone）共同组成辩护团。原告方律师团以汤姆·斯图尔特（Tom Stewart）为首，还有威廉·布莱恩、赫伯特（Herbert）、苏·希克斯等。这起诉讼被各方媒体关注，同时也是美国第一起在国家广播上直播的诉讼。

ACLU原本打算使用的反对《巴特勒法案》的理由是“它违反了教师的个人权利和学术自由，因此违宪”。但达罗将这一策略改变为：圣经对人类起源的描述与进化论并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不冲突（后来被称为神导进化论）。为了支持这种观点，辩护方请到了八个进化论专家，达罗在最后开始字面解释圣经并加以攻击，并且攻击布莱恩对其他宗教和科学的了解有限。到审判的最后，达罗才回到原来的辩护主题，即《巴特勒法案》违宪。达罗先对圣经的根基加以诋毁，然后再从国家法律入手，实为其最狡猾过人之处。

审判一直持续到7月25日。国务卿威廉·布莱恩自愿出任公诉方的首席律师。布莱恩谴责向孩子教授“人类只是成千上万种哺乳动物之一”的观点，而辩方马龙的一次发言被公认为本次审判中最精彩的一幕。他成功地引起了群众对“宗教裁判所”的恐惧，提出应将圣经保留在神学和道德层面上，而与科学无关。他宣称，布莱恩的“决斗至死”观点不成立，因为“你无法与真理决斗”。当他完成演说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法官劳尔斯顿因经常与达罗发生冲突，被指严重偏向控方。法庭进行到第七天，辩方提出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请求，要求法官让布莱恩出庭作证。达罗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诘问布莱恩。布莱恩年岁已高，思维能力根本不是年轻的达罗的对手，常被问得哑口无言。审判结果是斯科普斯仅被罚款100美元。通过这一次事件，基督教开始在全国一片嗤笑声中渐渐退出美国主流社会。为了歌颂这位“摧毁基督教”的英雄老师，人们将其事迹拍成电影。



图 5.57 歌颂斯科普斯的电影剧照

3、美国的公共教育转向无神论

由于自由联盟等组织的不懈努力，美国的公共教育终于渐渐转向无神论教育，整个社会转向抵挡神，教会被彻底边缘化，成为众多宗教的一种。

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田纳西州的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法律违宪。

1982年，数百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里根总统要求学校课程保留进化论的内容。

198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神创论乃宗教信仰。‘上帝造人论和造物论’这样的“创世论”属宗教信仰，因而不得在公立学校内与进化论并行教授”。言下之意是，公立学校只能教授进化论。

4、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虽然世界在堕落，但教会在堕落世界的挣扎从没有停息，1978年10月26日—28日，在美国的芝加哥市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基督教国际会议，一些基要主义者联合发表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此篇宣言包括三部分：（1）宣言概要；（2）确认和否认的条文；（3）解释说明。这篇宣言是由1977年成立的“国际圣经无误协会”发起，近三百位教会领袖与神学家在宣言上签名。虽然宣言捍卫了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但此时教会似乎已经无暇讨论其他教义，而圣经无误这一教义甚至在中世纪黑暗时期都无需辩驳，今天却成了教会最后的防线。撒但将人们的注意力成功地拽回基督道理的开端。

第二节 美国改革宗教会现状

1、美北长老会采取继续妥协政策而堕落

与亚米念派的金巴伦教会合并后，美北长老会一直采用包容政策。在史密特（E. W. Smith）博士所著的销售量超过六万五千本的《长老会信条》中，我们看出此时长老会打算包容承认一切，包括圣公会、亚米念教会。

长老会精神之宽宏，思想与感情之开明，又不受宗派偏狭与顽固的限制，正显示出它的尊贵……我们的教会论都宣示我们的宽宏大量。我们的信仰告白说：“普世有形的总体教会，包括天下万国中每一个承认基督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所以我们在正式的公开场合都不认为长老会是唯一的真教会，我们乃是认为长老会是众教会之一，表示除我们之外还有别的教会。有些教会虽然立场与我们对立，但是仍然与我们一样是福音派教会，我们的信仰准则不但没有谴责他们的字眼，甚至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准则是现存信仰准则中唯一以明确且权威的口吻承认其他福音派教会是“耶稣基督教会的真枝子”的信仰准则。我们认为其他福音派教会的会友和牧师在各方面都和我们相同，都真是基督教会的真会友和真牧师。只要是真基督徒，我们都承认他们的资格。牧师在别处的授职，我们也都拒绝。别的福音派教会牧师所行合乎圣经的圣礼，我们也都承认。我们也以德报怨。高派教会、循道会所阿们的事情，我们也全心阿们。任何诗歌只要将荣耀归给主耶稣，我们都可加入，与弟兄们同唱。我们以非常的爱心邀请任何宗派的基督徒与我们一同纪念主的死。我们不限制基督徒彼此的关怀与体谅。我们就是这样宽宏！

长老会的宽宏也表现在教会审核会友资格时只有一项条件，就是“承认基督、信靠基督、并且顺服基督”，除此以外，别无他求。我们不要求会友在任何信仰准则上签名，也不要求他们同意我们的神学。我们只要求他作基督徒，不要求他作加尔文主义者。他对三位一体、代赎等教义的知识或许不完全，对婴儿受洗、拣选、圣徒至终永蒙保守等教义或许有疑问，但是只要他信靠基督，长老会的门就向他敞开，他可享受其中一切的权利。

如果教会除了信耶稣之外还加上其他的入会条件，就是犯了“使进教会比进天国更难”的错误。或许有别人这么专制偏狭，但是长老会绝对不这么专横。长老会的原则就是人只要相信基督，就可以成为神家中一分子，长老会的大门就向他们敞开。

他们所说的“长老会的宽容”绝不是圣经里面的宽容，绝不是改革宗先辈们提倡的宽容，而是对异端错谬的纵容。加尔文等改教家们痛恨并严厉地斥责一切异端错谬，所以他们这样做早已成了改革宗的悖逆后代。

诗 119:128 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2、美国长老会（PCUSA）彻底成为自由派

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美国长老会越来越走向自由派。

1958年，美北长老会与北美联合长老会合并，成立联合美国长老会（UPC）。

1973年，美北长老会又与美南长老会合并成立新的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USA，简称：PCUSA）。美国长老会目前已经是被自由派（或新派）占领的不信派。

2008年，美国长老会总会决定取消“圣职人员必须忠于婚姻制度”的限制，也就是说牧师可以有淫乱罪而不被劝惩。

2010年，美国长老会总会以373票支持、32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允许对非独身同性恋者担任圣职的提案，也就是说，可以按立同性恋者为牧师了。这样的开放，就连那些福音派、亚米念派的人本教会都望尘却步，那些带来美洲文明和敬虔的清教徒，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的子孙却成了给社会带来腐朽堕落的先锋。

但法案虽然通过，要真正实施起来人们一时还难以下手。直至2012年，美国长老会的科罗拉多州长老会果真按立了一位同性恋牧师。这次按立一时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区会立即投票决定脱离美国长老会，加入其他福音派教会。有的区会新建了“福音派圣约长老会教团”（Evangelical Covenant Order of Presbyterians，简称ECP）。这个组织虽然是从长老会中分离，但已经基本没有长老会的信仰。ECP首先完全肯定了女人在领导位置上的作用，强调传福音的意义，取消宗派教义之争。

教会的堕落必然要引起社会道德的急剧下滑，就在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同性婚姻在美国各州合法化的法案。

3、PCA 成立

因美南长老会与已经成为自由派的美北长老会联合，很多坚持改革宗思想的牧师就离开了这个组织。1973年12月4日，从美南长老会离开的260个堂会（4100多人）的代表聚集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郊区的Briarwood长老教会，组成了新的长老会“国家长老会”，后来由于跟美国联合长老会的一个堂会重名，遭其抗议，于是1974年改名为“美洲长老会”（PCA）。PCA、OPC、RPC（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目前仍算是比较正统的改革宗长老会。

王上 19: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第三节 现代普世合一运动

1、穆德发起现代普世合一运动

穆德被誉为“近代普世合一运动之父”。他是循道宗的平信徒，虽然在大学读书时曾修读希腊文及一些神学科目，但毕生并未曾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亦未尝接受任何宗派按立。穆德在循道会的一所学院上艾阿华大学（Upper Iowa University）就读预备班时，他就积极投入各种活动，并且成为该校的青年会创会会员。他得着循道会所非常注重的重生经验——所谓“全然成圣”或“圣灵的第二次赐福”的经验之后，就深受19世纪圣洁运动的影响。

1886年暑期，穆德参加慕迪在马萨诸塞州诺非尔黑门山所举办的首届大专生夏令营，之后便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是近代一个发展迅速的福音派组织。1901年，穆德成为青年会海外事工部的副总干事。1926年，穆德当选为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的终身主席。

穆德在190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鼓励学生投身宣教工作的手册，题目是《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天下》。穆德在1920年于美国艾阿华州德梅因（Des Moines）举行的学生志愿运动大会中宣称：自运动开展33年以来，已有8140名献身者前赴宣教工场，占了全球所有宣教士的三分之一。

1922年4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园召开第十一届年会，由穆德主持。因德国发动战争的讨论，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反感和抗议。他们反对这个富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组织借用中国的高等学府，举办一个旨在荼毒中国青年心灵的会议，所以清华、北大等各个大学的学生立即成立了“反宗教大同盟”（后称“非基督教同盟”）。学生们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于是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并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年之久。这是中国继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另一场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

1910年6月10日，一个重要的普世宣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称为“爱丁堡宣教大会”。这是首次世界性的宣教大会，穆德作为主席主持整个宣教会议，亦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重申向未信基督的民族传教是教会至高的责任，而现今正是践行这个使命的最好时机。会议的成果是一本厚达250页的报告：《基督教使命的决定性时刻》。1946年12月，穆德获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毕生在促进国际沟通与事工合作的杰出贡献。

穆德的普世合一运动虽然仍带有一些基督教的色彩，但在他们传讲的所谓福音里面几乎没有了一丝救恩教义。他们只是传讲一个基督爱世上所有人的“爱的宗教”，甚至都不是一个宗教，不过是一个普世价值观罢了。

2、青年与宣教事工

19世纪至20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以平信徒为主导的运动，是首先谋求在属灵经验（圣洁运动、神医运动和千禧年运动）和福音事工（奋兴布道）等各层面上的分享合作，而非关心教义与敬拜礼仪的异同。这是一个跨宗派甚或超宗派的运动，由一些宗派与堂会以外的新兴机构（如青年会、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所推动。他们鼓励信徒以个人的身份加盟参与，从而绕过教会组织，更加淡化教会在人们心中的概念。

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正式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WCC），成为其会员组织。自此，国际宣教协会、生活与事工、信仰与教制这三个主要推动20世纪初合一运动的组织都汇集在普世基督教协会之内。普世基督教协会成了今日普世合一运动的代表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三自爱国会、基督教协会亦是其会员。

3、合一运动的成果

由于各宗派大力支持，除了像一些改革宗教会一样由于信仰上的原因而没有参加普世合一运动以外，大部分基督教会均积极推动这项运动。在1961年举行的新德里会议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有突破性的进展。东正教首先作出了响应，而且在1962年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中，天主教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也同意在不改变天主教信仰与教条之情形下寻求基督教界的合一。教皇保罗六世于1965年命令教廷设立联合工作组，以打破和基督教对话的门槛，从而推进了合一政策的施行。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面对这种把基督教大一统的思想，基督教内部也产生反对的呼声，为了对抗世界基督教协会，1948年，万国基督教联合会（ICCC）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他们认为使各宗教联合成世界大统一教会的行动有违圣经的教训，正是耶稣所指的敌基督出现的温床。其实，世界基督教协会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所谓的世界性机构连敌基督都算不上，他们和基督两个字没有任何关联。

4、普世合一运动演变为万教归一

现代的普世合一运动已经背离了原来发起的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的宗旨，因为那毕竟还是在名义上的基督教会内展开的。但现代福音派发起的普世合一运动不仅打破了基督教各个宗派的界限，甚至打破了各宗教的界限——不仅是与天主教，就连与伊斯兰教、佛教的联合都被纳入这种合一运动中，真所谓万教归一。

彼前 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我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1) 与天主教、佛教联合

早在1966年，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说：“我更接近天主教徒，而非激进的新教徒。我认为天主教正在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第二次宗教改革一定会在1978年前完成。我认为我的信仰本质上与正统天主教一模一样。”（《费城晚间公告板》1966年5月24日）



图 5.58 葛培理和教皇亲切会晤

1997年5月31日，葛培理接受加州水晶大教堂牧师罗伯特·舒乐（Robert H. Schuller）采访。舒乐问道：“请问您如何看待基督教的未来？”葛培理答道：“我认为每一位认识基督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神的目的是为祂的名呼召人们，无论他们来自穆斯林世界、佛教界、基督教界，还是来自不信派。他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他们已经得到神的呼召。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耶稣的名字，但我认为他们得救了，他们将同我们一道进入天堂。”

赵镛基，韩国纯福音教会领袖，也是成功神学和灵恩运动的大师，在会见韩国佛教界领袖时说：“佛教与基督教是一样的，佛的慈悲与耶稣的大爱也是一样的。”他还说：

“现在一些牧师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有拯救，这实在是唯我独尊的想法。”



图 5.59 赵镛基和韩国佛教协会主席亲切握手

(2) 与伊斯兰教合一

在“九一一事件”以后，为了缓和消除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的敌意和误解，美国的伊斯兰教在《Friday Church News Notes》2011年杂志上发表声明《你我之间的共同语言》，意思是他们和其他各宗教拥有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恐怖主义者只是极端特殊的少数，不代表他们的信仰。结果福音派都认为这一声明是彼此联合的良好契机，数以百计的福音派领袖迅速作出回应，签署类似的声明《基督徒对于“你我之间的共同语言”的回应》，强调“穆斯林与基督徒所敬拜的神，是同一位神”。他们又说：“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合一。”华理克（Rick Warren）为发起人之一。

部分签署声明的著名神学家及教会领袖如下：

美国哈佛神学院院长柯克斯（Harvey Cox）；

美国福音派联盟主席利斯·安德森（Leith Anderson）；

美国哥顿康维神学院荣誉院长罗伯特·古里（Robert Cooley）；

美国新奥尔良浸会神学院研究院副院长麦克·埃登斯（Mike Edens）；

美国桑佛大学比森神学院提摩太·佐治（Timothy George）；

“青年使命团”国际主席林恩·格林（Lynn Green）；

美国哥顿康维神学院彼得·库米克（Peter Kuzmic）；

《今日基督教》主编聂大卫（David Neff）；

美国惠顿学院策略性福音研究所罗伊·厄克斯内瓦（Roy Oksnevad）；

美国富勒神学院院长毛理查（Richard Mouw）；

美国葡萄园教会全国总监伯登·瓦戈纳（Berten Waggoner）；

韩国首尔纯福音教会主任牧师赵镛基（David Yonggi Cho）；

.....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3) 与摩门教合一

这些福音派领袖对和伊斯兰教的联合仍不满足，竟然在2011年3月10日亲自跑到摩门教总部盐湖城去，要与摩门教的领袖“对话”，说是为彼此加深认识，其中包括《今日基督教》的总编辑聂大卫、“美国福音派联合会”主席利斯·安德森（Leith Anderson）、“三一国际大学”的院长克雷格·威里福德（Craig Williford）、以及“美国富勒神学院”的院长毛理查（Richard Mouw），但被坚守自己“纯正”的摩门教所拒绝。

第四节 世俗潮流冲击着名义上的教会

1、后现代主义

教会背道对世俗文化的影响巨大。作为世界的良心的教会一旦扭曲，世界一下子就翻转，典型的例子就是后现代主义成为社会各领域的主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定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组成自己的后现代体系。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越悖逆上帝越美。

2、新纪元运动

新纪元运动所涉及的层面极广，主要是受诺斯底主义、普世主义、东亚宗教以及印度宗教等思想的影响。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交鬼、心灵辅导、气功和心理学等。

在此潮流冲击下，教会纷纷投入巴比伦的怀抱，今世的成功、富足、轰轰烈烈、外在气氛成了基督教会的主要目标。所以，一个个超级组织、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托拉斯纷纷诞生。在美国最大的一个“超级教会”，每周聚会人数在4万人以上。他们的牧师告诉会众：“只要有信心，上帝会把一切健康、财富赐给你。”

帖后 2:9-12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提前 4:1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3、真教会必然分别

步入了21世纪，上帝又要在许多地方兴起祂自己的工作，真理之旗再次被扬起来，这个时候，许多人开始对已经被人遗忘了二百年的改革宗真理燃起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特别是在亚洲的较落后国家。但同时，撒但利用人心中的诡诈，企图把这一次回归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不像宗教改革时各国用暴力和血腥镇压新教，这一次撒但是采用仿造和假冒改革宗的方法，于是各地打着“改革宗”旗号的教会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但却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提后 3:8 从前雅尼和佯庇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这是撒但最厉害的抵挡真道的方式。雅尼和佯庇是法老面前的两个术士，他们用什麼方法抵挡摩西？就是摩西行什麼神迹，他们也仿效去行，使以色列人觉得法老的势力和摩西的能力一样大，因而感觉离开埃及渺茫无期，从而失去信心。今天也是一样。许多教会虽然宣称传讲改革宗纯正真理，但人们却使之变得与从前并无两样，最终导致很多人开始产生质疑。但是如同羔羊血的遮蔽使以色列人免受长子之灾，十字架的宝血产生分别，这一神迹是术士无法模仿的。那么今天神对祂儿女的呼唤是什么呢？还是那古老的声音：

林后 6:14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林后 6:17-18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虽然太多假冒，但是真选民还是能按圣经所给出的标准从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中分别：（1）从敬拜中分别，回归圣经中所启示的敬拜；（2）从教义中分别，回归神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中所光照出的正统真理和教义；（3）从生活中分别，以上帝律法为我们唯一的生活标准，尽心尽力按着上帝的道德律法生活。从律法中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便将羔羊宝血涂在我们心门之上。靠着这恩典，神的教会必然再次被分别。这是那些虚假错谬信仰再怎么伪装也无法模仿的，这就是神给他儿女特殊的印记，是圣灵同在的明证，也是基督徒特殊的标志——圣洁。

教会如何走出世俗化、神秘化的泥潭，不再受心理学等伪科学的迷惑，不再受肉体感觉、邪灵的欺骗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归回到宗教改革时期、归回到使徒时代的古道。如何回归？用什么分别？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神的荣耀、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黑暗已深！黑暗中教会最大的盼望就是“主必快来”。

启 22:20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 维基百科, 在线百科全书, 美国: 2001.1
2. 百度百科, 在线百科全书, 中国: 2006.4
3. (古罗马) 优西比乌著, (美) 梅尔英译, 瞿旭彤中译. 教会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9.9
4. 朱寰, 世界上古中世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3
5.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编[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3
6. 祁伯尔著, 李林先译, 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M], 2013.10
7. 伯克富著, 赵忠辉译, 教义史[M], 改革宗出版社, 2011.10
8. 吕沛渊, 先贤所信——早期教会史话[M], 台湾: 改革宗出版社, 2015
9. (英) 麦格拉思著, 苏欲晓译, 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8-10
10. (德) Franz Xaver Funk (傅恩克) 著, (奥) 雷立柏译, 中世纪教会史[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5.2
11. 姜德福, 格利高里一世与罗马教皇权的初步形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6 卷第 2 期, 1997.6
12. (古罗马) 克莱门等著, 黄锡木等编译, 使徒教父著作[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13.7
13. (古罗马) 奥古斯丁著, 王晓朝译, 上帝之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12
14. (古罗马) 奥古斯丁著, 周士良译, 忏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5
15. 龙文, 西欧中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势力的鼎盛及其原因[J], 贵州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1 期, 1994.1
16. 张晓华, 中世纪后期教皇的敛财活动及其后果[J],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年第 2 期, 1995.4
17. 曾祥敏, 约翰·胡斯被控异端始末探略[J], 宗教学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2012.4
18. (美) 罗伦·培登著, 古乐人、陆中石译,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M], 译林出版社, 1993.10
19. (法) 加尔文著, 钱曜诚译. 基督教要义[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2010.3
20. (荷兰) 威廉姆斯·阿·布雷克著, 王志勇等译, 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6

参考文献

- 21.赵天恩、赵中辉、王志勇, 历代教会信条精选[M], 台北: 改革宗出版社, 2002.2
- 22.钟马田著, 梁素雅、王国显译, 清教徒的脚印[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1-1
- 23.约翰·毕克顿·威廉斯著, 陈凤、梁曙东译, 马太·亨利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1.4
- 24.(英)阿诺德·达里茂著, 陈凤译, 怀特菲尔德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05
- 25.(英)阿诺德·达里茂著, 陈凤译, 司布真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3
- 26.(美)茜亚·凡赫尔斯玛著, 王兆丰译, 加尔文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7
- 27.伯特纳著, 赵忠辉译, 基督教预定论[M], 台北: 改革宗出版社, 2011.2
- 28.侯晓民, 日内瓦城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软实力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2012.4.10
- 29.(英)托马斯·马丁·林赛著, 孔祥民等译, 宗教改革史[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92.4
- 30.孙艳,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11.3
- 31.那朝丹, 16-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6
- 32.柴惠庭, 英国清教[M],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7
- 33.张松韬, 18世纪法国胡格诺移民在英国[D], 研究生学位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07.3
- 34.(英)麦克里著, 宏恩译, 诺克斯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1
- 35.张文亮, 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12
- 36.(英)福克斯著, 苏欲晓等译, 殉道史[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
- 37.(美)霍西尔著, 曹文丽译, 爱德华滋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1
- 38.丰盛恩典网站 Wellsof, 属灵人物传记[M], 2011.1
- 39.(德)施本尔, 敬虔愿望[M]
- 40.伊恩·默里著, 张宇栋译, 真正的复兴[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2.11
- 41.(荷兰)赫尔曼·巴文克著, 赵中辉译, 我们合理的信仰[M], 海口市: 南方出版社, 2011.7
- 42.吴波, 北美独立战争前后基督新教主要派别及其民族主义思想[D],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03.5
- 43.刘远刊, 宗教与美国内战——从宗教角度重新探析美国内战[D],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05.4
- 44.田春苗, 1692年萨勒姆巫术案解读[J],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10.5
- 45.张松韬, 16至18世纪法国胡格诺移民在英国[J],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07.3
- 46.卡尔·巴特著, 魏育清译, 罗马书释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

47. 鲍谨博士夫妇著, 张逸萍译, 《心理学不合圣经》[M], 生命出版社, 2009.1
48. 张逸萍, 心理学偏离真道[M], 生命出版社, 2009.1
49. 张逸萍, 为真道争辩护教学[M], 生命出版社, 2009.1
50. 穆华黎, 荆棘中的火焰: 欧洲新教 15 名人传[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6.10
51. 张绥, 基督教会史[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2.7
52. 黄锡木, 新约背景文献选辑[M], 汉语圣经协会, 2000.12
53. 董江阳, 基督教基要派的形成与分裂[J], 世界宗教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2002.4
54. 陈雪娟,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那个路易十六[J],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第 7 卷第 2 期, 2009.6
54. 祝曙光, 一场被神化的革命[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7.2
55. (英) 巴刻著, 赵中辉译, 生命的重整[M], 香港: 宣道出版社
56. 任以撒著, 系统神学[M], 台北: 改革宗翻译社
57. (英) 汤姆·华森著, 罗维伦、钱曜诚译, 系统神学[M], 台北: 加尔文出版社
58. 赵享恩、赵中辉等, 传到地极[M], 台北: 改革宗出版社, 2011.1
59. 孔祥民, 奥兰治·威廉和尼德兰革命, 历史教学[J], 1984.10
60. 基佐,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4
61. 谢丽梅,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1636—1769)[D],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大学, 2005.5
62. 约翰·欧文, 圣灵论[M], 台北: 改革宗出版社, 2005
63. 赵中辉, 英汉神学名词词典[M], 台北: 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

外文文献

1. C. H. Lawrence, *Medieval Monasticism*, Longman, 1989.
2. Damian J. Smith. *Innocent III and the Crown of Aragon: The Limits of Papal Authorit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3. E. William Monter, *Historical Demography and Religious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Genev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9, No. 3 (Winter, 1979), The MIT Press.
4. Charles E. Edwards, *Calvin and Missions*,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8 (1936).
5. W. M. Hetherington, *History of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of Divines*, Edinburgh, 1843.
6. Horton Davies, Willam B, *Worship and Theology in England, From Cranmer to Baxter and Fox, 1539-1690*,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7. Bede,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Arthur J. Slavin,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参考文献

9. The Successor, "His theology is not epigonal", Magazine Reformierte Presse, 2004.
10. orthodoxwiki.org/Sylvester_I_of_Rome.
11. en.wikipedia.org/wiki/Francis_Makemie.
12. ncpedia.org/biography/smith-egbert-watson.
13. en.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Bullinger.
14. www.newadvent.org/fathers/3806.html.
15. www.ligonier.org/blog/covenant-theologian-heinrich-bullinger.

附录一 罗马皇帝表

| | |
|--------------|-----------------------------|
| 公元前 27—公元 14 | 屋大维奥古斯都 |
| 公元 14—37 | 提比略（提比留） |
| 公元 37—41 | 盖乌斯（卡利古拉） |
| 公元 41—54 | 克劳狄（革老丢） |
| 公元 54—68 | 尼禄 |
| 公元 68—69 | 伽尔巴 |
| 公元 69 | 奥托 |
| 公元 69 | 维利乌斯 |
| 公元 69—79 | 韦伯芎 |
| 公元 79—81 | 提图斯（提多） |
| 公元 81—96 | 图密善（多米田） |
| 公元 98—117 | 图拉真 |
| 公元 117—138 | 哈德良 |
| 公元 138—161 | 安东尼·皮乌斯 |
| 公元 161—180 | 马可·奥热流与卢修斯·维鲁斯 |
| 公元 180—192 | 康茂德 |
| 公元 193 | 佩提尼纳克斯 |
| 公元 193—211 | 赛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
| 公元 211—217 | 卡拉卡拉 |
| 公元 218—222 | 埃拉伽巴卢斯 |
| 公元 222—235 | 塞维鲁·亚历山大 |
| 公元 235—238 | 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 |
| 公元 238—244 | 戈狄安三世 |
| 公元 244—249 | 阿拉伯人菲利普，247—249 与他的儿子菲利普同在位 |
| 公元 249—251 | 德基乌斯 |
| 公元 251—253 | 特里博尼阿努斯·加卢斯与沃卢西阿努斯 |

附录一 罗马皇帝表

| | |
|------------|--|
| 公元 253—260 | 瓦勒良与伽利埃努斯 |
| 公元 260—268 | 伽利埃努斯 |
| 公元 268—270 | 克劳狄二世，戈提乌斯 |
| 公元 270—275 | 奥勒良 |
| 公元 275—276 | 塔西陀，276 年与弗洛里阿努斯同在位 |
| 公元 276—282 | 普罗布斯 |
| 公元 282—283 | 卡鲁斯 |
| 公元 283—284 | 卡里努斯与努梅里安 |
| 公元 284—305 | 戴克里先 |
| 公元 286—305 | 马克西米安 |
| 公元 305—311 | 迦勒里乌斯，共治皇帝包括君士坦提乌斯一世、 克罗鲁斯、塞维鲁二世、李锡尼等 |
| 公元 311—324 | 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 |
| 公元 324—337 | 君士坦丁一世 |

附录二 教皇表

| | | |
|----|-------------------------|---------|
| 1 | 贵格利一世 (St.Gregory I) | 590—604 |
| 2 | 萨比尼昂 (Sabinian) | 604—606 |
| 3 | 卜尼法斯三世 (Boniface III) | 607—607 |
| 4 | 卜尼法斯四世 (St.Boniface IV) | 608—615 |
| 5 | 多伊德迪特 (St.deusedit) | 615—618 |
| 6 | 卜尼法斯五世 (Boniface V) | 619—625 |
| 7 | 洪诺留一世 (Honorius I) | 625—638 |
| 8 | 塞维林 (Severinus) | 640—640 |
| 9 | 约翰四世 (John IV) | 640—642 |
| 10 | 提奥多一世 (Theodore I) | 642—649 |
| 11 | 马丁一世 (St.Martin I) | 649—653 |
| 12 | 尤金一世 (St.Eugene I) | 654—657 |
| 13 | 维塔利安 (St.Vetalian) | 657—572 |
| 14 | 阿迪乌达二世 (Adeotatus II) | 672—676 |
| 15 | 多奴 (Donus) | 676—678 |
| 16 | 阿伽托 (St.Agarho) | 678—681 |
| 17 | 利奥二世 (St.Leo II) | 682—683 |
| 18 | 本笃二世 (St.Benedict II) | 684—685 |
| 19 | 约翰五世 (John V) | 685—686 |
| 20 | 克农 (Conon) | 686—687 |
| 21 | 塞吉阿斯一世 (St.Sergius I) | 687—701 |
| 22 | 约翰六世 (John VI) | 701—705 |
| 23 | 约翰七世 (John VII) | 705—707 |
| 24 | 西西尼乌斯 (Sisinnius) | 708—708 |
| 25 | 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I) | 708—715 |
| 26 | 贵格利二世 (St.Gregory II) | 715—731 |
| 27 | 贵格利三世 (St.Gregory III) | 731—741 |
| 28 | 扎加利 (St.Zachory) | 741—752 |
| 29 | 斯德望二世 (Stephan II) | 752—757 |
| 30 | 保罗一世 (St.paul I) | 757—767 |
| 31 | 斯德望三世 (Stephan III) | 768—772 |
| 32 | 阿德利安一世 (Adrian I) | 772—795 |
| 33 | 利奥三世 (St.Leo III) | 795—816 |

附录二 教皇表

| | | |
|----|--------------------------|---------|
| 34 | 斯德望四世 (Stephan IV) | 816—817 |
| 35 | 帕斯夏一世 (St.Paschal I) | 817—824 |
| 36 | 尤金二世 (Eugene II) | 824—827 |
| 37 | 瓦兰丁 (Valentine) | 827—827 |
| 38 | 贵格利四世 (Gregory IV) | 827—844 |
| 39 | 塞吉阿斯二世 (Sergius II) | 844—847 |
| 40 | 利奥四世 (St.Leo IV) | 847—855 |
| 41 | 本笃三世 (Benedict III) | 855—858 |
| 42 | 尼古拉一世 (St.Nicholas I) | 858—867 |
| 43 | 阿德利安二世 (Adrian II) | 867—872 |
| 44 | 约翰八世 (John VIII) | 872—882 |
| 45 | 马林一世 (Marinus I) | 882—884 |
| 46 | 阿德利安三世 (Adrian III) | 884—885 |
| 47 | 斯德望五世 (Stephan V) | 885—891 |
| 48 | 福尔摩塞 (Formosus) | 891—896 |
| 49 | 卜尼法斯六世 (Boniface VI) | 896—896 |
| 50 | 斯德望六世 (Stephan VI) | 896—897 |
| 51 | 罗马诺 (Romanus) | 897—897 |
| 52 | 提奥多二世 (Theodore II) | 897—897 |
| 53 | 约翰九世 (John IX) | 898—900 |
| 54 | 本笃四世 (Benedict IV) | 900—903 |
| 55 | 利奥五世 (Leo V) | 903—903 |
| 56 | 克利斯多夫 (Christopher) | 903—904 |
| 57 | 赛吉阿斯三世 (Sergius III) | 904—911 |
| 58 | 阿纳斯塔斯三世 (Anastasius III) | 911—913 |
| 59 | 兰顿 (Lando) | 913—914 |
| 60 | 约翰十世 (John X) | 914—928 |
| 61 | 利奥六世 (Leo VI) | 928—928 |
| 62 | 斯德望七世 (Stephan VII) | 929—931 |
| 63 | 约翰十一世 (John XI) | 931—935 |
| 64 | 利奥七世 (Leo VII) | 936—939 |
| 65 | 斯德望八世 (Stephan VIII) | 939—942 |
| 66 | 马林二世 (Marinus II) | 942—946 |
| 67 | 阿戈培二世 (Agapetus II) | 946—955 |
| 68 | 约翰十二世 (John XII) | 955—963 |
| 69 | 利奥八世 (Leo VIII) | 963—96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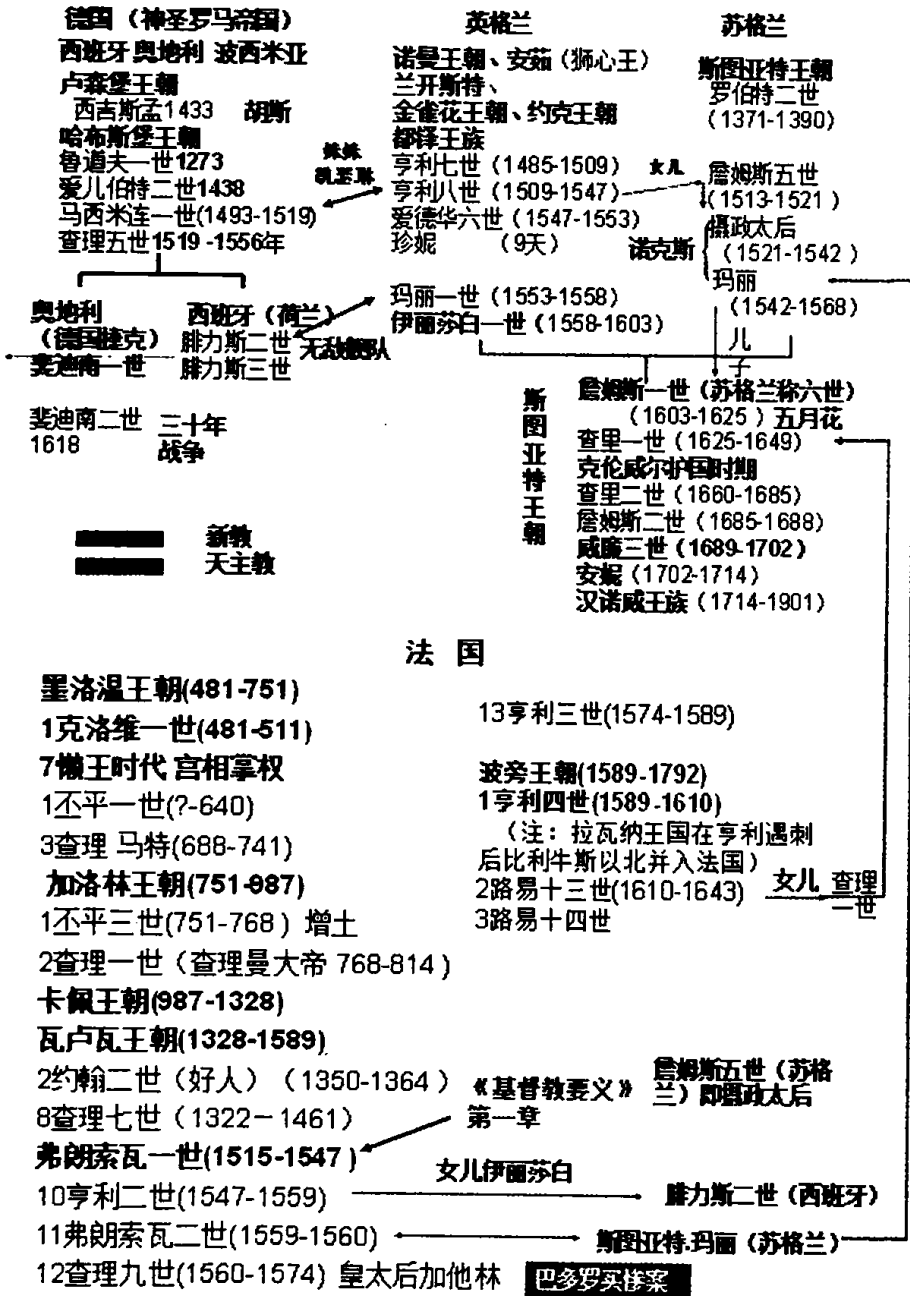
| | | |
|-----|-------------------------|-------------------------------|
| 70 | 本笃五世 (Benedict V) | 964—964 |
| 71 | 约翰十三世 (John XIII) | 965—972 |
| 72 | 本笃六世 (Benedict VI) | 973—974 |
| 73 | 卜尼法斯七世 (Boniface VII) | 974—974 |
| 74 | 本笃七世 (Benedict VII) | 974—983 |
| 75 | 约翰十四世 (John XIV) | 983—984 |
| 76 | 约翰十五世 (John XV) | 985—996 |
| 77 | 贵格利五世 (Gregory V) | 996—999 |
| 78 | 西尔维斯特二世 (Silvester II) | 999—1003 |
| 79 | 约翰十七世 (John XVII) | 1003—1003 |
| 80 | 约翰十八世 (John XVIII) | 1004—1009 |
| 81 | 赛吉阿斯四世 (Sergius IV) | 1009—1012 |
| 82 | 本笃八世 (Benedict VIII) | 1012—1024 |
| 83 | 约翰十九世 (John X IX) | 1024—1032 |
| 84 | 本笃九世 (Benedict IX) | 1032—1044, 1045, 1047—1048 |
| 85 | 贵格利六世 (Gregory VI) | 1045—1046 |
| 86 | 克雷芒二世 (Clement II) | 1046—1047 |
| 87 | 达马苏二世 (Damasus II) | 1048—1048 |
| 88 | 利奥九世 (Leo IX) | 1049—1054 |
| 89 | 维克托二世 (Victor II) | 1055—1057 |
| 90 | 斯德望九世 (Stephan IX) | 1057—1058 |
| 91 | 本笃十世 (Benedict X) | 1058—1059 |
| 92 | 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 1058—1061 |
| 93 |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 1061—1073 |
| 94 | 贵格利七世 (St. Gregory VII) | 1073—1085 |
| 95 | 维克托三世 (Victor III) | 1086—1087 |
| 96 | 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 1088—1099 |
| 97 | 帕斯夏二世 (Paschal II) | 1099—1118 |
| 98 | 杰拉斯二世 (Gelasius II) | 1118—1119 |
| 99 | 卡利克斯特二世 (Galixtus II) | 1119—1124 |
| 100 | 洪诺留二世 (Honorius II) | 1124—1130 |
| 101 | 英诺森二世 (Innocent II) | 1130—1143 |
| 102 | 西莱斯廷二世 (Celestine II) | 1143—1144 |
| 103 | 卢修斯二世 (Lucius II) | 1144—1145 |
| 104 | 尤金三世 (Eugene III) | 1145—1153 |

附录二 教皇表

| | | |
|-----|-------------------------|-----------|
| 105 | 阿纳斯塔斯四世 (Anastasius IV) | 1153—1154 |
| 106 | 阿德里安四世 (Adrian IV) | 1154—1159 |
| 107 | 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 1159—1181 |
| 108 | 卢修斯三世 (Lucius III) | 1181—1185 |
| 109 | 乌尔班三世 (Urban III) | 1185—1187 |
| 110 | 贵格利八世 (Gregory VIII) | 1187—1187 |
| 111 | 克雷芒三世 (Clement III) | 1187—1191 |
| 112 | 西莱斯廷三世 (Celestine III) | 1191—1198 |
| 113 | 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 1198—1216 |
| 114 | 洪诺留三世 (Honorius III) | 1216—1227 |
| 115 | 贵格利九世 (Gregory IX) | 1227—1241 |
| 116 | 西莱斯廷四世 (Celestine IV) | 1241—1241 |
| 117 | 英诺森四世 (Innocent IV) | 1243—1254 |
| 118 | 亚历山大四世 (Alexander IV) | 1254—1261 |
| 119 | 乌尔班四世 (Urban IV) | 1261—1264 |
| 120 | 克雷芒四世 (Clement IV) | 1265—1268 |
| 121 | 贵格利十世 (Gregory X) | 1271—1276 |
| 122 | 英诺森五世 (Innocent V) | 1276 |
| 123 | 阿德里安五世 (Adrian V) | 1276 |
| 124 | 约翰二十一世 (John XXI) | 1276—1277 |
| 125 | 尼古拉三世 (Nicholas III) | 1277—1280 |
| 126 | 马丁四世 (Martin IV) | 1281—1285 |
| 127 | 洪诺留四世 (Honorius IV) | 1285—1287 |
| 128 | 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IV) | 1288—1292 |
| 129 | 西莱斯廷五世 (St.Celestine V) | 1294—1294 |
| 130 | 卜尼法斯八世 (Boniface VIII) | 1294—1303 |
| 131 | 本笃十一世 (Benedict X I) | 1303—1304 |
| 132 | 克雷芒五世 (Clement V) | 1305—1314 |
| 133 | 约翰二十二世 (John XXII) | 1316—1334 |
| 134 | 本笃十二世 (Benedict XII) | 1334—1342 |
| 135 | 克雷芒六世 (Clement VI) | 1342—1352 |
| 136 | 英诺森六世 (Innocent VI) | 1352—1362 |
| 137 | 乌尔班五世 (Urban V) | 1362—1370 |
| 138 | 贵格利十一世 (Gregory XI) | 1370—1378 |
| 139 | 乌尔班六世 (Urban VI) | 1378—1389 |
| 140 | 卜尼法斯九世 (Boniface IX) | 1389—1404 |

| | | |
|-----|------------------------|-----------|
| 141 | 英诺森七世 (Innocent VII) | 1404—1406 |
| 142 | 贵格利十二世 (Gregory XII) | 1406—1409 |
| 143 | 亚历山大五世 (Alexander V) | 1409—1410 |
| 144 | 约翰二十三世 (John XXIII) | 1410—1415 |
| 145 | 马丁五世 (Martin V) | 1417—1431 |
| 146 | 尤金四世 (Eugene IV) | 1431—1447 |
| 147 | 尼古拉五世 (Nicholas V) | 1447—1455 |
| 148 | 卡利克斯特三世 (Calixtus III) | 1455—1458 |
| 149 | 庇护二世 (Pius II) | 1458—1464 |
| 150 | 保罗二世 (Paul II) | 1464—1471 |
| 151 | 西斯科特四世 (Sixtus IV) | 1471—1484 |
| 152 | 英诺森八世 (Innocent VIII) | 1484—1492 |
| 153 |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 1492—1503 |
| 154 | 庇护三世 (Pius III) | 1503—1503 |
| 155 | 尤利乌二世 (Julius II) | 1503—1513 |
| 156 | 利奥十世 (Leo X) | 1513—1521 |

附录三 改教时期欧洲王室谱系



复习题

第一部 旧约教会史背景

- 1、上帝启示的核心是什么？
- 2、怎样从教会历史中理解主耶稣“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句话的含义？
- 3、史实、实录、史观的关系如何，他们最终受什么影响？
- 4、为什么说教会是从伊甸园开始？
- 5、两河流域文明的特征，亚伯拉罕属于哪个王朝？
- 6、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有哪些功绩？
- 7、出埃及的年代和王朝的两种观点分别是什么？争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 8、神在古代兴起几个大帝国的目的分别是什么？
- 9、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为亚述灭亡后，犹太王希西家用什么方法保存了犹太，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 10、新巴比伦王巴拉但的儿子比罗达巴拉但出于什么目的探病希西家？
- 11、犹太人三次被掳的时间、国王、和其中包含的先知？
- 12、巴比伦覆灭的过程和原因？
- 13、上帝兴起居鲁士的原因？
- 14、几个大的希腊城邦及其特点？
- 15、波希战争几次著名战役的简单经过？其中的国王在圣经中的主要事件？
- 16、简单阐述几个著名的希腊哲学流派的观点？
- 17、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成哪四个版图，其中关于以色列关系密切的南北王是指那两个国家？
- 18、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是在哪个王统治时期译成，这个王还建造了什么著名工程？
- 19、南北战争的结果？
- 20、叙利亚时期巴勒斯坦行省划分？
- 21、安提阿克四世亵渎圣殿的原因和过程？
- 22、马他提雅（Mattathias）起义？
- 23、修殿节的来历？
- 24、马加比战死的经过？

复习题

- 25、哈摩斯王朝的内乱
- 26、罗马帝国的后三头是谁？最终谁获胜成为奥古斯都？
- 27、大希律修建过哪些工程，他一生做过哪些恶事？
- 28、圣经中主要记载的几个希律的事迹，他们在希律家谱中的位置？

第二部 新约初代教会史

- 1、凯撒进行帝国人口普查的背景？
- 2、耶稣降生前的一次犹太人起义，为什么弥赛亚降生会给耶路撒冷全城带来恐慌？
- 3、耶稣时代的几个主要犹太地宗教派别？
- 4、死海古卷？
- 5、神为了让使徒将福音传至外邦做了哪些环境的预备？
- 6、尼禄纵火案经过，哪些使徒在此殉道？
- 7、罗马人焚毁圣殿的原因？包括外部的和属灵的？
- 8、主教和教父产生的目的，几个主要地区的主教？
- 9、初代教父革利免、坡旅甲、伊格那丢、游斯丁的主要著作？
- 10、初代教父在三位一体的论述中，哪些比较全面，哪些尚有缺乏？
- 11、举例说明初代几位教父对婴儿洗礼的观点？
- 12、初代几个异端持守的错谬教义？
- 13、论述诺斯底异端的观点，给教会带来的危害？对今日教会的影响？
- 14、初代哪几位罗马皇帝对基督教比较宽松？
- 15、第一位殉道的主教是？
- 16、坡旅甲殉道经过？
- 17、什么是护教士，主要代表人物？
- 18、游斯丁的主要著作，他的著作中有哪些错误观点？
- 19、爱任纽一生主要工作，他的神学思想中哪些为现在系统神学的奠基？
- 20、特土良一生经历，他对教会最大的贡献？
- 21、马可·奥热流大逼迫的特点？
- 22、俄利根的基本教义及对后代教会产生的不良影响？
- 23、神格唯一论及分类？其中哪个在后世教会流传最广？
- 24、德修和戴克里仙的逼迫措施？
- 25、四帝共治制及最后演变结果？

- 26、诺瓦天派主要观点？
- 27、居普良名著，哪个口号为后代教会广泛使用？
- 28、台伯河战役经过？
- 29、米兰敕令？
- 30、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后，采取了哪些推广基督教的措施？
- 31、亚流思想及来源？
- 32、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经过？
- 33、亚他那修的辩护词的主要论据？
- 34、犹利安恢复异教的背后原因？
- 35、亚他那修被放逐经过？
- 36、背诵《亚他拿修信经》。
- 37、马其顿异端？
- 38、加帕多家三杰，每个人的主要恩赐？
- 39、拿先斯的贵格力通过什么方法使尼西亚正统信仰再次复苏？
- 40、狄奥多修的谕旨？
- 41、君士坦丁堡会议经过，君士坦丁堡信经主要内容？
- 42、安波罗修生平主要事迹及著作？
- 43、武加大（Vugate）译本？
- 44、橡树宫”会议？
- 45、聂斯多留的错谬神学？
- 46、主教屈利罗与聂斯多留的斗争采用哪些人的方法？
- 47、以弗所大公会议结果？
- 48、犹提克的错谬思想？
- 49、强盗会议？
- 50、迦克墩会议背景？
- 51、迦克墩会议结果、迦克墩信经主要奠定了那些正统教义？
- 52、奥古斯丁主要生平？
- 53、奥古斯丁与那些异端进行斗争，主要著作有哪些？
- 54、伯拉纠主义主要观点？
- 55、为什么说伯拉纠主义是教会历史最大上的异端？

复习题

- 56、奥古斯丁的救恩论？
- 57、初代教会的五大教区？
- 58、教会开始腐化的原因和现象？
- 59、修道主义最早的几个创立者？
- 60、修道主义形成原因？
- 61、引起欧洲二百年的动荡和民族迁徙的蛮族部落首领？
- 62、几个主要的蛮族部落，其中入侵洗劫罗马的蛮族有哪些？
- 63、西罗马帝国灭亡。
- 64、法兰克人归信基督的经过。
- 65、初代向欧洲宣教的几个主要宣教士？
- 66、导致大贵格利成为教皇的几个主要事件？
- 67、贵格利加强教会的措施？
- 68、崇拜偶像开始——硬币事件？
- 69、废除偶像运动？
- 70、第二届尼西亚“大公会议”和《尼西亚法规》？

第三部 中世纪教会

- 1、阿拉伯人是谁的后裔？
- 2、麦加朝圣？
- 3、倭马亚王朝？
- 4、奥斯曼定本《古兰经》？
- 5、东罗马领地丧失领地和抵抗失败的原因？
- 6、都尔（图尔）之役的简单经过和历史意义。
- 7、查理的政治改革？采邑制、重犁、三圃制？
- 8、丕平赠土及其意义？
- 9、查理曼的主要成就？
- 10、教皇为增加权势两份伪造文件？
- 11、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的原因和经过？
- 12、一位同时任罗马教皇和皇帝的人？
- 13、神圣罗马帝国的产生？
- 14、哪位年轻皇帝掌握教皇任命权？

- 15、什么是“对抗教皇”？
- 16、教会开始摆脱世俗政权的最早事件？
- 17、天主教有哪些主要节期？
- 18、举例说明天主教的偶像崇拜？
- 19、教会的财富的主要来源？
- 20、僵尸审判？
- 21、克吕尼运动主要内容和结果？
- 22、希尔德布兰对教皇国的贡献？
- 23、授衣权之争（卡诺撒戏剧）？
- 24、沃木斯协约？
- 25、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的目的？
- 26、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 27、后七次东征的简单经过？失败原因？
- 28、东罗马帝国灭亡。
- 29、阿尔比派异端？
- 30、英诺森三世在教义和体制上抬高教皇地位的措施？
- 31、英诺森发明哪七项圣礼？
- 32、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 33、瓦勒度派教义？
- 34、方济各修会的创始及其主张？
- 35、多明我修会的主要工作和其中杰出的神学家？
- 36、使教皇势力衰落的人物和事件？
- 37、教皇阿维尼翁被囚？
- 38、哪三个教皇鼎立？
- 39、安瑟伦在神学上的主要贡献？
- 40、伯尔纳有哪些名著？
- 41、举例说明托马斯·阿奎那的天主教的神学的错谬？
- 42、异端裁判所？
- 43、天主教以何为借口禁止平信徒读圣经？
- 44、威克里夫是什么职业，他以怎样的言论反对教皇？

复习题

- 45、威克里夫的著作，他反对天主教什么教义引起最大反弹？
- 46、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
- 47、约翰·胡斯是哪所大学教授？
- 48、胡斯的神学观点有哪些？
- 49、康斯坦斯会议的目的，胡斯为什么参加？
- 50、胡斯殉道经过及影响？
- 51、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的主要贡献？

第四部 宗教改革

- 1、马丁·路德早年生平。
- 2、改变马丁·路德信仰的几个主要事件？
- 3、举几个例子描述天主教对圣物的崇拜的程度？
- 4、教皇利奥十世大量发售赎罪券目的是什么？
- 5、《九十五条论纲》的主要内容？
- 6、教皇使用什么计策使路德差点屈服，神又用什么方法再使他勇敢？
- 7、路德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
- 8、沃木斯国会的经过？
- 9、宗教改革后的德国教会开始了那些变革？
- 10、墨兰顿的教义中主要有哪些偏差？
- 11、智者腓特烈三世为什么一再帮助宗教改革？
- 12、哈布斯堡家族借助什么手段成为欧洲霸主？
- 13、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失败的经验教训？
- 14、奥斯堡和约？
- 15、慈运理在瑞士发起宗教改革的特点？
- 16、慈运理和路德在圣餐上的分歧及后果？
- 17、布林格的神学思想中哪些对后世改革宗教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18、第二瑞士信条？
- 19、重洗派是怎样产生的？其主要观点有哪些？
- 20、明斯特王国叛乱？
- 21、门诺在重洗派教义上作哪些改进，但仍保留哪些错谬思想？
- 22、法国最先发起改教的有哪些人？他们有哪些事迹？

- 23、克普事件？
- 24、标语事件？
- 25、第一版《基督教要义》出版的时间、地点？
- 26、加尔文、法勒尔在日内瓦采取哪些改教措施？
- 27、加尔文被逐出日内瓦的原因？
- 28、加尔文重返日内瓦后采取哪些措施治理教会？
- 29、塞尔维特被处死的原因？
- 30、日内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 31、日内瓦教会的主要宣教重点？
- 32、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中最主要的核心是什么？
- 33、《基督教要义》共几卷？主题分别是什么？
- 34、简述加尔文有关启示、预定、自由意志的观点？
- 35、威廉·丁道尔翻译的圣经是哪个英文圣经的蓝本？该译本对改教有哪些重大意义？
- 36、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的原因？
- 37、《至尊法案》？
- 38、爱德华六世做了哪些改革？
- 39、玛丽的天主教复辟？
- 40、克蓝麦殉道过程？
- 41、三十九条信纲？
- 42、英西大战的导火索和结果？
- 43、苏格兰改教前背景如何？
- 44、苏格兰最先殉道的两位传道人？
- 45、约翰·诺克斯流亡生涯？
- 46、诺克斯返回苏格兰后主要斗争对手是哪两个人？
- 47、诺克斯与玛丽女王论战的焦点是什么？
- 48、苏格兰长老会的体制结构？
- 49、血腥敕令？
- 50、比利时信条？
- 51、尼德兰起义过程？

复习题

- 52、《抗辩宣言》？
- 53、多特会议？
- 54、亚米念为什么完全是人本主义的本质？
- 55、亚米瑞都派？
- 56、索西尼派？
- 57、布雷克牧师主要在哪些城市牧会？
- 58、为什么布雷克牧师两次被停止事奉采取了不同的回应？
- 59、拉巴第派？
- 60、《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的结构？
- 61、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几位国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序言中的对象是哪一位？
- 62、法国几大王室家族，信仰都是什么倾向？
- 63、法国宗教战争？
- 64、圣巴多罗买惨案？
- 65、《南特赦令》？
- 66、天特会议，其中对宗教改革破坏最大的决议？
- 67、掷出窗外事件？
- 6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69、清教徒定义？
- 70、胡珀主要在什么教义上和政府产生争论？
- 71、第一次长老会会议？
- 72、分离派清教徒？
- 73、千人请愿书？
- 74、詹姆斯一世支持国教会主教们制定了 141 条《教规法典》的主要内容？
- 75、英语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简称 KJV）？
- 76、独立派清教徒成立公理会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
- 77、《娱乐声明》？
- 78、五月花号？
- 79、五月花号公约？
- 80、查理一世的天主教复辟措施？
- 81、高教会？

- 82、新模范军？
- 83、克伦威尔后期的宗教政策变化？
- 84、威斯敏斯特会议。
- 85、《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结构？
- 86、克伦威尔执政后期的宗教宽容的表现？
- 87、查理二世恢复安利甘宗？
- 88、浸礼派怎样产生？
- 89、《浸信会信条》与《威斯敏斯特信条》显著不同的地方？
- 90、普通浸信会、特别浸信会？
- 91、贵格会？
- 92、《天路历程》一书的写作背景？
- 93、亨利·马太的著作？
- 94、光荣革命的过程，辉格党、托利党？
- 95、《宗教容忍法》及其后果？

第五部 近现代教会史

- 1、施本尔的《敬虔愿望》的主要观点？
- 2、敬虔主义的严重错谬？
- 3、芥菜种会？
- 4、莫拉维亚所谓“圣灵”大浇灌的背景？
- 5、圣洁会？
- 6、约翰·卫斯理开始露天布道的地点？
- 7、循道宗伦敦会社？
- 8、卫斯理及循道宗的神学观点？
- 9、安立甘怎样打开信仰大门？
- 10、普利茅斯弟兄会分裂后的两派？代表人物？
- 11、救世军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 12、荒漠教会？
- 13、人本主义启蒙运动的几个主要思想家及其著作？
- 14、《容忍诏论》？
- 15、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及后果？

复习题

- 16、拿破仑的宗教政策？
- 17、海得堡大学、埃尔弗特大学失落的原因？
- 18、自然神论？
- 19、康德、休谟、笛卡儿的自由哲学的主要观点？
- 20、新派（自由派）神学创始人施莱尔马赫？
- 21、高等、低等圣经批判学？
- 22、汉诺威王朝对教育的垄断后果？
- 23、牛津运动？
- 24、英国现代彻底向无神论妥协的标志性事件？
- 25、第一次踏入美洲的派别？
- 26、五月花号后率领最大一批清教徒来美洲的是谁？
- 27、怀特腓和卫斯理的教义完全相反，为何他将一批批的露天布道信徒交给卫斯理？
- 28、爱德华滋什么时候、在哪里写下《立志》？
- 29、爱德华滋的《落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是在哪里讲的？
- 30、第一个向印第安人宣教的宣教士是谁？
- 31、爱德华滋因着哪两个事件被他牧养了二十七年的北安普顿教会停职？
- 32、爱德华滋的晚年作过那些服侍，离世的原因？
- 33、《宗教情感》中列举了哪些不是真恩典却常被误认为是真恩典的例子？
- 34、真恩典情感的源头是人被什么吸引而生发的？
- 35、大觉醒后的美洲教会哪些派别产生了复兴？
- 36、普林斯顿大学产生哪些著名的神学家和政治家？
- 37、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 38、基督教各个派别对独立战争都是什么态度？
- 39、《独立宣言》？
- 40、美国建国后采取了哪些宗教自由政策，后果是什么？
- 41、长老会总会的成立？
- 42、第二次大觉醒出现哪些问题？
- 43、芬尼采用了哪些人为的复兴方法？
- 44、芬尼的信仰？
- 45、复兴主义的后果？

- 46、达秘的千禧年国度说著作？
- 47、司可福圣经注释的特点和迷人之处？
- 48、时代论说的基本要点？
- 49、慕迪的传道特点？
- 50、基要派怎样产生？
- 51、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 52、写出几位早期改革宗神学家包括华腓德、伯克富等人的著作。
- 53、美国长老会逐渐向新派妥协的几个标志性事件？
- 54、奥本宣言？
- 55、梅钦同新派斗争的经历？
- 56、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立的背景？
- 57、亚伯拉罕·凯波尔对改革宗教会的贡献？
- 58、分析司布真事奉的悲剧原因。
- 59、第一位成立海外宣教机构的是谁？
- 60、马礼逊来华宣教的经历？
- 61、李文斯顿的非洲宣教？
- 62、威伯福斯怎样废除了奴隶制度？
- 63、你读过赵中辉牧师翻译的哪些改革宗书籍？
- 64、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
- 65、巴特的新正统派迷人之处在哪里？
- 66、写出下面几个异端的创始者及主要教义：
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会。
- 67、灵恩派对教会有哪些毁坏？
- 68、为什么心理学是不合圣经的伪科学？
- 69、猴子事件？
- 70、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 71、PCA 成立的背景？
- 72、福音派采取了哪些与外邦宗教合一的措施？
- 73、后现代主义？
- 74、新纪元运动？
- 75、改革宗教会今天最大的使命？